

河上肇自传

上 卷

[日]河上肇著
儲元熹譯、龙 仁校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目 次

幼年时代、少年时代	5
我所想写的东西	5
爸爸的种种	7
我是祖母撫养大的	11
祖母的种种	13
赛会的回忆	18
幼年时代的极端任性	21
祖母遗传給我的肝火	25
外祖父的种种	28
小学时代的娇生慣养	31
防长教育会和岩国学校	34
岩国学校时代的同学杂志	36
对于我的一个批評	39
离开父母到山口高等中学校去讀書	43
山口高等学校时代的讀書傾向	46
山口时代的吃	48
从文科志願生轉为法科志願生	54
自画像(从无我苑时代到劳动农民党时代的回顾)	59
貫穿于我变化多端的一生中的本质的东西	59
1905年冬天第一次訪問伊藤証信的經過	65
从参加无我苑到退出无我苑	76
对于我的种种批評(一)	84
对于我的种种批評(二)	90
本人的回忆談的史料价值	96
我的愚鈍	102
1924 年前后开始从研究經济学进而研究哲学	110

逐步走上馬克思主义的道路——五十岁前后所经历的变化	126
向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靠攏	138
离开京都帝国大学	151
1928年年底結束安静的书斋生活	159
出席新党成立大会——第一次被捕	167
反映在《社会問題研究》中的自己的心境	180
山本宣治同志惨遭杀害	191
四·一六事件前后	202
建立新劳动农民党的提案	212
自画像(續前)(从无我苑时代到劳动农民党时代的回顾)	221
参加新劳动农民党,在我并不是退却,而是一种前进	221
1930年1月,迁居东京。一开始就糟得很的新劳动农民党	231
劳动农民党解散运动	238
与解散运动有关的一些回忆——取消派的跋扈	255
結束語	272
劳动农民党解散以后,潜入地下以前	275
开始写《自传》时的心境	275
劳动农民党解散后寄去京都的信	276
全神貫注于《資本論》的翻譯和《資本論入門》的改写	280
佐野学的来信	284
成为书斋里的人	286
西大久保的寓所	289
劳动农民党解散后在我家出进的人	292
同共产党的最初接触	295
根据劳动农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決議,成为京都第一区竞选众議員的候选人	298
对于畑田朝治的回忆	303
容易听信别人的話的我	306
畑田的出版事业和《資本論入門》	309
为給共产党提供資金而煩惱	314
二女儿芳子参加实践运动	316

冷冷清清的西大久保寓所	320
古井中的波瀾	322
离开精神上的故乡	324
老友吉川泰岳	327
最初的藏身处, 获得党籍时的感慨	331
取消派的暗中活动和櫛田民藏	334
从躲到櫛田家到离开他家	340
西川一草亭家	349
搬到党所指定的藏身处以前	355
“劳动农民党解散以后, 潜入地下以前”的补充	361
曇花一现的地下时代	368
难忘的一百多天地下生活	368
风間丈吉	374
初次会见奸細松村	378
老母进京	383
在藏身处写的《新綱領》的解說。岩田义道之死	386
迁居到画家椎名家	391
椎名的《二楼上的河上博士》	396
大塚有章的逮捕	405
藏身处被特高发现	410
同芳子见面	413
被捕	419
地下生活的終結	424
未决监生活(被捕以后、下獄以前——《獄中独語》 执笔前后)	428
中野警察署的拘留所	428
《手記》里的假話	436
戶泽檢察官的訊問	441
关进丰多摩刑务所后不久, 势如决堤洪水的疲劳	447
病房生活	453
稀奇的錯觉	460

对于保释的希望	468
一切都忙乱不安的市谷刑务所	478
市谷未决监里的生活	484
户泽检察官的谈话	489
写《狱中独语》的经过	497
《狱中独语》的被迫修改	504
《狱中独语》的在报纸上发表	509
《狱中独语》的内容和写作当时的思想情况	516
继续抱着缓刑的希望	519
第一次公审	525
宣判	530
撤回上诉	534
下狱后的生活	538

幼年时代、少年时代

我所想写的东西

今年^①我用《自画像》这个题目，相当详细地写了从我二十六岁参加“无我爱运动”起直到五十岁后竭尽心力设法建立和解散劳动农民党为止那段时期的一些回忆。那段时期，不妨说是我一生的核心时期。当时我想，如果能把这一时期的经历写出来，也就死而无憾，所以每天从早到晚很紧张地伏案工作着。等到写完，我犯了老毛病，又像两三年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发烧，到近来，更是往往连日卧床不起；可是看起来也不见得马上就会死，在健康恢复正常的日子，仍旧可以早晨五点钟左右就起床，马上开始工作，写作的兴致和精力，幸而一点也没有衰退。

可是写完《自画像》以后，我已不想再写个人的回忆了，于是改变写作方向，写几年前开始写的陆放翁诗的笺注。这个工作做开了头，倒也很有趣味，于是天天继续不断地写着。这样，到昨天，终于完成了一百八十余页的《六十后半（六十四岁到七十岁）的放翁》。

下一步又写点什么呢？今天早上，一边这样想，一边坐到书桌前面。这几天秋高气爽，中午暖和得像三春天气，我本来心想，这种天气出去散散步对身体倒有益；可是一个人呆在充满阳光的楼上，穿着轻衫，舒舒服服地写点东西，那又是多好呀！（我有时不禁

^① 指1943年。——译者

出声地自言自语：“多好呀！”）天气既然这样好，身体又没有毛病，就觉得光阴错过了可惜，实在舍不得出去。目前想写的东西，有以下三种。

一个是对陆放翁入蜀时的诗的评介。关于放翁，我已经写过许多文章，比如《放翁绝句十三首（日译）》、《放翁诗话三十章》、《陆放翁诗二十首》、《陆放翁诗二十首续篇》等几个小品，还有《六十前后（五十八岁到六十三岁的五年间）的放翁》、《六十后半（六十四岁到七十岁）的放翁》、《古稀的放翁》、《八十四岁的放翁》等几篇。接着我想到以《入蜀当时的放翁》为题，写一篇东西，介绍关于放翁在四川（这是他生平一想起就恋恋不舍的地方）时的作品。《剑门道中遇微雨》那首诗——“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可算是他的杰作之一吧，可是“此身合是诗人未”这句诗的解释，就往往因人而异。我所藏的那个本子，原来的藏书者还加了这样一个批语：“的是大诗人，故作疑问，何等风格。”我就怀疑这种看法未必妥当。我认为，这是诗人在微雨中骑驴经过他素所向往的名胜剑门时，诗兴勃发，不能自己，因而发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果真是个什么了不起的诗人吗？这样无穷的诗兴，是来到这里的任何人都能发生的吗？从这句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当时的诗兴已经达到了最高峰，那种激动，像春潮一样，我们简直可以听到它的汨汨波动的声音。这个看法也许不对头，可是，这却是我的解释，和那些所谓汉诗注释专家的解释自然不同。我就想用这样的看法，来写《入蜀当时的放翁》。一旦着手写的话，恐怕在今后一定的期间内，全部时间都将用在这个工作上。

另外一个写《自画像》的续篇。原先写的《自画像》，只写到我怎样竭尽心力设法解散劳动农民党为止。可是，不久以后，我就

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接着被捕，坐了四年半的监牢。因此，我想把这中间的经过详细地写出来，如果有兴致的话，还预备谈谈那时到今天的心境变化。本来，前几年被释放出狱后，我跟着就写了长篇的《入狱记》，现在再来写《自画像》的续篇，照说是件重复的工作。其实不然。因为，当初那篇《入狱记》，是在刚出狱、头脑还没有完全冷静下来的时候写的，有些地方，取材未必得当，而且当时心有余悸，还有些前怕虎后怕狼，因此，虽然我并不是小说家，写那篇东西却班门弄斧地通篇用了小说体裁，所以想把它从头改写一遍。这一次要是写的话，想从上次写的东西里删去许多东西，另外添进一些东西。这个工作，动起手来，自然还是相当有趣，在一定时期内，所有的时间也许都将被占去。

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题目而外，我还想到一个题目，那就是幼年时代、少年时代的回忆。许多杰出的人物像卢梭、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片山潜、岛崎藤村等，都写过少年时代的回忆，我也想学学他们的样。

这三个题目，我一时也不知写哪个好，这就好比吃饭的时候来了三盆好菜，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到底吃哪一样，从哪里下筷；直到最后，才决定写最后一个题目。这样一来，近年来所醉心的陆放翁的诗，自然就要搁一搁了。因为，我的个性，不能同时做两三件工作，要是拣定了一个题目，不把它做完，就不能分心搞其他的東西。

爸爸的种种

爸爸幼名叫做“源”。我的名字“肇”，很可能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因为两个字的意思相近）。爸爸后来改名源介，又改名忠左卫

門(这是采用了祖上的名字),最后定名为“忠”。这个字眼,在日本的古代語言里,是不虛飾、质朴、素朴、淳朴的意思;在现代日本語里,是率直、溫和、順从、柔和的意思。爸爸的个性,如果用一个字来表现的話,那就沒有比这个“忠”字更恰当的了。他六岁就丧父,由我祖母煞費苦心,撫养成人,他后来一半也是为了报答这种鞠育之恩吧,無論什么事,从来也沒有违拗过活到九十六岁的我的祖母。不管祖母对他怎样蛮不讲理,他总是和顏悅色,百依百順。爸爸活到八十岁,是春分节那天死的。因此,我追尊他法号叫做“全孝院到岸日忠居士”。我家世世代代都信佛教日蓮宗,祖先死后的法号多半带一个“日”字。爸爸的“全孝院到岸日忠居士”这个法号,我觉得十分貼切,是一个字也不能更动的。

爸爸所制的家譜里,在“第十四代忠、致利”的下面,有下面这样一段文字(致利是他的官名):

“祖父瀨兵卫,1855年2月18日,因风蠟残年,朝不保夕,向藩主吉川公申請退隱,以嫡子嗣家业,当蒙批准。同年九月,祖父瀨兵卫逝世,嗣子呈請退还因功永世受領之祿米两包、紋銀一枚。蒙批示:祿米一节,事出成規,又念死者积年功勛,于两包之外,更賞一石,共折合虛俸十九石。1868年,明治維新,王政復古,廢止虛俸,改为現米八石。1878年变法,改革国内一般武士階級之俸祿制度,蒙一次賜給公債票五百元正。”

我所写的另外几篇回忆录中,也曾經一再提到过:有些杂志的評論里,在談到我的身世的时候,总爱把我說成是封建諸侯的重臣家庭出身。其实,我家的俸祿,到我爸爸的一代,增加了一石,才不过十九石,而实际的收入,每年只有八石(俸祿額原来是指采邑的总生产量而說的,加在土地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头上的这种封建剝削的实际收入,大抵不到原定額的一半);1874年改为一次发給公

債的时候，只抵到五百元。新近看到《渡边华山》^①这本书，内中說到渡边华山的父亲市郎兵卫俸祿本来有六十石，可是因为孩子多，自己又不善于理财，所以生活非常困难。虎之助(华山的幼名)八岁那年，被挑选做小藩主的书童的时候，侍候在小藩主身边，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出外既没有雨伞，也没有灯笼。可是我家的收入，还不到他家的三分之一，所以我的家庭可以说是最最可怜的穷武士家庭。

关于明治以后爸爸的經歷，旧文书上有以下一些记录。1869年項下：

“1869年8月10日，卸去保甲办事員职务。同日，保甲长丰島郁太郎命充任办事处會計。时年二十二岁。”

1870年項下：

“1870年6月3日，……参加政事局工作，被任为山川氏之助理書記。”

又：“1870年12月21日，接到通知，命于次日赴政事局……免去前此所任山川氏助理書記职，改任會計局检使委任書記。”

再看1872年項下：

“1872年8月20日，被任为川上須通村副保长。”

这里所說的須通村，历来就是我们河上家的采邑。

同年10月17日，还有“被任为錦见村副保长”的一条，以后就没有记录了。錦见村是我们居住的那个村子，现在叫做錦见，是岩国市^②的一部分。爸爸大概一直继续当錦见村保长，接着当錦见村村长，不久錦见村和岩国鎮合并、成为該鎮的一部分的时候，他

① 渡边华山(1793—1841)是德川幕府末期的画家，他的代表作有“千山万水图”、“虫魚帖”等。——譯者

② 岩国市在日本本州西南端山口县的东部。——譯者

可能就当了岩国鎮这个市鎮的鎮长。市鎮制度頒布以后，鎮长要由选举产生，可是爸爸却一再連任，一直到年岁很高的时候才辞职。

如果到鎮公所去(这个鎮公所是后来新建的，最初設在小学校里)，就会看见，对着正門进口的地方，爸爸总是穿了整整齐齐的日本服，坐在桌子前面(他年輕时候那种精力充沛的样子，到现在还像是在眼前一样)；在那間很大的屋子的两边，排列着管會計、庶务、戶籍之类的人員的桌子。冬天，像那样大的西洋式的、用板壁隔开的大屋子里，却照例不生火炉，只是在桌子旁边放一个火鉢。回想起来，从前的人，身体真强壮，因为那时，下身連棉毛衬褲都不穿哩。

爸爸到底是哪年辞去鎮长职务的，手边沒有确凿的資料可查。假如我記憶得不錯的話，那大概是我大学毕业的前后，当时他是五十五、六岁。

这样算起来，他从 1872 年当錦见村的副保长起，后来当保长、村长、鎮长，名目虽則換了不少个，可是一生之中，前后三十年工夫，几乎完全在同一个地方干着同样的工作。爸爸和我不一样，他凡事不喜欢有所变化。比方說，即使是一个水桶，他也爱用向来的木桶；用洋鉄桶打水，說不定整个錦见村里要数他是最后一个。

他辞去鎮长的职务以后，馬上就做旧东家吉川子爵家的老管家，直到他八十岁老死，一直担任了那个工作。现在翻看一下留在我手边的 1924 年 11 月 30 日他的来信，里面有这样一段話：

“收到你 11 月 26 日的信，信上恳切地表示要好好奉养我，让我晚年能称心地过活，这种孝心是可嘉的。俗話說，‘年老从子’，这本是自古以来的金科玉律，我也很願意这样做……但目前手足还輕健，向来常做的工作还是想尽可能做下去，能做到几时为止，虽

然还說不定,但是拿目前來說,我唯一的願望却是用自己掙的錢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所以你如果听我随心所欲,我反而自由自在……希望你暫時忍耐一个时候吧……”七十七岁的老父,当时由于这样一种心境,竟然拒絕我給他寄生活費,而我呢,那时已經当了大学教授,稿費收入尤其可观,所以經濟正十分寬裕。他直到八十岁老死,終身沒有閑过一天,每天上班工作(严冬下雪的天气,来回經過拱背的錦帶桥,这特別是在他晚年,想来是很艰苦的),完全靠自己的收入維持生活。想起来,不仅在錢一层上,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他都不願意麻煩自己的儿子(我这句话,是回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說的)——像这样的爸爸,世上恐怕不多见吧。

我是祖母撫养大的

关于爸爸的回忆,将来有机会还想另外写一点。我所感到幸福的,就是爸爸沒有給我留下半点不好的印象。自从他去世以后,追慕之情,与日俱增,我只恨自己当时沒有好好孝养他。

世上有的是那种給子孙留下巨万财产或爵位的好父亲,我却絲毫也不羡慕。我觉得,像我的爸爸那样,不給儿子留下半点坏印象,只留下好印象,世上沒有比这样的爸爸再好的了。

陆放翁詩中,有这样两句:“果能称善人,便可老乡里。”我有着一位一輩子生活在乡里的爸爸,这虽則不能向別人夸耀,但內心却十分高兴。我是爸爸三十二岁那年(1879年)10月20日黎明出生的长子。

媽媽的娘家也姓河上,和我家出自一个祖先,庆长(1596—1614年)以后才分出去。明治初年,俸祿每年二十七石六斗,再加一点津貼,媽媽的娘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世。

爸和媽是 1878 年 6 月 15 日結婚的，那時爸爸三十一歲，媽媽十七歲，年紀比爸爸小十四歲。結了婚九個月，到 1879 年 3 月 11 日，他們就離婚了。過後不久，才知道媽媽已經有了身孕。屈指算起來，離婚當時，已經懷孕三個月了。

爸爸 3 月里和媽媽離婚後，那一年的 7 月里又和井上章的妹妹紫衣結了婚。就在那年 10 月，我在外祖父家呱呱墮地了。

接到生了兒子的通知，爸爸馬上穿得端端正正的帶了乳母來到外祖父家接我。祖母守在自己家裡等候着，看到乳母抱着我走進比大路還高的大門的時候，她親自走到二門口來接，並且招呼乳母說：“今天該從這裡進來。”

由於這樣的原因，我是沒有吃媽媽的奶而長大的。等到後來我長大成人，媽媽告訴我，她產後乳房脹得非常難過，就用棉花扎上白布，做成乳房模樣，送到妙覺院菩提寺門口的土地堂里，掛在門框上作為供品，求土地菩薩保佑她的乳房不痛。

餵我奶的乳母，她自己的孩子有幾歲，沒有人知道；不過當時還根本談不到什麼衛生思想，再加祖母對於這類事情又是根本不介意的，所以當時我所吃的奶，濃度恐怕很不合適。本來對於我來說，最好的乳汁應當是十八歲的親生媽媽乳房里滾滾流出來的乳汁，可惜那些乳汁都讓妙覺院的土地菩薩給吃了。到後來，兄弟三人里，數我的體格特別差，原因也許就在這上面。

我那位乳母有氣喘病。祖母放心不下，不久就歇了她的工。從此以後，就用粥湯餵我，因為那個時代還沒有牛奶。我晚上睡在祖母的懷抱里。祖母二十五歲就成了寡婦，我出世的時候，她已經五十二歲了。她的乳房里，當然不會流出什麼乳汁，可是由於我經常吮吸，終於流出一種透明的液體，用手擠的時候，那液體像綫一樣地噴射出來，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分泌物。雖說這類事情世上

少有，不过請教一下生理学家，也許可以明白它的成分。我小时候吸的，就是这种东西。

我出世不到一年零两个月，继母生了一个男孩子。这就是我的二弟暢輔。暢輔生下来还不到三个月，他的生母又被离掉了。据说继母生了她自己的孩子以后，經常虐待我，比方說，有一次提着我一只手，把我吊到井里去，結果把我的肩胛骨都弄脱臼了。特別鍾爱我的祖母，据说为了这一层，就让爸爸把第二个媽媽离掉了。这是我长大后从旁听到的，事实究竟怎样，我当然无从知道。

不仅祖母鍾爱我，外祖父也非常疼我。媽媽是外祖父的最小的女儿，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姊姊又都不在家乡，除了我这个外孙以外，外祖父再沒有直接爱撫孙儿的机会，所以他为了看我，常常来我家。据说每次他来时，祖母总是特地买了肥大的銅盆魚，备了酒，款待他。1881年3月，继母走了以后，重新同媽媽結婚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結果，那年的7月4日，重新成了亲，媽媽这才开始和我住在一起。因为有这样一番情由，所以我們家里，大儿子倒是媽媽的嫡亲儿子，二儿子却是继子，真是世上少有。那时我虛岁三岁。

不过，因为我直到这时为止，完全是由祖母一手撫养，每夜都是吮着祖母的干癟乳房过夜的，所以我只知道恋祖母而不知道恋媽媽。所以，每天晚上，媽媽抱了弟弟睡在正房，我却仍旧伴着祖母睡在另外一栋单独的房子。陪着祖母睡在一床过夜的習慣，以后繼續得很久，到现在我还記得。

祖母的种种

我家的住宅是两个院子合并起来的，那是因为1875年7月4

日我家把隔壁人家新盖的住宅連地基买了下来的緣故。历代祖先所住的茅屋，不久就倒塌了，后来就利用旧木料，拣西边院子里阳光充足的地段，給祖母盖了一栋单独的房子。我小时候就是在那栋单独的日子里和祖母生活在一起的。

不过，这只是我記憶中的情况，其实当我还在吃奶的时候，祖母住的单栋房屋还没有盖。

1872年爸爸当了錦见村副保长，这在前面已經讲过了；至于后来当保长是哪一年，我手边却没有确凿的資料。不过，說不定是不久以后的事吧。那时候的保长办公处，就像今天的三等邮局一样，是以保长的私宅来充当的。祖上传下来的西院的西南角上盖造的茅草頂平房，就是爸爸最初在那里办公的保长办公处。媽媽在出嫁以前，据說偶尔也到那里买公文紙。日本式的屋子里放了矮桌和火鉢，爸爸就坐在棉蒲团上办公。那时，祖母住的单栋房屋，在西院东南角上；媽媽嫁过来的时候，正屋已經搬到东院新盖的瓦房里去了，而祖母住的房子，还是原来那个地方。这样說来，我刚出世后所住的地方，就是那里了，但是那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当时我还在襁褓中，所以一点印象也沒有。现在所記得的，就是后来那所用旧木料新盖的单栋瓦房。那房子的主室，是一間鋪六张席垫^①的屋子（附有三尺宽的摆設間和六尺宽的壁櫥），东面和南面是紙門，門外是狹狹的廊檐。除了这六张席垫的屋子而外，北边还有一間朝西的小屋子（祖母最后就死在那里）和朝东的一間小小的厨房。（现在这栋房子也倒塌了，就在那片阳光充足的地基上盖了新屋，由媽媽住在那里。我好久未能回家乡去，始終未曾见到媽媽所住的新屋，真是遺憾得很。）

^① 日本式的房子里，都鋪席垫，人就在那上面坐臥。席垫長約六尺，寬約三尺，厚一寸余，屋子的大小就用鋪几张席垫来計算。——譯者

祖母二十五岁就守寡，后来二十多年工夫，她把一个女人的最美好的年月完全消磨在操持家务上，结果还清了上代留下来的债务，还用积蓄下来的钱买了东邻的住宅；直到这时，她才开始喝酒，享受人生的乐趣。爸爸深知她前半生吃尽了千辛万苦，所以一点也不阻止她。关于这事，非常谨慎的爸爸这样写道：“妈妈壮年的时候一口酒也不喝，到我成人以后，每每劝我喝点酒，说是不能喝酒的人，应酬交际不方便。后来久而久之，她自己也喝起来，一直到她晚年，哪天都得喝几杯……”。

住在原先的单栋房子里的时候，祖母养了一个年轻小伙子，早晚供以酒食。十七岁刚嫁过来的妈妈，每天得给准备酒肴，送到祖母住的单栋房子里去。

祖母年轻时虽然滴酒不入，可是喝上了以后，酒量却似乎不小。吃酒的时候，老爱搳拳。搳起拳来，把筷子夹在手里，嘴里哇啦哇啦地吆喝着，互争胜负，输家罚酒：这种玩意儿，今天一想起，总觉得不大高尚。祖母是肝火很大的人，有时喝到后来，竟喝得近乎发酒疯了。

到以后盖了新的单栋房子、我开始懂事的时候，那个年轻小伙子已经不在。那小伙子由于祖母的成全，跟一个女人结了婚，祖母还亲自参加了他们的婚礼。祖母是个精明的人，似乎从来没有受男人的骗，给敲一笔竹杠。

我记得还有一个住在附近的单身汉，一年到头和祖母在单栋房子里一起生活，简直成了家属的一个成员。祖母每天让那人陪她喝酒，妈妈就在正房准备好酒肴，白天晚上往单栋房子送。我直到年纪相当大时，还陪着他们两人在一起吃饭。

妈妈因为家务忙，没有工夫管我，我幼年时代，到东到西，总是祖母带我去。在这种时候，她毫不在乎地和上面所提起的那个单

身汉走在一起。由此看来，祖母是个完全不顾一切所谓体统而独行其是的人。还记得后来我上了小学，有一次小学里的同学谈起那个单身汉，把他错当成我的祖父，我还很不舒服哩。现在想起来，那种误解，可以说是很自然的。

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个人曾带我到一个叫做长久寺的寺院去听过一次演讲。那个时候，自由民权论在日本风行一时，全国到处都举行演讲会。主持会场的人，向听众收取一定的入场费（他就靠着这入场费吃），站在讲坛上向听众宣布说，听众可以随便提出哪个问题来辩论，他一定能赢，如果输了，入场费可以退还。那次辩论的题目，记得是禁烟论或禁酒论，听众一提出这个题目，他马上就谈了他的意见。可是他那种意见，听去完全是在用强力压服人家，连我这样一个小孩子，都觉得很不对头。这种印象，到今天还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时代，乡下不大有什么文娱活动，所以尽管祖母目不识丁，居然参加了那次演讲会。而我呢，无论她到东到西，总是跟着去的。

锦川的锦带桥左边河岸上，搭着一个棚，常常演戏。每当演戏时，演员总是坐着人力车，前面张着旗，打着鼓，穿过大街小巷，以广招徕。每次演戏，祖母总是必到的。

那时还没有固定的戏院，演戏的时候，就在河滩的鹅卵石上铺些草席，让观众坐在上面看戏，简直就是席地而坐。去的时候，我们带了提篮，提篮里放着煨鱼、煮鸡蛋、饭团子之类，还带一个温酒的小风炉，炉子里还放好熟炭，另外还带条红毡毯。逢到这种时候，妈妈也和我们一起（爸爸从来不去，总是在家里看家。他生平几乎从来没有看过戏）。当时警察还不太管有伤风化的事情，所以舞台上常常演出色情的场面。例如，舞台正面摆一架矮屏风，一对年轻男女藏在屏风后面，女的解下衣带，搭在屏风上，这时

从后台走出一个老太婆，瞧着屏风那边，把两手的手指搭在一起，手掌一合一合，做出一副怪相，然后退场。遇到这种场面，看客就兴高采烈，齐声喝采。当时我还不过七、八岁，自然不明白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尽管这样，在我那小心眼里，却也知道那不外乎是些下流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夜里，舞台上照明很差，重要角色上场，要用蜡烛火照着。一些头上戴了黑头巾的人，点燃起装在很长的柄上的蜡烛，长柄一抖一抖，随着角儿的一举一动，前后左右地照着，时时刻刻地设法使角儿的身段表情能让看客看得清楚。

这类戏的演出，多半总在夏天。除了那个戏棚而外，河岸上还有许多店铺，东一家西一家地点着灯笼和洋灯，卖着甜酒啦、冷饮啦、西瓜啦之类。河里还有一两条专门卖鸡肉鸡杂做的高级菜的船，还可以听到弹三弦的声音。另外，河滩边上还拴着两三匹马，只要花几个钱，就可以租给孩子们骑。这马，暢辅弟弟很爱骑，而我却是个胆小鬼，一次也没有想骑过。有时候游客也聚在一起唱“浮节”小调，这种小调现在叫做“浪花节”。从傍晚到天黑，乘凉的人特别多，那些想卖弄好嗓子的人，往往从一、二十里以外的村子步行着（那时还没有自行车）赶了来，站到台上去，不要大家花一个钱，白唱给大家听。

离灯火较远的阴暗地方，常常有一对对的青年男女在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丝毫不管对孩子的教育上会发生怎样的影响，祖母总是大声谈论着这类事情，所以到今天我还记得起来。

有时候，戏班子走了之后，就来一个现今所说的马戏班。我在那里曾经看到几个彪形大汉被绑在高高的柱子上，扮演着受磔刑的角色。那些人是真的人；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怎么一个人能一连几个钟头地扮演那样的角色，供人参观。还记得有个能把脖子伸

得老长的女人，抽着一支很长的旱烟袋。

夏天我每夜跟着去河滩看戏，到回家的时候，总是走不动，足见当时我的身体是很弱的。童年时候那样热闹的河滩，后来竟变得十分冷落，我不明白那是什么道理。

[补记]没有想到记述我的童年竟牵涉到了祖母的私人生活；其中有些东西，说不定不应该那样写。其实，我从小受到祖母的鞠育深恩，一想到她，眼泪都落得下来，所以丝毫也没有伤害她的人品的意思。结果写成这个样子，其实是要说明祖母的顽强的性格，而且觉得自己承继了她的这种长处，尽管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但从自己的性格中可以找到她的缩影，我是很感激她的。

还有，关于祖母的私人生活，我从来没有听到谁议论过一言半语。我是很自然地融化在她的私人生活中而长大的。许多事情不过是我长大以后自己这样理解的，或是根据亲戚们的谈话这样想像的。为了不致伤害我父母（他们两人对于祖母特别尊敬）的谨慎，所以特地记上一笔。

赛会的回忆

祖母活到九十六岁，几乎从来没有到佛寺烧过香。她讨厌佛寺而喜欢属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的神社。平常，偶尔想起，她就去参拜神社；邻村有什么赛会，她一定带着我去看。渡过锦川（岩国川），西边有个川西村，我姑母就嫁在那里，所以那村上的小小的稻荷神社（司五谷丰登）要是举行赛会，或是有别的赛会，我们总是去看。赛会里有一种原始而简单的舞蹈，叫做“十二之舞”，给童年的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两三个人在大约十二尺见方的一块场地上，四面围着草绳，站在那里，口中念念有词，刚一念完，手和脚就

像触了电那样大揮大动起来。那发噱的舞姿以及与舞蹈相应和的吆喝声的那股說不出的吸引力，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还留在我的耳朵和眼睛里。記得十二之舞中，还有拿着木头做成的男性生殖器在褲襠下揮舞的一幕。我們看完賽会，总要买点搓成圓条的栗子糕带回家。买虽买了回来，我却总是沒有胃口馬上吃掉它，扔在一边，到阴雨天气，就让它点在点心匣子里霉掉。

我們河上家的宗祠椎尾八幡宮祖神的賽会，每隔三十三年才举行一次。那是因为有一次出会时，看会的人麤集在錦带桥上，陈旧的栏杆禁不起众人的压力，坍塌河中，靠在栏杆上的人跌到河滩上，死伤很多，于是大家认为那是祖神显灵，不願意每年出会，从此以后就决定每三十三年賽会一次。至于每年举行一次的賽会，其中仪仗队伍最盛的，要数邻村的今津八幡宮。1934年10月4日，那时我还关在小菅刑务所^①的监牢里，回想起每年中秋时节的今津八幡宮賽会，在家信里曾写过下面这样一段話：

“……小时候随着祖母和母亲，带了紅毡毯、温酒的銅风炉和装着各种菜肴食物的提籃，去邻村看会，那印象到现在还非常清楚地留在脑子里。我們在道旁小山上一棵老松下占了地方，毡毯鋪在草地上，把带来的食物分装在小碟子和紅漆盘子里吃着。提籃里花色繁多，有加生姜煮的銅盆魚片，有切得薄薄的煮鸡蛋，有配上胭脂色洋粉和黄色煎蛋小丁的什錦飯团，还有糖酸藕片。捡些松針生上风炉，祖母所爱喝的酒散发着扑鼻的香气。山上山下鼓声鞞鞞，不一会，那扮成封建幕府时代諸侯卤簿的仪仗队，肃靜地从山上走下来。这些僕从模样的卤簿，腰里插了腰刀，一对一对地排好，手里拿着形形色色的枪啦、弓啦、箱子啦之类，重重地

^① 刑务所就是拘禁犯人的地方，旧称監獄。——譯者

踏着步，边吆喝边向前走。有时候，队伍随着拍板的响声而中止前进，每一对人交换着他们手里所拿的东西。交换东西的时候，两人成一斜对面，脚下踏着拍子，互相把手里的东西扔给对方。扔的时候，枪杆滴溜溜地转，枪缨左右飘拂，枪柄一弯一弯，在空中呆了半天，然后稳稳当当地落入对方的手里。在旁边观看的幼小的我，张大了惊异的眼睛，为他们捏一把冷汗。仪仗队之后，就是骑在馬上的神官以及神輿，最后就是各村抬来参加赛会的大鼓，鼓上载有花团锦簇的傀儡，扮的是儿童们在童话故事里早就熟悉的加藤清正啦、牛若丸啦、桃太郎啦等等事迹。那样的赛会的仪仗，今天居然还是能看到，真是教人神往之至。不过，就像久客异乡、后来回到洛阳的白乐天的两句诗所说，‘昔别今来二十年，唯觅少年心不得’，赛会的仪仗虽然如旧，可是当年那颗瞠目而视的少年心，却再也找不到了。这样一想，过去的事情就格外使人神往，想说的话说不尽，可是纸却写完了。”

这封信是九年前写的，当时我还关在监狱的单身房里，从早到晚没有一点机会同人家说说话，每天只是从窗洞里独眺西边的天空，一味耽于少年时代的回想。今天对着这样一封信，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果然有这样好的记忆力，把小时候的印象写得这样淋漓尽致。牢狱里的囚犯，每月可以和外界通两次信，每次的信，只许写一张纸。现在重读当年在寒冷的牢房里所写的这封信，心里不觉一阵难过。

我还记得很清楚，后来过了很久，我随着祖母去宫市的天满宫朝山进香。这是我进山口中学的前一年，那时我虚岁已十四岁，十足年龄是十二岁零五、六个月。我和祖母两人是坐了一辆双人人力车去的。要是在今天，只不过三小时火车的途程，可是在当时，却得在半途上宿一宵。人力车夫也住在同一个旅馆里，费用由

雇主負担。那时的旅館，对于这种事情已司空见惯，把雇主领进上房，却让車夫住在另外給安排的屋子里。第二天动身的时候，还准备好三个人吃的飯食，用箬叶包成一大包，給带走。等到中午該吃午飯的时候，就走进刚巧碰上的茶館，泡壶茶，吃了飯，休息一会，再上路。至于那宮市的天滿宮，现在想起来，不过是小小的一座庙宇而已，为什么当时竟然花費那么多的錢去朝山进香呢？大概与其說是出于信神，倒不如說是为了游山玩水吧。正当春和日暖的天气，祖孙两个，坐在一辆人力車上，让年迈的車夫慢慢地拉着，坐厌了的时候，就随便下来走走，像这样翻山涉水，眺望着高高低低的峰巒，走在两边都是哇哇圃圃的官道上，走一整天也不觉得累，这样的旅行，比起今天的乘火車来，实在更加愉快，更加悠閑从容。所以，从某个角度來說，我在幼年时代，托祖母的福，是着实有过一些鋪张浪費的游山玩水的事的。有一次，正当学校放春假，一位素来相識的、比我早一年到山口去讀书的邻居，独个儿騎了一辆自行車，回到家乡岩国来，我們无意之間在古松林立的街道上碰到了他。祖母对那个人說：“肇明年或許也要到山口去讀书，那时还得請您多多照应。”祖母說話时的那番誠懇的态度，到今天还活生生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幼年时代的极端任性

大概是因为三十二岁时才生下我这个大儿子吧，爸爸老早就送我上学。1884年3月，我才四足岁零五个月，就入了小学初等科。一則因为入学年龄那时并没有规定，再則爸爸是村长，就管理着小学校，所以哪岁上学都不成問題。

刚上学那年的习字，包括最初在习字紙上写的“イロハ”这样

三个正体字母，全部由爸爸保存了下来。写的时候，老师先在紙上用指甲掐出痕迹，然后握住我的捏笔的手，照着痕迹写出来，所以实际上那是老师写的字，而不是我写的字，可是字的旁边却仍旧打着紅圈。由于我是村长的大儿子，在級里岁数又最小，大概給老师添了特別大的麻煩。

入学那年的8月12日，我得了一张小学初等科第六級的毕业証书；过了两年，也就是第三年的3月16日，又得了一张第三級的修业（这一次却是“修业”）証书。大約就在那个时候吧，爸爸让我把衣服穿得端端正正的，捧了那张修业証书，帶着我去见那快要断气的外祖父。前面也曾提到，外祖父非常鍾爱我，在他的孙男孙女中間，最疼的就是我；他看到那张修业証书，照例非常高兴，結果給了我十个一角錢的銀角子，算是奖賞。外祖父睡在朝北的佛堂里，为了逗我高兴，他把那些嶄新的銀角子排列在他床边的席垫上。那时，我家历来的俸祿被折成五百元公債票，也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所以这十个一角錢的銀角子，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个极大的奖賞了。

在那件事情以前，外祖父曾經到他的大儿子（名叫謹一，那时在外务省工作，后来做过日本銀行的理事，又做过住友銀行的理事。他是日本最早的法学士，现在还活着，已經八十八岁了）家里去住过一陣。下面是他当时写給家乡的我媽媽的信，日期是11月20日，沒有写年份。推算起来，大概是1884年，也就是我虛岁六岁那年。

“11月12日写的信，昨天收到了。天气这样冷，而大家都平安无事，非常可喜可賀。但是据来信說，肇孙牙痛，面頰虛肿，粥飯都不能吃，只是吃柿子。柿子对于牙齿虽說不大好，可是既然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也只有吃它了；不过想来总是很痛苦吧。本来，假

如是蛀牙的話，不如趁早拔掉；不过这样一来，就要受很大的痛楚，未免可怜；可是我这里也没有什么特別好的药；但願他早日全愈。可虑的是，今后說不定还时时要疼痛，希望好好注意才是。我們这里大家都安好。我自己五、六天以前也害牙齿痛，面頰也虚肿，吃东西很困难，心情很不愉快。呆在家里，不免想这想那，所以索性每天出去跑。昨天吉原附近举行賽鳥会，据說非常熱鬧，我也去了，順便还逛了吉原和浅草这两个熱鬧的地方，走了整整半天。平常也总是独个儿信步漫游，前些日子，还走到飞鳥山賞了紅葉，回家的时候才坐的車。菊花展览会，也参观了好几处。跑跑路，当时牙痛似乎好些了，不过也許是着了风的緣故，夜里却痛得厉害。要是怎样也治不好，打算拔掉它；可是左边的大牙已經拔掉了一个，右边也已經拔掉了一个，如果再把旁边那个蛀牙拔掉，說起話来就要漏风，很不方便，所以暂时就只好忍耐着些。这种苦楚，別人觉不出，只有自己知道。……常常有人送点心之类的东西来。前些日子人家送来一大匣羊羹；吃到这些东西，就想起肇，虽說太甜的东西对牙齿不好。他的坏牙，是門牙呢，还是大牙呢？如果是門牙，那就赶快把它拔掉吧。这样那样，你大概也够煩心的，不过俗話說，‘苦在前头，乐在后面’，你就暂时忍耐着些吧。希望注意調攝，不要让肇伤风，多疼着他些。……”

信封的背面，寄信人的地址和姓名写的是：“东京府麴街区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二番地河上謹一寓，河上又三郎”。上面的信里省略去的地方，有这样几句：“人家送来初生嬰兒穿的衣服等二十五、六件，于是我們备了赤豆蒸飯和松魚，准备答礼。”信里这几句話大概指的是我舅舅的大女孩（也就是我的表妹）綾子誕生的事。綾子是 1884 年 10 月 21 日生的，因此可以确定这封信是 1884 年写的。

上面这封信里說“粥飯都不能吃，只是吃柿子”，这“柿子”指的大概是熟柿。但是天下哪有能吃熟柿而不能吃粥飯的道理呢？只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我小时候是怎样一个难于对付的任性的孩子了。不过，話又要說回来，我觉得，让孩子专吃熟柿的那种疼爱孩子的方法，其实是不好的。

据說我生下地来就瘦弱，有三种病。所以，想必一天到晚总是愁眉苦脸，沒有一点孩子的活泼气象，在旁人看来，一定毫无可爱的地方；可是不知怎的，外祖父和祖母却特別鍾爱我，以致养成了我的任性。

平常，祖母本来最膩煩人家把东西泼翻在席垫上或是把东西弄坏，可是，只要知道是我干的，就一句話也沒有。我刚刚学会在席垫上爬的时候，祖母就說“不要让孩子馋嘴”，把糖果点心撒滿一地，听凭我拿了吃。也許是因为沒有能吃到适当的奶吧，我身体里看来从小就缺少某种重要的营养料，再加后来又一直采取那样的养育方式，所以我偏食得很厉害；要是用今天进步的营养学的眼光来衡量，我幼小时候的食物大概可說是一塌糊涂吧。从小就患牙痛，大概也就是这个緣故。我爸爸活了八十岁，直到老死，也沒有一个蛀牙，甚至牙根也沒有一个搖动的。可惜这样的爸爸生出来的儿子，六岁的时候就害牙痛毛病了。

同是一个媽媽生出来的儿子，我的最小的弟弟左京，比起我来，在养育方法上就幸运得多。他不仅吃上了媽媽的奶，稍稍长大时，还每天喝鸡湯（那时牛奶还不普遍，用鸡湯来代替），在飲食方面非常注意。那鸡湯是我媽媽的一位嬸母每天从街上买来鸡杂燉出湯来送到我家的。到后来，同一父母生出来的左京远远比我生得身强力壮，其原因之一，也許就在这种地方吧。

祖母遺傳給我的肝火

我从小肝火很大。要是发了脾气,哭起来,誰都沒法对付。

我整天纏住了祖母不放,甚至弄得她連澡也洗不成。于是临到她洗澡的时候,就把哭鬧着的我拴在客堂的柱子上。到了夜里,說什么也不肯乖乖地上床睡觉。祖母沒有办法,只得每晚把我抱在怀里,叫我媽媽点着灯笼,照着她在宅旁的路上轉,直到我睡熟为止。这样养成了习惯,不这样,我就不能入睡。

这些事情,都是我长大后家里的人对我說的。直到我懂事的时候,我还常常发肝火,弄得家里的人无法可想。平常,孩子发脾气,总是把他关在壁櫥里作为惩罚,可是遇着我发起脾气来,反而是大人躲进仓库里去避难。是祖母躲进仓库还是媽媽躲进仓库,已經記不清了,反正还隱隱約約地記得,她們躲在搗米小屋里,紧紧門上了板門,我却在外边跳着鬧着,使劲搗打那扇門。碰到这种时候,我簡直像发了疯似的,要是用蛮力来制止,說不定会使我受伤,所以除了大人认輸,暂时躲避我之外,別无他法。

前面已經提过,我爸爸的性格非常溫柔和順,沒有半点火气。我的肝火,要不是媽媽遺傳給我的(外祖父肝火大得很,可能是受到他的遺傳;媽媽年輕的时候,脾气也相当大),大概就是祖母隔代遺傳給我的。

祖母性格刚强,不过也常发肝火。后来年紀大了,脾气也一点点好起来了;但是年輕的时候,肝火大得不得了。今天我怀疑,可能是由于腦神經有毛病。

祖母年輕的时候,常常发作肝气病(晚年完全好了)。他那倒在佛堂里人事不省的样子,到今天还如在眼前。手脚挺得笔直,苦

痛地呻吟着，掙扎着，爸爸和媽媽从两旁按牢她，用富山的一个貨郎給留下的熊胃煮的湯灌她，她仍然咬紧了牙，一滴不吃。嘴里直冒白沫。还記得，有一天，我跟着她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走到八百条酒楼的門口，她的肝气突然发作了，弄得我毫无办法。

这种毛病，大家一向把它叫做肝气——“癩”，不过我近来独自思量，那毛病还不只是肝气，其实也許是癩癩（这在祖母本人自然沒有想到，就是我爸爸和媽媽可能也一点沒有想到）。查查字典，“癩”字的解释是：“强烈胃痙攣所引起的胸腹部剧痛。妇女常犯。严重时甚至人事不省。”而“癩癩”的解释是：“无外界刺激，而突然发作痙攣，人事不省，倒伏地上，手足抽搐，口吐白沫，稍停片刻，恢复正常。”

祖母从来沒有說起胃痛过，而且每次毛病发作，我記得总是人事不省，倒在地上，手脚僵直，全身抽搐，口吐白沫。也許我幼年的記憶不全正确，可是她的病，看来其实不是肝火，而是癩癩。不知道究竟是好事呢还是坏事，祖母的这种癩癩病，反正沒有遗传給我；不过我的腦細胞，說不定却从祖母身上继承了能誘发那种病症的精神异常的一部分，因而肝火才那样大。（我混身上下沒有一点地方像爸爸，可是十分像祖母。爸爸的头稍稍有点歪，而且其大无比，几乎不易买到尺寸合适的帽子。祖母的头却又圓又小，和我的头一样。祖母的皮肤很光滑細膩；而我的皮肤，也像熟透的西紅柿的皮那样，一碰就破。同样，两人的皮肤外表都看得见脉搏的搏动。还有，弯着細长的两手的那种别致的样子，据說也和祖母一模一样。我只有两点不像祖母：第一，可能是喝酒的緣故吧，祖母肌肉丰满，肚子凸出，而我身体瘦弱，肚子凹进，像媽媽一样；第二，祖母从年輕时候起，就鬧头痛，而我年紀过了六十，还不知道什么叫作头痛病。所以虽說祖孙十分相像，也并不是一切都相像的。）

害癲癇病的人，有些跟白痴差不多，可是其中也有天才。所以我也許一点也用不着悲观。

俄国文豪陀斯妥也夫斯基，就是有名的癲癇病患者。最近我讀了他夫人所写的回忆录，才知道其中的詳細情形。另外，最近讀了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一本荷兰画家哥赫 (Vincent van Gogh) 的传记；据医生說，他的精神异常，似乎也属于癲癇的一类。所以我虽說继承了癲癇病患者的血統，却一点也用不着悲观。

现在言归正传。当时我发起脾气来，誰都沒法摆布；但是当我高兴的时候，的确是个耐性很好的乖孩子。祖母常鬧头痛（这个毛病，和肝气一样，到她晚年时完全好了），臥床不起。那时，我总是坐在她枕头旁边，用我的小手掌给她按摩額部。我弟弟暢輔，生性活泼，沒有耐性做这种老是坐着不动的工作。再加上弟弟身体壮健，手暖和，而我的手冷，祖母說是摸在头上，觉得舒服。由此一端，也可见我小时候血脉不和，是个不健康的孩子。

我八岁的时候，外祖父死了，外祖母家常常派女佣去上坟。外祖母常鬧肩胛僵硬；我到她家去的时候，常常给她按摩。那时比我大两三年的表姊（我姨母的大女儿），正住在外祖母家里，她都沒有耐性坐得住做这种事。可是我却能一直按摩到女佣上完坟回来为止，因此常常受到夸奖。

由于生着这样的性格，所以我的衣服就不大会髒。弟弟暢輔，一天到晚在外面玩，不是掘土，就是堆石头，再不然就是搬树。媽媽因为他不是自己生的儿子，应当格外关心些，所以特別注意他的衣著，給他洗換，比我勤得多；但是尽管那样，我的衣服还是比弟弟的干净。

有一次，正当大家吃飯的时候，暢輔說要开炮，站起身来，撩起衣服，把屁股对着大家，使劲地放了一个屁，不料由于用力过猛，把

“实弹”都射在席垫上，虽说挨了骂，却还是引得大家笑了一阵。而我，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快活滑稽的性格。

外祖父的种种

提起上坟，就联想到外祖母，她是外祖父死的第二年，也就是我九岁那年相继去世的。因此，我常常跟着妈妈到外祖母家的家庵妙觉院去烧香。走进妙觉院的正殿，头顶天花板上有许多金色的天女——也许不是天女而是菩萨——站在云端，我就最爱看这个。本来，我小时候，到东到西总是跟着祖母；至于佛寺的幽邃，却是妈妈让我懂得的。晚年我住在京都东区的时候，经常携杖游玩附近的真如堂、黑谷、法然院等佛寺。法然院的正殿很小。轻轻拉开正面的纸门，走到里面，眼前一片黑暗；坐定下来，瞳孔逐渐得到调节，就隐隐约约地看出室内的佛像啦、花瓶啦、香炉啦、木鱼啦、经案啦之类的东西，到后来愈来愈清晰。我特别喜欢浸沉在那种气氛里。黑谷的正殿，前几年遭了一把火，烧得精光，现在的正殿是刚刚新盖的，规模很大，而且非常敞亮。明亮的光线里，佛像和佛具一切都是新的，金光灿烂之中，和谐地点缀着大红大绿，使人联想到上等日本点心的柔软和甘美，也很不差。往年在京都帝国大学工作、同时起劲宣传着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每当感到疲倦，也常常来到这黑谷的正殿，静坐一会。那时正殿前面两边的柱子上挂着可能摘自《阿弥陀经》或《无量寿经》经文的、金底绿字的对联，上面写道：“五谷丰穰，万民鼓腹；干戈倒载，灾厉不生。”可是现在，那副对联已经变成“大诏奉载；佛教报国”了。没有改变的，唯有那人迹稀少的大殿里终年只听到木鱼声音的寂静气氛。从古代印度人的冥想中产生的佛教，透过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而传到

日本，到现在将近二千年之久，而这样悠久的历史，就造成了这种无穷幽邃的特殊气氛，这种气氛，除了佛教的伽蓝^①而外，是任何地方所沒有的。而我，从小就领略到了其中的妙味。

本来一向疼我的外祖父的坟，是天然石造的，旁边栽着白椿和枫树。那枫树是他生前从京都带回来栽在庭园里而在他死后移植的。墓碑上刻着“霜松河上君之墓”几个字。“霜松”这个法号由来自于他生前用的雅号“霜松軒”。他生前，屋子里挂着著名的儒学家佐藤一斋給写的“霜松常青”的扁額。这扁額，可能是他年輕时代到江戶^②去的时候，带了老酒一类的礼物，特地去訪問佐藤一斋，請他写的。另外还有一个立軸，上面写的是“独釣晚江”五言絕句，可能是同一个时候請佐藤一斋写的，裱装的紙已經破烂不堪，现在归我收藏着。

关于外祖父，从家譜上可以找到这样一段記載：“1822年9月8日生，五行屬木。1834年12月9日，童年被藩府召见。1839年6月22日，被任命为副文书，俸米三石，属侍从人員組。1849年12月30日，增俸一石，共为四石。”他不愧当过藩府的文书，写得一手秀丽的小楷。他这种才能，想必传給了他的后代，关于1851年生的我的大姨母，家譜上說：“1864年（按：时年十四）8月8日，被藩府召见。次年4月28日，被任命为侍从文书见习。”现在还健在的我那大舅父，大学生时代，也就是出名的三个书法家里的一个，字写得很漂亮。还有我媽媽，虽則是個从未受教育的乡下老太太，可是写的字也不差；到现在年紀已過八十，給我写信，字体还是非常秀丽。而我自己，由于一半属于字迹拙劣的爸爸的血統，所以写出来的字，远远赶不上舅父。

① 伽藍，就是和尚修行的地方，也就是寺院。——譯者

② 現在的東京，在1868年7月以前，曾經称为江戶。——譯者

外祖父爱好文艺，喜欢汉詩以及日本詩歌。我童年时候，曾經翻看过他遺下的、蛀得很厉害的大批木版日本詩歌集。不过当时我还看不懂那些东西，所以已經記不起是些什么歌集了；后来由于年久不曝晒，那些书全都被蠹虫蛀毀，最后扫数卖给收破烂的了。

至于中国书籍，我手边至今还留下一部 1883 年 8 月东京出版的銅版《康熙字典》。这是上等紙印的一函八册的版本。一个家境并不富裕的乡下人，竟然买这种新出版的字典，可见他非常爱书。他是 1885 年死的，所以这部字典买到家，恐怕几乎用都没有用，而藏书印也沒有盖。

有一部汉詩集《星岩集》，上面盖着“霜松軒河上氏书画章”的藏书印。那部书大概是买的旧书，上面还盖着旧藏书者“此君亭书画”的图章。两三年前，年过六十的我，开始学写汉詩，住在須磨的八十岁的舅父，就特地把这部汉詩集寄給我，还在信里說：“这是珍藏至今的先严遺澤，只因我家子孙没人爱好这种东西，所以今天把它送给你。”

“費尽霖霖滴滴声，今宵才放一輪明，非自老雨打洗出，焉得秋容如此清。”这是集子里的一首，讀了不禁使我想到数十年前我外祖父讀着这样的詩以安慰他的詩魂的那种情景。他如果今天还健在的話，也一定乐于指点我的拙作吧。

住在远离江戶三千多里的西陲的乡下、俸祿不到三十石的小官儿，居然在自己的书房里挂起江戶第一流儒学家、昌平黌教諭佐藤一斋所写的扁額，在自己的桐木书箱中收藏着《星岩集》（貼着封条的桐木小书箱，至今还留在我乡下的家里），《康熙字典》一出版，馬上就买到手。由此种种看来，我外祖父确实是个非常爱好文艺的人。

他也很喜欢画，他的屋子的紙門上，参差錯落地貼滿了书画。

到今天我还隱隱約約記得，在他的壁櫥門上，画着盛放在花籃里的菊花；紙門上，除了书画之外，中央还有一个草书的大“閑”字。据最近舅父来信說，那顆“霜松軒河上氏书画章”的藏书印，也是特地到东京定制的，我外祖父还嫌它俗气，不欢喜它。由此可见他对金石书画方面，眼光是很高的。无独有偶，我的最小的弟弟左京是水彩画家，我的表弟（大舅父的第二个儿子）也是水彩画家，这或許也是外祖父的趣味的遺传吧。而我自己多少对文艺感到兴趣，大概也是继承了他老人家的血統的关系。对于我外祖父遺传給我的这种东西，像对我祖母遺传給我的另一些东西一样，我是感謝得很的。

小学时代的娇生慣养

上面已經讲过，我四足岁半就上小学了。我上学不走路，来回都由人揹。那时村公所和小学校就在一个大門里。爸爸是村长，兼管小学校，他因为疼我的緣故，一反他素常那种公私分明的作风，让村公所里的工友每早揹着我上学，每晚揹着我回家。而我呢，那时又不爱上学，所以每天早晨总要弄得那位工友十分为难。因为面对着学校走，我就要在他背上開，他就面朝着家，背向着学校，一步一步倒退着走，这才好容易把我揹去学校。到后来，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也跟我一同上学的时候，还是做哥哥的被人揹着，小兄弟步行。本来，这种事情写来也难以为情，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我是怎样娇生慣养了。

那时候，村公所里有一个钟樓（村上的人都称它为钟堂），用来打钟报时。吃午飯的时候，我們兄弟两个总是跑到钟樓上，倒一杯茶，坐在大钟底下吃匣子飯。飯是十二点钟以前工友从家里給取来的。記得当时所用的紅地白釉的飯碗的碗底上，爸爸給写了

“肇”、“暢輔”的字样。

我在小学校里曾两次获得奖励，奖状到现在还保存着。一张上說：

岩国小学校学生河上肇，初等科第五級改級考試成績卓越，特獎給小学校习字本一册。

玖珂郡公所，1885年3月11日

还有一张上說：

岩国小学校初等科第三年級学生河上肇，学期考試成績优良，特獎給习字紙三刀。

岩国小学校，1887年3月19日

我虽說得了这类奖品，但是事实上可能并不见得是个优等生。前面已經說过，小学校归我爸爸管，他执掌着教員的任免大权，当教員的，对于村长的大儿子自然有所顾虑；分数不敢給少了。我也曾隱隱約約地听說，曾經有一个教員，由于給我分数給少了，結果被撤了职。那时每逢过时过节，村公所里的职员不必說，就連小学里的老师們也都給我們家里送礼，比如酒啦、挂面啦、白糖啦、点心啦等等。爸爸和祖母都爱喝酒，所以酒送得最多。挂面和糖也不少，送来后就收藏起来。到现在还記得祖母把挂面收藏入佛坛下面小木柜抽屉里的那个情景。要是人家送来了一匣一匣的糕点，祖母就說“送来了不受欢迎的东西”，心里不痛快，結果往往是轉送給了別人；可是我呢，却最欢迎这种东西。糕点匣子里，用薄薄的木片隔成方格子，糕点每一行的顏色和形状都不一样，排列得十分好看。目前我們正遇上空前的世界大战，物資非常缺乏，其中特別缺乏的就是糖；住在京都，每人每月或每两个月才好容易配給到一角錢的干点心；最近我不知有多少次想到少年时代吃的这类糕点。想想今天，再想想过去，单是当时人家所送的糖，也就很可观了。柏

木或杉木的薄片制成的圓匣或是四方的白木匣里，滿滿地盛着白糖或紅糖，這在今天，哪怕能弄到一匣，也將多么高興呀。而這一切，現在却成了一場少年時代的夢。

越扯越遠了，言歸正傳吧。學校里的老師們連這些東西都給我送，想必分數也送給我不少。獎狀中所說的“成績卓越”，是完全靠不住的；我小時候，各方面不過是平常罷了。

聯帶又想起了童年時代每逢年節家里舂年糕的那種抒情的場面，這也給了我難忘的印象。

到了年終，舂年糕的人就來我家。他們幾個人算是一組，隨身帶着大行灶、大鍋子、大石臼、蒸籠、杵棒之類。一上來，幾個人手里都拿着小杵（大杵以後再講），一邊高聲合唱着“小松樹呀小松樹”之類的舂年糕歌，一邊迅速地啪嗒啪嗒地舂搗。到快要好的時候，就改由一個人使大杵舂，另外一個人趁使杵的舉起大杵的時候，用蘸了水的手迅速地伸入石臼，把年糕翻過身來。祖母和媽媽卸下了正門上的紙門，把一塊大案板放在席墊上，案板上撒滿了一層雪白的糯米粉，一切準備停當。等到一臼年糕舂好，一個舂年糕的就雙手把它捧起，吆喝一聲，啪嗒一下子把年糕扔到案板上。祖母立刻把它撒上米粉，分成幾塊，搓成長條，然後左右手并用，把長條一面捏細，一面分成小塊，噼噼啪啪一個接一個飛快地扔在案板上。坐在她身旁的媽媽，就把小塊搓圓，再把它壓扁，飛快地放到長方形木盤里去。至於帶餡的，就由她們兩個人一齊迅速地包餡，並且把它搓圓。正當祖母和媽媽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大門外邊的廣場上，第二次舂年糕歌又唱起來了，於是又小杵大杵地舂了一陣，舂好之後，又毫不客氣地扔到案板上來。就像這樣，高速度地舂好一臼又一臼，同時年糕糰子也做好弄好。等到大功告成，舂年糕的就一齊跑進二門，坐在橫檔上，喝慰勞酒。菜總是大盆的。

萝卜丝烧蛤蜊，酒总是盛在饭碗里，年年是这样，永远不变样。喝过了慰劳酒，春年糕的就告辞走了。过了些时，附近人家家里又传出响亮的春年糕歌来。那歌声，我直到今天还忘不掉。后来读了布克(Bücher)的《劳动与旋律》，才明白那是自古以来世界各国都盛行的劳动歌的最后的遗风。在这样一种气氛中长大的我的幼年，有时真是使人留恋哩。

元旦那天的早晨，村里的唱春的首先载歌载舞地唱到我家来；我家门口点缀新年的松树比左邻右舍的都大得多。唱春的来到我家，是不是也给慰劳酒喝，已经记不清了。

总之，乡下的一个村长，在当地是相当威风的。所以，我虽然不是什么重臣的后代，不过由于我是村长的大儿子，比起普通的孩子来，想必总是享受了许多不应该享受的福分。在小学里得奖，大概也和自己的能力很不相称吧。

防长教育会和岩国学校

在一张注明 1888 年 3 月 8 日颁发的毕业证书上，写着：“该生履修本县制定之普通小学，业已毕业，操行学力及格，特授给本证书。”那时我的足岁是八岁零五个月。普通小学毕业后，我马上就进了岩国学校(大多数的孩子，还得再上二年高等小学，才进得去)。

这个岩国学校，是高等中学校(本科两年，预科三年)的预备学校。这里我先把当时防、长二州^①的教育制度说一說。

做过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后来做到文部大臣的外山正一，曾经写过一本《藩閥的将来》，里面说：“山口县人老早就很看重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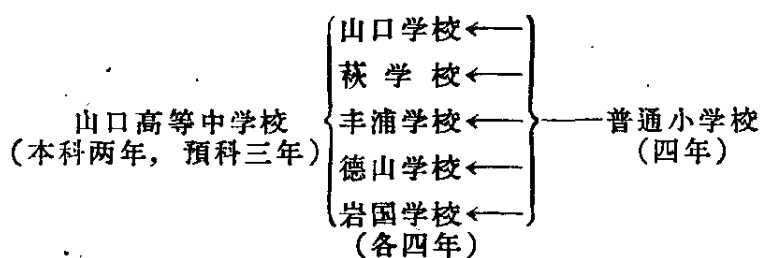
^① 周防和长门，现在已经合并为山口县；这里所说的防、长二州，就是周防和长门的简称。——译者

教育，所以人才輩出。今天大家都說要打倒藩閥；如果真的想打倒藩閥，全國各府各縣就應該向山口縣看齊，特別致力於振興學校教育。”這番議論，當時很引起大家的注意。實際上，山口縣老早就創立了一個防長教育會，比哪個縣份都早地建立了學校制度，使全縣的子弟受惠不淺，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翻看一下《山口高等商業學校沿革史》，關於防長教育會，是這樣說的：“防長教育會的起源是……1884年1月，適逢當時的參議兼外務大臣井上馨回到山口縣，舊藩主毛利元德特地委託他視察縣里的教育事業。……井上馨回到東京後，給毛利家寫了一份報告，詳盡地陳述了他對五個中學校的制度的不完備、中等教育的經費不足、沒落武士階級的窮困以及他們子弟的教育等問題的看法，並且建議積極改革和充實中等教育。……毛利家根據井上馨的視察報告，決心為了振興全縣教育事業、特別是中學以上的教育事業，和同族四家共同創立防長教育會，除自捐十萬元外，由長府毛利家捐出一萬元，德山毛利家捐出一千元，清末毛利家捐出三百元，岩國毛利家（按：這就是我家的舊藩主）捐出公債二萬元，作為該會的經費，另外還向全縣熱心辦學的募捐。……結果，縣里的官吏和百姓，有二千三百八十一人響應號召，捐款達二十一萬八千五百餘元之巨（按：這個數目，在當時說起來，確實是一筆巨款），終於成立了防長教育會。”

我進岩國學校的時候，山口高等中學校以及它的預備學校就是靠這防長教育會的經費經營的，它的系統是：“山口高等中學校分本科和預科，其下設立山口、萩、豐浦、德山、岩國五個預備學校，這五個預備學校就是原來的五個中學校改組而成。高等中學和預備學校組成一綜合的學制；全縣子弟，在普通小學畢業以後，十歲到十一歲，就可以直接升入預備學校，念完四年，再升入高等中學

校。高等中学校本科二年、預科三年，連預备学校共計九年，根据一貫的教育規程进行教学；毕业以后，就具备了进修大学各科的条件。对于进修大学的，还借給助学金，以資奖励。……其学制系統如下图：



这样，防、长地方的子弟，在同一学制之下，就可以一口气念到高等中学校毕业，因而避免了升学、轉学等等所造成的时间和金錢上的損失。”

岩国学校的性质大体上就是这样。照道理，这个学校的入学年龄应该是十至十一岁，但是我由于上学早，所以八足岁零五个月就进去了。

虽則入学比大家早了两年，可是第一年却留了班。大概是因为那个学校不同于过去那个小学校，它不受我爸爸的管轄，所以毫不客气地留了我一年班吧。

不过后来，就再也没有留班，每次都升了級；到 1893 年 7 月，就在岩国学校毕业了。于是在那年 9 月，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了父母，去到县治所在的山口，进了山口高等中学校預科。那时我还不到十四足岁。

这里让我再补充一点到山口去讀書以前的回忆。

岩国学校时代的同学杂志

当我还是小学校低年級生的时候，我和我表姊每天一道到住

在附近的森胁先生家里去复习功课。岁数比我大的表姊，总是很快地复习完了当天的功课，就去天井里玩球啦什么的，而我却始终离不开座位。并不是因为挨了老师的骂或是什么，只是因为看到别人能够把书本放开到外面去玩，而自己却不能，越想越气，就哭起来。其实这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决不应该受到表扬，但是森胁先生却对我爸爸和妈妈说：“肇哥儿志气刚强，长大了一定了不起！”

后来大了一点的时候，记得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泄气的事，反而逐渐在同伴中间露出头角来。

记得在岩国学校读书的时代，不知道是怎么一来想起的花样，我慫恿年纪比自己大的一位朋友深井，去汉学家井上先生那里，学习日本著名史学家赖山阳的《日本外史》。这并非是爸爸和妈妈的主张，而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每天下午放学以后，就到先生家里，坐在先生对面，读《日本外史》。每天总是在那个时候，大门外有个卖千金丹的，高声叫卖着走过。本来，大家小时候都是如此：遇到什么并不可笑的事也往往会发笑。而我呢，每逢听到那个卖千金丹的声音，就忍不住噗嗤地笑出来。我那样一笑，我的伙伴深井，虽然咬紧嘴唇，终于也忍不住笑起来。因为每天都是这样，生性寡默严谨的井上先生，也起了疑心，最初还忍耐着，后来终于忍无可忍，拒绝再教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实在对不起井上先生，是我们不尊敬老师；不过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从前我在老师面前只会哭，现在却变得敢在老师面前发笑了。

又记得在同一时期，由我发起，在小朋友之间曾经搞过“演讲会”。我家对门，住着我的一个小朋友足助，他家的屋子是茅屋，茅屋的一边屋檐下面是舂米的地方，地是泥地。我们三、四个小朋友，就在那里，把石臼当作讲坛，举行演讲会。

当时，仍然是由我发起，我们还搞过一个同学杂志。我在演讲

会上讲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一点也记不起了；至于同学杂志，幸而手边还保留着三本。杂志的名称是《会报》，是个周刊，每星期一发行。封面画以及中间的插图，都是我画的，画得十分出色。想必全都是模仿那时出版的《儿童杂志》、《少年杂志》一类刊物，第一期封面上画的是一只大青蛙，穿了西装，两手捧着一个打开的卷轴，上面题着“会报”两字。第二期封面上，画的是一只青蛙，一边在吸纸烟，一边把荷叶当作车子坐在上面，让另一只青蛙拉着，拉车的青蛙还喘着气；还有一只青蛙，似乎是个邮差，正向着反对的方向赶路。两幅封面画，画得都很有趣。

这个同学杂志里，设有“讨论”栏，其中有我所写的一篇《日本工业论》。现在把幼稚的原文抄录一节如下：

“……方今旧日本已去，新日本将生，而英、俄等国，每欲乘我之衅。……而我国工业不发达，例如欲造战舰则委托法国人，非但糜费金钱，且煞费周折，甚或竟无所获，致我虽有勇武才智，终不免蒙受损失，嗚呼惜哉！此实我国工业不发达有以致之，实可为祖国痛心。由此观之，当今之亟待振兴工业，实有甚于饥者之求食，渴者之求饮，故吾人痛感发展工业之必要也。然今世之人，每徒知提倡尚武，而不知工业之应振兴，可谓目光短浅矣。质之尚武论者，以为如何？”

在那篇《日本工业论》后面，还登着别人写的两篇《日本尚武论》，大概是大家预先商量好，故意造成两种主张的对立，作为讨论的题目吧。这种讨论，一直继续到第三期为止。

今天看来，当初我那种振兴工业论，倒是一番很有意思的议论。因为，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日本正在同英、美艰苦作战，一些人认为为了飞机和其他军需品的自给，发展工业技术实为焦眉之急，而我童年时候所主张的，正是这一套。

对于我的一个批評

提到这个,又想起另一件事。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大学毕业不久,曾經出版一本《日本尊农論》,反对牺牲日本国内的农业的商业立国論。到1937年6月我从小菅刑务所里出来时,赤城和彦在《日本評論》杂志的人物評論栏中所发表的《河上肇和近卫文麿》那篇文章里,特別提到了这件事。这和童年时代的旧話固然离得太远了些,但是我却想在这里把赤城的文章抄录几段。

“我曾經听到有人說,河上肇博士所写的东西,《第二貧穷故事》以后都沒意思,《貧穷故事》以前的东西倒有意思,我觉得这句话是有一听的价值的。我觉得,京都帝国大学聘請他教书、派他到欧洲去留学时他所写的通訊《回顾祖国》,以及《貧穷故事》等等,确实非常有趣。特别是,如果你一面在脑子里描繪着后来的河上肇,一面翻看‘他二十六、七岁时’以后的著作和論文,这对于研究日本經濟史、社会思想史上的河上肇以及他的生活,是有无穷的趣味的。

“人們几乎一致认为河上肇是一个單純的、热情的、純真的、富于求道精神、自我批評精神的、有良心的、戇直的、值得尊敬的学者,为人非常机灵却又有点古怪。人們总是把他的这些性格和后来的战斗的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結合在一块考察;稍稍上了一些年紀的人,还联想到他用千山万水楼主人的笔名主編着《社会主义評論》的时候,心境起了变化,除了一本《聖經》和一本《藤村詩集》之外,把其余的书全都卖光,毅然参加伊藤証信的“无我苑”那件事。还有一些观察河上博士更深入的人,会觉得他这个人,某些地方具备着实践的、經世家的风格,同时隱隱約約地带些武士的、封

建的味道，以及浓厚的日本主义、国家主义的味道吧。……

“讀到 1904 年他二十六岁那年所写的《虚游軒文庫》第二篇《日本尊农論》以及 1906 年出版的《日本农政学》，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地关怀着祖国。后来他所写的《回顾祖国》以及《贫穷故事》等文章里面，也总是发出国家主义的香气，同时使人想到那种經世家、实践家的风格。这些难道不是他渗透在内心深处的特质嗎？他对日本人民和日本国家的热爱，是和近来的一些一夜工夫就变成的、机会主义的日本主义者以及左顾右盼、令人作呕的新进国家主义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

“河上博士出身于山口县岩国的重臣的家庭，是在国士气氛和武士教养的环境里长大的（按：我的家庭，不过是个位低俸薄的穷武士家庭。至于幼小时是在怎样的气氛中长大的，前面已經詳細叙述了。这是和国士气氛啦、武士教养啦相距很远的。把我家庭出身描写得这样了不起，真使我难以为情），总使人感到他有一种国士的气魄。可是由于他的社会科学的教养，他很谨慎小心，不肯把他的爱国心沿街叫卖。经历了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而且在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昂揚的气氛中度过其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河上博士，今天看到新宿^①夜市上用洋涇浜外国語叫卖香蕉那样的某种日本主义者，将会觉得多么浅薄呀。哪个人不爱祖国的国土、祖国的人民呢？所不同的，就是有的人从心底里热爱祖国和人民，目光看到日本的将来，对现实加以分析，深謀远虑地使之不誤入歧途；而有的呢，却随波逐澜，摆出一副日本主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面孔，突然活跃起来。

“博士在《日本尊农論》里的国家主义思想、日本主义經世家的

① 新宿是东京的熱鬧地区，夜市很有名。——譯者

风格等等，随着年龄的大小以及社会科学的修养程度的深浅，无所隐蔽地跃然纸上。

“他认为：‘日本人一向忽视保全农业的必要；幸德秋水^①曾公开地说什么我们不一定要吃本国的米，就是一个例子。今天抱有这样思想的人也并不在少数。’有感于此，所以写了那本书。他主张保全农业而反对偏重工商业，而且举出那些采取偏重工商业政策的国家日益衰落的历史，认为‘我们日本帝国有什么必要去重复那种失败的历史呢？诚如马丁(Martin)所说，回顾历史而不重蹈复辙，乃是人类的特权。我们不能不反对放弃这种宝贵特权的我国的重工商而轻农的思想’，并且主张保全农业是国家的独立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就连我这样一个人，今天居然能科学地观察社会，也多亏受了河上博士的启蒙教育。后来，凡是博士的著述(从他青年时代直到他入狱)，我都从旧书店里搜购来读了一遍；甚至他的片言只语，只要能弄到手，我也都读了。我深深觉得，总的说来，凡是博士所写的东西，都直率地表现了他的信心，一片丹诚，没有半点虚伪。……所以前面所说的博士的日本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其经世家的风格和实践的态度，绝不是表面文章，而是渗透了博士的骨髓的东西，只不过由于科学教养和时代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表现罢了。……”

作者似乎对我抱有极大的好意，承他过奖，把一个俸禄不足二十石的穷武士的儿子，说成是重臣的后代，这虽捧得有点过火；但是他把“总是发出国家主义的香气，同时使人想到那种经世家、实践家的风格”作为我“渗透在内心深处的特质”，倒确是深刻的见

^① 幸德秋水(1871—1911)是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本名传次郎。曾组织平民社，创办《平民新闻》，著有《社会主义神髓》一书。1911年因“大逆事件”而被杀害。——译者

解，我本人心里十分感激。我一生几乎都是在书斋里度过的，从这一点上說，我的确是个讀書人；但是我相信，从本质上說，我却始終是街头上的人，是实践家，所以我在书斋里弄的学問，也始終不失其实践的性质。关于这，有机会时我将另外写篇东西来詳細說說。

和幼年时代所写的振兴工业論一样，我在青年时代所主张的农业保全論，目前也偶然地成了預言，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在目下食物这样极度紧张的日子里，大概沒有一个人再会反对日本国内有保全农业的必要吧。我现在每天早上和中午吃的都是粥，粥里全是菜叶子和豆腐渣；尽管这样，每月配給的米，也还是只够吃十天、八天。这种情形，大概不会永远繼續下去吧。照此看来，我五十岁左右所写的东西，說不定有一天也会成为預言吧。我倒很想多活几年，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

写到这里，索性再补充一笔。我即使在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从事活动的当时，也从来沒有忘掉日本、厌恶日本人，却正是为了日本全体人民的幸福和日本国家的兴盛，所以才热烈希望早日把祖国改造成为一个苏維埃国家。正当大战期中，而希望祖国战败，那种人并不一定是不爱国。人們把那种人当作不爱国，那是因为人們还不能科学地認識到阶级国家的本质。統治着資本主义国家的是資本家阶级；它是資本主义国家的主人翁。不过一旦发生了战争，一切失去了常规，这个統治阶级要不是十分坚强，就会完全失去政治能力，惊惶失措，乱来一气，自动地丧失群众的信任。特别是战败了的时候，这个統治机构就会完全陷于支离灭裂，民心也离反，于是开始了統治阶级自行腐蝕的过程。这样，一向貌似坚牢无比、难于反抗的統治机构，就会变成脆弱得一击即破。这就意味着革命成功的最好时机到来了。天下那些夙願对一国的政治机构加以革命变革的志士，有时热烈希望本国战败，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希望，倒真正是出乎爱国的至情。

离开父母到山口高等中学校去读书

前面讲的同学杂志的第二期，封底幸而没有撕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那上面注明有“1890年6月11日编”的字样。岩国学校第一学年的修业证书上的日期是1890年7月31日；这样看来，那本同学杂志就是我进了这个为升入高等中学预科而设的预备学校的第一年的时候所编辑的。那时我虚岁十二岁，足岁十岁零八个月。所以，如果说我本性里有什么经世家、实践家的气质，那末这种气质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早就显露出了它的萌芽。

那时候我已经很喜欢写东西，对于编杂志这类事也很感兴趣，这从保留下来的那本杂志上就可以得到证明。

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在舂米的地方开“演讲会”，还和他们一同搞同学杂志，——十二岁时就出现在我身上的这种特质，可以说一直贯穿于我的一生。想起来，人从娘胎里一生下来时所具有的气质，实在是终身都容易改变的。瓜永远是个瓜，白薯永远是白薯。只是由于环境的不同，有的瓜长得细而且长，有的白薯长得又肥又大。“古来虚死几英雄”——在这世界上，只因生不逢时，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分而中道白白死去的人，确实不少，（这种可叹的现象，大概唯有到了苏维埃社会才会绝迹吧）。而我呢，却侥幸一生之中常能际会风云，得以充分发挥了自己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天分，这真是我的运气。

本来，我在故乡的时候，就每月订阅《幼年之友》、《少年园》这类杂志。现今少年的读物已经非常丰富了，可是那时，少年杂志却大概就只这两种，而且发行数量也少，特别是在乡下，订阅这种杂

志的人更少。（《少年园》是 1888 年創刊的。）我到现在还奇怪当时我怎样会知道訂閱那些杂志。

当时，住在东京的大舅父，經常把看过的《时事新报》寄到我們家里来。我每晚睡觉以前，总是就着油灯的光，在床上閱讀那报上的連載小說，这成了每天的娱乐之一。

我那时取了一个別号，叫做“天保狂夫”，还仿照天保錢的形状刻了一颗图章。

我还喜欢画画。那时学校里只教鉛笔画；而我所画的自由画，几乎每次都給张贴在学生休息室里展览。现在我身边还留着一本写生画册，封面上題有“討飯袋，1894 年 7 月 11 日”几个字，里面有十几幅画，都是家乡附近的风景写生，画得都比較好。住在家乡的最小的弟弟找到了給我寄来的时候，在信里說：“这些画从种种方面來說都很有意思，……中間的几幅风景画，是非常有趣的好作品。請你珍藏着。”我那个弟弟是图画专家，从他这番話看来，說不定我身上也有着几分画画的才能。不过，我生平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画家。

前面已經說过，我在岩国学校时，只是第一年留了班，后来每次都升了級，到了 1893 年 7 月，得到了“修完本校所规定之課程，正式毕业”的一紙毕业証书。那时在横滨銀行工作的另外一位舅父，給了我一只鍍鎳怀表，作为祝賀毕业的礼物。直到后来文部省派我去欧洲留学时，我也还是只有一个鍍鎳怀表，不过是不是舅父送給我的那一只，还是后来另外买的，就記不清楚了。

岩国学校毕业后，那年九月，我就离开父母，到县治所在的山口去讀書。我虽然在三年以前就已經在搞什么演讲会，办同学杂志，写《工业振兴論》，但从小娇生慣养的我，那时虛岁才十五岁，头年还会陪着祖母同坐一辆人力車去宮市的天滿宮进过香，还是个

軟弱无用的哥儿，所以现在要单身一人去异乡讀書，不說父母放心不下，我自己也惴惴不安。那时的情景，到今天还忘不掉。

比我小十岁的弟弟左京，一生下来，我就照顾他。那时节，每天傍晚时候，祖母就来到正房，和爸爸一同喝酒吃晚飯。而我呢，总是把弟弟揹在背上，去祖母住的那个单栋房子，哄他睡觉，天天这样，成了我的日課。由于这样的关系，弟弟片刻也离不开我。等到我动身去山口的那天，祖母怕弟弟看见我走会哭，就把他寄在亲戚家里。祖母把我送到門口，悲从中来，含着一泡眼泪說：“从此再会了！”后来每次放假回家、临到重新分別的时候，她总是說着这句话。祖母后来一直活到九十六岁，等我当了大学里的簡任教授才死的。

第一次离开家庭的我，单身一人去輪船碼頭。现在鉄路通了，岩国到山口只要三个钟头；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火車，要从家里走十里路到新港，从新港乘坐“内国通运公司”的小火輪到三田尻登岸，再走旱路去山口。

我携带的唯一的行李，是一条紅毡毯，外边捆了皮帶，里边放了一个鈴子，皮帶上拴着用手絹包的一包飯团。在輪船局里等輪船的时候，我那件小行李，因为上面拴有一包飯团，不知被狗叨到哪里去了。毡毯里的鈴子，是媽媽特意給我，叫我在三田尻上岸以后，去宮布的天滿宮烧香，把它献给菩薩，祈求将来学业成功的；现在才动身就把它丢失，真叫我急得要命。后来总算还好，在开船前，又把它找了回来。

由于港口浅，輪船只能停在离碼頭較远的海心。当轉过一个海岬、航近港口时，它就发出第一遍汽笛声。汽笛一叫，碼頭上的乘客，就一拥而上，挤到舢板上來，艙声咿哑地让船夫向海心搖去。这总是在半夜里。輪船在港外抛了錨，周围的海水直冒水泡，这时

就响起了急促的第二遍汽笛声，仿佛催大家快些上船是的。于是舢板上摇动着灯笼向輪船上打招呼，輪船上也摇动着灯笼作为回答。一切情景，全是令人发愁的、抒情詩的情景。

第一次乘船的时候，我和大家都乘上了。后来，等到放暑假回家、假期满了再上学的时候——那时总是正赶上夏末秋初赤痢、霍乱等病流行的时候——却常常被船上的防疫医生拒絕上船。医生检查时，只是按按脉搏，而我的脉搏到现在每分钟还是九十跳左右，只要稍为动动身体或脑筋，就一下子超过一百跳。所以大学毕业后不久、打算保人寿险的时候，也让保险公司的医生給拒絕了。总之，我从小就是这样古怪的脉搏，要不是防疫医生給检查出来，我自己还不知道。可是既經知道之后，我也一直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幸而到今天并沒出什么乱子，居然不久就要成为六十六岁的老翁了。

山口高等学校时代的讀書傾向

在山口，有一位同乡——小原先生，是学校里的图画教师。他是我爸爸的老朋友，也是我的保証人。家里的学費，总是寄到他那里，因此我时常到他家里去。去时他太太总走出来对我說：“令尊、令堂一定非常挂記你吧？”被她那样一說，我馬上就泪汪汪的了。准是因为初次离开父母，来到他乡，同一些素不相識的人一起住在学校指定的宿舍里，別人一天到晚高高兴兴，有說有笑，而我却一个人在想家。

可是不久对新环境也就习惯了。由于学校改变了制度，我在山口高等中学預科一毕业，就被編入了山口普通中学校第五年級。山口高等中学校改名为山口高等学校，校长岡田良平兼任普通中

学校的校长。他后来做到文部大臣。1895年4月轉学,就在那年的7月,我弄到了一张署有山口县普通中学校校长岡田良平的名字的毕业証书,9月里就升入山口高等学校。

不知道什么緣故,那时学校的当局,对于快要从中学毕业、进高等学校的学生,都不願意他們把法科作为将来的志願。听到人家說,那时东京的律师多得好比过江之鯽,都穷得沒有飯吃。所以我最初想进医科。(由于学校当局的那种方針,有不少本来适于进法科的人,也改变了升学志願。比如今天桐生高等工业学校校长西田博太郎,其实也是該进法科的。)当时我似乎并沒有有什么了不起的願望,只希望将来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自己家里开业做医生。但是这样一来,要怎样把现在家中的房子改建一下,却始終想不出好的主意;为了这事,我还曾几夜工夫沒有睡好觉。我还立即买了許多与医科有关的《生理学》之类的书。

可是,不知道怎么一来,不久我改变了方針,把文科作为自己的志願。1895年9月,足岁还不到十六岁,我就成了山口高等学校的文科生。

一进文科,馬上就又买了許多文学书。記得把当时博文館书店出版的《日本文学全书》整套买了下来,其中包括着日本古典文学作品《源氏物語》、《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等。我还攬掇了两三个朋友,买新出版的小說,大家传閱。初到山口讀書的时候,花一角錢买零食吃,都觉得仿佛犯了罪是的,心里着实不安,可是后来也就不以为奇了,虽然并不富裕,也居然那样大手花錢了。

那时我讀了文部大臣井上毅写的《为了国語》,受到很大的影响。(井上毅就在我进高等学校那年死了。)因此我曾想将来进大学的国文科。什么都容易走极端的我,有一时期,在历史課上記老师讲的讲义,都用的是嚙嚙苏苏的所謂国文的体裁。

1895年，我进高等学校那年，东京帝国大学帝国文学会出版的《帝国文学》杂志创刊了。从第一期起，我就成了它的热心的读者。我对大町桂月、武岛羽衣、盐井雨江等在各期上所发表的“美文、韵文”，很感兴趣。

每月我还订阅薄薄的大型杂志《文学界》。记得那杂志的封面的三分之一是套色的，颜色每期变换。女作家樋口一叶在那杂志上发表她的《青梅竹马》，是我进高等学校那年的事。

报纸看的是《读卖新闻》。著名小说家尾崎红叶的《不言不语》、《多情多恨》、《金色夜叉》等作品，就是1895年至1897年我在高等学校一年级到三年级读书的期间连续刊登在那个报上的。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特别清楚地记得，那时我曾把桐生悠悠写的小说书买来读过。桐生悠悠后来在文坛上并没有什么盛名；大概因为他是一个法学士，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吧。记得后来上了大学，我还曾经到住在我宿舍附近的他的家里访问过他。

与谢野铁干(与谢野宽)的诗集《东西南北》，是布面精装的袖珍本，那是在高等学校二年级读书的时候出版的。我很爱读他的老虎啦、宝剑啦那种精神抖擞的诗。随后，国木田独步、田山花袋、松岡(柳田)国男、^①宫崎湖处子四人的诗集《抒情诗》、岛崎藤村的处女作《若菜集》出版了，土井晚翠的新体诗也在《帝国文学》上陆续发表。我对那些都很感兴趣。

山口时代的吃

这里我来插上一笔，谈谈山口时代的吃。当食品十分紧张的

^① 松岡国男，后来改姓柳田。——译者

这种时期，谈到吃的东西，单是回忆一番，都觉得其味无穷。

幼年在父母身边的时候，我是个食欲非常不振的孩子。暢輔弟弟老爱吃腥膻的东西，大家都管他叫“猫”；我却连鱼类都不大爱吃。我们家的院子里，橘子树、枇杷树、柿子树之类栽得很多，可是我几乎一点都不吃。桑树上结的紫红的桑椹，样子和洋莓差不多，附近人家的小朋友到我们家来玩的时候，常常采着吃，吃得把嘴唇染成通红，可是我却从来也不想吃那种东西。我只爱吃甜点心。妈妈给我买来直径有五寸的、一种名叫大鼓馒头的白糖馅的大馒头，把它放在大橱的抽屉里，听我取了吃。可是我也不想多吃，总是吃一点点；一个馒头，往往要吃好些日子才吃完。所以虽说我爱吃甜食，食量却是很小的。

这种食欲不振，等到去山口读书的时候，就逐渐好转了。因为住在宿舍里，只好吃人家给做的饭，所以我的偏食的毛病大大地得到了纠正，结果食欲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

我在山口，最初住在学校指定的宿舍里，后来有一个时期，和两个同乡上级生住在我的保证人小原先生家的单栋附属房屋里。一日三餐，都让饭馆里送盒子饭。饭盒是圆筒形的陶器，分上下两层，下层放饭，上层放菜，装在方木箱里，每天三次给送到住的地方来。想必那些食物的营养是不够的。我每逢学校放假，回到自己家里，总喜欢让家里给买了牛肉，切了片，多放些糖红烧，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因为是在乡下，那牛肉也只是些耕田老牛杀出来的劣等肉，尽管这样，我还是赞不绝口地狼吞虎咽着。仅仅一个星期的春假期间，我眼看着就胖了起来。

山口有个第一流的酒楼叫做菜香亭，有些阔气的学生就去那里喝酒，可是不会喝酒的我，却从来没有光顾过。我的吃，还是专门在点心上讲究。有一种饼，我已记不得它的名称了，只记得是糯

米粉捏成香脆餅那樣的小小的橢圓形，点上青紅两种顏色，里面包上餡。三、四年以前，有个朋友到山口去工作，我曾托他給我买一些，結果据說现在这种东西已經絕迹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沒有的。这种点心，要紧的倒不是餡，而是它外面那层皮。做得不好，粘牢在牙齿上，一点都不好吃；做得好的——可能是糯米粉摻得不多不少的緣故——吃的时候不粘牙，和餡儿一块嚼起来，其味无穷。走出小原先生家，有一条小河，沿河向左走到尽头处，就是我时常去光顾的那片点心店了。那片点心店的店門口，只摆出有限的几个样品，顾客去买的时候，就当面給做起来。五十年前我所爱吃的那种点心，直到今天，我还清清楚楚地記得起它的形状和滋味。那样的点心，除了山口以外，后来我無論在什么地方都沒有见到过。

穿过学校的运动場，有一家糕糰店。走进里边，就給你倒出茶来，让你吃大福餅。住在学校宿舍里的时候，我和朋友們常去那里，一次甚至能吃十个以上。市外有一家“外郎屋”，是山口出名的点心鋪子，在一条小河的桥下；我們去到那里，常被領进小房間，吃现做出来的“外郎”。它有黑、白两种，黑的便宜。据《辞苑》上的解释，“外郎”是“把米粉染黃、加糖蒸成的点心”，这个解释是不对的，其实那是从蕨的根茎里提出淀粉（我們家乡管它叫做蕨粉），再摻和米粉做的；至于黑色的“外郎”，另外还摻上黑豆粉。它那种特殊的风味，完全是由蕨粉而来。切成狹狹的长方形的“外郎”，形状虽則像羊羹，滋味却和羊羹不同，它有一种說不出的淡泊风味，所以我們一吃就是好多条。記得白的一条卖二分錢，黑的稍为狹小一点，一条卖一分錢。在甜点心极度缺乏的今天，回顾少年时代，能把点心当飽吃，真有滄桑之感。那时，每逢学校放假，我就买了“外

郎”带回家去。几十年后，当我关在丰多摩刑务所的未决监^①里的時候，舍弟左京曾經送來过这种点心，这是因为当时三越百貨公司有这种山口“外郎”賣。可惜那时我正当食欲不振，尽管那样好的点心送了來，五十年前的味觉终于喚不回来了。的确，无论多么好吃的东西，如果本人身体不好，也不会觉得好吃的。

学生宿舍楼下是自修室，楼上是寢室，所以白天楼上总是一个人也没有。我常常买一包糰子，藏在寢室的行李里，乘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地吃。

后来我的食量增加，随着班次的升进，最后我成为全班首屈一指的饕餮家。本来身体最最瘦弱的我，在有一年正月里举行的班会上，吃糕糰却吃得最多，因而赢得了“宁美尔王”的称号。所谓“宁美尔王”，出典于德語“nimmersatt”这个詞，就是“永远吃不飽的人”的意思，这是那时我們在教科书上念到的。关于这事，我曾經在另外的回忆录里写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可是那样旺盛的食欲，等到后来大学毕业、志在研究学問的时候，却完全衰退了。約有二十多年之久，往往連一天三頓飯都有些吃不下。記得結婚后不久，住在东京，祖母从乡下来看我們，她看到我吃飯的情景，耽心地說：“只吃一碗飯，还得泡上茶才吃得下去，这可怎么办……。”后来住到京都，稿費收入非常丰富，我在生活上虽然并没有怎样奢侈，在飲食方面却没有勉强節約的必要，一家人吃的菜，买的往往是明石地方出产的銅盆魚。送魚來的是—家叫做敷島屋的魚行；尽管帶來了好几条銅盆魚，魚行里的人还是很客气地說：“今天的魚不新鮮，不会合府上的用。”同样的銅盆魚，明石地方出产的，价錢虽貴些，味道却好得多。可是，尽管这

① 未决監，是拘押还没有判決的犯人的牢監，相当于看守所。——譯者

样讲究，我也不过夹上一、两筷子，从来不觉得特别好吃。现在回想起来，真有隔世之感：那时京都有家第一流的点心店，叫做鑑屋，每天早晨，把他們的日本点心和西洋点心的样品送到我家，让我们挑选定做。当时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也仅仅只有他家的点心而已；但是尽管这样，也还是吃不了多少。我那时胃很不好，常常犯严重的胃痛。有一次，岳父来京都后回乡，我去七条火车站送他，在候车室里，剧烈的胃痛发作了。我额上的冷汗噗落噗落地淌着，腰弯得像只大虾，好容易坐上人力车，由妻伴同着到车站前面去找旅馆。那时正当夏季，旅馆里的人大概把我当作急性时疫病人吧，都推说客满了，拒绝留宿。又赶上是傍晚时分，下着几点小雨，狗又赶在身后狂吠；这样东闯西奔，好容易才找到了一家旅馆。一到旅馆，马上把一向给我看病的松田医生请来，打过了针，可是住了一宿，胃部的疼痛还是不见完全消除，到第二天早晨，还是直不起身来，终于爬着离开了旅馆。在那些日子里，我在大学研究室的写字台的抽屉里，经常存放着准备胃痛发作时吃的药剂。

1933年，在我被判决前不久，細迫兼光曾经写过下面一段话：

“……像那样的身体，那样的健康状态，要是判了徒刑的话，只要一个月，就可以夺去先生的生命吧。先生的健康状态，实在坏极了。他有严重的肠胃病，连火车上的轻微颠簸都吃不消。还常常发胃痉挛。现在呆在十分受拘束的未决监里，尽管外面的人热烈希望送这样、送那样进去，先生总是加以拒绝，不愿意多麻烦人家；可是在食物方面，牢里的饭还是不能下咽，一日三餐，还得要求从外面送进去；尽管如此，仍然不久就病倒，被送进病监。日后如果判了徒刑，进了已决监，^①每餐每顿就非吃那粗劣的牢饭不可，那

^① 已决监，是已经判决的犯人执行徒刑的牢监，相当于监狱。——译者

样的生活，恐怕一个月都熬受不了吧。”

这番話虽然未免过于夸大了些，不过那时我的胃确实坏透了。呆在丰多摩刑务所的未决监的时候，我内人花了重价，托送牢飯的一日三餐給我送特等盒子飯，我拿到手，也还是充其量只能吃掉大約三分之一。特为給我送进去的烤鰻魚，分量并不多，我却仍然吃不下去，虽然觉得弃之可惜，結果还是剩了下来。

尽管胃腸这样坏，不知怎的，等到进了已决监，最初虽則簡直无法可想，可是奇怪得很，到后来，就逐漸习惯于牢房里的食物，不到半年工夫，每頓几乎有两大碗的二等牢飯，居然也能毫不在乎地一下子就吃光了。照现在这个非常时期來說，那样一頓飯实在相当于一天的配給量。

坐了四年多的牢，再回到家里，我的胃弱毛病，几乎完全消失了。无论吃什么，都觉得津津有味。而且恢复了学生时代的那种旺盛的食欲，不妨說又成了宁美尔王了。所以，就像学校的寄宿舍生活治好了我少年时代的胃弱毛病一样，牢獄生活完全治好了我老年时期的胃弱。猜想起来，大概主要是由于絞脑汁的研究工作完全放下了的緣故吧。而且，在牢监里吃得那样多——牢房里冬天不生火，衣服穿得又单薄，像我这种瘦弱的人，要不是飯量大，热量就不足，說什么也抵御不了那样的寒冷——似乎把我的胃都撑大了，以致像我这样快要七十岁的老人，飯量之大，竟不下于二十左右的年輕小伙子；从前动不动胃痛发作，痛苦非凡，而现在却无论吃得多飽，胃也从来没有痛过。还有，我本来从小不爱吃水果，尤其是柿子之类的东西，怕不消化，从来没有吃过；可是到了老来的现在，柿子啦、橘子啦、苹果啦，什么都爱吃，而且无论吃多少，都不鬧肚子，甚至吃得光光的，給孙儿孙女都不留一个。在食品不足的今天，这样旺盛的食欲，倒叫我不好办。大概老天爷认为；老头

儿食量这样大可不妙，为了多看看这个花花世界，还是设法适当地节欲，多活几年的好，所以连米都不痛痛快快地配给我的吧。要是想买点心就有得买的话，说不定我的肠胃又要弄坏，早就弄得没命了。这样一想，现在吃不到美味的点心，也只好死心了。

想不到写了这一大堆无聊的话，现在再回头谈山口时代的往事吧。

从文科志願生轉为法科志願生

我手头现在还保留着一本題有“餐舍出入日記，在鴻城，天保狂夫”等字样的日記簿。封面上有“梅阴生印”、“天保狂夫”这样两颗图章，和“明治己未三月中旬起笔”的一行字。“己未”大約是“乙未”的笔誤。明治乙未年也就是 1895 年。这样看来，那还是我在山口高等中学校預科讀書、正热中于所謂国文时的东西。日記里抄有当时我做的下面这样一篇文章：

“乡下人举止多浅薄无聊。走在路上，叫囂不已，步履踉跄，言不及义。不堪一笑之事，每亦拉开嗓子，张口几裂，放声大笑，不亦鄙乎。

“凡有器物，均于内側写上某月某日购置等字样，俾于取用时想到此是去年今日所购，妙哉妙哉。

“全然不懂的事情，也談得仿佛无所不晓，何其浅薄也。”

当时我似乎就是用这种文縷縷的文章在課堂上做筆記的。

我手里还保留着一本《同志会歌集》，封面上写着“忍、月岭、賤屋主人、枫月、兰岳、默庵、泉乡”等七个人的雅号。年月日沒有写，大抵是高等学校二年級或三年級时候的事情。可见幼年时代和几

个小朋友搞过同学杂志的我，这时又找些同班生搞起短歌^①会来了。歌稿全部是我的笔迹，看来短歌会的事，是由我主持的。“枫月”就是我的雅号，这是因为我是枫月(十月)所生，所以才想到用这个笔名，不过一半也是模仿美文大家大町桂月。那时我的同班同学，就老叫我“枫月”“枫月”。后来上东京读书的时候，才知道东京有个出名的点心铺就叫做风月堂，于是我不再用这个“雅号”了。

歌词原稿全部不署名，只是在同人中间传阅，评定甲乙，分辨不出哪一首是我做的。只有题作“寄水述怀”的一首：“像浮萍随水漂流一样，与世浮沉，这是多么可悲呀！”后面附有我对别人的批评的反驳，看来大概是我的作品，其余的就想不起了。不过总而言之，短歌我到现在也还是做不好，当时也并没有什么佳作，记得从来没有得过甲。

就像这样，我那时完全变成了一个文学青年，不过同时，我胸中已怀有相当大的抱负。起初想进医科的时候，不过是想毕业以后在家里开业做医生，所以志向是不大的。等到进了文科，却就觉得一定要使自己文名遍天下才好。有一年放暑假，我和同班同学岡村正市到宫岛去进香，买了当地的名产杓子，爬上宫岛的山顶，在杓子上写下自己的冲天抱负，献给了那里的神社。

不过，决心进大学文科的我的内心深处，仍然早就潜伏着一种经世家的气质(虽然学校的方针倒不如说是倾向于奖励实业，而且由于这样的传统，等我毕业两三年之后，母校山口高等学校改成了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所以尽管我热心地读着小说和新体诗，经世家的气质却在不知不觉中间抬起头来。

前面曾说过我有一颗“梅阴生”的图章，这个别号，我是仿照吉

① 短歌是日本固有诗歌形式之一，每首由三十一一个音(字母)组成。——译者

田松阴^①先生的名字而取的。我家院子里有一株老梅，每年元旦前后盛开，那是非常少有的早开的白梅。由于这个缘故，我就把吉田先生的名字改了一个字，变“松”为“梅”，取了这样一个别号。德富苏峰著的《吉田松阴》，是我进高等中学校预科那年出版的。记得我读了那本书，受到极大的感动。（这本书后来曾由作者增补订正，可是当我读到增订新版时，觉得还是原先的旧版要好得多。当然，事实上新版也许比旧版好，可是，我由于最初读那本书时，印象太深了，所以后来重读新版时，就意外地觉得它没有多大意思。这和吃东西是同样的道理；同样一本书，由于主观条件不同，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味道。）

萩地的松阴神社，离山口不远，恰好是一次远足的路程。我曾经去过许多次，买来好多张松阴先生墨迹的拓片，满满地张贴在学生宿舍自修室（一室规定六人至八人）的四壁。——我从松阴先生的事迹里受到不少感化。直到后来到了东京读书时，在松阴先生的纪念日，也曾去田谷的松阴神社参拜过几次。看到陈列在神社里的、先生的母亲给先生的全用拼音字母写的信，曾经掉过眼泪。

潜伏在我内心深处的经世家的欲望，不断地因松阴先生而获得鼓舞，后来又受到日本第一次成立政党内阁的各种报纸消息的刺激，从而暴露到表面上来了。像尾崎行雄、大东义彻、松田正久那些搞政党的，一介匹夫，居然一跃而位居卿相——看到这个消息，少年的我，十分兴奋，觉得功名唾手可得。文学哪里是男子汉终身干的事业呢？我还是进大学法科吧。这种决心，是高等学校毕业考试近在眼前的时候产生的。学校当局，起初认为事无先例，

^① 吉田松阴(1830—1859)是日本幕府时代的爱国者，鉴于美国军舰入侵日本领海，认为必须通晓世界形势，曾潜登外国军舰，企图出国，结果失败。1859年因谋刺阁部获胜而被斩首。——译者

不允許我改变升学志願。我被叫到教务长室里去挨教务长的訓。教我德文的老师登张竹风先生，也把我叫到他家里，对我說，“你是詩人的材具，不是学法律的人”，恳切地劝我不要改变素志。可是我的脾气，方針一旦决定了，无论誰怎样劝說，都不能使我改变主意。于是我就坚持，說：“如果学校不允許我改变升学志願，那末我就宁可不参加毕业考試，留在原班，再讀一年。”那时法科志願生和文科志願生学的功課几乎完全一样，法科志願生不过到第三学年多念一門法学通論罢了。因为这种关系，所以学校当局看我态度坚决，也就只好让步，答应我只要法学通論这門功課考試及格，就让我以法科志願生的資格毕业(遇到这种情况，我往往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当时我說我宁願留班，这决不是要挾学校当局，而是出于真正的决心。大概学校当局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才让步的吧)。

回想起来，我这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时，似乎总能設法找到一个有力的陪伴，以便使自己的立場变得有利。所以我这人看看似乎蠢直，其实有些地方却是十分机灵狡猾。后来我开始解散劳动农民党的时候，曾死活劝說上村进和我一同进行；而那次改变升学目标时，也說服了經常考第一名的同班同学岡村正市，使他成为我的陪伴。(岡村比我年紀大得多，是个稳重的常識家，他的性格也許确实宜于进文科而不宜于进法科。后来他在大学讀書的时候，考試起来虽然也从不出前五名，可是毕业后当了稅务局长，年紀輕輕，却由于行政整頓而遭到革职处分，从此一蹶不振，老早就退隱回乡了。如果大学不念法科而念文科，那末毕业以后，說不定到现在至少也能当上一个高等学校的校长。看来我这人干起事来，很有一股热情，所以我所看中的人，結果总是让我說服了。)可是，像山口这样的乡下地方，法学通論之类的书想买也买不到，連旧书都

沒有。學校的圖書館里也僅僅備有一本。因此，我們兩人從圖書館里把那本書借了出來，也沒有得到圖書館的同意，就把它拆成兩半，由兩人分着讀。等到考試完畢，才把書送到裝訂作坊里重新裝訂好，還給圖書館。就這樣，1898年9月，我順利地升入了東京帝國大學的法科，那時我還不滿十九足歲。

最後還得提一筆。我幾次三番地改變自己的志願，爸爸絲毫沒有加以干涉，總只是听听我事後的報告，一切都由我自作主張。對於學校畢業以後的處世方針，也是這樣。我深深感謝他那種態度。

到這時，我已經是個大學生了。題作“幼年時代·少年時代”的回忆錄，到此也應該擱筆了。

1943年11月16日脫稿

自画像

(从无我苑时代到劳动农民党时代的回顾)

贯穿于我变化多端的一生中的本质的东西

想起来，现代日本的学者中间，像我这样几次三番被当作人物评论的对象，恐怕绝无仅有吧。1919年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的当时，《中央公论》杂志上就登载了许多人对我的合评。后来，1933年由于我是日本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刑期届满，从小菅刑务所的监牢里放出来，在这前后大约20年中间，我不知多少次被各色各样的报张杂志当作评论的对象。所以，我的肖像，可以说已经给画得太多了，这种肖像画也许至今还在什么地方流传着。一个渺小的读书人，居然引起人们这样关心，实在觉得过分了。但是，如果允许我说句放肆话，别人给画的那许多肖像，自己满意的很少。其中有些全然画得不像，有些即使像，本人看起来，心里却总是觉得不受用。因此，我在未死之前，就想给自己画一幅中意的自画像。

本来，我的一生就是极不平坦的。不过杉山平助这位先生却不善于处理像我这种类型的人物，1933年3月，在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而被捕后不久，他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评论，文章支离灭裂，自相矛盾到了极点，究竟给我这个人打了多少分数，始终弄不清楚。一些为表面形态所迷惑的、不懂得绘画的读者，看到他给我画的仿佛是把照相放大的招牌画那样的肖像，也许会啧啧称赞说像得很吧。其实那仅仅画了一层皮，没有

画出肉和骨，更談不到眼睛所看不见的心和灵魂了。总之，被当作描繪对象的我本人，是感到非常不滿的。现在按照次序把他那篇文章摘录几段如下。

“河上博士被捕后，报纸上登出了他的各种各样的照片。……事实上，报纸上刊登出来的和共产党事件有关的被告们的脸相，都具有一种共同性，使人觉得那副说不出的阴惨凶狠的面貌，再往前发展一步就将成为暴力犯了。……而我们的河上肇的照片，自然也流露着这样的共同性。不过，在许许多多的照片中间，记不起是登在哪个报纸上的了，却有一张照得很好的照片，使我看得半晌不忍释手。那个脸相，总的说来，是个专心一意的求道者的脸相。笔者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本人，从照片上看来，他那稍稍狭长的脸，十分带有理想家的风度，却又决不是西田几多郎^①那样的颧额宽广的哲人的风度。他那宽宽的鼻子，稍稍肥厚的嘴唇，都是对现实世界抱有极大关心的人的生相，同时说不出是什么地方具有一种高僧般的相貌，不过又不完全是僧侣式的面容，毕竟是作为一个迷途的俗物的脸，而使我們感到同情和亲切。”

杉山平助的文章一开头就是这样写的。这是看到当时报纸上登出的我的照片而发生的感想；不过，就是这几行文字，也把我写成了一个变化多端的人。他看到我的照片，一方面说使人觉得“再往前发展一步就将成为暴力犯（就是强盗杀人、强奸杀人等罪犯）”，而另一方面又说“在许许多多的照片中间，却有一张照得很好的照片，使我看得半晌不忍释手”。而且，我的脸据说“十分带有理想家的风度”，“说不出是什么地方具有一种高僧般的相貌”，而

^① 西田几多郎（1870—1945）是日本唯心主义哲学家，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著作有《善的研究》、《思索和体验》、《无的自觉的限定》、《日本文化的问题》等。——译者

同时却又是“一个迷途的俗物的脸”。沒有见过我的人，讀了这篇文章，势必至于大伤脑筋，再也想像不出河上肇这个人的脸究竟是怎样一张脸吧。一个人的脸上，一方面要流露出强盗杀人犯、强奸杀人犯的凶相，同时却又要要有高僧那般的相貌，这套功夫是很不容易练的。我这副尊容，难道就是只有在大众小說里才会出现的那种稀奇古怪的面容嗎？

杉山又說：

“据报上說，他是新生共产党的‘最高理論指导者’，我却無論怎样也不能輕易相信。……河上肇到了这个岁数，难道还会陷于这样的自我錯觉中么？想一想也就明白了，他既不具备独立自主的坚强性格，又沒有透彻的洞察力，仅仅是个极愚鈍、极平凡的理想家型的讀書人罢了，这是誰也不能否认的。这只要通盘观察一下他的过去，就清楚了。他一点也沒有什么独创性，总是受人家的影响，听其支配，徬徨游移，无所抉择，直到今天这个岁数。年輕的时候，甚至受过提倡无我爱的伊藤証信的影响。其他就像劳埃德·乔治^①啦、欧文^②啦、馬克思啦、列宁啦、斯大林啦、大山郁夫^③啦、山本宣治^④啦、甚至細迫兼光等人，他都讓他們牵着鼻子走过。無論从哪一点看，他决不是具有站在頂峰、支配时代的能力的人。他永远只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忙个不了。……不客气地

① 劳埃德·乔治 (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 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自由党首領。——譯者

② 欧文 (Robert Owen, 1771—1858) 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譯者

③ 大山郁夫 (1880—1955) 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日本劳动农民党的建立者之一，和平民主运动的战士。1951 年获得国际和平奖。曾来我国訪問。——譯者

④ 山本宣治 (1889—1929) 是日本生物学者。曾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26 年参加劳动农民党，1928 年当选为众議院議員。1929 年遭反动政权暗杀，死后被追认为日本共产党员。——譯者

說，像他那樣的人，並不值得多大尊敬，不過是個東倒西歪的人物而已。”

根據這段話，我被杉山平助貶低到一文錢也不值，多可憐呀。但是，他一方面說着上面那樣的話，接着卻又說：

“既然這樣，那末社會和時代為什麼對他曾經那樣關心，而且直到現在還繼續關心着呢？這可能是由於他那五十年來精神上十分苦悶而到老都不知停止的求道的純情，以及他求道的途徑永遠和時代的脈搏相呼應，因而使他成為時代的最典型的象徵，吸引着大家，刺激着大家，使人們不斷地注視着他吧。這也就是說，他在我們這個時代所以起到教師的作用，決不是由於他的‘理論’，倒是由於他的人格。這一點，無論他喜歡或不喜歡，都是無法推翻的事實。再說，他那人格，不管有着多大的缺陷——缺點似乎的確不少——可是却具有一種與眾不同的高尚的堅定性，這也是誰都承認的。這也就是說，他一向是如同詩人或宗教家感動世人那樣地影響了社會，而決不是作為一個學者或政治家推動了社會的。他在這方面的巨大的存在意義，決不應該過低地估計，却是應該充分加以承認的。

“縱使他有某些缺點，但是像他那樣畢生為追求真理而奮鬥到底，不停滯，不逃避，像逝水那樣地不舍晝夜，找遍了今天的日本，這樣的人還是不多見的。我們為我們這個時代有這樣純情的人而高興，不惜向他表示衷心的敬意。”

這一下，分數忽然多起來了。前面把我說成是“不具備獨立自主的性格，是個極愚鈍、極平凡的人”，“總是受人家的影響，聽其支配”，“不值得多大尊敬，不過是個東倒西歪的人物”，而這裡，我却又“具有一種與眾不同的高尚的堅定性”，對於時代起了“教師的作用”，“影響了社會”，“推動了社會”，我的“巨大的存在意義決不應

該过低地估計”，而且值得表示“衷心的敬意”。不过，这却是非常滑稽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如果要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坚定性，他就得具备某种独立自主的性格；可是据說我这个人，一方面是个不具备独立自主的性格的东倒西歪的人物，同时却又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高尚的坚定性。再則，据說我永远受人家的影响，听其支配，专门让人家牵着鼻子走，而同时却又給了社会很大的影响，以致不得不充分承认我的存在意义；如此說来，一方面我既是被动的，同时却又是主动的，試問我凭什么魔术而能起这种自相矛盾的作用呢？

其实，一个人假如执笔写人家的評論，单单罗列了一大堆互相矛盾的现象，那是說明不了問題的，还應該稍稍动动脑筋，追究一下那些表面上看来十分矛盾的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其原因何在。要是不这样做，說出来的話，就会前后互相矛盾，該說明的对象，就会变得支离灭裂了。杉山的缺点，就在于被表面现象所眩惑，而沒有把握住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用一种本质来統一說明許多互相矛盾的现象：他沒有这个本事。

誠然，我的一生是变化多端的。优点（自己說自己有优点，虽然觉得不好意思，就不客气地这样写吧）和缺点，棱角分明，打个比喻來說，就好比玉石混淆在一起。不过，比喻尽管打，我毕竟是个有生命的人，所以这所謂玉（自然比不上玉那样璀璨）和石，并不是东零西散的，而必然是融和統一在某种精神状态中的。这样說来，那末使这种矛盾的对立物互相吸引并把它們統一于一个中心的那种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只有把这个本质的东西交代出来，那才是評論家的任务。

虽說自画自贊，未免浅薄，可是我认为那个本质，在我就是追求真理的至柔的心。（杉山那篇評論，用《求道者河上肇》作为題

目，也隱隱約約地看到了这点。)說得詳細些，那就是：假如出現在我面前的東西看上去是真理，那末我就不問它是什麼樣的東西，毫不躊躇地立刻把它接受下來；一經接受以後，就再也不肯放手，就一步一步地追根究底，非弄出個究竟不止；如果到那時仍然認為它是真理的話，那末我就不顧生命，不計較毀譽褒貶，虛懷若谷地、無條件地而且絕對地、徹底地始終全心全意服從它，追隨它，最後儘管不得不落到意想不到的危險、失敗或困窘的境地，我也決不逃避，決不退縮，卻以響應至高無上的號召的心情堅決履行生命攸關的飛躍。但是，在這樣不顧一切、奮身前進的過程中，如果發現最初被當作真理的東西肯定地不是真理，那末我就立刻毫無顧惜，堅決地拋棄它。

這就是我的人格的本质。我所有的種種特征，不管外表上是如何矛盾對立，都是以這個本质為中心而輻射出來的，它們都受到這個本质的光照，它們都被這個本质所着色。所以這種矛盾對立，自有其一定的限度，是既統一而又調和的。

我往往容易受人家的影響、支配以至被人家牽着鼻子走，這也是這種本质的一種表現，是這種本质的一個方面。確實，我曾經像杉山平助所說的那樣，“年輕的時候，甚至受過提倡無我愛的伊藤証信的影響。其他就像勞埃德·喬治啦、歐文啦、馬克思啦、列寧啦、斯大林啦、大山郁夫啦、山本宣治啦、甚至細迫兼光等人，都讓他們牽着鼻子走”。豈僅如此呢，直到擔任大學教授的後期，我已快要五十歲了，却仍然不斷地受到年紀比我小三十歲的、我所教的學生的刺激和影響，讓他們牽着鼻子走。不過，這無論從期間方面說，還是從範圍方面說，都只限於我認為對方具有真理性時才是如此。要是一旦我相信這樣做是不對的，就會隨時脫離這種影響。還有，不管周圍的人怎樣說，如果我不相信他說得對，我就決不接

受他的影响。下面我要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这一层。

1905年冬天第一次访问伊藤証信的经过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受到伊藤証信的强烈影响，这完全是事实。不过，那时的情形，几乎没有人了解，所以我愿意在这里把经过说清楚。

据伊藤本人说，1905年，他三十岁那年，还在真宗大学^①研究科（当时真宗大学在东京郊外巢鸭）学习的时候，就开始提倡无我之爱，攬掇了两三个朋友，不出租费，借到了宿舍附近荒废着的庙宇大日堂，作为无我爱运动的据点。就从那年6月10日起，发行机关杂志《无我之爱》（8开本8页）。这份杂志的发行数量逐期激增。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引起了异端问题。结果伊藤就从真宗大学中途退了学，而且抱了脱离僧籍的决心，把10月10日发行的那期《无我之爱》标为“脱字号”，通体用红字印刷，作为纪念号出版。据他自己说：“这期杂志的反应实在不小，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各式各样的投稿和私信”。

正是那个时候，我受到《圣经》上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②这段话的强烈感化（我把它姑且称做绝对的非利己主义）；不过又觉得如果真的照那样做，在这个世界上是生存不下去的，由于这种疑惧，我就长时期不能决心实行这种教义。但是，作为人类生活态度的这

① 真宗是佛教在日本的一个宗派，真宗大学就是那个流派所办的宗教学校。——译者

② 见《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9—42节。——译者

种绝对的非利己主义，在我看来，却是无可怀疑的真理。同时我觉得，我现在的情况，是与这种生活态度不符合的，非根本加以改变不可；而且这样的内心要求，一天天地迫切起来。正在那个时候，伊藤証信不仅作为一个绝对非利己主义的提倡人，而且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实行者而出现在我面前（在我当时看来，他确实具有这样一副面貌）。在现代日本，不折不扣地实行这种主义的人，尽管仅仅只有一个，实际上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躊躇不前的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伊藤証信的关系，我才下定决心，向绝对非利己主义的道路迈进。所以这种影响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非常巨大的。

不过，这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说来可笑，我之所以受到这种影响，其实是因为我误解了伊藤証信的无我爱，把它当作真理了。我把无我爱这个口号当作那时我自己所想的绝对的非利己主义的同义语，其实这完全是个误解。根据伊藤的无我说的理论（这到后面还将比较详细地谈到），人类的一切行动，无论是强奸也好，强盗也好，无一不是无我爱的活动，而且除了无我爱的活动之外，人类也不可能从事别的活动，这就是懿歟盛哉的宇宙的构造。伊藤証信的主张既是这样，如果最初我就弄清楚的话，我也决不会参加无我苑那种组织。这实在该说是个不可思议的因缘，总之，是误解使我接近了伊藤証信，并且一开始就对他寄托了绝对的信任。

我在那个时候，把绝对非利己主义当作真理，而且要求自己的生活彻底遵守这个主义。碰巧在这个时候，伊藤証信作为一个先知先觉者出现在我面前。由于这个缘故，我才极谦虚地把伊藤当作老师，一步一步无条件地接受了他的影响。但是等到逐渐弄明白他所说的无我爱和我所想的绝对非利己主义根本不相干的时候

候，我就离开了他的影响，而且公开地把他的无我爱說成是天下的邪說。

这一时期我的行动，如果从我和伊藤証信的关系这一角度来看，也許会显得我在很短一段时間里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仿佛我这个人簡直是个捉摸不定、变化无常的人。但是如果从我和絕对的非利己主义的关系这一角度来看，那末我对主义却是始終如一，信守不渝，犹如磁針永远指向着南面那样。

从那时起，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到我五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对于劳动农民党的大山郁夫所采取的态度，也和对于无我苑的伊藤証信所采取的态度很相像。当我觉得大山郁夫是一位实践馬克思主义的先知先觉的时候，我就对他充滿了敬意和信任；一旦觉得并不是那样的时候，我就同他鬧翻了。我对大山郁夫的这种态度尽管显得变化无常，可是忠实于馬克思主义的素志，在主观上却絲毫都沒有改变。

要是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够理解到：我的行动，表面上有时仿佛逸出常规，实质上却是遵循着一定的途径的。

查看当时記錄下来的旧文件，我第一次写信（在我的另外一篇文章《大死一番》中抄出了全文）給伊藤証信，是1905年12月1日，也就是《无我之爱》脫宗号出版后的第五十天。信中措詞非常肉麻，现在重讀一遍，自己都觉得难以为情，不过，这也适足以証明我对于真理（道）是怎样地低首下心。要說我这个人的脾气，有时非常莽撞，容易发肝火，难摆布得很；可是面对着真理，我却具有一颗至柔的心。

12月4日，我第一次訪問伊藤。第二天，我就完全照他所吩咐的，向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学习院、专修学校、台湾协会专门学校等所有我在那里教书的几个学校提出了辞职书。抛弃了所有的教

职以后，生活怎么办，像这样的问题简直完全不在我心上。

12月7日那天，又为当时连续刊登在《读卖新闻》上的《社会主义评论》写了一篇《搁笔之辞》。我在那篇文章里，作了半生的忏悔，那也是出于伊藤的指示。《社会主义评论》，是用“千山万水楼主人”的笔名写的，那篇文章，乃是我的所谓成名之作，它意外地获得了读者的好评，由于刊登这篇文章的缘故，《读卖新闻》的发行数忽然大大地增加了，所以那篇《搁笔之辞》格外引起大家的注意。那篇文章自然也就成了《无我之爱》的强有力的广告，这份小杂志的读者也忽然增加起来。

8日那天，第二次访问伊藤证言的无我苑。在我的旧文件里，关于那天的情形有着下面这样一段记载：

“8日再访大日堂，归寓后，我树立了在无我苑以外独立从事传道工作的计划。这是因为无我爱同人口头上说是要竭尽全力去爱别人，但他们的行动，却未能使我深深感动，特别是夜间贪睡，只能认为是他们没有竭尽其全力的明证。因此，第二天9号那天，我就下定决心，要和无我苑完全脱离，今后不眠不休地来传播这个真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时我对于‘竭尽全力爱别人’这句话，作着怎样的解释，思想是怎样地走向极端，由此也可以想像了。也许人们将笑我狂愚，但是，当时我是十分真挚地下了这种决心的。而我之经历到最奇异的体验，也就是在下了决心那天的晚上。”

照这段文字看来，尽管一时我对伊藤非常尊重和信任，可是第二次见面时，就感到某种不满。因为，我本来认为必须竭尽全力爱别人，而伊藤却认为实际上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竭尽全力爱别人，所以我们两人虽由“无我爱”三字连结在一起，可是各人的立场非常悬殊。当时我虽然还没有向伊藤详细地请教过他

的无我爱真理究竟是怎样的东西，但是，尽管我生性愚钝，却也模模糊糊地从当时的气氛中早就觉察到立场的不同以及心情的差异。特别是“无我爱同人口头上虽说要竭尽全力去爱别人，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未能使我深深感动，特别是夜间贪睡，只能认为是他们没有竭尽其全力的明证”这一段，可以作为自己那时还不了解伊藤的所谓无我爱的真相的证据，现在使我感到兴趣。伊藤所标榜的“确信”里，有所谓“夫宇宙之本性，乃无我之爱也。组成宇宙之一切个体，在其本性上，均无我爱之活动也。个体将本身之命运委之于他人之爱，而同时竭尽全力以爱他人，此之谓无我爱之活动。”细细地读一读，就可以知道，他是说组成宇宙的一切个体本来就在做着无我爱的活动，而不是说各人应当尽力从事无我爱的活动。因此，从伊藤的立场来说，夜里睡觉不睡觉，根本不成问题。想睡就睡，不想睡就起来，根本用不着为这类事情而想不开。我们的一切举动都是无我爱的活动，所以只要自觉到这层道理，那末每一个人就都能得到绝对的安稳，免除一切烦恼。这就是伊藤证信的想法。可是在我这方面呢，却认为既然抱定宗旨，竭尽全力去爱别人，那末就该做到觉也不睡，不分日夜地为别人服务。所以，两个人的立场是大相径庭的。当时我虽然没有弄清楚这一层，可是访问了无我苑以后，总觉得有些气味不相投，于是我就下定决心，脱离无我苑，独立地开创传道事业，日夜不休息地来干这个工作。——这看起来真像发疯，不过既然认为绝对非利己主义是真理，那末我就要坚决向这方面做去，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曾被哪个人牵着鼻子走，却是走着独立自主的道路。

就在下定决心一辈子不睡觉不休息地干下去的那天晚上，我忽然一下子达到了禅家所说的“放身舍命，大死一番”的佳境。前面所引的旧记录中所说的“奇异的体验”，指的就是这个。关于这

事，在另外一篇文章《大死一番》中有詳細的記述，这里不再重复。不过这里还得交代一句，就是，那种宗教体验，是当时我所获得的唯一最大的收获，它给我一生的生活方针奠定了基础；还有，当时我之所以能够走到这个关口，虽然由于受到伊藤証信的刺激，可是，打开这个关口，却完全是我自己个人的力量，并没有沾伊藤証信的光；结果，我所体会到的宗教的真理，和伊藤那时所提倡的无我爱的真理，自然也就毫无联系了。

可是，再看杉山平助的评论，他对于当时那件事情却是这样说的：

“西田天香^①的一灯园的主张是，要忘我地为别人服务，首先要从打扫厕所和给人擦皮鞋开始；我不知道当时的无我苑主张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实行无我的生活。那种生活，果真是无我的么？对于世人果真有什么好处么？没有听说河上肇为这些问题而烦恼，只听说——而且他自己也这样说——他曾因自己晚上需要睡觉、把为邻人服务的时间耗费在自己的休息上而感到烦恼，认为这是一种利己的行为，烦恼得晚上觉也睡不着。……凡是希望过无我生活的人，他所最感到烦恼的，就是不容易做到在精神上割断我这个念头。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那种自负自恃的念头，就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日夜支配着他，因而使他感到非常苦恼。只要稍稍有点纯宗教经验的人，没有一个不为此而苦痛的。可称为无我之书的中世纪的那部《日耳曼神学》，反来复去讲的就全是这个道理。可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河上肇却不愿意去想，只是为自己晚上睡觉不睡觉这样一个第二、第三义的问题而烦恼，只是打算走苦行头陀的老路。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说，这是多么不深刻，多么

^① 西田天香(1872—?)是日本的宗教家，曾任参议院议员。1905年在京都市鹿谷创立一灯园，宣传托钵化缘、打扫厕所等。——译者

不敏銳呀。从这方面來說，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他，对于我們的影响力是意外地薄弱的。老实不客气地說，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个不值得多大尊敬的、东倒西歪的人物而已。”

杉山平助那种人，由他去說什么，本来不值得放在心上，不过让那样的人胡說一通，还印成文章留传下来，就令人生气。特别是，評論是和非，倒无所谓，歪曲了事实，所牵涉到的又是我切身最紧要的一件大事，我就非彻底加以訂正不可。

“据說——而且他自己也說——……煩惱得晚上觉也睡不着。”我記得自己并没有說过这样的話。那末这样的話又是誰說的呢？杉山所指的，大概是伊藤証信在《那个时候的河上肇博士》那篇文章里的下面这样一段話吧。

“那个时候，他(河上)似乎为实行无我爱的問題而感到非常苦恼，有一天他問我：‘您晚上睡觉么？’我回答說：‘晚上睡觉的。’他又說：‘晚上睡觉，不是还有我么？如果真的做到无我的話，那就应该觉都不睡，来宣传无我爱，这才是无我爱的实践的一端。’事实上，他那时为了这个，大概有几个晚上沒睡上觉哩。”

到底是人家的事情，記得不可能那样准确；拿我來說，即使是自身的事情，也总是記不大清；不过唯有睡觉不睡觉这件事，却意想不到地成为我一生的一件大事的契机，所以不仅不容易忘掉，而且幸而还留有当时一直没有发表的記錄，所以事情非常清楚。根据那个記錄，睡觉不睡觉的問題，发生在12月初旬第一次会见伊藤的时候；而极力想要彻底解决这个問題的結果，意外地窺见了大道的一端，乃是12月9日那天晚上的事。

伊藤那篇文章里先說：“我在第二年，也就是1906年1月底，宣布解散无我苑。”接着就是上面所引的那一段：“那个时候，他(河上)似乎为实行无我爱的問題而感到非常苦恼，有一天他問我：‘您

晚上睡觉么？’……”所以看上去，事情仿佛发生在无我苑解散的前后，而其实却不是这样。

前面已經說过，我第一次訪問伊藤是12月4日，第二次訪問是8日，回家后，当天就决心离开伊藤，独自献身于传道事业，于是，就在9号那天晚上，决心“今后不眠不休”地工作，而在下定这样一个奇怪的决心的瞬間，我第一次割断了小我的根子，廓然彻见了大道。这样，关口打开了，钥匙用不着了。那天夜里快天亮的时候，我在席垫上熟睡了。因此，实际上我連一晚都沒有不睡过。把我描写得当时像个苦行头陀，这是杉山平助猜测錯了。

白柳秀湖这位先生和杉山平助有所不同，他装出一副十分明了真相的样子，說了許多同样与真相极不相符的話。这里也順便引它几段。1929年5月（我辞去京都帝国大学教职的第二年），《祖国》杂志上发表了几位先生的《河上肇論》，这是其中的一段：

“前年在《經濟往来》杂志上，登載了XYZ先生的《河上肇教授論》。那份杂志的学术界人物評論文字的特色是，根据每一个学者的思想生活，談他的人物性格，和过去一般人物評論不一样，因而博得了讀者极大的好評；其中XYZ的匿名人物評論，甚至成为杂志界一时最受欢迎的东西。可是我讀到那篇文章，却觉得非常不滿。对于一个人的实际生活不加观察，单单根据其思想生活而作人物評传，这种做法的錯誤，我认为在那篇文章里充分表露出来了。”

他一面这样說，一面批評那篇評論說：“在发现河上博士的波瀾万丈的思想生活的一貫綫索这一点上，这篇文章可說尽了一番努力。然而，可惜的是，由于这篇文章疏于最必要的事实調查，所以它沒有能够說明博士的思想过程：为什么博士在当了几年大学教授、安分守己地过了几年所謂学者生活之后，会变成一个馬克思

主义的热烈研究者,更进一步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热烈信奉者,最后想做一个根据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社会的实际革命家。所以尽管尽了一番努力,在我们这种深知河上博士前半生的底细的人看来,这篇文章还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这样看来,在“深知”我前半生的“底细”的旧社会主义者——在明治时代早就变节了的——白柳秀湖那样的老先生面前,我即使想装聋作哑,画皮还是不免要被揭穿,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那末,他所知道的事实,又是些什么呢?他说:

“XYZ 知道河上博士曾经参加过无我爱的组织,可是关于他参加无我爱组织的动机何在,却只字未提。……河上博士并不是像 XYZ 所说的那样,在他被京都帝国大学请去当教授以前,完全是个倾向于唯心主义的人,一脑袋国家至上主义的人,等到进了京都帝国大学以后,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学生时代,他就有热爱社会正义的倾向,矿毒问题^①曾使他青年的热血沸腾,木下尚江^②的演说曾使他感到振奋,他也曾为了想进岛田三郎的《每日新闻》报社而到处奔走(另一方面,也曾为了想进三井银行而奔走过,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到1902年7月大学毕业的时候,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他差不多都已读过,实质上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了。这只要读一读他毕业后不久所出版的《千驮木丛书》(第一篇《经济学上的根本问题》、第二篇《新史观》、第三篇《经济学原理》等),也就可以约略知

① 指大资本家古河市兵卫所经营的足尾铜山排出的矿毒,浸润渡良瀬川沿岸的村落,致使田地寸草不生,许多贫农因而饿死的事件。这事件到1897年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译者

② 木下尚江(1869—1937)是日本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1901年和幸德秋水、片山潜等创立社会民主党,日俄战争前夜,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发表非战论。还发表过《火柱》、《良人的自由》等非战小说。——译者

道了。到 1905 年 10 月他用千山万水楼主人的笔名在《讀卖新聞》上連續刊登《社会主义評論》的时候，他那社会主义者的立場已經沒法隱蔽了。……然而，那时政府对于社会主义者的极端残酷的鎮压，决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有許多事情，今天的年輕教授和学生們是連想像都想像不到的。这样，他深恐報紙上的文章累及他的大学讲师的地位，于是暗地里和主笔足立北鷗商量好，假托說那篇《社会主义評論》是一位得了不治之症、从外国回来的青年学者在房总海岸疗养期間写的，作者的眞名实姓絕對保密，不让外界知道。他写那篇文章的目的，原是为了介紹近代社会主义的实质，纵横无尽地批判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笔鋒所及，却攻击了曲学阿世的大学教授，严厉地責备了他們对眞理的怯懦态度，而且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理論的难于隱蔽的向往之情。如果能照最初所計劃的那樣，絕對不把作者的眞名实姓泄漏出来，同时政府的注意也不像那样严厉的話，大概他也不至于参加无我爱的組織吧。可是那篇連續刊登的評論才发表到一半，外界已經有人知道千山万水楼主人就是法学士河上肇，到了后来，这事竟变成了尽人皆知的公开的秘密。他一方面受到政府当局的注意，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被他罵得狗血噴头的前輩教授，也觉得下不了台，于是看到伊藤証信的‘无我之爱’，灵机一动，他就此擱笔，把《社会主义評論》加以腰斬，跑进巢鴨的大日堂里去了。……

“他实在是个伟大的招牌店老板。不知道当初他腰斬《社会主义評論》而轉向‘无我之爱’时所抬出的堂皇的大招牌的人，可能也和 XYZ 一样，对于他后来抛弃‘无我之爱’重新回到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灵机一动、大招牌就此失踪，不感到有什么別扭吧。可是像我們这样老而不死、看慣了別人的連台好戏的人，却觉得起初有那样堂皇的大招牌而后来却沒有，未免有些美中不足，怪冷冷清

清的。河上肇說：‘我已經掌握了絕對最高的真理。这个真理的伟大，不是人类語言所能形容的，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这块招牌不是大得无边无际么？后来，他安分守己了几年，重新做了官，当上了大学教授。^①不久欧洲大战結束，原封不动地继承桂內閣^②以来的传统的当时政府的思想政策，起了变化，允許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某种程度的自由，这一下河上肇沒有抬出前次那样的堂皇的大招牌，人不知鬼不觉地重新又回到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貧窮故事》这部书博得了成功，《社会問題研究》又博得了成功，于是他看出尽管丢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单凭人望，也完全吃得开，就走出书斋，站到街头上来了。我并不是說大招牌不好。出去的时候抬着絕對永远的大招牌，回来的时候却一声不响地藏了起来，居然装得若无其事，那样的事世上可也不少。反正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我也不願意为此而說长道短。不过我觉得，由此一事，也就可以充分看出，人物評論不是单看招牌就可以写的。招牌上写的是‘无我之爱’，实际上却是顾虑到警察的眼睛和前輩教授們的脸色。……”

多别扭的吞吞吐吐的笔調呀！一上来，装出一副通过“事实”看穿了我的前半生的模样，哪里知道他所說的所謂事实，却絕對是造謠，这就有些不好办了。他說我因写《社会主义評論》而受到政府当局的注意，可是那个时候，警察方面对于这件事，却沒有来找过任何麻煩，我也从来沒有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他又說，文章登了一半，外面就有人知道千山万水楼主人是法学士河上肇，因此我

① 帝国大学是国立大学，教授等都由政府任命，所以河上肇的引文里說当教授就是做官。——譯者

② 桂太郎(1850--1913)是日本的老軍閥，曾三次任首相，在他首相任內，簽訂了日英同盟条約，发动了日俄战争，还簽訂了并吞朝鮮的条約。——譯者

着了慌；这也完全是造謠。我的稿子每次一写好，总是立刻亲自送到离我家不多远的足立北鷗主笔家里去（我住在神田駿河台下淡路町，北鷗住在岩崎公館前面的坡道的尽头，井上眼科医院的附近，大概是紅梅町吧），而且一定当面交給他。北鷗去报館以前，就在他家里亲自抄录一遍，把原稿換成他的笔迹，然后付排。再說北鷗的嘴巴又很严，决不会向外泄露我們中間約定的秘密。而且从报纸的营业政策的角度來說，作者的眞名实姓絕對保密，也当然是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就越加引起讀者的好奇心，甚至在报館內部，也有人作了种种猜测，不过仅仅知道原稿是主笔的笔迹，其他也就无从推测，因此格外引起了轰动。——白柳秀湖所掌握的所謂“事实”，就是我匿名所写的文章半中間泄露了眞相，我着了慌，为了应付一时的难关，才投奔无我苑。可是我觉得我的为人，决不至于像他所說的那样。对不起，白柳秀湖这篇文章，只是“眞所謂小人好議論而不乐成人之美”的一个适当的例子罢了。

从参加无我苑到退出无我苑

第二次訪問伊藤証信以后，我决心脱离无我苑，独立地以献身团的名义“不眠不休”地从事传道事业，到1905年12月9日晚上，正当想記錄下自己所到达的确信的时候，忽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一种宗教体驗。一旦經過这样的宗教体驗以后，不知怎的（大概是因为什么东西都沒得說了吧），完全失去了独立传道的意思。可是，虽然不想独立传道，却也不想立刻回头重新研究經济学。于是，可以說是出于自然地，我就决定作为无我爱同人之一，从事传道，在那年年底，住到巢鴨的大日堂去，第二年（1906年）1月4日，就在

大日堂附近租了一栋房子住下，把它称做无我苑第三分苑。就从那天开始，我在《讀卖新聞》上連續发表《人生的归宿》这篇文章，鼓吹伊藤証信所說的无我之爱的真理。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自称为以“无我爱同人的一个速記員”的資格来写，这倒并不是什么門面話。实际上，我每次执笔总得和伊藤商量怎样写，每次都是照他所說的写的。

现在回想一下当时自己的心理过程，連我自己都不容易摸清楚它的奇怪的綫索。前面已經讲过，我当时一心把无我爱这个标語当作是絕對非利己主义的同义語，由于这样一种誤解，我才去同伊藤接近。所以，假若最初我就明白无我爱这个标語的真正的解释，無論强奸还是强盜都算是无我爱的活动的話，那末我是决不屑参加无我苑的，可是当时我却一心认为无我爱就等于《聖經》上的“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辞”的教訓，所以才抱着莫大的尊敬和信仰去同伊藤接近。而这种莫大的尊敬和信仰（我把它解释为对于真理——道——的尊敬和信仰），使我的心变得十分柔軟，結果我就把伊藤的說素一一接受下来，終于把伊藤的无我爱代替了我所想的《聖經》式的无我爱；就这样，有一个时期里，我完全成了伊藤的信奉者。

要是照白柳秀湖那样解释，自然又当別論，不过在事实上，我如果不尊敬和信仰伊藤，是不会参加无我苑那样的組織的。在当时，我确实是抱了师事伊藤的打算而参加无我苑的。不过我相信，一个人假如想从前輩人物那里得到益处的話，那末就得尽可能放謙虛些，这就好比如果在两个桶之間安上个水管、想从另一个桶里取水的話，那末自己这个桶就得尽可能放低些；所以我对伊藤始終抱着謙虛的态度。尤其是，我对于真宗的教义，完全是外行，相反地，伊藤却是真宗僧侶出身，对于法然、亲鸞、蓮如那样一些他力

本願宗^①的日本高僧的著作和語录，有着淵博的知識。那时伊藤所写的一篇題名“确信”的文章里，就說他自己所說的无我爱的眞理不外乎是“释迦、基督、孔子、亲鸞諸圣人之道”。后来听听他的談吐，觉得和亲鸞上人所說的眞宗的教义果然至少很相像。因此，我就认为我的想法之所以和伊藤的說法不一样，完全是我認識不到家的緣故，結果就把伊藤的說法全部囫圇吞棗地接受下来。1906年1月4日起在《讀卖新聞》上連續刊登的《人生的归宿》，就是这一时期的产品；如果用杉山平助的話來說，那个期間，我是完全被伊藤牵着鼻子走的。

但是，这种状态却並沒有长期繼續下去。大約过了一个月光景，我对伊藤的說法漸漸发生疑問了。同时，对于无我苑同人的生活方式，也更加怀疑起来了。这样到了2月上旬，关于生活态度的問題，我就和伊藤发生了爭执；当我看出我們两人的意见难于一致的时候，我就决心脫离无我苑。翻看一下当时的記錄，有这样一段：“多次和伊藤交談，心不能通。平常一言一語都把他当做老师那样受命唯謹的我，到这时才第一次頑强地加以拒絕，决心脫离无我苑，暫時埋头讀書。恰好和田幽玄（他和伊藤都是杂志的創办人）为了某种情由也要脫离无我苑，几天以后，伊藤也有所感觉，于是决定解散无我苑。”

由于这样的緣故，《人生的归宿》也和以前的《社会主义評論》一样，半中間擱笔了，同时，《无我之爱》杂志也停刊了，无我苑也解散了。（现在《无我之爱》杂志，又由伊藤繼續出版了，无我苑、无我

^① 他力本願宗也叫做他力教，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我国高僧曇鸞所創。它主张，众生凡夫，依靠自身的努力，是不能求得极乐往生（上西天）的，这一定要依靠如来佛的本願（超度众生的当初的誓願）的力量才行。日本法然、亲鸞、蓮如所提倡的淨土宗、眞宗等，总起来說，都属于他力本願宗。——譯者

苑分苑等，經過長期停閉之後也復活了。在我剛收到的1943年6月5日發行的《無我之愛》第九十四期里，登有一篇“國體教學會同人”的《神之家庭運動宣言》，伊藤列名為同人之一。所以不消說，在無我愛這同一名義之下，伊藤的主張，前後變化是很大的。）

如此說來，我當時所看出的無我愛教的實質究竟怎樣呢？它到底什麼地方不對呢？文章雖然非常幼稚，姑且把那時寫了沒有發表的一篇東西抄錄幾節如下。

“無我愛三字，實為聖聖相承的真理。而所謂無我愛宗的無我愛，其內容則全然不同。照他們的說法，殺人也是無我愛的實踐，盜賊也是無我愛的實踐，奸淫也是無我愛的實踐，其他一切人類行為，無一不是無我愛的實踐。不僅人類行為，甚至地震、洪水、暴風之類，也都是無我愛的活動。然而那些殺人的人，雖然實行着無我愛，卻不自覺；從事盜賊、奸淫等的人，雖然同樣在實行着無我愛，卻也不知其所以然，因而把這些事視為罪惡，徒然感到苦悶。無我愛宗的同人因為不忍坐視其愚，所以提倡無我愛的真理，以便早日破除他們的迷惑。——所謂無我愛宗，就是這樣的東西。然而這種主張，實在是極端的暴論邪說。由於他們自稱其教為‘無我之愛’，世人自然也就不明白他們的主張的真相。但是讀者如果看了我以上的說明，再閱讀下面這篇文章，恐怕也就不難知其真意。

“《無我之愛》第十三期上說：

“‘宇宙者，善也；組成宇宙之每一個體之活動，絕對善也。……善者何也？自身獲得真幸福并使他人獲得真幸福之活動是也。何謂真幸福？體驗無我愛，即為真幸福。自身體驗無我愛，且使他人體驗無我愛，此即善也。然組成宇宙之每一個體，無不正在從事自身體驗無我愛且使他人體驗無我愛之活動，此非絕對善乎？世人謂世上有罪惡，如掠奪，惡也，殺人，罪也。然掠奪之所以為惡，不

在其行为，而在其不能无我。……由此观之，掠夺，善也，本身得賴以自由行动，人或遇之，将摧其私欲；杀人，亦善也，本身得賴以自由行动，人或遇之，将丧其驕纵之头。其他人世間一切行为，毕竟皆自身体驗无我爱且使他人体验无我爱之活动也。’

“像这样，把掠夺当作善，把杀人当作善，把其他一切罪恶行为当作善，这实在是抹煞了善恶是非、抹煞了道德法律的权威的論調。我最反对无我爱宗的就是这一点。还有，像下面这篇文章，簡直是恶魔的狂号。

“‘吾人既进入无我爱之大道，即达绝对自由之境。何謂自由？自由者，无束縛也，无羈絆也，随心所欲而无阻也。吾人现即逍遙于绝对自由之境。吾人最初认为，人类本不完全，不自由，决不能登绝对自由之域，然此非真见，全属謬誤。观夫吾人今日，岂非已登斯域乎？吾人之意思，非已绝对自由乎？制度法律其奈我何？制度法律，究何物也？文字非制度，紙片亦非法律，雇佣之官吏亦非法律制度。法律制度之条文，虽巍然徧布于世界各国，如吾人不之畏惧，則法制者片紙耳，官吏者土偶耳。道德习惯其奈我何？所謂道德习惯之制裁力，究何物也？无非吾人之恐惧心而已。他如国家、宗教、财产、名誉，皆因吾人有保护己身及子孙肉体之私利妄念，方有此等使吾人作茧自縛且憎恶他人之媒介物之势力也。’（《无我之爱》第五期）

“还主张绝对自由恋爱，說：

“‘托尔斯泰翁虽显然为一悟道之人，然其个人积习尚多，頗为信仰之光之蔽。就中如《余之宗教》中所主张之結婚論，实属怪論，不应出諸其口。惟此盖源出基督，其道与吾人自异，由翁之立場而言，固亦不可免之情也。然翁謂仅初次結婚乃神之綴合，吾人殊不以为然。吾人深信，无论初婚、二婚、三婚乃至离婚，皆为神之慈

悲、神之威力之显现。……一切事件均出于自然，自然即神之爱之河流也。故一切事件，均应加以欢迎，而不应该加以嫌恶。若将其区别为高下善恶，或则好之，或则恶之，此乃偏私迷妄，吾人应竭力排除之。……故由无我爱之信仰言之，配偶初无固定之对象，普天下男子皆得为普天下女子之配偶。一切男子为一切女子之夫，一切女子为一切男子之妻。故世人如皆能领悟无我爱，彼时之结婚问题、恋爱问题，将可融通无碍。’（《无我之爱》第九期）

“还有青柳有美的一篇《灵之闪光》，其中有一段说：

“人之重贞操、敬忠义，犹如好奇者之珍视古董。以贞操忠义为美德，并断定其为人类本性，则尤属谬误。人之所以重视道德贞操，非因其可贵，实因其罕有也。岂不知德义实古董品之一种乎？”（《无我之爱》第四期）

“把这种恶魔的狂号当作灵之闪光，单是由这一点，大概也可以明了无我爱的真相了吧。如果这样就说自己获得了绝对的意志自由，不妨随心所欲，这是何等暴慢，何等狂妄呀！以孔夫子的大德，也只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那末试问无我爱宗，果真有什么魔力，而能使人即时达到太圣人的圆熟境地呢？同样是从心所欲，而一方则抹煞善恶是非的区别，把自身现在的行为全部当作善，认为自己获得了绝对的自由；而另一方则以不修德、不讲学为终身之忧，克己复礼，而后止于至善，这才达到绝对的自由。一方是昧没良知而得自由；一方是弃绝私欲而得自由。看上去似乎是一回事，其实两者之间却有千里之差。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贩卖新闻》上写那篇《万水楼独语》，指出无我爱宗是天下的邪说，远远地偏离古往今来的圣贤的正路，而深深地陷进了群魔的邪境，不过是所谓大奸之忠而已。”

我的旧文章里，还谈到许多东西，不过现在没有必要细细说

它，只要能让大家知道一个大概也就够了，所以这里只再抄一节“我所见到的流弊”。

“第一个流弊是：无我爱宗不能导人于善，反而不免诱人作恶。嘴上虽说不该作恶，恶事还是不容易完全免除；心上虽想做好事，好事却还是难于做到，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无我爱宗却说人根本不会作恶，人的一切活动尽是好事。流弊就产生在这里，而且事实上也已经产生了。诸圣的遗教，在于劝善惩恶，策万行而同归于治；从来没有听到不惩恶、不劝善的圣人。释迦、基督、孔子等圣人之道，岂可与无我爱道同日而语？尤其是，心中略有苦闷，无我爱宗就把它斥为偏私的习性，而一味重视所谓绝对的平安，其结果，有时做了坏事，犯了罪，因而受到良知的苛责，也不去力求致良知，避恶从善，反而把一切行为都看成好事，抑制良知的发动，借此经常求得一时的平安。而这样做，流弊是很大的。……”

“第二个流弊是：不仅抹煞道德上的努力，而且抹煞一切人类的努力。把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看做全是好事，把一个人的发展完全看做是自然的命运，因为走了这样的极端，所以不免产生一个流弊，那就是对别人没有责任感，违背了忠恕之道，不作主观努力，而陷于消极。像我这样的人，虽然不懂得忠恕之道，但素性爱好努力主义、奋斗主义、精神主义，可是在参加无我苑的时期，却流于极端的放任主义，只是听天由命，完全忘记了该尽的人事。我相信这不见得是我一个人受到的坏影响。”

“第三个流弊是：抹煞了社会的进步发展。无我爱宗把现有一切事物都看做是绝对善，其结果，必然达到这样一个论点，就是丝毫用不着谋取社会的改革进步。……”

“由于这些理由，所以我才在5月27日的《读卖新闻》上公开地把无我爱宗斥为天下的邪说。”

“总之，最初我之所以对无我爱宗抱有满腔敬意，只是因为我把这个宗派当作是宣传绝对非利己主义的，而绝对非利己主义，我又深信其为至善，为真理。后来我参加了无我苑，详细听了它的主张的内容，由于我对伊藤証信已经抱有满腔的尊敬和信仰，所以我把他的教理丝毫不加怀疑地接受了下来。至于后来无我苑解散的时候，我虽确信应当遵循至善的大道，但仍未能抛弃无我爱的教理，那只是因为我虽然不是先详细知道了无我爱的教理然后参加无我爱宗的，可是后来终于认识了大道，觉得这一点还多亏无我爱宗的教理。直到最近（按：这篇文章是1906年6月写的），我才好容易明白我今天的信仰，并非受无我爱宗的教理本身的影响，同时相信它那种教理反而有害于世道人心。如果再把我自己思想的前后经过说得彻底些，那就是：最初我照普通的意思理解了无我爱三字，从而确立了我的信念，后来照无我爱宗所主张的那个意思加以解释，而今天我要再照普通的意思来理解它。”

当时的记录，就是这样写的。我和伊藤的无我爱的关系的确相当微妙，局外人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大体上是上面所说的那番经过。

1933年伊藤写的一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解散了无我苑以后，我和两三个同人住在一起，讲习《论语》，再不然就从事其他的修养，而河上肇则重新进了读卖新闻社当记者，写起文章来，并且逐渐对无我爱抱怀疑态度。他似乎反省到他过去过分走了极端，对他的夫人和亲戚很抱歉，觉得对不起他们。到后来，竟把无我爱斥为邪道。河上对于五伦五常之道，一向学得相当到家，大概这时后悔自己以前的思想过于偏激了吧。他本来以为无我爱运动应当是理想的彻底实现，所以觉得从五伦五常的角度来衡量，未免不切实际吧。后来他思想上变化很大，我也有过几次转变。展开

过去的历史画卷看看，觉得有一个教训。河上的思想反来复去转变了許多次；相反地，将近六十岁的我，却直到今天，还抱定了无我爱的信念和思想。所以，我們中間的距离是很大的。可是，我們也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无我爱’的人道爱。”这只是在伊藤看来如此而已。对于同一件事情，各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对于我的种种批評(一)

在一些人对于我的种种批評之中，最叫人生气的，就是杉山平助的批評。如果不看到他的文章，我大概也不至于翻出那些旧记录，这样嚙嚙苏苏地写下无我爱运动那一时期的事情。事实已經說清楚了。这里我还要把杉山的批評稍为研究一下。

像前面所引的那样，他对于无我爱运动时期的事情是这样說的：

“那种(无我苑的)生活，果真是无我的么？对于世人果真有好处么？沒有听说河上肇为这些問題而烦恼，只听说——而且他自己也曾这样说——他曾因自己晚上需要睡觉、把为邻人服务的時間耗費在自己的休息上而感到烦恼，认为这是一种利己的行为，烦恼得晚上觉也睡不着。”

前面已經指出，这完全是曲解事实。我所以关心睡觉問題，是由于我在这个問題上沒有想通：睡觉究竟是不是无我。杉山說我当时沒有为无我苑的生活是否真正无我这一問題而烦恼，却为睡觉問題而烦恼，用这类話来責备我，这完全与事实不符。

說我当时烦恼得晚上觉也睡不着，这也不是事实。說我不关心无我苑的生活是否真的对世人有好处，也不是事实。根据我的

旧记录，我在1906年5月27日登在《讀卖新聞》上的《万水楼独語》里，对无我爱宗作了最后的清算，“把它斥为天下的邪說”。可惜那篇旧文章沒有保存在手边，想必其中对于无我苑里的生活是否真正无我、对于世人是否真的有好处这些問題，我都作了总清算。既經参加了无我苑，在报纸上用“无我爱同人的一个速記員”的名义宣传了所謂无我爱的真理，那末我是一定会感到自己的責任的；所以尽管面子上不大好看，如果我的看法变了，我是一定会对大家如实坦白的。

杉山又这样說：

“尽管他得出了那苦行头陀式的結論——‘忽然觉得脚下乾坤下沉千里……当下体会到了无所謂利己、利他的至上妙境’，可是我們却不禁要大叫一声‘这干我們屁事’，而退避三舍。……他自己說他体会了什么妙境，可是据伊藤証信說，他甚至把这种生活斥为邪道，所以不妨說，他那同人家一会儿是同志、忽然又鬧散伙的行径，在这里已經露头了。总之，无我苑的生活，終于就此莫名其妙、糊里糊涂地告一段落，他又重新回到紅尘俗世，当了大学教授，作为一个报刊文章的作者而出現在我們面前。”

杉山对我年輕时候的宗教体验加以如此不負責任的謾罵，我是十分感到不愉快的，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深信我一生的生活方針，是这个宗教体验給奠定的基础，而且尽管当时我为了获得这个体验作出了种种牺牲，东摸西撞地走了許多弯路，我却从来也沒有后悔过。

伊藤的无我苑生活，和我在参加无我苑前的一天晚上所忽然得到的宗教体验，完全是两回事。还有，伊藤所鼓吹的无我爱的真理，和我由于那次特殊宗教体验的結果而获得的自以为心安理得的宗教真理，也完全是两回事。只是由于在我的情况下，这些事情

偶然互相交錯在一起了，所以別人就很難理解。但是，我却不是像杉山所說的那樣，把我同无我苑的關係“莫名其妙、糊里糊塗地告一段落”的。白柳秀湖也同樣說我“出去的時候抬着絕對永遠的大招牌，回來的時候却一聲不響地藏了起來，居然裝得若无其事”；可是我這個人的脾氣，却寧願在玻璃房子里過活，無論是好是壞，都不願隱瞞人家，裝得若无其事。一切我都願意公開。要是這樣還感到莫名其妙的話，那就請少開尊口好了。

也許稍稍有些自稱自贊吧，我在前面曾經說我的本質是對待真實的至柔的心。從柔軟這一點來說，我对伊藤，最初是極其順從的。但是，人若要对真實抱一顆至柔的心，就得对不真實抱一顆始終加以拒絕、加以排斥、加以堅決反抗的剛強勇猛的心。所以，我這人有柔軟的一面，也有剛強的一面；有顯得非常脆弱、順從的一面，也有顯得非常頑強、固執、不近人情、富於斗争心的一面。如果对方被认作是真實的，我就对他非常柔順；如果对方一旦被认作是不真實的，我立刻就对他变得非常剛強。因此，年輕時候我雖然確實曾經被伊藤証信牽着鼻子走过，可是那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过是一定期間內的事。当我认定他所說的是真理的時候，我就把他当作老师；可是一旦认为不是真理的話，馬上就背向着他了。杉山說：“不妨說，他那同人家一會兒是同志、忽然又鬧散伙的行徑，在这里已經露頭了。”其實，說話何必這樣客氣，事實上，的的確確在这里露了頭呀！

这也表现出了我容易相信別人的輕率態度，以及对事物的認識不正確。這的確是我的很大的缺點。不过在另一方面，不管是一個人也罷，一個主義或思想也罷，只要我經過仔細的觀察，对他（或它）有了不可動搖的認識（尽管由于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条件不同，可能經過許多曲折），那末我就会不計較一时的利害得失，一

己的毀譽褒貶，始終一貫地、堅決地加以擁護。

如果單從“一会儿是同志，忽然又鬧散伙”這一點來說，那末我也許的確顯得是個看風使舵、東倒西歪的人物吧。杉山因而還說了以下這樣一段話：

“近來某個報紙上刊登了佐野學和鍋山貞親^①等人在監獄里供認了思想轉變的消息。這大概是謠言吧。但是我們的河上肇即使在監獄里和外界隔絕五、六年之後，變成了一個佛教徒甚至伊斯蘭教徒，我也會因此感到多大奇怪吧。”

杉山說了這種俏皮話，當時社會上的常識家們听了說不定很高興吧。可是後來的事實究竟怎樣呢？事實完全和他所預料的相反。倒是佐野和鍋山，在監獄里看到時局有了變化，一而再、再而三地毫無廉恥地供認了思想轉變，而我——看上去似乎比佐野、鍋山軟弱得多的我呢，儘管在監獄里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誘惑和威脅，却終於沒有因此而改變自己的思想。當時報紙上對於快要刑期屆滿、釋放出獄的我，有着如下的記載：“從被捕入獄直到今天，博士的作為一個讀書人的信仰，絲毫都沒有動搖。他和實踐運動雖則分手了，可是仍然保持着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的良心。……假釋的申請，由於博士的心境離假釋的條件——完全轉變——太遠，所以每一次都白白地被駁回了。可是，釋放的日子終於快到了，據說是6月15日早晨。中野區的博士的家中，他夫人體貼入微地給縫了一條軟軟的被子，心焦地等候着疲累了的博士回家。為信仰而坐牢，結果始終堅持了自己的信仰而獲得釋放的博士的心境，不管他的思想正確不正確，總可以用‘悲壯’兩個字來概括吧。”

不能掌握事物的本質的杉山那樣的人的預言，除非瞎貓碰上

^① 佐野學和鍋山貞親，都曾混入日本共產黨內，成為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人，1929年被捕後，相繼變節投降。——譯者

死耗子而外，是决不会說中的。

但是值得感謝的是，从杉山平助写这种文章的 1933 年算起，几乎三十年以前，也就是在 1906 年，早就有人給我的本质作了鉴定。那并不是什么文章，不过是一封写給我个人的私信。看来当时我收到那封信，心里十分高兴，所以本来什么都容易弄丢失的我，唯独这封信，却把它好好地貼在剪貼簿里，到现在还保留在我身边。信是用英文写的，但署名却是德文 *Kleidung-macher*，意思是裁縫师。写信的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根本沒法知道。下面把譯文写出来。

給《讀卖新聞》投稿人河上肇先生

亲爱的先生：

請你接受一个对你的写作经历感到很大兴趣的人所写的这封信。不管人家对你怎么說，我始終认为你是一个追求精神光明的少有的热情家。固然有些人想从你的观点的不稳定中找寻你的缺点，但是，在我看来，那种可能存在于你感情里的不一致，不仅毫不足以損害你的荣誉和功績，反而倒是隨時准备接受任何可能遇到的真理的你那片誠心的征候。而且我还进一步認識，那种搖摆不定，仅仅是表面现象，因为我不能不指出，在那汹涌澎湃的波涛下面，还有一股永恒的潜流，指向着解决与人生相終始的謎。

你既不像一般科学家那样淺薄，同时又不被“暖房迷信者”的教条主义所束縛、所僵化，因而充分具有給我們弥补时代的迫切需要的資格。如果这样說是对你要求过奢的話，那末至少我相信你走的路是对的，因为那些早就失去了內在生命的像符咒一样的教义，已經不能使我們感到滿足了，如果我們想获得真正的生活的話，面包之外，我們还得有些別的东西。

我这样說，可并不是恭維你。即使我能恭維你，我也不願意那样做；不仅如此，你也会觉察到我无意做这种事情。我只想在这里对于你钻研日常生活中的本质的东西的巨大努力，致以微末的頌辞而已。在精神生活的尖銳观察方面，我得到你的益处不小，虽然不能說我和你毫无不同的见解，但大体上我至今还是跟着你走的。但是，这方面的問題，如果再深入下去，对于一个外

国人来说，是不恰当的，我想还是写到这里为止吧。请你原谅我的唐突，打扰了你。希望你能给我另一个机会，让我能更自由地表白自己。

你的真诚的 A. Kleidung-macher, 1906年5月2日于名古屋

1906年5月，正是我在《读卖新闻》上把无我爱宗斥为天下邪說的前后，当时我还不过是二十七岁未滿的年輕小伙子。写作生活还刚刚开始，居然有这样善意地肯定我的好的一面——我的性情的本质——的人，真使我不胜感激。几乎经过了四十年星霜的今天，当我翻译这封旧的英文信的时候，我还深深地有知己之感。

自然，写这封信的人，如果一直注意着我的经历，看到我晚年最后坐了牢，很可能感到失望，认为事情和他所預料的相反。但是，当这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打得热火朝天、地獄的劫火——史无前例的残酷的大规模屠杀、劳动力和物资的疯狂的非生产浪费、人民生活的困苦——烧得正烈的时候，我深信马克思主义会、也唯有这个主义才会确实地给这个地球带来永远的和平，这是科学的真理；而且我至今还深信不疑，觉得我过去为了研究和宣传这个主义而耗費了半生精力，这是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最高的努力。因此我觉得，即使现在见了写这封信的人，我也能問心无愧。

[附記]写这篇文章恰好写到1928年年底的事的时候，一位熟人来信通知我說，他讀文学家夏目漱石的《书簡集》，讀到了下面一封信。现在把它抄录出来。那是作者写给野間真綱的，写信的日期是1906年2月3日。

“謹启者……我过得和平常一样。人們都是用姑息手段过日子的。想到这层，河上肇那种人，实在叫人佩服。沒有他那种决心，称不上是豪杰。有人說他是神經病，如果是神經病的话，正是那个毛病才值得佩服哩。你的忧郁病怎样了？借上一百块钱，去大逛一番窰子試試吧。普通的忧郁病保险全愈。不过放蕩也不能长久；长久放蕩下去，会生放蕩的忧郁病。于是又勤勉

地工作，又生忧郁病，又搞吃喝嫖赌。够了够了。这就叫做姑息手段。一般人都是采取这种办法的。而你连姑息手段都不采用，所以生病了。

“近来访问的人稍稍少了些，真是难得。不过我仍然忙得很。大概一辈子这样了吧。而且一辈子也不得安宁了吧。我的成天忙忙碌碌，也不过是一种姑息手段。总之，已经成了一个大俗物，还急于想成为更大的俗物哩。像这样，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做人应当不管别人说什么，而自己却能安心，有可以自恃的地方，否则什么安心哩、宗教哩、哲学哩、文学哩，都谈不到。顿首。”

也许这是对我的讽刺，不过我内心没有什么惭愧，所以把第一次见到的这封信顺便也抄录在这里。

对于我的种种批评(二)

我在我的写作生活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位知己，而在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活将结束的时候(我是1933年1月被捕的，后来从此不再能在文坛上公开发表文章)，最后又见到一篇评论，同样使我深深地有知己之感。那篇评论的作者究竟是誰，偏巧也不知道。在许许多多评论里面，只有那位作者怀着好意忠实地观察了我的思想的变化和动摇，认为我不一定是像浮萍那样随风东西飘荡。现在我把那篇文章抄在这里，那是登在1933年2月15日发行的《经济学者》杂志上的。

“民法学家末弘严太郎在他的《法窗漫笔》里，曾经谈到学者的思想变迁，他的看法很有意思。

“德国耶林(Rudolf van Jhering)和温特色特(Windscheid)是近世法学界两大权威，前者集自由法学的大成，后者集概念法学——主张‘概念与逻辑构造高于一切’——的大成，可是有趣的是，他们两个都是在五十岁左右发生了思想上的大变化。耶林最

初是概念法学的死硬派，和反对形式法学的温特色特爭論得非常激烈，长时期各不相让。可是到了四十五、六岁的时候，思想开始轉变，后来竟成了自由法学的开山祖。而他的論敌温特色特，当耶林称贊他多年来所主张的自由法学的思想的时候，他却沉潜到形式法学的思想里，最后还著了那部被称做私法学的《聖經》的《羅馬法令全书綱目》。

“末弘把这两大学者的生涯称做是具体地說明思想的辯証发展的最适当的例子。把一种思想作为正題而固定下来，而后由于批判它而产生反題，后来又由于克服这个反題而产生新的命題，并且把它固定下来。愈是伟大的思想家，思想变迁的波长就愈长；最最长的，一生中仅仅只有一个波长。波长的长短，取决于各人的天賦。波长短的人，只有依靠不断的內省批判、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合題而获得进步，除此以外沒有別法。这是真正的思想进步，而不是因批判而获得的固定命題的克服，它和单单出于外部动机的变說改論或‘心境的变化’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这样的思想轉变，尽管表面看上去是变說改論，却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或矛盾。——末弘的意见大致就是这样。

“尽管波长短，只要有波长的思想家，总是伟大的。但是，看看现在日本的思想家，长波也罢，短波也罢，有几个人有波长呢？大多数不是都沒有波长么？話虽似乎泄气，但是仔細一想，其中却也不无緣故。本来，思想的辯証发展，也只有把一定的思想作为正題固定下来之后才能实现。而要固定一种思想，就得下定决心，經過努力；可是，现在日本却不大有这样的人，大多数的所謂思想家，都是些机会主义者和御用思想家，因此也就根本沒有什么思想波长，这是理所必然的事。

“但是，自然也有若干例外。像因共产党員嫌疑而被捕的河上

肇那样，在日本人里，可算得上是个少有的长波长思想的所有者了。关于他的评论，本文的作者曾经写过，社会上也曾有不少人写过，这里就不详细讲。我只想谈谈他费了五十年工夫才起一大变化的思想变迁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在日本现有的和过去的思想家中，像河上肇那样绝无仅有的人，从种种方面来说都是十分有意思的。

“河上肇本来是个一丝不苟的人，笔底勤快，起伏在胸中的思想，酝酿成熟后，要是不把它写出来，就觉得不好过。所以，关于他的思想的变迁、发展过程，还是读读他一生的著作，要比我对他的回忆，能够更正确地加以推测。他这个人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方便的。

“他的著作，到现在大约有五十种。由于生产得太多，有些旧著作，似乎连他自己都忘了，例如翻看一下他的著作目录，关于德国华格纳(Adolph Heinrich Wagner)《经济原论》的译本，那上面说是‘书名不确，1906年(?)前后出版’，口气很靠不住。自己写的东西，普通总得保留一本在书箱里。这是人之常情，可是河上肇却有个怪脾气，就是喜欢把藏书一批一批地卖掉，所以也许因此才手里一本也没有，没有能加以参考吧。

“由卖掉藏书一事联想到了他的写作态度。河上把自己的主张卖掉之后——这样说，听来未免刺耳，反正也就是把自己的主张发表了之后，往往自己又一一加以否定；这在学者中间，也是独特的。比方说，有一次，发生过这样的妙事。他的论敌、经济学家高田保马博士，曾经在利润源泉论上抓住了河上的旧说，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几万字的长文章质问他，想不到河上回答说，‘那种旧说，早就抛弃了’，就此掉头而去，不加理睬，弄得高田扑了一个空，十分下不了台。特别是后来他埋首于马克思学说的解释时，就像非

常时期的国家財政的收入估計那样，一年中間，不知要把他的部分学說变更多少次。河上博士不像别的学者那样，永远捧牢着自己的莫名其妙的百无一用的說素；他那种毫不躊躇地否定自己的态度，是他的值得称道的一个优点。自然，作为一种学說而发表的話，最好是慎重而且不輕易变更的正确学說，但是，如果觉得錯了就馬上加以否定，那种态度是可貴的。河上的理論学說，虽曾有过几次改变，但是用末弘的話來說，那不是由与学問无关的外因所造成，而是由思想的辯証发展所造成，所以尽管一再改变，也毫无妨害。

“和否定自己的学說有联带关系的，是旧著作的絕版，这也是河上經常爱干的事。从二十世紀初年的著作直到 1921 年的《唯物史观研究》，这一段期間的著作，他几乎全都叫书店絕版了。《唯物史观研究》以后的著作，說不定也有几种絕版了。这类事情，固然是无足輕重的小事，但是和自己否定自己学說以及卖掉藏书的脾气联系在一起，也可以看出博士的性情中一脉相通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就附带写了几句。河上的数十年来的論敌、已經死去的福田德三，在他晚年所出版的《經濟学全集》里，把他二十多岁时所翻譯的一本似乎属于神学范围的《灵感說》都收了进去，这和河上肇对照着看一看，就觉得滿有意思。

“說到河上肇的思想变迁，并不像近来有些所謂馬克思主义者那样，一下子就死拉住了馬克思主义。大約四十岁以前，他还专门搞着正統經濟学。1915、1916 年的时候，他还天真得很，当他讀到劳埃德·乔治的胡說八道的《送穷論》的时候，还感动得流眼泪。1917 年的《貧穷故事》和 1918 年的《社会問題管见》，虽則是洛阳紙貴的名著，但是內容也还只是表现出作者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場。

“直到 1919 年《社会問題研究》杂志創刊以后，他才开始露出

馬克思主义者的色彩。不过那一时期他对馬克思主义的见解是很天真的，它的重要部分，后来大半被他本人所否定了。例如，1921年的《唯物史观研究》里，就說唯物史观即使不归入哲学的領域，也可以作为純粹經濟学說而成立，这真是天大的笑話。到1922年的《社会組織和社会革命》，他对于俄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于是改变了历来的单纯钻研馬克思主义經濟理論的态度，开始对馬克思主义政治学有所研究。但是，仍然看不出他对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理解。直到出版了《唯物史观略解》，好容易才进入哲学的領域。經常去听西田几多郎博士的讲义，大概就在那个时期吧。可是，真正埋头钻研唯物論哲学，却是在福本和夫^①批評了他的学說以后。至于他确信唯物論哲学的真理性，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則是五十岁过后，最近四、五年来的事。

“就这样，大体上以五十岁作为分界綫，博士的根本思想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变。所以，他确实是个少有的长波长思想的人。而最后，由于資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他被关进了監獄。他的一生，在种种意义上，都使人深深地感到‘悲壯’。”

在这篇文章发表約一年前，也就是1932年3月，这位作者在同一杂志上，就曾說过同样的話。在那篇文章里，有些地方写得比較詳細，这里不嫌重复，順便再抄下几节。

“拿一个学者的經历來說，很少见到像河上肇那样迂迴曲折、备尝辛苦的，而且今后可能还会是这样吧……”

“《社会問題研究》以后，他的馬克思主义者的色彩逐漸浓厚起来。像熬牛皮糖一样，一点一点浓厚起来，这是河上肇的思想的特点，在日本思想家里面再找不出第二个。在日本，多的是那种暴

^① 福本和夫(1894—?)，笔名北条一雄，他的一套“左”傾机会主义理論被称为福本主义，后被批判。——譯者

发戶思想家，他們看到法西斯主义流行了，馬上就想写本法西斯的书；而像河上肇那样，在看出一个究竟之前，始終不声不响地啃着一种思想慢慢地发生变化的人，却非常少。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学說比較地受到人們的信任，有許許多多人都拥护他。

“1919年以后，河上的馬克思主义者的立場愈来愈明确了。这一点，按照出版的先后，看一看他所发表的著作，就可以看得出来。

“《社会問題研究》，1919年1月出版第一册。先是批評欧文的思想，但是并非贊美欧文的人道主义思想，而是否定它。

“《近世經濟思想史論》，1920年出版。这本书是后来的《資本主义經濟学之史的发展》的萌芽。主要是馬克思經濟学的解說。不过，其中所主张的許多重要論点，后来都由他本人否定了。

“《唯物史观研究》，1921年出版。在这本书里，还完全看不出他对馬克思哲学的基础——唯物辯証法有什么体会，他反而主张唯物史观可以脫离哲学而成为一种純粹的經濟学說。

“《雇佣劳动与資本》以及《工資、价格与利潤》的翻譯，1921年出版。《社会組織和社会革命》，1922年出版。后者是一本論文集，它从馬克思主义經濟学进展到馬克思主义政治学。可是仍然沒有談到馬克思主义哲学。

“《唯物史观略解》，1922年出版。到这时，他才有意思研究馬克思主义哲学。

“《資本主义經濟学之史的发展》，1923年出版。从孟第維尔(Bernard de Mandeville)一直談到納斯欽(John Ruskin)，从資本家的自由的贊美一直談到資本家的自由的否定，他站在辯証法的立場上，論述了資本主义經濟学的发展和灭亡。不过，那个时期他的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还很靠不住。看来他认真地埋头钻研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福本和夫否定河上肇学說以后。

“总而言之，像上面所說的，从河上肇对馬克思主义經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的钻研，我們可以大致看出他的思想变迁的經過。”

《金剛钻》杂志^①的匿名作者，就是这样說的。

本人的回忆談的史料价值

关于我費了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逐漸成长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写作生活的經過——从我二十几岁的年輕时代作为一个极端唯心主义者而开始写作活动的时候起，直到五十岁过后好容易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論者的时候止，中間实在費了整整一輩子才完成的我的思想变迁的經過——那位匿名作者这样善意地仔細加以考察，真叫我感謝不尽。如果把我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全部拿出来，再把大約二十年間我在京都帝国大学每年的讲稿完全收集起来，根据它們来考察我过去的思想变化的經過，也許能更正确而詳細地弄清楚其中的迂迴曲折的过程吧。可是这既沒有必要，我本人也不那么感觉兴趣。

上面所說的那位匿名作者在对我的評論中，曾两次說过下面这样的話：“因为不能从他本人的嘴里听到有关他的思想变迁的經過，所以只得通过他的著作来加以推測。河上是个笔头勤快的人，脑子里的东西一經酝酿成熟，不写出来他就不好过。所以，根据他历来所发表的著作和文章来作判断，說不定反而要比他本人的記憶可靠。”实际上可能正如他所說的那樣。特別是我这个人，就如另外一篇回忆里所提到的那樣，記憶力极差，要是沒有什么資料而

^① 前面說“在同一杂志上”，那末杂志的名称就不該是《金剛钻》而應該是《經济学者》，在下文中，也一会儿說是《金剛钻》，一会儿說是《經济学者》，这大概是出于著者記憶不清。——譯者

让我单凭记忆写回忆，说不定会弄出大笑话来。

通常人们总认为，本人谈本人的事情，最为可靠，其实不一定如此；尤其是本人谈本人的功绩，往往有意无意地编造些谎话进去，所以作为史料，有时反而最不可靠。

我的大舅子，几乎做了一辈子的文部省维新史料编纂局的史官，所以根据长时期的实际接触，对于该局多年来的总裁金子坚太郎的为人，知道得很清楚。作为明治维新的功臣之一，死后还受到大勋位的爵位赏赐的这位先生，似乎是个十分卑鄙庸俗的角色。侥幸的是他比他的同时代的人活得特别长久，因而到了他的晚年，无论他怎样吹嘘自己的功绩，也没有一个人能证明他是吹牛。他就利用了这点，肆无忌惮地丑表功，把人家的功劳据为己有。他在去世前不久被封为伯爵，临死时又受到大勋位的爵位，这全是他那极端执拗的丑表功的结果；而他为了这样的目的，晚年全然不顾脸面地攘夺别人的功劳。他那大部的怀古谈虽则留传了下来，然而作为史料看，那自然是很不可靠的。

想起一件同类的事情，顺便再带上一笔。

1939年9月4日（英、法对德宣战的第二天），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用“空袭下的蝴蝶夫人，曾经准备牺牲在舞台上的歌唱家三浦环女史的谈话”的大标题，登载了这样一段东西：

“英国对德宣战的当天晚上，二十五年前在齐伯林飞船空袭下的伦敦的亚尔伯特大会堂里从容不迫地歌唱过《蝴蝶夫人》的三浦环女史，在麹町区四番町她自己的家中，谈了当时的生动的回忆。——我们到柏林的时候，英国还没有宣战。那时德国非常信任日本，可是过了大约一个月以后，英国对德宣战了，这时日本大使馆通知我们说：‘日本也要对德宣战，赶快逃到伦敦去吧！’于是我们就到伦敦去了（当时大使馆方面也极秘密地收拾了行李）。那时柏

林的日本人大約有百把人，女子中間，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柏林的。到伦敦一看，那里晚上电灯全部熄灭，成了一个黑暗世界，乱得一塌糊涂。本来預定在柏林演出的紅十字会音乐会，决定改在伦敦亚尔伯特大会堂里举行。正当唱着《蝴蝶夫人》的时候，响起了轰隆轰隆的高射炮和炸弹的爆炸声，当时我也吓了一跳，至于乐队，全都逃到地下室里去了。可是我想，在歌唱中死去，原是我的夙願，所以尽管沒有乐队伴奏，尽管听众逃跑，我仍然繼續唱下去。唱完走到窗口去一看，远处的天空中，結束了它的轰炸的齐伯林飞船閃爍着金剛钻般的光芒，正在回航哩。英国軍隊所发射的高射炮弹，就像焰火那样爆裂着。那天夜里，有一个炸弹落在亚尔伯特大会堂的附近，引起了火灾，市民烧死了不少。从此以后，每到夜里十一点钟，齐伯林飞船就出现，最后，市民也就比較沉着了，很有秩序地躲避到地下室或防空洞里去。……”

俗話所說的“睜着眼睛說瞎話”，大概就是指的这个。像这样的弥天大謊，我实在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在讀到那段东西以后，我曾在筆記簿里写了一点感想，现在也把它抄在下面。

“我恰好是和这段談話的主人在同一时期从柏林逃到伦敦的，那时看到日本的报纸上登出‘以三浦环为首的几十个日本留学生平安抵达伦敦’的电报，还觉得有些气愤。可是，不久（也許看到日本报纸上的电报一事在后）就在伦敦的报纸上看到一篇广告，說是伦敦首屈一指的著名音乐堂亚尔伯特大会堂里将举行为紅十字会募捐的音乐大会，早就輟演而为一般听众所不容易听到的著名声乐家某某，在这一天也将破例登台演出。我虽然不懂音乐，但是因为看到广告上說三浦环也是当天演出者之一，就和住在隔壁宿舍的竹田省一道到亚尔伯特大会堂去了。等我們赶到那里，已經客滿，費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买到了两张最便宜的門票——我最不

会打这种交道，所以一切都听凭竹田去办理，我只站在一边等着，交道是怎样打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好容易进了会场。我们的座位，已记不起是在三层楼上还是在四层楼上了，总之是在最上面的一层；座位已经完全坐满，没有一只空的，捞不到座位的听众，都站在后面，挤得水泄不通，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站在我们前面的听众的背影。想必是设在大会堂的池座里的舞台，任凭你怎样踮起了脚尖看，还是看不到一点影儿。特地跑了来，在这样的情景下，三浦环什么时候出台，到最后恐怕也不知道吧。——我和竹田正在人背后这样窃窃私语，这时出乎意料地传来了清彻的用日本话唱的歌声——‘樱花烂漫的艳阳天呀’。那时我真是高兴得几乎掉眼泪。不，事实上我眼睛里已经含着一泡泪水了。本来当时我就十分怀念祖国日本（当时我曾写过一首短歌：‘站在伦敦的繁华的街道上，怀念着猫头鹰啼叫的故乡’），觉得我在欧洲的大国游历，到东到西脸上总不那么光彩，总觉得祖国日本的文化程度差得很远，经济上也非常落后。而现在，那样年纪轻轻的一个日本姑娘，居然站立在大英帝国的首都的中心、几万名听众的前面，清彻地唱出祖国日本的歌，所以当那歌声传到我的听神经的一刹那，我高兴得几乎掉眼泪，这也可能是大家所能理解的吧。这样看来，把我包括在‘以三浦环为首的几十个日本留学生’之中，也只好委屈一下了——我这样想着，从人群背后向看都看不到的舞台上的三浦环表示了坦率的感激。

“唱完了日本歌，接着就唱《蝴蝶夫人》。对于这个歌剧，不用说，全部听众都更热烈地拍手欢迎了，看来的确是非常成功的。

“我和竹田两人这时已经感到十分满意，没有听后面的演员的节目，就回到住的地方了。

“当时的情形，虽则已经过了二十五年，至今还鲜明地印在自

己的脑子里。

“可是，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三浦环本人谈到当年的那件事情，是怎样地胡说八道呀。我真奇怪，一个人怎么能那样厚着脸皮说出弥天大谎，而居然从容自若。俗话说，‘撒谎也得有个边儿影儿’，可是这位女士谈到往事，竟连半点边儿影儿也都沒有呀。

“她说：‘正当唱着《蝴蝶夫人》的时候，响起了轰隆轰隆的高射炮和炸弹的爆炸声，当时我也吓了一跳，至于乐队，全都逃到地下室里去了’。接着她还说：‘可是我想，在歌唱中死去，原是我的夙愿，所以尽管沒有乐队伴奏，尽管听众逃跑，我仍然继续唱下去。唱完走到窗口去一看，远处的天空中，结束了它的轰炸的齐伯林飞船閃爍着金剛钻般的光芒，正在回航哩。英国军队所发射的高射炮弹，……’

“假如这是讲的我们去亚尔伯特大会堂那天所发生的事，那末我是至今还活着的目击者中间的一个，在这里必须明确地说，像这样的事，那天连影子也沒有。——难道她那番话，说的是我們完全不知道的另外一天的事么？难道当时在外国还不过是个无名女歌唱家的她，后来碰上了好运气，获得了再一次在伦敦大音乐堂演出的机会么？

“不过她所谈的，还不仅是亚尔伯特大会堂的事。她还说：‘到伦敦一看，那里晚上电灯全都熄灭，成了一个黑暗世界，乱得一塌糊涂。’又说在演出《蝴蝶夫人》以后，‘每天夜里十一点钟，齐伯林飞船就出现，最后，市民也就比较沉着了，很有秩序地躲避到地下室或防空洞里去。’可是这些话也完完全全是谎话。

“我在伦敦呆得相当长久，当时的见闻，都陆陆续续写出寄给《大阪朝日新闻》了（大半收集在《回顾祖国》一书里），可是像三浦环所说的那样的骚动，却一次都没有见到过。只是从报上知道，德国

的齐伯林飞船曾到伦敦郊外扔过几次炸弹，稍稍造成些破坏；这一点，我在寄给日本报纸的通讯里也说起过。齐伯林飞船，没有打仗时我在柏林倒曾见过，在伦敦却一次也没有看见过。‘轰隆轰隆的高射炮和炸弹的爆炸声’，在那时的伦敦，我一次也没有听到过。

“誰都知道，一般說来，空军的发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上次的世界大战，整个作战时期，德国空军扔在英国领土上的炸弹，总共不过二百八十吨，炸死的人总共不过一千四百一十三名。拿这个数字来和下面的数字比较一下吧。1940年9月里德国空军轰炸英国本土以及今年（1943年）2月里反轴心国家的空军轰炸德国时所扔下的炸弹，仅仅一个月工夫，就在一万吨以上。又如今年8月12日那天的夜里，仅仅一夜工夫，反轴心国家的空军就在意大利的米兰(Milano)和都灵(Torino)两处地方每处扔下一千吨炸弹。至于死伤人数，最近英国空军轰炸德国汉堡，仅仅一星期工夫，炸死的人就在两万以上，受伤的比这个数目还多出几倍。再拿它来和1923年我国的关东大地震比较一下看吧。我国关东大地震时，一府八县的死亡人数在九万名以上，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炸弹炸死的人数，还不到关东大地震的死亡人数的几十分之一。二十五年以前，像今天人们所惧怕的那样的空袭的危险，是几乎做梦也想不到的。我到伦敦的那天，夜间灯火辉煌的样子，和一年前所看到的情况，没有丝毫两样。在我呆在伦敦的时期，灯火管制之类的花样，一次也未曾有过；我住的屋子，也从来没有在窗上遮上黑布。所以，市民‘很有秩序地躲避到地下室或防空洞里去’的光景，不幸得很，连做梦都没有梦见过。据说三浦环到伦敦时，市内已经成了黑暗世界，奇怪的是我同样呆在伦敦，而且呆得那么久，她所说的那种黑暗的道路，却在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见到过。

“听到老太太說老話而挑她的碴儿，虽然未免有些孩子气，不过因为我生平最恨人家胡說八道，所以終于还是写了这些話。”

上面这几段东西是我四年前，——并不打算发表——独自气愤着而写下的随笔。靠唱歌混飯吃的歌手即使作为別論，可是連被称为明治功臣之一的大勳位伯爵金子坚太郎，都毫不害臊地在他自己的丑表功里夹杂着类似上面那样的胡說八道，由此看来，一般所謂本人的回忆談，往往很有随意編造的可能，听的人应当小心提防才是。

我这个《回忆談》，至少到我死去为止，除了一两个亲人而外，不会給別人看到，所以，其中可能也大有自說自話的丑表功的地方。不过，手边总算还留得有一些客观的材料，只要根据这些材料来写，那末我写出来的回忆，大概不致于是十分虛造的。再說，那位《金剛钻》杂志的匿名作者已經給我画出了一个大致的輪廓，而且把我說得太好了，所以尽管下面我自己再加油加醋，也許不致于让人家觉得太自美吧。

我的愚鈍

算起来，我最初翻譯塞利格曼^①那本討論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著作《历史的經濟的說明》，把它改題作《新史观》出版，是1905年、我虛岁二十七岁那年的事。后来好容易对唯物史观获得正确的理解时，我的年紀已經五十出头了，所以这中間几乎耗費了二十多年工夫，也就是整个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壮年时代。我的天

^① 塞利格曼(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 1861—1939)是美国經濟学家，《社会科学大辞典》的主編，著作有《租稅轉嫁論》、《历史的經濟的說明》等。——譯者

資，真可算是愚鈍了。就这一点而論，杉山平助批評我是“极愚鈍、极平凡的”、“永远只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忙个不了”的人，因而“半点天才也沒有”，我只有——俯首称是而已。

無論在中学校里、高等学校里或大学里，我从来沒有考上第一名。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时代，成績优秀的毕业生，可以得到天皇賞賜的銀表，而我却离那种光荣的名次很远，仅仅占居第六、第七名而已。还有，那些将来当大学教授的，原則上一毕业就留在大学里，馬上当副教授，不久就当教授，而那些人就只限于得銀表的一流人。例如和我同一期毕业的、在民法上自成一家的石阪晋四郎（不幸很早就病死了）也罢，后来当上京都市市长的市村光惠也罢，还有比我晚一年毕业、后来两次当国务大臣的小川乡太郎也罢，投海自杀的雉本朗造也罢，就都是得过銀表的人。他們一毕业，就让老前輩賞識了，把他們培养在玻璃花房里，一开始就在最好的条件下从事研究工作。至于我呢，大学毕业后，东教点书，西教点书，好容易弄口飯吃，偷空研究些自己所爱好的东西，不久就参加了无我爱运动，随后又当上《讀卖新聞》的記者，結束了記者生活以后，就創辦《日本經濟新志》杂志，杂志办了一个时期，好容易才当上了京都帝国大学的讲师，那时离大学毕业已經六年了。同班的石阪晋四郎，已經留学回国，当了教授，比我低一班的小川乡太郎，不久也快要留学回国当教授了，而我呢，却連副教授都一下子当不上。作为一个学者的經歷來說，这样的发軔方式，对于愚鈍的我，倒是很相称的。

我的长处，在于只要比人家多花些時間，就能比人家钻得更深；至于敏捷，自然完全談不上。不記得是什么时候了，我的小弟弟曾經告訴过我，有一次，我中学里的同学对他說：“你那位令兄，学生宿舍飯厅的醬湯里的菜，从来也捞不上吃。”問他为什么，那人

回答說：“那是因為動作太慢了呀。”一點不錯，我住在山口高等學校學生宿舍裏的時候，很少吃到過醬湯裏的菜。飯廳裏雖則一切都已準備好，可是非到規定的時刻不讓進去，等到號一吹，大家就連奔帶跑地穿過長廊衝向飯廳；在這種時候，我總是跑不快，掉在後面。所以，等到我好容易走進飯廳坐定下來，桌上給幾個人準備的一桶醬湯，早讓先到的人把菜撈光，無論湯裏放的是芋頭也好、蘿卜也好、面筋也好，這一類的固體東西早就一絲不剩，我吃到的總是清湯光水的醬湯。這事離現在快有五十年了，還被人家當作話柄，足見這種特徵在我身上是多麼顯著了。

由此想起了大學舉行畢業典禮那天的事。那次畢業典禮，因為明治天皇親自參加，所以禮堂上只報出畢業生代表和銀表得獎者的姓名，儀式幾乎在鴉雀無聲中舉行，肅靜已極，可是畢業典禮結束後茶點招待室裏那番擁擠喧鬧的光景，相反地達到可怕的程度。許多人鋪開手絹或包袱皮（居然有人為了這個用途而深謀遠慮地有計劃地帶了包袱皮來，真是了不起），像老鷹抓小雞那樣，爭先恐後地把盛在許多大碟子裏的大塊蛋糕一搶而空。當時正當大熱天，而且按照規定，身上又穿着冬天的黑制服，我本想退而求其次，能喝上一杯檸檬水也好，可是等我坐定，連檸檬水也一滴不剩了。沒奈何，只得邀了在動作緩慢這一點上和我屬於同一類型的的朋友吉川泰岳居士（泰岳居士名宗充，早年學禪，具有特殊的風格。那時大家都十分看重的四角帽，他一次也沒有戴過；黃銅鈕釦的學生服，他也不做，上學時永遠穿一身日本服，頭上戴頂鴨舌帽。到了舉行畢業典禮那天，沒辦法，他只得向別人借了制服和四角帽子穿戴上。他在大學法科念了四年書，穿戴制服制帽，就只舉行畢業典禮那一天。我後來一直和他交往，直到他死去）回到宿舍裏，自己掏錢，吃了點心，喝了檸檬水，為自己祝賀畢業。

不爭先的話，醬湯里的菜被撈光了，大盤子里堆得滿滿的蛋糕也一搶而空了，可是唯獨真理這樣東西，無論我怎樣跑得慢，却永遠那樣豐富地等待着我，儘管有人先着手，也絲毫不見耗損。我不像別人那樣，搶到手就一口吞下去，為了咀嚼它，得費很長的時間，不過真理的妙味却非但不因此而略有減少，慢條斯理的我，似乎反而比那些快手快腳的人更能嘗到其中的真味。

我還在大學讀書的時代，田島錦治的那本《最近經濟論》出版了，當時獲得了稱譽，在學生中間流布得很廣。那本書的附錄里，介紹了馬克思學說的大綱。介紹馬克思學說的東西，在日本這也許是最早的一本吧。可是田島本人，老早就放棄了馬克思，等到我在京都帝國大學教書的時候，這位老前輩同事，經常拼命地攻擊馬克思。還有，我大學畢業不久的時候，剛從外國留學回來的福田德三，以風靡一世之勢而登上論壇，聳動了我們的耳目。他也很早就從事研究馬克思的學說，目前通用的例如“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一類的譯語，似乎就都是他首創的；可是他也沒有怎樣深入鑽研，當我一点点開始宣傳馬克思學說的時候，他已經成了反馬克思主義者的領袖，常常成為我的論敵。

比起這些老前輩來，我的走近馬克思的傑作《資本論》的門戶，要晚得多。不過，倖幸的是，“越讀越深不見底”的這部偉大的著作，不像學生宿舍飯廳里的醬湯那樣簡單，只要跑得快就可以把里面的東西全都撈光。這部傑作，“對於研究和理解我們周圍的現實來說，永遠是深不見底的泉水一樣的取之不尽的知識寶庫。”最初埋頭於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我，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怎麼也不能感到滿意，直到很久以後，才畏畏縮縮地接近《資本論》。在同時代的經濟學者中間，最後一個窺見《資本論》的門戶的，說不定就是我。

翻看一下我在1905年出版的《經濟學原論》上卷的目次，第一

章是“經濟上的欲望”，第二章是“財物”，第三章是“經濟行為”，第四章是“經濟”，第五章是“經濟學”。这里面，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影子都找不出。

等到后来在京都帝国大学教书的时候，情形还是一样，1911年翻譯了荷兰皮尔逊(N. G. Pierson)的《價值論》，节譯了美国費特(F. A. Fetter)的《物財的價值》，1912年节譯了美国費希尔(I. Fisher)的《資本和利息率》，不用說，这些都是属于資產階級經濟學范畴的。1913年用《經濟原論》这本书所发表的價值論，也属于同一范畴，那是我向来所学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價值論的所謂集大成(捧我的赤城和彦，在《河上肇和近卫文麿》这篇文章里，把这本书称作“讀起来实在是兴味无穷的一本书”，我觉得也許并不像他說的那樣好)，在这本书里，也絕對找不出馬克思經濟學的影响。

1915年春天，我从外国留学回来，开始当了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正式主持一門課程的講座，但是我从一开始做研究工作就最感兴趣的經濟原論，早已让前輩教授田島博士担任了去，所以我只能担任經濟學史的講座(在当上教授以前，我教的东西完全要看学校的情况而定，曾让我教过經濟史、貨幣論、交通政策甚至政治学等等課程，这次回国以后，总算派定我担任經濟學史)。1916年以后，每星期又让我教两小时选修科目的分配論(經濟原論的一部分)。不过，翻看一下当时的讲稿，内中所介紹的尽是奥国庞巴維克(Böhm van Bawerk)、美国陶西格(F. W. Taussig)、克拉克(J. B. Clark)、卡弗(T. N. Carver)、費希尔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學說，几乎一点都沒提到馬克思的學說。后来不知过了多少年，我才和田島博士輪流着教經濟原論。那就是說，如果田島博士今年教經濟原論，我就教經濟學史，第二年我教經濟原論，田島博士就教經濟學史，換句話說，我已經挤进前輩教授所占領的講座了，虽則是

隔一年教一次，但总算能担任起經濟原論这門功課，因而爭取到了教书和研究工作的一致。我之所以能够热心钻研《資本論》，恐怕还是叨这个光吧。（記得初做教授时，除了經濟学史以外，我还得担任一門經濟史，而到了这时，本庄荣治郎当了經濟史的专任教授，我就不再用再教那門功課了。）

我本来一向要在准备讲义上費去很多時間，到了这时，才好容易有可能对《資本論》下些功夫；不过当然，我的讲义的內容，并不是从資產階級經濟學一跳就跳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以動作緩慢為特征的我，那種變化，實在是十分緩慢的。試查看一下 1923 年到 1924 年的經濟原論的讲义大綱（就像下文所說的那樣，尽管 1923 年是我寫“來不及拂去衣服上的征塵，又要開始新的旅行了”這首短歌的年份，是抱定決心為了徹底弄通馬克思主義而實行生命攸關的飛躍的那年），序論仍然是“什麼是經濟學”、“什麼是財富”這兩節組成的（換句話說，1905 年出版的《經濟學原論》第一篇序論的面目，還原封不動地保留着）；再看一看本論，第一篇是“生產論”，第二篇是“交換論”，第三篇是“分配論”，這和一般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篇名取得完全相同；再看第一篇，是由第一章“生產和勞動”、第二章“勞動的社會化”、第三章“生產手段”、第四章“再生產”、第五章“生產力 and 社會組織”等五章組成，雖則到處表現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相當大的影響，可是在根本構造上，却是和《資本論》里的研究方法、敘述方式完全不相干的。篇名和內容大体上變成《資本論》的解說的样子，還是從第二年的講稿開始的。至於認識到非徹頭徹尾用馬克思的敘述改弦更張不可，因而下定決心把講稿從篇名到內容（除了像財政資本那樣的在馬克思死後產生的東西而外）完全寫成《資本論》的解說（當時大學內外正掀起排斥馬克思的高潮，要不是真正有所認識，我也決不會那樣做），則是又過

了一年，即 1927 年 9 月到 1928 年 3 月的事（那份讲稿，后来用《经济学大綱》的名称，作为改造社的《经济学全集》第一卷出版）。

不过，恰巧就在讲完这门课程的第二个月，我就不得不离开大学了；这也就是说，我的经济原論的讲义，从当时一般大学里所通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每年有所改变，最后写成了任何大学里都找不出的彻头彻尾的《資本論》解說（1943 年的今天，图书馆里都找不到一部《資本論》，学生们甚至连这部书的影子都见不到一眼，回想当时，簡直好像做梦），再往后已不能有所改变——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我离开大学的讲坛了。

1928 年离开大学后，到 1932 年，完成了着手已久的解說《資本論》第一卷全部的《資本論入門》，由改造社出版。可是，在我所写的书里，銷数从来没有像这本书这样少的。而且这本书竟成了我生前最后的一部著作。

去年冬天，我的朋友瀧川幸辰要我给他所收藏的《資本論入門》題几个字，下面的一段文章，就是写在那本书后面的，可以作为前面所說的話的注脚。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出版的著作的数目已經超过我的岁数，不过其中大半不能使我感到滿意，出版不久就把它們絕版，心安理得地自信可以永远供人們閱讀的著作，一本都沒有。唯独这本《資本論入門》，我相信它的寿命也許可以稍稍长些，暫時可以对社会有些益处，哪里知道在我的著作里，偏偏这部书的寿命最短。

“当我拿到装訂好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經潛入地下，变成連太阳光都不得不躲避的人了。那时正当無論对于我个人來說，还是对于日本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实践运动來說，都是最后一次的彻底大鎮压的前夜。仅仅試印了几百部（說不定只印了十几部）的这本书，当下就被禁止发行。流传在外面的册数，恐怕极少吧。后

来出了重排本，凡是受到当局警告的地方，都开了天窗，不过已经晚了，不久一切左翼书刊，甚至连粉红色的东西，都受到了彻底的查禁，就连旧书店里也都无影无踪了，因此，重排本也没有发行多少就完蛋了。

“假如这本书能早十年或至少早五年出版的话，著者的心愿，或者也能了得几分吧。可惜的是，著者可说花了半生心血写成的这本书，竟遭到了这样一个悲惨的命运。

“1942年冬，瀧川兄约我到他家晚餐，无意中在他书库里看到这本书的初版，感慨无量，于是应命在卷末写上这几句话。”

大学里的讲稿好容易成个样儿的时候，我就被大学撵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好容易成个样儿的时候，我所写的东西已经不再能在社会上公开流传：这看来似乎是偶然现象，其实却决不是出于偶然。像我这样愚钝的人，假如不经受阶级斗争激烈的浪潮的冲击，是决不可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解的，等到阶级斗争的巨浪汹涌奔腾，震撼着统治阶级的生存基础的时候，统治阶级就连一分钟也不能容许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解的宣传流布了。日本共产党是在1927年年底到1928年1月选举众议员的时候才第一次在日本大众面前公开露面的。结果在1928年3月15日，突然发生了所谓三·一五事件——（全国几百名共产党员及与共产党有关嫌疑者的同时被捕），余波所及，我不久就被迫脱离京都帝国大学，同时，至少在经济学的领域内，大学里永远不再容许有研究和发表的自由。那是日本学术界、思想界划时期的一大转变，从此以后，当局的镇压加速度地加强了，不到三、四年工夫，一切左翼书刊都绝迹了。

要是永远呆在能够随便说话、随便写作的太平环境里，像我这样愚钝的人，是决不可能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所

以当我好容易树立起自信心的时候，随即不能在大学里讲课，不能发表著作，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资本论》第一卷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著作，可是，天分低的我，1879年出世，却非到1930年前后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当《经济学大纲》出版的时候，我曾把上面所说的我的思想变化过程扼要地述说如下：

“总之，我最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多年来寻求安身立命的真理，一步一步地靠攏马克思，到了最后，终于转化为和最初的出发点正相反的东西。为了完成这样的转化，我在京都帝国大学费了二十年的岁月。这件事虽则不外乎证明我的愚钝，却也足以驳倒一部分人指摘我现在的立场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的无批判的盲从的说法吧。回头看一下我的彻底转向马克思学说，乃是长期采取几乎值得唾弃的躊躇折衷态度以后，方才实现的。不过，正由于我经历了长期的研究思索才好容易达到今天这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今天即使把我抛进火里去烧炙，我在学问上的信仰也是决不会动摇的。”

坐牢坐了连头带尾五个年头，年纪快六十岁，总算恢复了自由，幸而从前所说的几句大话，没有说错。这是我聊以自傲的地方，以后我还要谈到。

1924年前后开始从研究经济学进而研究哲学

我的作风不像飞驰在旷野里的骏马，而像一只鼯鼠，守定一个地方，孜孜兀兀地掘土，永远往下挖掘，所以我的学问的范围自然狭窄。不知究竟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大学时代念了经济学，后来又以愚钝的资质在大学里教书，因而战战兢兢，一心埋头钻研经济

学,对于经济学以外的各种学问,没有一点工夫去涉猎。现在想起来,这就是始终妨碍我真正理解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因。

上面已经提到过,早在1905年,我就翻译了塞利格曼的《历史的经济的说明》。这本书也许是日本出版的第一部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书。从原书的书名也可以看出,这本书把唯物史观同它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割裂开来,把它歪曲成了一种经济学说。辩证法这个术语,书里自然也出现,不过被我错译成一个什么奇怪的名称了(书不在手边,究竟译成了什么,不能确定)。记得把黑格尔的法律哲学当作毕业论文题目的吉野作造,曾来信提醒我。这倒不能怪我特别无知,吉野倒是特殊的,因为那时的法学士,一般地对于哲学可说一窍不通。近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把日本文化说成十分了不起的人,多起来了,可是我却相信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实在非常贫乏,决不值得自称自赞。(顺便提一下,吉野当时曾在《国家学会杂志》上郑重地介绍了我所译的《历史的经济的说明》,而对于我错译了辩证法这个术语,却仅仅用个人名义写信提醒我。当时我觉得他的这种举动非常厚道,到现在还没有忘怀。)

因塞利格曼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的史观的我,后来在长时期中,通过经济学这个狭窄的管子,来观察这个史观,而且指手划脚地写了许许多多文章,那些东西真所谓是管中窥豹而已。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基础上树立了唯物史观,把这独特的史观作为指南,而研究经济现象;而我呢,相反地最初就局限于经济学的领域里,只是在这个领域里转来转去,这真符合了一句老话:“如野人在先王庙外,博量盭盭之美,百官之富,不齟齬者几希。”当初所写的那些东西,现在觉得完全见不得人,这也是必然的事。

《經濟學者》的匿名作者批評我 1921 年出版的那本《唯物史觀》說：“在這本書里，還完全看不出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唯物辯證法有什麼體會，他反而主張唯物史觀可以脫離哲學而成為一種純粹的經濟學說。”又批評我 1923 年出版的那本《資本主義經濟學之史的發展》說：“那個時期他的馬克思哲學，似乎還很靠不住。至於認真地埋頭鑽研馬克思哲學，似乎是在福本和夫否定了河上肇學說以後。”這些批評，幾乎都是正確的（說得更正確些，我的“認真地埋頭鑽研馬克思哲學，是在福本和夫否定河上肇學說”不久以前）。

關於這事，四年前寫下的一篇《關於開始新的旅行這首短歌》的備忘錄，想不到可以充作注解。現在姑且把它抄在下面。

*

*

*

今年（1939 年）6 月，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舉行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的時候，展覽會上陳列了從前的教授們的書畫，其中有我所寫的一個冊頁，上面寫的是這樣一首短歌：

來不及拂去衣服上的征塵，又要開始新的旅行了。

據說這是谷口教授拿出來展覽的。我本來想，那大概是 1928 年剛脫離大學不久所寫的，但是怎樣也想不起那個時期曾經寫短歌送人；那末奇怪，這首短歌又怎樣會落入谷口手里呢？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頭緒，終於寫了一封信給谷口，問他當時的情況記不記得，今天接到回信，信上這樣說：

“那首短歌是 1924 年 6 月，您因病辭去才做了兩三個月經濟學部部長、到和歌浦望海樓去轉地療養的時候所寫的。雖說要轉地療養，其實當時您的貴恙已經大致全愈，我那時還是和歌山高等商業學校的學生，每天到望海樓去打攪您。您當時每天研了墨，

写字作画，那首短歌就是其中的一幅。”

接到这信，起初还觉得奇怪，不过馬上也就想起了其中的情节，不禁独自发起笑来。回头看一看，1928年那一年，是我脱离大学、快要从书斋走上街头的年头，所以在我的一生中，是划时代的一年，把那一年看做出門去作“新的旅行”的一年，也未始不可。但是，这只是外表上的看法，假如从我的内心活动的历史来说，那时不过是继续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历来的旅行而已。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1928年并不能算是我出发去作什么新的旅行的一年。

从我的内心活动的历史来说，我出发去作“新的旅行”，倒是在1924年。

1923年的秋天，我把多年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集結起来，出版了一本相当厚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这本书出版后十个月，1924年7月1日发行的《改造》杂志上，出现了櫛田民藏的长篇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还是黑暗——关于河上博士所著〈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的一点感想》，对我作了严峻的批判。批判的要点是：河上虽则标榜马克思主义，可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来衡量他这部书，却簡直是不行。我读了櫛田这篇论文，觉得有几处虽则是缺乏善意的曲解，可是大体上来说，他说得很对，确实击中了我的要害。我一方面痛感到吃了一次败仗，另一方面决心发奋努力，重新从头搞起，说什么也得掌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真髓。那时这种决心，正是使我后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真能有几分理解的基本动力。

櫛田的论文，前面已经指出，是1924年7月发表在《改造》杂志上的，在文章发表之前，他曾把大致的意思当面对我说过，或是给我写过信，当时我已决心非在学问上重新痛下一番功夫不可了。1924年6月17日我在和歌浦望海楼写给櫛田的信里，就有下面

一段話：

“我已經是四十出頭、快到五十的年紀，近來經常受到該努力而能努力的時代即將過去的意識的襲擊。這種意識給我帶來一種安心，至少——這樣說也許是騙人——沒有給我帶來不安。我甚至感到這樣一種安心，覺得能力薄弱的我，已經盡力做了我所能做的事，如果死得值得的話，就這樣猝然死去亦無不可。可是，另一方面，卻又覺得我還有許多學問上的懷疑、研究上的興趣和野心，沒有了結，而且至今一事無成，今後正該好好大干一番。這一個月，就是想着這類事情，安安逸逸地在這海濱消磨過去的。”

前面所說的那首短歌，大概就是這一時期的作品。那年6月28日寫給櫛田的明信片上說：“到今天我在這裡已經住滿一個月，今晨打算離開這裡回京都去。”由此看來，谷口所藏的冊頁，既然是在和歌浦所寫的，那末必然是6月28日以前的東西了。

回京都不久，7月1日寫給櫛田的信上一開頭說：“今天又重新從頭讀了一遍登載在《改造》雜誌上的你的大作。”我現在已經弄不清“重新”這兩個字眼是什麼意思了。究竟是呆在和歌浦的時候看了一遍，回到京都又重新讀第二遍呢，還是回到京都以後看了一遍，那一天又重新讀第二遍呢，我不能斷定；不過，要是在和歌浦已經看過一遍，那末照說6月28日的明信片里應該提起，既然明信片里沒有提起，那末所謂重新讀，大概是回到京都以後讀了兩遍吧。從7月1日那封信的整個語氣看來，這一推測也比較合理。

今天為了這樣一件小事而尋根究底，那是因為我對當時自己沒有見到《改造》雜誌那篇論文以前、單單根據櫛田口頭或書信批判就決心開始“新的旅行”的那種異乎尋常的發憤精神，感到了很大的興趣。回頭看一看，仿佛覺得我當年既有些可憐，又十分勇敢，也許“悲壯”二字恰好能加以形容。

讀了《改造》杂志上櫛田那篇論文以后所写的7月1日那封信里，有下面一些話：

“今天又重新从头讀了一遍登載在《改造》杂志上的你的大作。我感到，直到现在，我还是从我自己认为所屬的陣营方面，不断受到同往年一样的指責。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社会主义評論》是这样，《貧穷故事》也是这样，今天《資本主义經濟学之史的发展》还是这样。……幸而我还没有僵化。我觉得我还在变化和动摇。根据你的批評，我当尽力有所作为……”

还有，同年9月29日写的一封信里，有下面一段話：

“前些日子承蒙駕临，給我提了种种寶貴的意见，听了觉得获益不浅。我虽則已經漸入老境，可是还想发憤图强，脱胎換骨一番。所以今后看到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請你不要客气，多多见教。你走了以后，我对內人說，今后非下一番苦功不可。也許是怕我弄坏身体吧，她說，上了年紀的人，还是安分守己些吧。又想到自己精力不够，所以打算在学校里的讲义上稍稍馬虎点，抽一些時間出来。最初本来以为是資质差，后来才觉察到还是努力不够，所以今后打算发憤一下，以便打破二十年来的思想桎梏……”

由于“今后打算发憤一下，以便打破二十年来的思想桎梏”的这种心情，就写了“新的旅行”那首短歌。所以，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的那樣一首短歌，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非常值得紀念的。

那个时期，人家也許像鈴木安藏后来在某杂志上所說的那樣，把我当作“是我国馬克思学說研究的最高权威，而且是报刊文章写作方面的最高峰，占有今天任何人都比不上的光輝的社会地位”；可是，这种称誉，完全是虛名而已。当时日本的学术界十分幼稚，像我这样很早就写有关馬克思主义文章的人，在全是瞎子的社会里，就被誤解成为“馬克思学說的权威”了。可是，实际上我对于

馬克思學說，真不過是瞎子窺牆而已。像我這樣的人，要是老被人家當作馬克思學說的權威，就不好辦了。櫛田第一個起來對我進行批判，這是十分必要的。繼櫛田之後，福本和夫又把我大大批評了一場。我手邊的年表上，在櫛田那篇文章發表了大約半年以後的1925年2月的項下，有這樣幾句話：“福本和夫在《馬克思主義》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就唯物史觀駁河上肇的文章，此後福本主義就風靡我國無產階級運動。”面對着福本主義的勃興，我着實有些動搖。福本那篇文章發表以後的第二個月（3月）的4日我給櫛田的信里，就有這樣一段話：“不管怎樣，過去的我，確實還完全停留在資本家的經濟學的領域里。雖想今後重新下一番功夫，却也不無日暮道遠之感。”同年6月5日的信里，又說：“我對內人說，直到今天，簡直什麼都是白干，我連一本像樣的書也沒有寫出來，此後得好好努力，大干一番；內人想到我的健康，非常擔憂。寫出來供你一笑吧。”從這兒封信看來，出發去作“新的旅行”的那種心情，並不是我住在和歌浦時的突然發作，至少是1924年6月到1925年6月這一年中間一直沒有改變的心情。

由於那時這樣的發憤努力，我後來對於馬克思主義总算有了某種程度的真正理解，從而樹立起了把余生獻給這個主義而無所後悔的信心。

有人聽了這話，也許會奇怪為什麼我那樣落后；可是，落后的不獨是我個人，實在是整個日本思想界非常落后。1925年2月手拿《駁河上肇》一文而登場、此後就以福本主義風靡日本無產階級運動的福本和夫，也不過玩弄着“唯物辯證法”、“列寧主義”一類的名詞，戴着鬼面吓唬吓唬小孩子罷了。其實所謂福本主義，今天誰都可以從當時的書刊中看出，是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義。但是，這樣的東西那時却風靡了整個日本，由此也可以證明日本思想界本

身是非常幼稚的。至于真正理解馬克思主义，在日本，不妨說至少是 1926 年以后的事。考虑到这些情况，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历来那样恨鉄不成鋼地幼稚，也就充分可以理解了。

把这許多情况并在一道来考虑，1924 年 6 月我写“开始新的旅行”那样一首短歌，就格外觉得意义深长了。不过，光說上文那一些，別人可能还不会明白“新的旅行”这四个字的意义。我的接触到馬克思学說，說起来很早，例如我翻譯塞利格曼著的那本关于唯物史观的著作，是在 1905 年，也就是写那首短歌的 1924 年的十多年以前。还有，自从 1919 年創辦《社会問題研究》以来，我經常在那个刊物上介紹馬克思学說，而这份《社会問題研究》，到 1924 年也是第六年了。所以，从表面上說，尽管我到 1924 年决心从此发憤努力，也只是繼續原来的旅程，談不到开始什么新的旅行。那末，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完全是新的旅行的开始呢？

这只要看一看 1924 年成为櫛田的批判对象的我那本《資本主义經济学之史的发展》，就可以明白了。这部著作，彻头彻尾是以利己活动的社会效果作为它的主题思想的，这一主题，实在是长时期要求我思索的主题。

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作为思索的主题呢？要詳細說明这一点，很費時間，我在这里不准备找这个麻煩。好在手边保留有在小菅刑务所里开始写的《我的心灵的历史》的断片，其中談到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做的道理，现在姑且把它抄下一些。其中有一节是这样写的：

“我的心窍，最初可以說是《聖經》給开的。所以，我的肉体虽則在 1879 年 10 月就出世了，可是心灵的历史却是二十世紀初年才开始的。（中略。——《回忆》里已經写过，再写就重复，所以这里就省略了。）

“我讀了《聖經》，受到了非常強烈的刺激。這和讀《論語》一類書所感受到的完全不同，任何其他書籍都從來沒有給我這樣強烈的刺激。

“特別是下面一段話，最初讀的時候使我非常感動，直到後來還有力地震動我的心魄：

“‘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

“在我看來，這是絕對非利己主義的命令。對於這種絕對非利己主義，我的良心只有無條件地服從。一點也不去反省為什麼要無條件服從，我的心里只管叫着‘是呀是呀’，覺得只有這種絕對非利己主義的態度，才真正是人类的行動的理想。而我感到我的內心深處有一種強烈的要求，要求自己真正依照這個理想去行動。不過；同時心里又發生這樣的危懼：‘用這樣一種態度去處世，你在這個世界上很不容易活下去，說不定馬上就得死亡。’

“于是我第一次對人生產生了懷疑——懷疑自己的生活究竟應該依照什麼樣的準則才對。由於發現理想和現實中間有距離，我的心里開始感到苦悶。我的心靈的歷史就從這裡開始。”

以這樣幾段話作為開頭，我曾經準備寫出自己的心靈的歷史；可是寫了一點，隨即停止了。到今天還覺得以後的事情相當麻煩，不那麼容易寫下去。（按：直到1943年的今天，我好容易才完成這件工作。）可是，總而言之，我的心靈的歷史有上面所說的那樣一個開端。後來，到1905年，也就是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三年，我之所以參加伊藤証信所提倡的無我愛運動，也是由於我把“無我愛”當成了真正提倡實踐《聖經》上所說的那個絕對非利己主義的東西。不久以後，我雖然拋棄了宗教運動，重新繼續研究經濟學，但是儘管

如此，个人的利己活动的是非，却始终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我思索的主题。1908年，我上京都帝国大学去教书，到了那里，由于学校的情况，所担任的课目一再变更，后来才担任教经济学史，为了准备讲课，每年修改讲稿，最后终于汇集成一本书，那就是1923年秋出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

这本书写的是经济学史，可是，它没有模仿别人的著作，它的体例，尽管没有什么把握，却是著者根据特殊的要求而独出机杼的。它从肯定利己活动的思想写起，以否定利己活动的思想结束。在这本书里，由于著者的特殊要求，花了许多篇幅写了普通经济学史里连名字都不提的、被一般人当作法学家的英国边沁（J. Bentham）（河合荣治郎后来曾经发表过关于边沁的詳細研究，却一个字也没有提起我的著作，记得当时我看到他那篇文章，心里有些不大痛快）。还有，对于普通被人当作文学家的英国喀莱尔（T. C. Carlyle）和纳斯钦，也花去了相当多的篇幅。在这些方面，显然带着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史的特殊面貌，所以尽管内容贫乏，却是我在某个时期里的生产品，使我感到特殊的爱好。

不过，虽然是这种性质的著作，从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写的经济学史的角度来要求的话，自然到处都暴露出很大的缺点。我写这部书，只是毫无保留地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马克思主义，只是把自以为理解了的部分零零碎碎地吸收到书里而已。不用说，用这样的办法去处理，是谈不上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受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櫛田的严峻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说这时我决心开始新的旅行，那就是说从此以后要专心一意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关于利己活动的思索这个二十年来的任务，已经由《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一书大致告一段落，今后必须拿出全副力量来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做到真正理解这个主

义。——这就是那时的决心，所以这正是要“打破二十年来的思想桎梏”，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确实完全是新的旅行的开始。

那时以后，我的学問生活，是逐渐真正理解馬克思主义的过程，从而也是我被馬克思主义逐渐吸收的过程；所以从那时以后，在我的著作里，像过去一些著作里所表现的那种由于个人兴趣或嗜好而造成的个人色彩，已逐渐消失。随着不断努力钻研，我开始从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社会科学的正确的方向，于是专门努力糾正偏离那个正确方向、歪曲它的正确形象的任何偏差；所以，在我后来的著作里，自己的小主观就逐渐消失，利用自己的渺小的个人感情来说服别人的地方就逐渐沒有了。而这样一来，我就开始把我毕生命运寄托给了世界史的命运。后来我之所以能主动地决心去坐牢，就完全是有了这一番学問上的閱历的緣故。

这样一想，1924年6月我在和歌浦口占的那首截句，对于我的一生，倒成为一大标志的紀念塔。

今年8月，应石川兴二的請求，給他把这首短歌写在册頁上的时候，考虑了半天，终于把它改成这样：

站起征尘未拂的身子，出发去作新的旅行。

我本来以为这样比較好些，哪里知道后来石川到东京来順便看我的时候，对我說，像这种有紀念意义的短歌，还是不加改动，更能引起怀旧之情。給他这样一讲，觉得倒也有理，于是答应照原来的样子重写一张寄給他。那首短歌的原句，前面已經抄过一遍，是这样的：

来不及拂去衣服上的征尘，又要开始新的旅行了。

(1939年8月5日脱稿，9月3日修改。)

*

*

*

四年前所写的上面的一段说明，虽则没有什么错误，可是今天读起来，觉得稍稍有些不足。

我给櫛田的信里说：“还想发愤图强，脱胎换骨一番。”又说：“今后打算发愤一下，以便打破二十年来的思想桎梏。”还说：“我对内人说，今后非下一番苦功不可。也许是怕我弄坏身体吧，她说，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安分守己些吧。”又说：“我对内人说，直到今天，简直什么都是白干，我连一本像样的书也没有写出来，可是此后得好好努力，大干一番，内人想到我的健康，非常担忧。”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当时我的确下定了决心，去实行生命攸关的飞跃，一个人兴奋得很。说不定这一时期，在我思想变迁的过程中，正相当于我毕生只有一次的大转变的决定点，换句话说，说不定在我心灵的历史上，那历时五十年之久的、毕生只有一个的大波长的浪头，到这一时期，正到达了上下坡的顶峰、曲线的转折点吧。

前面已经一再讲到，利己活动的绝对否定的真理性问题，是我二十来岁还在大学读书的时代紧紧拉牢着我、叫我忘不掉、扔不开、摔不去的一个人生问题。后来，到参加无我苑时期，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自己觉得心安理得的解决，使我很幸运地掌握到了一个宗教真理，足以把它作为毕生生活方针的准绳。在《大死一番》那篇回忆录中，关于这件事有详细的记述。

我年纪轻轻竟能稍稍体会到这种宗教的真理，这对于我的一生，是很大的幸福。可是，在长时期中，我却一直没有能辩证地理解宗教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的对立和统一。因此，当我重新回头研究经济学、从事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的时候，我就在不知不觉中间，犯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例如把宗教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混淆不分，把心的世界和物的世界混同起来，把形而上学的唯心论导入科学的世界），因而在科学研究方面，常常陷于不可收拾的混乱。

我在上文中說，到《資本主义經濟学之史的发展》出版后、1924年时，“关于利己活动的思索这个二十年来的任务”得以告一段落，那句話的意思，其实就是說在科学的世界里和宗教一刀两段。这就是說，到这时，我毅然决然地同二十来岁时起始終忘不掉、离不开的宗教真理决絕，暂时把它丢在脑后。說得正确些，对当时已經四十六岁的我來說，这是二十年来甚至三十年来的一个脫胎換骨，是生命攸关的飞跃，是破茧化蝶的大变化。

这样說，有种种意思。

在学問研究方面，这意味着过去一味钻在經濟学的圈子里、自以为这样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今后非发愤努力，进而研究哲学不可。我本来沒有一点哲学修养，可是到了年紀将近五十岁的时候，却不得不从头学好哲学，这对于愚鈍的我來說，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大大发愤，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不过，我之所以下定这番决心，却是为了搞通我所专攻的經濟学这样东西。因为，要是想真正理解馬克思主义的經濟学，說什么都必須先理解它的哲学基础——唯物辯証主义；如果不学唯物辯証主义，那就一辈子也不用想真正理解《資本論》这部巨著。正由于这种情况，才促使学問范围狹窄的我，一向竭力避免分散精力的我，立志从头学起哲学来。这对于我來說，无异开始一个完全“新的旅行”。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一个劲儿往深里钻，钻到最后，会往宽广发展。

可是，决心追溯到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以便真正全面地理解馬克思主义，这归根到底也就意味着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而这就不仅是学問研究問題，同时还牵涉到一己的生活态度問題。这对于我來說，决不是小問題。本来，为了貫徹自己的学問上的主张而牺牲大学教授的地位，这在1919年創辦《社

会問題研究》时，就已經做好精神准备，关于这一层，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随笔断片》中也談到了。但是，要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单是牺牲大学教授地位这样一点精神准备，是不够的。为了在學問上前进，必須采取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說不定将来会发生什么变故，然而無論遭到什么意外，也要听其自然，不去考虑一己的得失利害。对我說来，这也意味着开始“新的旅行。”

那时我因为健康关系，第二次轉地疗养，在和歌浦的望海楼住了一个月光景。提起望海楼，到现在还是大臣之类的要人住的高级旅館，还兼营酒楼业务。那个旅館，和前次轉地疗养时住的同一紀州地区的田边市的廉价小旅館不同，房間多，成群的女服务員穿得都很讲究。住在田边的時候，只有一个衣服不整洁的土头土脑的女服务員給送飯，送飯来的时候，把飯放下就走了。而在望海楼这个旅館里，尽管我謝絕，一日三餐，当我吃飯的时候，总有不同的女服务員在旁侍候，直到我吃好为止。初去的时候，因为觉得菜肴味道好，飯也就吃得多，以致让女服务員給盛了一碗又一碗，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可是，呆久了，就觉得菜老是那几样，很少变化，中看不中吃，因而也就厌了。不过旅館方面，也很会察顏观色，有时給做些鸡肉鍋子之类。我爱洗澡，旅館每天給烧浴湯，浴場也很寬敞很漂亮。我所住的一間屋子，是海边高阜上的二楼房間，早晨夜晚，坐在屋子里就可以看到来来往往的漁船。住在田边的時候，沒有誰来看我，可是住在这里，因为我曾經給予和歌山高等商业学校一些帮助，熟人很多，上自校长，下至年輕的教授們，都来玩。关东大地震后带着年輕的爱人迁居京都的津田青枫，当时虽然同我是初交，却带着爱人双双来到望海楼一住就是几天。記得有一次，津田的爱人穿着便服經過走廊去浴場，让高等商业学

校的年輕教授們看見了，就給她來一個下馬評，說她像一個女演員，這句話給上了年紀、見多識廣的女服務員頭兒在旁邊聽到了，就說女演員的手指甲不是那個樣子。上次到田邊去養病時，我帶的是油畫用具，而這次帶的卻是硯台和宣紙，每天研了墨亂塗一陣。津田住在望海樓的那幾天里，我曾在他畫的幾張畫上題過款。其中有一張畫的是菊花，我在上面題了舊作的俳句^①“拼得一死而還活着，這條命是白白拾來的了”，後來女服務員頭兒要，就給了她。想不到過了半年之後，她提了一隻暹羅雞，特地到京都我家里來道謝，還恭維說：“同樣是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先生，I 博士到望海樓投宿的那一夜，半夜裡碰上了便衣偵探的查問，弄得狼狽不堪，您卻真是位忠厚先生”。不知怎的，連她說這些話，我現在都還記得。那個時候，我的版稅收入相當可觀，花錢根本不必耽心，有一次，內人把孩子們都帶來住了一個時候。她討厭擺闊氣，每次出去回來，總是不讓汽車送到旅館門口，而在山腳下下車，徒步走上山坡，以致本來有心脏病的大孩子，累得臉都發了青，為此我還著實耽了一陣心。這到今天，成了傷心的回憶之一。

嚕嚕蘇蘇地寫了這一大堆，總而言之，住在望海樓三十天工夫，表面上我是仿佛過着太平無事的日子。其實呢，在這種太平無事之中，却包藏着一種悲壯的決心，一向不大寫短歌的我，却寫下了那首“開始新的旅行”，回想起來不禁感慨無窮。

就像這樣從 1924 年前後開始了“新的旅行”的我，後來到 1928 年 4 月辭去大學教授的職務的時候，总算對於辯證唯物主義、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一系列的學問體系，做到了大致理解的程度。我在大學里的經濟原論的最後講稿，無論從敘述的次序來

^① 俳句也和短歌一樣，是日本固有的詩歌形式的一種，每首多半由十七個音（字母）組成。——譯者

說，还是从每章的内容來說，都完全成了《資本論》的解說，总算成了个样子，这从学問方面來說，也就是因为直到那时我才好容易逐漸懂得了辯証唯物主义的緣故。

把 1924 年前后作为分水岭，我所写的东西，对于一般讀者來說，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趣了。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我也认为，可能确实是这样。在这以前，即使在《社会問題研究》創刊后，我还在一篇《不变的道德、可变的道德》的文章中，說什么“发而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其用可变，然离其体，人生又何在？”可是，1924 年以后，这样的說法已一扫而光。不妨看一看我发表的一些著作和翻譯：

《資本論略解》，1925 年出版。

《階級斗争的必然性和它的必然轉化》，1926 年出版。

《列宁的辯証法》(翻譯)，1926 年出版。

《人口問題批判》，1927 年出版。

《經濟学批判序說》(翻譯)，1927 年出版。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册至第五分册(翻譯)，岩波文庫版，1927 年出版。

《馬克思主义經濟学》，1928 年出版。

《經濟学大綱》，1928 年出版。

《馬克思主义經濟学的基础理論》，1929 年出版。

《为了馬克思主义》，1930 年出版。

《第二貧穷故事》，1931 年出版。

《資本論》第一卷上册(翻譯)，改造社版，1931 年出版。

《政治經濟学批判》(翻譯)，1931 年出版。

《資本論入門》，改造社版，1932 年出版。

以上这些书，对于一般讀者來說，的确沒有一本是充滿着閑情

逸致，讀來趣味橫生的。《金剛鑽》雜誌的匿名作者說：“他確信唯物論哲學的真理性，從而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則是他五十歲過後，最近四、五年裏的事。”又說：“大體上以五十歲作為分界綫，博士的根本思想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所以，他確實是個少有的長波長思想的人。”他這些話，大體上是說對了。（我生於1879年，到1928年，虛歲正好五十歲。）實際上，我是在五十歲前後，在經濟學的領域里完成了從最初出發點——地道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到它的對立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完全轉化，在哲學的領域里完成了從掩蓋着一層宗教的神秘雲霧的最初出發點——唯心論到它的對立物——徹底唯物論的完全轉化的。

對於我來說，達到這個境界的幾年工夫，在我一生中可以說是痛苦最甚的時代。回想起來，實在感慨無量。在這裡，我將不嫌重複，把當時的情形更詳細地寫下來。

逐步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五十歲 前後所經歷的變化

不錯，說得好聽些，我是屬於少有的長波長思想的一個。但是，另一方面，卻說明我這個人非常不敏感，行動緩慢。

前面曾經提到“在同時代的經濟學者中間，最後一個窺見《資本論》的門戶的，說不定就是我。”原來我這個人的脾氣，不善于東張西望地涉獵各種各樣的學問，而且也討厭這樣做。所以，在研究經濟學的時候，我首先抓住了通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不到認定這種經濟學實在不行時，就不想去接觸《資本論》之類的東西。

在科學的世界里迷失方向的時候，我是徹底地迷到了家的。打個比方來說，這就好比走路，在遇到岔道的时候，要是我覺得右

边那条路是对的，那末我先走右边那条路。一旦上了路，那末无论在路上听到人家说什么，或遇到什么障碍，我也仍然不計較时间的消耗，自管自一步一步地目不旁視地向前走去。这样走着走着，要是碰到了全然沒法通过的断崖絕壁，那时才毅然决然放弃所走的那条路。随后，在找不到別的路的时候，尽管沒有一个同伴，一个人感到十分孤独，我也要走左边那条路。既然走上左边那条路，就絲毫也不再留恋右边那条路；无论人家说什么，无论半路上遇到多大困难，我也仍然专心一意地沿着新的路走去。我开始研究馬克思主义經济学，就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从来沒有认为自己比別人早发见这門学問，也从来沒有讲过这种話。就好比到学生宿舍的食堂去吃飯一样，直到跑得快、去得早的人吃完饭快要离开食堂的时候，我才刚刚坐到席位上。（要是能算作什么长处的话，那末我的一个长处，就是彻底。年輕时候我之所以能掌握到一个宗教真理，也是像发神經病一般彻底闖遍了所想望的道路的結果。今天之所以能在科学领域中掌握馬克思主义，也还是这个求彻底的脾气的緣故。速力虽差，但是前进不已，这是我的一大特征。）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啃《資本論》的，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我最初买到的是英譯本；恩格斯版的德文本，是后来才弄到手的。不折不扣地“韦編三絕”、翻复钻研的，是考茨基版的第一卷，記得书的扉頁上写有买书的年月日。（考茨基版我有好几本。但是用得破烂了的，却只有一本。那本书送給了福井，现在不在手边。还有，我身边一切有关馬克思主义的文献，連同舍不得丢掉的一些东西，1941年奉有关当局之命，全部交了官；现在所留下的一点东西，仅仅是当年寄存在亲戚家里的一小部分而已。）可是，这个考茨基版，是很晚才出版的，所以，我的啃《資本論》，也許比別人要落后好多年。

公爵近卫文麿^①的《清談录》中，有一段京都帝国大学求学时代的回忆，是这样說的：

“当时的河上，已經在研究馬克思，經常对我們說‘必須能讀通馬克思的著作，否則就不行’，却并不极端左傾。到他家里去作客，总是把我領去书斋，围着火鉢，吸着旱烟，心平气和地和我作長時間的談話。

“那时他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斯巴尔戈的《卡尔·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一本是意大利都灵大学教授罗利亚著的《现代社会問題》。关于后者，交給我时候他还說：‘这本书非常有趣，讀了就放不下手，我一夜就把它讀完了。’記得当时我也兴奋地一口气把它讀完了。想来，那时河上也許还在努力学习馬克思主义，和实际运动还没有发生关系。不过嘴里老讲‘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应当經常做好被驅逐出国的精神准备’。在京都的时候，差不多有一年工夫經常到他家里去，后来他被派到欧洲留学去了。临行前，他把他的唯一知己朋友介紹給我，这人就是今天的国会議員瀧正雄。不过，后来瀧正雄的思想漸漸变化，直到今天的地步。但是，1917年瀧正雄第一次竞选的时候，河上还出馬給他做过宣传。后来他們两人的思想距离越来越远，記不起是第几次的竞选了，当瀧正雄去請他支援的时候，干脆被他拒絕了。”

那时的近卫文麿，高高的个儿，日本服穿得端端正正，趿拉着一双皮底草鞋，有时到我的破屋（那是不折不扣的破屋，书斋的牆壁都是七凹八凸的）里来，这个我倒还記得。可是別的一切，全都忘了。送他两本书的事，更加記不起了。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看到对方的社会地位高，影响大，因而热情地和他談天，并且送书給

① 当过首相，成为侵华禍首之一，日本投降后畏罪自杀。——譯者

他的吧。但是，此外我并无野心，所以等他大学毕业之后，一封信都没有同他通过。尽管是这样，1933年当我被捕时，他却如此详细地谈到十五、六年以前的情景，这也許可以说明教员这个职业的特殊的影响力吧。不过，这里要顺便加上一笔，关于当年在财政学的考卷上给近卫打了一百分的小川乡太郎，《清谈录》中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近卫有一次组织内阁的时候，还让小川当了铁道大臣，自然没有把他忘了的道理，可是《清谈录》中，关于我以外的教师，却只说：“此外，由于去京都上学的关系，能够受到西田几多郎以及户田海市的教导，到现在还觉得幸运。”顺便还要加上一笔。我临出国留学时介绍给近卫的瀧正雄，当时口口声声说要把他的一生贡献给社会问题，可是到了后来，却完全把自己的诺言扔到脑后去了。这人在近卫内阁时候，当过法制局长官，接着当了第一任的企划院总裁，现在当上了贵族院議員。我和他已经长久不通音信了。

好了好了，坐定了写起东西来，老年人的回忆，就像抽丝一样，抽来抽去没个完，不知不觉就岔到别的地方去了。现在言归正传。我出国留学，是1913年初冬动身的，所以近卫那段怀旧谈，看上去似乎是讲那个时候的事情（我本来就不怎样重视留学，所以我的留学年限，也比普通短一年，预定两年，后来碰巧遇到欧洲大战爆发，于是再度要求缩短年限，到1915年春天就回国了。那个时候，近卫还没有毕业，自然也会去找我），其实却是1913年到1916年那一段时期里的事情。不过，当时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究竟懂得多少，连我自己都弄不清，等到看到《清谈录》里那段话，才模模糊糊地有些印象。据《清谈录》说，“当时的河上，已经在研究马克思，经常对我们说‘必须能读通马克思的著作，否则就不行’”，“嘴里老讲‘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应当经常做好被驱逐出国的精神准备’”。

这样看来，当时我在谈话中间似乎经常提到马克思。但是，我的真正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应该是后来的事；至于埋头钻研《资本论》，当时恐怕连个影子都没有。所以当时我经常说“必须能读通马克思的著作，否则就不行”，那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即使翻开《资本论》，也啃它不动，才自然而然地发出这种浩叹的声音来的吧。

《金刚钻》的匿名作者说：“直到1919年《社会问题研究》创刊以后，他才开始露出马克思主义者的色彩。不过那一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是很天真的，它的重要部分，后来大半被他本人所否定了。”这话可能还是正确的。1919年1月以来，我之所以办个人杂志《社会主义研究》，原因大概是那时找到了真理的方向，尽管不懂，却决心宣传马克思主义吧。我的开始啃《资本论》，大约也是那个时候。

《社会问题研究》这个刊物，是我的朋友小島祐馬和櫛田民藏背着我先和京都弘文堂书店的老板商量好，然后通知我，要我执笔，匆匆忙忙地从1919年1月开始搞起来的。小島祐馬在1918年12月4日给我的信上（我本来什么东西都爱随手扔掉，可是这封信却似乎为了留作纪念，把它保存了下来），这样写着：

“谨启者，日前奉陪末座，恭聆高见，过了最有意义的一天，十分感谢。在您百忙中，打搅您到深更半夜，不安之至。本来应该马上写信问候，反而先收到您的诚恳的手教，真是不胜惭愧。您说您要把多年钻研的结果，从事启蒙运动；这对社会来说，实在是一件好事。看到您的决心，不由得不想起伊尹所说的那段话：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章句上）

“然而，我们知道：‘明月之珠，夜光之璧，闇夜而投之于途，人

鮮有不按劍相眄者。’正当举国上下都醉心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希望您珍重，逐步逐步地把您的高见发表出来。先此布臆，匆匆不宣。

“还有，关于您所說的前次在本願寺演讲时招到僧徒的反感一事，那天夜里听您讲到，还觉得奇怪。可是后来細細一想，今天的僧徒，特别是本願寺派的大部分僧徒，都是經常阿附于资本家、以获得资本家的庇护而繼續生存为无上光荣的一群寄生虫，为拥护资本家而摩拳擦掌，是很自然的。这类意外的阻碍，以后您可能一再遇到；前途的困难，想来是不免的。”

从这封信上的話看来，我大約把自己准备开始搞启蒙运动的决心，写信对小島說了。也許这就是原因之一，使他为我斡旋创办个人杂志的吧。因此，1919年，对我來說，可以算作是划时期的年份。

这样一来，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算是終于絕了望，打定主意开始钻研馬克思主义经济学了，可是对于《資本論》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却一窍不通，在这样一部和以前所讀的书完全两样的著作面前，那时我是怎样长期地不知所措，簡直沒法形容。

1925年前后几年工夫，馬克思主义的优秀文献在我国大量出版，所以那时开始研究这門学問的人，自己用不到着急，只要把身体浮在水面上，随着潮流，就自然而然能流到正确的方向去，比起我来，真不知道要幸运多少。那时，連中學校也似乎沒有毕业、刚刚参加工人运动的人，都是开口唯物辯証法，閉口唯物辯証法（尽管并不真懂）。可是，我开始学习的时候，却没有前輩可以請教，欧美各国也沒有出版什么优秀的书籍。可以作为《資本論》的初阶的，只有高島素之譯、考茨基著的那本薄薄的不完全的《資本論解說》。所以，长时期間，我只能不折不扣地暗中摸索，写的东西，錯

了就加以否定，也不知道否定了多少次。

要是說我对于当时的思想界做出了什么貢獻，那也許就在于我宣传了馬克思主义这样东西的存在。那时国立大学教授虽然已經相当多，可是像我那样認識到——尽管有許多地方不对头——馬克思主义的真理，决心拥护这个主义的人，在馬克思主义全盛期到来以前，可以說找不出第二个。这期间，我毕竟吹响了喇叭，把青年的注意引到馬克思主义上来了。大学教授这个职业，在賺取人們的信仰上具有有利的条件。再如，当时的大学教授有着民間的社会主义者所不能比拟的言論自由，而我也有意識地利用了这种地位。同时，那时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我的正直。大部分讀者，都相信我不是有意撒謊的人。文章也比一般大学教授写得好，至少是浅近而流暢。这些条件凑在一起，就使得我充分发挥了号召青年聚集到馬克思主义旗帜下来的喇叭手的作用。我所写的东西，虽然錯誤百出，可是仍然起到了指点方向的作用。

我是这样想的。但是，說什么也还是瞎子摸天窗，我簡直是在漆黑的夜路上伸手摸着走。不过，俗話說得好，“瞎子也能上京城”，这样摸索了几年工夫，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到1928、1929年，我也居然走到京城近郊了。

漆黑的夜路上竟然射来一道光明。——1920年1月，日本頒布了世界恢复和平的詔书；而在这以前，1918年1月，俄国制定了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占全世界面积六分之一的俄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也就是跨出了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化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的第一步。这样一件大事，給世界各国带来了十分巨大的精神影响，它的余波，也达到了东海里的孤島日本国的思想界。那些在理論上似乎懂得而对于是

否真能实现却半信半疑、徬徨瞻顾的人，也顿时看到了前途的光明。活生生的事实所给予人们精神上的这种影响，比一百个理论也许都要有力。但是，俄国革命不仅用事实、而且还用理论给全世界带来了莫大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俄国的作品，老早就被介绍到各国；唯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除了俄国以外，却几乎长期被抛在一边而不为大家所知道。尽管很久以前俄国就已经是培养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的沃土，可是这片沃土所产生的作品，在沙皇的反动统治的镇压下，却大部分被当成非法的文献而埋在暗黑的地下。然而，今天俄国革命成功了，与此同时，这些作品顿时都见到了太阳，对全世界公开，而且传播到世界各国。其中对世界各国的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列宁一生的许多著作。在哲学的领域里有唯物辩证法，在政治学的领域里有国家论，在经济学的领域里有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二十世纪以后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等等，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的理论武器，在列宁的著作里，丝毫没有修正的地方，而是适应着马克思死后世界的新形势加以发展，用时代的语言，浅显明快地充分加以说明。通过这些著作，长久以来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歪曲、所隐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列宁主义，就像太阳一样，照耀着全世界。愚蠢无知的农民占大多数而一直被称做“野蛮国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竟然能在那里开出这样鲜艳的花朵，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奇迹。可是，细想一想，其实也不值得惊奇，因为那里有着古老的传统；深远的渊源。当马克思还在世、《资本论》第一卷还没有再版的时候，俄国早就把它翻译出来了。翻看一下1873年1月24日《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马克思说：“《资本论》一个优秀的俄文译本，于1872年春，出版于彼得堡。初版三千册差不多

完了。”^①又說：“《資本論》应用的方法，不常为人理解。这一点，可以由关于本书各种互相矛盾的解释看出来。”^②然后提到一篇发表在彼得堡出版的《欧洲通信》里的专门討論《資本論》方法的論文（1872年5月号），临了說：“这位作者如此正确地描写了我的现实的研究方法，而在考察这个方法在我手上的应用时，又如此好意地描写了它。”^③这真是了不起！說起1872年，这相当于日本明治5年。那比我出世还早七年，那时日本东京横滨之間的火車还刚刚开始通車，太阳历还是第一年被采用，可是那时俄国已經出版了《資本論》的优秀譯本，杂志上已經发表了专门討論《資本論》方法的論文，非常出色地叙述了馬克思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即使在五十年后的昭和初年，我国也还没有做到）。所以俄国这个国家，实在老早就是能使馬克思主义健全发育的沃土。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末全世界最初的馬克思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实现，就决不是偶然的事，而是长年累月革命先觉者在理論和实践方面惨淡經營的結果。有着这样的传统和渊源的俄国馬克思主义的文献，现在汹涌地流入我国，它的影响实在大得惊人。而在我个人看来，打开这种新局面的先驅者，乃是櫛田民藏和福本和夫两位。

櫛田是1920年10月（日本是那年1月頒布世界恢复和平的詔书的）去欧洲留学的，主要是在柏林学习，曾經到过苏联，后来又游历过法、英、美三国，在1922年8月回国。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讀过列宁的著作（他留下来的藏书，可能以“櫛田文庫”的名称全部保存在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里，据我推測，其中列宁的著作一定不多，至少不会有《列宁全集》），也从来不談哲学，說得露骨些，他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頁。——譯者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6—17頁。——譯者

只是把馬克思当作一位学者来尊敬，至于他本人，终于沒有成为彻底的馬克思主义者。不过，他到过世界大战刚結束的德国，还到过苏联，所以我相信，尽管是无意識地和間接地，他还是最早受到俄国革命所造成的汹涌澎湃的思想界新局面的影响的学者之一。

福本留学归国，要比櫛田晚一两年。可是，他却在皮箱里装满了堂而皇之地貼着列宁主义标签的紀念品（固然內容是意外地空虚，而且多半是冒牌貨色），带回国来。虽則只是一場空話，理論不結合实际，可是当时他却到东到西搬弄着唯物辯証法啦、列宁主义啦一类武器，用他那独断的、缺乏邏輯联系的、像咒語一样的独特的文章，把論壇上的人們一个个砍倒，一时风靡了整个日本思想界，成为一个彗星式的人物，所謂福本主义的祖师。

正是这两位批評家促使我开始了“新的旅行”。我在这里也大大地落了后。这就好比人家早已尝到了美味而在議論着的时候，我才穿过长廊，赶进食堂門口。

关于櫛田的河上批判，《櫛田民藏全集》第一卷的編者，写了这样一段話：

“关于收集在这本书里的論文的内容，編者没有什么可說明的。但是，讀者諸君在讀完本书各章时，不难看出，著者的唯物史观研究，几乎始終都是采取着批判河上肇博士的說素的形式。著者这种看来十分别致的方法，不仅在唯物史观方面，就是在价值論、地租論方面，也一貫地繼續采用着，終身沒有改变。这是因为，著者从青年时代起就深深地欽佩河上肇博士，特別是在問題提得切合时宜这一点上，似乎願意追随博士，同时，似乎希望在同一个問題上竭尽自己的力量，討論博士的說素，通过这种討論来对推进日本学术界的認識作出貢獻。正因为这样，讀者如果从这部全集里挑选出散见于各卷的对河上肇博士的批判，順着年代排列，就可

以得出一个日本社会主义經濟学的进步的歷史的輪廓，同时，还可以借以知道著者的思想是怎样地同河上博士的思想保持着并行、雁行或先行的关系而发展的。……作为本书的附录……而收集在后面的，是河上肇博士的《奢侈和貧困》、《貧穷故事》、《改版社会問題管見》的介紹批評。这些著作，不用說，都是河上肇博士当时紙貴洛阳的名著，并且，也确实是在发现日本国内社会問題真相的里程碑。正因为这样，櫛田的这种批判的本身，也就有它的时代的价值。总的說来，他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場上提出問題，批評河上肇博士，从而促使他的观点趋于純一，这一点可說是非常有趣的。”

关于福本，1937年1月《中央公論》杂志附录《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年表》的1924年5月項下，說：“《馬克思主义》杂志創刊，这个杂志后来成了日本共产党的理論杂志。”1925年2月項下，說：“福本和夫在《馬克思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就唯物史观駁河上肇的文章，此后福本主义就风靡我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福本不像櫛田那样，只集中地批判我一个人。不过，据說他出国时把我的著作全部帶了去，所以他的批判的矛头首先是指向着我，而且以后一直也沒有放松对我的攻击，因而，在福本主义的全盛时期，只要我写出一点什么东西，連他的追隨者們也都根据他們自己的所謂唯物辯証法的立場，馬上來百般挑剔，而洋洋得意。

因为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而在日本也开始了新的局面的时候，我这样地成了众矢之的，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那是当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当时我已經是“我国馬克思学說研究的最高权威，而且是报刊文章写作方面的最高峰，占有今天任何人都比不上的光輝的社会地位”，其实这个馬克思学說研究，却是十分天真浅薄，是在德国猖獗了多年的伪馬克思主义者的糟粕和我自己的人道主义的混合物。所以，破邪显正的第一着，就該是首先打倒这个吹着

喇叭把人們的視听集中到他那里去的喇叭兵。

当然，在这些批判中，是决不会有表示善意态度的。来自福本主义阵营的攻击，相当恶辣，内中有的仅仅只是恶毒的謾罵；甚至連相处多年、交誼极深的櫛田对我的批判，从被批判者的立場來說，有些地方也使人感觉到是夹杂着曲解的非善意的冷嘲。可是，尽管我对于批判者的某些积极意见不能表示同意，但是，通过这些批判，却充分認識到自己一向的立場是錯誤的，从而侥幸沒有走上反动的道路，虽則年紀已經将近半百，却还是立志要来一个力所能及的“大发憤”，即使晚了一步，也要追溯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探究它的最后的地盘。前面也已經說过，福本在《馬克思主义》杂志上第一次发表攻击河上肇的文章，是 1925 年 1 月，而实际上，在前一年即 1924 年的 6 月，我自己已經埋葬了过去的河上肇，开始了“新的旅行”；所以，尽管福本主义流行一时，我仿佛置身于四面楚歌之中，我却一点都不担心违反时代了。在这种地方，凡是把真理作为朋友的人，只要永远站在真理将占上风的一边就成了，不用耽心敗陣，出处进退也好办得很。

說是这样說，这个“新的旅行”，对于我这个已經到了相当岁数、在精神方面和肉体方面都快要走下坡路的人，却是非常艰苦的。不錯，馬克思早就警告过：“在科学上面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輝的頂点。”^①像我这样愚鈍的人，光是領略前人所掌握的真理的一个大概，就几乎不得不費去毕生的努力了。

想起来，这个新的旅行的最初一段路，几乎完全是在书斋里完成的，这在外表上看来似乎沒有有什么，可是在我却已經相当艰苦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9 頁。——譯者

了；而等到在科学的世界里好容易看到頂上的光芒的时候，却又不得不钻出几十年呆慣了的书斋，而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打个比方來說，就好比原来呆在箱根深山的沼澤里的青蛙，一下子爬到东京鬧市銀座大街上，我着实徬徨了一陣，也吃了許多苦头。1932年，《金剛钻》那位匿名作者說：“拿一个学者的經历來說，很少见到像河上肇那样迂迴曲折、备尝辛苦的，而且今后可能还会是这样吧。”后来事实就是他說的那样。把吃过的苦头一件件想出来，詳細地写下去，也实在麻煩，我捏着一枝笔，簡直有些感到忧郁了。再說，有些事情，在別的地方已經写过了，把同样的东西再写一遍，就不大高兴。这篇《自画像》既然是特地重新写起的，那末姑且加把劲，給它配齐眼睛鼻子也好。为的是，只要把这个《自画像》画出一个輪廓，那末我什么时候死去，心里再也没有牵挂的了。

向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靠攏

我在1924年前后开始了“新的旅行”，到1927年前后好容易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恰恰就在那个时期，我身边莫名其妙地同时发生了种种变化。

在和学問沒有直接关系的方面，比如1924年^①死了大儿子（他是我的独生子），1927年死了父亲。我那个儿子，从小有心脏病，几次死里逃生，确实是我的一个大包袱；他的死去，虽說我自己并没有意識到，可是显然減輕了我的負担。我的內人每逢什么机会，老是发牢騷說：“要是那个孩子不死，你也决不会弄到坐牢。”可是，这一类家庭里的事件，这里还是一概从略，专门来談直接和

^① 根据著者自己編制的《年譜》，他的大儿子政男死于1926年9月，享年二十四，而不是死于1924年。这里恐怕是著者記憶錯誤。——譯者

學問有關係的事吧。

那時，在我身上同時發生了下面所說的一系列的狀況：我在思想方面，好容易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從唯心論完全走到了唯物論；我在大學里的經濟原論的講稿，成了徹頭徹尾的《資本論》的解說，我的研究對象已從資產階級經濟學一變而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到這時，我已不能再安分守己地僅僅當一個大學教授，非走出書齋不可了。這許多變化，同時發生在一個人的身上，表面上看來似乎奇怪，其實並不奇怪；這一系列的狀況，都是我好容易逐漸變化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表現。

我的離開大學，是1928年4月；其實，離開大學不久以前，我已一點一點地開始參加無產階級運動的實踐了。

1927年的冬天，一套由政治批判社出面編輯的《馬克思主義講座》在籌劃出版。那時候，《政治批判》這個雜誌，是《馬克思主義》的姊妹雜誌（它們中間的分工，大體上是後者主要登載基礎理論的文章，前者主要登載討論時事問題的文章），都是左翼陣營編輯的。《馬克思主義講座》就是由左翼方面所發起。那時他們向我接洽，要我和大山郁夫兩人擔任該講座的主編，我起初拒絕了。這是因為，前面曾經提到，那時候左翼陣營里的人多半成了福本主義的俘虜，平常一向把我看成眼中釘，而這次為了生意眼，想利用我做招牌，這樣的態度，自然使我不大高興。但是，經過幾次接洽以後，我終於也答應了做主編之一。

翻看一下當時向社會散發的徵求預約的小冊子，該講座的執筆者有下面這樣一些人：淺野晃，秋山次郎（是枝恭二的筆名），水野成夫，河上肇，櫛田民藏，豬俣津南雄，佐野學，大山郁夫，淡德三郎，門屋博，村上藤四郎，關根悅郎，西雅雄，產業勞動調查所，野坂鐵，秋笹正之輔，野呂榮太郎，藤井米三，細迫兼光。這些都是當時

左翼陣營里大家所知道的頭兒腦兒。此外，還有一些相當出名的人，化名參加在裡面。

總之，看了這樣一張名單，誰都會覺察到那是當時一般所公認的左翼陣營寫文章的人的總動員，是給馬克思主義示威的堂堂皇皇的陣容，因而大大地聳動了社會的視聽。（執筆者在這裡為什麼沒有福本和夫的名字，到今天還是弄不懂。順便說一句，當年聚集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的這批人之中，能全始全終的數不出幾個，其中還有不少人後來十分惡劣地變節了。在過渡時期里，終身不渝地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多麼不易，由此可以想見。）

關於這個講座，當時我曾寫了下面這樣一篇推薦文，文章註明是1927年11月20日寫的。

“親愛的讀者：

“這次籌備出版《馬克思主義講座》，我是發起人之一，所以想給您寫這個信。

“也許您已經看到了，新近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土方成美出版了一本《排擊馬克思價值論》。內中提到有人用了‘揭露近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法則’這樣一句話。關於這句話，他說：

“‘揭露運動法則’這句話，聽來彷彿既新奇又痛快。可是這句話，我從前也似乎曾經聽到過，覺得和自然主義文學流行時代所經常聽到的‘揭露現實的悲哀’那句話非常相像。其實，為什麼一定要用這種聽起來彷彿在講體操或軍事的‘運動法則’之類的話呢，用一些讓我們一聽就懂的比較容易的字眼好不好呢？’

“俗話說，爬行在草原上的蛇，只要稍微露出它的頭，就可以知道它全身有多大；單憑土方上面那句話，我認為已經足以測量出聲稱要排擊馬克思價值論的這位先生的造詣了。‘本書的最終目的，是揭露近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法則’——這句話是馬克思本人

在《資本論》第一版的序文里用來說明他的著作的最終目的的众所周知的一句話。所以，揭露經濟的運動法則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這在我們中間根本不成問題，可是對於寫書來排擊馬克思價值論的土方來說，却只是‘似乎曾經聽到過’，而且這位教授由此好容易只是聯想到自然主義文學和體操。對於馬克思的在‘運動之流’中掌握事物的方法，土方是如何盲目無知，這從他連‘運動’一語都不懂這一點上，就可以加以推定吧。

“我把他那部新著看了一遍，不客氣地說，覺得不比中學生湊熱鬧、買了一部廉價本《資本論》、讀後所寫的感想高明多少。他對問題一竅不通。現在舉個例來說。

“黑格爾在他的《邏輯學》一書的開宗明義第一章 Die Lehre vom Sein (存在的理論)里，首先論到質，其次論到量。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中談到價值的時候，正是按照這個次序寫的，而且在許多地方一再提醒我們，要把這兩個問題分別清楚。例如他說：‘如要發現一種商品的簡單價值表現如何隱藏在兩種商品的價值關係中，我們首先要完全離開它的量的方面，來考察這種關係。人們普通的研究方法是正好相反；他們在價值關係中，只看見兩種商品依一定量就可以相等的比例。他們忽略了，不同物的大小在還原為同一單位以前，不能有量的比較。’^①可是土方卻說：‘這裡首先有一個疑問，就是，說價值的實體是包含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這究竟有什麼證據？’這種說法，從土方過去的文章直到今天的文章里都一再出現；從這一句話，也可以看出土方對於他自己所要排擊的對象，是多麼無知。馬克思把‘抽象的人類勞動’作為‘形成價值的實體’，然後提出‘它的價值量要如何去測量’的問題，并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頁。——譯者

作出回答說：‘由其中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劳动——量去測量。’^①也就是說，价值的实体就是劳动；价值的大小，根据劳动量來測定。可是土方呢，却把‘价值的实体是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作为馬克思价值論的根本命題；他在那篇文章里，还說：‘在东京帝国大学經济学部担任着經济原論的讲座的我，不得不感到有責任迅速加以答辯。’这样一位感到責任的排击者，究竟是故意呢，还是真的呢，对于他所要排击的对象，却如此极端无知，或装出极端无知。对于这种假借科学的名义而公然歪曲事实的行为，我們是不能坐視的。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罢了。自从阶级斗争以威胁的姿态出现于社会表面以来，社会科学——那种有意識或无意識地想为现状辯护的社会科学——正在迅速地走上墮落的道路。现状越是不好辯护，辯护論就越发需要，正由于这样，辯护論也越发山穷水尽。至少在我所专门搞的經济学这一領域里，近代的經济学史不是别的，而是这门學問墮落的历史，小丑化的历史。这中間，唯有馬克思學說，运用了‘不畏懼任何东西’的辯証法，担任起剝去一切事物的表皮而揭露其真相的任务。正由于这样，自从馬克思學說成立以来，科学的历史，同时就是誣蔑馬克思學說的历史。針對着馬克思學說，一切方面的‘有能之士’，都为‘有利于为现状辯护的内疚和坏意图’所驅使，进行着‘御用的指責和攻击’。然而，在全世界人类的总实践越来越証实馬克思學說的正确性的今天，这些指責和攻击就不得不日益山穷水尽。所以，在攻击的方面，它的历史也就只可能是墮落化、小丑化的历史。1927年——馬克思學說在我国显著流传的今天——‘在东京帝国大学經济学部担任着經济原論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頁。——譯者

讲座而不得不感到責任’的土方成美之所以不得不出版他那本书，以及那本书的内容之所以比以前其他学者对馬克思价值論的排击更为拙劣，原因就在这里。

“为了在这个过渡时期的黑暗里投以一道光明，所以我們才計劃出版这个讲座。虽然我本人經常蟄居在书斋里，就好比是一个不直接接触病人的病理学者，所学的东西既狹窄又肤浅，而且非常不結合实际，但是，为这个讲座写文章的絕大多数人，却全都是日夜面临现实世界的各种具体問題而使馬克思主义在各方面發揮出它的作用的、现代日本最認真最有能力的馬克思主义者。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执笔者不一定全都是世俗上知名的人士。如果您要讀知名人士所写的书，那末我就給您推荐上面引为例子的土方成美的那本书。如果您真正需要社会科学，那末我就給您推荐并不全都是知名人士所写的这部《讲座》。这个讲座，一套共十二册，对馬克思主义将作全面的介紹，这几乎是凭个人力量怎样也完成不了的一份工作。”

考虑到上面这个印刷品哪里都不会有了，所以尽管长了些，却把全文抄了出来。另一方面，这也說明，和我在京都帝国大学那样，当时在东京帝国大学担任着經濟原論的教授，对馬克思主义經濟学說长道短，其实对于这門学問是多么无知，在这一点上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的情况已經逐漸变成这样：帝国大学的教授，要不是这样一流人物，就当不下去。还有，在这个印刷品里，我一方面用“我本人經常蟄居在书斋里”这句话对自己作了反省，另一方面則用“但是，为这个讲座写文章的絕大多数人，却全都是日夜面临现实世界的各种具体問題的”这句话来表示自己今天能够参加到这些实际搞运动的人們中間去，隱隱地引以为荣，这在我是很有意思的。把上面提到的中央公論社那个年表翻看一下，1925年2月項

下說：“福本和夫……发表了……駁河上肇的文章，此后福本主义就风靡我国无产阶级运动。”接着在1926年12月項下說：“由福本、渡边、山本、佐野^①等組織第二次日本共产党，在山形县五色温泉开了會議。”又在1927年12月項下說：“山川均、荒畑寒村、猪俣津南雄、鈴木茂三郎等創辦《劳农》杂志，反对流行一时的福本主义。”所以，計劃出版《馬克思主义讲座》的当时，还正是福本主义盛行的时候；被福本主义攻击得体无完肤的我，总以为将永久被时代所淘汰了，不料很快地就恢复了生命，被抬出来担任这样一个讲座的主編，自己心里大概是很高兴的。

由于这样的緣故，我似乎也就很起劲。在該讲座征求預約的宣传小册子的开头，我又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我是坚决相信真理一定胜利的人。

“不管人們怎样卖弄他的小聪明，客观世界却不以我們的主观意志和意图为轉移，如实地存在着。科学家的任务，就在于如实地認識客观事实，尽管那事实可能很不符合主观的希望、預期或趣味。虛伪一定会被揭穿，歪曲的認識决不会成为有效的行动的永久方針，所以，科学家只有忠实地履行这样被规定的任务，才能忠实地完成他所肩負的社会任务。我就在这样一个信心之下，度过了将近三十年的研究生活，曾經几次出入于諸家思想之門，今天终于参加到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深信至少在我所专攻的經济学領域內，只有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掌握那不以人們的意識为轉移的客观真理。

“想要利用电的人，应当先理解电这样东西。电这样东西的本质，不管你怎样忠告、說教或祈祷，总是客观地存在着。問題首先

^① 这里，除“福本”指福本和夫、“佐野”指佐野学外，“渡边”是指渡边政之輔，“山本”是指山本宜治。——譯者

在于掌握鉄一般的內在的自然法則。电的有意識的自由利用，只有在這種必要的辯証統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水深火熱中的亿万人民的自救，也只能这样；除此以外，更无他法。理解馬克思主义，也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而普及这方面的理解，当然是我們义不容辞的任务。

“由于我抱着这样的信心，所以近几年来，专门从事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时为了它的普及，尽了一点自己所能尽的力量。只是，由于体会得不够深入，一再发生錯誤，害了大家，觉得非常惭愧。再加我性情偏狹，从来没有和大家共过事，前几年有人計劃出版《馬克思全集》的时候，我也害怕对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有出入，沒有敢参加那个事业；最近有人計劃出版《社会問題讲座》，我也沒有担任执笔。可是今天我却要追随政治批判社諸同人之后，参加到編輯这个讲座的事业中去，这是因为我深信我們中間的见解尽管可以偶或有所不同，但是大家对于理解和普及真正的馬克思主义，却抱有同样的热情和决心……”

在这篇文章中，我說我“近几年来专门从事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时为了它的普及，尽了一点自己所能尽的力量”。我是不肯撒謊的人，这句话，不妨看做是記憶还没有模糊时所写的、1926年前后的自传中的一句。在这意义上，这是一个值得重視的文献；此外，这篇短文章还在当时的統治階級中間引起了物議，所以在我也是一个紀念品。

现在保存在我手里的当时那本征求預約的小册子的封面上，还写着下面这样一段話。

“这本小册子里的我那篇短文，让当时枢密院里某些人当作了把柄，那时的文部大臣水野，叫京都帝国大学校长荒木对我說，如果可能的話，希望我取消那篇文章。經济学部部长神戶，那时慌慌

张张地辞去了部长的职务。1928年12月30日記。”

荒木校长是哪天对我說那样的話的，因为我向来不記日記，所以现在查不出；不过推想起来，可能是1927年年底或1928年年初的事。因为，那本小册子里写明預約截止日期是11月15日，所以我的那篇文章大概是11月15日以前、多半是1927年10月份写的，而事情經過枢密院議論，再通过文部大臣而传达給校长，中間得有相当的日子。記得是那天在大学內一个和俱乐部相仿佛的乐友会館里，有一个什么会，我吃完晚飯，正在休息室里吸烟，不料荒木找了来，把我拉到屋角，鬼鬼祟祟地从大礼服的夹袋里取出上面所說的那本小册子，对我說出大意是这样的一番話：“放弃馬克思主义讲座的主編工作办不到么？此外还想請你取消这本小册子的开头那篇文章，你看怎么样？据說这件事引起了枢密院方面的議論，文部大臣希望你这样办。”他一面說，一面还翻开那本小册子給我看。一眼看去，我那篇文章上画滿了粗粗的紅綫。我心里也轉念：是了，吃紅棍子的地方大概就是成問題的地方了。但是，即使在今天看起来，那篇文章也不應該吃那么多的紅棍子；那时候的我，就更不以为它有什么問題了。只記得我仅仅回答說，这个办不到，立起身来馬上就离开了乐友会館。这件事，当时我簡直滿不在乎，可是神戶部长大概觉得事情不好办吧，馬上就把部长的职务辞掉了。这个人，在公务方面，一生就只知道尽量躲避責任，不要栽跟斗；表面上仿佛慇直，实际上却是个滴水不漏的明哲保身的好手；可能他那时觉得形势不妙，所以急忙卸去了責任。

老年人翻陈年老賬，总是东拉西扯，叫人讀起来，觉得沒完沒了。我在这里提起《讲座》，原是想說明从1927年年底那个时候起，我已經漸漸地开始走向无产階級运动的实践了。因此，即便关于这个《讲座》，我在这里也必須再交代一件事。

1927年12月1日，我写給櫛田民藏下面这样一封信。

“七、八年不到东京，这次去了。上次去是出席以澤柳政太郎为会长的教育会的讲习会；这次去是参加演讲会，演讲的时候，有警察在場監視，沒有等讲完，就被勒令中止了。我觉得这件事也就象征着日本最近的形势的变化。自己深深觉得，如果稍不留神，就会变做废物。

“黑格尔、費尔巴哈、馬克思、恩格斯——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可是他們的年齡，却按照父亲、哥哥、弟弟的次序排下来，这也許是无可奈何的事吧。不过，我尽管喘着气，也还是想爬到陡坡上去。”

这封信里說“七、八年不到东京，这次去了”，七、八年前去东京，为的是出席帝国教育会的夏季讲习会，那次演讲的速記，后来用《近世經濟思想史論》的书名出版了。查看一下，是1919年出版的。演讲大概就在那年的8月里吧。如果是这样，那末从1927年11月推算起来，已經是八年多以前的事了。像我这样一个不爱演讲、不爱旅行、身体懶得动弹、最爱呆在清靜的书斋里的人，八年多工夫也沒有去东京一次，那一次竟然为了演讲而又进京，真是鼓足干劲的了。

• 手边有那时剪下来的一則新聞，上面是这样一个大标题：“建国會員十余名，騷扰河上博士公館。”內容是：“1日（按：何年何月不明，因为剪得不齐全）上午十一点多钟，在京都市梅小路仲町二十四号設有京都府联合会本部事务所的建国会的京都支部會員福島佐太郎——家住京都市内淨福寺下立卖下——等十余人，突然来到住在吉田二本松町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家，要求会见博士。当时博士不在家，他的夫人出来說明情由，許多會員就把带在身边的該会的宣传招貼画（上面印着神武天皇樞原即位典礼以

及‘回到建国精神’几个大字)和上月 10 日他們所散发的扑灭共产党的宣传标语(上面印有‘打倒劳动农民党’、‘打倒赤化教授’等字样)取出,貼滿在博士家的柱子和墙壁上,然后一哄而散。”从这条新聞里,可以看出当时周围的空气是怎样地不妙;所以,內人怕出什么乱子,我去东京的时候,她也同了去,为的是保护我。当时我們买的是臥鋪票,可是記得內人对我說,一夜之中,她連眼都沒有合。我让我內人多操另一番心,大概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了东京,許多左翼团体联合起来为我开了欢迎会。那个欢迎会是在日比谷一家中国菜館开的。还記得代表劳动农民党的大山郁夫、代表《无产者新聞》的佐野学、代表政治批判社(过去一向把我的文章批評得一文不值)的是枝恭二,在席上都致了欢迎辞。

演讲会是在青山会館举行的。第一个走上讲坛的大山郁夫,刚张开嘴讲了几句,就让在場監視的警察勒令中止了。我把預先准备好的一篇題作“稀有的灾难时代”的稿子,就像在学校里念讲稿那样,不慌不忙地宣讀着。文章虽則不长,可是因为讀得很慢,所以費了相当长的時間。等到念到临了的“东方的天空已經发紅,不久就要天亮了”几句,就被勒令中止了。这是我被勒令中止演讲的最初的經驗。当时中央公論社的記者島中雄作也在会場,請我写稿子,于是我就把那篇文章交了給他,让他拿去在《中央公論》上发表。并且和他說妥,这篇文章的稿费准备捐給劳动农民党,所以稿费希望尽量高些。

演讲过后,我就回到京都,写了上面那封給櫛田的信。写这封信时,我是有些兴奋心情的,这从“我尽管喘着气,也还是想爬到陡坡上去”的措詞里也可以看得出来。虽然只是心上这样想,但是从那时起,我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已經不是漠不关心了。

1927 年 11 月月底相隔八年才去东京的我,过了两个多月,又

到四国地区去了。

1928年1月21日，田中内閣解散議會，日本第一次根据所謂普通选举法而举行議員总选举。在这次选举里，劳动农民党——实情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合法政党——推出三个候选人，其中，京都两人：水谷长三郎、山本宣治；香川一人：大山郁夫。（在这以前举行的县會議員选举中，劳动农民党当选議員最多的地方，就是貧雇农斗争最激烈的香川县。）我对于这件事情不能无动于衷。本来不喜欢演說和旅行的我，觉得不能不有所举动，单身一人去到香川县，住在琴平的小旅館里，每天到东到西，站到讲坛上去演說，每次演說都不等讲完就被勒令中止了。鎮压一天比一天厉害，越到后来，演說被勒令中止得就越快了。大山郁夫的选区的邻县候选人是上村进，他也是劳动农民党的党员。有一天夜里，我也到那里去了；当时那种場面，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的，到今天还没有忘記。我从琴平乘上火車，傍晚时候，到达高松，当我靠着一张地图走向演說会场的时候，人群就像雷雨过山洪一样，迎面而来。我心里想，难道演說会已經被解散了么。哪里知道，当我走到作为会场的小学校一看，好家伙，大讲堂里挤得水泄不通，連到隔着天井的另外一栋房子的几个教室的走廊里，也都挤滿了听众。有的人爬在树上，还有的人搬来垫脚的东西站在上面。原来方才我来的时候路上所遇到的那一大批人，是因为会场容納不下而死了心、回家去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听众。见到这种景象，我倒有些吃惊。会场里所有的窗子，尽管在这隆冬天气，全都开着。我体力差，觉得怎么也不能在这样的地方作长篇演讲。但是，我仍然提高了嗓子說：“我把在京都作的演說的底稿带了来，今天晚上也准备同样来个朗讀演說。不过，在京都的时候，一次也没有被勒令中止的演說，来到香川县，哪次都被勒令中止了。我暗地里

疑心，难道在同一个日本国里，京都府的安宁秩序，同香川县的安宁秩序，性质不同么？”当我說这些话的时候，接連两三次受到在場監視的警官的“小心”的警告，而等我說到最后一句时，就被勒令中止了。瘦骨如柴的我，用那样高的声音說話，本来也就吃不消，所以，被勒令中止，反而像是得了救。而在我的演說被勒令中止的同时，演說会被命令解散，会場顿时像搗了蜂窝一样，乱成一片。眼前只见警察和听众在乱揪乱打，身上穿了端端正正的日本服的我，夹在人海中間挤来挤去，半晌直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怎样是好。

順便再加一笔。在琴平的旅館里，我和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的細川嘉六住在一块。他来琴平，并不是因为爱好或擅长演說，也是被一种义务感所驅使，而来給打气的。細川和我，都同櫛田非常接近，是多年来的朋友。我們两人，自然提到了櫛田，而且你一句我一句地談着：这次櫛田不到場是說不过去的。細川还說：“在这样一个时势之下，像我們这种青年时代已經过去的人，应该采取怎样一个生活方針？——这种問題，最好能开誠布公地談一談；可是近来你正正經經地和他談起这类問題时，他却取笑你几句，馬上把話头扯到旁的地方去了。櫛田近来的态度，不知怎的，有点不对头。”我同櫛田来往，比細川要早，交情也許更加深些，不过自从那时起，我就逐漸同他疏远起来了。这也不妨說是这一时代里紛至沓来的許多事件中的一个吧。

在琴平呆了一星期左右，正打算第二天离开那里回家去，我的小舅子大塚有章突然赶了来。那时他正在大阪藤本証券銀行工作，大山郁夫是他早稻田大学时代的恩师，看到报纸上說大山在香川县竞选中遭到严重鎮压而陷于苦战的消息，义憤填膺，就向銀行請了病假，特地跑来支援。他先到旅館里来看我，我听到女服务員

的传达，还疑心自己听错了，等到下得楼来，走到门口一看，我那小舅子就像飞到垃圾堆上的白鹤一样，衣冠楚楚地站在那里，不禁使我吃了一惊。这一星期中间，我在当地所会见的人，不管是中央来，这里参加竞选的人也罢，地方上的农村青年也罢，全都是破衣烂帽的战士；而大塚的服装，从头到脚，和这些战士们太不一样了，所以那时的印象到现在还清楚地留在我脑里。我比他先离开琴平；那时选举运动已经接近尾声，镇压越来越厉害，竞选人一个个地被捕，到最后，只剩下大山和大塚两人作竞选演讲了。大塚后来成了日本共产党员，不幸进了牢监，这种命运可以说是从这个时候开的头。

投票是2月20日举行的。当时劳动农民党的候选人，全国将近四十名光景，可是当选的仅仅只有京都地区的水谷和山本两个，其余都落选了。早就懂得了投降术的水谷不去讲他，后来惨遭毒手的山本的命运，也可以说是这时开的头。

离开京都帝国大学

就是在这次国会议员总选举中，日本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在大众之前露面。印着“打倒天皇制”等主要口号的无数传单，用“国际共产党日本支部、日本共产党”的名义，散布到全国，吓坏了日本的统治阶级。

果然，在3月15日一清早，全国同时举行了对共产党的大逮捕。到那年6月底，受到起诉处分的约有四百五十名，其中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也不在少数。好容易逃过逮捕关的，有的大白天跑到我大学里的研究室里，自称共产党员，向我借旅费；有的趁着黑夜，到我家里，说要潜伏到地下去，向我辞别。

在这种乱哄哄的情况下，我的进退也就成了问题。报纸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流言，而文部省、京都帝国大学校长、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部教授会之间也似乎打了許多交道，可是我从同事们那里始终没有能听到一点消息。这样，到4月16日，校长劝我辞职，我就在17日提出了辞职书，同时对新闻记者团发表了下面这样一篇文章，代替谈话。

“4月16日下午，荒木校长向我提出几点理由，劝我辞职，他还特地补充说，经济学部教授会也同意这个劝告。校长所提出的理由有三点。第一点是说《马克思主义讲座》的广告小册子里我那篇短文章有不妥当的地方；可是我丝毫想不起那篇文章里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拿这一篇文章作为理由来逼大学教授辞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第二点是说我在香川县支援竞选的演说有不妥当的地方；可是我生平除了用文章发表意见而外，在香川县并没有演说什么，要我单凭这样的空话而辞职，是办不到的。第三点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里出了扰乱治安的分子；我认为我没有必要根据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对事情负责。固然，我以前受到校长委托，当了该研究会的指导教授之一，可是从来没有通过研究会或研究会会员而参加到实际运动中去，尤其是同这次成为问题的事件（按：指对共产党的逮捕），更加没有什么关系。

“总之，我认为上面所说的几点，都不能成为要求我辞职的理由。可是，既然已经由教授会正式议决，而且受到校长的劝告，作为大学的成员之一，为了拥护大学的自治，我认为必须尊重校长和我所隶属的学部的意志，所以决定即日辞去教授的职务。

“本来，我认为，一个学者不应该根据常识来加以判断。假如常识本身就是真理的话，根本就用不着科学研究了。和错误的常识作斗争而加以打破，乃是新兴科学的任务，因此也就必然受到常

識的反击。由于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所以一向认为不管对方是怎样的达官貴人，在科学世界里只不过是些俗物而已，对于这些人的与科学无关的攻击，不必加以理睬。但是，为难的是，作为大学的一个成員，我始終认为必須极力拥护大学的自治，因此也就不能不尊重我所隶属的教授会的決議。我决心辞职的理由，完全在于这一点。”

我所写的东西，总是正直地表达出每一阶段自己的感情，这是我向来的作风。上面一篇文章里絲毫沒有兴奋的成分，足见当时我没有把脱离大学看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我虽然也曾打算根据事情的发展情况，硬不提出辞职书，而和当局进行斗争（按照我的性情，本来不喜欢这样做）；可是結果，幸好經濟学部的教授會議决让我辞职，而且我早有精神准备，所以也就能够不声不响地淡然离开了大学。

在校长劝我辞职的理由中，第一点的《馬克思主义讲座》和第二点的香川县竞选演說，前面已經提过。第三点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会，我在《回忆》的第二篇《荒木寅三郎的头》里，有詳細的記述，所以这里不作重复。

4月17日上午，我把辞职书一交出，荒木校长就連夜帶了这个辞职书进京，向文部大臣水野鍊太郎汇报了事情的經過，18日內閣會議上就加以討論，19日就发表了“辞职照准”的命令。

卸下了这个沉重包袱的我，应編者的請求，給4月21日发行的《京都大学新聞》写了一篇叫做《面临辞去大学教职之际》的文章。原文如下。

“离开了京都大学的今天，我首先要說的話，是对京都大学的感謝。1908年，把一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担任一个經濟杂志的主笔的我，請来当法科讲师的，是京都大学。到职的时候，岡田

校长——后来的文部大臣——对我說，什么时候让你当教授，现在讲不定，当时我回答說，即使終身当讲师，也沒有关系，就这样愉快地来到了京都。因为那时我所热烈願望的，是专心从事科学研究。不料，还不到一年，就升为副教授，不久又当了教授，此后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像我这样一个人，能安心埋头研究經济学，这在我來說，的确是意外的幸福。二十年来的长期研究，給我毕生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使我找到了終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不仅这样，通过大学生活，我还認識了几位值得衷心欽佩的朋友。所有的这些，在世路日益艰險的今天，实在是很难求到的人世的宝贝。这些好处，我必須向大学深深致謝。如果直到今天，由于我的关系，或多或少地給大学添了麻煩的話，这就非常遺憾，在这里不得不深致歉意。但是，与此同时，如果允許給我一个机会的話，我願意就为什么产生这种結果的原因談談我自己的看法。

“我将避去一切不必要的客套，說老实话。愈是阶级斗争以威脅的姿态出现于社会表面的时代，經济学的自由的科学研究就必然愈会遇到种种敌人。馬克思說过：‘自由的科学的研究，在政治經济学范围内，不只会和在其他范围内，遇到相同的敌人。經济学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喚起，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战场上来阻碍它。’^① 处身在这种环境里，要想真正完成学者的任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阶级斗争愈激烈，許多有本領的学者就愈会在不知不觉中間向統治阶级献媚，这只要讀一讀經济学史，也就明白了。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置身于这样一門最困难的学問的領域里的我，最初就認識到要有特別充分的精神准备。我心里坚决地立下誓願，首先要以真理为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頁。——譯者

念。天分不高，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我经常总是注意着决不让俗念左右自己的学说。这样，我的学问总算逐渐——实在说起来，是畏畏缩缩地——走向了一定的方向；而我之所以不得不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在主观方面是我的研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所以，假如我现在的学问立场从常识上说不适宜当大学教授，那末在我说来，这不外乎是我为忠于大学教授的责任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我已经完成了我本身的辩证转化。

“我占据大学教授的职位，在社会上被一部分人从常识的判断出发而加以非难，而且这种非难愈来愈熾烈，这是最近两三年中我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的。受到这样的非难，而仍然若无其事地留在那个位置上，实在说，我也非常痛苦；不过回想到自己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职责，就鞭策着自己，觉得非有漠视这种非难的勇气不可。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如果为了要避免这种非难而束缚了自己的言论行动，那就会主动地招致减少大学教授的自由的结果，所以凡是理论上——不管常识上怎么样——我相信一个大学教授可以那样做的事情，尽管早就知道会招到种种非难，我仍然积极努力去做。举个例说，正当乱哄哄的时候，我还是去香川县作了一次竞选旅行。在旁观者看来，说不定有许多看不入眼的地方，可是我自己，却抱着一贯的宗旨。

“大学教授生活将告结束的现在，我对于因自己能力薄弱没有做出一点成绩觉得非常惭愧；可是回顾一下，并没有对不起良心的地方，却是引以为幸的。现在离开了负责的地位，实在有卸下了力所不及的千斤重担的感觉。

“不能在讲坛上和同学们告别，只能通过这个报纸，祝诸位将来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幸福……”

上面这篇东西是当时所写的，所以应当最能表达我那时的心

情。其中我提到，由于我二十年来“为忠于大学教授的责任而付出了巨大努力”，仿佛“我现在的学问立场从常识上说不宜当大学教授”，可是这“也可以说是我已经完成了我本身的辩证转化”。其实，如果用另一个标准来看问题的话，我到那时才刚刚达到无愧于当大学教授的科学研究；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面临总危机的时代，正由于这一点，我才不宜当大学教授。

不过，我本身也的确不想再继续占据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学教授的位置。侥幸的是，日本资产阶级在明治革命时，尽管很不彻底，却总是流了鲜血，争取到了若干思想自由，而当这种思想自由的余烬还没有在官立大学的一角完全熄灭、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还没有被总危机所震撼、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反动化的时候，我偶然能在许多抱有坚强信念为拥护大学教授研究与发表的自由而不惜作任何斗争的可敬的同事讲学的京都帝国大学安静地埋头研究了将近二十年工夫，这对我的一生，可以说是无上的幸运。“专心从事科学研究”是我当初的“热烈愿望”，前后经过将近二十年，这个愿望既然已经满足了，所以我也就能怀着满腔的谢意，心平气和地走出大学的门。除此以外，我对于大学，还有什么更多的希望呢？现在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受到总危机的袭击，大学里的研究自由和发表自由，也快要寿终正寝。恰恰在这样一个时候，我总算大致使我自己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完全没有必要永远留在大学校园里了。

上面那篇文章里说：“现在离开了负责的地位，实在有卸下了力所不及的千斤重担的感觉。”这的确是当时的感想。我想，历来感到非常沉重的大学讲义，此后永远可以免掉了；临了几年愈来愈感到难以忍受的大学里的气氛，此后完全可以脱离了；从此以后，可以守牢在自己的书斋里，埋头于翻译《资本论》的终身事业了。

我是一条特种的蠹魚，終身消磨在写作上的蠹魚。生平最喜欢也最拿手的，是坐定了写东西。我膀上没有气力，任何劳动都赶不上人家，唯独拿笔，还不落人后。侥幸现在已经懂得了馬克思主义的一个大概，如果单是做翻譯工作的話，也許还不致造成多大錯誤。虽然像《資本論》这样的书，不是单单忠实地譯出它的意义就算完事的，应当用日本語忠实地表达出原著者的气魄和原文的精神，設身处地地把馬克思所要說的东西用最恰当的日本語表达出来；不过这一点，自信只要下点功夫，也不难做到。——我就是抱了这样的宗旨，打算着后半世的工作，从大学的讲坛上退到自己的书斋里的。我暗地里还想，这对于我来说，倒是一个好机会。所以，尽管脱离大学时我并不认为共事多年的經濟学部的同事們对我的态度是合理的，但却也沒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終于淡然地离开了二十年来的职位。

1928年5月1日，我印了一个小柬，分发给各方面。小柬上說：“敬启者，前些日子我辞去大学教职，承蒙恳切慰問，不胜感激之至。謹志謝忱。”而在寄給櫛田的一张的背面，还題了一首俳句：“卸下了包袱，在山头茶館里听百灵鳥的歌唱。”另外还加上一句：“暂时我要喝口茶休息一会儿。”直到六十岁过后完全隱居时为止，我很少写短歌和俳句。那首“拼得一死而还活着，这条命是白白拾来的了”的俳句，是年紀还不到三十岁、参加无我爱运动前后的作品，而这首“卸下了包袱”，說不定是那次以后所写的第一首俳句。要不是感到自己身上有什么大变动，我是决不会写这类东西的，所以那时所写的这首俳句，自然反映着我当时的心情。这心情也許别人不了解，其实这里所說的“山头”，指的就是半年前給櫛田的信里所說的“我尽管喘着气也还是想爬到陡坡上去”那个横在陡坡路上的一个山头；当然，我并不是說越过山头，旅行就此結束

了，或是今后不会再遇到别的什么山头了，我的意思是說现在总算越过了我一生旅程中的一个山头。至于最后所說的“百灵鳥”，不仅恰巧是那个时候的季节之鳥，而且汉字又写作云雀、告天子、天鵝等等，很能表达出我那时的心情。

还有一篇恰好是同一时期所写的东西。当我辞去大学教职的前后，事情很多，一点空閑的时间也沒有，以致一向大致每月出一期的《社会問題研究》，就暂时停刊了，直到6月，才好容易出版第八十五期；在那一期的卷首，有一篇《为本刊复刊告讀者》，原文如下。

“去年（1927年）8月出版了第八十三期以后不久，我就着手翻譯《資本論》（按：是为岩波文庫版而开始的工作），当时感觉到全部空閑时间都用在这部书的翻譯上也还不够，所以到年底（按：指1927年年底）出版了第八十四期以后，就一直沒有能繼續出版。本来我觉得这个杂志說不定只好永久停刊，而且永久停刊了也好。可是，今年4月，我辞去了大学的教职，于是一方面觉得有必要繼續出版不妨称作我的私人讲座的这个刊物，同时也获得了这样做的空閑，所以现在就重新把它办下去了。

“另外我还打算繼續出版《資本論入門》。翻譯《資本論》、每月出版《資本論入門》和《社会問題研究》，光这三件事，对于我这样能力薄弱的人來說，已經是很重的負担了。即使不做一点其他的事情，光这三件事，也就够我忙的了。

“无产階級今天在自我解放的战斗中，正在百般鎮压之下苦斗着。批判的武器固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然而科学也还是一种斗争的力量。今后如果幸而能拿着批判的武器排在战斗队伍的末尾，将是无上的光荣。”

这是刚辞去大学教职时我为自己今后的工作大致訂下的計

划。而“卸下了包袱，在山头茶馆里听百灵鸟的歌唱”这首俳句，可能也就写出了一边盘算着未来的计划、一边缓一口气在山头茶馆的长凳子上坐下的旅行者的面貌。

可是结果，我不仅没有能在那山头茶馆里好好休息，就是《资本论》的翻译、《资本论入门》分册的继续出版、以及继续搞私人讲座《社会问题研究》，也都没有能照我预定的计划去做。

1928 年年底结束安静的书斋生活

由于参加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一切计划都给打乱了。

上面已经讲过，还在大学里的时候，我自认为已经使自己勉强成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时候起，就一点点地和无产阶级的实践运动有了关系。当然，内部的思想变化，不能不引起与之相适应的外部行动，这两样东西同时凑合在一起，其实不足为奇。脱离大学的当时，我本来打算把翻译《资本论》作为后半生的主要工作，结果却成了一时的梦想。

那个时候，我心里老是记着恩格斯下面一段话，它对我起着一种鞭策的作用。关于这件事，前几年在《入狱记》的开首已经写过了，可是因为这是一件大事，不能省略，所以不厌重复，再把它写上一笔。

担任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遗稿的恩格斯，1885年出版了第二卷以后，拖了九年，直到1894年，才好容易出版第三卷。那时他在第三卷的序文里，解释第三卷之所以拖了九年才出版，一则是由于他的视觉极度衰退（1894年，他已经到了七十五岁的高龄，第二年他就永眠了），再则是由于和实际运动有关的工作大量增加，占去了他许多时间；然后说了下面这样一番值得注意的话：

“……各种(河上按:指与实际运动有关的)工作,对于我,又是一种不能畏避,而必须立即实践的义务。在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是和在十六世纪一样,在公共利益问题的范围内,单纯的理论家,只能在反动派方面发现,但也就因此,所以这辈先生决不是现实的理论家,却单纯是这个反动的辩护者。”^①

经历了七十多年所谓动荡的时代的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在晚年所说的这句话,对于每一个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不管他一时听得进也罢,听不进也罢——都是决不能忽视的一大结论。天下任何一个学者,见到这句话而等闲视之的,不管他学问怎样渊博,也决不能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想来,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价值,恐怕谁都赶不上恩格斯那样懂得清楚吧。再说,除了恩格斯而外,恐怕也没有一个更适当的人能从头到尾整理马克思的不好读的遗稿,而把它编成一本完整的书。况且恩格斯自己年纪已经那么高,已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老人。可是尽管这样,为了当前的实践运动,他还是毫不吝惜地分出他的时间和劳动,把《资本论》第三卷拖了九年才出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在那几句话里也明显地指出来了。他很细致地用“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规定了时代,用“在公共利益问题的范围内”规定了问题。比如说,在数学、物理学之类的科学的范围内,自然也许可能有脱离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的学者吧。还有,如果社会进入了安定的时期,时代是学者可以埋头钻研他自己的专业的时代,那末就在公共利益问题的范围内,或许也可能有脱离实践的学者吧。然而今天不是这样的时代,恩格斯说得很清楚。

在恩格斯说这番话的几十年后的1928年,俄国已经成立了苏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页。——译者

維埃聯盟，而在日本也正是日本共产党受到統治階級的大鎮壓的時代。從任何方面來說，這無疑地是一大變革的時期。這樣看來，《資本論》的翻譯，儘管對我說來是最合適的工作，而參加無產階級運動的實踐，儘管我自己比誰都明白是最不適宜於我的工作，可是我却不能對眼前的運動閉着眼睛，安靜地躲在書齋里，埋頭搞自己所最愛好的文筆工作。為了當前的實踐運動，連《資本論》的原著都拖了將近十年方才出版！那末誰有權利借口翻譯這部書而脫離實踐呢？所以這部巨著的翻譯工作儘管非常必要，但是我却終於不能心安理得地埋頭於這份工作。

還有，列寧在他的《國家與革命》初版的跋里所說的那些話，也和恩格斯前面那一番話一樣地使我不能躲在書齋里。列寧說：

“這本小冊子是在 1917 年 8、9 兩月寫成的。我當時已經擬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1905 年和 1917 年俄國革命的經驗’的大綱。但是，除了題目以外，我連一行字也沒有來得及寫，因為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機‘妨礙’了我。對於這種‘妨礙’，只有高興。但是本書第二部分（關於‘1905 年和 1917 年俄國革命的經驗’）也許要拖延很久才能寫出，因為做出‘革命的經驗’總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①

處在革命的前夜，把群眾從他們對“國家”的偏見（這是統治階級經常拿出全副力量、利用一切機會、動員一切機關在群眾中間散播的）里解放出來，是特別必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着的今天，我寫着這部稿子的时候，痛感到實在有此必要）。正因為這樣，所以列寧儘管處於萬分艱難的境況下，仍然寫出了這部《國家與革命》。這部著作，單從它本身來看，仿佛是研究室里的產物，連

① 《列寧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79 頁。——譯者

革命的烟火气都聞不出来的冷靜到极点的理論著作。其实不然，实际上那是在万分艰险的环境里写出来的。在阿·肖特曼的回忆录中，关于当时的情况这样說：“列宁隱藏起来已經一个月了。……資产阶级的报纸，沸騰地叫囂着非逮捕列宁不可。克伦斯基的密探，日夜到处巡邏着。連最有名的警犬脫萊芙都被动員起来，搜索善于躲藏的列宁。……有一天，报纸上刊登着一則消息說，由五十名士官生組成的决死队，立下誓言，如果不找到列宁，决不生还。”在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躲藏在拉茲里夫沼澤地的草棚里的列宁，剃光了鬍子，戴了假发，化装成火車头上的司炉，逃出国境，藏在芬兰的一个小村庄里。《国家与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那是因为他認識到那时革命的当务之急，无过于闡明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論了。可是，就像这样一部意义重大的著作，他为了参加革命实践，也把它半中間攔了下来，并且說：“做出‘革命的經驗’，总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

这些是不光嘴上讲、而还要亲身去实行的先哲的榜样。所以，我們纵使从头到尾讀了《資本論》或《剩余价值学說史》，而且能一字不差地加以背誦，可是如果对上面那两段話却等閑視之，就决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的学者。我是这样想的。恩格斯的話和列宁的話，虽然都是如果不注意就很容易忽略过去的片言只語，可是对于我來說，却是印象十分深刻、使我念念不忘的（我还把这些話大书在我书斋的牆上）。

我的书斋，是按照我个人的趣味而設計的。那是位于楼上东南角的一間四张半席墊的屋子。和我父亲的脾气正相反，我喜欢小一些的屋子。我的书斋，东面全是窗子，窗外是简单的栏干，书桌紧靠窗下的牆头。那个书桌原来是西洋式的，截去了四只脚，改成矮桌子，材料非常坚实，面积奇大，还是从前在东京的时候买的，后

来一直用了二十年。书斋的西面有三尺宽的小小的摆设间，六尺宽的浅浅的壁橱。壁橱里安着架子，上面放着常用的书籍。这些书籍之类的东西，我不喜欢放在看得见的书架上，而喜欢放在有纸扉遮着的壁橱里。原来放在大学研究室里的一批书，脱离学校的时候，把一部分没有用的处理掉，其余的就堆放在楼下新盖的简陋的藏书库里。书斋的南面是隔了一扇玻璃门的廊沿，晴朗的日子，室内阳光充足，暖和得犹如玻璃花房。瘦弱而怕冷的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朝南的小屋子。屋角里还装有小小的煤气火炉。书斋的北面，是笨重的门，通向西洋式的会客室。京都的夏风总是从北面吹来，所以夏天敞开那扇门，风大得几乎连书也看不成。我五十岁脱离大学，要是一直守牢在那间书斋里，到今天该有十五年，说不定《资本论》全部三卷的翻译已经完成了；可惜这样一间惨淡经营的书斋，我却没有能够充分利用。

我的书斋里时常有一些非法的油印文件光顾，还从邮局里寄来一些禁止发行的东西。有些逃过三·一五事件^①那个关口的熟识的学生，在被拘留了一、二星期之后，带着混身的虱子从警察署里出来，跑到我书斋里，有的甚至把手上脚上被打得青紫斑斑的伤痕露出来给我看。三·一五事件被捕后因为咯血咯得很厉害而暂时得到保释的评议会（日本共产党系统的日本工会评议会，三·一五事件后立即被解散）的战士谷口善太郎，曾经躲开了暗探的追踪，来看过我好多次。在大雪纷飞的天气，头脸完全包在围脖里，趁天黑跑到我书斋里来的他那副模样，到今天还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东京方面也有人来看我。《无产者新闻》派人来募捐基金的时候，我当下就答应捐出一千块钱。由于这样的情况，所以尽管我

^① 三·一五事件，指1928年3月15日日本反动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对日本共产党员的大逮捕；参看前面第109页。——译者

呆在书斋里，书斋的气氛，却日益紧张，日益失去古都的宁静。

从写这回忆的1943年往回算，这已经是十六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又再度回到古都，在以前的故居的旁边租到一间破屋，尽情地过着宁静的晚年生活。近来盛夏快要来到，我每天清早起来，总要在早餐前作三十分钟的散步，这几乎成了我的日课。官币中社^①吉田神社所在地的吉田山，在它的小小的高阜上，长着茂盛的树木，中间有可供散步的宽广的道路，就像个不加人工的公园，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个散步的好地方；可是心脏衰弱的我，总是避开小山岗，沿着大学和高等学校的两个正门相对的那条马路，曳着手杖，慢腾腾地朝着鸭川那个方向往西走去。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写着：

右：从坡下向前，通白川

左：通百万遍

1756年11月 日 泽村道范

这些文字，几乎经历了二百年的岁月，还清清楚楚地留在碑上。站在那路口，不多一会儿，就可以遇到白川的卖花女子，头上缠了白手巾，脚上扎了白绑腿，肩上跨着颜色漂亮的缚袖带，腰里围了飞白花纹布的称身的宽围裙，打扮得和大原女子^②一模一样，推着满车的朝露还没有干的鲜花，到市内去卖。我虽然明明知道，夏天的花，养在瓶里，活不了几天，可是由于刚摘的鲜花太娇艳了，终于只算是上当地买了几朵。我从这种细小的地方，也深深感到京都实在太优美、太可爱了；可是从前在同一地段住了二十年，像这

^① 从前，凡是用国帑祭祀的神社，称为官币社，有大社、中社、小社、别格官币社的区别。——译者

^② 大原是京都市外的一个农村，那一带的妇女，经常在头上顶着柴禾、鲜花之类，拿到京都去卖。——译者

样閑靜的情調，却一次都沒有領略过。着上千年历史色彩的京都的好处，我过去竟一无所知，当面错过了。

这样，到 1928 年将近年底的时候，我就主动地想到东京去走一趟（去年的同一期間，我相隔八年之久，才去东京，而这一次，还不到一年，就又去了）。

三·一五事件发生后不久，向来受日本共产党間接领导的劳动农民党，和日本工会評議會一同被解散；后来根据日本共产党的指示，成立了一个新党筹备会。筹备会本来就是個松懈的組織，委員长由大山郁夫充任，秘书长由細迫兼光充任，大体上继承了原来的劳动农民党的斗争場面。这个筹备会决定在 12 月下旬在东京举行接連三天的新党成立大会。

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日本警察，在取締思想犯方面，当时还很幼稚。即使在三·一五事件大逮捕当时，本来打算把活动在合法場面上的左翼战士一网打尽，結果也只是摸瞎，在全国范围内撒下一面大网，至于潜藏在合法場面背后的非法活动，司法当局却几乎一点都不摸底。正因为这样，那时的司法当局，虽然有心对这个新党成立大会加以大镇压，却也想利用这个机会看一看有哪些人物出席那个大会，以便制成全国范围的黑名单，所以事先就沒有禁止开会。

当我听到新党成立大会就要举行的时候——也許是在《无产者新聞》上看到了新党筹备会向全国发出的号召吧，記得並沒有收到什么私人通知信，——我考虑的結果，終於决定到东京去。关于这件事，我在前几年脫稿的《入獄記》里，写了下面这样一节話：

“有些长期从旁观察他（这里的‘他’，就是指的我）的行動的人，都认为他是容易受年輕人煽动、被年輕人抬着走的感情脆弱的人，其实这完全是不理解他内心斗争的一种表面看法。他这个人，

只要他自己认为不该动，那末任凭别人从旁怎么说，他也决不动一动。在这种地方，他那股顽固劲儿，简直显得不近人情。可是在另一方面，当他自己认为非动不可的时候，他就会不顾一己的利害得失，毁誉褒贬，朝着应该去的方向勇往直前。当这种时候，他的行动的力量是很大的。自然，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柔弱的人，当他将要开始这样行动的时候，他也躊躇逡巡；可是，这种躊躇逡巡如果不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正义与否，而是为了顾虑一己的利害得失，那末他到时候就会利剑一挥，奋然而起。有些人以为他容易受人煽动，那是由于只看表面现象的缘故。现在，他的决心去东京，也决不是因为受了别人的煽动。”

一年以前，我为了《马克思主义讲座》的演讲会上东京的时候，是我内人陪我去的，这在前面已经提过了。后来事情办了，从东京火车站出发回京都的时候，我的大舅子来送行；据说当时他曾提醒我内人：“肇弟还是不要再来东京的好。”站在至亲的立场上，自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吧。我内人对于我的再去东京，十分耽心。所以，到我临动身，在楼下放衣櫥的四张半席垫的那间屋子里换衣服，一切都已装束停当的时候，我内人仿佛又记起了那句话，拉住了我的袖子说：“可不可以暂时不去东京呢？”她那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我的肝火，我大声斥责道：“说些什么糊涂话！”这是我的坏脾气（我从小就肝火大，上了年纪也还是改不掉，一点也不像我爸爸，没有他那种温和性子）；其实那时我自己正由于不愿去东京而在为难，心里不想去，却又觉得有非去不可的义务，这个义务感推动着我，受到它那股力量的推动，好不容易才下了决心，而结果却从旁受到阻止，于是心里大不舒服，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由于我骂她糊涂，她似伤心非伤心、似可怜非可怜地哭了。当时她那个哭泣的样子到现在我还忘不掉。从那以后，她所受的辛苦，简直是不能和大学时代

的同事們的太太相提并論的；所以我經常想，我到死的時候，一定向她說，多謝她長期的照顧，然後結束自己的一生。

現在想起來，這個時候，就是我結束我的寧靜的書齋生活、對我說來有歷史意義的時期。我出席了那次大會，也就對社會普遍地表明了我的態度。從此以後，我以一個漸入老境的衰弱的身軀，閱歷了讀書人所少見的波瀾重疊的生活。

出席新黨成立大會——第一次被捕

關於新黨成立大會的事，《入獄記》里已經詳細地寫了。現在讀起來，覺得寫得很不差，一點都不用改動。不過，在寫《入獄記》的時候，總覺得不用小說體裁來寫也許不好，所以就用本田弘藏的名字，把自己寫成了第三者。現在把這種地方稍稍改動一下，大體上仍然照舊稿的樣子抄在下面。

12月(1928年)22日的早晨，隔夜到東京的我，走出神田淡路町的關根屋旅館(這個旅館是我到東京去時經常住的旅館)，去到本所公會堂。第一次到這種地方的我，看到會場附近戒備森嚴的樣子，神經先就緊張了。

因為警察還沒有允許進入會場，所以大門緊閉，許許多人三五成群地逗留在附近。那天我穿的是整齊的日本服，腳底下趿拉着一雙麻里草屐。我已經多年不穿西裝了，可是因為出進西洋式房屋不方便，所以身上即使穿的是日本服，腳下却不穿木屐，而用粗糙的草屐代替了皮鞋。(人的服裝是由生活規定的。近來進入“戰時體制”以後，日本女子也穿起裙褲來了。後來，我參加了無產階級運動的實踐，也翻出舊西裝來穿了。可是那天，我還像上大學去教書時那樣，穿着日本服。)四下一看，全是些穿西裝的年輕

人，像我这样穿着拉拉攀攀的老古董的老年人，一个也没有。因为看来看去都是陌生面孔，没有一个认识的，我茫茫然地站立了一会儿，觉得乏味，就在路旁蹲下，从外套的口袋里摸出纸烟，开始吸起来。这时，人群中间有个绅士看见了我，走到我身边来。他是京都市选出来的旧劳动农民党的議員山本宣治。

“你好！”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

“躲在家里，心里不安，所以打起精神跑来了。”

“那太好了。”

“你的身体近来可好？”

那时的山本，利用他的国会議員的长期免費火車票，东奔西走，到处出席左翼工人农民的集会，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力量。那次大会，恰恰是他遇刺前的一百天，他忙得就仿佛赛跑快要跑到终点的时候，拼命往前冲刺一样。他本来是个生物学者，身体原来就不那么强壮（少年时代由于身体虚弱，上中学就半途退了学。那时他害的是坐骨神經痛），所以我一见到他，就势必至于先問他的健康状况。

“不知怎的，这个地方痛得受不了，勉强忍耐着作点工作罢了。”

他一面說，一面指着腰部給我看。

“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担子格外重了。不过身体也要保重才好。”

我用这些话宽慰他。同是京都市选出来的劳动农民党的議員，另外一个水谷长三郎，看到形势不利，馬上就抛弃了左翼陣营，撇下了山本一个人，自然不会同山本一道来参加这个大会。后来，水谷不仅沒有遭到暗杀，还屡次当选，到今天这个战争非常时期，

依然还是众議院議員。本来，一度和左翼无产阶级运动发生过关系的人，尽管小心翼翼地老早逃避到安全地带，但是由于情势变化得过于急剧，所以多少总要受到一点擦伤，唯有水谷长三郎，才是最善于明哲保身的人。一想到当年的事情，到现在还觉得人的生活方式真是无奇不有。

看到我和山本站在那里讲话，有一个人从人群里走到我们这边来。这个矮矮的、其貌不扬的绅士，就是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細川嘉六。他也是特地从大阪赶来的。

我站着有些吃力，重新蹲下来，和細川攀谈。还记得那地方似乎是河边。‘公会堂在哪边，已经记不清了；旁边的那条河，似乎是隅田川。

我们谈到了双方共同的朋友櫛田民藏。对于他的没有来参加这个大会，我们两人都不期然而然地觉得很遗憾。老早就大家手挽手地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櫛田，是我和細川的最好的朋友，可是随着日本国内革命情势的高涨，櫛田的态度，与其说是逃避，倒不如说是反动，而近来，他的这种态度日益露骨，因此我们当时都对他不大满意，都逐渐和他疏远起来。去年竞选国会議員的时候，我们在香川县就没有碰见櫛田，今年这个大会上又没有见到他。

櫛田是我任教二十年的京都帝国大学的最初的学生。（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我在《河上肇给櫛田民藏的书简集》的草稿的开首，已经详细地交代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下面的一些话，和《入狱记》草稿里所写的大致相同。）他初进大学的时候，由于经济困难，来找我给他想办法赚些稿费，我满口应承了，从此以后，他经常到我的地方来，往往清早来了，一起吃午饭，再吃晚饭，直到深更半夜才辞去；我所教过的学生中，关系这样密切的，没有第二个。所以，有一个时期，我们中间的关系，几乎和亲兄弟一样。櫛田在

京都大学毕业以后，当了东京帝国大学的讲师；那时每逢我去东京，他总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去看亲戚朋友，他也跟着去，立在人家门口等候着，最后把我接到他自己的寓所（那时他还没有结婚，租了一幢房子和一个雇来的老妈妈住在一起），高高兴兴地留我住上一夜。生平从来没有给人家做过媒人的我，他结婚的时候，第一次给他做了媒人，在结婚典礼上还真心真意地致了祝词。我们中间的交谊就深到这样。但是，这些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阶级斗争的激烈化，使这样的朋友关系都产生了裂痕。现在，我和他已经十分疏远，以致尽管我来到东京，也互相不通个消息。

那时櫛田是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因为负责东京方面的工作，所以长住在东京。细川是同一研究所的研究员，在所里和櫛田最亲密，虽则在结识的时间上比我晚得多，但是他们两人中间的关系，也同样和亲兄弟一般；细川每次到东京，总是住在櫛田的家里。

“您这样大岁数，都特地从京都赶了来，住在东京的櫛田反而不见面，真是说不过去。近来无论和他说什么，总是专门拿些挖苦话来应付，既不能认真同他商量些什么问题，见了面也不痛快，所以我即使到了东京，也不去他那里。”

细川一面这样讲着，一面露出忿忿不平的神气。

我也附和着说：“我们大家都是读书人，这种卑鄙的态度是不应该有的。我们这些人，和年轻人不同，上了岁数才遇到这样的过渡时期，大家实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才好；要是老朋友能开诚布公地大家商量商量，又多好呀，可是这一阵的櫛田，实在太不行了。”

我们正在讲话的时候，到会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一会，会场的大门开了，外边的人都走了进去。正面进门的地方，从高高的屋脊

上悬下一幅大白布，上面写着“劳动者农民党成立大会”几个大字。被解散了的旧党，叫做劳动农民党；因为必须和原来的名称有所区别，所以才叫做劳动者农民党的。原来那个名称，也可以解释为劳动的农民的党，以前我一直嫌它不妥当，现在这样一改，我觉得就要好一些。我一面这样想，一面跟着招待员走进扶梯尽头的演讲者休息室。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走进会场一看，会场的前部，是全国各地代表席，后面是听众席。我就坐到奥村甚之助、山本宣治一些人所占据的京都地方代表席里。在演讲者休息室里已经让“无产阶级摄影班”拍了一次照相的我，这时又被拍了一次。听众席已经坐满了人。会场里到处都布置了警察。

会场呈现出一副活跃景象，真可以说是意气冲天。田中内阁在三·一五事件后不久，仓惶地公布了一道紧急敕令，来修改治安维持法，照原来的法规最高判有期徒刑十年的，现在提高为死刑；可是人民群众的革命高潮并不因此而消沉，这个大会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肚子里一面这样想，一面以惊异的眼光热心地注意着大会的进展情况。

各地派来出席大会的代表的情况报告，一个个都被在场监视的警察勒令中止了；发言被勒令中止的代表，又一个个被逮捕了。一个演讲者被勒令中止发言、被逮捕之后，马上就由另外一个演讲者接着他的话讲下去，几分钟以后，又被勒令中止和逮捕，这样的等到一地方的几个代表全都被逮捕到警察署里去了以后，那个地方的情况才算勉强给听众们留下一个约略的印象。被逮捕的人中间，也有和警察大打出手的。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我，感觉到十分吓人。

要是让英国人——如果举行什么集会时被捕了几个人，英国

人馬上就会把它看成国际新聞的材料，拍电报到国外去——看到这个場面，一定吃惊非凡；可是在封建制度的老根子扎得很深的日本，左翼运动中逮捕几个人，不算什么一回事，而且从这次大会以后，逮捕得愈来愈凶了。不过，在一次集会上捉去那么多人，却几乎是空前絕后的。

这样杀气騰騰的集会，对于我来说，当然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我长期在大学里教书，教室里哪怕有一个学生大声打个呵欠，我都会当下停止那天的授課；就像这样，我的神經，平常已习惯于宁靜的空气。而那天會場的空气太吓人了，我簡直受不了那紧张的場面，所以时时退到演讲者休息室里，休养一下神經。

第一天正当會場的紧张空气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我被指定致祝詞。当报出我的名字的时候，滿場热烈鼓掌欢迎，那种盛况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是的，这样热烈的欢迎，以后也一次沒有遇到过），我自己也异常兴奋，走上讲坛。那一天，平常演說会所用的那个高高的讲坛，做了議長席，上面坐着大山郁夫，旁边設了記錄席，演讲者的讲坛，只是在平地上放一张桌子；可是为了我，却特地用啤酒箱子把站的地方垫得高高的。这样一来，前面放的那张桌子，对于瘦长的我，就显得非常低，两手都沒法支撑。不得已，我只好把手抵在腰里，稍稍向前弯着，来支持自己抖动的身体。我素来有个毛病，只要稍稍受点刺激，脉搏馬上加剧，身体发起抖来，在学校里教了多年书，平常站在讲坛上讲課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总是张开两手撑在讲坛的桌子上，借以支持着身体。可是有一次給人做媒人，在平安神宮举行神前結婚时，却要两手捧着紙头，站在那里朗讀，当时身体抖个不停，簡直不成体統，我也慌了手脚。因为我有这个毛病，所以在这次大会上，由于极度兴奋，想必身体一定在发抖。可是會場的气氛却使得誰都不再注意这些地方了。

本来，我平常的作风，即使在竞选演说时，也都预先仔细地写好底稿，到时候一字不差地照着读。可是，唯独这次，因为是临时邀请，没有写好底稿就得演说。自己心里思忖，好歹讲不了几句就要被勒令中止（对于体力衰弱的我，在这种场合，早点被勒令中止发言，反而合适），所以，我一开腔就拉高嗓门，喊出下面一番话。（这时第三次被拍照。）

“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天，阶级斗争就是一天也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现象。从而工人农民的斗争组织，在现代也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产物。尽管利用权力加以破坏，它也将一个接一个地不断产生出来。目前这个大会就是最明显的证明。今天的大会，完全证明：阶级斗争万岁，工人农民的斗争组织万万岁。”

讲到这里，正在思忖接着该讲些什么，就立刻被勒令中止了。会场里又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我在掌声中平静地走下讲坛。发言虽则被勒令中止，却没有被当场逮捕。

大会虽则受到极大的镇压，却还是连续开了两天。虽然随时都有被解散的可能，可是第二天各地的情况报告却仍然一个接着一个进行，总算结束了预定的议程。上面已经提到，政府当局本来也就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看有哪些人物来参加这次大会，制出一幅左翼阵营的鸟瞰图，所以尽管施加极度的镇压，却故意不下令解散。不用说，凡是来参加大会的，都得在会场进口的地方写下自己的住址、姓名和职业。

第三天上，情况就完全变了。那天一清早，我到达会场的时候，看见出动了大批警察，排成队点着名，就觉得有些不对头；那种情形，几乎令人错认作军队出动了。进入会场的人，排成一字长蛇阵，两边被密密层层警察包围着；进门的时候，每人都受到身体搜查，携带的手杖之类的东西，都被搜了去。戒备森严已极。

走进楼上的演讲者休息室，先到的大山郁夫說：

“大家正在猜测你今天无论如何不会光临，却竟然光临了！”說完，张开嘴发出忠厚的笑声。他那句話的意思，是說沒有料到从未上过陣的我，居然会一連三天来到这样杀气騰騰的會場；其实呢，我正由于从未上过陣，所以才来了，假如稍稍懂事些，今天說不定就躲起来了。这时，我刚刚在椅子上坐下，十几个警察突然拥进了休息室，把四周包围了，宣布說：“不准讲一句話，也不准动！”房門也喀嗒一下鎖了起来。再一看，那些警察都扣上了盔帶。

后来才听說，就在同一時間，大批警察一下子拥进會場，密密层层地把四周包围了，只留下一个出入口，其余的門都上了鎖。那时还没有开会，該管地区的警察署长带着佩劍跑上讲坛，大声宣布解散集会。把會場挤得站都没有地方站的听众，被分成一批一批，隔一定的時間，让慢慢地退出會場。这样，費去很多時間，听众才走光。會場附近，沿路每隔十尺八尺，就有一个警察；重要处所，警察更多，这些警察不让會場里出来的听众有片刻集合的机会，把他們向四面八方撵走。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听众蜂拥到銀座大街，举行示威游行，和警察队冲突了。

等到听众全部散完，各地代表差不多全被逮捕，會場里不剩一个人的时候，警察才开始来对付休息室。好久被鎖在里面而和听众隔絕了的人們，几个人一批、几个人一批地被逮捕。可能是由于押送的汽車不够，所以隔了一些時間才押走几个。

最后只剩下我和旧劳动农民党的中央委員上村进律师两个人。我暗想也許我們两个不致被捕，哪里知道两人照样被装进汽車，解到附近的警察署里。当时報紙上曾登出一段消息，說我走进警察署的时候，問这里是什么地方，把我形容得犹如三家村上的老学究。其实警察署我总还知道，我問的只是那是哪里的警察署而

已。那个警察署是相生警察署。我的被关进所谓猪箱（拘留所的俗称），这是第一次经验。

安装着铁丝网的拘留所的房子，全都沒有窗門，白天都是漆黑的；屋子里面已經挤满了許多出席大会的代表，只看见黑黑的脸。我一走进去，就听到有人低声說：

“先生来了，先生来了。”

最初我就被关在一間这样的猪箱里，里面有几位从四国地区来的代表，因为寒冷，就把大衣放在一起，把腿塞在里面。給大家一让，我也把腿塞了进去。不久我和上村被移到隔壁的一間称为保护室的屋子里。这里有席垫，又有窗戶，比别的猪箱好多了。我因为感到非常疲倦，把外套盖在脚上，就在席垫上躺倒了。后来我作为日本共产党员而被关在中野警察署的时候，整天只准端坐，而关在相生警察署的时候，却还有这一点自由。

吃午饭的时候，监视的警察跑来問要不要从外面叫匣子飯。我回答說：“不用从外面叫，就吃公家的匣子飯好了。”别的漆黑的监房里，也低声发出“同意，同意”的声音。可是結果，匣子飯发下来，我只吃了一小半。吃得精光的上村进，笑着对我說：“吃不下去么？”

那天我本来打算乘晚上的火車回京都：被搜去的錢包里，还放着預先买好的臥鋪車票。結果恰好在我赶得上乘那班火車的时候，我和上村进两人都被释放了。

跑到东京火車站，在食堂里边吃晚饭边看晚报，看到晚报上登有“河上博士被捕”的大标题消息，消息說，新聞記者問警察署长：“为什么要逮捕河上肇呢？”警察署长解释說：“因为他讲了那些激烈的話，有必要加以調查。”可是实际上却什么也沒有調查，只是因为那时我辞去大学教授的职位还不久，而且当时的时势也还没有

极端法西斯化，所以尽管不过把我拘押了半天工夫，也成了重大的新聞資料，警察署方面也不得不对拘押作出解释。事隔十几年的今天，回想起来，簡直有隔世的感觉。到东京火車站来送行的我的弟弟左京，还没有看到晚报上的消息。“今天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哩。”我一面把晚报上的消息指給他看，一面說，“真是個盛况空前的大会，要是你能来看个一天，长长見識，又多好呀。”正在說着，有个姓宇都宮的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提了一个棉布大包袱走了过来，說道：“先生，請您把这包东西带回去。先生带去，保險沒有問題。”問他包袱里是什么东西，他說是《无产者新聞》。当下我就拒絕說：“这种东西，现在不能带走。”那时候这份报纸是每期都被禁止发行的，可是仍然用了种种走私的方法散布到全国。这个学生是宇都宮大将的儿子，那时他和鈴木安藏、大門英太郎等一些人，每星期要到我家里开一次研究会。这些人后来都曾坐过牢，但是当我从監獄里出来的时候，宇都宮做股票生意发了大財，以此为基础，轉变为相当成功的企业家，和一个在中国东北起家的大名鼎鼎的实业家的女儿結了婚。時間隔了十年，由于境遇的不同，一个人的目光、脸上的筋肉以及言語举止，都会变成另一个样，这实在太使人惊奇了。人的本性固然不大容易变，可是它的表现形态的变化又多么大呀。

那次出席新党成立大会，是我一生的里程碑，所以凡有想到的东西，不加选择，全都写了出来。现在一想，这个大会，乃是人民大众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举行的暗中支持日本共产党的最后的一次集会。从此以后，直到将来革命的前夜，这样的集会，恐怕不会有第二次了吧。我在向实践靠攏的最初阶段上，居然能列席于这个稀有的大会，到今天还觉得幸运得很。对于实际运动完全还是初出茅庐的我，一下子参加了这样的大会，作了毫无准备的发言，而且

沒有犯什么錯誤，真是偶然的侥幸。假如那时我一命嗚呼，那末也許可以在实际运动中不犯什么錯誤，蓋棺論定，让人家同情我这个馬克思主义学者的一生吧。說不定还是那样好些。可是，从那以后又多活了十几年，现在过着这样清閑的生活，写着这样的回忆，我觉得也不坏。

处在封建制度的残余根深蒂固、个人自由絲毫不受尊重、警察万能、軍部专制的日本帝国主义統治之下，因演說而被捕，簡直可以說是家常便飯，不算什么一回事，不过那时我个人的行动，由于那次集会的性质以及我的社会地位，却引起了人們很大的注意，給与社会一个連我都没有料到的反响。

这事一直传播到了国外；我在会场里拍的照片，德国杂志上都登載了。大会第一天，“无产阶级攝影班”由于好奇，时时給我拍照。内中有一次是在演讲者休息室里拍的，四个人拍在一起。依照攝影师的安排，我右边坐着大山郁夫，左边坐着山本宣治，当时奥村甚之助站在我們旁边看，我就招呼他坐到山本和我的中間。奥村这个人，曾担任在日本工人运动史上留有光輝一頁的日本工会評議會刚成立时的中央委員长（尽管只是一个名义），是一位工人出身的老战士，那天是作为京都地方的代表而出席的。后来形势越来越困难，本来也就不是馬克思主义者的奥村，逐漸地亏损了他的晚节，等到当选上市會議員和府會議員，就扔掉了从前的便帽和工人服装，换上讲究的日本服，嘴里啣着牙签，逛起窑子来了；一向在人前夸耀的参加罢工的話，也絕口不提了；最后还搞了小老婆，也許是喝醉了酒吧，在铁路和公路的交叉点，让火車撞倒，他那頑强无比的肉体就此完結了。可是那时他却还是留在左翼陣营里，沒有像同是京都出身的水谷那样一看见风头不对馬上逃走，我由于尊敬这位富于斗争經驗的老战士，所以招呼他坐到自己身边

来。德国杂志上所登的照片，就是这四个人照在一起的。那张照片上面，大山側身向左，双膝靠着我；山本等側身向右，同样望着我；夹在中間的我，稍稍低着头看向前面。四个人中，穿日本服的虽則只有我一个，可是因为外面罩着外套，大鈕扣照得很清楚，所以日本服还不怎样显眼。我脸上隱然有一副悲壮的神色，相貌看去比实际年龄还大。表现了轉变期的我的神采的那张照相，我把它当作紀念品保存很久；后来銀座一带图片店里长时期出售的我的相片，就是从那幅照相上翻下来的。刊登着我的照片的那个德国杂志上，还附有一段相当长的文字記載。

那次大会的消息，也許一直传到了莫斯科。因为过了不久，想不到苏联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李亚扎諾夫給我來了一封誠懇的信，到现在我还认为这是我出席了那次大会、表明了我的态度的反响之一。那封信上說，如果我需要什么文献，只要去信告訴他，他就会寄來，还把經由德国轉信的通訊地址开給了我。全文是打字机打的，最后由他亲笔签名。那封信，本来保管在我小舅子大塚有章的手里，后来据說在他轉入地下工作的时候烧掉了。

〔补記〕1944年12月24日，李亚扎諾夫那封信，刚巧在它写后十六周年，偶然又回到了我手里。原来是大塚有章交給我另外一个小舅子末川博的。末川也完全不記得大塚曾經交給他这样一封信，当他清理旧文书的时候，想不到同样在12月24日这一天发现了这封信，就把它送来給我。原信內容如下：

亲爱的先生：

据聞您正在着手从新翻譯《資本論》的工作，不管现今这样一个时势，还是热心致力于科学的馬克思文献的編輯，而且听說您正忙于这件事的准备工作。

我极願意知道这件工作的进展詳情，以及有关編譯計劃的詳情。

如承撥冗賜示數行，我將非常感謝；也許我能對您有些幫助。總之，您將發覺，我對於久經考驗的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是始終極願盡我的力量，予以一切援助的。

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長 D. 李亞扎諾夫

1928年12月24日於莫斯科

又：我這封信是繞道德國法蘭克福寄發的。您可能也不願意把您的復信直接寄給我，無妨利用同樣的途徑，其通訊地址如下：Marx-Engels-Archiv, Verlags-gesellschaft m. b. H. Frankfurt, Börsenstrass 17。

下了最大決心才到東京去出席那次大會的我，回京都後，精神很好。——大學教授這個行業，就好比冬天鑽在炬燵^①里過活的人。雙腳一旦伸進炬燵，就懶得站起來。可是如果振起精神，跑到外邊去試試，漫天風雪的日子，却也並不怎樣冷。不，豈僅不冷呢，屋外還展開著一幅雄偉的景色，是那些終年離不開炬燵的人做夢都想不到的。回到京都以後的我，曾經這樣想過。

列寧說：“做出‘革命的經驗’，總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我現在寫著這個回憶的時候，才似乎懂得了這句話的意義。上面也曾提起，列寧的這句話，是十幾年前硬把躲在書齋里的我推向街頭的一個動力；可是那時我怎樣也不懂得“更愉快”這三個字的意義。我當時這樣想：像列寧那樣偉大的人物，才能做到這樣；另外還有一種人，雖說並不是十分了不起，但是由於個人的性情脾氣，也許會覺得在外面搞實踐工作，比坐在家里寫東西愉快得多。但是，對於我來說，搞實踐工作實在是一件苦事；可是雖則是苦事，如果是應盡的義務，那就沒有辦法，只好跑出自己所愛好的書齋，去碰釘子。——我當時是這樣想的。不過，現在回想起來，

① 日本屋子里的一種特殊的腳爐，安裝在屋子中央，上有四方形的框架，蓋以棉被，冬天人們把腳伸在被子里取暖。——譯者

仅仅做了那样一点实践工作，作了那样一点演讲，当时我却似乎已经尝到了几分痛快的滋味。光是感到自己尽了自己的义务这一点，也就很愉快。这样说来，以前为了《马克思主义讲座》而去东京也罢，选举国会議員时去香川县助陣也罢，尽管疲劳，也并非完全没有使人感到快活的地方。再说后来过牢獄生活，事后回想起来，也并不怎样苦。这样看起来，这倒有些像登山。比起登山来，躺在床上，身体当然要舒服得多。可是，越是峻险崇高的山岭，当爬上它的最高峰的时候，那种痛快的感觉，却是那些钻在炬燧里的人所不能想像的。我生来体弱，心脏尤其不好，也许終身不会領略到攀登最高峰的痛快滋味；可是有些年轻小伙子，为了登山，往往不惜抛弃自己的生命，大概就是因为登山有那样巨大的吸引力的緣故吧。

勉强从书斋跑出来的我，几年以后弄得坐进牢监，现在想起来，大概也是因为书斋外面并非全是苦事的緣故。

反映在《社会問題研究》中的自己的心境

我向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靠攏，后来似乎突然加速了步調。我自己几乎完全忘掉了那时的确切情形，好在留有一部分记录（大都是发表过的，也有一些是未經发表的草稿），现在就根据这些记录，把我所想到的写在下面。

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变化，相当正确地反映在《社会問題研究》里。脱离大学不久的1928年6月，該杂志第八十五期的卷首有一篇《为本刊复刊告讀者》，在那篇文章里，我說，本来“我觉得这个杂志說不定只好永久停刊，而且永久停刊了也好”，不过近来“我辞去了大学的教职，于是一方面觉得有必要繼續出版不妨称作我的私

人讲座的这个刊物,同时也获得了这样做的空闲,所以现在就重新把它办下去了”。可是,仅仅经过半年,到了1929年,在它的1月号(第八十九期,后面印的出版日期是2月1日)卷首的一篇《站在风暴中(为本刊革新告读者)》里,开头就说:

“本刊创办以来,到今天刚好满十年;乘此机会,我计划把我对它的编辑态度根本改变一下。我过去一直把这个刊物当做自己一个人的独占性著作。仅仅只有一次,登载过大学同事和辻哲郎关于京都学生事件的文章,除此以外,从未登过别人写的东西。可是从这一期起,却不仅要借重同志们力量,而且要使本刊成为同志们的共同的刊物;我自己要从它的著作者一变而为它的编辑者。实现这样一个变化,我认为是当前的社会形势命令我这样做的。我必须服从这个命令。”

然后接下去叙述了当前的社会形势,最后说:

“这种现实所规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首先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启发,必须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化。

“当前的社会形势,要求我们这样做。也许是日本最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我,处身在这个空前的苦难时代,为了不辜负向来所学的东西,顾不到力量薄弱,内心里立下誓愿,决心要完成这要求的一部分。本刊的革新,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实行的。

“自然,本刊并不能直接完成上面所说的那个伟大任务;可是,站在风暴中,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尽管是间接地完成这种任务,但将作出竭尽全力的贡献),我却要比以前更有意识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正因为这样,所以本刊从这一期起,将不再是仅仅一个人的‘个人杂志’,而将对广大的全体无产阶级群众开放门户,欢迎大家投稿。

“本刊的上述种种任务,特别是在封建的检查制度和资本家的

出版事业的双重桎梏之下，并不一定能輕易地完成。可是，从1819年1月本刊第一期发行以来，到今天恰恰十周年了。这十年中間，我独力維持了它的出版。为了有意識地完成新规定的各种任务，本刊还会遇到某些困难，但是我相信，依靠同志們的协助和全体讀者的支持，那些困难一定会被一个个地克服。”

这第八十九期的封面，把历来的“河上肇著《社会問題研究》”改成了“河上肇編輯《社会問題研究》”。而从下一期即1929年3月号起，“河上肇編輯”这几个字也取消了；原来用阴文明体字印的刊名“社会問題研究”这几个字，也換成了那时一般左翼出版物上所流行的柳瀨正梦的长了角似的古怪的字体。另外，封面上的目次的上方，第八十九期印的是“昭和4年1月，1929.—№.89.”，而第九十期印的却是“1929年3月—№.1.”，期数也印成“第九十期（更生第一号）”；还有，版权頁上的編輯兼发行者，历来用的是弘文堂书房老板八坂浅次郎的名义，而第九十期以后，却改用鈴木安藏的名义。

另外，第九十期的卷首还刊载了如下的一篇《关于本刊今后的編輯和发行》。

“关于本刊的革新計劃，上一期在‘站在风暴中’里已大致宣布了，幸而获得了工人同志們的热烈支持。本期以后，我打算进一步把这个刊物的編輯工作全交給东京的同志們担任，发行所也移到东京的上野书店。这样做，本刊才能和活生生的运动密切地結合在一起，成为我們馬克思主义陣营里的写作活动的統一鎖鏈中的一环，而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一手創办的这个刊物，到上期正好滿十周年；现在想起来，当时这个刊物，作为个人編輯物，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假如还要使它有意义地繼續办下去，就非注入新的生命不可。为此，要求——

个通过飞跃式的转变的更生。可是过去的本刊，由于处在现实的运动比今天幼稚得多的时代，而大学教授的身分又使我受到种种拘束，因而只能以个人著作物的面貌出现，这在许多方面都成了本刊飞跃发展的桎梏。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今天，共产党公然出现在大众面前的今天，白色恐怖猖獗一时的今天，要靠我一个人来维护本刊的健全成长，已经不可能了。上面所说的关于编辑和发行方面的措施，完全是鉴于此而实行的。

“十年来只手培养大的像我爱儿一般的本刊，现在交托给了可靠的同志们，从此得以发挥它的能完成有意义的使命的作用，我是十分放心的。今后我甘心情愿地追随于同志们之后，为了使本刊继续成长，誓必竭尽我的最大努力。”

六十六岁的今天，抄着十几年前写的这些文章，回想到当时的种种情景，连自己都觉得当年的我真是又可怜又可悲，只能悵然搁笔，抱膝兴叹。——当时我已经年过五十，过去一向像另外一篇文章《不善于过日子的我》里所写的那样，长年关在书斋里，连买鞋帽都听凭我内人一手办理，对于世故几乎一窍不通，像我这样一个人，却突然在空前大镇压之下，急着希望和非法活动保持联系，结果上了别人的当，吃了别人的亏，我觉得那是完全应该的。这就好比生长在深山中的土老儿，上了岁数，为了想和洋鬼子做秘密交易而第一次来到商埠那样，要是没有信得过而且经验丰富的老诚可靠的帮手给做向导，那就准定会上当；可是那样的凑巧的帮手却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跑来给做帮手的，既然不是至亲，他们的目的，就不外乎是看中了土老儿身上的那个沉甸甸的錢袋罢了。

我离开大学不久，鈴木安藏开始常常到我书斋里来。他进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没有多少时候，就因所谓京大学生事件^①而

^① 指1926年1月日本学生运动的全国性组织“社会科学联合会”受到反动政府

被捕，据说直到那时才释放，突然来看我。至于被捕之后一向关在哪个刑务所或警察署里，他自己从来没有主动讲过，我也始终没有问他。后来由他发起，在我家里每星期举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常到会的，除了铃木以外，只有宇都宫和大門两个京都帝国大学学生；偶然来参加的，是另一个京都帝国大学学生平井羊三（这个人始终没有去服徒刑，1943年的今天，据说在御用的什么翼賛会壮年团帮忙），还有我的小舅子大塚有章（他是每次从大阪赶来京都参加的，后来——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辞去了银行里的工作，住到京都，随后就走向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

铃木安藏是个头脑明敏的学生。他的关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学，比我还早。再加，他有过被捕的经验，又有坐牢（虽然坐牢的地点无从知道）的历史，所以当时我简直对他赏识透顶了。在下面，我要直直爽爽地写出事情的经过。他到现在还和我通信，写得太露骨，本来有点不好意思，可是现在除了照实写而外，没有别的办法。

记得在《回忆》的什么地方曾经引用过，赵翼在《甌北诗话》里批评苏轼说：“东坡襟怀浩落，中无他肠，凡有一言之合，一技之长，辄握手言欢，倾盖如故，而不察其人之心术，故邪正不分，而其后往往反为所累。”这里攀出一个大文豪，似乎有些不自量，可是当我看到这段文章的时候，心里就想：自己正好是那样一种人咧。的确，我也是这种脾气，就是“凡有一言之合，一技之长，辄握手言欢，倾盖如故”。记得有一次曾经和津田青枫谈起过，他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人，总是先给打个零分，后来相处久了，分数就逐渐打得多起来。而我呢，恰恰相反，第一次见面的人，往往一下子就给打上一百分，

的大镇压的事件。因为被捕者以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占多数，所以通常把它称为京大学生事件。——译者

后来相处久了，感到失望，就把分数一点点地减少。年轻时候第一次和伊藤証信见面时，是这样；关东大地震后，1924年画家津田青枫突然来看我的时候，是这样；后来和劳动农民党的大山郁夫结交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一次和鈴木安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还是这样。那时我正当脱离大学不久，老是呆在书斋里觉得呆不下去，心里开始希望采取个什么方法，哪怕間接又間接也好，使书斋里的写作活动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互相结合起来（那时我的心情，上面抄出的《社会問題研究》第八十九期和九十期的那两篇卷头語，最能表达），而正当这时，鈴木来同我談起这个问题，恰好投合我的心意，于是他的建議，我就完全听从了。要是让杉山平助說起来，这种地方，就是他所說的“河上是誰都能牵着他的鼻子走的”。

在这里，我記起了一件事，足以說明当时我对鈴木（同时也是鈴木对我）的态度，现在就把它写出来。在我家里开上面所說的那个研究会的时候，我們大家总是坐在席垫上，围着一个大火鉢談着。独有鈴木一人，却往往搬一张椅子来坐，而且把他的一双脚擱在我們大家烘着手的火鉢边上烤着。我的年紀比他几乎大三十岁，而且尽管時間很短，仅仅是在形式上，我們中間也一度有过师生的关系。而当我和其他的人一道坐在那里烘手的时候，他却在火鉢上烤他的臭袜子；尽管我把他当作同志看待，他的态度也未免太放肆了。当时我心里似乎对这件事不太高兴，所以到现在我还記得。像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記在心里，也許要让人家笑我器量太小；不过小器就小器，这个《自画像》的目的，正是有什么写什么。

现在回头再說鈴木对我提出的建議，他认为《社会問題研究》这一刊物，现在必須“和现实的运动密切結合，而包括在馬克思主

义陣营的写作活动的統一鎖鏈之內，成为它的一环，以完成它的任务”。我自然毫不躊躇地听从了他的建議。不过，那样做的話，除了把《社会問題研究》交給鈴木之外，沒有別的办法。当时我以为他是共产党员。那时日本共产党对于党员的标准，抓得不紧，原先的京都帝国大学学生或现在在京都帝国大学讀書的学生，曾經受到学生事件的牽連的，就不消說，即使不是这样，不少学生也已經成了共产党员，所以我把他当作党员，并不一定是缺乏常識。至少，听他的口气，他和共产党员有联系，而且通过这个路子，和党的干部也有联系。把《社会問題研究》交給他办，完全是出于这样的設想。

事情既然商量定了，他說他必須搬到东京去住，而且《社会問題研究》的編輯和发行也非在东京搞不可。結果他让我給他出了旅費，因为怕累，火車还是坐的臥鋪，到东京去，和他老婆在东京郊外租了一栋漂亮的房子住了下来。那时我坐火車已經改坐三等，所以連这样細微的事情都記在脑子里。

同鈴木的联系，由我的小舅子大塚負責。因此，在京都东京之間，他来回跑过許多次；而在东京要和鈴木碰头，总是費尽周折。預先約定了碰头的地点和時間，算准了時間去到指定的地点——多半总是新宿的高級吃茶店——等候着，鈴木随后也来了，可是坐下来才喝过一杯咖啡，他就小声小气說：“哎呀，这可不好！”就此自管自走了。大塚急忙付了茶錢，赶到街上一看，已經連影子都不见了。就像这样，大塚不知被他故弄玄虛，撒下过多少次。大塚这个人，本来不像我这痴呆懵懂的糊涂虫，后来他成了共产党员以后，轰动一时的大森事件，^①就是他負責搞的，以他那样大胆泼辣的手

^① 指1932年10月的搶劫事件，即日本反动統治階級派遣奸細混入日本共产党中央、为了削弱日本共产党的威信、指揮大塚等白昼持枪袭击东京大森的川崎第百銀行支店、夺取資金的事件。——譯者

腕，照說又何至于上鈴木的當呢；其實不然，那時他還剛剛拋棄了銀行行員的職業，對於非法的地下活動，也和每一個普通人一樣，一點都不懂。因此，對於鈴木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那種舉動，還一心認為是讓暗探釘梢，有被捕的危險，才那樣脫身的。不過，到後來才明白，鈴木的這些舉動，只是為了要顯示他的了不起而施出的騙局罷了。真是丟人的事！

《社會問題研究》的編輯工作交給鈴木以後，每月書店送來的編輯費也讓他了。這個刊物原來是我個人的寫作，書店方面不費一點事，只要登出一個小小的廣告，每月就可以銷行幾萬份，而且零售店沒有一本退回（普通的雜誌，每出一期新的，就把賣剩下來的一期退給發行者，而退回的那些雜誌，都成了廢紙，所以收支的計算很困難），對於書店來說，實在是一棵搖錢樹。而我當大學教授的時候，並不需要錢，所以不同書店講什麼條件，他們送多少來，我就收多少。不過，儘管如此，每寫出一期，我總可以獲得大學教授薪俸一倍以上的稿費。而現在，這筆稿費全部變成鈴木的了。他拿這個作為財源，似乎曾經搞過一個左翼作者的小集團。

現在還留下那時所寫的一封信（那封信是1933年11月發行的某雜誌上鈴木安藏寫的一篇《進了牢監的河上先生的回憶》中所引用的）。順便就把它抄在這裡。對於那樣一個在咖啡店里裝腔作勢的青年，老头兒的我，竟一本正經地寫出這樣的信，自己這時實在覺得傷心。

“你的忠告懇切之極，有滲入骨髓之感，實在感謝得很。學生事件那年，弘文堂送了我一本特制的備忘錄，只用了几頁，後來住宅受到搜查的時候，這本備忘錄的各頁也讓警察檢查了，於是我把用過的地方扯了下來，後來一直放到了現在，今天偶然取出來翻翻，看到內中有一條說：‘收到無名氏來信。’並且抄錄了你的來信

的一节。(河上按：那个备忘录上说：‘1929年1月25日，收到无名氏来信。’下面抄录了来信的一节：‘……我认为您现在正站在也许是您一生中最最困难而且最最重大的转变关头。这转变，比您脱离大学——这转变也许可以说是您脱离大学的继续，而且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还要巨大。不过，从前让资产阶级社会你呼我应地瞎起哄，而现在呢，却也许要让那些资产阶级的帮闲讨厌和嘲笑，您也许会伤心吧。我们的、同时也是您的最大的弱点能不能克服，乃是今后的迫切问题。我深信，今天许多知识分子会没落，会露出狐狸尾巴来，可是我们却会坚持到底，开辟这条异常艰险的道路。放肆得很，敬祝您的健斗——对外界的敌人同时对内心的敌人。请您宽恕我，听从我这几句话：卡尔、罗莎^①惨遭杀害之日。’)‘拼得一死而还活着，这条命是白白拾来的了’这首俳句，是我年轻时候，抛弃了一切教职，卖光了所有的家具和藏书，把妻子扔在父母身边，跑进巢鸭大日堂——在伊藤证信从乡村里的人那里借来以前，那地方是叫花子和小偷的窝——无我苑时所做的。我那时想，我的身体那样弱，往后最多还能活三年。可是，奇怪的是，后来居然当了大学教授，一直当了二十年。这就好比是我的第二国际时期，是和平的二十年。这是我的幸福，同时又是我的不幸。我在这二十年中间，由于物质生活安定，得以多少孝养了一下祖母和父母，特别是千方百计地给我那七岁上就得了不治之症的长子看病(他前年在二十四岁上死去了，想起他，现在还心痛)，也算尽了我的心，还有，由于占有大学教授的职位，著作多少对社会起了些影响，自己也多少搞了点研究工作。可是，由于过了这二

^① 指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1871—1919)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两人。两人都是德国共产党的奠基者，1919年1月15日同时被反革命分子杀害。——译者

十年和平生活的緣故，現在要一下子——恐怕是畢生中——回到早先無我苑時代的境遇或幾分和它相像的生活方式，就不是那麼容易了。當我在這樣一些客觀條件之下，脫離了大學而將進入新的生活時候，我所熟識的年輕朋友全都不在了（河上按：他們都被捕了）。近幾年來作為“人”而尊敬的同輩朋友（河上按：這大概指佐佐木惣一），幾乎像慈父那樣地親切地關懷我，可是由於立場不同（河上按：指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他的關懷，自然不能盲從。還有，近幾年來我心里一直認為在這種時候最最可以依靠的人（河上按：這大概指櫛田民藏），却意外地不中用，所以我簡直有孤零零一個人走在萬里的曠野之中的感覺。我在寫字的時候，老愛寫“青山萬里一孤舟”這句詩。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你在那個時候來到了京都，這在我來說，確實是無上幸福。在短短的交往中，你給了我許多有益的刺激，我是非常感謝的。我過去一直是幸運的，今番又獲得這樣的幸運，覺得真有點過分。

“二十六歲時所做的那首俳句‘拼得一死而還活着，這條命是白白拾來的了’，在學時代，意味着地位的丟失。這次非重新體驗最初做那首俳句的嚴肅精神不可。

“我在肉體方面是非常膽小的。小時候，遇到了人力車，儘管有祖母帶領着，還是老遠老遠就讓開了路，等候人力車通過。所以我從來沒有受過傷。僅僅有一次，在削柿子皮的時候，刀子割了手指。據說大哭了一場，那傷口到現在還留有隱隱的痕跡。此外就從來沒有流過血，所以生平不愛看到流血或熬受疼痛之類的事情。這樣一個膽小鬼，自然不能置身于馬克思所說的“肉體和肉體的衝突”的中心，在今天這樣的時勢之下，說不定最好退隱到山林里去；可是，我現在沒有退隱山林的意思，却希望始終留在勇敢的青年們

的战陣里。尽管做后备的后备也甘心，我决不走向××××××（河上按：这封信在杂志上发表时，这六个字用的是××。原文究竟是什么，现在想不起来），却要始终和自己人在一起。这事在我固然相当困难，却还是想振作起留存在这副老骨头里的几分精神，来结束我的一生。

“你对于杂志的忠告，我将永记不忘。《社会问题研究》的编辑工作，暂时就拜托你；希望你能办得使大家把它看成‘我们的杂志’。来信所提起的有关《选集》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信中提到的其他种种，也请放心。（铃木按：这里所说的《选集》，指我所译述的东西，每篇都是由先生对照原文加以修改的，所以我去信请先生至少收受一部分版税，先生就这样答复我。先生在这一年的12月里曾对我说：‘收入仅仅只有《资本论入门》的些许版税，支出却很多，单单借给人家的钱，就达八百元左右。’‘家属为此而发愁，也可怜。’还慨然地说：‘上了年纪，对于家属的这种耽心，越发厉害了。’他说这些话，似乎一半是在对他自己辩白，就是说，像这样一味耽心家属生计，虽然不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本人却摆脱不掉这种心情。我说：‘先生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先生当下就说：‘不，年轻的时候，是不会理解这种心情的。’像这样当下就驳斥我的话，前前后后只此一次，所以当时我觉得很稀罕。大概先生想到无我苑时代的抛弃一切和这时的瞻前顾后成了一个对比，同时由于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自己的生活上的不彻底感到苦闷，因而当时心上十分烦恼吧。）最近支出很多而收入极少，我答应家里的人从今年正月起，会计收支一定使之平衡，所以有一次曾对你提过一些俗不可耐的话，可是请你切勿耽心。

“小时候大家就说我养不大，二十六岁的时候又曾准备一死，想不到现在活到五十岁出头。这条性命简直是白拾来的。今后也

許还能活几时，我一定活一天努力一天，尽我的最大的心力。卡尔、罗莎紀念日的晚上。”

《社会問題研究》的事就讲到这里为止，下面要談談山本宣治的死。

山本宣治同志惨遭杀害

劳动者农民党的成立大会，上面已經說过，在最后那天被解散了，那个党名也就此不存在了；而在这一直繼續着斗争的“新党筹备会”之后，成立了一个半非法的斗争組織“爭取政治自由工农同盟”，到了1929年以后，共产党所支持的群众运动，就通过这一組織而繼續下去。（日本共产党的战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打倒天皇制为中心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革命实现后，第二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所謂爭取政治自由，就意味着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認識到在这个阶段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同盟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才采取了工农同盟的斗争組織。）

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一般說来也沒有一个人知道，其实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上，就通过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綱領”，在这个綱領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話：“我們必須大力宣传农民和工人的斗争同盟。特种的‘劳农政党’尽管在某个时期内有它的革命性，但是它很容易轉化为普通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所以，我們不主张組織这样的政党。”

历来利用“新党筹备会”这个組織来推动群众搞所謂工农政党运动的日本共产党，在劳动者农民党成立大会被解散以后却提倡“爭取政治自由工农同盟”这一組織形式，也許就是以上面所說的共产国际的新方針为根据的。我到现在还一点都不清楚其中的实

情。但是不管怎样，直到昨天，我們还被推动着去建立工农政党哩。要是不应该建立工农政党，也该用个什么方法明白地通知大家方針已經有所改变；不那样做，我們的思想一下子就转变不过来。这就是后来我之所以犯錯誤——贊成建立新劳动农民党——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事，以后还有机会讲到。

旧劳动农民党解散了，新计划的劳动者农民党又落了空，沒有成立；旧劳动农民党选出的国会議員，只有山本宣治一个人，在为爭取政治自由工农同盟（普通簡称爭政同盟或工农同盟）工作着。山本在1929年3月5日国会上准备討論1928年三·一五事件发生后立即頒布的关于改正治安維持法的紧急敕令的事后承认一案的那一天，为了陈述反对意见，把发言稿藏在口袋里（他向来演說不用发言稿，只有这次用了发言稿，也許是共产党或爭政同盟方面給他的。——那个时代，在合法場面活动的著名人物，有时往往比藏在地下的人处境要困难得多。当时在“帝国”国会里实质上要起到共产党議員的作用的山本，我們可以想像到他的辛苦实在一言难尽），結果沒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傍晚回到旅館里——那时他經常住在神田区的光荣館——刚吃完晚飯不久，就让右翼反动团体七生义团的一个姓黑田的人暗杀身死了。（几年以后，我在小菅刑务所服徒刑的时候，經常遇見那个黑田，洗澡也时常在一起。那人皮肤稍稍帶黑，筋强力壮，年輕无知，除此而外，沒有別的特征或可取之处；我心里暗想我們的山本怎么竟死在这种家伙的手里呢，可是因为在同一浴池里洗澡，有时还是不得不敷衍他几句。这样一个杀人犯，在我服刑期間，居然受到假释的恩典，刑期不滿一半就出獄了。他所属的那个团体七生义团里的同党，每年定期地来看他，給他送錢送东西，他出獄的时候，还特地从朝鮮赶来迎接他。据說他出獄以后，由同党介紹，馬上找到了工作。他們同党之間的互助

关系，非常讲义气，据说只要大家商量定了杀死一个人，那个执行杀人的人就一辈子不愁没饭吃。）

山本被刺的消息，还没有由报纸和无线电传开，我就由于新闻记者的来访，马上知道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牺牲和凶手是谁，仅仅对新闻记者说：“如果为了思想上的信仰而牺牲，那是山本的素志。”

3月8日，在东京本乡区佛教青年会馆里举行山本的入殓仪式；为了参加那个仪式，我又到东京了。看一看那时的照相，我已经穿上西装了。

我乘夜车到了东京，就在8日清晨，去大山郁夫家里。记得那时天气很冷。我在西装外边穿了大衣，还借了一件棉袄裹在身上，主人又给我在火鉢里生起旺旺的炭火，可是仍然冷得我受不住，嗦嗦地发抖。当时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大概是由于发高烧而怕冷发抖的。两三天以前，正写着这个稿子，尽管季节已经到了6月，由于连续下了好多天雨，天气凉嗖嗖的，我觉得怕冷怕得厉害，拿体温表一试，原来有三十七度半的微热。那是下午四点钟前后的事。我心想这可不好，马上放下笔，铺好被窝睡下。一会儿工夫，热度升到三十八度六。尽管这样，我还是若无其事地照常香喷喷地吃晚饭，吃完饭又睡；到十点钟左右，热度退到三十七度以下；半夜醒过来的时候，热度已经退到三十六度以下了。近来我平常体温总在三十六度左右，可是有时会一下子突然上升三度，不久又退热。这是上了岁数之后、最近四、五年来的老毛病，有时经常发作。这样看来，想必从前也曾因为疲劳，而偶尔发高烧怕冷。据医生说，这大概是呼吸器官的毛病；总之，体温在短时间里急剧升降，有时尽管发三十九度光景的高烧，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痛苦，这是我生理上的一个特点。

那次我参加入殮仪式，准备了一篇短短的祭文，打算朗讀；可是結果，只念了一行，就被警察勒令中止了。关于这事，在《社会問題研究》第九十期上，我曾經发表过下面这样的一篇文章。

“我和山本最后一次会面，是在2月15日我因出席全国农会京都府联合会第一次大会而被拘押在五条警察署；山本来保释我的时候。当我被释放、走出警察署的时候，碰见山本笑嘻嘻地站在大門口。我只匆匆說了一句“謝謝你”，就同他分別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与生前的他說話的最后一次机会。（写到这里，脑子里浮现出各式各样的人的面影；山本和我相交虽則不深，可是沒有留給我半点坏印象，所以使我眷念得很。1943年9月2日补記。）3月8日在东京举行入殮仪式那天，本想趁他的遺骸还没火化以前，立在它前面讲几句话，哪里知道我刚开口，念出祭文第一行“坚决斗争”的几个字的时候，就被在場監視的警察勒令中止了。这样，我連对他的遺骸訴說万分之一的感想的机会都永远失去了。我們的发言自由橫遭剝夺，竟到这样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所以山本极力想为被压迫民众充分利用議員在議會里的发言自由，而結果，就被暗杀了。我现在仿效墓前献剑的古人，把沒有念完的祭文发表在这里。

祭 文

站在山本宣治同志的遺骸前面，謹讀这祭文。

“你所流的宝贵的鮮血，使全国同志有了更深刻的精神准备，把坚决斗争的决心提高百倍千倍。因为所有活着的同志都清楚認識到，你是因为什么、为了哪个阶级、怎样地被杀害的。我們痛惜和你死别，可是你的死决不是白死，追随你的无数同志也决不会使你的牺牲成为白白的牺牲。作为你的同志之一，我对于你为整个运动所作出的宝贵牺牲，在这里表示滿腔的敬意和无限的感激。”

一切已經成了过去的一场梦，而在重新抄写这种文章的时候，

当年的事情又不知不觉地活生生地浮现于眼前。在入殓仪式以前，我在安置山本灵柩的那间屋子（记不清是什么地方了，只记得不是会场）里休息一会儿，那时大家叫他“秘书长”“秘书长”的細迫兼光，一边说“请先生念吊辞吧”，一边把砚台和纸放在我面前。我当时刚拜过躺在灵柩里的山本，只看见他的前额上带着新鲜的血痕（当时他心脏被刺中了，却还是揪住凶手不放，结果和凶手一起跌倒在楼下二门口的洋灰地上；前额上的血痕，据说就是跌倒时受的伤），没有生病而死的他的面貌，几乎和平时一样。拜过了死者的这样的遗骸，我马上就写了上面那篇祭文。其中我说“你所流的宝贵的鲜血，使全国同志有了更深刻的精神准备”，其实是当时我自己所受刺激的如实的表现。——一个人尽可以写出天花乱坠的文章；但是如果言行不一致，过了几时，那漂亮文章还抵不上挂在壁上供人欣赏的字画。幸而我自己翻看一下从前所写的文章，还不觉得那样惭愧，这是可以庆幸的。

大概由于山本曾经一度做过京都帝国大学的讲师吧，外界就误传他是我的学生，其实他并没有从我身上直接受到什么思想上的影响。京都市的南首有一条河，叫做宇治川；柿本人麻吕^①的那首“荡漾在宇治川中鱼斲桩木边的水波，不知要流到什么地方去”，据说就是站在这条河的河边咏的。宇治川上有一顶桥，叫做宇治桥；从前佐佐木高纲^②曾经在这桥上抢在梶原景季的前头上阵。从桥东走到桥西，向左转弯，沿着河岸走，就见到一座大酒家，叫做“花屋敷”，那里大白天也往往可以听到絃歌的声音。河里的水碧绿澄

① 柿本人麻吕，万叶诗人。他和后来的山部赤人同被推尊为日本的歌圣。生卒年月不清楚。——译者

② 佐佐木高纲，鎌仓初期的武将。宇治川之战，他和梶原景季争先锋，坐了名马生啖，率先陷阵。后来怨恨功大赏薄，落髮做了和尚。生卒年月不清楚。——译者

清，两岸的山风光明媚。不知内情的旅客，会疑心那一带是设有温泉浴室的温柔乡。那个“花屋敷”的创办人就是山本的父亲。山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山明水秀之乡长大的一位生物学者。从他的境遇来说，从他所专门研究的学问来说，既没有站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最前列而被惨杀的經歷上的淵源，又没有那样的义务，然而现在却这样悲壮地死了。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事当作过眼云烟看待。——这也許成了推我走向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的一个强有力的刺激。（順便提一笔，香川县选举运动以及本所公会堂新党成立大会时都到場的細川嘉六，这次沒有来。也許他同山本的私人关系与我不同吧。）

现在接着上文說下去。入殮仪式完毕后，我把山本的遺骸送到火葬場，烧过了香，馬上就回京都了。和細迫商量的結果，我故意避免和死者的骨灰同一班火車回京都。后来才听說，举行入殮仪式的那天，京都帝国大学的毕业生某君，受到共产党中央委員某君的委托，为了向我募捐，跟踪了我一整天，結果终于失去了那个机会。

山本的骨灰运回京都后不久，就在3月15日（所謂三·一五事件的一周年紀念日），在京都三条基督教青年会館里，“在空前的严密戒备下”——那时的报刊都这样說——举行了工农葬。同一天，东京（在青山斋場）、大阪（在天王寺公会堂）以及全国其他各地也都举行了工农葬。我自然参加了京都的葬仪，在死者的骨灰前面献了两小束鮮花。那天有五、六个大学生“护卫”着我，从家里坐了一辆汽車，同到会場；結果那几个大学生，在会場进口处全都被捕了。正在那个时候，一个刚赶到会場的大阪市的工人，他認識我，就一把抱住了我，穿过密密排列在那里的警察身边，好容易才走进演讲者休息室。我那天讀的祭文，也当然被勒令中止了。

到4月里，“无产团体協議会”在神戶、大阪、京都等地举办追悼演讲会，每次追悼会我都出席了。4月21日我在京都市公会堂追悼会上的演說，偶然留得一份底稿；为了紀念当时的心情，现在把它抄录在下面。（3月31日在大阪中島中央公会堂里的演說和4月1日在神戶基督教青年会館里的演說，都收录在《社会問題研究》第九十一期《山本宣治同志的死的階級意义》那篇文章里。那时无論作什么演說，我总还是保持預先詳細打底稿的习惯。在京都朗讀的那篇底稿之所以单独保留在我手边，是因为前两篇底稿謄也沒有謄就送到印刷厂里去了。）

“为了追悼山本同志，必須闡明他的死的階級意义。根据这个宗旨，我在大阪和神戶已經做过两次內容不同的演說。今天晚上仍然根据这个宗旨，再从另一方面来談談。

“我們的山本宣治遇刺牺牲之后，立刻就各方面——例如从河上丈太郎議員的嘴里，浅原議員的嘴里，也許甚至从水谷議員的嘴里——听到叫“山本宣治同志”的声音。但是，这些人当真有那样的权利把我們的山本宣治称为“同志”么？我深信只有和山本宣治站在同一陣营而和他誓共生死的人，才有那样的特权，称他为同志。我們有独占这种特权的权利和义务。今天晚上，我就要說明同志这一称呼的階級意义，作为追悼。

“我們的山本宣治死后，报刊上发表的評論之中，讀了使我們不禁作呕的，是《中央公論》杂志上所发表的吉野作造的文章。那篇文章从头到尾充滿着恶劣的議論和反动的意见。例如，他劝告我們說：

“‘活着的同志們，无論如何都應該感到这样的义务，那就是为了不让死者白白牺牲，要去发现新的工作，而以完成这种新的工作来安慰死者在天之灵。那末，那新的工作是什么呢？假如我的判

断不錯的話——（吉野接下去又說一遍）假如我的判断不錯的話，首先，那就是利用这个好机会向那个什么七生义团实行突击。’

“吉野說出这样的話，大概連他自己都觉得滑稽吧，所以馬上加了一个注解：

“‘不要拘泥于突击这两个字的字面，而把它誤解成拿起刀枪，发动群众为死者报仇。’

“那末，所謂‘突击’，又是怎样突击法呢？他恳切地說明道：

“‘那是說，要在思想上展开正正堂堂的論战。’

“这就越来越滑稽了。这就是吉野对我们提出的首要的新工作。換句話說，吉野要我們把七生义团当作对手，和它‘在思想上展开正正堂堂的論战’。我批評吉野的文章‘充滿着恶劣的議論’，并非一味謾罵，这只要举出这个例子，也就很清楚了。

“我們的敌人，决不是一个渺小的七生义团。再說，今天社会上的敌对关系，是建立在社会經濟构造这个物质基础上的；要是不挖掉这个物质基础，这种敌对关系，单靠論战，是决不会消除的。然而吉野却对我们提出这样的劝告，存心要混淆现代的社会形势，其反动意义就在这种地方。

“东京有一位同志，讀了吉野的文章，給我来信說：‘吉野作造的文章，每句話都使人作呕。他的反动，现在已达到惊人的程度。过去列宁以极大的憤怒斥責宋巴特教授的話——說他是臭虫大学教授，德国警察自由主义者，——今天正好奉送給吉野。’

“往年我所敬畏的朋友，现在以这样一副姿态出现于敌对的陣营里，不能不使我有感慨。这吉野还这样說：

“‘有一派囂张狂妄之徒，硬說这次的暗杀是反动政治的有計划的行动，大事咒罵一般既成政党，这样还不滿足，还把一般无产阶级政党的沉着措置，斥为违反阶级精神，在这里也沒有忘掉运用

打击民主主义的老办法。山本的死，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也许的确是最好的宣传材料。可是，他们对人家说，滚得远些，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结果把甲撵走了，把乙也撵走了，把山本的死骸抬上狭狭的高山顶上，这究竟是打算做什么呢？看在生前的缘分上，山本的肉体就听他们去作弄吧。可是山本死后，他的精神今天却还活在有志于和他一同改革社会的所有民众中间。他的牺牲的宝贵意义，埋没在少数人的嚣张狂妄的声音里，暂时隐晦于大众之前，这是可惜的。’

“吉野把我们说成是嚣张狂妄之徒，说我们作弄了我们的山本宣治的肉体。可是，作弄山本宣治于死后的，到底是誰呢？我要来弄个明白。

“山本宣治同志牺牲前不久，在大阪天王寺公会堂里举行的全国农民大会席上，清清楚楚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选为帝国议会議員而被称做无产阶级政党議員的共有八人（按：总选举时，劳动农民党里只当选两名；不过除了劳动农民党以外，还有社会民众党和日本劳农党，也标榜为无产阶级政党），除了我以外，其余七人全都变成了资本家地主阶级的僕从。站在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立场上的，现在只剩我一个了。但是我决不是孤立的，我背后有千百万人民群众。卑鄙的人，去你们的吧！我要保卫红旗。’

“当时他从那个大会立刻赶到东京出席议会，就在那天晚上被暗杀了。所以，他那句‘卑鄙的人，去你们的吧！我要保卫红旗’——由于这句话，他的演讲被警察勒令中止了——就成了他留在京都大阪一带的最后的一句话；而且，在大众面前，竟然这样公开宣言，这就表示出他抱定了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决心，他的惨遭杀害的原因也正在这种地方。（按：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以馬

克思主义者的身分而占有帝国議會議席的空前絕后的人。)而現在我們不得不想到,当他生前这样大声吶喊的时候,那些所謂无产階級政黨議員,有哪个叫他一声‘山本宣治同志’呢?又有哪个向他伸出溫暖的手,和他胳膊挽着胳膊一道進軍呢?

“不用說,要是当时別的議員向他伸出了溫暖的手、胳膊挽着胳膊同他一道進軍的話,他也決不至于說‘卑鄙的人,去你們的吧!’了。可是,等到他慘遭杀害、再也不会开口的时候,这些人却有的跪在他遺骸前面,有的站在他遺骸前面,口口声声地叫着‘山本宣治同志’。我們的山本宣治要是死而有知,听了这个,他的骸骨也許会因憤怒而起来吧。

“吉野指責我們‘对人家說,滾得远些,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結果把甲攆走了,把乙也攆走了’;事实上,我們不得不攆走甲攆走乙,不得不极力阻止在山本宣治生前背叛山本宣治的那些人口称山本宣治同志。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就划清了階級斗争的两个陣营的界綫,就可以在群众前面把工人农民的真朋友和仅仅在口头上冒充朋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明明白白地区別开来。……”

不管是好是坏,当时我反正作了这样的演讲。

还有,对于《山本宣治全集》的計劃,我写了下面这样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注明是5月1日写的。

“今天社会上,有一个伟大的事业要做。这事业伟大到这样,‘政治、經濟、科学、艺术等人类的一切創造,在它面前都相形見绌’。这事业就是无产階級作为它本身的历史任务而必須完成的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彻底最后解放。这样的任务,这个无限伟大的事业,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只有在无产階級领导下,依靠工人和农民紧密同盟的力量,才能完成。而我們的山本宣治同志,就是为了建立这样的同盟在奋斗中遭到敌人的杀

害的。

“山本宣治同志本来是科学家。但是，真正的科学，必须以促进大众的福利作为它的最終目的。因而，真正的科学家，必須考虑哪条道路是最能促进大众福利的道路。山本宣治同志之所以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越来越关心，在他被刺之前东奔西走，到处活动，休息都不休息，这不外乎是因为他具有比普通一般人更为敏銳的科学的良心。我們在这个事实面前，表示衷心的感佩。

“现在回想起来，他在世的最后一个时期，犹如运动会上赛跑的人跑到終点的时候，施出全副力量向前冲刺那样。他真是竭尽了全力。在他临死之前，他已經完全成为一个战斗的馬克思主义者了。我在前面說，现在有一个伟大的事业摆在我們面前等待我們去做，这事业伟大到这样，政治、經濟、科学、艺术等人类的一切創造，在它面前都相形见絀；而山本宣治同志就把他的生命献給了这个伟大事业。正由于这样，他的一生，比他成为任何伟大科学家还伟大百倍。他的著作集，也由于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献給了这个伟大的事业，所以成了值得尊敬的文集。在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的时代度过了自己青年期的一个知識分子，年紀过了四十岁，还能适应阶级斗争的迅速白热化，而为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由于完成了这样困难的事情，拿自己的肉体来表示‘通向馬克思主义的道路’的他的文集，應該說是日本的革命知識分子的驕傲。1929年5月1日。”

本来对誰說来都是这样，这些文章自然而然地泄露了当时作者的心境。参加执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比任何伟大学者的成績还要伟大百倍的对人类的貢獻——对于这一层，我已經深信不疑了。一年以前，当我刚离开大学的时候，我心里本来还只是想，从今以后要关在书斋里，把整个力量献給《資本論》的翻譯；而

結果，照說不經過十年不會產生的心境變化，想不到在一年中間就迅速完成了。也不妨說，直到那時，對於列寧所說的“做出‘革命的經驗’，總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有益”那句名言，我才進步到能夠完全理解的地步。

四·一六事件前後

山本宣治的死，不僅給予我內心一個強烈的刺激，同時還使我的環境發生了一個變化。

山本被刺的消息一傳開，有四、五個大學生，說是為了保護我，每天來到我家里。我就把樓上那間四張半席墊的書齋讓了出來。這些學生，一天到晚呆在那間屋子里，高聲說話，有時還大唱革命歌。我和我妻都覺得他們一番好意，事實上卻給我們添了麻煩。不久山本的工农葬結束了，一時的狂瀾漸漸平靜下來，這時京都工會方面卻又建議派一個工人常川住在我家里。我向來很少機會和工人接近，自然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建議。結果來了一位姓馬淵的伏見工會的青年工人，代替了那些大學生，這樣家里才安靜下來。新來的馬淵，從勞動農民黨正當活躍的時候，就搞工會運動，是個稍稍帶點知識分子的派頭的、聰明伶俐的青年。後來他長期和我們一起生活，同我們一桌子吃飯，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不論遠近，他總不離開我的身邊。坐火車的時候，有暗探跟踪的話，他馬上就覺察得出來；糊塗蟲的我，得到他的幫助不少。

可是，既然接受了工會派來的“護衛”，我現在就彷彿已經是個街頭上的人；既然到了這個地步，也就騎虎難下，只好做到哪里算哪里了。我的小舅子大塚有章的決心參加無產階級運動，全家搬到京都來住，大概也就是這個時候的事。

4月16日那天，又在全国范围内大捕日本共产党。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四·一六事件。在这次大逮捕中，像市川正一、三田村四郎、鍋山貞亲等在三·一五事件中漏网的一些党的干部，这次全都被捕了，只有佐野学一人，得以亡命中国。（佐野逃到中国，正想去莫斯科的时候，从北京寄给我一封信。后来被捕而扣留在上海的中国当局手里的时候，大概是买通了中国的官吏吧，又写给我一封信，要我去和他在东京的哥哥商量，设法在上海把他营救出来，他把那封信用上海公安局的公用信封寄给了我。我对于他的委托不能置之不理，特地派大塚有章去和他的在东京駿河台开了一家大医院的哥哥佐野彪太商量，一本正经地打算买通上海公安局的官吏。关于这事的经过，在《入獄記》的《假释的梦》里已经写过，这里不再重复。）由于这次四·一六事件而受到起诉处分的計二百九十五名，加上三·一五事件的四百五十名，前后共約七百五十名被起诉，此外被捕后沒有起诉的，至少也有同样多的人，所以，对于左翼陣营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当时地下运动的詳細消息，我自然没法知道，不过由于連續不断的逮捕，似乎那些有实际运动經驗的指導者，几乎給一扫而光了。至少，合法場面上的左翼运动，从那时以后，連演讲会都因受到警察的鎮压而几乎完全开不成了。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来談談。

6月18日晚上，东京青山会館里要开一个由产业劳动調查所主办的演讲会，我和大山郁夫被邀去作演讲，于是我就帶了一篇題作“資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的讲稿上东京去。这个产业劳动調查所（普通簡称为产劳），向来編輯《产业劳动时报》、《国际》这两种杂志，以及其他許多有益的資料，照說所員都該是些靠得住的人；岂知由于繼續不断的鎮压，那时所里被几个口头上讲革命而行动上缺乏能力的知識分子所占据。把《社会問題研究》搬到东京去

的鈴木安藏，似乎就和这些人結交在一起，成了那个集团的領袖。总之，我就是由这些人招請而上东京的。

一到东京，我照例先去看大山郁夫。我們两人，比約定的時間稍稍提早一些，一道走出大山家，坐上电車，在青山會館附近的一个电車站下了車。那时，我們已經知道当天的演講会开不成了，可是因为听說會場門口还有許多听众挤在那里，大山认为演講会虽則开不成，让大家和我們见见面也是好的，所以我听了他的話，尽管自己已經觉得很疲乏，还是跟着他向會場走去。路上遇到三五成群往回走的听众，他們看到我們，就扭轉身子跟着我們再向會場走去。这样，自然而然地就由我們两人領先，开始了一个街头示威。这时，我們的前面忽然出现一队穿了白制服的警察。他們正跑步向我們冲来。一轉瞬間，那些盔帶扣得紧紧的警察离开我們只有两三丈了。我本能地拔步就逃。回头看时，从會場那边被驅逐过来的人全都被抓住了。我掉在逃走的群众的末尾。本来我从小心脏就衰弱，在高等学校讀書的时候，体操課上一开始跑步，就得掉队，不中用得很，所以更不用說和警察賽跑了；但是尽管如此，还是由馬淵挽着我的胳膊，就像被拖着走一样，拼命地跑。嫌手里的一把洋伞碍事，曾几次想扔掉它。大塚为了保护我，故意落在我后边，后脑勺上吃到警察好几拳。

半路上好容易逃进一家书店(奇怪的是，路上有各式各样的店鋪，想不到逃进去，一看见书店，馬上就奔了进去)，才逃脫了警察的追赶。慌慌张张坐上一辆汽車，回到大山的家里一看，原来对于这种場面司空见慣的大山，一起头就沒有逃跑，巧妙地避开了警察队，老早回到自己家里了；他听到我在青山街上跑了半里多路的狼狽光景，还觉得很有趣地高声笑着。鈴木也老早回来了，正在喝紅茶哩。

关于当天的事情，鈴木在7月号的《社会問題研究》的編輯后記里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話。

“河上肇同志带着本期卷首所登載的那个演說稿，来到了东京；可是結果，青山会館方面却暴露出它那資产階級御用机关的本来面目，借口說不合会館的宗旨，突然拒絕利用早已訂好契約的會場，因而失去了演讲的机会。那天晚上，青山警察署为了借暴力赶走拥向會場的听众，动員了大批警察，从会館周围到電車路全都戒备森严，走过那里的人，不问是誰，只要稍一停留，就受到拳打脚踢，真是狂暴已极。河上肇同志由于周围許多同志的保护，侥幸沒有受到暴行和逮捕，可是护卫他的同志們，有的从后背挨到毆打，有的被逮捕后听说还受到凶毆。被糟踏蹂躪了的这次的产业劳动調查时报更生紀念演讲会，后来7月1日在芝协调会館举行时，仅仅开了不到二十分钟的会，就被解散，据说同样遭到逮捕和拳打脚踢之类的狂暴镇压。那里的爱宕警察署的署长，五一节那天，据说曾被工人群众打倒在地上。还有該署的一个警官，据说也曾被协调会館里跑出来的工人示威群众所包围，打倒在地上。所以，只要力量强大，在任何場合下，演讲会还是开得成的。这里把这件事情报告一下。”

因为鈴木一派人在这个編輯后記里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当时的心情，所以把这样无聊的东西都抄录了下来。另外，我还收到一个陌生人写給我的下面这样的信。

“河上先生函丈：（按：原文这里写作‘函文’。这封信大体上是照原文抄录的，但是遇到这一类的錯字，就随手加以訂正，而不一一注明。）

“原諒我給您写这封信。知道您很忙，照說不該給您写信，可是仍然来打扰您。

“上月 18 日晚上，在青山會館開演講會的時候，我們工人對於產業勞動調查所所員採取的那種態度（按：原文寫作‘對度’），非常不滿。那種態度把他們的本质徹底暴露了出來，完全證明我們工人經常對他們的行動抱着疑懼是不錯的。……過去我們認為產業勞動調查所所員是用革命的言辭死守共產黨、引導我們走向革命實踐的知識源泉。……過去在我們看來，產業勞動調查所以及它的所員，是革命的存在（過去也的確是這樣。三·一五事件以後白色恐怖的時期，我們看得很清楚；黨中央的幹部、勞動農民黨幹部以及三團體的中堅分子，都是這樣）。可是後來那些所員墮落了，社會民主主義傾向越來越濃厚，逐漸變成合法主義的巢窟，我們工人中間，有的甚至對產業勞動調查所的存在起了懷疑。我們工人看穿了他們的本质和本性，覺得和現象（現象是革命的）大不相同，而是左翼民主主義者。那末，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稱他們為左翼民主主義者呢？

“從演講會的前後經過，我們看出來了。

“七點鐘開會，可是直到開會準備時間迫在眼前的五點鐘，六點鐘，主辦方面的人——也許是產業勞動調查時報編輯或產業勞動調查所所員吧——却一個也不見，一個也不到會場里和事務所里來做準備，也就是說，一點也不存心做什麼準備，這究竟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在今天的政治情況之下，我們所舉辦的集會，在任何場合都是政治性的集會，都會受到有關當局的殘暴鎮壓。同統治者手里的政治權力正正堂堂地正面起衝突，這並不能算是唯一的巧妙的戰術。應該看準時間和地點，或者用奇襲，或者用正面攻擊，在任何一个細小的場合，打敗敵人。一味宣傳有關當局殘暴鎮壓，那只是長有關當局的志氣，從而長統治階級的志氣。真想抵抗有關當局的殘暴鎮壓，只有攻破他們的狡猾的戰術。產業勞動調

查所所員打算这样做了沒有呢？不，他們絕對沒有打算这样做。当青山会館勾結了青山警察署、拒絕出借会館而挂出停止演讲的告示时，照說尽管是晚了一着，主办者应当向会館和警察当局提出抗議；可是他們这样做了沒有呢？他們沒有这样做。直到上村律师到来以前，他們始終袖手旁观；后来把責任推在上村律师一个人身上，他們却东躲西閃的。在这种情况下，主办者所应当做的事情，可能至少有以下几点。

“(1) 和律师一道，向会館主持人和警察当局提出严重抗議，按照預定計劃开会。那时主办者自然将会遭到无理的逮捕和拘押；不过，产业劳动調查所的几十名所員，要他們干嗎呢？

“(2) 抗議的結果，如仍然絕望，就必須采取下一步手段。那时就得公然夺取軍警的許可，就得設法取得以主办者的資格向听众宣布演讲会中止和解散的权利。如果当局比較狡猾，那末就应当不惜采取任何非常手段，鼓动几百名听众在薄暮里举行示威游行。这并不是什么难事；照当时的情况而論，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要是利用当时的一、二次欢呼声，就可以占据附近某些建筑物的宽大房子。應該以此作为目标，而向群众进行鼓动。可是主办者却絲毫沒有打算做什么。

“(3) 还有，那次被逮捕的，有十五个人。保释工作是任何集会所应当做的，因为那是主办者的責任。警察方面，自然也会很高兴把抗議者捉进拘留所里去。不过，到那个时候，就得利用群众的义憤，一举冲向警察署去。如果事情鬧大了，那就更好。街坊一定会来救火，警察的非常集合，地点是青山。附近就是第四团，軍隊馬上可以出动。事情这样一鬧大，就可以向大众提供把帝国主义战争导向內乱的一个活生生的样本。这就不是学术演讲会，而是活生生的革命实践了。

“(4)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那是因为演讲会不是为了捞钱，也不是书店的宣传工具。

“关于主办者的起码的任务，我们给您写得太多了。不过还要请您再稍稍忍耐一下。上面所提出的四点最低限度的工作，他们没有做。换句话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不，要是什么都没有做，倒还情有可原。主办者中间，还居然有几个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

“大概是料定这个演讲会在当局的镇压之下开不成吧，预定七点钟开会，有的到八点多钟才在会场附近走下电车。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有一个样子像外国人，还有一个是皮肤白嫩的赶时髦的马克思主义法律家。据说他们都是产业劳动调查所的部长级的重要人物。像这样的合法主义者，到革命的时候，必然会丢掉武器，看见流血就发抖。而且也是口头上说教的家伙。另外，还有这样的人，看到警察来了，他马上坐了汽车跑了。那个人对上野书店的老板说：‘河上先生不见了，大概被抓去了，你给我到警察署里去看看。’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在白色恐怖的暴风雨下，他们让您一个人处于无防御的状态中；主办者们，为了自己的安全，把您孤零零地扔在一边了。

“幸而我们到警察署去的时候，听说您已经回去了。可是我们不相信警察的话，因为那些家伙，抓了人也会说是没有抓。不过，您没有在那里，看来倒确是事实。因为第二天问起被捕的人，都说您没到警察署里去。

“这是把您一个人放在白色恐怖之下！山本宣治被刺是哪天的事情呢？是3月5日，这是一个永远忘不了的日子。山本宣治坟上的土还没有干，而他们居然就这样，真是太不像话了。大家都说，第二个牺牲者是谁呢？小心些吧，不是大山先生，就是您了。

“您从一个讀書人而走上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我們說这是您的人生悲剧。在您，固然有着把悲壮的老头儿——請原諒我这样称呼您，但是在二十岁的青年眼里，您总是老头儿——的鮮血染紅宝劍的精神准备；但是，我們却不能让您輕易牺牲。可是，像那天晚上那样，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們却无法可施。我們并不怕死，可是，死也要死得其所。

“我們决不白死。

“像那天晚上那样，您很可能被白白杀死；我們很耽心。您身边据說有一两个人护卫着——听說还是最近才設置的——其实那也只是比完全没有护卫稍稍好一些罢了。常言道，护牢身体比让人杀死难。‘杀身容易护身难’，記得这是木戶松菊說的。我們在这里衷心希望您更严密地保护您的身体。我們指出产业劳动調查所所員是左翼民主主义者、合法主义者、无原則主义者，指出他們是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义者，为的就是希望您严格甄別您身边的人們。

“据聞您对于每个人的本性虽則看透了，但是如果相信了那个人，就信用到底，一切委托給他。从这种地方我們也看出您在人情世故上还欠老练。我們还是希望您多加小心。还有，关于 18 日晚上的情况，如果您要知道詳細情形，随时都願意告訴您。”

信上还写了地址和姓名，为了怕給他招麻煩，所以把它涂去了，然后一直保存在文书箱的底里。这封信上所說的“赶时髦的馬克思主义法律家”，指的是《无产者法律必携》的著者、后来被《无产者新聞》宣布为奸細的那个人。我已經忘掉了他的姓名。至于“上野书店老板”，明明指的是鈴木安藏。那时鈴木說不定也是产业劳动調查所的所員。至少那天晚上他也是演讲人之一。

为什么那时沒有把这封信丢掉而把它保留了下来呢？（我向来

的习惯是看过的信就丢掉,除非有什么重要的理由,不加保存。)这大概是因为,看到这封信后,我开始对鈴木的人品发生了怀疑,同时也对一部分知識分子发生了怀疑,这些人,乘着經過几次大逮捕、中坚人物都已不在的机会,就霸占着有光輝历史的产业劳动調查所、无产者新聞社等机关,自封为空鋪子里的財神菩薩,光在口头上搬弄一些革命的詞句。我当时开始觉得,鈴木就是这种知識分子集团的一个代表。記得那时鈴木曾向我开口,要我为重建共产党而捐出一万元或两万元的資金(正确的数字已經忘掉了,但确实是上万而不是上千);当时我考虑都不加考虑,当下就拒絕了他。

除了上面所說的事件之外,交給鈴木一手編輯的《社会問題研究》,像我所期望的那样的“通过飞跃式的轉变的更生”(这是鈴木建議中的話),連影子都沒有见到。不錯,杂志封面上确实印着“更生第几号”,可是,这也和《产业劳动时报》的“更生”沒有两样,仅仅給我們这样一个印象:“什么呀,原来是这样一回事么?”徒然使人失望而已。鈴木早先曾在我面前表示,要是《社会問題研究》移到东京出版的話,編輯方面要和共产党干部取得联系,偶尔还可以請他們写几篇文章(因为事情属于非法活动的范围,对方只是半吞半吐地这样表示,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我呢,也有所顾忌,不好問他具体的进行办法);可是翻看一下出版的《社会問題研究》,像样一点的論說,除了我写的以外,仅仅只有鈴木安藏和大山良雄署名的稿子,而大山良雄不过是鈴木的变名。我心里想,像这样的东西,我就是在京都也編得出来。所謂“和现实的运动密切結合,而包括在馬克思主义陣营的写作活动之内,成为它的一环,以完成它的任务”,“使本刊成为同志們的共同的刊物”,“对广大的全体无产階級群众开放門戶,欢迎大家投稿”等等(这些都是鈴木提出来的口号),絲毫也沒有实现,只落得一場空話。

在这时，我所信任的一位年轻朋友K君，受到四·一六事件的余波，在未决监里关了一个时候，受到暂缓起诉的处理而放了出来。他向我提出一个强烈的意见，叫我千万不可以信任铃木那类人。那时我才知道铃木不仅不是党员，和有力党员也没有什么联系，在共产党方面完全是个不被信任的人（他后来也一直沒有成为党员）。从那以后，一向对谁都神气十足的铃木，学问虽比K君高明，可是在K君面前，总显出伏贴的态度；看到这副情景，我曾对大塚说，也许铃木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落在K君手里。

不久我在建立新劳动农民党的问题上又和铃木意见分歧，乘机就和他分了手，把《社会问题研究》收了回来。当时我如果能平心静气地听一听铃木一些人的主张，也许还可能改变我的想法；可是因为我一旦怀疑到对方的心术，就再也不能倾听人家的话了，而且当时还谣传着那些只在嘴巴上勇敢地搬弄革命词句的人有奸细的嫌疑，所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疏远了。

和我本身的徬徨失措一样，第九十期以后的《社会问题研究》，也迷失了方向。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时机。现在想起来，1929年1月发行的第八十九期上，我发表了那篇《站在风暴中（为本刊革新告读者）》的文章，其中说“本刊创办以来，到今天刚好满十年；乘此机会，我计划把我对它的编辑态度根本改变一下，”也许创刊满十年的这时，正应该是《社会问题研究》的死期。错过了这个死期的《社会问题研究》，后来又拖延了两年寿命，到1930年10月发行第一百零六期后，终于停刊。那时新劳动农民党已经解散，久不见面的希望阁（左翼出版社）老板市川义雄来到我处，答应代我征求一下党（日本共产党）的意见，我就把这事拜托了他；后来得到的回音是“《社会问题研究》可以就此停刊，连停刊号也用不着出”，我就照办了。不过那究竟是不是党的意见，却不得而知；即使是党的意

见，在党的最高机关已被奸細侵入的当时，这种意见也是不足为凭的。总之，错过了死期的东西，往往就会落到这样的下场，这也是事物的一般规律。

建立新劳动农民党的提案

对于左翼方面的运动，无论文笔活动也罢，工会、农会的活动也罢，有关当局方面的镇压越来越厉害，在我们看来，几乎一切路都像是给堵塞住了。争取政治自由工农同盟委员长大山郁夫和秘书长細迫兼光两人，尽管当初做劳动农民党委员长和秘书长的时侯，忙得飯都来不及吃，可是到 1929 年的夏天，却因为社会活动一点都没有了，經常茫然地呆在自己的家里。

6 月 18 日晚上被大批警察在东京青山街上追赶的我，回到京都以后，独自一人思索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对于活动范围一天天狭窄起来的左翼运动的现状，自己应该不应该坐视呢？目前最要紧的，当然是日本共产党的重建，可是直接去搞这种非法活动，像我们这些人，却連做梦也别想。不过，如果采取现在这样的斗争形式的话，就連合法場面我们都不能有什么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是坐待形势的自然推移，那自然是既不费力又太平无事。但是，这时因为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相继发生，坚强的战士全被逮捕，多年来所开辟的左翼斗争場面，行将一举而归于荒废。像我们这样的侥幸漏网的人，眼看着这种惨淡的光景，而拱着双手什么都不干，只等形势自发恢复，未免有些不負責任。然而，我们自己又没有直接建設非法組織的能力；那末，为了維持和开辟非法組織借以成立的地盘，——为了加强工会和农会的活动，通过这些斗争而培养出可以胜任非法政治活动的战士，——暂时

先組織一个合法政党，怎么样呢？今天，要不是在这种合法政党的烟幕之下，左翼陣营就既不能实现工会、农会的扩大和强化，又不能展开劳資斗争和貧雇农斗争，所以，虽然无产阶级政党在原則上除了共产党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組織形式，可是，在这个时候，撒一个谎，也可能是一种方便手段，而且只要意識上不对立，在共产党以外組織一个工农政党，作为暗地里支持共产党的暫时的过渡物，难道不也是可以考慮的一种便宜之計么？我脑子里逐漸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想法。

不过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因此，就写了一封信給細迫兼光。信里叙述了上面那样的我的意見，最后还附带写了这样几句话：“我是长期呆在书斋里的人，对于实际运动方面可說一窍不通。所以，上面的提案，老兄看了如果觉得沒有意思，就請你扔进廢紙簍里。假如认为多少还有点意思，那末还請您出一把力。”

关于細迫，我想在这里提一笔。我在学生时代就認識了他。他搞劳动农民党，比大山郁夫还要早，是众所周知的名秘书长。劳动农民党的干部和共产党的联系，几乎是他一手包办，委員长大山，直接一点都不插手，一切活动，都照書記处所拟定的計划执行。在劳动农民党全盛时期，党的活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維系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只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山才博得“我們的出色的委員长”的名誉，而細迫也不愧是个“名秘书长”。可是，共产党干部的一下子全部复灭，劳动农民党的解散，却把这样的机制完全破坏了。三·一五事件后，在新党筹备会的时代，还不去說它，等到改成了爭取政治自由工农同盟这样一个松懈的組織，接着发生了四·一六事件，从此以后，委員长和秘书长就逐漸变成了历史上的陈迹。后来，山本宣治議員也被惨杀了。面对着这样一个形势，

本来并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迂夫子的細迫，就想看准一个适当的时机，退出斗争。因而，可能一半是事实，一半是借口，在山本被刺后不久，細迫就对同志们表示，因为家乡的老父一定要他回去，所以他打算在最近期间离开东京，退隐家乡。可是我们却耽心这事将大大影响全体的士气，和大山一些人商量的结果，我特地从京都赶到山口县厚狭镇去访问細迫的父亲。細迫家是厚狭镇的大地主。細迫兼光是他家的次子；他能长期从事没有报酬的政治活动而不发生生活困难，基本上是靠家里的接济。我代表左翼阵营同志们去访问他的父亲，目的就在于请他父亲照常给他寄钱，让他再自由活动些时。

带同“护卫”我的馬淵在京都乘上火車，一路都有暗探监视着。要是我单独旅行，说不定什么都不会注意到，经过馬淵君一提醒，果然看到每逢管辖区变更的、两县交界的火車站上，特务警察挥动着手帕在打暗号，进行交接哩。虽说既不疼又不痒，但是心里总觉得不愉快。越到乡下地方，那类特务警察的活动就越发粗暴、执拗而露骨。

半路上我在山口县岩国市下了車，去看了我的母亲。自从爸爸死后，她雇了一个小女孩子，独自一人住在宽敞的正房里。我住了一晚，第二天穿上放在门口的皮鞋，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妈妈叫住我，说：“留神些吧。”据说当时我正要跨过户槛，回过头来对她說：“自然要留神，不过我也是个男子汉呀。”妈妈听到我这句话，知道我当时已经有了精神准备。这些话都是后来我从监狱里出来、初次和妈妈见面时，她对我讲的，我自己已经什么都记不得了。

到厚狭镇細迫家去一看，果然是大地主的門庭。大門大得像庙門，門旁聳立着枝干極杈的老松树。走进大門，靚面就是二門，正对二門的那間鋪席垫的屋子，左右两边的紙門都敞开着，有一个

飘着雪白的长鬚的老年人，穿了整整齐齐的日本服，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见了我就郑重地来迎接。这个老年人就是細迫兼光的父亲。我被領到会客室里，那个会客室是两大間連在一起的，平常不大用。寒暄了一番之后，我馬上就說出来意，老人家似乎什么都預先知道了一般，毫无异議地答应了我的請求，接着就把自己的儿子夸了一番。会客室还有专用的浴室，因为平常也不用，浴池漏水了，那天特地为我准备起来，就寝以前洗了澡，他还向我致歉說耽誤了時間。这样一些已經成为过去的梦的小事情，嚕嚕苏苏写了一大堆，簡直就像老头儿的唠叨話。

由于和細迫兼光有以上种种的关系，所以这次关于組織新政党的問題，我就先和他商量了。而当时的細迫和大山呢，正一筹莫展，呆在家里，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徒然留恋于回想过去劳动农民党的全盛时代。他們本来以为我一定首先反对成立合法的工农政党，想不到我这次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所以本来只是藏在大家肚子裡的念头，一下子就实行起来了。

看到我那封信的細迫，馬上帶了我的信去找大山，两个人的意見当下就一致了。社会上当然完全不知道其中的底細，其实，成立新劳动农民党，我要負最初的点火者的責任。我既然已經点了火，那末如果没有使我信服的充分理由，尽管一部分人怎样反对，我对于成立新党也必須竭尽我的一切力量，这个命运在那时就已經决定了。

就这样，大山、細迫两人商妥以后，又攬掇了旧劳动农民党中央委員之一的土村进，三人連名向全国同志发表了“成立新劳动农民党的提案”。不过，大家預先就料到，成立新党，势必至于会受到左翼陣营至少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如果事前泄露了計劃，旗帜还没有打出就受到猛烈的反对，事情就不好办，所以得极秘密而且

迅速地做准备工作。可是，东京方面起草提案极慢，左等右等，还是搞不出来。我终于派大塚去到东京，住在大山家里，从旁督促进行。

大概是7月底、8月初吧，我收到大塚的来信，信上说提案总算起草好了，已经付印，不久就可以发表了。那时我想至少得先告诉细川嘉六一声，所以就去西宫看他。果然他对这件事是反对的。但是我仍然不服，两人辩个不止。吃完晚饭，他说不妨稍稍休息一会儿，把我带到海边，听了一会儿涛声。不知为什么，后来我被关在小菅刑务所的时候，几次想到这时的海涛声，觉得留恋得很。我们两人从海边回到家里，又继续谈，谁都认为自己有理，终于谈了一整夜。细川最后劝我暂时不要发表意见，至少得看看形势的变化，可是我还是不听，他于是说：“那末，你再去一趟大山，探探他的口气，看他有没有和共产党闹对立的意思，把这一点确实弄明白了再说。这是我对你的最后忠告。”我听了他的话，就打了一个电报给大山，通知他说，我马上到东京去，等我到达以后再发表那提案，随即向细川借了旅费，就从大阪去东京。

不过，当时我十分相信大山，再说我这个人，也没有那份试探别人意图的本领，结果到了东京，开门见山地就问大山有没有和共产党闹对立的意思（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傻透了，这种话哪用问呢，不讲也知道回答什么呀），他自然当下就回答说，绝对没有和共产党闹对立的意思，这在提案里也明白交代了。只凭他这一句话，我就满意了，十分安心地就此回了京都。

题作“成立新劳农党的提案，献给亲爱的全国同志。大山郁夫、上村进、细迫兼光”的四十七页的一本小册子，上面印着8月9日发行的日期，颁发到全国。

这提案发表后，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所最感兴趣的，似乎就是我

个人对它究竟抱怎样的态度；可是結果，也許和許多人所猜想的相反，我第一个起来表示贊成。可是，左翼陣营方面，却像搗了蜂窠那样，提出了猛烈的反对論，罵我們是岂有此理的叛徒，是該唾弃的卑鄙家伙，馬上把我們开除出爭取政治自由工农同盟。《无产者新聞》也對我們加以謾罵。鈴木安藏当然也表示絕對反对。結果是《社会問題研究》重新回到我手里；从第九十六期（1929年9月发行）起，封面上仍然印上“河上肇編輯”的字样。

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有两件事情加强了我的自信。

第一，当时在京都可以见面的唯一的共产党员，給我大打其气說，难为你老人家，乘此机会加一把油吧。他是属于日本工会評議會的一个工人出身的战士，三·一五事件时被逮捕了，因为拘押期中咯血很厉害，一时病势垂危，才释放回家，經常由特务警察加以監視；后来病势有了好轉，仍然許他住在家里。由于亲身的体验，他知道旧劳农党对于左翼陣营的扩大和强化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希望这次的新劳农党也能带来同样的結果。当时我觉得在日本工人运动中有着丰富經驗的这位战士的意见，比起革命知識分子的紙上空談来，远为值得尊重。由于这样的关系，在我参加劳农党的时代，他曾用磯村秀松的笔名在《社会問題研究》上分期发表过一篇《日本工会評議會史》，还用深川一郎的笔名写过时事評論的稿子。到后来，他用須井一的笔名从事无产階級文学工作，尽管是外行出身，可是他所写的几篇小說，却博得了文坛的好評。在須井一的笔名之后，他还用过加賀耿二的笔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不再写小說，参加了电影公司的剧本部。他的真名叫谷口善太郎。

第二，东京希望閣书店的老板直接对我讲了一些話。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当时我固然不明确，到现在我还是沒有弄清

楚。不过，当时的希望阁，仿佛就是共产党的出版部，从月刊《国际》起，它所出版的书，几乎完全是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而且杂志每期毫无例外地都被禁止发行；禁止出售的书籍，也占大多数；尽管如此，它依然在合法舞台上經營着出版业。本来，非法方面的事情，誰都只能隱隱約約地提一些，即使明明白白地說出来，也无从辨别是真是假，所以像我这样的笨人，除了相信人家对我說的話而外，沒有别的办法；要是主观上认为不可靠的人，就只有远远避开。在新党提案发表以后直到成立大会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大山家里曾經多次遇见这位希望阁的老板，听到种种消息。当时我想，这位希望阁老板，至今还平安无事地留在合法場面上，而且对于非法場面的各种消息灵通得很，大概担任合法場面与非法場面的联系，积有多年經驗，所以能巧妙地起到这种作用吧。因此，他对我个人讲的一些私房話，我自然也都信以为真了。其中他曾經对我吐露过大意是这样的話：“哥哥贊成成立新劳农党，而且叫我对你們說，新党的事情，还希望大山和你两人努力奋斗。”他所說的“哥哥”，指的是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員之一的市川正一。市川正一在四·一六事件时遭到逮捕，那时关在监牢里，还没有判决。他是否讲过这样的話，到今天我还沒法証实(根据我自己被捕后的經驗，接见时，监督得非常严厉，决不可能讲这样的話)；不过，总而言之，希望阁老板本人对于成立新劳农党，起初反正表示了贊成的意见，这是事实；而且我的两部著作《为了馬克思主义》(1929年6月发行)和《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1929年11月发行)都由希望阁出版这件事，也可以証明这一点。

我还想起有一天在大山家里遇见这位希望阁老板(他名叫市川义雄)的情形。同无产阶级运动发生关系以前的大山，本来是资产阶级趣味的人。我在他家出出进进的时候，他家的房子虽然由

于沒有好好修葺，破破烂烂的，可是作为一个学者的住宅，却还是非常奢侈讲究。那所住宅位于戶山原靠北，是西式的建筑，它的高高的屋頂，老远就吸引着人家的注意。会客室就和书斋連接在一起，是一間天花板很高的大屋子。食堂也是西式的。那天我們正在食堂里吃西菜，希望閣老板湊巧也来到了，他說他已經吃过了飯，只要些黄油就行，于是也不用面包，就把大块的黄油嚼滿一嘴。当时的光景，到今天我还記得。那个时候，大山已經老叫穷了，可是和 1943 年今天物資不足的情况一比較，那种生活，还是不得不說是十分奢侈呢。后来，这位希望閣老板，到劳农党的名声搞臭以后，就完全不到我們的地方来了。劳农党解散以后，他曾經看过我一两次，不过不久我就被捕了，从那时起，就一直和他断絕了音信。像那样的人现在不知道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这样，成立新劳农党本来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主意，再加得到了上面所說的那种有实践經驗的有力战士的贊成，所以尽管我身边的許多京都帝国大学学生极力反对，我仍然毫不为动。还有，鈴木那一派人，几次三番通过細川嘉六，要求同我见面；可是因为有人讲他們的坏話，說什么只知道在合法場面上大吹大擂的这批人中間，也許暗藏着奸細，所以我終于連见面都拒絕了他們。

在 9 月和 10 月所发行的《社会問題研究》第九十六期和九十八期上，刊登了《必須克服小儿病》和《为什么要支持新劳农党》的两篇文章，不管这两篇文章写得多糟，却是我贊成建立新劳农党的想法的真誠无伪的告白。那时我深信不疑：像我这样的人，处在当时的形势之下，除了走那样的道路之外，沒有其他办法。所以尽管反对的声浪很高，它反而給我增加了勇气。我終于决眦而起，发誓要抛弃一切，从此拼命为新劳农党而工作。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1929 年的秋天）起，我完全从书斋走上了街头。

(1943年6月15日夜九点二十分，我写到这里；今夜打算就此搁笔了。六年前的同一天夜里十二点多钟，我连头带尾坐了五年牢，重新回到了家里。后来我就把6月16日称为第二誕生日；明天是我第六次第二誕生日，为了祝贺起见，我正想请我的内人和女儿到进进堂面包店去吃每客六角钱的快餐哩。)

自画像(續前)

(从无我苑时代到劳动农民党时代的回顧)

参加新劳动农民党,在我并不是 退却,而是一种前进

这里我把 10 月 3 日在大阪中島中央公会堂的演說稿照式抄录出来,因为这篇演說稿反映我对当时的形势的看法以及我的精神准备,比今天回想当时的情况,要正确得多。(这篇稿子刊登在《社会問題研究》第九十八期上,題目是“为什么支持新劳农党”,当时有許多地方开了天窗,现在都补了进去。)

“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表示贊成建立新劳农党的計劃呢?而且,为什么尽管后来出现了許許多多反对新劳农党的論調,可是我坚决不改变我最初的态度呢?我这篇演說的目的,就在于談談其中的理由。

“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鋪石大道——这是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名言。它的意思就是說,政治是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事业,不比坐着汽車在石头鋪得很平、又宽又直、又漂亮又太平的大道上风馳电掣。列宁曾經引用过这句话,告誡我們說,俄国革命正因为忽視、忘掉了这个真理,所以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他把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比做攀登从来沒有人攀登过的险阻万分的高山。我认为列宁这个比喻,是千真万确的比喻,我們可以从其中得出許多有益的教訓。现在我就借这个比喻,來說一說当前的各种問題。

“大家都明白,誰也不能成直綫地跑到上面所說的那种险阻万分的高山上去(只有患急进主义幼稚病的人,才那样主张)。不过,

既然是从来沒有人攀登过的山，那就說不定会有什么近路或小路；而且我們的目的是早一天到达山頂好一天；如果看到形势险恶，馬上悲观絕望，就此向后轉，那就太泄气了。只要有一綫希望能攀登山頂，我們总得坚持到底，尽一切可能爬上去。

“我认为我們陣营里的同志們，早就抱有这样的决心，几年来一直在布滿荆棘的崇山峻岭上前进再前进。可是，如所周知，站在我們最前面領導全軍的我們的前卫队的大多数同志，不料在去年春天突然一下子落入了深谷。我們終於碰到了可怕的断崖絕壁。可是當我們的前卫队还没有全軍复沒、还留下一部分為我們拼死帶路的时候，我們一步也沒有后退，仍然向同一方向繼續前进着。在我个人來說，也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抛开了呆慣了的学校，追隨在勇敢的同志們之后，决心向崇高的目的进军。可是沒有过多少时候，許多同志，又落入深谷了。我們終於完全失掉了前卫队的帶路。

[在《社会問題研究》上发表的时候，这里加有这样一段注——有不少人，在文字上否认上述事实。不过，笔头上無論怎样否认，事实依然是事实。工农同盟的斗争，除掉极少一两个个别地区而外，在全国范围内碰了壁。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我們沒法听到可以信任的領導意见。自然也有那样的一些人，說什么无产阶级党的重建和扩大工作正在逐步实现，或是說什么实际上无产阶级党正在对所有各种斗争进行着領導。可是列宁曾經說过：“如果……不会领导群众，不会紧密地联系群众，那末它即使叫作党……，它也不是党，也沒有任何价值。”^①至于一部分知識分子用希望代替现实或是用“可能”的想像代替“实在”的事实而在脑中或紙上凭空描繪出来的“党”，自然更是“沒有任何价值”的。（下略）……]

[下面一段注，是现在对当时的回忆，这次新加的——当时我这样写了，而且也的确是这样想的。但实际上，尽管力量不大，那时确实有一部分人在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8頁。——譯者

从事重建共产党的工作。大概在我发表了上面那篇文章以后吧，我曾收到邮局里寄来的《赤旗》报。但是，报纸上连号数也没有，因此我甚至指摘说：“连这种伪造的《赤旗》报都出世了，情况真是混乱。”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认为自己可能看错了。直到几年后我小舅子大塚从事地下活动时，偶然有位同志对他讲，前几年曾经给河上肇寄去过《赤旗》报，我才明白当年的《赤旗》报并非伪造，而是真的。]

“以上的事实今天给我们提出了意义重大的问题。而大山郁夫同志的倡议建立新劳农党的计划，在我看来，不外乎是主张：既然完全失去了前卫队的带路，今后除了靠我们自己商量着来决定前进的道路而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倡议书中所说的确立党内民主、在组织内部成立自己的领导机构，就是这个意思。同时，由于处在这种断崖绝壁之上，是不可能成立我们自己的协商机构来决定我们今后的方针的（固然也有那类纸上谈兵的战术家，主张着这种绝对行不通的做法），所以不妨暂时不走这条路。所谓成立合法政党，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这个倡议，不用说，是意味着我们运动中的一个巨大的方向转变。不过我觉得，政治活动本来也就不是涅瓦大街的铺石路；鉴于当前的各种形势，今天像这样转变方向，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赞成这个倡议，原因就在这里。

“自然，同志中间也有相反的看法，认为像这样转变方向并不是必要的。我有个比较亲近的朋友，他就主张说：今天我们面前虽然摆着一个万丈深渊，但是我们可以用同志们的尸体把它填平，让后继者踏着同志们的尸体迈步前进。当然我相信，假如他所说的办法是攀登前人未到的险峻高峰的唯一办法、除此以外更无其他的道路可供选择的的话，那末我们的同志们是一定会互相拥抱着跳入万丈深渊，甘心情愿地用自己的肉体来把这个深渊填平的。可是在采取这样一种办法以前，最好还是能找到另外一条道路，这条

道路，尽管是迂迴曲折的，但归根到底，却能迅速而且可靠地使全軍一同达到山頂——我相信这就是倡議組織新劳农党的同志們的真正的意图。所以新劳农党的倡議书中也說：如果組織不了新劳农党，那时就只能破釜沉舟，立即采取第二步的作战办法。（在大阪举行的演讲会上，說到这里，当下就被到場監視的警察勒令中止了。）

“据我看来，这就是組織新劳农党的意义，同时也是新党发起人的真正的意图。但是，有人却指責說，不問人們的主观动机如何，这总是一种取消主义。可是据我看来，倡議組織新劳农党，目的只是想把工农同盟这个斗争形式变为政党組織的形式而已；不用說，这个倡議既不是想积极地反对无产阶级党的組織，更不是想主张取消无产阶级党的組織。

“两三日，我为了出席名古屋的一个演讲会，从京都动身，坐火車东行，半路上快要到达野州車站的时候，发现河都向左流，起初心里觉得奇怪。照一般公式理論来讲，河应该流到海里去。可是，现在尽管海在南面，也就是在右手那边，河却向北方——左手那边流去。可是再一想，这里的地势，北面比南面低得多。所以，河虽然想流向大海，在这种情况下，迫于当前的形势，表面上看起来却不得不向反方向流。因此，这一地区的河流，都先汇归琵琶湖。这里所以形成日本第一个大湖，本来就証明那个地方是一大片低陷的凹地。为当前的形势所迫，水就暂时只得向低陷的地方流。等到那个地方貯满了水，成了可以通航輪船的日本第一大湖以后，才找到一个出口，成为宇治川和淀川，經過大阪市，然后流入大海。政治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鋪石路这句话，其实就是指的这种情况。新劳农党的倡議者，当然不是主张重新建立无产阶级党，显然是要在无产阶级党之外建立一个合法政党，所以，毫无疑

問，这个党不該代替无产階級党，也不能代替无产階級党。这就好比野州火車站附近的河流，很明显地不是向着大海流，而是暂时背向着大海流。不过我认为，从整个无产階級解放运动的終极效果上来說，这个地区的河水，暂时也只有向琵琶湖那样的广闊的合法舞台汇合，而且，这样做也是最好的方策。至于有人把不直接致力于无产階級党的重建和发展巩固的人都看作取消主义者，我认为那只是一种近視眼的看法。

[在《社会問題研究》上发表的时候，这里加有如下的注——工农同盟編的小册子《新劳农党倡議的反动性》里，有这样一段話：“倡議建立新劳农党的人們(按：指大山郁夫等)，嘴巴上說‘我們决不是要和日本共产党鬧对立’，大吹大擂，暗中很得意。这只‘披着羊皮的狼’，多么巧妙地在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辯护，欺騙大众呀！但是，請看看他們的整个言行吧！事实已經把他們的真面目暴露了出来。……大山、細迫等說，倡議組織新劳农党，是四·一六事件后形势变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要求。不过，事实是如何呢？但看上面所引的話就很清楚，在共产党积极活动着的新党筹备会时代，他們就主张必須成立別的政党，这就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他們的取消主义、合法主义的本性。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却大事宣传他們的政党不同于別的社会民主主义各政党，而是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政党。多么出色的鼓动家！”

这种議論，真是太天真了。这篇論文的作者，难道忘掉了去年8月《馬克思主义》杂志上所刊登的共产国际政治部書記局公布的那篇《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里主张些什么了么？比如說，在第六項里，关于为重新建立被政府解散的各种組織(包括旧劳农党在內)而斗争一事，就說：

“这个方策的最重要的各点如下。

“1. 为爭取被解散的各种組織的合法性而搞群众运动；

“2. 必須重新建立这些組織。为了这一目的，該付出一切努力；

“3. 为了引导更广泛的群众向反动統治作斗争，必須創立新的群众組織——支持与防卫的組織。”

而且在第七項的开头还說：“对那些公开或隱蔽地放弃重建被解散各組織的斗争的一切尝试，以及一切退却情緒，党必須与之作不懈的斗争。”

还有，同一期《馬克思主义》的一开头，就刊登着須田麟造的一篇《与反动派同流合污的孟什維克的分裂活动》，里面說：“劳农党不是前卫党，却更不是社会民主党。劳农党是站立在阶级斗争立場上的公开政党。所以它很重視这样一项工作：批評和攻击以非阶级的妥协为领导原則的社会民众党、日本劳动党的干部，在群众面前揭露他們的行动。面对着解散，我們該做些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不让这个党（按：指旧劳农党）所集合的群众力量分散，立即展开强有力的群众斗争，争取重新建党的合法性。……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发动群众为工农群众的日常利益而斗争，使群众的战斗組織日趋强大，借群众斗争的展开，通过斗争以争取旧劳农党的重新建立和合法性。”

现在，根据工农同盟編的那本小册子《新劳农党倡議的反动性》的作者的意见，只要是“在共产党积极活动着的新党筹备会时代主张必須成立别的政党”的人，“就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他們的取消主义、合法主义的本性”。因此在这位作者看来，无论去年的共产国际政治部書記局也罢，《馬克思主义》也罢，都該看成是“非常明显地暴露出取消主义、合法主义的本性”，而且不得不这样看。多銳利的眼光呀！]

[下面的注，是现在对当时的回忆，这次新加的——这里我所引用的共产国际政治部書記局的文件里所說的“重新建立被解散的各种組織”，固然應該理解作其中也包括旧劳农党，而且事实上日本共产党也就似乎曾經本着这个宗旨，在旧劳农党解散后，馬上发动一个“新党筹备会”的运动；不过，所謂重建旧組織，显然是指通过斗争以争取合法性，而不是指建立一个我們所企图建立的那样的合法政党——一个一开始就甘拜下风、接受恩賜合法性的政党。可是我当时只想到重新建立組織的一层，因而虽然并没有违背共产国际的方針的意思，却对新劳农党的建立表示了贊成。我那时住在京都，大阪的小岩井淨曾經来看过我几次。最初他对于参加这个計劃，很躊躇。到现在我还記得很清楚，当时我們曾商量怎样才能設法探明共产国际的意见。关于建立新劳农党的問題，那时我只有同小岩井談过。上面也已經提到，前一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上，早已作出決議，不鼓励組織工农政党；可是，那时我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假如知道了这个消息，我和小岩井至少总不至于忽視根据各国經驗作出的国际決議，而参加新劳农党的建立。而結果，我們則被指責为叛徒。客觀上說不定确是如此，而且从整个运动来讲，各人的主观意图是没有考虑的余地的；不过在写私人傳記的时候，我觉得有必

要把主觀意图方面的情节也說个清楚。

还有，才走出书斋的我，当时判断錯誤，原是不足为怪的。可是，共产国际还是在一年以前，才作出不可成立工农政党的決議，而且那次大会在討論的时候，強調工农政党的必要性的人还是不少；回顾到这样一个事实，对实际运动的知識和經驗都非常缺乏的我；当时抱有同样的想法，就更加沒有什么奇怪了。

在共产国际大会上，印度代表奈拉揚曾說：“有些同志說，有人想用工农政党来代替共产党，我觉得这只是他們在担心他們自己幻想出来的幽灵而已。事实上，誰都沒有主张过工农政党可以代替共产党。……逐渐无产階級化的小資产階級的成分，往往比无产階級本身还多。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产階級，在殖民地革命运动中应当起一定的作用；然而，同这种小資产階級成分組成的反帝国主义战綫，将表现为怎样的組織形式呢？我們能不能让这种小資产階級成分氾濫于共产党中呢？那是不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印度共产党却不能不利用小資产階級的革命精力。所以，据我个人的看法，事情很清楚：这种反帝国主义的战綫，除了把城市知識分子和小資产階級成分統統用工农政党的形式組織起来，由无产階級加以領導而外，沒有別的办法。在这当儿，我們应当想起斯大林同志1925年5月在东方大学所作的关于印度問題的演讲。这种工农政党，在印度是1925年前后开始成立的，它們都采取了坚决的态度。这些工农政党，在打倒帝国主义、爭取印度絕對独立以及其他类似的口号之下，为了对西門委员会举行示威游行，在孟买組織了三万工人。今天的罢工运动，就由这些工农政党領導着。利洛瓦的罢工，是在共产党的直接管理之下，由工农政党执行的。我們现在处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許多工会被改良主义的領導者搶了去，农会有待組織起来。在这种形势之下，难道我們现在还要主张解散这些工农政党嗎？如果这样主张，那就完全是教授式的教条了。这是列宁所一再警告过的。总之，請观察一下印度的形势吧。成为共产主义者影响群众的工具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相信，工农政党在印度共产党影响之下，对于在印度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起着强有力的輔助作用，这是很清楚的。……”

还有一个印度代表达特也在会上說：“我想強調的，就是工农政党的問題，凭草案里那样簡單的一句話，是解决不了的。……印度现阶段的工农政党的特征，是它起着共产党和群众之間的重要的桥梁作用。”

这就是說，在日本倡議成立新劳农党的那个时候，我正抱着和共产国际大会上印度代表們所主张的同样的意见。經過討論后，共产国际大会所决定的綱領是：“特种的‘劳农政党’，尽管在某个时期內有它的革命性，但是它很容易轉化为普通的小資产階級政党。所以，我們不主张組織这样的政党。”而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旧劳农党只有很短一个时期有过革命性质，至于我們所搞的新劳农党，則这样的性质連一次都沒有具备过。]

“有人也許会指責說，工农同盟向合法政党轉变形式，就是墮落为机会主义。其实，所謂机会主义，打个比方來說，就好比一个登山运动員，他并不是根据周围的情况或登山者的体力等主、客观条件上的不可避免的必然要求，却一味貪图途径的安易，每次总是沿着抵抗最小的路綫前进，有时折向东边，有时折向西边。机会主义的特征是它并不是經常看向山頂（也就是忘掉了无产階級解放这最后目的），而且缺乏早日登上山頂的不断努力和誠意（不是站在階級立場上积极地进行日常斗争，却以非階級的协调主义为原则）。当然，照这样，尽管走得怎样快，結果总是在山脚或半山腰里轉来轉去，無論經過多少年，也到不了山頂；像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們是早就极力反对的。我們现在决不是要毫无必要地轉变方向，也並沒有失去登上山頂的意識。我深信我們今后的实践会比任何言詞更清楚地来向諸位証明这一点。

“还有，当我们开始这样轉变方向时，有些一开头就沒有和我們一同前进、或是老早就脱离我們队伍的人，也許会洋洋得意地自称有先见之明，說老早就应当像这样轉变方向了。可是，前面已經讲过，我們所爬的山，是从來沒有人攀登过的山，所以要是不通过实际的斗争而直接和它实际接触，那末究竟應該用怎样的方法从哪条道路爬上去，事前是不可能具体知道的。即使別的国家有那样的例子，但是甲山和乙山的各种具体情况大有不同，爬登甲山的

經驗，對於爬乙山的人來說，決不能照樣有效。这个道理和打仗一樣，不能以為曾經打過幾次仗，就把一定的戰爭中的部队的行动事前一一加以具体規定。

“不仅如此，我們不應該忘掉，我們的行动，無論是前进或后退，它的正确与否，是与一定的時間有决定性的关系的。列宁在1917年曾經提出一定的口号，那口号在2月27日到7月4日这一期間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就像列宁自己所說的那樣，这‘口号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唐·吉訶德的怪想，或者是一种笑料。这个口号在客观上会欺騙人民，会使人民产生一种錯觉’。^①我們必須注意，这里明确地規定着日期，即2月27日至7月4日。客观情况时时刻刻在变化，我們的战术也就跟着要时时刻刻加以变化，而在这个問題上，時間有着决定性的关系；通过上面这个例子，这一层是很明显的。要是有人錯认为無論什么事，快就是好，那就非常滑稽了。

“我听说有人對我們夸称他們有先见之明，这才发现：在这世界上，胆小鬼說大話的机会，只可能有一次。全軍——主力部队——被迫大大轉变方向的时候，胆小鬼因为在一年半載以前早就逃之夭夭了，所以总能夸称自己有先见之明。可是，在我們看来，一个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人，居然能夸称这种先见之明，倒是莫大的耻辱。

“自然，我們早就料到，成立新劳农党的提案将遭到种种反对，同时大山郁夫等同志将受到集中的指責和攻击。不过，我認識到，从整个运动的終极效果來說，那个提案是正确的，所以我不能弃大山等同志而不顧，所以我不顧一切指責和攻击，对于这件事一开始

^① 《論口号》，見《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9頁。——譯者

就加以全面支持，直到今天。同志们：旧劳农党时代，我因为担任着官职，受到官吏服务规程的限制，不能公开成为党员，可是今天，我幸而成为一个放浪江湖、无拘无束的人，可以像出籠的鸟儿那样在广漠的原野里飞翔了。如果新劳农党能成立、而且党允许我加入的话，我这次一定入党当一名党员，尽管才菲力薄，而且身体羸弱，我一定要担任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誓与工人和农民同志在这充满荆棘的解放运动的道路上同生死，共命运。”

我不仅在大阪，还在名古屋、京都、神户作了这样的演说。这样的演说，当时的听众听了就可能觉得十分沉闷，更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了好些年，今天再来读它，这在我本人都觉得沉闷，大概旁人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因为我感觉这篇演说如实地表露了我当时的想法、心境以及决心，所以不怕丢丑，还是把它的全文抄在这里了。当时参加新劳农党的人们，并不是全都抱着同样的心意：他们的动机和用心，各有不同。今天说句老实话，当时就连签名发表建立新党提案的大山和细迫，也不一定是以发展和巩固共产党为第一目标而行动起来，不过是留恋过去，追求旧劳农党时代的繁华梦而已。像大山那样的人，本来也许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我和他来往的时候他手里经常拿着列宁的著作）。可是我呢，却往往容易流于主观，生就一副脾气，总是认为自己是怎样，别人也是怎样，而在成立新劳农党的时候，也就不免以自己的想法来看问题。这一点，在这篇演说里也许表现得很明显。这篇演说，与其说是叙述了当时成立新党的客观意义，倒不如说是表白了我自己的主观意图。几十年来对于一向爱好清静的书斋生活和写作生活的我，到了已经被人称做老头儿的年龄，拖着一个羸弱的身体跑到街头上，尽管那是个合法政党的场面，在我总是一种需要勇气的前进，而决不是卑鄙的退却。

1930年1月，迁居东京。一开始就 糟得很的新劳动农民党

1929年8月作出成立新党的提案后，馬上就开始成立新党的筹备运动(在这一时期里，我东奔西走作着如上的演說，还写了一些文章);大約經過了两个月，到11月初，就在东京芝区的协调会馆举行了成立大会。当时《东京时事新报》上，刊登消息說：“以地方代表的資格从京都赶来出席劳农党成立大会的河上肇博士，十分引人注目。这种从各府各县前来参加大会、根据党的规章仅有发言权的代表，約有三百名；河上博士夹在他們中間，不声不响地坐在代表席上，他那副样子，給人家一种說不出的凄凉冷落的感觉。”的确，在旁人看来，我在新劳农党里，也許一开头就显得冷落吧。现在想起来，那个成立大会，我其实根本不應該去参加；我去参加那样的大会，实在沒有什么意义。最足以說明这一点的，就是到现在我还觉得，每次当我站上讲坛时，听众給我的感应和以前大大不同了。我的演說，不像以前那样受到欢迎了。我自身虽然尽管参加了劳农党，却并没有变质，但是集合在会场里的群众，已經不是以前那样的群众了。我的神經不容易和对方相通了。那些听众，倒是大山郁夫的最好的对象。这也表现在不久以后选举众議院議員时，大山的演說博得空前的欢迎，因而胜利当选这件事上。——我在成立大会的当天，就已經感觉到这样的空气。

旧劳农党时代，我还在大学里教书，也曾由于对方的要求，給党的年会送过賀詞，而且还被推荐为党的顧問，虽則我没有担任。可是，这次的新党成立大会，尽管我亲自出席了，却直到最后一天，都没有給我发言的机会。我怎么都觉得不够劲，等到最后，自

己提出要求，讲了一番祝賀的話。不过当我走上讲坛的时候，他們只是馬馬虎虎地把我介紹一下而已，因此后来在休息室里休息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地方代表，居然当着我的面問：“河上博士沒有来么？”还有，党章虽然几乎完全沿袭旧劳农党的，却独独不設置顧問一职。甚至連大会上发表的中央委員里都沒有我的名字。虽然我本来只想当一个普通黨員，絲毫沒有計較名位的念头，可是在代表席上听完发表幕后所决定的職員名单的时候，心里却不禁有些感到寂寞。现在想起来，我这个人，对于新劳农党，也許一开始就是个累贅。而愈到后来，这种情形愈显著，最后竟成了破坏党的障碍物了。下面我想叙述一下其中的經過。

成立大会结束后，到12月13日，我从京都动身，預定去九州地方做十天的游說。十天的旅行，天天要演說，这在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經驗。路上我十分疲乏，連同行的人也看出了。于是，在熊本就和大山等分道揚鑣，他們到鹿儿島去，我一个人到佐賀去。那天晚上，我在佐賀西方的出名的溫泉地武雄住了一夜，以資休息。由于到处演說，都收入場費，所以演說会主办者农会福佐联合会弄到了不少运动資金。因而，他們說是“今天晚上要慰劳先生一下”，給我在武雄的一家最好的旅館里包了最好的房間，用貴宾的待遇款待我。我在京都帝國大学差不多担任了二十年教职，特别是后来的十年，临时收入十分可观，每月的一点薪俸簡直不在話下；尽管这样，我却从来沒有大手大脚花过錢，溫泉之类的地方一次也沒有去过；所以住在武雄的那一夜，是非常难得的。那里的溫泉，不在旅館里，而在旅館外面。我当时实在疲乏不堪，所以尽管平素极爱洗澡，也打不起精神跑到外面去入浴；但是由于人家特地給我包了特等浴池，不去未免可惜，所以还是和大家一道去了。用类似大理石的石头砌成的干淨无比的浴池里，噴溢着碧青的激瀾

的泉水。我生平还是第一次洗到这样的温泉。这是到今天还留在记忆里的当时的苦痛回忆中的唯一绿洲。后来我在牢监里，还曾多次想到这一晚上的事。由于旅馆主人的要求，那天晚上我曾给写了几张册页，那些册页怕早已给扔进废纸篓里去了吧。

我从九州回来以后，终于决心全家搬到东京去住。准备在年底以前先把行李全都运走，一开年就搬去。

京都帝大的左翼学生（就是以前组织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学生们。研究会被解散以后，他们又组织了怎样一个名称的会，现在记不清了）听到我要搬到东京去住，就说要开个送别会来欢送我。我当时心里想，学生到底是可爱的，他们尽管在发生新劳农党问题的时候猛烈地指责我，可是一旦听到我要走，却仍然依依惜别。当我还在大学里教书的时候，这个社会科学研究会不知给我添了多少麻烦。福本主义流行的当时，我讲的话，他们一句都不听，可是临到要和大学当局办什么交涉，却总是利用我出面。他们号称是斗争主义，无论开一个会或贴一张告示，所采取的手法，总是故意和学校当局闹对立，刺激警察的神经。尽管如此，我却总是站在双方之间，尽可能帮助他们达到他们的要求。为了这类事情，我不得不抛开手里的书，在研究室和学监室之间来回奔跑，一天跑上两次或三次。还有，后来他们逼我辞职，其理由之一，就是因为我当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指导教授（虽然只是形式而已）。我当时想，大概正因为这些关系，所以学生们才想开个送别会欢送我的吧。

同年4月我离开大学的时候，经济学部的学生曾在大学主楼的大会堂里为我开了个送别会，临散会时，高呼万岁，声震屋宇。我家离学校很近，家属听到这声音，还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回家的时候，许多学生一直送到我家门口，又在门外高呼万岁。家里的人预先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场面，所以守在屋子里没有出来看。这

次听到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学生們要为我开送別会，料想又会和上次一样，所以都說，今天晚上总得出来看看熱鬧了。

可是，去到那个送別会上一看，原来当天那个会的目的，不是为了欢送我，而是为了把我痛罵一頓。学生們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攻击新劳农党，指責我，說我不應該参加这个党。有的甚至公开地說，今年山本宣治遇刺以后曾經去先生家里临时充当护卫，现在想起来，那样做簡直是无聊。在稠人广众中間，受到四面八方的痛罵，要是我有半点內疚，以我的个性來說，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在那里长久呆坐下去的。但是，回想一想自己絲毫无愧于心，所以也就能坦然地和他們相周旋。我这个人，良心上要是有一点抱愧的地方，就非常不带劲，可是要是自己觉得沒有做錯什么事，就对誰也不肯輕易让步。所以我就堂堂地对學生們宣言，說是：現在我們抱着不同的意見，只有各自朝自己的信仰前进；但是，我願意向大家坚决約言，假如将来有一天証明是我錯了，首先我自己就会把旧我打倒，狠狠地唾弃自己；現在暫且用不着爭論，可让時間来作判断。說过这番話，我就走了。此后經過了十几年，当时那样大言不慚的学生們，到今天，內中究竟有几个能毫无慚愧地站到我这老头儿面前来呢？伤心的是，当年的急进知識分子，到现在能留在記憶里而忘不掉的，实在少得很。

1930年1月2日上午10点20分，我和妻坐上京都开出的三等特別快車，离开了住了二十一年多的京都，而去东京。劳农党的人們举着許多旗帜赶来送我，前面两条长旒上写着“欢送河上博士”，后面是工会旗。因此，我沒有顾得上和赶到火車站来送行的佐佐木惣一博士等好好話別。

当初武士鞭打紅棕馬从京城出发，今天却成了一場梦。

这是前年 11 月，我在十余年后再回到京都居住的时候，想起当初的事情而偶然写成的一首短歌。前面已经说过，左翼方面对于当时参加劳农党的人给加了许多恶名，如机会主义者、卑鄙的人、失败主义者等等，但我在主观上却并没有因此而感觉什么痛痒。我本来是个读书人（正好抄写到这里，原鼎从东京来看我，夹七夹八地谈了一阵，他说：“您常常把自己说成是读书人，我看其实您不是读书人的性格，在本质上您是街头人的性格。”让他这样一说，我也觉得不是没有道理；关于这一点，以后另外再写篇东西来说明），即使一直不声不响地躲在书斋里，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而且那样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不知道安逸得多少；但是正因为我觉得如果采取这种态度，才是机会主义，因而毅然抛开了安逸的生活而走到街头上来。所以在实际上，我是抱着一颗扬鞭策马、英勇上阵的武士的雄心，而从京都出发的。“拔剑征万里”——这确是我当时的心境。

可是，到了东京以后，我对于新党的活动，却一天天地不满起来。环顾周围，觉得自己的真正的同志几乎一个都没有。

在新劳农党里，最受用的大概是大山郁夫。照长谷川如是闲的评论，旧劳农党时代，“大山一派虽说同非法主义有关系，却完全只是担负着合法活动的工作；说到同共产党的联系，那不过是在战术上有着合法的一面的共产党，在合法活动上同大山一派保持联系而已，所以完全不会有什么非法的表现”，所以，无论怎样勇敢地进行斗争，也不用担心触犯治安维持法。可是，即使如此，总还是同共产党有着某种联系；在大山说来，如果能把这种联系完全割断，搞上一个在组织内部有自己的领导核心的合法政党，那当然要放心得多。再则，本底子不是共产主义者，却得在共产党的领导（尽管是间接的）下当傀儡，也不是一件痛快的事。而这次的成立

新党，那就不仅是在組織内部有自己的领导核心，而是把整个党的领导权全都捏在自己手里，而且完全和非法要素断絕了关系，所以是安逸得很；如果这样一来而仍能繼續保持“我們的出色的委員长”的名声，那就再理想也沒有了。‘这次我务必搞个合意的党’——这就是起草成立新党提案当时大山的意图，总之，新劳农党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一个大山党。共产党的发展和巩固，根本沒有放在他眼睛里。經過一段时期的察看，我觉得大山确实非常适宜做一个城市小資产階級政党的党魁，他比吃飯都喜欢作演說，只要来听街头演說会的人多，他就高兴，此外似乎什么也不在他心上。新劳农党成立后不久，竞选众議員的时候，大山在他的演說会上获得罕见的大成功，一举补偿了香川县的失敗而当选上众議員；那时的大山，也許是对新劳农党的活动最感到滿意的人。

細迫兼光也和旧劳农党时代一样，当上了秘书长，可是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了。前面說过，旧党时代，委員长大山，同一切非法方面都不亲自打交道，万事都交托給書記局办理；同时，書記局所制訂的計劃，沒有二話，一律照办。在这样一种組織机构之下，大山作为“我們的出色的委員长”，細迫作为“名秘书长”，相互輔助，發揮着各自的机能。可是现在，新劳农党却同非法方面完全断絕了关系，委員长一点都用不到秘书长的这种輔助了。秘书长的背后，已經不再有共产党的威力了。所以，大山一开始就沒有把細迫放在眼里。举个例來說，成立新党的提案是分头起草的，大山和細迫各自起草了一个，可是結果，大山却沒有采納細迫提案的任何部分，只是让細迫和上村进两人在他自己起草的提案上签个名而已。因为一开头情况就是如此，所以后来受到极端冷淡待遇的秘书长的被开除出党，也就成为必然的結果；到头来，“名秘书长”也和旧劳农党一样，一去而不复返了；在新劳农党里，細迫秘书长自始至

終几乎只是个被漠視的人物而已。

至于我呢，大概一开头就被认为是渗透入新劳农党的共产主义系統的一派，而加以严密防范。为了成立新党，我的积极贊成也許被視為必要的；可是，大山一派的意图，本来也就主要在于清除党內的共产主义因素，所以新党一經成立，我这个人，在他們眼里，自然就漸漸成为一个須要防范的障碍物了。而我这方面呢，贊成建立新党，不过是为了达到发展和巩固共产党这一目的的一时方便之計。所以，站在我的立場上說，只要能对这个目的作出貢獻就行，至于劳农党本身，無論搞成怎样都无所謂；相反地，如果劳农党本身日益发展，竟至妨碍这个目的的达成，那倒是毫无意义而有害的。总之，我不是劳农党第一主义者，从而为共产党着想，就希望新劳农党尽可能成为旧劳农党的再版；这和大山一派的意图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新党成立后不久，党內就傳說大山和河上閘对立，这种风声，到后来一天比一天扩大，这也是一开头就注定了的。

新劳农党本身既然包含这样的內部矛盾，在工会、农会的組織和斗争問題上，也就受到了不贊成組織合法政党的人的激烈反对，有些地方还招致了左翼陣营的四分五裂（尽管我們希望成立一个后来所采用的人民統一战綫）。不久，共产国际否认新劳农党的消息，大家也逐漸知道了。重建的共产党工作，似乎也逐漸在进行；在它領導下的全国工会協議会（全协）的活动，也显然愈来愈活泼。于是我想，这可真是左右为难了。如果同新劳农党一刀两段，就此避不露面，那是最最省事的；可是这种态度决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所应采取的态度。既然已經把群众拉到了这里，那就非极力想出一个善后办法不可，可是这却是个非同小可的艰巨的任务。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一条走投无路的死胡同，一时完全失去了主张。那时期，恐怕是我毕生中最最忧郁的时期之一吧。

劳动农民党解散运动

不过，形势的发展却意想不到地快。新劳农党在去年 11 月才成立，成立了还不到一年，到 1930 年 8 月底，大阪府劳农党支部首先就发动了一个解散运动；这个消息在 29 日的各种晨报上登出后，細迫秘书长接着就在当天的晚报上突然发表了贊成解散的意见（大概他和大阪方面早就有了接触）。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所以我把它的全文抄在下面。

关于劳农党解散问题的意见书

劳农党的解散问题已经表面化了，大山委员长也已发表了意见，所以我也来谈谈我的看法。

劳农党这个组织，本来具有世界上少有的、非常特殊的任务，它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不知道要在什么时候怎样地解散。换句话说，劳农党的目的在于发展和巩固被破坏的左翼阵营、左翼工会和农会，它是在这样一个十分善良的意图之下成立的。

可是，事情是怎样发展的呢？全国农会方面，左翼阵营一分为两，力量削弱了。这是事实，是没有怀疑余地的。工会方面，起初大阪金属、大阪木材、东京市从（东京市从业员工会）等工会分裂了，后来虽然利用劳农党的合法性，由于战士们的奋斗而陆续重新建立起来，可是这些工会，除了在全协（全国工会协议会，就是三·一五事件当时被解散的全国工会评议会的后身，它并不是合法的组织）力量薄弱的地方，以及坚决保持最初的善良意图的领导者之下的两三个工会而外，大多数都正走上绝对排斥全协的道路。事情像这样发展，是不会符合全体党员的意图的。而这样的倾向，在共产国际采取排斥劳农党的根本态度而劳农党却坚持劳农党第一主义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倾向；所以，为了忠实于我们最初的意图，我们应当克服劳农党第一主义，明确树立解散劳农党而发展工会和农会的大方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道路。……

由于細迫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书，經過了一些曲折之后，劳农党在9月3日的第三次常务委員会上，终于决定开除細迫出党。我虽則不是委員，却向例列席这类會議，那次也列席了，觉得当时会场里的空气，对于从旧劳农党以来长期担任秘书长的細迫，未免过分冷淡，因此主张应该和細迫本人好好地談一談，而我自告奋勇担任了这个差使。因此，我就获得了解散問題发生后第一次和細迫作个人談話的机会。那时我劝他，现在不妨稍稍隐忍一下，留在党里，尽力做些应当做的事情，到实在沒有办法的时候，再尽可能率領多数同志一道脱离，也决不嫌迟；可是細迫不听，而我呢，也不想立刻和他采取同一行动，結果听他說了一句“那末我在党外等着您吧”，就和他分手了。这件事既然沒有能够在我手上圓滿解决，到了4日那天，劳农党就在报纸上公布了开除細迫出党的消息，同时还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理由书，理由书的結尾說：“党本部期望着細迫兼光有朝一日从迷梦中觉醒，重新再参加到劳农党的旗帜下面来，茲将开除他出党的經過，向全体黨員和全国的无产大众报告如上。”

当时我虽則沒有立刻和細迫采取同一行动，但是对于大山一派对待細迫的态度，却一再借着机会，表示不滿，觉得細迫从旧劳农党以来当了多年的秘书长，不应该对他那样冷酷。在那时掌握在我手里的《劳动农民新聞》的9月11日号上，我就发表了下面这样一篇文章。

送 細 迫 君

我們的陣营自从劳动农民党解散以来，換过多次名称：新党筹备会、工农同盟、劳农党。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运动不比坐着汽車在涅瓦大街的鋪石大道上风馳电掣，同时每一次都伴随着若干同志的去就問題。細迫兼光从旧劳动农民党时代起，直到今天为止，一直担任着繁重的秘书长职务。我們得到

他很大的帮助。我們的《劳动农民新聞》，多年来也受到他的哺育之恩。可是，现在由于发生了劳农党的解散問題，想不到要同这位多年来的同志分道揚鑣，这是非常遺憾的事。特别是，像这样的重大問題，不先在党内进行彻底的討論，未經充分研究意见是否果真不可能一致，就造成了組織上的分裂，这一点，不問其原因何在，乃是我們所最感到遺憾的。现在，我們要和細迫分手了，我們深深感謝他多年来的功績，并且希望将来有一天大家能再在同一陣营里聚首。

当初我之所以沒有和細迫采取共同行动，是因为我对他的退党手續、时期、态度等抱着疑惑的緣故。前面曾經提到过，发起建立新劳农党的事，最初是我給細迫的一封信所引起来的。既然其中有这样一番淵源，照說他假如早已知道大阪方面的消息，并且决定起而响应，就應該事前把他的决心通知我，并且和我商量一道办事；用不着把我撇开。而且，細迫身居秘书长的职位，假如他确实认为劳农党有解散的必要，我觉得他首先應該把这个問題在党机关里提出，尽力引导全党同志走向正确的方向。再說，当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解散意见后、由于党的要求而出席常务委员会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总觉得他的态度似乎缺乏魄力和确信。我觉得他的态度非常消极而不彻底，似乎是认为：“劳农党的声誉愈来愈坏，而且即使留在党内也沒趣，现在大阪方面既然发动了解散运动，不如乘机歇手不干，来得合适。”因此，我在一时之間就沒有跟着他走。

至于大阪方面的实际情况，我也一点都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去年发表建立新劳农党提案时，我在京都曾和大阪的小岩井淨碰头过几次，交换过种种意见；既然有这样一番关系，如果小岩井抱有坚定的信心，那末在他所負責的劳农党大阪府支部联合会发动解散运动之前，即使不能特地来京都，也該写封信来报告一下情况，劝我一道行事才是，結果他却沒有这样做，所以在我看来，归根

到底，这是由于行动上缺乏信心的緣故，所以他的态度似乎也 and 細迫的态度一模一样。

因为我抱着这种想法，所以当时我虽然正在为劳农党的残局不好收拾而独自苦恼着，却没有在听到大阪方面发动解散运动的风声后，立刻起来响应。

10月1日发行的《劳动农民新聞》上登載了我写的一篇《爭取我党組織的发展的改造》，那篇文章很可以說明我当时的心情。

“……属于解散同盟的同志們的最大錯誤，就是断定劳农党的組織已經固定化了、化石化了。……我們劳农党在去年成立大会上，规定本身是‘工人和农民的战斗同盟’。可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充分采取这样一个同盟的組織形态，暂时还有困难，所以一面声明‘我們在最近的将来一定使这样的組織（以最完善的形态）实现’，另外又說：‘支部以及支部联合会的組織，虽然极不彻底，却必須暂时忍耐一下。’根据这些話，建党当时的組織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就很明白了。也就是說，党本身承认这种組織‘极不彻底’，而且声明一定要在‘最近的将来’加以改造。党外的人就不讲，党内的人，特別是一些負責的領導同志們，总不会忘掉我們建党当时的这种意图和預定吧。不料解散同盟的同志們，連一个負責的改造組織的提案也不想提出，就突然以劳农党现在的組織有缺点为理由，而唾弃自己昨天还是其成員的党，以为得意。我們敢說，这是极端不負責任的态度。不論他們的主观意图怎样，出于怎样的动机，都是对过去属于同一陣营的同志的彻底背叛。劳农党本身在建党当时就自认組織‘极不彻底’，而且宣布一定要‘在最近的将来’加以改造；尽管这样，解散同盟的同志們却断定这个組織沒法变动，宣传‘抱着像劳农党那样的組織方針的党，无论怎样发展，也决不可能达到較高的形态’等等，这完全可以說是对大众的一种欺

騙。‘建党后仅仅一年就解散，虽說太快了，可是为了看穿劳农党有向反动方面发展的必然性，一年工夫也足够了。’这是什么話呢？我們能相信这样的話是出之于同志——声明一定要‘在不久的将来’根本改造党的組織而团結在一起的同志——的口中么？我們决不想为建党当时的应急組織——自认为‘非常不彻底’的組織，‘暂时忍耐一下’的組織——辯护。在这样的組織形式之下难免产生种种不良傾向，这大体上也是早在預料之中的。这不是什么‘为了看穿……，一年工夫也足够了’，而是一开头就明摆着的。关于这一层，建党当时党的文件就是最好的証明。所以，如果說过去一年中間我党有种种不良傾向，那末，现在正应从那些經驗中充分汲取教訓，集中党内最大精力来从事早已預定的改造組織的工作。然而，解散同盟的同志們，正当此时，却宣称看穿了劳农党的反动性，突然扔掉昨天还手挽手一道前进的同志，昂然玩弄着左傾的言詞，一味抬高自己，把昨天的同志罵得就像掉在万劫不拔的泥坑里一般，这决不是阶级战士应有的态度。这其实只是証明：过去作为同志，他們是不可靠的同志，同时無論对誰說来，他們都是不可靠的人。

“如果我們的根本意见有分歧，那末無論昨天是多么亲密的同志，也自然非分手不可。这是一种阶级义务。还有，如果对于斗争已經精疲力尽，那末暂时隱退，也是不得已的事。不过，在这种場合，分手以前，要尽一定的义务，分手以后，要采取一定的态度。忘掉了这一层、忽略了这一层的时候，就是一种背叛的行为……”

这样的文章，现在对于第三者來說，也許不会有半点兴趣，可是我为了种种理由，仍然不厌冗长地把它抄在这里了。

首先，这样的文章，仅仅在《劳动农民新聞》上发表过，到今天可能哪里也找不到了。可是重新讀它的时候，我自己都記不大清

的、十多年前的心情，现在却跃然紙上。因此我不願让它散逸。（我手边本来沒有这份报纸了。现在能够弄到它，是我的朋友畑田朝治的功劳。）

其次，我觉得这篇文章最能表现我生平的作风，所以我特別不願意让它散逸。

我年輕的时候，曾和无我苑的伊藤証信鬧得不欢而散（不过在私交上到现在还很好）。五十岁过后，又和劳农党的大山郁夫鬧得不欢而散了。中間虽然相隔二十多年，可是前后的情况却非常相仿。凡事只看表面的人，也許会认为河上这个人实在靠不住，只要心情一变，就会随时对原来一道共事的同志啐口唾沫逃走。但是事实上，我并不得是这样，这只要看一看我对待劳农党解散問題的前后行动，就明白了。幸好那时的資料，到现在还充分保留着，所以我想把这一点弄个明白。

在別人眼里，我可能还是一个缺乏操守的人。可是我自己认为，我并不是一个寡廉鮮耻、不断变节的人。我当初由于憧憬着絕對非利己主义而参加了伊藤的无我苑。后来我虽然把伊藤的无我爱教理斥为一种邪說，却仍然憧憬着絕對非利己主义，始終不变。不，倒反是正因为我憧憬着絕對非利己主义的緣故，所以我才离开了无我苑而和伊藤分了手。和这同样，我由于信奉共产主义而参加了大山的劳农党。尽管后来我把劳农党斥为一个邪党，可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心，却始終毫无改变。不，倒反是正因为我始終信奉共产主义的緣故，所以我才拆散了劳农党而和大山分了手。人家看我这人朝秦暮楚，我自己却认为我始終操守一貫，对于自己的信仰从未动摇过。今年我六十五岁，已經快将結束我的一生了；我深信：絕對无我这一宗教真理和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是我毕生的最大收获，这两样东西在我心中牢不可破，形成了辯証的統

一，日后将使我可以无比的安泰，离开人世。

岡邦雄曾經在 1933 年 8 月份的《文艺春秋》杂志上写过一篇《河上博士生活中的一貫的东西》，其中說：“像博士那样經歷过多次大‘自我清算’的人是很少的，而且他的‘清算’，决不是胡来，却仿佛有那样一条表示博士生活的特征的紅綫，貫穿于他漫长的思想生活的內部，几次清算，都是以那条紅綫作为軸心的。”讀了这些話，我是很高兴的。实际上，我的“清算”决不是胡来。他还說：“我觉得，河上博士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进行清算，这說明博士不像一般的学者，他是个少有的老实人，正义感异常敏銳，因此，上面所說的那条紅綫，一方面說明博士的个性，同时也在最高水平上如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紀末叶以来日本最真挚的知識分子阶层的思想发展。博士决不是一个个性弱的人。但是，正因为他个性十分真挚而且嫉恶如仇，所以反而使他从个人的偏执里解放出来，而不致偏离常径。”这些話虽然过奖了，不过总之，在承认我有一貫的东西这一点上，使我讀了觉得比杉山平助的批評要好受得多。

不錯，我曾經一再对自己进行过清算，而且还曾以急剧轉折的角度轉变方向。但是，在那种場合，决定我的行动的却不是單純的道听途說、世上的毀誉或是一般的潮流之类。这就好比路分两条，我要是认为該走右面那条，那末即使走左面那条的人多，我也仍然走右边那条。而且即使愈走愈觉得不对头，还遇到許多折回头的人，都說这条是死路，走不通，而我自己也觉得这样走不妙，我也还是不肯就此回头。不尽量走到我所能够走到的地点，亲眼看到是死路，我是不死心的。一定要等走到最后，亲自碰到了断崖絕壁，确定这条路絕對走不通，那时我方肯回头。而到这时，我就要大声呐喊，叫大家及早回头，直到声嘶力竭。当初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参加伊藤的无我苑以及旋即离开那里的。牺牲虽然相当大，而且

仿佛走了許多冤枉路，可是对于伊藤所提倡的无我爱教理的是非长短，比起单单的旁观者来，却要清楚得多。后来，我又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抛弃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抛弃了资产阶级所宣传的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而一經这样做了之后，即使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到严厉取締，在市場上完全消声匿迹，即使战争发生，我所隶属的资产阶级国家吃了败仗，我也至死不会再来一个转变，重新走那已經被我抛弃了的道路。在劳农党的問題上，也是这样。小岩井脱离了，細迫也脱离了，大势所趋，已經摆得清清楚楚；尽管如此，走路不走到尽头，我却不肯对大家喊出“这条道路到底走不通呀！”这句话。

每有所举动，总要大嚷大喊，这是我的作风；不过，既然有所举动，我就抱有一定的信心。要是沒有信心，我决不敢大声招呼人家說：“喂！大家一道来吧！”所以，我永远不会領先。感觉生来迟鈍，而且也不想凭感觉来行动。就像年輕时候到学生宿舍飯厅去时总是落在人家后头一样，科学上从事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接受列宁主义的影响，我也落在敏捷的人們的后面。关于劳农党的解散問題，我也暂时落在小岩井和細迫的后面了。

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一連串的事实，有必要談一談劳农党解散問題发生当初我所采取的态度。因此，我才不嫌冗长，把当时所写的文章抄在这里了。

起初抱着这样的态度的我，后来却竭尽全力，去打倒劳农党。可是，像这样改变态度，是費去不少時間的。在旁观者看来，这件事情大概做得非常糟糕。不錯，事情做得一点儿也不机灵，不老练。但是，不管怎样糟糕，它却非常具体地表明了我的作风的特征，所以对于我本人來說，是有相当趣味的。在下面，我要談一談：任何事情照例都落在人家后面的我，解散問題发生当初写了上面

那篇文章的我，后来怎样全力以赴地从事于解散劳农党的工作。

小岩井和細迫相继脱离了劳农党以后，我在党内孤零零一个人，连一个可以商量商量的同志也没有，处身在劳农党第一主义者的中间，简直是孤军作战。和我一道迁居到东京的我的小舅子大塚，对马克思主义虽然修养不足，却经常在我左右，最忠诚地为我的出处进退操心着。可是就连他都看不入眼劳农党本部那种只把街头演讲会当作拿手好戏的态度，不久就离开东京，回到京都，专心从事组织工会的工作。由于他的惊人的忘我努力，京都地方的工会迅速发展和巩固，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就像水向低处流、海绵吸水那样，陆续被吸收进工会，工人组织率之高，在京都地区简直是空前所未有。他既然用全副精神在搞工会运动，自然就顾不到别的事情。所以，尽管解散运动最初发生于近在咫尺的大阪，他也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我和他一个在东京，一个在京都，而且情况又是这样，所以关于解散运动，要想和他商量，也无从商量起。像这个时候那样独自一人呆在异己分子中间，什么都不得不凭个人的主意行事的境况，在我一生中是少有的。

到现在我只记得，在小岩井和細迫走后，我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党内，为了解散劳农党，凡是能做的事情我都做了；至于详细的经过，却全都忘了。不过，幸而手边留着一些《劳动农民新闻》，现在就根据这份资料，把当时的大致经过记述如下。

前面说过，劳农党大阪府支部联合会是在8月29日最初公开发动了解散运动，細迫是在当天的晚报上发表了她的赞成解散的意见；至于劳农党本部，则在8月30日那一天，对此事件发表了声明。那篇声明，先是说：“劳农党本部深信在目前客观形势下，我党的牢固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可是接着却插进了这样一段话，说是如果形势转变，“由战斗的群众组织起来的劳农政党，必然要逐渐

地或立刻就解除它的政党的任务,或則轉化为純粹的‘劳农同盟’,或則彻底解散本身的組織。但是,那时的解散問題,……必須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也就是在实践斗争的过程中、明确的方針下,加以解决。所以,劳农党的解散,只能是向自己的斗争形态的更高阶段的发展。”这就承认劳农党是可以解散的。本来书记局的初稿里没有这一段話,是后来根据我的意见加进去的。

因此,我才在9月11日发行的《劳动农民新聞》上发表了一篇題为“什么叫做劳农党的发展的解散”的文章。文章一开头說“上月31日劳农党本部发表的声明里,有‘劳农党的解散,只能是向自己的斗争形态的更高阶段的发展’这样一句話。我简单地把它叫做发展的解散,以区别于机械的解散”,下面說明什么叫做发展的解散。

后来在9月21日的《劳动农民新聞》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工农政党的討論(前年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翻譯;10月1日又在該报上刊登了我的提案:《改造劳农党組織的一个試案》。这两篇文章,前者闡明了共产国际关于工农斗争同盟的形态的意见,后者則談到怎样尽可能按照共产国际的方針来改組劳农党。

在此以前,我曾提出“改造党的組織是当务之急”的主张,使党本部加以承认;而这一次,也使书记局不得不为这个試案写了这样一个引言:“劳农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9月18日的會議上通过了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彻底改革党組織的方案的決議。理由就像成立大会时早就指出的那样,现在的党組織,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同盟,有許多缺点,所以要趁此机会,毅然来一个大改革,以便向‘工农政治斗争同盟’前进几步。那天的常务委员会上,虽然决定提出适当的具體方案,但党本部书记局目前所收到的方案,还只有河上的一个。我們认为这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試案,所以……”

当时我呢，竭力想把本部拉着跑，而本部呢，要是代价不大，也竭力想避免分裂，所以起初的时候，多少有着妥协的余地。但是党本部方面，也就是大山郁夫那派人之中，却没有一个人认真把改造组织当一回事。尽管十天以后就要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书记局方面的改造组织方案还是没有起草出来。好容易等到书记局起草好改造组织方案，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却延期到11月举行，而等到要赶快仔细研究这个方案的时候，常务委员会却老是因为人数不足而流会，到会的人，只是闲聊一阵天就回家了。

可是我呢，却一心想着用什麼方法可以使现在的劳农党转化为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同盟。为了这事，前些时候曾经提出一个改造劳农党组织的试案；可是后来仔细一想，聚集在劳农党这面旗帜下的工人和农民，人数十分有限。如果要组织真正的革命的工农同盟，那末聚集在社会民众党、日本大众党等旗帜下面的工人和农民，也非同样参加这个同盟不可，而且，在这个同盟里，非确立工人的领导权不可。这样一想，就觉得要把现在的劳农党转化为革命的工农同盟，躲在劳农党组织的内部是怎样也做不到的。想来想去，觉得除了马上解散劳农党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况且我们的任务，不仅要解散劳农党，而且要趁此机会，全面地解散社会民众党和日本大众党。在理论上弄通了这一层，我就在10月11日的《劳动农民新闻》上发表了一篇《工农同盟的革命本质》，阐明了我主张现在就马上解散劳农党的理论根据。这是小岩井、细迫等发表解散劳农党的意见后约四十天的事。我的动作，就总是缓慢到这步田地。但是，我只要树立了确信，觉得已经无可置疑，那就非常坚决。在劳农党问题上，也是这样；到后来，我就为立即解散劳农党而什么都不怕地竭尽了我的全力。

10月11日，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之前，我先对大山郁夫委员长

表示了我的决心，然后又在常务委员会对大家陈述了我的意见。自然，在座的人没有一个认真地把革命当一回事。谈着谈着，我简直腻烦了。我觉得，甚至连大山，都忘掉了“革命”的“革”字，真所谓“粪土之墙不可朽也”，我于是走了。

接着我就向常务委员会要求允许我在《劳动农民新闻》上发表我的立即解散论。可是，11日的委员会上没有作出决定，12日的委员会上又把问题提了出来。会是在大山郁夫家的西洋大客厅里开的。除了上村进一个人之外（后来参加到主张解散方面来的神道宽次，那天缺席），其余列席的人都是劳农党第一主义者。其中还有从大阪赶来的绝对反对解散的鬪将。对于这些靠工会吃饭的工会干部——职业的劳动运动者——来说，像我这种爱谈理论的知識分子，自然十分可厌。为了给本部打气而连忙赶到东京来的这批人，一面痛骂解散论，一面仿佛就要以他们的魁伟的身体扑向我瘦弱的身上那般，虎视眈眈地在会议室中来回大摇大摆着。会议室里从开会前就充满着杀气。可是，平素非常胆小的我，一旦有了信心，对于这种威胁，却一点也不畏缩。对于包围在我四周的许许多多的人所发出的质问，我毫不迟疑地说出了我自己的意见。——四十天以前，我曾同一地点看到細迫遭到类似的情况。那时我看到細迫垂头丧气的模样（也许是我的误解），深深感到他缺乏自信。而我呢，当时却是天不怕地不怕；连自己都觉得我那种昂然的态度，决不是細迫所能同日而语的。像这样的大无畏精神，是我一生中少有的。

至于我要求在《劳动农民新闻》上发表立时解散论的事，12日的委员会上仍然不了了之，没有作出决定。可是，全权操在我手里的新闻部里，当天却开了个会，作出意见书，说明光对解散论封锁言论，是不正确的，坚决要求党内批评的自由，当夜我就特地去征

求委員长大山郁夫的諒解，他当然不贊成，推說到 13 日的常務會議上再加以討論。可是，当天晚上大山郁夫就动身到外地演說去了，第二天的常務委員會又因人数不足而流會。最后我要求把我的意見油印出來，仅仅發散給黨內最高幹部——中央委員們，以便給下一次的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做參考，結果也沒有得到許可。接着在 15 日的第四次常務委員會上，我的要求仍然沒有得到批准。

我这个人，一旦信任了朋友，即使后来对他发生了怀疑，也是不肯不加思索，貿然同他决絕的。同样，在要脱离自己一向所属的团体的时候，念到过去的关系，碍于情分，也总是尽量尊重那个团体的章程而决定我的进退。前次离开京都帝大的时候，我完全尊重教授会的決議，就是本着这样一个宗旨；现在当我要脱离劳农党的时候，尽可能遵守党的規章，千方百計想事先取得常務委員會的承認，也是本着同样一个宗旨。

可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却不能永远等待下去。事情不仅关系个人的进退，还牵涉到一个政党的存亡。我不能拘泥于当时的环境。因此，过了几天，經過上面所說的那樣一番周折之后，我終於决心不經黨承認，就在《劳动农民新聞》上公布自己的解散組織的意見。这份報紙一直是由我編輯的，編輯工作就在我家里进行，每月三次的編輯工作的最后几天，往往要搞通宵，有时还得整天呆在印刷所里看校样，而且出版費用全部由我个人支付。因此，这个報紙虽然是承继着旧劳农党传统的新劳农党的机关报，可是由于劳力和費用完全由我負擔，所以实权全操在我手里。不拿一个錢而干着党的書記工作、一面还帮同搞編輯的畑田朝治，对我抱有好感，所以不成問題；至于另外一位竹尾弑，在報紙編輯方面經驗丰富，是个专家，我每月給他津貼，所以也沒有問題。代替細迫挂名为編輯、發行兼印刷者的神道寬次，好在也是主張解散組織

的。所以對於準備充分利用勞農黨自己的機關報來破壞勞農黨的組織的我来说，是一無阻礙的。

10月21日發行的《勞動農民新聞》的第一版，全版登載着《勞農黨的存在意義及其發展和鞏固的必要(黨本部決議)》，前面一段引子說：“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關於在提交將於11月1、2兩日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的提案中確定勞農黨的本質、決定它的發展方向的問題，經再三審核，作出如下的決定。”從第一版版面看來，這一期和往常並沒有什麼兩樣；可是翻開第四版一看，大半版却登載着上村進、神道寬次、河上肇三人聯名發表的題作“給勞農黨的發展的解散所留下的唯一道路——戰鬥的解体”的長篇文字。這就使大山一派吓了一跳。我從前再三再四向黨本部提出展開黨內批評的要求，他們總是加以拒絕，一心以為這樣河上也就毫無辦法。再說，報紙向來由黨本部分發，要是發現什麼問題，只要扣下不加分發，就可以了，所以他們放心得很。哪里知道唯獨這一期，我却從印刷所直接搬回家中(報紙一印好馬上就裝上汽車，顛顛簸簸地駛上青山御所前面的坡道——那時的情景，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心還卜卜跳。記得那時我身上穿的是在倫敦縫的一套藍西服，腳上穿了一雙長筒膠靴)，直接分發到各地去了。

後來黨本部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消息——《出賣同志的河上等人的行動》，內中有這樣幾句話：“黨本部同人本來完全相信作為階級戰士的河上等人的人格，等到事情發生以後，才苦笑自己的老實。……他們竟採取這樣卑鄙的態度，我們實在覺得很痛心。”事實上，我的行動是黨本部沒有防到的。要不是出其不備，當時也就沒法利用《勞動農民新聞》。更幸運的是勤勉的畑田一向做着黨本部的書記，百事都由他經手，報紙該往什麼地方發幾百份，他都一清二楚。當時大山郁夫委員長正帶着三、四個常務委員在關西地

区演说，拿到刚寄到党支部的报纸，先看了第一版，还满高兴，等到翻到第四版，“事出意外，愕然大吃一惊”。党本部发表的文件里一再重复这样的话，似乎对于我那一手，感到非常突然。

我费了老大的气力，才征得上村进在《给劳农党的发展的解散所留下的唯一道路——战斗的解体》这篇文章上共同签名。上村对劳农党虽然早已绝望，可是对于是否同我采取共同行动，却拿不定主意。他是建立新劳农党的发起人之一，有悠久的斗争历史，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不得不尽力笼络他。神道宽次是不请自来的。上村和神道两人都是律师。

斗争开始以后，暂时我还是孤军作战。那时我打算趁机把劳农党一下子消灭掉。既然在党内工作了一年，就必须发挥党外人所不能具有的破坏力量。这是我的义务。在这种意义上，我必须担当轰炸党的心脏部的任务，弄得不好即使炸伤了自己，也没有办法。当时的态度，回想起来，和离开京都帝大时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11月1日发行的《劳动农民新闻》的第一版上，全版登载着我写的《劳农政党是有害的东西》，第四版上登载着同样是我写的《劳农党的反动的固定化》。到11月21日，我又在该报的第一版上用四号铅字发表了下面这样一篇《废刊辞》。

“曾经先后作为劳动农民党以及争取政治自由工农同盟的机关报而完成了左翼任务的本报，自从去年10月被劳农党夺取以来，直到最近，只不过助长了劳农党的反动作用而已。本报历史上有这样一段骯髒的期间，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现在已经无法挽回。直到最后，夺取者终于被夺取，本报这才以几期的篇幅，对解散劳农党多少起到一些作用，这是我们差堪自慰的。不过，据我们看来，今后连这个作用也已经不再能起了。我们最初以为，本报作为

促进劳农党解散的一个机关,在下次的劳农党大会召开以前,有继续出版的必要,如果在大会以前废刊,那就是我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可是,最后我们却得出结论:那样办,日子拖得太久了。

“这是因为,我们通过这份报纸,直到今天所做或所能做的,只是为解散运动跨出第一步创造条件而已;至于解散运动的重要环节,却在今后。比如说,自从解散运动爆发以来,有些地区,尽管全场一致通过解散支部联合会(大阪、京都等地),可是后来两三个党棍子和害着议员病的,马上又搞起徒有其名的支部联合会,在形式上、名义上把支部联合会恢复了原状。由此可见,形式地机械地解散支部联合会或支部,本身是毫无意义的。

“解散运动主要关键,是在使大众脱离了劳农党的影响之后。那就是说,应当使历来多少受到劳农党影响的工会、农会、青年部等等的革命分子,转到左翼阵营。但是,这样的实质上的解散,光靠形式上否认劳农党,是不能实现的。所以,真正的、有意义的解散,只有在日本共产党、全协、同盟(共产青年同盟)领导之下,同这些组织联系,最后归并到这些组织,才能实现。这才是解散劳农党和劳农系的工会和农会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如果不这样做,而采取另外的办法来实行解散,那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会产生工会、农会第一主义,因而招致另一种弊病。

“因此,如果这份报纸再办下去的话,那就会隐蔽上述的唯一正确方法,结果起到妨害作用,而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这份报纸如果继续出版下去,将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它的主要弊病将是:形成取消派集团,使革命分子受到它们的影响,因而阻碍革命分子参加左翼(也就是真正地解散劳农党),妨害共产党、全协、共产青年同盟的发展和巩固。

“我们极少一点的经验,已经促使我们反省到上面一系列的弊

病。固然，依靠党、全协、共产青年同盟的宣传鼓动，这类弊病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可是我们却怀疑我们通过这份报纸所能做的一点宣传鼓动工作，究竟能不能防止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弊病。党、全协、共产青年同盟为了进行宣传鼓动，已经出版了《无产者新闻》、《劳动新闻》、《无产青年》等报。既然我们感觉到本报的继续出版将多少起到机会主义的作用，因而有把群众引入歪路的危险，那末晚停办就不如早停办。

“从上面的考虑出发，根据以前的预告，我们这份《劳动农民新闻》，就出版到这第一百二十五期为止。

“现在，当《劳动农民新闻》要和多年的亲爱的读者分别的时候，我们要和全国工人和农民同声高呼下列口号，作为我们最后的言词：

“日本工会全国协会(全协)的发展和巩固万岁！

“为全国农会(全农)的革命化而斗争！

“共产青年同盟(同盟)的发展和巩固万岁！

“同取消派和工会、农会第一主义者作无情斗争！

“彻底粉碎劳农党、日本大众党、社会民众党以及其他一切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

“团结在无产阶级党的旗帜之下！”

这篇文章里，“革命”、“共产党”之类的字眼，本来都是用的××；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用××和不用××并没有多大区别。比如最后的一个口号，当时印成“团结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之下！”。可是在任何读者的眼睛里，实质上却和印成“团结在日本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完全一样。在合法场合公然提出这样的口号，我也知道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为了解决劳农党的解散问题，我已有了充分的决心，连坐牢也情愿。

那期报纸当下就被禁止发行了。警察来没收报纸的时候，还剩下几百份没有发出。可是在紧急关头，我出于本能地把报纸藏了起来，只交出了几十份。站在门口的两个警察不答应，你一言我一语地和我内人说，照说还应该剩下很多。向来不习惯于撒谎的我的内人，被弄得束手无策，跑来问我怎样办。我骑虎难下，只得亲自走到门口，毅然决然地对警察说，要是不信，可以进屋搜查。那两个警察似乎始终不相信，可是他们究竟没有进屋搜查的权力，所以只好拿了几十份报纸，无精打采地走了。在这样的小事情上争，本来没有多大意思，不过辛辛苦苦搞出来的东西，总不愿意平白地让人家拿去。后来这些报纸虽则藏了起来，却老是搁在那里，无法发出去。结果没有办法，只好托那时还住在东京的我的最小的弟弟把它送到家乡去了。后来，使唤着一个女佣住在家乡养老的妈妈，看出了苗头，据说在烧洗澡水时就把这些报纸当柴烧掉了。

当时那份报纸仅仅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并没有引起什么大问题。要是在1943年的今天，那就一定会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被起诉；光是为了这篇文章，我就要被判处五、六年的有期徒刑。

与解散运动有关的一些回忆——取消派的跋扈

劳农党的解散问题到此即告一段落。现在，我还要把当时的事情，另外拉杂写一些在这里。

当初我虽则赞成组织劳农党，不过与此同时，我却对我自己立下誓言：假如半中间发觉自己做错了，那末我一定要以负责的态度，竭尽力量，把这个政党拆散了事（这是京都帝大社会科学研究会那批人因我参加该党而臭骂我的时候，我亲口许下的诺言）。而现在，我居然实现了这个誓言，所以自己觉得很满意。不久以后，

劳农党终于不再能独立存在，彻底土崩瓦解；大山郁夫率领着他那一伙残党，终于投奔到他所一向骂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别动队”的某一无产阶级政党里去了。

从前我脱离无我苑的时候，是和伊藤証信在談笑之間交換了意見，結果由伊藤自身宣告了无我苑的解散的；所以，我們其实并没有不欢而散。后来我虽則把他所提倡的无我爱的教理評为一种邪說，可是这并没有妨害我們的私交，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們之間还互通音信。至于大山郁夫，如果他对劳农党的前途看得更透彻一些，看出它反正非垮台不可，那末他也許会認識到，最好还是索性和我們站在一起，把該党加以解散。哪里知道他原来是个出奇的乐天家，就在大阪方面发动解散运动的时候，他在一篇文章里說：“当初表面上鬧得那样热火朝天的解散运动，不久就烟消云散，而党的基础却絲毫沒有发生动摇。”而当我们提出立刻解散的时候，他还是对新聞記者說：“深信我党的将来，不会因那三个人的行动而受到絲毫影响。我們不仅絕无悲观的必要，以后还要更加努力发展和巩固我党。”也許他真的直到最后都是这样想着的吧。总之，这次的事情和无我苑不同，結果终于鬧得不欢而散。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和大山郁夫再也没有见过面。

大約是 11 月底吧，劳农党举行大会，突然派人来叫我——我那时已被开除出党了——参加。我虽然明明知道，单枪匹马去，一定会吃大亏，但是觉得如果躲在家里不去，人家会說我怯懦，所以就对来人說，我馬上去。后来我就去了。到了会场，刚走上大門进口处的石台阶，就被左右两边的便衣偵探阻止住，把我帶到附近的警察署拘押了起来。这是真正的保护拘押。警察方面的用意是：参加大会的党员，对于河上等人的行为，非常气愤，群情激昂，这时我如果去到那里，說不定会鬧出什么大乱子，所以为了保护我，暫

时把我拘押起来。这样一来，我总算沒有挨到党棍子鬪将們的一頓毒打，而且因为这种关系，我在我“叛变”以后，总算一直沒有和大山郁夫见过面。

有人也許觉得我对劳农党所采取的办法，有些过分吧。在这里，我想分辯一下。我就在专心研究科学的时候，也还是这样的作风。代表的例子就是让自己的著作絕版。我发表著作的时候，自认为总是尽了当时的最大努力，而日后如果发现了什么錯誤的地方，我就一刻也不能就此由它去，几乎毫无例外地馬上就让它絕版。就拿那本常常被人家誉为洛阳紙貴的《貧穷的故事》來說，出版后不久，正当风行的时候，我就硬要书店把它絕版了。有人說，这样做是值得称道的，而我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即使是发表在杂志上的論文，要是发现有錯誤，我也总是連忙自己写文章来加以否定。在我看来，这乃是社会活动者的一种义务，所以無論将发生怎样的情况，我决不有所顾虑，而狠狠地在公众面前把我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所犯的錯誤彻底暴露出来。在这种时候，我对待昨天的我，就像对待仇人一样。因为我这个人，对待自己——只要认为自己犯了錯誤——都是这样，所以当时对大山郁夫一派人采取了从一般交誼上說来有些不应当的态度，也就无可如何了。

前面已經讲到，我搞解散运动，要比細迫兼光等晚四十天。为什么我最初不和細迫采取一致行动，过了四十天以后才跟上去呢？这在局外人，也許很难理解吧。因此，我才把当时的情况比較詳細地写了出来。讀者看了以后大概可以明白：对于我来说，为了滿怀信心地行动起来，四十天的時間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当时我所认为最难解决的，是解散以后，聚集在劳农党旗帜下的群众（工会和农会的那些人）怎样安排的問題。細迫在他的声明中說：“应当明确方針，克服劳农党第一主义，解散劳农党，轉向工会和农会，除此

以外，沒有別的办法。”可是那个时候的工会和农会，大半都操纵在右翼无产阶级政党手里。我觉得把劳农党的群众送到那些組織里去，不是办法。再說，細迫光是主张解散劳农党，至于解散以后加入怎样的政党以及支持怎样的政党，却一字不提，只說轉向工会和农会。这样一来，結果必然會給工会、农会第一主义推波助瀾，把群众从政治斗争拉回到經濟斗争。我认为光那样做还是不成。我和他虽則是同样主张立即解散劳农党，但是我关于工会，却提出了“日本工会全国協議会(全协)的发展和巩固万岁”的口号。而全协是受日本共产党领导的非法团体。关于农会，我提出了“为全国农会(全农)的革命化而斗争！”的口号。“革命”二字，可惜被錯排成了“扩大”，但是誰都看得出那是排字工人排錯了。关于許多工会和农会中都設立的青年部，則提出“共产青年同盟(同盟)的发展和巩固万岁！”的口号。“共产”两字虽則印成××，但是那个时候，誰都知道所謂“同盟”就是指共产青年同盟。而这个团体，自然也是受日本共产党领导的非法团体。最后我还提出了“团结在无产阶级党的旗帜之下！”的口号。“党”字虽則印成×，但那时一提起无产阶级党，誰都知道是指共产党。我不仅否定劳农党，还提出“彻底粉碎劳农党、日本大众党、社会民众党以及其他一切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口号，否定了其他一切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时說明了无产者應該集合到怎样的政党的旗帜下面去。我所引以自豪的是，細迫和我虽則同样主张立即解散劳农党，但是我們两个人的立場却大不相同：細迫是消极的、保守的，而我却是积极的、发展的，两者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我这方面，却比細迫晚四十天才发动。要是潜伏在地下，那末也許無論多么大胆的話都可以說，可是我那时却暴露在合法舞台上，竟公然提出拥护非法团体的、有生命危险的口号；为了作出那样的决心，在我当时說来，四十

天的時間是必要的。

当时的报纸(剪报上没有写清楚,大约是10月22日《大阪朝日新聞》的“硯滴”栏)上曾发表評論說:“河上博士号召解散劳农党,这事固然使劳农党感到詫异,却更使一般人感到詫异。博士上个月談到解散問題的时候,曾經分析劳农党的发展的解散和破坏的解散的區別,把前者比做在地里播种,米粒通过发芽过程成长为稻子,把后者比做用石头敲碎米粒。可是现在他主张立即解散劳农党,这跟前些日子的解散派又有什么不同呢?不同样是用石头敲碎米粒么?”說这种話乃是由于新聞記者認識不足。尽可能使聚集在劳农党下的群众轉到共产党方面去,这才可以算是劳农党的发展的解散哩。

在我所提出的口号中,还有一句“同取消派和工会、农会第一主义者作无情斗争!”像細迫那样单单說是轉向工会和农会,是大有陷入工会、农会第一主义的危險性的。而我却主张同工会、农会第一主义作无情斗争;所以尽管同样主张立即解散劳农党,我們两个人的立場,却是显然不一样的。不过关于这些,现在不用再嚼苏了。我要附带說一說的,就是关于所謂取消派的事情。当时我們所說的取消派,指的是那些因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而被逮捕的共产党员中、让司法当局收买了去、带着破坏共产党的使命、未判刑而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的那一伙人。内中有个名叫南喜一的工人出身的人,很早就钻进劳农党总部,工会方面还把他捧为罢工的圣手。我也曾和他见过多次面,还借給他几千块钱作为罢工費用。最初我也完全被他蒙在鼓里了。至于知識分子方面,同我接近的則是水野成夫、浅野晃一伙人。这两个人是什么时候一道来訪問我的,現在已經記不起了。不过有一点却記得很清楚,就是当时正当我对劳农党的前途开始感到迷惑。他們觉察到我这

个弱点,所以似乎打算利用我——特别是利用我所編輯的《社会問題研究》和《劳动农民新聞》——来大搞一番。不过南喜一领导罢工的神話也許騙得过我,至于知識分子的政治論,正面向我提出来,却不是輕易能使我受騙的,尽管我平常很容易受騙。我同他們会见少則两次,多則三次,就发觉了他們的可怕的陰謀,从此同他們断絕关系,不再和他們接触。当时我的直觉是不错的。不久以后,他們都成了取消派中的理論家,相当活跃;他們的意图,在从事非法政治活动的人中間是人所共知的。

我最恨他們那种人。一个研究科学的人,竟然做出这样不要脸的事情,我认为簡直是恶劣到了极点。浅野晃这个青年,还和我有过一段交往:我在京都帝大时編輯的《馬克思主义丛书》中,一本馬克思著的《哲学的貧困》就是他翻譯的。这样一个青年,仅仅为了減輕自己的罪名,就出卖了科学的良心,甚至来欺騙我这个老头儿,真正岂有此理,可恨之极,使我生气。我尽管写了这些,还是没有能把我当时心里的憤恨完全表达出来,觉得那真是无話可說。后来他們竟发行了假的《赤旗》报,甚至伪造了《日本共产党綱領》,胡作非为,簡直不成話;我为了留作日后的史料,曾让我妻把那《綱領》的大部分抄了下来,可是前年离开东京的时候,因为觉得这类东西一直留在身边也没有用处,就把它烧掉了。要是留到现在多好呀,真是太可惜了。

总之,那时正是革命洪流汹涌澎湃的时期,为了阻止左翼工人中的革命分子加入共产党,有气无力的合法无产阶级政党已經不能适应需要了。因此,那些取消派分子就串通了檢察局和警察厅,搞出一个伪共产党,企图用来搅乱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日本共产党的战綫。他們把切断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作为当前中心任务,所以他們搞了个伪日本共产党,提出了一些革命的口号,却絕對不

用共产国际日本支部的名称。他们一面散发伪《赤旗》报等，一面四出奔走，到各处地方工会去活动，想把罢工的领导权夺到手。看看那一时期的《无产者新闻》，也可以知道，当时取消派不仅在文字宣传方面，就连工会运动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搅乱阵线的目的。1943年的今天，和不知底细的人讲这类话，也许会让人当做说谎，实情是十三年以前，革命洪流确实非常汹涌，连检察当局都不得不唆使叛徒们搞这种苦肉计。

顺便提一笔。水野、浅野等取消派分子，在利用我的计划失败以后，却把合法论坛上的榊田民藏拉进了他们的圈子。榊田的《日本地租论》，就是在同取消派勾结之下发表的；在这篇文章里，榊田实质上否定了共产国际认为日本地租是日本资本主义中的封建制残余的论断。从此以后，直到他突然病死，他同取消派的可耻关系一直保持着。（劳农党解散后，我和榊田碰了头，曾经详细地告诉他当时经常在他的书斋里出出进进的浅野晃、藤井米藏等人的居心是多么险恶，后来当我即将潜伏地下的前夜，又曾几乎以哀求的口吻劝榊田不要站在党外批评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和那伙人疏远。到现在每逢榊田的忌日，浅野晃、藤井米藏等人，还总是去参加祭奠）。现在，榊田死了快十年了，他的墓碑上也已经长出青苔，对此交往二十余年的老朋友，我无论怎样都不能产生真诚的悼念，这是非常痛心的，也是无可奈何的。

前面也已经说过，请原谅我再噜苏一遍。我是一个长年累月呆在书斋里、连自己的鞋帽都得我妻代买的不问世事的人。再加感觉迟钝，不能一眼就看出对方的性质和心术；即使几次三番受了骗，还是听信人家的话；“见人先带三分疑”啦，“看事要看反面”啦等等，我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出于本能地做到（要是平心静气地考虑一番，可能就不至于这样）；所以，如果“欺之以其方”，我这个人

最容易受人利用的了。这样的人，岁数过了五十，一下子要从书斋里跑上街头，而且要走进非法活动的圈子，如果没有可以信任、經驗丰富的非常可靠的朋友来做商量的对手，事情就十分危险；可是在劳农党解散前后那一陣，我完全陷入了孤立，不得不全靠自己一个人的手腕来应付一切，而且正在那个时候，眼前又出现了以取消派那伙人为首的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魎，这就真是使我徬徨失措了。本来，說到共产党员，那是当时我所最信任并且尊敬的对手，所以我做梦也想不到他們在被捕以后，竟然十分可耻地变节，成为敌人的爪牙。可是现今在日本，即使研究科学的人們中間，这类人也多得像粪蛆一样，这就使我不得不慨叹士道的衰微了。

不觉話又离了題。总之，当我搞劳农党的解散运动时，在許多重要口号中間插进“同取消派作无情斗争！”这样一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存在着上面所說的情况的緣故。

关于取消派的問題，还有一件事想談一談。在我和上村、神道两人連名发表了劳农党的战斗的解散宣言后不久，岩田义道有一天突然来看我。他以前是京都帝大的学生，从那时起（他那时已經結了婚）我們中間就发生了家庭的交际，他也是我最亲近而且宠爱的青年。和許多我所接近的学生一样，他也由于京大学生事件而被捕，不得不中途退学；后来被保释出獄，开口就向我借一千块钱。据他自己說，他家里很穷，老父老母一心指望他成为一个学士，但是照目前看来，一般人所尽的那种孝养，是絕對无法尽到的了。幸而老父还很頑健，他过去一直是往来于木曾川上的舵工，今后只要有一条船，也足够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了。可是目前那条船已經太旧，再也用不了多少时候。所以，要是现在能給他老人家打造一条船，自己就可以把全副精力放到工作上去；借一千块钱就是作这个用途的。他从未决监里一释放出来，就跑到弘文堂书店（那家书店

当时几乎一手經營着我的《社会問題研究》以及其他著作的出版)，从那里打电话把我邀去，在书店楼上讲了上面的一番話。一见到我，他馬上握我的手。生平两手总是冰凉的我，觉得他的手特别热。他对我說，在监牢里害了病，到现在还发着将近三十八度的高烧。在向我开口借錢以前，先說了下面这样一番話：“大家都說，提到錢和女人的事，您就不要听，今天我却要向您提到錢的事，因为我覺得，其实無論是錢的事或是女人的事，都并不是同您談不通的。”然后突然改变了向来那种无忧无虑的神色，悄然地說出了借錢的話。我当下答应了他，于是填写了一张两人共同签名的借据，让弘文堂付給他所要求的一千元。生性活泼而豪放的他，这样地对待我，而我呢，也这样地对待他。后来他不再叫我“老师”，总叫我“老头子，老头子”。据說他在高等学校时代，就开始讀《資本論》；和一般左翼学生不同，他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論，曾經下过苦功。我最初和他認識，是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定期集会上作关于唯物辯証法的研究报告的时候。我听了他的研究报告，很佩服他，还把那件事情写信告訴了櫛田民藏，那封信也許收进了《櫛田民藏全集》的附册《书簡集》里。岩田由于家境的关系，上学較晚，当他还是經济学系的学生的时候，他中学里的同学山田盛太郎已經当了东京帝国大学經济学系的副教授，而山田在发表自己的論文以前，却把原稿寄給岩田，征求他的意見；由此一端看来，岩田的理論能力早就让山田賞識了。而他不仅长于理論，还具有階級斗争战士的卓越手腕。那是后来才知道的，早在1927年底、我还在京都帝大当教授的时候，他已經是日本共产党党员；三·一五事件时，巧妙地逃脫了法网，曾两次去到上海，計划和外国取得联系。1928年8月，终于在东京被捕，以后在未决监里坐了两年，到1930年10月，正当我提出立时解散劳农党的主张的时候，如上所述，他

被释放出来了。

那时我正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十分希望同一位可以信任的共产主义者见见面，从长商量商量(哪怕一次都是好的)，所以当时我不知道有多么欢迎他。我把什么问题都同他谈了。可是不久以后，就觉得他也許是检察院派来的取消派的第二批人馬，不禁使我老大吃了一惊。他的第一次来訪，是10月21日我在《劳动农民新聞》上发表立刻解散劳农党的主张之后不久(还记得他曾批評我何必同上村、神道等連名呢，单独一个人发出宣言就行啦)，所以那次见面，想必是10月下旬的事。后来在11月1日发行的《改造》杂志附册《第二貧穷故事》的版稅一万二千元中間，我给了他二千元；因为据說他急于应用，所以在改造社的规定付款日之前，由他亲自去該社取了那笔錢；他用那笔錢的一部分，买了一些衣服，回家乡去了一次，等到重新回到东京的时候，我就拒絕接见他。根据我所想到的以上的种种，足见我对他全盘加以信任，只是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这个极短的期間內的事。在这期間，我可能同他见过两次或三次面；可是从这有限几次的见面中，我总觉得他的言語举动，不无可疑之处。

现在有些細节已經記不清楚了。到今天还清清楚楚記得的，只有这样一件，就是当我对他說起水野、浅野这一伙取消派的阴謀真是岂有此理的时候，本来总以为他也一定会和我同样地气愤，哪里知道他只是假痴假呆地說了一声“是嗎”，馬上把話头轉到別的地方去了，当时这使我觉得十分出乎意外。在他被保释出来之前，我曾听到他的妻子說起，这一陣子水野、浅野等人拼命在拉攏监牢里的岩田。所以，那伙人的意图和計劃，他是不见得不知道的，可是他却用那种假痴假呆的話来回答我，当时我顿时觉得有些蹊蹺。(当他还在未决监里的时候，他的妻有一天跑来，对我說：“现在如

果想出獄，倒不是沒有辦法，但不知究竟該怎樣，叫我首先來征求一下您的意見。”我當時回答說：“現今外面一個人都沒有，要是他能出來的話，希望竭盡一切辦法，出來再說。”今天回想起來，這也許是使他發生極大誤解的原因。回答那句話的時候，是不是我已經看穿了取消派的把戲，現在已記不清；在岩田那方面，說不定認為我明明知道而滿不在乎吧。既然贊成建立勞農黨，那末不管我的主觀願望如何，在別人眼睛里，也許總以為我不惜同日本共產黨作某種程度的對抗吧。照說，那樣久經鍛煉的戰士岩田，關於他自己一身的進退，決不至於當真要同我這樣的書齋里的迂夫子商量；那次叫他妻來問我，說不定是為了試探一下我對當時被釋放出獄的人們抱着怎樣的看法。而我的回答，卻產生了使他發生極大誤解的結果，所以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我出其不意地說起那些話時，老練如岩田，也似乎吃了一個措手不及，感到為難了。）

一旦起了疑心，重新再檢查一下他的言語舉動，就開始覺得有許多地方不無可疑。從監牢里放出來不久，他說他有些發燒，可是像他那樣有才干的共產黨員罪犯，是決不會因為他略微有些發燒，就把他釋放的。就拿後來我自己被捕後的經驗來說，在未判決以前，儘管我發燒，長期被收容在監牢的病房里，也不准保釋。等到判刑以後，快要收進大牢的時候，我也曾苦苦申請保釋出獄一兩天，檢察官卻全然置之不理。不僅對我是這樣，一般違犯治安維持法的犯人，儘管已經進了大牢，開始執行徒刑，還是被對待得非常嚴厲。他們毫無例外地至少要在最初的幾個月中間，日夜被監禁在單身牢房里；特別是那些不肯背叛的人，整個徒刑期間，無論多少年，都是那樣被扔在一邊，完全被剝奪了同人說話的機會。而岩田呢，卻是一個尚未判決、羈押中的被告，居然獲得釋放，而且沒有人監視他，讓他自由自在地行動，足見檢察官一定牢牢地抓住

了他的小辮子，十分放心，所以才会这样。至于他凭什么取得了检察官的绝对信任，他却始终守口如瓶（照说他是无话不可以对我说的）。还有，他当时曾怂恿那些日子里每天在我家出出进进的我的小舅子大塚回到京都去组织共产党的细胞，还教给他进行的方法，却叫他绝对不要让“老头子”知道。（我那小舅子当时对于非法活动还十分生疏，他担心着像他那样的人是否一下子当得了党员，以及是否能马上以党员的身分开始活动，这样独自思索了一阵之后，终于对我讲出了这件事。）那时岩田也许有他一定的企图和计划，但是怨羹吹膾的我，觉得如果把他看作取消派的新手，那末种种可疑之点就都可以理解了。这样一想，我甚至怀疑他恰恰在我宣布立即解散劳农党的主张之后保释，说不定就是由于检察院怀着某种企图哩。我的这种怀疑，后来通过希望阁的老板市川一五一十地传进了他的耳朵。假如我这些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话，那末尽管那时我谢绝和他见面，依他平时那种脾气和性格，也将想尽一切办法，来打消我对他的怀疑，可是他始终没有这样做。

当我对他的疑心终于无法消除的时候，我愕然诧异，愤然叹息了。以我们那样长久的交情，他居然来欺骗我这个“老头子”，实在岂有此理。也许是被妻子的爱情所束缚的缘故吧，以他那样一个人物，一旦陷于困难境地，竟也变质变到如此地步，真是不胜令人慨叹。我怀着这样的想法，所以尽管他请求和我见面，我却始终加以拒绝。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到我家里来看我，当时恰好我要到外面去，正在换穿西装，我就推说时间来不及了，终于避免和他坐谈。平素豪放而活泼的他，当时默默地什么也不说，给我穿上了外衣。那副样子，到今天还历历在目（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保释后两个月左右，1931年1月15日，据说他离开家庭而潜入了地下。我虽则听到这样的消息，可是对他的看法仍然没有改

变，甚至还非常担忧，怕检察局的奸細混进了共产党内部，这是不能等闲視之的。偶然有一位我所最信任的H同志，从乡下到东京来看我，談起这件事情，那位朋友也完全和我的看法相同。因此，为了把情况告訴莫斯科方面，我当时曾給莫斯科方面写了一封信（記得是写給国崎的。这类信如果不写出寄信人的真名实姓，收信人是不會加以信任的，可是又怕落到反动当局的手里，所以当时非常不好下笔），后来听說这封信并没有收到。

岩田潛入地下以后，还曾几次要求和我见面。有一次是一个年輕的女子（仿佛是鍋山貞亲的老婆）来看我。去到門口一看，那个女子手里托着一只涂鍍怀表，对我說：“这只表，您一定記得吧，现在它的所有者請求和您见见面哩。”再一看，原来那是我已故的儿子政男的遺物，以前我送給岩田的。可是，即使是那一次，我也沒有和他见面。又有一次，他让医学博士Y君轉达，請求和我见面，我仍然謝絕了，于是他托Y君轉告我說，希望我至少能諒解他的精神。尽管如此，我对他还是半信半疑。

不久我自己也和党有了联系，方才知道岩田现在党中央工作着，于是对于他的警戒心就在不知不觉之間消失了。后来他派了和他同居的女子来对我說：“为了和同居的女子結婚，想和从前的老婆离婚，这件事情務必請‘老头子’帮忙。”于是我对他也就不再采取提防的态度了。到1932年夏天，我自己也成了共产党员，潛入地下，当时有人对我說岩田要来看我，而我这时也想和他见见面，正苦于沒有机会，岂料那年10月30日他就被捕，旋即被警察厅严刑拷打死了，而我呢，在两个月后，即1933年1月上旬，也被捕了。

被捕当时，党的最高干部是风間、松村、岩田三人，风間是委員長，松村是个奸細。风間是地下时期和我联系的唯一对手，后来在监牢里也常常碰头。松村呢，我們都不知道他的下落，这是当然

的。至于为什么唯独岩田一人遭到那样的严刑拷打？其中的情由，却一点也不清楚。不过，坦率地说来，就在岩田这样地惨死以后，我还觉得过去我对他的怀疑；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据我猜想，他可能是一度变心，后来又恢复了本心。这样一来，自然就把检察当局很巧妙地骗了过去。也许这就是惹起警察厅的小官员们痛恨的根由吧。不过我又想，既然他和奸细松村在一块儿工作，也许他手里其实并没有抓着什么非杀死他不可的秘密。——前面我对铃木安藏说了许多毫无忌諱的话，这次对岩田义道，又在他死后说了一些甚至牵涉到他的名誉的话。尽管是不对外公开的草稿，这样写究竟是不好的；不过我曾经存过这样的想法，乃是无可抹杀的既成事实（哪怕那些想法是错误的），请恕我不得不照直把它写出来。

话扯得离题愈来愈远，几乎不可收拾了。总之，我当初在劳农党的解散运动中所以提出“同取消派作无情斗争”这个口号，乃是因为当时有着上面所说的那样一种情况。因为怕有人怀疑：“主张取消劳农党，也是一种取消主义，那末所谓同取消派作斗争，从何说起呢？”所以我才写了上面一大番话。

早就钻进劳农党总部的取消派分子南喜一，表面上装得和水野、浅野那伙人处于对立地位，因此我长期受了他的骗。当时我曾交给他几千元的罢工费用，等到劳农党解散的时候，他并没有还我。这笔钱我虽则本来也就没有准备收回，可是钱交在这一伙人手里，即使再少一些，也觉得不胜可惜。记得有一天（大概在即将爆发解散劳农党的运动之前吧，那时我已看透了他的品质，决心远远避开他），他来看我。唯独那天，他身上穿的是日本服，一边谈话，一边老是把右手伸到怀中去。是不是怀中真的藏有匕首呢，还是假装呢，反正是一种恫吓的姿态。谈话内容已忘掉了，大概是关

于解散劳农党的事有所要求，或是要我拿出更多的錢吧。但是尽管他怎样恫吓我，我始終保持若无其事的神色，反而把我的身体靠近他身边，同他談話。不久以后，他又給我一封信，說要帶几个搞罢工的工人来看我。那是我脱离了劳农党不久的事情。我因为已經厌恶和这类人见面，于是离开西大久保的寓居，躲到住在高圓寺的弟弟家里去了。同时交代我的內人，让她对南喜一說，那笔錢就算是捐款，不要他还了。几千块錢給了取消派，固然气人，可是錢一旦交到人家手里，就再也沒有方法收回来了。

在劳农党解散运动发生不久以前，我还給劳农党系統的某个工会提供了罢工費用。那个工会的领导人，本是大山郁夫的直系（那人的姓名已經忘掉了，1930年1月我迁居到东京的时候，他也曾到車站月台上欢迎过我，当时他还挽了我的手臂，同大家一齐高唱着革命歌，一直走到劳农党的总部。大山郁夫还給我介紹說，他是个最可信任的人），可是当我发起解散劳农党的运动时，他却說他也贊成解散劳农党，經常到我家里来，諛称再坚持两三天，罢工就可以得到胜利，今天五百块、明天三百块地零零碎碎地向我拿了好几次錢，等到一切借口都用尽了的时候，就此避不见面了。

像这样的事，甚至大山郁夫本人也做得出来。在国会选举的时候，我曾給他垫付了两千块錢的保証金。后来又借給他几百块錢作为他的生活費。結果，选举費且不說（既然是保証金，选举过后自然是原数发还的），連到那笔私人借款，数目虽說有限，当他卖了他的住宅准备出洋的时候，原以为可以还我，哪里知道在我面前竟然提都不提。正是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內人在銀座街头遇见了出洋前的大山郁夫夫妇。平常我向她罗嗦，她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因为她也知道，劳农党时代借出去的錢，名义上是借款，其实是对党的捐款，可是那天在銀座街头亲眼看到大山郁夫的太太穿着华

丽的新西装时，她似乎总觉得不那么快活。

从前，在我作为文部省派遣的留学生出洋的时候，曾經路过上海，訪問过当时任职正金銀行上海分行經理的老友水津弥吉（现任台湾銀行總經理）。和我同道的，是在船上新認識的村野外牧文学士。水津招待我們，讓我們坐了馬車游览了全市，晚上住在一家日本人開設的旅館里。第二天早晨动身的时候，我打算付了房錢再走，同道的村野却坚持說：“沒有这个必要。这家旅館是水津介紹的，他自然准备替我們出錢。再說我們是穷学生，而他是富裕的銀行家，即使由他出住宿费，反正不过在銀行交际費里开支。哪里用得着我們出旅館費呢！”我本来不喜欢这样做，可是，要我代村野付房錢，我也不願意。因此，就叨扰了水津一次。一年多以后我回国时，为了还这份礼，特地在伦敦买了一个銀盘，打算路过上海时送給水津作礼物，哪里知道那条船在返航时不停靠上海，于是我那个心願終于落了空。这件事情发生在三十年以前，可是到今天我心里还觉得不自在；所以，要是当初付了那笔旅館費，对我說来反而減輕了思想負担。由于这样一种性格，我要是沒有充分理由，就不願用人家的錢。可是在我所接触到的人們中間，有些人的作风却和我不大相同。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在种种不同的情况下白白浪費了許多錢。可是我所有的錢，大半是我关于馬克思主义、至少是关于社会問題的著作的稿費。我并不想靠这些錢来发财致富。我所引为憾事的，只是我把这些錢給了馬克思主义的敌人，給了橫在解决社会問題的路上作梗的敌人。

为了破坏劳农党而竭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我才放下了心。

接到片山潜从莫斯科寄来的恳切的信，也是当时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那封信里說：“你在山本宣治尸体前所淌的眼泪，现在証明是真的眼泪。”又說：“希望今后繼續奋斗，同时希望尽可能注

意自己的安全。”信上不称我“河上君”而称我“肇君”，也使我体会到这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老战士对我的亲切无间的同志爱。

事实也是这样，到这时我才觉得可以毫无惭愧地面对山本宣治同志在天之灵。劳农党解散问题发生约半年前，我在本所公会堂和芝区协调会馆举行的山本宣治同志追悼会上，作了“追悼山本宣治同志”的演说，结尾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这是国会议员竞选刚结束时的事情，当时我总算能不起草稿而作演说了。下面所引用的是当时的速记。）

“在最后的两天（按：指众议员竞选的最后两天），我的喉嚨全哑了；走上讲坛之前，要在喉头上药，好容易才能发出声音来；尽管这样，在举行最后一次演讲会的晚上，我还是在讲坛上大声呐喊了如下的话：‘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致，为了拥护和发展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战斗（掌声）；同时，凡是关心人类幸福、社会改造的人，不论他属于哪一阶层，都必须自觉地参加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掌声）：这两点，是我通过多年的研究工作而获得的无可动摇的确信。头可断，我的这个确信是绝不能动摇的。为了保持这个确信，过去我抛弃了一切必须抛弃的东西（掌声）；今后如果有必要，我也将抛弃一切（掌声）。我虽然没有那样的自信，公开宣称我能像我们今天所追念不已的山本宣治同志那样勇敢斗争，但是，我为了我的信仰，为了整个无产阶级委托给我的任务，我有这样的决心，就是要像山本宣治同志那样，拼着性命从事斗争（掌声）。’最后那天晚上，我大声呐喊了这些话，……我这个决心，不论是否当选为众议员，决不改变（掌声）。所以，今天晚上特地在诸位面前复述一遍，一来借以追悼山本宣治同志，二来作为对山本宣治同志的宣誓（掌声）。”

到了六十五岁的今天，我虽则一事无成，偷生世间，可是当我

重抄过去所說的一番大話的时候，幸喜还没有多大慚愧。当初我贊成建立劳农党，并且参加劳农党运动的时候，曾被左翼人士一再痛罵为叛徒、卑鄙的家伙。可是，在我的主观方面，我却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叛徒，叛卖过什么。就是在为劳农党热心工作的时候，我也还是在大庭广众之間，作了上面那样的演說。这些話并不是出于口是心非（我这个人的脾气，不喜欢說口是心非的話）；我所說的是我真正的决心。就拿我为了劳农党亲自参加众議員竞选的时候來說，我也預先作好了精神准备，心想如果真的当选了，我一定会成为第二个山本宣治，所以到临了终于落选的时候，我反而放下了心，对那些为我落选而哭泣的宣传員說：“其实我还是落选的好。”后来我妻还提醒我：“人家为你竞选而拼命活动，而你却对人家說那样的話，实在太对不起人家了。”——仅凭一滴眼泪、一場演說，是不能馬上評定一个人的；通过长时间的观察，自然就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真假。我自认在劳农党这个問題上犯了錯誤；我所最害怕的只是人家怀疑我的心术不正。现在，为了解散劳动党，我总算尽了最大的努力，事后，我所尊敬的共产国际中央委員之一的老战士，还从遙远的海外写給我那样恳切的信，这样，我也就十分滿足了。

結 束 語

劳农党解散后，过了半年多，到 1932 年的夏天，我取得了日本共产党黨員的資格，潜伏到地下；后来又过了不到半年，到 1933 年 1 月，我就被捕了。

找到了归宿，回头一看，已經越过了多少山河。

这是我取得日本共产党黨員的資格，也就是在理論上和实践

上都成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那时我已經离开了家庭——在孤灯之下，形影相对，感慨无量，自然而然地口占的一首短歌。这首短歌是1924年6月我那首《来不及拂去衣服上的征尘，又要开始新的旅行了》整整八年以后的作品；要是从以前参加到无我苑时所写的《拼得一死而还活着，这条命是白白拾来的了》那首俳句推算起来的话，則是二十七年后的作品。（《找到了归宿……》这首短歌，1933年1月我被捉进中野警察署的时候，曾应請书贈該署署員，偶尔流传到报纸上，却被說成是被捕当时的作品；其实那是被捕半年前的作品；歌中所說的走到了的目的地，其实并不是指监牢，而是指共产党。）

我在1933年1月被捕，連头带尾坐了五年牢，到1937年6月，总算重新回到了家里。所幸对于馬克思主义的信心，几年中間絲毫都沒有动搖。在出獄之前所写的一篇《獄中贅語》里，又把自己体会到的宗教真理和科学真理这两种对立的東西辯証地統一起来，做到了自己滿意的程度，借以結束了二十世紀初年以来三十年間的一大波长，給它打上了一个終止符号；这样，我就可以安心度过晚年，高臥无为，没有什么丢不开的了。

在杉山平助的眼里，我是个“不具备独立自主的性格、永远受人家的影响、听其支配的东倒西歪的人物”。而在我这方面呢，却自己称赞自己具有一颗“追求真理的至柔的心”，“假如出现在我面前的东西看上去是真理，那末我就不問它是什么样的东西，毫不躊躇地立刻把它接受下来，一經接受以后，就再也不肯放手，一步一步地追根究底，非弄出个究竟不止；如果到那时仍然认为它是真理的话，那末我就不顾生命，不計較毀誉褒貶，虛怀若谷地、无条件地而且絕對地、彻底地始終全心全意服从它，追随它，最后尽管不得不落到意想不到的危險、失敗或困窘的境地，我也决不逃避，决不

退縮，却以响应至高无上的号召的心情坚决履行生命攸关的飞跃。但是，在这样不顾一切、奋身前进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最初被当作真理的东西肯定地不是真理，那末我就立刻毫无顾惜，坚决地抛弃它。“这就是我的人格的本质。”总而言之，我这个人，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三十年左右中間，具体說来，是经历了上面所說的一番波瀾的。

生平最爱安安靜靜地呆在书斋里的我，做梦都沒有想到会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更何况像我这样为大家所知道的人，居然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警察国日本，参加了地下的非法活动，那簡直可以說是荒謬絕倫、輕率得远远超越一般常规了。不过，無論是得是失，只要我相信非走那条路不可，我就既不逃避，也不退縮，勇往直前地向前走去，这乃是我的面相的特征，要不是粗笔浓墨地把这种富于特征的面部筋肉画出来，就画不像我。抱着这种想法，我才写了这篇《自画像》。

入獄前后的情况，獄中的生活以及出獄前后的情况，这些都已經詳細地写在《入獄記》(筆記簿共六册)里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爱弄笔头的我，每天写着这篇《自画像》，終於也厌倦起来了。再加二女儿芳子病在大連，我內人在这几天里打算去看她，因此我心緒也不宁。所以，《自画像》暂时就写到这里为止，如果有什么遺漏的地方，将来再补写。1943年6月28日。

劳动农民党解散以后， 潜入地下以前

开始写《自传》时的心境

我现在六十六岁了。据说一生下地我就有三种病；高等学校时代，体格检查总是丙等；进了大学，每次体格检查，医生也总是警告我必须注意健康；大学毕业后结了婚，想要保人寿险的时候，遭到了保险公司医生的拒绝——生来这样一个蒲柳之质，居然快要活到七十岁了。每次听到年纪比我轻而身体比我壮健的熟人的死耗，我总是觉得奇怪：怎么我还活着。以我这样羸弱的身体，大概不久就快结束天年了吧。我已经无论什么时候死都可以，事实上也不知道哪天就会死去（年轻时候我就这样想，现在更不用说了）。这样一想，就觉得虽然要写的东西另外还有，想读的书也还有，却不妨顺便把自身的事再写上一些。无我爱运动时代到新劳农党解散运动时代那段生活，已经写过了，总算了却了一番心事。可是，从新劳农党的解散运动结束到加入日本共产党这一段时期中间的情形；还有一点没有写，所以想顺便把它写出来。后来过了不久，我就被捕，坐了四年半的牢；关于这方面的事，五年前我已在《入狱记》中相当详细地写过，所以也就够了。只不过因为当时才出狱不久，对外面总是有些提心吊胆，所以那篇东西就没有用自传的体裁写，却用小说体裁写了，这到今天总觉得有些不够妥当。要是可能的话，还是想把它改写成自传的体裁。由于有着这样的想法，我才开始写这篇东西。

开始写这篇东西的今天，是1944年5月27日。现在，我已经逐渐习惯于自己做饭吃；本来总是担心起迟了没有煤气，现在却似乎不担这号心了；昨夜很早就睡，今天清早四点半钟，还是闹钟闹醒了我，我才起床。昨天晚上还留下一些菜粥，把它热一热，再加上一些玉米面糰子，算是早饭。另外，又做上一小碗米的饭，预备当作中饭和晚饭；要是晚上有得剩，就留到明天早晨吃。总之，我是想尽办法把自己的食欲限制在配给量范围以内的。昨天把每间屋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今朝一吃完早饭，马上坐到书桌边，时间恰恰是六点四十分。收受配给米的容器，已经放好在二门口。等一会儿得去排队领取配给的玉米粉和豆渣，此外就不用担心什么了。早晨下了毛毛雨，环境安静。心情也很宁静。小书桌边，供着盛开的红白芍药，那是昨天塚本送来给我的。

红白芍药插满瓶，破屋里的老翁正在写作哩。

我情不自禁地吟了这样一首短歌。勉强有得吃，有工夫安安静静写点东西，再加上身边还供着瓶花，我觉得我所居住的世界，比《阿弥陀经》里所描写的极乐净土要更好。我现在就这样感觉着无比的幸福，写着这篇东西。

劳动农民党解散后寄去京都的信

1930年10月13日，我给羽村(大女儿的男人)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二喜男贤婿：谨启者，由于事冗，久阙音候。从历次来信得悉由纪子和通子都顺利成长，非常欣慰。我们一对老夫妇在这里也平安，请放心。从报纸上你可以看到，劳农党的解散问题，表面

上似乎已經大致告一段落，可是留在黨內的我，從根本上說來也是一個解散主義者，所以，雖然至今在黨內做了種種工作，卻對發展的解散的方向逐漸失去了信心，因此，終於得出立即解散的結論。要是你看一看最近的《勞動農民新聞》，大概就可以推察出我的心境。最近那期報紙出版後，第二天夜里我在中央常務委員會上終於公開宣布我得出了立即解散的結論，要是黨允許的話，我就留在黨內繼續主張立即解散，不然的話，只有脫離黨，希望黨作出適當的決定。現在資產階級報紙上雖然還沒有透露這個消息，但不久將會宣騰眾口吧。為了這件事，最近每天都開會。今晚也一樣。大概今晚的會議上，黨將決定對於我的態度吧。我準備等黨作出了決定，再決定自己的行動。脫離黨之後，將做些什麼，還沒有具體地考慮。我打算立即埋頭翻譯《資本論》。黨說不定還將在混亂中削弱而保存下來。我打算寫一篇文章，把建黨以來直到脫離黨為止的一切經過，詳詳細細地從理論上加以說明。不管怎樣，等到事情告一段落，說不定我們老夫婦兩人會一道來看看由紀子們。因為據我推測，以上的情形，不久資產階級報紙上就會登載出來，所以趕緊先來告訴你。我決不會做出出丑的事來，請放心。又，送給我的松菌，多謝多謝。靜子前請代致意。

肇

1930年10月13日”

信紙用的是紀伊國屋書店印制的，那家書店的規模很大，和丸善公司差不多，座落在新宿的最熱鬧的街上。那時我住在離新宿不遠的西大久保，夏天的晚上，常帶同家屬邊散步邊去買些東西。只要看到信箋角上留下的小字，馬上就使我想起當時的事情，不禁感到又悲傷、又寂寞、又留戀。

過了二十多天，又寫了下面這樣一封信。

“二喜男賢婿：謹啓者，來信收悉。由紀子和通子都頑健如常，可喜可賀。來信說由紀子一個人能上理髮店，真正有趣極了。

“我終於脫離了勞農黨。前些日子舉行擴大中央委員會，我要是去出席的話，也許將挨打，結果在會場門口受到拘押，反而是運氣，簡直是天大的運氣。本來，事情到此已經告一段落，不過我還負有收拾後事的責任，所以報紙準備再繼續出版大約一個月。事情完結之後，我決心從此同外界斷絕一切關係，把余生消磨在筆硯之間。其實，要是最初就採取這個方針就好了，不過那樣我就會于心不安，問心有愧；而這一來，我却可以心安理得地（按：原文有重點）呆在書齋里了。從今以後，也許再不會有使你擔心的事情了吧。總之，我現在才真正明白，情況是那樣複雜，像我這樣的人，是一無辦法的。至於書齋里的工作，倒還有些自信，也許不至於鬧出大錯誤來，所以今後大概總可以安定下來了。

“因為要給《中央公論》和《改造》兩個雜誌寫稿子，1日晚上為了躲避來客，就住到左京家里來了。——靜靜地定下性來想一想，彷彿是做了一場大夢。

“等到一切安頓就緒，我們老夫婦兩人想來看一次由紀子和通子。

“靜子前請代致意。

“秀子和芳子都安好。

肇

11月4日

“又：最近一期的《勞動農民新聞》被禁止發行了。”

信紙用的是《勞動農民新聞》的稿紙。信是用鉛筆寫的，字寫得很草。左京是我弟弟，靜子是嫁給羽村的大女兒，秀子是我內人，芳子是還沒有出嫁的二女兒。左京那時在郊区高圓寺的偏僻

处所租了一幢房子住着。遇到有什么事情，我总是利用他那里作为避难所。除了門廊和厨房外，就只有鋪六张席垫和四张半席垫的两間屋子，所以是所很狹小的房子。我一去，我弟弟就給我騰出窗子对着馬路的那間鋪四张半席垫的屋子。一想起左京亲手把从新宿中村屋买来的面包烘得黃黃的，涂上厚厚一层牛油，用家乡話劝我“来吧，請吃吧”，还把我带到建在附近洼地的一家髒里髒气的浴室里，給我在枯瘦的背上冲水，給我用小桶打水，就不禁念念难忘。

从上面的两封信上可以知道，結束了新劳农党解散运动的当时，我似乎决心“同外界断絕一切关系，把余生消磨在笔砚之間”。本来，無論是书信也罢，日記也罢，遇到和非法活动有干系的地方，因为怕給別人万一看到，有时会有意識地撒謊，所以即使是本人所写的东西，也不可以完全信以为真。（自从和非法活动发生关系后，我經常想到这一层。）可是，对于自己的女婿和女儿，我当时似乎沒有特地写信去撒謊的必要，所以信上所說的，也許是劳农党解散运动剛結束时我的真实心境。

在这以前，当解散劳农党的运动剛发动时，我写过一篇《給劳农党的发展的解散所留下的唯一道路——战斗的解体》。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解散劳农党后，我們該朝哪个方向前进呢？”接着，先談了談工人和农民的問題，然后說了下面这样一段話：

“其次是小市民的問題。过去由劳农党組織起来的小市民中，那些决心今后坚决为革命的工会、农会的发展和巩固而斗争的，也許应当趁劳农党解散的机会，参加到这些組織中去。如果有人不打算那样做，那末我們希望他讀一讀下面一段文字。（按：这里引用了1930年6月号《国际》杂志上的文章的一节。引文这里从

略。)打算在合法場面上做点有意义的工作的人,就該走这条‘无害的’(从工人和农民的最后解放这一观点上看来是无害的)道路。要知道,如果留在完全合法的場面上从事活动,那末尽管表面上看来在为解放运动而斗争(可能自己也以为如此),結果总是帮了跳不出改良主义圈子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众、日本大众、劳农等党)的忙,这样,不管本人主观意图怎样,毕竟只能产生‘有害的’效果,所以我們必須避开这种不三不四的——归根到底是反动的——政党运动。与其做有害的事情,还不如轉移到无害的(归根到底多少是有益的)陣地为是。”

当我說这样一段話的时候,也許认为我自己所該退入的无害的陣地就是书斋,而且认为要是书斋的話,可能从此不再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問题,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了吧。前面那封給羽村的信上,我还說:“从今以后,也許再不会有什么使你担心的事情了吧。”当时似乎絲毫沒有料到,后来仅仅过了两年多,我就被捕,結果让骨肉至亲担了老大的心。由紀子和通子是我的两个外孙女。当时我希望和我妻一道到京都去玩一趟,看看这两个孩子,可是后来十多年中間,終于一次也沒有机会去。等我再度见到故都的山川的时候,日本已經对美、英宣战了,那时由紀子和通子都已經成了女学生,而靜子时常来信說“想让爸爸吃一頓”的河原町三条的栗子赤豆年糕湯,連见也见不到了。

全神貫注于《資本論》的翻譯和 《資本論入門》的改写

劳农党解散运动结束后,实际上我就像給羽村那封信里所預先声明的那樣,暫時全神貫注于《資本論》的翻譯和《資本論入門》

的最后改写。（《資本論入門》的最初萌芽，是1923年連載在《社会問題研究》上的《資本論略解》。后来在1928年，我把它改写了一遍，并且改題为《資本論入門》，計劃以单行本分册陸續出版下去。这次准备再把它彻底改写一遍，并且把相当于原著第一卷全部的解釋，汇总出版。）

但看我在給小舅子大塚有章的信（大概是1931年2月25日写的。这个推測如果不錯的話，那末这封信是在給羽村写了上面那封信不到四个月之后写的）里，就有下面这样的話。

“有章弟：长信拜讀了。……承你对我的工作提出忠告，非常感謝你的厚意。我已經把来信反复讀了好几遍，准备还要好好考虑。要是先把我想到的事情奉告，那末如你所知，我从前是搞經濟学的基础理論的，对于馬克思主义的政治論，則完全漠不关心，这是我的致命伤；因此才造成了积极贊成組織劳农党的大失敗，有鉴于此，现在我总算对政治方面經常感到兴趣了。这是此番給《改造》写那篇类似論文的东西的內在原因。但是，正如你所說的，这种东西写了出来，并不起多大作用（內容本身，我到现在还觉得并不怎样坏，不过作者是河上肇，那就不行），所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写那样的文章了。实情是我本来无意写那篇文章（如果最初就打算写的話，一个月以前早就写了），后来受到朋友的慫恿，就认为可能还是写的好。

“最近看到德文版的《国外通訊》^①里面有一篇《馬克思主义的工人教育》，介紹函授学校的事。內容包括經濟学、工人运动史、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設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四个讲座。每个讲座历时一年，每两星期发一次讲义，每次三十二頁。因为这事业非常有

① 《国外通訊》（《I. P. K.》）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譯者

益，所以費了相当的篇幅加以介紹。《經濟学》分为七篇：

- “1. 馬克思主义价值論；
- “2. 資本主义剝削的本质和方法；
- “3. 工資的本质、形态以及它的变动规律；
- “4. 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律；
- “5. 恐慌的原因和不可避免性，及其社会的結果和意义——資本主义范围内克服恐慌的不可能；
- “6. 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殊性；
- “7. 有关帝国主义以及經濟上的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各种理論的批判。

“要是以这样的内容为范围，那末在我也馬上能够着手搞，所以打算参考那个讲座，考虑一下。

“另外一方面，最近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資本論》的翻譯上。譯完那部书，我想写《資本論入門》。这本《入門》，书名虽說是“入門”，却稍許有些深，但是我打算使它仍旧維持原来的程度。单是这两件工作，就会占去我所有的時間，所以一定听从你的忠告，留心着不再插手到其他的領域去。最适宜于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我自己很难作出适当評价。这也許是我插手到别的領域去的根本原因吧。总之，我将再好好考虑考虑。

“本来無論怎样想去見識見識全农（按：所謂全农，就是全国农会）大会，可是到了那里，一定会叫我致辞，而我則不願意演說。还有全农主办的紀念已故山本議員的演讲会，他們也劝我去作一篇講話，我也不願意。因此，暫時就都不打算参加了。秀子却准备在这几天里单独去看看外孙女。我决定不和她一同去，所以打算让她尽快（两三天內）动身。关于产业合理化的資料，我将把我身边所有的查一查，凑齐了寄給你。

“百忙中承你写給我那样充滿厚意的信，姑且草率奉答如上。匆匆不一。

肇

3月25日”

从这封信上可以知道，那时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資本論》的翻譯上”。也許是忙着即将发排的第一卷上册的整理工作吧。至于这封信里所說的发表在《改造》上的文章，到底是怎样的东西，因为手边现在沒有，所以不清楚了；不过从信上推测，反正是政論文章。当时我尽管每天埋头于《資本論》的翻譯，却經常对政治感到兴趣：这一点也可以从这封信上推测出来。这个倾向，后来一直繼續到被捕那天为止。尽管这样，我当时却不敢发表政論文章，这大概是由于顾虑到那时我还是党（日本共产党）外人士，沒有直接受到党的領導吧。

后来过了一个月，我又在3月21日的信上写了下面一番話。

“卫弟：謹启者，好久沒有写信給你，你的健康想必已經逐漸恢复。今年4月，本来想趁学校放假的机会，訪問老朋友并且到你們那里去探春，可是一个月以前动手做的《資本論》的校对工作（几乎把每天最好的時間都花上去了）怎样也完不了，照目前的进度，月內無論怎样也沒有結束的希望（把它擱下来，却又办不到），所以京都之行，只好作罢（虽然我很希望同你见面，因为我們闊別已久）。要是你得便的話，希望来东京休养一陣子。

“《資本論》第一卷恰好付印了一半。自己认为是个很好的譯本（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目下校对工作暫時中断，所以草此奉候。等到工作告一段落，再暢叙吧。再见。

肇

21日”

“卫”是我小舅子那时所用的别名。

前封信里还说“秀子准备在这几天里单独去看看外孙女。我决定不和她一同去，所以打算让她尽快（两三天内）动身”，而过了一个月，在这封信里却说“京都之行，只好作罢”，这是因为我想；既然我妻要去，我不如也一道去，所以等着我得便的机会。可是一直等到三月底，我始终不得闲，这时我妻也只得断了去京都的念头了。

佐野学的来信

又过了一个月，在盖有4月27日的邮戳的佐野学给我的信里，有着下面这样一番话。

“河上肇先生：谨启者，4月16日的手书，已于22日奉读。得悉贵体康健，殊为欣慰。从江马修那里得悉您的近况，又从您的来信中更清楚地得知您近来的心境和工作情况。您深刻地谴责自己犯了重大的过失，可是由于您的自责，以及最近的努力翻译《资本论》，以前的过失也许已经抵偿清了（请恕我说话老气横秋）。您在脱离大学教职以前，对于无产阶级的实际运动可能没有具体了解，因而走了一些弯路，那是不足怪的。日本党和中国党的事情，我是具体地知道的，其他各国的党的事情，我也耳闻或者从书本上读到一些；我知道，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有一些人从我们的阵营投奔了敌对阵营。我完全知道您和那类人——他们做尽了不顾廉耻的事，比如破坏罢工咧，分裂群众团体咧，积极攻击共产党咧等等——是有区别的。我认为，今后您如果想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必须首先拿定宗旨，参加独一无二的无产阶级的党。这样的时期也许不久就会到来吧。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意料不到的惊天动地的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不过，我认为，您现在不参加党，集中精力

翻譯《資本論》，這無論對您自己說來，還是對無產階級的黨說來，都是一件好事。對着老前輩的您，反而用這種老前輩的口氣說話，我覺得很過意不去。還記得庫西寧同志說過，布哈林自稱為經濟學者是不對的。讀了斯大林同志的文章以後，再讀布哈林的文章，感覺完全不同。前者百分之百地從工人的立場抓住了事物的根本，而後者呢，相反地過於偏重理論，過於學究氣，換言之，是小資產階級式的：他們兩個人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斯大林同志的思想方法，是長時期的布爾什維克的活動、實踐的產物，盲目地加以模仿當然可笑，但是那確是從馬克思開始、通過列寧日漸發展而成的無產階級的思想方法，所以務須加以掌握。您的大作《資本論入門》最初的部分拜讀了，非常佩服。希望今後務必繼續寫下去。當然，希望去除布哈林式的思想方法的任何痕迹（這決不是說《入門》這部書里有這樣的痕迹）。您嘆息這幾年里失去了許多知交，其實那是用不着悲傷的。如果干着正確的工作，是會得到許多本階級的朋友的。人到死都必須前進；我自己覺得即使關在牢里也有了進步。今後在長達一年以上的審判期間內，我還會有所進步吧。祝您健康，工作順利。草草。

佐野學拜

4月25日”

這封信現在重新讀起來，覺得實在寫得不錯。可是，誰料想得到佐野學本人寫過這樣的信以後，在“長達一年以上的審判期間內”，竟“從我們的陣營投奔了敵對陣營”，“做盡了不顧廉恥的事”呢？一個人用嘴說出和用筆寫下的話，難道這樣地不算數么？想到這裡，我不禁擱筆興嘆了。

《資本論》（第一卷上冊）的裝訂，是5月初搞好的。大概我馬上就給監牢里的佐野學送了去，6月5日（由於檢查費時，所蓋的

郵戳是 10 日)他写給我的信(信式明信片)的最后,有这样几句话:

“惠贈的《資本論》第一卷上册的尊譯,我已写信給江馬,請他寄給家姊。我很想至少大略看它一遍;如果实在办不到,只好轉送給獄外的哪一位忠实同志,这层希望您原諒。”

地址和上一封信一样,写的是“市外南綾瀨町小菅 1284 号”。“小菅”就是小菅刑务所,后来我在那里坐过将近四年的牢(到后来,町名虽則变更了)。信里所說的江馬,是指劳农党解散后时常在我家出进的江馬修,我送給佐野的那本书,就是托他轉送到监牢里去的。

在那封信里,还有下面这样一段話:

“上次的信里我曾說过,我也和大家同样地认为,您的翻譯《資本論》以及现在在书斋里的其他工作,对于工人阶级有着很大的意义,希望把主要精力全都用上去,至于政治工作,我认为目下尽可能以少参加为是(請恕我說話冒昧)。党外馬克思主义者的政論,即使是支持党的人写出来的,在日本也有越来越不对头的迹象。向老前輩說这許多話,非常过意不去。”

那时候的佐野学,在我們中間,仿佛就是党(日本共产党)的权威发言人,佐野学这个名字,响亮得很,所以像上面那样的信給了我极大的影响,是不难想像的。本来,我在刚发动劳农党解散运动时,即半年以前,就写信給羽村,說今番无论怎样要“心安理得地”呆在书斋里。凑巧佐野学又劝我这样做,我就更加“心安理得地”抱定这个宗旨了。

成为书斋里的人

我手头还保留着一封 6 月 1 日(1931 年)給羽村的信,里面是

这样写的。

“二喜男賢婿：謹启者，前些日子收到你的来信，敬悉一一。貴地情形，从靜子的一次一次的信中經常可以知道一个大概，非常高兴。前些日子我收到佐野学从监牢里写給我的长信，里面說：‘我认为，您现在集中精力翻譯《資本論》，这無論对您自己說来，还是对无产阶级的党說来，都是一件好事。’还有，鍋山貞亲写給我的朋友的信里也說：‘即使到将来，属于学者的范畴的人的存在，还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河上应该专门从事写作，借以对无产阶级作出贡献。’他还把这番意思托人轉告了我。据說三田村四郎也說过同样的話。总之，‘巨头們’几乎异口同声地希望我翻譯《資本論》和写完《資本論入門》，这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我觉得此后完全可以定性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精力完全集中在目前的著作上，而且近来工作也进展得很順利。希望你放心。《入門》（第一卷，相当于《資本論》第一卷全部）正在执笔中，大概至迟七月中可以写完了。

“现在正碰到談机器的地方。Sliderest (Drehbankschlitten) 不知道指的是什么。要是你能简单地告訴我，請給我一信。只要几行的解释就成。如果知道专门的譯語，那就更好。片山正雄的德文字典里，只注出“旋床的滑台”，光这样讲，外行人是不容易懂的。

“此后要是到京都去，我将和外面的运动完全无关地只是去玩玩，或是利用利用图书馆。在不久的将来，会去打搅你。

“靜子的明信片上，說去看电影《全綫》了，大概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吧。我因为江馬修极力称赞它，劝我一定去看，所以虽然已經多年不看‘影戏’，这次却去看了，觉得并不怎样有趣（和江馬修等看到的不一樣；我看的时候，重要的地方据說都被剪去了）。

“新近我把写字台搬到北窗下，坐在椅子上写作。拉开窗子，西面的邻居家里，大树参天，枝叶密茂，几乎看不见天。我在我前面、右面和左面都放着小桌子，进行着工作。白天黑夜专心一意从事写作，最近这一阵的定性，是近来少有的。皮肤病和神经痛曾使我感到极大痛苦，但是现在已经差不多全愈了。匆匆不一。

肇

6月1日夜”

本来无论如何都不能心安理得地呆在书斋里的我，到1931年（那时我正五十岁），总算达到了能够毫无良心上的不安地呆在书斋里的心境。“白天黑夜专心一意从事写作，最近这一阵的定性，是近来少有的”这几句话，把我专心写作、宁静地沉浸在满足感里的心情如实地表露出来了。可是，我之所以能获得这种安心，却是由于内心里早就有了遇有必要时将随时跑出去的精神准备。想起来，要是当时的日本共产党稍稍健全一些的话，那末尽管我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党也不至于使我这种人感到这种“必要”吧。可惜的是——如果照实情说——那时候党的核心部分已被反动当局所派遣的奸细所侵蚀，三个最高干部中的一个，不断地在和警察厅串通下，专门搞着种种的阴谋，所以党对于党外的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仅对每一个被做工作的人说来是不亲切的，连对党本身说来也是不亲切的。我曾经见过一面的松村（这是他在党里的化名，真名实姓当然不知道）那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奸细，是最高干部里的一个，那时他掌握着党的资金局的全权。他就利用资金局，把合法场面上的党外人士一个个地罗致到非法的网中去。在言论界标榜马克思主义的知名人物，一个个受到他向党捐款的劝诱。机灵的人自然巧妙地逃开了。可是一些正直而认真的人（其实这种人才是言论界的珍宝，他们在合法场面上的写作活动，对于非法的党具

有很大的利用价值),由于認識到处身在党外,对于党的作法不該說长道短,所以只要知道那确实是党的意志,就无論多么为难,好歹总响应党的号召。因为,为了自己个人的得失而逃避,那是良心上所不允許的。这样一来,合法場面上的最好的活动分子,就都像蝴蝶卷进蜘蛛网那样,一个不剩地被党的非法活动的网所罗致了,而一旦被卷进网去,就再也脫身不得,只有等待着哪一天一齐被捕而已。所以,表面上看来,当时党是迅速发展着,大有蒸蒸日上之势,而其实却不过是到处都在张着这样的蜘蛛网,只等檢察当局在认为所有赤色分子大致都落了圈套的时候,一网打尽而已。

劳农党解散后,我本来以为这一下总可以心安理得地呆在书斋里,把全副精力傾注到早就认定为自己終身事业的《資本論》的翻譯上去,哪里知道事与願违,終于未能让自己了却这番心願。

西大久保的寓所

1930年1月,我离开京都,把家搬到东京,住在东京市外西大久保133号,那时信封上的地址就是这样写的。那个寓所,离新宿很近,步行只要十四、五分钟,当时却还属于郊区哩。乘高架电車在新大久保車站下車,走过商店街,向右轉弯,朝着炮兵工厂走不多路,右手有一家澡堂,从澡堂前面那条小胡同向左轉弯,第二、三家就是我当时的寓所。那是一所有个簡陋的小門的旧楼房,記得房租是每月五十五块上下。

大門旁边那棵松树,也許是由于阳光不足吧,瘦弱得可怜。大門右边的柱子上,挂了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河上”两字,后来警察跑来叨嘮,說必須把姓名全都写出,因此不久就換了一块牌子。右边柱子上挂了一块稍許大一些的牌子,上面写着“社会問題研究

編輯所”。这块牌子是从京都带来的。

屋子虽则脏了一些，但是按房租来说，地方还算是宽敞的。在楼下，二门口的北面有一间下房，窗子对着马路，西面有一间起坐间，窗子开向北方。二门口西边是一间附有摆设间的八张席垫大小的屋子，我们把它作为寝室。摆设间挂有幃幕，代替壁橱之用，里面放些被褥之类。起坐间的西边是厨房，厨房里也铺着几张席垫。从二门口走上楼梯，楼上有两间屋子。靠近楼梯口的那间算是会客室，里面放着三张廉价的桌子，拼在一起，上面复着一条红色台布，还配着几张藤椅。里边那间算是书斋，当窗安放着我用了多年的那张大矮桌（那是截了四脚的桌子。1903年我成家那年，从旧货店里买了来，用了一阵以后，就截去四脚，改成矮桌，到京都去教书时，把它运到了京都，这次搬到东京来住家，又把它运回东京。这张矮桌对我来说是十分富于纪念意义的，现在由我的朋友畑田朝治保存着）。

当时家里有五口人，包括比我们晚到东京的二女儿芳子在内。因为，除了我妻之外，那时还有一个书僮，一个女佣。

那书僮，名义上是书僮，其实带有护卫的性质。1929年春天，山本宣治遭到暗杀以后，我京都的住宅里，就有当地的工会所派的一名工人来当护卫。最初是出于工会方面的好意，我只是被动地接受了，后来成了习惯，要是缺了人，我这方面——一切由大塚幹旋——就主动地物色一个适当的候补者，使我的身边经常有一个年轻人伴随着。因此，在这两三年中，旅行啦，出席演讲会啦，那就不用说，甚至出去理个发或洗个澡，也总是有人陪着我。（在刑务所里，除了极少数几个受到“独步”的特典的人以外，罪犯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一名看守跟随着。比如，一个熟练的电工罪犯，为了进行工作，有必要在所内东走西走的时候，总有一个看守跟着他，到

东到西拱手站在那里看着罪犯做工。所以，不管那个熟练工人做什么，他身边总有一个领取一定工薪的公务员什么事情也不干地在闲荡着，这多么不经济呀。如果有人来探监，传呼的看守就走到犯人呆的工场或单身牢房，把犯人领到接见室，接见完了，再把犯人领回原来的工场或单身牢房里去。所以，犯人永远有人跟着。后来我被判徒刑坐牢的时候，老是想起劳农党时代的护卫来。)

在西大久保寓所给我当护卫当得最长久的，是京都水平社派来的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姓小林。他本来就是肌肉发达的体质，到我家一两个月之后，更加胖得不成样了。我的内人向来非常注意我的营养，早饭的酱汤里总给放进两个鸡蛋。她觉得光对丈夫这样，不大好，所以也给护卫的青年同等的待遇。我胃腸不好，午饭多半是吃涂上黄油的、中村屋的面包。那位青年胃腸很好，却也照样三顿饭里给他吃一顿面包。还记得，我看见那位青年在面包上涂上那样厚的一层黄油，起了吝嗇的心，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着他。那时物资不像今天缺乏，晚饭菜多半有鱼，如果家里的人吃烤猪肉(她们常吃)，总是给我准备别的肉类(因为我不想吃烤猪肉)，而守门的青年总是和我吃同样的东西。在今天这样艰难困苦的时代，回想过去，觉得当时我虽存心过简单朴素的生活，可是在吃东西方面，却过分讲究了。主要是因为身体特别衰弱，所以觉得唯独在营养方面，非充分注意不可，但是，也许正由于吃得太讲究了，所以反而损害了健康，也说不定。我经常胃痛，四肢瘦得就像枯树那样。而那些守门的先生，只在我外出时陪陪我，在家里清闲无事，连扫帚都不拿一拿，由于营养好的缘故，一到我家，马上就发胖，特别是小林。不过，肉体虽则马上发胖了，精神方面却发展得怎么也不够理想。本来被认为大有前途而当作留学生派来我家的

小林，我因为听说他抱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莫大愿望，就先给了他一本我所著的《经济学大纲》；把书给他的时候，还对他說：“可以一边讀，一边提出問題。”可是他却像看小說那样，一行一行地用筷子点着飞快地浏览，过了三、四天，就对我說，那本书已經讀完了，要我另外換一本給他。那本书的前半部，是我担任京都帝大经济学讲座时最后所写的讲义稿修訂而成，在大学里用了一个学年，才讲完了它。当小說那样讀，根本不会懂，可是，他連自己不懂都不知道。那就毫无办法了。非知識分子出身的当时的年輕左翼战士，多半是那样。

女佣是我們住在京都时就來我家的一个姑娘，我一生中波瀾最多的时期，她一直和我們在一起。后来她在东京結了婚，1937年我刑期屆滿、从監牢回到家里的时候，她曾背着她的一个男孩来看我，当时她一见我的面馬上就哭了。就像这样，她和我們之間是很有感情的。到后来，她还常常到我家里來玩；最后回到她的家乡新潟县，害了肺病，年紀輕輕就去世了。

劳动农民党解散后在我家出进的人

脱离劳农党以后，我仍旧住在西大久保。1931年春天，我完全結束了劳农党的解散运动以后，西大久保的寓所虽然骯髒而空曠如旧，但是房子里的气氛却驟然与前不同了。

来往的客人变得极少；像劳农党时代那样，二門口堆滿了鞋的情状^①，一次也沒有了。同工会运动有关系的两三个青年还繼續在我家出进，可是他們真正完成了所謂战斗的解散，率領會員們一

^① 到日本人家里去，先要把鞋脫在二門口，然后走上席墊。“二門口堆滿了鞋”，表示宾客之盛。——譯者

齐参加了“全协”(受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全国协议会),所以都已经潜入地下,成了非法运动者,口袋里经常藏着非法文件,对于周围必须经常戒备。寓所大门旁边,是一条小胡同,通向两三幢建在死胡同里的房子,我家的厨房门也在那条小胡同里,兜售日常用品的商人都从那里出进。那些非法青年,也避开大门不走,却走后门。那时经常来我家的是团迫、饭野两位;还有一对在全协化学工会做事的年轻夫妇,经过他们两人的介绍来看我一趟之后,也常常来走动。那些人都蹑手蹑脚、一声不响地从厨房门口进来,往往悄悄地走进起坐间,使得埋头做针线活的家眷们吃上一惊。本来,劳农党时代来我家的那批合法场面上的闯将们,总是在大门外面就高声谈着话,接着冲进屋子里;上了楼,纸门也不关就高谈阔论起来;特别是大山郁夫委员长同了两三个人来我家的时候,响亮的笑声楼下都听得清清楚楚,显得十分热闹。可是非法运动的人,多半只在楼下商量事情,说话也低声低气。即使上了楼,也一定要把纸门关上,不让人家从外面看见他。他们甚至不愿让守门的那个青年听到他们的谈话。

团迫这个人,是和歌山高等商业学校的毕业生,一毕业马上就来看我,表示愿意参加工会运动。那时新劳农党还成立不久,所以他自然就在劳农党系统的工会中做事。不过他本来就怀疑是否应当建立劳农党,所以等到解散运动一发动,他马上率领会员参加了“全协”。学校里的成绩据说并不好,可是他热爱科学,头脑很明敏。只是由于他的气质以及体力不强的关系吧,在工会运动的实践方面,并没有做出十分出色的活动。一般说来,对于他那样一个斯斯文文的人,学者生活大概最为适宜吧。

团迫从事地下活动期间的生活费,多半都由我——严格地说,是由我妻——借给他。后来,他和他那个工会里的女工结了婚;结

婚那天晚上，他們两个双双来到我家，就住在我家楼上过夜。我每月捐献给他所从属的那个全协化学工会的捐款，总是由他转交。他后来成了共产党员，被捕后，假装坚决“转变”，结果由法院从轻发落，判以两年徒刑，准予缓刑（当时，共产党的一般党员如果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事情，受到的刑罚不过如此而已），最后得到保释出来，回到了家乡岡山。可是不久就得了不治之症，一个有为的人材，几年后就白白死去了。要是他还健在，而在本地搞农业生产的话，遇到今天这种食物异常艰难的时候，一定会想起我这个老头儿，不时送点地里的出产来使我欢喜欢喜吧。我就这样独个儿凄然地思忖着。

还有一个飯野，他曾经做过南九州的小学教员，同样是有心从事左翼运动而来东京的。起初他也和团迫一样，参加了劳农党系统的工会，认识了团迫，也常来看我。他是个身体茁壮、正直愉快的好汉，虽则没有学问上的能力，在运动方面却是个非常勤奋忠诚的努力家，所以老早就被吸收为党员（比团迫早得多），后来一直做到“全协”的化学工会的中央委员长。他后来也被捕了（团迫和飯野都比我迟几个月被捕），还没有等到开庭公审，就在警察局的拘留所里生了病，表面上那样茁壮的一个青年，竟就此突然死去了。而我呢，比他们年纪大得多，身体又不好，坐了几年牢，居然平安地回到家里，到今天还活着。可是，当年照应过我的那位年轻女子也死了，交情很深的两位青年——团迫和飯野也死了。以我这样的身体，怎么偏偏能够活下来，而沉浸于当年的回想中呢？真是想不通。

当时，每当团迫和飯野像一阵风那样走进厨房、蹑手蹑脚地出现在起坐间时，不拘什么时候，我妻总是马上给他们准备茶饭。这是因为他们永远没有钱，永远是饿着肚子。他们总是趁茶饭未端

好以前，来到我的书斋里，悄悄地从口袋里取出印刷品来让我看，有多余的就送给我一份。那些都是非法文件，多半是油印的。就这样，我不仅能够看到全协方面的印刷品，连每期的《赤旗》报都能读到。飯野初获得党籍的时候，也曾欢欢喜喜地跑来我处，急忙把这个秘密消息告诉了我（获得党籍之类的事情，按照纪律说，本来连对在同一单位工作的知己同志，都应该绝对保守秘密）。由于那时他们给我看、对我说的全是这一套，所以周围的空气自然而然地也就不能不是静悄悄的了。

同共产党的最初接触

劳农党的解散运动结束后不久，就仿佛是等候好了那般的，日本共产党的手直接伸到我身上来了。

详细情节现在我都忘了，不过记忆力好的、同我打过交道的人在被捕之后，却在预审推事面前把详细经过按年按月一一交代了，那份预审笔录现在总还保存在什么地方，所以详情不难弄清。这里就只能凭我的很不确凿的记忆来谈谈。

那是不冷不热的时节，早则 1931 年 6 月光景，迟则那年的夏秋之间，有一天，几年没见面但是素来就认识的杉之原舜一，拿着细迫兼光的介绍信来看我。拆开介绍信一看，内容大致是这样：“我保证杉之原是日本共产党党员，一切请直接同他洽商。”杉之原那时是日本大学的民法教授。他开口先说：“要是我突然自称为共产党党员，跑来找您，恐怕您不相信，所以让细迫给介绍一下。”说完马上就请求每月给党捐出一定数额的经费。而且还发誓赌咒般地說：“我到死也不会泄漏这个秘密，所以您完全放心好了。”（我总把党员当作理想的人格，所以我就相信了他那番话。可是，虽则事

情发生于我被捕以后，杉之原后来却把所有一切经过几乎丝毫不遗地向预审推事交代了。当时为了和莫斯科取得联系，由杉之原从中斡旋，我请他们给我搞了个秘密地址，后来这个地址变更过一两次，我因为记忆力差，所以街名、门牌号数以至户名全都忘了，而杉之原却一一交代了出来。关于这些，我将另外讲到。）

我自然马上就应承下来。记得起初约好每月捐款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后来逐渐有所增加）。

这样，我终于同党直接挂上了钩。一方面我固然完全放下了心，可是另一方面却因此而大伤脑筋。

为什么说是放了心呢？这是因为我一向都在苦思着，怎样才能设法把我手里的钱用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上。那些钱，都是登在杂志上的文章的稿费以及单行本著作的版税积蓄起来的，而那些文章和著作，虽则并非全都直接谈到马克思主义，但其中大部分都是谈社会问题的。我因为不想靠贩卖这类问题而发财致富，自己过奢侈的生活，所以尽管有钱，却经常约束着自己，不把它用在个人享乐上。我本来对字画很感兴趣，但是从来几乎没有花过一个钱买那类东西。《回忆》里曾经讲到的外祖父遗留给我的那一轴佐藤一斋的字，裱纸破损了，本来早就想把它重新裱一裱，结果却连这件事都一直搁到今天。多谢我妻，她也完全随顺着我的作风（尽管我并没有叫她这样做）。在大学里教书的时候，最后那几年，薪金仅仅占到每月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稿费收入却多得惊人；尽管这样，我妻也连时髦的外褂都没有添置过一件。我们夫妇二人都不善于理财，多出来的钱，只知道存银行；结果，因为什么钱都不花，所以自然而然就积下了几万块钱。离开大学、从事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的时候，不用说，我是打算把积下来的那笔钱全都花完的。不过，我觉得，一味乱花，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有那样一笔钱在我手里，我

就有义务把它花在最有意义的地方。本来，为了履行这个义务，最好无过于把手里的錢一古脑儿交给日本共产党的党中央；无奈当时的党总部，大有全軍复沒之概。后来虽说透露出重建的曙光，但毕竟是个非法的东西；像我这样的人，既不容易识别，又不容易找到它。因此，我除了给新劳农党（我是因为想使日本共产党易于重建和发展，才参加新劳农党的創立的）捐了一些錢之外，凡是接近我的人，只要我推测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或是为共产主义而工作的，我就随时给他们一些錢。在当时，我只能采取这个办法；但是，为此我也在长时期中一再遭到失敗。

说来慚愧，当时有一部分人中間流传着这样的话：“要刮那个老头儿的錢很容易。只要让他看到你口袋里有条紅手絹，他馬上就会掏錢。”事实上也确是如此；要想叫我掏錢，是用不到别的花招的。当然，我曾上过形形色色的家伙的当；那些戴上假面具的坏蛋們，曾經几次三番变尽花招儿騙过我的錢。如果只是白白糟塌几个錢，倒也罢了；有时还把錢送给了取消派，这就只能产生有害的作用；所以当我一旦发觉上了当的时候，我真是懊恼万分。

可是现在，我总算同党总部直接挂上了鉤。这样，剩下来的所有的錢，就都可以有效地使用，而不致再出什么差錯了。这就是我所以放心的緣故。

但是，另一方面，从此以后，我却不得不經常为錢的問題而煩惱。那是由于其中有下面所說的这样一种道理。

在初次见面的时候，杉之原向我提出了如下的要求：既然同党直接挂上了鉤，以后有錢时，無論多少，希望都交给党总部。党总部会考虑各方面的需要，通盘规划，适当調剂，所以你一向捐给工会等的錢，今后請一概止付。工会方面，党总部会通过相应的机关把情况通知他們，他們决不会再来胡乱請求捐款；即使有誰再来請

求捐款，也决不要捐給他們。

我认为他这番話說得有理，而且认为，当时我虽还没有成为党员，可是党的这种要求却非严格遵守不可。但是，这样的要求其实是行不通的要求，因此，到后来，我不得不一再吃足苦头。

根据劳动农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成为京都 第一区竞选众議員的候选人

眼下，每月給团迫等人的捐款，首先非設法停止不可。对团迫，話还好說；大概是我敞开內情，征求了他的諒解。至于对別人，却不管我多么为难，也不便把內情說穿。因此，素来不善于搪塞敷衍的我，每次遇到有人来要我支助金錢时，我总是穷于应付，苦恼万分。

提到这一点，首先想起的就是畑田朝治的事。现在我和畑田一家，来往得比亲戚还密，露骨地写出来，本来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在这里，我要尽可能坚持客观的态度。

1930年1月2日，我刚刚把家搬到东京，1月25日就又重新回到京都。当时我虽則参加了劳农党的建立，决心把全副力量貢獻給这个新党，却連做梦也没有想到即将参加众議院議員的竞选。当然，当时可能早有人慫恿我参加竞选，可是我怎样也不願意；为了爭取主动，所以正月初三都没有过，就急急地离开了京都。可是劳农党的中央委员会，却不顧本人这种恳切的願望，滿場一致地要求我当京都第一区竞选众議員的候选人。坐在旁听席上的我，因为觉得既然是党的决议，也就没有办法，于是当下就应承了下来。——本来，我这个人虽然非常任性，却具有服从团体意志的道德律。我一向认为，既是一个团体的成員，那就非遵守那个团体的决

議和規定不可。例如，1928年，我就因為教授會作出了決議的緣故，乖乖地離開了大學教授的職位。而這一次，也因為中央委員會作出了決議，所以儘管我非但一點準備都沒有，而且心里萬分不願意，却仍然毫不躊躇地決心參加競選。不了解我的性格的人，看見我起先萬分不願，一經議決，却就馬上答應下來，會說我那一套只是裝腔作勢吧。

由於這樣的緣故，所以西大久保寓所里的行李還沒整好，1月24日的夜里，我就離開東京，到京都去了。但是，那時我在京都的原来的住所已經轉讓給我的大女婿羽村了，我不願意住到女婿家去，把女婿的一家卷進競選運動的旋渦。不僅如此，周圍的人都說，看到外孫的臉，會降低鬥爭情緒，所以，直到競選完了，他們家我連去都沒有去。因為有這層關係，而且另外又無處可住，所以在競選運動期間，我只好住在旅館里（儘管京都是我住了二十年之久的地方，照道理不至於要住旅館）。

競選事務長是大家都叫他“奧甚”“奧甚”的奧村甚之助。他是個工人出身的老戰士，一生都住在京都，當時已經是京都府議會議員、市議會議員；他那操京都方言的低級演說，對於大多數來聽競選演說的聽眾，是非常熟悉而且叫座的。他生活艱苦，却老早就參加了無產階級運動，這次競選，他老當益壯，一心想由他當候選人，可是黨的方針已經決定，他也只好勉強委屈一下。因為這層關係，所以在幫我搞競選的人們中，他也許是最不熱心的一個了。過後我發覺，那時他的基本方針，儘管是無意識的，却似乎為下屆選舉眾議院議員、他自己當候選人，播下種子。所以，任何事情，他自然都不會加以充分親切照料，而我呢，却剛剛走出書齋，像嬰兒一樣無知，萬事都交給了他。旅館也是這位奧甚給挑定的，叫做目貫屋旅館，座落在三條大橋的橋塊，正對着高山彥九郎的銅像，面臨

着加茂川。我住的是楼上的两间屋子。

当时的剪报还保留着：

“划了一个印象深刻的大的抛物线而从马克思主义砌造的象牙之塔跑上街头的河上肇博士，遵从了‘党的节制’，壮烈地出来担任了第一区的候选人。博士对选民的竞选口号是：‘即使不能像山本宣治那样斗争，却能像山本宣治那样牺牲。’诚然，正如博士自己以他惯有的讽刺语调所说的那样，面对着加茂川的潺潺清流的三条大桥目贯屋旅馆二楼的两间屋子，是‘日本最好的竞选本部’。河上博士的本部，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竞选本部，的确太好了，几乎有些不相称。正在整理当天即将开始的言论战的底稿的博士，说：‘我在京都，家倒是有，在吉田区，可是打扰家里的人，于心不安。……我已经在这旅馆里睡了两夜了。你问我的战术么？我打算专门进行言论战……前些日子在九州有了经验；连日连夜搞演讲的自信心，我是有的。我的帮手是奥村君，一切事情都委托给他了，请你和他谈谈吧。’说罢，回头看了看坐在旁边的奥村甚之助。（中略）博士有两个孩子，吉田区的家里，还有外孙，可是由于‘打扰家里的人，于心不安’，所以在竞选期中不折不扣地过着独身生活。从象牙之塔走向实践斗争、一下子更参加竞选的博士，对着加茂川的潺潺清流，心中可能有着无限的感慨吧。”（1月29日的《京都日日新闻》）

第一区的众议员名额一共五个，可是候选人倒有十三个，其中有当时的执政党——民政党的党员、前任大藏大臣片岡直温，同党党员、前任众议院议长森田茂，地道的京都人、前任京都市市长安田耕之助等人。和我站在最敌对立场上的，是被人称做“水长”“水长”的水谷长三郎。他是上次大选中和已故山本宣治一道从旧劳农党选出的全国仅有的两名议员中的一名，可是当左翼阵营开始

受到镇压的时候，他馬上逃出原来的陣营，搞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地方政党，党名堂而皇之地叫做劳农大众党。事情发生在由于他的逃避而只剩一人孤軍作战的山本宣治牺牲不久以后，所以我們大家都对这个水谷非常痛恨，而我参加竞选的主要目的，甚至也可說是为了打倒他。

关于我們两个人的对垒，2月5日的《大阪朝日新聞》有下面这段描写。

“‘姐姐，你知道嗎，从前在京大教过书的河上博士和他的学生水谷这次竞选众議員，唱起对台戏来了，这件事哄动了整个京都呢！’就这样，連祇园^①的天真烂漫的舞妓都在紅灯綠影下，輕歌曼舞中，談論着河上肇博士师生二人的对垒；的确，这件事着实哄动了全国的新聞界。一边是走出了象牙之塔、参加了新劳农党陣营的前京都帝大教授法学博士河上肇，一边是脱离了旧劳农党、建立了地方政党的、劳农大众党的上届議員水谷长三郎。河上博士是从研究室踏上实践的第一步，而水谷却要把退出劳农党的是非曲直交給京都的无产市民作判断，并讓他們表示对他信任与否。这一仗，两方面都只許胜利不許失敗。”

处在这种势不两立的地位的我，却住在靠近花街柳巷的繁华的三条大街，靜靜地呆在陈設洁淨、鋪着座垫的二楼房間里，这就非常不妥当。因为，对方的选举事务所，据报纸上說，是“在縫紉机店的楼下，每月房租只要十八元”。——2月20日的《大阪每日新聞》上，刊登了十二个候选人的照片，在照片上，我是把两手放在方火鉢上坐在那里烤火，而水谷却一手拿着飯碗，一手拿着筷子，站在那里吃飯，桌子上乱七八糟地放滿了鍋子啦、筷筒啦之类。从竞

① 祇园是京都八坂神社附近的妓院区。——譯者

选运动的战术上說，我簡直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我因为本来就覺得还是落选的好，所以尽管在竞选最激烈的时候，我仍然从容不迫，悠閑得很。到离投票仅仅只有九天的2月12日，我还让《大阪每日新聞》在目貫屋楼上給我和刚来京都的我的妻一道拍了一张照。现在拿起那张照片一看，不禁慨叹那时我們夫妇俩还很年輕。在照片上，我們两个都端端正正地坐在座墊上，前面放着火鉢，背景是紙門，紙門紧連着窗子，紫檀矮桌就靠着紙門放着。“政战只剩九天”那一天的《大阪每日新聞》上，还在那张照片下面这样写着：

“这一天，候选人河上在三条大桥堀目貫屋旅館的面临加茂川的一室，一直睡到过了正午才醒来。他的身体素来不大好，每夜要到三个地方去演說，似乎有点吃不消，所以演讲一完毕，馬上就回到旅館钻进被窩了，而昨夜也是这样。臥鋪旁边，默默地坐着他的夫人和弟弟左京，都是昨天从东京赶来的。这里和陣地隔絕，所以倒是个宁靜的休憩的地方。由于这个地方不是竞选办公室，要是党员到这里来，怕会违反选举法，所以經常追随着博士的他的小舅子大塚，也不让住在旅館里。因此他的太太和左京两人，一方面要作为家屬来照料疲于政战的博士，另一方面要勇敢地負起保护他的責任。”

那时每夜回旅館，总在十二点钟左右。作为演讲会场的小学校的讲堂，地方很冷，再加京都本来冷得要命，所以在严冬的夜半，瘦弱的我，实在冷得够受。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每星期讲课三次都还觉得疲劳，而在竞选运动中，一个晚上（我在候选人中間还是演說得最少的一个）却非三次登上讲坛不可，所以到临了，我几乎觉得精疲力尽了。演說完了回到旅館，脫下那套长久不穿的紧箍箍的西装，馬上就钻到浴池里去，燙燙又累又冷的身体，緩和緩和僵

硬的筋肉。旅館里总是特地为我新烧浴湯。浴湯老是燙得很，手都放不进去。左京总是先脫掉衣服在浴湯里兑入許多凉水，等到不冷不热正合适的时候，我才脫衣服。他經常給我浇背，連两臂都給我洗。

对于畑田朝治的回忆

写到 1931 年下半年的回忆，提到畑田朝治的时候，一下子就回想到 1930 年初的竞选上去了。我事实上正是在竞选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在目貫屋旅館的楼上第一次認識畑田的。一想起我們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就不由得有些儿感伤，一連串地想起当时自己的境遇和背景等等，連那些毫无直接关系的事情，也一桩桩一件件地想了起来，簡直沒个完，就好比撒下了网，拉起来一看，里面不但有跃动的魚类，不指望还有大批的藻屑和草屑之类的东西。当时我所遇到的人，虽然形形色色都有，可是后来都像水面上的泡沫一样，不久同我断絕了交往，或者漸漸疏远起来；唯独畑田，后来十多年中間，同我交情虽則增进得很慢，却一年比一年亲密，尽管我几經浮沉，到了我被大家认为失意之至的晚年，却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因此，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同畑田的交游，将成为我今后有限余生的构成要素之一；当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对于他的回忆，自然就同我对我本人过去的波瀾重叠的回忆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使我忆起了甚至直接与他无关的种种往事。話又說到岔道上去了，现在來說說我和畑田初次会见时的情形吧。

在目貫屋旅舍楼上一角的匆遽的气氛里，第一次见面的畑田，大致对我說了这样一番話：“我是京都府某小学的教員，今后打算辞去教职，专心从事无产階級运动，希望多多帮忙。”听了他的話，

我提出了許多問題，于是他大致說了下面這樣一番話：“在學校里，有許多地方不得不違心地對兒童們撒謊，這是我的良心所不允許的。再三考慮的結果，我已經抱定決心不再干這一行，這個決心現在是無法改變的了。我也明白，要是專心搞無產階級運動的話，就一點收入也不會有。但是，關於這一層，我早有準備，所以即使沒有一點收入，生活暫時也還不至於發生問題，可以不必為此而替我擔心。就是以後，我也不準備在金錢問題上麻煩你。雖則我不是單身漢，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可是一家的生計，早已有了一定的安排，所以才向你提出這樣的請求。不消說，關於這事，我同老婆也商量過，她不僅不反對，反而比我更加積極。”

對於我提出的問題，他絲毫也沒有露出興奮的神色，平心靜氣地、低聲地、但是明確地大致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回答了我。事情是清清楚楚的。無論問他什麼話，他都一點都沒有躊躇的神色，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抱有決心的。但是，拋棄了教書的職業而從事無產階級運動，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因為也是才在不久以前下了那個決心，所以深深知道這一點。所以，儘管事情清清楚楚，我却覺得責任很重，所以一下子不敢對他說我贊成他這樣做。幸而恰巧那時細迫兼光也來看我（他那時是新勞農黨的秘書長，也在競選眾議員，是京都郡部提出的候選人。還有，據我的大女兒靜子說，她第一次見到畑田，是在目貫屋的樓上；所以當時除了細迫之外，大女婿羽村大概也在場。當時那番亂哄哄的情形，可想而知）。我聽了畑田的那番話以後，就請細迫來一同商量。記得當時細迫問了畑田幾句話之後，就說：“既然這樣的話，請踊躍參加吧，我們很歡迎哩。”這同原話也許有些出入，我雖素來健忘，但是他把“踊躍”的“踊”字讀了別的字音。到今天還余音在耳。

後來大選結束了。連頭銜是前任大藏大臣的片岡直溫都沒有

当选上，我当然也落选了，但票数仅仅次于片岡。至于水谷，他曾宣称“要是票数比河上先生少一票的话，就证明京都的无产市民对我不信任，那时我就不得不作出最后的决心”，但是结果，他的选票却要比我少二千多票，只有五千零二十四票。后来水谷究竟下了怎样的最后决心，直到今天，除了他本人而外，谁也不知道。

等到选举结束，我终于在东京西大久保寓所安居下来，开始学习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课的时候，畑田也把家搬到东京，当了新劳农党总部的书记，每天到总部办公室上班，一心致力于新的工作。当时，一般人都专门以演讲会为中心而嚷嚷不休，唯有畑田总是不声不响地呆在办公室里，有条有理地几乎把庶务、会计等工作一手担当了下来。不声不响地、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这是他的生性，他也许一次也没有登台演说过。当时参加无产阶级政党的知识分子中间，像畑田那种类型的人，我可说没有遇见第二个。

在我担任劳农党机关报《劳动农民新闻》的编辑以后，畑田也兼任新闻部员，做我的帮手。（顺便说一說，我在劳农党里不过是个普通党员，在党员名册上，我只有“新闻部员”这样一个名义。）每月三次的编辑，总是在我西大久保的寓所里搞通宵。畑田之外，还有一位竹尾弑，他是千叶县农会出身（通俄语，那时已经出版了两三种译品），也是新闻部员，一切事情就由我们三个人做。本来，如果好好安排的话，用不着搞通宵；可是由于竹尾曾在《报知新闻》或另一个报馆里搞过夜勤工作，他说不搞通宵，做不出事情，所以我们只得依着他。半夜餐总是吃荞麦面。附近有一家面馆，我们让它每夜敲过十二点钟，在封炉关门以前，把面送来。

名义上是三个人搞通宵，其实我总是吃完面就去睡了。第二天清早，我们三个人拿了原稿，坐了一辆汽车，去到青山御所附近的一月小印刷所，大家整天呆在工场的一间屋子里，等着排字。字

排好以后，就由竹尾拼版，把它拼成对开四頁，然后等印刷。差不多的日子，总是傍晚时候就印好了。于是我就一手取貨，一手交錢，把印刷費和紙張費付清(这些費用全都由我負担；除此之外，每月还要給竹尾一定數額的生活費)，这才算結束了一次報紙編輯工作。印出来的报纸，总是全部由畑田一个人发到各方面去。

新劳农党时代(这占去 1930 年的大部分时日)，我和畑田的关系，大致不过如此。

容易听信别人的話的我

我素来十分容易听信别人的話。明明知道这个脾气要不得，却一輩子也改不了。由于容易听信别人的話，所以尽管是只见过一两面的人，只要他把他的想法之类吹嘘給我听，我当场就会为之傾倒。可是人的說話往往是假的。要是人的說話可以十足相信，就像秩序正常的社会的貨幣那样，不用一一辨别它的真偽，依照票面通用的話，那将多么省事呀！可是这一层，事实上却不那么容易办到。有时候，过了一些日子，就会觉得某人曾經說过那样的話，完全是撒謊，又會說过这样的話，也是信口开河，不禁独自憮然惆悵，甚至出一身冷汗。可是同人家往来，要是心上老是存着一个怀疑别人也許在撒謊的念头，时时刻刻都要辨别对方所說的話的真偽，而加以防范，我觉得那就无法愉快地同人家說話。因而，即使是心腹之交，如果发现防范他的必要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地同他疏远起来。由于这样的关系，有許多朋友，尽管一度有过深交，半中間我就不大同他們来往了。关于这一点，我深为遺憾，但是也沒有办法。

記得在《回忆》里或別的地方曾經引用过，一提到这一层，我就

联想到苏东坡的情形。拉出伟大的古人来和自己相比拟，虽然有些不識高低，姑且在这里引用一段《甌北詩話》吧。

“东坡襟怀浩落，中无他腸，凡一言之合，一技之长，輒握手言欢，傾盖如故，而不察其人之心术，故邪正不分，而其后往往反为所累。如李公择、王定国、王晋卿、孙莘老、黄魯直、秦少游、晁补之、张文潜、赵德麟、陈履常等，固始終无間，甚至有为坡遭貶謫亦甘之如飴者；其他則一时傾心写意，其后背而陷之者甚多。如坡过寿州，李定出餞，坡有詩贈之，頗称莫逆。而元丰中，以詩語劾坡者，即李定为首。坡守密、徐二州时，与王邦直唱和甚多，謂邦直詩如醇酒，盎然能起我病，并比之清庙圭璋；然邦直后与邓溫伯、章惇等銳意紹述，貶窜正人，东坡七年瘴海，推源禍始，实自邦直发之。……此皆坡素交，而其后反噬者也。此外如叶涛、唐垌、邓潤甫等，亦皆平日交游，末路相背者，更不可数計。”

我的性格以及交友关系，和这很相像。

虽然是廢話，而且离題会愈来愈远，就把脑子里一时想起的举一个作为例子吧。

现在在某大学当教授的某經濟学博士，初进大学的时候，他的父亲有一天到大学研究室来看我，拜托我說，他想使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学者，希望我給以特別亲切的指导。那时候，我非常爱惜光阴，对于毕业生找工作之类的事，几乎从来不过問，連自己的孩子身上的事情，也从来沒有照料过一次，唯独对于有志搞科学的人，总是高高兴兴地給与帮助。凡是在这方面請我帮忙的人，我总是对他們这样說：“如果是追求真理，那末到哪儿都願意奉陪。我能力薄弱，連自己的事情都管不过来，所以不能指望我有多大效劳，但是，我一定不惜給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过本人也必須用功努力，否則就不好办。同时，也不可以稍有想依靠我爬上一定地位的

那种心思。我是不想为那类事情分心或费气力的，所以应当抱定宗旨：只要求得真正的学問就成。如果能抱定这个宗旨，那末我虽則能力有限，也将高高兴兴地接受你的請求。”——当某經济学博士的父亲来求我的时候，我照样把这番話讲了一遍。这时他說：“您說得很对。将来的地位之类，我根本不放在眼里，只是因为想使我的儿子搞点真学問，才特地来麻煩先生的。”听了對方的話，我心里想：“这可来了一个誠心搞学問的学生！”于是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对方的請求。

我馬上就让那个学生翻譯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为什么让他翻譯呢？因为我认为那是一本非精讀不可的古典著作之一，要使他养成精讀的习惯，就最好让他翻譯；再說，做翻譯工作，要在一定的拘束之下作出一定的表达，这对于学习写文章的技巧也有好处。我把那个学生的翻譯，对照着原文，一一用紅笔加以修改，至少在最初阶段，所費的时间几乎和我自己翻譯那本书相同。就这样，那个学生快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出版了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的翻譯，作为他的处女作；后来进了大学院，又把李嘉图的价值論作为他的专攻。

不久他結婚了。我也参加了婚礼；当年把自己的儿子托給我的他的父亲，在宴席上，当着十几个来宾的面致詞說：“我的儿子将終身不忘記河上先生的恩德。”这句言过其实的話，当时弄得我怪不好意思，使我不由得把头低了下来，所以到现在还記得清清楚楚。

后来他当上了某帝国大学的助教，离开了京都，接着由文部省派赴欧美留学。回国以后，写了論文《李嘉图的价值論》，因而获得了博士学位，不久升任教授。依照日本文部省所规定的学位令，学位論文必須公开出版。我在报纸上看到广告，所以知道那本书已

經出版了。可是，那时已經离开大学而从事劳农党运动的我，不仅沒有从著者那里收到一本贈书，連获得学位的通知都沒有收到。

我妻說我大概有什么不对的行为，所以人家才这样。但是，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最后竟至受到这样的对待。

我从来沒有想到为了叫人家永远感激或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指导学生的研究。可是，我一时热心照料的青年，竟然这样地躲避我，这就不能不使我感到自己的薄德，产生一脉凄凉的感觉。

‘当我将要写到 1931 年虽然同日本共产党直接挂了鈎却仍在合法場面上打发日子而作不愉快的回忆时，一支笔就迟鈍下来；仿佛拒絕前进一般，我的思路一会儿追溯到从前，一会儿岔到別处去，老是离开本題。不过，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

畑田的出版事业和《資本論入門》

畑田的性情，很少讲话，举止非常谨慎；在我的朋友中，可算少有。我这个人，很容易把人家的話信以为真，但是由于感觉迟鈍，所以人家要是不把話讲出来，我就摸不透人家的心事。所以，我同畑田那种类型的人，是不容易搞熟的。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一旦听信了人家的話，就决不后悔，而只会通过长期間一次一次的經驗，慢慢地发现对方的长处和优点，使朋友关系日益亲密起来，到后来，觉得無論什么事让他知道，都可以放心，同他犹如沒有血緣关系的亲戚一般地亲暱。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却要費去許多岁月。而人生是短促的，一生中像这样的朋友实在交不成多少（固然，本来也就不需要多少）。目前我已經是六十六岁的人了，可是像这样的朋友，却只有两三个。而且，对畑田发生如此亲密的感

情，也还是最近的事，而我们的关系，从1931年前后（我现在就在写那个年代的往事）算起，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岁月了。

前面已经提到，整个劳农党时代，为了编辑《劳动农民新闻》，我和畑田每月总得在西大久保寓所一同工作三次。但是，我只觉得他是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知识分子中少见的一个朴实勤勉而不爱说话的事务人材；至于他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出现到底有着多大的热情和理解，就一点都不知道了。因为，尽管多次在一起搞通宵，他可从来没有谈到这方面的问题。自然，我既对他没有多大的关心，也觉得他对我不那么关心。

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提出了立即解散劳农党的主张。关于这一问题，畑田到底采取怎样的态度，当初我一点也摸不透。可是，有一天，在大山郁夫家里开完会，我和他同坐一辆汽车回来，在车中，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他对大山的态度有所不满。那时我才知道他不愿意再跟着大山走。

他采取这种态度，当时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当时什么话都可以商量的，可说仅仅只有畑田一个。更合适的是，由于他的帮助，在解散问题上，得以充分利用了《劳动农民新闻》。要是那个时候他忽然背离了我，我将会感到多大的不便呀。

等到解散运动结束、《劳动农民新闻》也停刊之后，这一下大家都得考虑各自的出路问题了。和我特别接近的我的小舅子大塚和团迫等人，向来埋头搞工会运动（这批人本来对以劳农党总部为中心的政党运动不怎么关心，仅仅因为是在劳农党系统的工会里工作，而和劳农党有关系，所以即使和劳农党这个政党一刀两段，一下子也不会没有工作），那时干脆带领他们的工会会员，参加了非法的“全协”（受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全国协议会）。固然，他们像这样从合法舞台潜入非法活动，对于他们的处境是个大问题，比

如不久以后，他們就一无例外地被反动当局所逮捕，遭到了复灭的命运。但是眼前的出路，由于上面所說的关系，却没有什么困难或問題。可是我和畑田，却一向专门从事以劳农党总部为中心的政党运动，同工会运动没有一点关系，同时因为种种原因，又不能毅然投身于非法运动，所以从认定合法无产阶级政党为有害无益的观点出发，不得不退出活动圈，在合法場面的一角，找一个尽可能不妨碍左翼运动的新的工作做。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在我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对我說来，书斋里的工作，比如《資本論》的翻譯和《資本論入門》的著作，要做的很多很多，簡直把我的残生全部花在这上面还嫌不够；所以，书斋可說是我的故乡，在异乡流浪了一些时候的我，只要回到这个故乡就成了。这一点，前面也曾讲过。

可是，畑田却没有像我那样的故乡。他不是回到故乡去，而是必須开始新的旅行。在这件事上，他似乎感到很为难。而我呢，心里虽則想帮他点忙，事实上却做不到，所以也很伤脑筋。

畑田最初想出的主意，是搞出版事业。正好那个时候，有个曾經当过改造社会計主任的广田，脱离了該社，計劃独立从事出版事业，于是說定由他們两个共同来搞这工作：广田負責筹措必要的创办費，畑田負責拉稿，把我的《資本論入門》作为他們的处女出版稿，借以在出版界独树一帜。我自然很高兴地把稿子交給了他們。但是，我同时提出了种种条件。从前我在大学里教书的时候，把著作交給弘文堂书店出版，无论版稅也罢，发行册数也罢，几乎完全听凭书店办理，我这方面毫无异言，对于书店方面說，我恐怕是最好对付的著者；可是，现在情况已經完全不一样，不能那样办了。

自己說这样的話，虽然似乎有些夸口，不过事实上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作为一个著者，对于版稅之类的問題，是絕不計較的。但

是，现在既然担负了向日本共产党提供资金的义务，就相反地应当使自己的著作的版税多多益善。我在良心上觉得应当这样做。所以，要是办得到的话，《资本论入门》最好交给发行网遍布全国、财力雄厚的改造社出版；现在把它交给这样一个还没有开张的无名书店出版，已经是我的最大让步。自然，作为这种让步的代价，为了多少保证著作的收入，对于版税和出版册数就不得不附有一定的条件。

可是广田那方面，款子怎样也不能如期筹划到；尽管并非是撒谎骗人，但是反正一再拖延着事情的着手进行，不止一次地要求改变出版条件。为此我着急得很。钱固然希望快点拿到手，但是我所更加热烈希望的则是我的稿子早日印成书出版。1933年3月16日，应友人瀧川幸辰的请求，在他收藏的改造社版《资本论入门》卷末所写的一篇题辞，很可以用来说明当时我为什么那样着急。（见前，此处从略。）

像我这种天分不高的人，当社会形势没有充分成熟以前，我对于科学的理解就不会透彻；而等到社会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的时候，那被称为社会革命的圣经的《资本论》这部书的忠实解释，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合法出版物而普遍流传于社会。这样看来，我的《资本论入门》刚刚完成就不能发行，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也许是因为预感到这部著作的命运吧，总之，我当时是很着急，希望它早日印成书。

从我的小舅子大塚保留下来的一些信件中间，偶然发现了下面那样一封信。事情牵涉到现在同我私交极深的畑田，照说不该在这里抄录这样一封信；但是那封信里却最生动地表现着我当时是如何地焦急，所以不忍把它割弃。写信的日期是12月（1931年）4日，是一封挂号信，信封上贴着四角三分邮票。

“謹啓者，《入門》那件事情，条件一再变更，昨天我明明白白地回答对方說：

“‘1. 要么先付一万本书的版稅；

“‘2. 要么这事作为罢論，稿子听凭著者自由处理；

“‘上面两种办法，任凭挑哪一种，沒有第三种办法。再不要杂七杂八地一次一次来多嚙苏了，应当把問題化得簡單些，能让我回答一个“是”或“否”就可以；而且为了此事，前些日子你早就托大塚带信來說，此后再沒有什么問題了。上面两种办法之外的話，此后請不用再跑来向我提。’

“尽管我这样交代过，今早畑田还是来到我这里，用別的話来哭鼻子。据他說一定要到京都去一趟；我不理会他，回說要去你就去吧。

“你不妨对他說，今天的河上，已經沒有力量‘行善事’了。如果你认为还有考虑的余地，就請写下你的意见，交畑田带来。由于广田、畑田两人的一致哀求，情况有所变化，真使我无話可說。

“秀子事后批評我說，让他到你那里去哭鼻子，一定使你很为难，其实早該干脆加以拒絕。請原諒我又給你添了許多麻煩。四日正午。”

那时我有一篇类似随笔的《第二貧穷故事》在《改造》杂志連續刊登；在杂志上发表时，我就拿到巨額的稿費，后来作为該杂志的特別附录印成单行本的时候，又拿到一万二千元的版稅。那时，我所写的东西，大致就有这样一点經濟价值。而那本《資本論入門》，却花費了許許多多的時間和努力，無論从质上或量上來說，它的价值，都超过《第二貧穷故事》好几倍。所以，我怎么样都想从那本书上弄到几万元的版稅，給党作为运动經費。这可以說是我所負有的义务，我必須想尽办法来履行它。本来在金錢上恬淡无欲的著

者，这一次却抱有强烈的欲望，希望版稅收入多多益善。而正在这种时候，遇上了畑田的問題，我被夹在义理人情之間，不知怎样才好，最后只好把这件事情拜托京都的小舅子来收拾。上面那封信，直截了当地露骨地表示了我那时的无法可想的心情。

为給共产党提供資金而煩惱

可是由于畑田的关系，在我却发生了更大的为难事情。

广田的出版事业，因为資金筹划不到而終于流产。于是畑田又决定独立搞个小企业(究竟是食堂呢或是咖啡館呢，现在我已忘了)。为了这事，有一天他到西大久保来看我，把情况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要我給他設法弄一小笔錢，甚至还說可以把生命保险的保单或銀行定期存款的存摺之类的东西作为抵押。那时我心里很想答应他的請求，再說商借的数目又不大，对于当时的我來說，实在算不了什么。为难的只是，党的方面曾經再三叮囑过我，說是哪怕多一个錢，也千万不可用到別的地方去，希望全部捐給党的資金局。也許是我过于拘泥于这个叮囑了吧，但是那时我却怎样都不願违背它。可是，这一层又不能向对方和盘托出，所以我的回答就不能不十分含糊其辞。可怜畑田当然怎样也想不通为什么那一点儿錢都不肯借給他。当时自然費了許多唇舌，愈說到后来我愈窘，最后我終于說：“你是明白我这个人的，只要方便，一两千块錢是决不吝惜的。”这就几乎等于已經把問題說穿了；可是畑田連做梦都沒有想到我和非法活动有关系，怎样都不懂得我說那句話的意思；因此，看着他那副仍然徬促不安的神情，我也无話可說，只有一声不响地在自己心里难受。

到了 1932 年的 1 月上旬，众議院解散，举行第十八届的大选。

劳农党解散运动当时由于我极力慫恿而做了我的同道的上村进律师，这次仍然沒有放弃参加竞选的心思。有一天，畑田同着他来看我，要我借給他两千块钱，以便交納目前非交納不可的竞选保証金（这笔钱在选举结束后当然就会原数发还）。本来，那一点钱，我手里决不会沒有，而且我也相信他日后一定会还給我（上届大选时借給大山郁夫的保証金，糊里糊涂地算是我的捐款了；至于上村，我却认为他决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来），他們两人也預料我会滿口应承，所以才来的。而且像这样預料，从常識上說，也是十分合理的。

哪里知道出乎意外，我却推三諉四，怎样也不肯答应。尽管对方說干了嘴，再三恳求，我始終犹豫不决，一味含糊其詞。結果，說來說去老是那句話，最后終於使沉不住气的上村动了火。精悍矮小的他，胀紅着他那連腮鬍子的老实相的脸，站起身来，对着低垂了头的我，仿佛要把唾沫吐向我脸上那般，高声怒罵道：“想不到你是这样一个人，到今天我算是瞎了眼睛。像这样的人家，我是再也不会踏上門来的了！”边罵边走地走了出去。当时他那副样子，我到今天都沒有忘記。說书和鼓詞里所說的赤穗义士的俠客故事，大半是編造出来的，而我现在所写的，則完完全全是事实。

那时候，党对我要求的捐款一次比一次增加，不仅約好的每月定期捐款額有所增加，而且一千元、两千元的整笔整笔的临时捐款，也叫我拿出了不止一次两次。每次捐款时，我的內人总是去銀行提取存款。所以，那时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心想：假如反动当局检查一下存款賬簿，追究起我們过着那种朴素的生活，那些钱用到哪里去了的話，我将怎样回答。

可是，越到后来，跑来借錢的人却越多了。那些人中間，在合法場面上活动的左翼方面的人（例如无产階級文化联盟方面的人），倒还好办，最难应付的就是在“全协”工作的战士們。这些人

跑来，尽是說些可怜相的話：什么身上連电車錢都沒有，是从上野走到这里的啦，早飯和午飯都沒有吃啦等等。“我簡直像是一个放高利貸的哩。今天听到借錢的話，这已經是第三次啦！”有一次，我不禁回头对着我妻发出了这样的叹息。

从来沒有向我借过一文錢的畑田，来向我借錢，就正赶上这样一个尷尬的当口。以前要是数目不大，无论誰来向我借錢，我都借給他；而当时，对于交情已經非同一般的畑田，竟然沒有能帮一点儿忙，虽說不是出于本意，却一点也沒有尽到做人的道理，就是由于这样的緣故。虽說那时候的种种，直到后来我被捕受到审判，也始終沒有暴露出来（所以在我的預审笔录里，那时候的事一字都沒有提），不过，当他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时，大概会体会到为什么那时我会采取那样頑固的不讲交情的态度吧。——人与人之间，以心传心，互相完全理解，是多么不易，从这个例子上也可以看出来。

二女儿芳子参加实践运动

后来，我那显得空曠的寓所越来越寂寥了。

首先，我第二个女儿芳子离开了家庭。我們从京都搬到东京来的时候，她中学还没有毕业，为了結束中学的課程，她暂时寄居在她姊姊家里；等到中学毕了业，也到东京来了。后来，她好歹进了津田英学塾，做了一个时期的走讀生。可是由于同住在一个家庭里的我的生活不断发生激烈的变化，近在身边的她，终于也被卷进风暴里去了。

我的大女儿当我还在大学任教时就結了婚，所以倒不发生什么问题。可是芳子呢，她中学毕业的前后，正当女孩子一生中最紧

要的那个时期，却碰上了我的生活的激烈变化，所以就怪可怜地遭到了种种的困难。

本来她的爸爸爱好宁静的生活，长时期老是呆在书斋里打发着日子。不喜欢东跑西走的他，尽管在京都住了二十年，既没有看过一次高雄^①的紅葉，也没有赏过一次大原的秋景。当他的虚名越来越大的时候，各方面都请他去作演讲，他几乎一概都拒绝了。自从他当了教授以后，他一次也没有像别的教授那样，去到私立学校上过课。他特别怕接见不熟悉的客人，在交际方面是个极端的闭关主义者。现在，像这样一个爸爸，快到老年的时候，却要脱下一向穿惯的日本服，换上留学时代做的旧西装，拼着羸弱的身体，和年轻的工人们一道，去遥远的地方旅行，经常做演说，有时为了被勒令中止的演讲，还被关进警察局的拘留所去，吃尽了千辛万苦。在新劳农党解散运动结束之后，身体虽则安静了下来，但是经常和地下工作者接近，连自己那样爱好的书斋也不能充分安心呆下去，精神上总是背着十分沉重的负担。此情此景，自然不会不对长年呆在他身边、目睹一切的她的年轻的脑筋，产生强烈的刺激。

爸爸对她从来没有讲解过一次马克思主义。可是爸爸本身那种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破坏着自己的生活而夜以继日地作着真诚努力的情景，在他身边的人却觉得甚至可以算是十分壮烈。她所受到的，是不言之教，而不是什么口头的讲授。爸爸那时唯一的娱乐，就是听棒球比赛的广播节目，可是，为了节省有限几个收听费，原有的收音机，却放在那里没有安装。有一天，爸爸出去散步，老是不回家，家里的人正在担心他出了什么事，他却欢欢喜喜地回来了，原来那个时候正是广播棒球比赛情况

① 高雄，和下面的“大原”一样，是京都市近郊的地名。——译者

的时间，他老人家蹲在无綫电收音机店舖前面的馬路上，听完了那个节目才回来。媽媽說这也太可怜了，就托收音机舖子把收音机装了起来。就像这样，銀行里的存款尽管一大笔一大笔地减少下去，家庭里的生活却非常俭省。飲食方面，爸爸长年爱喝茶吃点心，可是連为数极微的茶点費，那时也显著地节省起来，一心想把一切都捐献给运动。媽媽呢，最初还試着劝阻，但是事情既然发展到这个地步，她似乎也只得死了一百条心，忠实地按着爸爸的方針做去了。可是这时媽媽头上开始有了白头发。也許是因为想着将来的事情，往往不得不沉浸在忧虑之中吧。有时候，人家看起来，她似乎什么事情都不做，坐在那里烤着火，毫无心事地吸着烟，其实她那时心里却正在前前后后盘算着一家的命运。处在这样一个家庭气氛里，对芳子說来，唯有她一个人叫家里拿出昂貴的学費，穿了日本式的裙子，无忧无虑地上着学，心里当然是老大不自在的。要是在平稳无事的家庭里，像她这样岁数的孩子，該是正做着一生中最美妙的梦哩，而现在她却独自开始思虑着她个人的出路問題。不仅家庭中是那样的气氛，随着形势的发展，京都女子中学时代的同班生里，也有好几个人脱离了家庭去参加左翼运动，而在津田英学塾里，也已經可以感觉到左翼团体的活动。随着时日的推移，她的小閨女的心灵里，越来越失去良心上的平靜，老在想着这样一个問題：有着这样一个爸爸，自己却过着这种偷安的生活，那样成么？結果，她可能暗自苦恼了老长一个时期，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不再去上学，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給劳动妇女的組織化——把女工組織到左翼工会里去。

等到这个决心已經确定不移时，她才对我表白她的心願，請求我們父母二人的許可。还記得她那时說过这样的话：“爸爸，您考虑这个問題时，請不要把我看作您的女儿，却只当是别人家的小姐

来同您商量。”

不錯，如果是別人家的小姐來同我商量這個問題的話，我會首先摸一摸她的決心的程度，要是認為她的決心是純真而且堅定的，我就決不會阻止她。——過去我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有些文章，可能有着巨大的鼓動效果，在促使年輕人投入運動的旋渦這一點上，起了不少刺激作用。但是，那是以一般讀者為對象的；至於對於個人，我却從來沒有積極地做這種鼓動工作。話雖如此，對於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的參加運動，我本來並不認為是壞事，反而覺得非常必要，所以如果不是我自己的女兒而是別人跑來同我商量的話，那末儘管對方是大戶人家的小姐，事情牽涉到她本人的一輩子，也許會成為她一生幸福的致命傷，我也決不會加以阻止。我雖說不敢積極地加以鼓動，但是如果是本人自發地要跑出去的話，我却不便從旁拉她的後腿。對於我自己的女兒，也是一樣。所以，結果我一切都依了芳子。

這個小女兒，和在我大學教書時代就結了婚的她的姊姊不一樣，她是在我生活激變的旋渦中成長起來的；我一想到她的出路問題，就不得不獨自擔憂。結果，事情却這樣地根據她本人的自發意志而決定下來了。

她不願靠父親的提携而參加運動，因為她怕走上一個自己不能勝任的工作崗位。她打算單身一人去到大阪，在這個未知的世界上找個職業，一面維持自己的生活，一面參加運動。她既不和父親商量，也不和母親商量，獨自一個人考慮着，等到決定了這樣的具体方針以後，才把她的意願對父母說明，並且請求父母的同意。我呢，倒也罷了，我的內人也不簡單，眼看着自己孩子的這一生的幸福就此落了空，却不像平常一般做母親的人那樣，硬要把女兒留在家裡。她也一句話都沒有和女兒爭辯，愉快地依從了自己女兒

的願望。

芳子离家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一向包在紙包里养大、风都不让吹到的这个小女儿，为了和最凶险的人世波涛作斗争，将要投进革命运动的旋渦里去了。站在东京火車站月台上送她上陣的我們老夫妇俩的心里，对于这个最鍾爱的孩子的无限怜惜和不安的心情，仿佛扑天的波浪那般地兜上心来。火車快要开动时，芳子握过了她母亲的手之后，从車窗里伸长了她的手，向站在她母亲背后的我說：“也同爸爸握握手吧。”我好不容易忍住了涌上眼眶的眼泪，紧紧地握了她的手。——从那时到现在，虽然經過了十几年的星霜，可是我还不能忘掉当时那一瞬間的触觉。

冷冷清清的西大久保寓所

芳子走了以后，我把守門的书僮也打发走了。那时守門的书僮已經不是水平社的小林，却換了一个金属工人出身的青年野口，他也是京都的工会派来的。这个青年体格也很好，可是对运动缺乏热情，所以我本来也就不喜欢他。再加自从劳农党的解散运动結束以后，我既不旅行，又不演說，連散步都不大出去散步，不像从前那样出門时需要有人保护，而且在我家出出进进的又几乎都是搞非法活动的人，同这些人的事情，不便让守門的书僮知道，所以我这方面已經不再有求于他，尽管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像这样多余的人呆在我家，反而什么都不方便。

翻譯共产国际关于日本問題的綱領的时候，党催得非常急，我彻夜把它搞了出来；但是向党提出这个譯稿的时候，为了隱蔽我的笔迹，有必要让我妻抄写一遍。可是，白天那个书僮老是呆在家里，不能抄写，不得已，只有等他睡下之后开始工作；可是深更半

夜，連写字弄紙的声音都清晰可聞，因为怕他醒来听到这些声音，会疑心在搞什么，所以必須不断地注意他是否睡熟了。

京都带来的一个女佣，我妻早已把內情对她說穿了。警惕性比誰都高的我的妻子，却这样地对待那个女佣，是因为深知那个女佣的为人，相信她决不是泄露秘密的人。那个女佣的名字叫阿君，是新瀉县人。她究竟是通过怎样一个关系来到我家的，已經記不得了，可是关于她，有一件事我到现在还忘不掉。前面也曾提到过，1937年我从小菅刑务所释放出来的时候，已經結过婚的阿君，背着她的孩子到我家里来看我，在二門口见到我的时候，一句話也不說，只淌眼泪。她的头胎男孩子过第一个五月节时所拍攝的那张旁边摆着披甲武士的玩偶的照片，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照相簿里。玩偶后面，还挂着我所写的一幅立軸。那幅立軸，是我被捕以后不久，她离开我家的时候，向我妻討去作为紀念品的。当自己的爱儿过第一个五月节的时候，特地把这样一幅犯人所写的立軸挂在摆设間里的这个女佣，在生产第二个孩子之后，服侍着她那害肺病的弟弟，并且送了她弟弟的終，不久她自己也染上肺病，终于抛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年紀輕輕地死去了。这件事，前面已經讲过一遍，现在重复提起，只因为一想到当时的事，就想起这位姑娘，到现在我还想再见她一面。这个阿君，我們信任她信任得像一家人一样，而左翼战士的野口，我們却怎样也不放心把秘密对他說穿。再說呢，在沒有遮拦的日本式房子里，和一个必須对他保守秘密的人同住在一起，也非常不便，日子久了，自然两下变得生疏起来。所以，后来终于把他打发走了。——記得是白乐天在六十岁前后吧，得了中风病之后，把侍姬打发走了，他的詩里还写过此事。放妓的故事，听起来多么风流呀。而我呢，打发走了的却是书僮。

古井中的波瀾

芳子走了、野口也走了以后，剩下快到暮年的我們夫妇和女佣阿君三人，住在那所显得空曠而阴暗的有九間房間的寓所里，在宁靜然而具有暴风雨前那种可怕的沉寂紧张的空气中过着日子。到我家里来的，仍旧多半是些非法的地下工作者，他們都像鬼一样一声不响地走进来。他們总是沒有吃飯（这在前面已經讲过）；于是我妻凡是见到熟識的人来，不管什么时候，馬上吩咐备飯，而且尽可能讓他們吃些滋养的食物（这也許是当时我妻的唯一乐事吧）。那些人尽管嘴上說忙得很，飯还是吃了走的。这就是靜如古井的家庭的沉悶空气里偶尔发生的一点小波瀾。

就在那个时候（我已經記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候了），我的小舅子大塚离开了京都，搬来东京，在离我寓所不远的高架电車新大久保車站附近，租了一幢平民化的小房子，和他的妻子一同住下，又同日本共产党总部挂上了鈎，在党的資金局里工作起来。在我家出出进进的人中間，劳农党一解散就获得党籍的，就是大塚。那时他害了肺病，常常发着三十八度以上的高烧，手絹里尽是血痰，还說忙得紧，不能休息，一天奔走到晚。我从旁看到他那副样子，一点办法也沒有，老是担心他会不会馬上倒下。不久他也被捕了，而且判了十年的长期徒刑。可是日本的监牢說来古怪，有些人一坐牢馬上就病，而有些人呢，反而身体变得健康了。大塚幸而属于后面一类；他的肺病在监牢里竟完全好了，现在到中国东北的长春做了所謂“良民”，正在“滿洲电影公司”起劲地工作着。

劳农党解散以后，先是做地下工作，接着坐了牢，到今天仍然活着的当年的同志，也只剩下大塚一个了。自从 1933 年 1 月他被

捕前同他分手以后，我到今天一次也沒有见过他的面。现在我年紀快到七十，战争究竟会是怎样一个結局，现在还看不透，我担心我也許会见不到他的面就死掉；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在1932年1月4日写给大塚的信，地址写的是京都市千本通五辻上牡丹鉢町角，可见大塚迁居东京是在1932年1月以后，而他的被捕是在1933年1月，由此推算，这里所說的“那个时候”，显然是指1932年那一年內），虽則沒有工作上的联系，却經常同他见面。由于这种关系，自然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党内党外的許多情况。

当时，我同莫斯科的片山潜也取得了联系；按照他的要求，我經常把到手的一切非法印刷品——党的文件、全协的文件等等——寄給他。

几次捐給党的临时捐款，数目也越积越多，說不定哪一天会在什么地方露出破綻来。

由于这样的关系，我早就模模糊糊地預料到，总有一天我会进监牢。可是，人这样东西，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特別幸运的存在（这是我讀了爱里賽·勒克呂（Elisèe Reclus）的《世界文化地史》深深体会到的），而这种傾向在我身上特別强。所以，尽管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总有一天我会被抓去，精神上早有这种准备，却仍然心不死，想把《資本論》譯完，只要有一点功夫，就埋头搞这个工作。我一心只想在沒有出事以前，至少設法把这个工作做完。

九百四十六頁的譯本《資本論》第一卷上册，1931年5月出版了；后来大約过了一年，好容易又把下册譯了出来。譯本的初稿是当时在德国明亨留学的宫川实用漂漂亮亮的字誊清了寄来的；我在校訂的时候，把它改得一塌糊涂，有些地方剪剪貼貼，有些地方完全重新改写，最后是弄得几乎不能就那样送給印刷所；等到这样校訂完毕，我妻就給重抄一遍；到印刷所把校样送来的时候，初校

也在我妻担任。因此，《資本論》第一卷的譯本，她先抄写了一遍，后来至少是把前半部又重讀了一遍。

可是，当《資本論》第一卷下册的譯稿好不容易重新抄过一遍，我已經着手翻譯第二卷的时候，我却不得不匆匆离开家庭，这件工作也就此中断了。于是我譯完《資本論》的願望永久断送了。对任何事情都丢得开我，唯独对于这件事一直到后来还总是不死心，尽管被捕坐进监牢，还是过了很久很久才最后放弃这个念头的。

离开精神上的故乡

劳农党解散后，1931年的春天，重新回到书斋里的我，终于未能老死于这个精神上的故乡；到了1932年的夏天，又馬上走出了书斋。固然，事情变成这样，并不一定违反我的意願；可是，如果使我任其所好、随心所欲的話，我也許不会甘願抛弃自己的书斋——精神上的故乡——吧。

提起这一点，我不能不联想到森鷗外的小說《大塩平八郎》里的一节。那篇东西，乍看起来，在史实方面似乎和許久以前出版的幸田成友的《大塩平八郎》沒有多大出入。可是，鷗外先生为了写这个短篇小說（在1928年改造社出版的《新选森鷗外集》里，这篇东西不过三十四頁），却参考了許許多多史料。只要看一下原文的附录，也就清楚了，例如其中有一节这样說：

“我的《大塩平八郎》，主要是写一天中間的事情。不过，活动在那一天中間的平八郎以及他周围的人物，都各自有他們的过去，有他們的記憶。如果不只是罗列他們的外部生活，而要比較深入地描写他們的內心活动的話，就不得不写出給予他們較大影响的、他們的过去的記憶。在描写过去的記憶的影响时，为了一目了然

起见，我制作了平八郎的年譜。原稿上逐漸填滿了种种事項，不仅沒有一点空白，而且字上加字，別人看起来会把它当做不知什么廢紙。这里我把它全都删掉了。”

为了写平八郎一生中的一天活动，鷗外先生竟費了那样大的气力搜集材料，这是因为鷗外先生为了“根据史实加以推测，写2月19日一天里的事情”，虽说“大胆加以推测”，却要避免“粗暴的处理和欺騙的捏造”。所謂推测，主要是指对平八郎的内心活动的推测，从字数来说，这只不过短短几行而已，可是正由于有这样几行东西，鷗外先生的《大塩平八郎》才不同于幸田成友的《大塩平八郎》，这就是鷗外先生煞費苦心的地方。不过，尽管是那样費尽心机所作的推测，說句放肆話，有些地方我却不敢苟同。内中唯有下面所抄录的这样一节，讀后觉得写得入情入理，为之首肯。那是穿插在題作“出发”的一章里的，它的原文是：

“平八郎就那样一直端坐着。在他熾烈的内心里，过去的回忆像做梦一般地忽隐忽现：这个阴谋是怎样地萌芽，怎样地生长，又是經过了怎样的曲折而达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平八郎心里轉念着：我靠着自己的才干和际会，做了一个小官吏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最后在天保元年^①退休；那一年，天下是太平的。一个国家，如果它的老百姓的生活的好坏全看米粮收获的多少，那末丰年总是太平的。……天保3年以后，天时不順，终于到了去年，从五月起，下雨一直下个不住，天气冷得像冬天一样，秋天又遭到颶风洪水，从东北起，全国都鬧灾荒。我退隱以后，专心从事著述，先后完成了《古本大学刮目》、《洗心洞札記》、《洗心洞札記附录抄》、《儒門空虚聚語》、《考經汇注》等的刻本，把《札記》藏进富士山的石室，又听了足代权大夫弘訓的劝告，把它送给宮崎、林崎那两个图书馆；这

^① 即公元1830年。——譯者

样。作为一个学者的愿望也完成了。可是，连年的饥荒，老百姓的困苦，我也不能闭着眼睛装看不见。……到最后，我就想到用诛伐和威胁来达到目的。因为我想，不灭无道之商，就不能发鹿台之财。我打定主意，对格之助说明了，他就托称练习打靶，着手准备，这是去年秋天的事情。……今天看起来，我心里既没有什么可害怕，也没有什么可兴奋。……我三十多岁当官吏的时候，被高井大人所信任，逮捕耶稣教徒，弹劾奸吏，搜捉破戒僧，心想总有一天丰田贡老婆婆会被磔刑处死，弓箭捕快新右卫门会切腹自杀，大批和尚会成为阶下囚，不久这都一一实现。而且在这些想法实现之前，我从来也没有产生过一次怀疑。这一次却和当时的情况不同。当时是，先是我打算那样做，随后客观情况跟着我的主观意图而实现。而这一次，当我进行着准备的时候，我自命为操有左券，可只是自己安慰自己罢了，实际上却有听任它永久只成其为准备的那种倾向。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可以说是事情本身的自然发展。并非是我推动阴谋，倒可以说是阴谋在拉着我走。这究竟将得出怎样一个结局呢？平八郎像这样不断地思索着。”

我怀疑：一个人在发动一个阴谋而走出家门的一瞬间，是否还有沉浸在这种回顾性的感想中的余裕。可是，如果让平八郎在事情过了若干年之后，再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他却很可能沉浸在这种感想之中。我特别欣赏那描写内心活动的经过的那几句话：“心里既没有什么可害怕，也没有什么可兴奋”，不是“先是我打算那样做，随后客观情况跟着我的主观意图而实现”，而是“事情的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可以说是事情本身的自然发展。并非是我推动阴谋，倒可以说是阴谋在拉着我走”。

平八郎的情形是不是这样，我不能断言，至少我为了参加非法运动而潜入地下时的那种心情和经过，今天回想起来，就和上面所

描写的一模一样。劳农党解散以后，我本来打算呆在书斋里不問外事。哪里知道周围的形势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很大的变化，最后终于使我不得不离开家庭。这一点，我固然早有精神准备，心里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害怕”，可是如果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的话，我也许决不会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吧。所以我并不是“有什么可兴奋”而离开家庭的。

老友吉川泰岳

事情发生在1932年8月12日。那一天，我还是从早晨就呆在书斋里翻译《资本论》。吃完晚饭，瞌睡得很，天还没有黑，就在楼上书斋隔壁的那间屋子里，铺好被褥躺下了。这是我的老脾气之一，本来打算躺一两个钟头，再起来工作，可是就此一睡睡到第二天才起来的时候也不少。但是那天却因为大塚来看我，把睡魔完全赶走了。

他那时带着党的任务到关西地区去旅行了一些日子，几小时以前才在东京车站下火车。他获悉这几天里党的同情者一个个地开始被捕，形势很不妙，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回家，就先跑来我处，催我马上躲到别的地方去。

“抓就抓吧。”

起初我想硬呆在家里，听其自然，因为实在懒得跑到别的地方去。可是，能逃避的话，自然还是应该逃避。虽则懒得动弹，但是由于事情不比寻常，所以等到把问题大致谈清楚之后，我就打定主意，到楼下起坐间里去了。

我妻也一道参加商量究竟躲到哪里去。

本来，只要设法躲过这几天，据说党就会给我找个适当的藏身之

处，可是哪怕是几天工夫，我們也想不起一个适当的躲避場所。我的照片經常登在報紙上，再加劳农党时代又曾多次在东京市内市外演說，所以要想造个假姓名藏身在普通旅館里，是有困难的。胞弟左京的寓所，过去也曾一再利用，不凑巧的是，那时他恰好带着他的妻子回到故乡去度暑假了，所以那里也不行。最后想到三十年以前大学生时代的同班同学吉川泰岳(宗充)家，我决心好歹去恳求一下。

关于吉川，我曾經在《大乘禅》杂志(1931年7月号)上写过一篇文章，现在先在这里抄录几段。

“我和吉川开始来往，是1899、1900年前后的事。当时我們都是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现在称做法学部，那个时候則称做法科大学)的学生。法科大学里分法律和政治两科，我們两人都属于政治科。政治科和法律科的課程大致相同，两科合并起来，約有几百个学生。可是降級的人很多，我們又是采用新学制后最初一班的学生，所以只有往下一班降級的，沒有降到我們班上来的，因此同班同学每年减少很多，到毕业的时候，政治科的学生，只剩三十几个了。

“当时的学生，大都按自己所毕业的高等学校来划分天然的交际范围。吉川和我既非同乡，又非同一高等学校毕业，在許許多多的同班生中，我們两人究竟由于什么原因而处得投机起来，我现在就記不得了。总之，不知在什么时候，我們成了朋友，等到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两个人已經和同穿一条褲子的一样了。

“那时大学生所穿戴的四角帽和黄銅紐扣的制服，还很吃香；一进大学，誰都馬上新做起制服制帽穿戴上。唯有吉川，却始終沒有做制服制帽。他經常戴一頂便帽，穿着日本服上学。但是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天皇要来参加，非穿制服、戴制帽不可。那天吉

川不知向誰借了一套穿着來了。他在大學讀了幾年書，僅僅在舉行畢業典禮那天，才穿過一次制服，戴過一次制帽。儀式完畢後有茶點，大家搶着用手絹包了帶回家，等到我們兩人好容易走到桌邊，已經什麼都被搶一空，甚至連飲料也沒有剩下一滴。因此，我們兩人回到我的寄宿舍，自己掏腰包買了茶點吃了。這是1902年的事，到現在差不多有三十年了。在這三十年中，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變化（拿我自己來講，作為一個科學研究工作，我經歷了比較變化多端的生活，特別是成了一個被許多人厭惡的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可是我們兩人見面的時候，却始終保持着三十年前一道在寄宿舍里吃茶點那時的心情，絲毫都沒有改變。本來，像我這樣在種種意義上失去了很多朋友的人，世上恐怕不多，但是，我却一點也不放在心上，有時甚至还以此自豪；但是在另一方面，能同吉川那樣的人相處三十年而維持着始終如一的深厚交情，却是我心里感到欣慰的。我同他分手以後，在京都住了將近二十年，到他晚年，想不到我又住到東京來，特別是托人家給我找的寓所，趕巧就在他的住宅的附近，在他去世的時候，幸而能送他的終，真是天大的緣分。只不過由於我經常忙於我所嚮往的工作，近來連同他談天的機會都沒有，這是我深深引為遺憾的。如果早知道再沒有敘談的機會，那末我無論怎樣也將抽出點時間來，同他暢叙一夜舊事吧，真是悔之莫及了。

“我的書齋里盡是馬克思啦、列寧啦一類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可是擺設間里却挂着一幅洪川禪師的立軸。洪川禪師曾經在我的故鄉山口縣岩國市呆過，可是直到我進了大學，我還是連他的《禪海一瀾》都不知道。告訴我這本書——往年我愛不釋手的一本書——的，就是吉川。吉川的遺物、上面刻有洪岳老師（釋宗演禪師）所寫的‘無’字的鐵香爐和洪川禪師的立軸，這兩樣東西供在我

书斋里，一点也不破坏我的书斋的調和。这是由于受了吉川的影响的緣故。一个信奉馬克思主义的人，正当进行着反宗教斗争的今天，說出这种話来，也許会受到自己陣营的非难吧。……”

吉川名宗充，远州中泉地方的人，泰岳是他的老师洪岳禅师給他取的別号。他的父母也都很別致，晚年都絕俗参禅，最小的儿子泰岳受到父母的感化，学生时代早就专心学禅，学业方面，虽則一次都沒有不及格；但是成績并不好（他本人也許从来沒有打算爭取优良成績），毕业的时候，三十多个政治科学生中，他占末位。我們班里經常占第一名的是西野元，他老早就做了大藏次官（財政部次长），退任以后进了銀行界，现在是日本劝业銀行总裁。其余的同班同学中，立志做外交官的松平和永井，后来都当过大使；永井最后做到外务次官才退职，松平现在是宮内大臣。还有桂太郎的一个女婿，姓名現在已經怎样都記不起来了。起初比誰都飞黃騰达，后来大概由于驕傲吧，中途遭到挫折，晚年終於潦倒。那些进內务省工作的人，早就一个个都当了县长或局长，不过这方面的人退隱得較早，现在站在第一綫上的人一个也沒有了。总之，同班毕业的三十多个人，由于那时候学士还少，毕业以后在各个崗位上都相当当地干了一番事业，多少出过一个时期名。而吉川呢，毕业以后从来沒有发达过，自始至終，說好呢則是一个怪癖的遁世者，說坏呢則是个被遺弃的落伍者，远远躲开世上的荣华富貴（他是連制服制帽都不做的大学生，所以那条路也許是他自己选定的），一生都在东京銀行公会的地下室里度过了。他本来就不是左翼的同情者，銀行公会退职后，就在他的禅友、富豪古河家里帮着整理整理图书，过着隱遁生活：和这样一个性情脾气非常不同的朋友，我却始終不渝地交往了三十多年，直到一年以前他因病逝世的时候，除了一位禅僧而外，只有我一个外人夹杂在他們的亲戚中間送他的終。现

在，他的太太带了四个已经长大的孩子守着家业。像这样一个地方，出乎对方意外地硬去打扰，本来很不好意思，可是又不能老是躊躇不决，迫不得已，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我只得打定主意去借住两三天了。

当下我喝了一杯红茶，拿了一个盛放着洗脸手巾和手纸的小提包，就离开了家。……从此以后，直到坐完几年监牢，没有能够重新回家。

最初的藏身处，获得党籍时的感慨

走出我的寓所，沿高架电车新大久保站那个方向朝西走，有家面店，从面店往南转弯，再走两三百步光景，右手半边就是吉川的住宅。那是他自己的房子，老早就盖的，我曾去过很多次。大门是四角柱子上安装着黑漆门，右手半边的门上还有个小门；我到那里的时候，门已经关了。看到吉川亲笔写的活像宗演老师笔法的“青龙窟”三字的牌子，稍稍思考了一下，最后我终于不愿敲门进去，随即回家去了。

“今天晚上我还是住在家里吧。”

提着小提包正要走进家里的我，让出来迎接我的妻子和小舅子从旁打了一番气，结果连皮鞋都没有脱，只是在二门口说了几句话，就又出去了。当时说好的是：今夜去大舅子家住一晚，明朝由我妻到吉川家去悬商。我出了门，叫了一辆街车，在深更人静的夏夜，向西郊高圆寺大舅子家驶去。想起来，当时我坐在汽车里，虽然不是垂头丧气，却也似乎并非兴高采烈，意气昂扬。

思想立场根本不同、在文部省当官的大舅子，自然不能对他说明实际情况。因此我就推说为了躲避法西斯暴力团的袭击，来暂

住一夜。按照那时社会情况，确实有这种可能，不会使人把这种借口当成說謊。因而我后来一直拿它作为借口。

从合法舞台躲到非法的地下活动去，比起竞选众議院議員来，更是我所梦想不到，对于我的一生來說，是个重大的轉变。也許是由于周围的各种情况漸漸地成熟到了那个程度的緣故吧，我虽則处身于这种激剧的变化中間，却并不心慌。在更深人靜的夏夜的凉风中，同久不见面的大舅子閑扯家常，扯得很晚。为了使他安心，記得我曾对他說过这样的話：“好在每月有一百五十元的恩俸可領，即使我死了，秀子也可以領到一半。拿了那笔錢，去到女儿家里，总能度过她的一生吧。”其实那点儿恩俸，当时我完全不把它放在眼里；哪里知道，到了今天，那笔区区的恩俸，却成了我們老夫妇后半世的唯一的生活資源。

我酣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恰巧有棒球比賽的广播节目，我就請他們插上收音机热心地收听着。

不久我妻来通知說，吉川家幸而应允了。

我馬上离开了大舅子家，乘上电車，又換了几次車，穿过到处都在嘩啦嘩啦轉播着在大阪甲子园举行的全国中等学校棒球比賽的无綫电广播节目的街头，在盛夏的太阳地里流着汗，重新回到市內。吉川家把盖在正屋旁边有走廊相通的假洋房的楼上一間鋪八张席垫的屋子騰出来給我住。楼下原是已故的吉川泰岳的书斋，又是他臨終时的寢室。那間屋子里，从书架以至一切其他摆设，都照他生前的原样未动。楼上原是男孩子們用功的地方，只給我留下一张矮桌子。

記得当时我擦了擦汗，馬上就到楼下一間凉爽的屋子里吃了午飯。用精致的碗蓋盛放的湯啦、煮南瓜啦、酱菜啦，都放在高高的小食桌上端来。吉川太太很客气地說：“我們平常吃得很苦，沒

有特地給您弄什么菜，把大鍋菜拿来請您了。”当时給我的印象是，我和他們两家的家风完全不同，我家里是用粗劣的碗盞盛滿了营养丰富的食品，而吉川家里是用精致的碗盞漂亮地盛放着淡泊而简单的菜蔬(其实，当时能留我住下已經非常值得感謝了，吃的东西怎么都行)。

吃完饭回到楼上，定了定性，原先同我联系的共产党员杉之原，由大塚領来看我了。那时他对我談了下面这几桩事情，談完就走了：日本共产党已由中央委员会議决，推荐你为党员；担任的任务是对《赤旗》报的編輯技术提出意见，以及根据党的需要写些小册子之类；以后由政治經驗丰富的《赤旗》报方面的重要負責人負責同你联系，从今以后我同你的联系就算終止了；居住的地方，不久党会决定，这几天希望你自已想办法克服一下。

“到底咱也成了党员了！”

我对誰都不能訴說心中的那份喜悅，独自一个人感慨无量，終于口占了一首短歌。

找到了归宿，回头一看，已經越过了多少山河。

大家都說这首短歌是我被捕当时的作品，实則是入党之歌。我被捕以后，在被迁往丰多摩刑务所以前，曾經在中野警察署里拘留一个时候。那里的許多警察都买了飞金、飞銀的彩笺，让我題字。那时我就把这首短歌写給了好几个人。还把三十多年以前参加无我苑时的那个俳句“拼得一死而还活着，这条命是白白拾来的了”，写了好几张。那时的报纸上，都把这些东西說成是当时的作品。

我藏身的楼上那間屋子，东西两面都是窗。西边的窗子同邻家靠得太近，不得不躲避外人耳目的我，只好有窗也不开。下半年十分悶热。要是在自己家里的話，也許会让备下糕点或者冷飲之

类作为庆祝,对妻談談心里的話吧。而现在呢,我却独自一个人呆在悶热的屋子里,隔着帘子望着变幻的云峰,許久許久只默默地沉浸在无穷无尽的感慨的喜悦中。

也許有人会奇怪:当时加入日本共产党的一些人中間,有不少人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同那些人搞在一起,会那样地感到高兴呢。但是,当中国的紅軍放弃了首都瑞金,路远迢迢地把根据地迁往西北偏僻的延安,实行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和年輕人一道徒步跋涉了中国許多最大的江河和最高的山岳的謝肉蔡,像他这样一位豪杰,在被中国共产党批准入党的时候(那时他已經五十岁了),甚至都說:“像我这样一个老不中用的人,居然还能对建設新世界貢獻出一分力量;想到这层,我高兴得哭了。”我当然比不上他那样勇敢,但是,到了比他还大的岁数才获得了入党的机会,却也像老謝那样感动得哭了。馬克思主义学者的我,现在好容易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我的能够到达这一地步(那时我甚至还有着正四位、勳三等的勳位),在我來說,确实不是容易的事。当时不知是誰,在詩歌杂志上諷刺我那个短歌——“找到了归宿,回头一看,已經越过了多少山河”說,这个短歌一点儿都沒有脫掉古今調^①的老一套,談不上什么无产階級文学。其实,我是在这首短歌里概括了自己五十四年的生命,决不是用什么古今調不古今調的标准可以評价的吟风弄月之輩的作品。

取消派的暗中活动和櫛田民藏

吉川家,我本来只打算住两三天就走的,哪里知道党給我找

^① 日本有一部旧的短歌集,叫做《古今集》;所謂古今調就是指《古今集》的一貫的风格(笔調)。——譯者

的藏身处所迟迟不决，因此就在他家一天天地耽擱下去。我本来就不是脸皮厚的人，即使住在人家两三天，都觉得不好意思，怕打扰了人家，可是在没有决定去处以前，却又无从走起。于是，正当大热天气，我只好像犯了什么重罪的犯人那样继续整天躲在楼上，窗子也不敢开，楼下天井里也不敢去。在大学和高等学校读书的吉川家的大儿子和二儿子，见到这种情景，马上觉察到：躲避法西斯暴徒的一套话，只是一种推托而已。胆小的大儿子，一想到可能带给他家莫大灾难，就表现出很不安。吉川太太呢，把一个对来来往往的亲戚无法交代的人老藏在家里，事实上也有困难，因此这种不自然的状态拖长下去，使她感到很为难。所以，过了十多天，终于借口不久有亲戚来住，暗暗要我离开她家。我也认为这是很应该的，因此决定不管怎样马上离开吉川家。

可是去什么地方呢。在广大的三千世界里，竟没有安顿我这五尺之躯的地方；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决定打搅榑田民藏了。在叫我妻先去征求榑田的意见、得到了本人的同意之后，八月下旬的某一天，由来接我的妻和小舅子护送着，仿佛就像偷了人家东西逃走那般地，青天白日，躲躲闪闪地出了青龙窟，钻进一辆等候在附近的汽车，开到了牛込区五軒町の榑田家。

那时候，取消派的一批人仍然肆无忌惮地到处暗中活动着。我老早就有这样一种预感：起初他们想利用劳农党内的一部分心怀不满的人，但是没有成功，现在连劳农党本身都已经解散了，所以他们一定会有下一步棋子，那也许就是搞出一个假的日本共产党来。我因为有着这样的想法，所以连素所信任的岩田义道，我都疑心他有什么不良之心（这一点，《回忆》里已经详细讲过）。而这一次，事情果真完全不出所料。

劳农党时代曾经到我家里来过好几次的浅野晃、水野成夫那

批人，这时果然出版了伪《赤旗》报，伪造出一个《日本共产党綱領》，口头上竭力玩弄革命的詞句，却主张完全脱离共产国际而独立（司法当局的主意，乃是尽管在日本国内搞出一个号称日本共产党的东西，只要切断了它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就无所谓了）。因此，在他们的出版物上，只写着“日本共产党”，而没有“国际共产党日本支部”等字样。

由于他们的活动，当时共产党的阵营受到相当大的搅乱，他们那批人甚至掌握了东京和神奈川一带地方的罢工领导权。如果有人不相信天下竟有这种事情，只要请他看一看那时出版的真《赤旗》报和全协方面的印刷品，就可以了。在这些印刷品中，经常大张旗鼓地刊登着防御和攻击取消派的暗中活动的文字。在那个时候，统治阶级为了捣乱共产党的阵营，不惜想出主意来搞那种下流的伪宣传品，这是给我们的很好的教训。（将来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也一定会再出现这类事情。资产阶级根据形势的需要，会毫不躊躇地抬出打倒天皇制的口号来的。）

当群众蜂涌参加共产党的时候，万不得已，只要能够设法把他们阻止在党外，就是好的，这就是统治阶级的要求。那个时期，正是那些圈子外面的人分不清真假的下流的伪共产主义者、伪马克思主义学者，适应统治阶级的要求，在反动当局直接間接的保护之下，横行不法的时期。（这也说明革命的客观形势已经成熟了。——时隔十年的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正起劲，特别是，现在已经到了战败的最后时期了。目前客观形势是怎样，可以用不着说了吧。我们亲眼看到统治阶级正在完全丧失它的政治能力。不折不扣地到处都发生了生产的停滞。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在整个生产机构中，生产关系都牢牢地束缚着、阻止着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要增加生产，增植物资，就非粉碎现存的生产关系不可。客观

形势现在迫切要求这样做。)

取消派的一批人正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他们虽然一度以共产党员的身分而被捕,但是在审判确定前、保释期中,竭尽忠诚,证明他们后悔从前的错误,以期受到减刑或免刑的恩典,从这样一种无耻的打算出发),充当着最可恨的恶劣的伪共产主义者、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角色。(钻进日本共产党中央的、从莫斯科归国、自己说是姓松村的那个奸细,大概回国后也曾在什么地方一度被捕。反动当局一旦抓住了这样的人,就设法施以利诱,利用他做奸细。那些不愿坐牢、终于“返忠”——叛党——的可耻的粪蛆们,就是这样产生的。)

而我由于走投无路而想去托庇的那家人家的主人榊田,当时正是取消派的理论方面的最高顾问,他正费尽心机为取消派而把他多年来所学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点知识全部端出来。

我这样地描写这位大家都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权威而惜其早死的榊田,似乎对不起死者,但事实就是如此,没有办法。为了使大家明白这个事实,有必要说一说那年6月共产国际所发表的《关于日本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的纲领》。

碰巧我同这个纲领有特别的关系。这是因为,在日本共产党中央还没有接到这个纲领以前,我就把全文译了出来交给了党。这个纲领的德文翻译在德国版的《国外通讯》上一发表,那时呆在柏林的国崎(前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副教授)马上就给我寄了来。我立刻就把这件事通知党总部,结果党总部要我赶快翻译了连同原文一道送去。因为这样的关系,这个文件,翻译得非常仓卒,译笔未免过于生硬。(译文送出以后,国崎又寄来了德译本的详细的勘误表,可是因为最初的原文已经不在我手头,所以只是把那个勘误表原封送交党总部;后来究竟是怎样处理的,就不知道了。这件

事，后来我曾问过中央委员长风间丈吉；据他说，这类事情他完全不清楚。由于中间要经过资金局的手，也许被掌握着资金局实权的奸细松村捺下来了。）

总之，这样一份有历史意义的文件，马上给党译了出来，而且立即印行，广泛地分发给同志们，这是我所感到非常满意的。纲领原文发表的日期是1932年6月25日，而日译本在7月10日《赤旗》报的特别号上就登出了。登出的时候，写的是本田弘藏译。“本田弘藏”是我地下的党名。

可是，那时櫛田所发表的著名的论文《论我国地租的特质》，目的却在否认对占日本人民半数以上的农民进行极度残酷剥削的地租的半封建性质，这就无异于否认日本国内封建遗制的根深柢固的存在，而为那种认为日本无产阶级以扫荡封建遗制为目标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非但没有必要而且毫无意义的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他这篇论文，表面上似乎只是一个搞研究工作的人在他的研究室里搞出来的单的理论作品，而实际上，其中却隐藏着想要推翻共产国际关于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规定的反革命的、反动的、大胆到极点的政治野心。

（取消派浅野晃、藤井米藏这批人，在我还是劳农党员的时代，已经和櫛田有往来，在櫛田家里我曾经偶然同他们碰在一起。当时我举出种种具体的事实，直接忠告櫛田不要和那批坏蛋接近，可是丝毫没有用处，那批人后来更加经常地到櫛田家去。櫛田死后，我留下一条老命释放出狱，曾经有两三次受到死者家属的邀请，参加为死者举行的佛事，我每次去，都不得不和见了就讨厌的浅野、藤井等同席。这类私人生活方面的事情，即使不去苛求责备，就拿櫛田公开发表的论文来说，也不难从文献上证明他同那批取消派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参考《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这部书。）

談到革命，理論上最重要的工作是树立正确的战略。如果战略錯誤，那末尽管其他各种条件如何完备，革命起义也必然归于失敗。如果記住这一点，我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 1932 年时的統治階級居然放心大胆地嗾使那批日本共产党的叛徒取消派分子假造出一个日本共产党，出版假《赤旗》报，作成假的《日本共产党綱領》，玩弄“打倒資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之类的空洞詞句了。不管怎样大叫“打倒資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只要把关键問題含糊过去，那末一切都必然落空，結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順便說一下，反动当局的制造假共产党，本是出于万不得已的苦肉計，如果沒有那样的必要，哪怕假的也罢，凡有号称共产党啦、馬克思主义者啦那类的东西，莫如全部消灭干淨。所以，当时同那些取消派、从而同反动当局不发生直接关系、沒有情投意合地勾搭上的大多数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义学者和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义者——对不起得很，不管他們的主观意图怎样，山川均、向坂逸郎、猪俣津南雄、大森义太郎等人，都得归入这一类——由于不懂得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从速改变态度，也不像取消派分子那样卑鄙无耻，所以几年以后，侵华战争发生后不久——那时共产党方面的非法文件已完全不再出版，在社会上公开出头露面的真正的馬克思主义学者已經一个都不剩地被收拾干淨了——就被一网打尽，連稍微有些嫌疑的人也不能幸免。真是不折不扣的狡兔死而走狗烹的时势。可是，和反动当局有直接联系的取消派分子，却早就卸下了共产主义的招牌，搖身一变，成了露骨的軍部思想的喇叭兵，所以尽管过去出版过假《赤旗》报，頒发过假《日本共产党綱領》，干过这类无法无天的勾当，却像曾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常务委員的奸細松村一样，全都安然无事。就連今天这种超非常时期，我們还可以在报纸的新书广告里看到浅野晃等人的名字。如果有人知道从

前我所編的《馬克思主義叢書》中那本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的譯者淺野晃就是今天這位淺野晃，也許會大為驚訝吧。——有人說，如果櫛田今天還活着的話，也許會和大內兵衛、向坂逸郎等一樣被捕；我却以為不然。我認為，要是櫛田還活着的話，他將是馬克思主義學者中不出毛病的唯一的一個人。）

當時櫛田雖然“不愧為新聞界所推尊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元老，他同由於柴米沒有着落、只好每月在大、小雜誌上發表些內容空洞的雜文的勞農派的主將們（山川均、向坂逸郎等人）比較起來，確實具有理論家的穩健和學者的風度”（引用《日本資本主義論爭》第32頁上的話），可是，我對於他的靠前面所提到的那本《地租論》而出了名氣這件事的政治意義，却作了如上的觀察，所以那時連和他見面都不大願意。

1932年8月下旬，我托庇於有着這樣一種關係的櫛田家，實在是出於山窮水盡，走投無路。

從躲到櫛田家到離開他家

我雖然像這樣陷於山窮水盡以至不得不到櫛田那里登門求救，自己却仍然不覺得可耻可憐。我毋寧說是抱着驕傲的心情而和這位老朋友見面的。

隨着革命危機迫在目前，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生活面臨危險，乃是必然的命運。如果想免除這個危險，除了拋棄筆硯，退隱山林而外，沒有旁的法子。如果想繼續站在合法舞台上，發表議論的話，那末除了利用自己所懂得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發表一些直接間接妨礙革命進展的文章而外，就不可能置身於安全地帶；不管本人的主觀意圖怎樣，社會的客觀形勢總是逼得他非這樣做不可。

这一类人乃是出卖馬克思主义的家伙，与其說是腐儒，不如說是毒儒。我宁可坐牢，也不願做阻碍人类进步、只求本身太平无事、苟安一时的毒儒。不管別人对我是怎样的看法，我反正觉得作为一个馬克思主义学者，无愧于天，以致穷餓而死，都比当一个毒儒光荣得多。当我想到我和櫛田之間产生的隔閡时，我心上一点都不感到有什么內疚。我这个人，只有在抱具这种意識的时候，才会天不怕地不怕。

我同小舅子和妻进了櫛田家大門、走到二門口的時候，他家似乎有两三个客人。櫛田沒有出来，他太太出来了，把我們領到并非正房的、正对着大門旁边那条馬路的单幢楼房里。那所宅子是櫛田太太娘家的财产，目的为了出租的这幢单独的二层楼房，外面还貼着召租帖子。我們三个人，呆在似乎长久沒有人住的楼上的一間屋子里，就像失去了窩的小鳥那样，在屋角里等待了好久。我想也許是取消派那批人来了吧。

在悶热的楼上等候了一点多钟，我們好容易才被領到正屋去。正屋建筑很讲究。楼上有一間是櫛田的书斋，书斋隔壁的一間，是放滿着书架的藏书室；除了这两間之外，还有一間宽敞的会客室和一間来客休息室。櫛田特地把那間会客室騰了給我。楼下屋子也很多，当我住在他家的時候，他就在楼下接見客人，这样就完全把我隱藏起来了。

最初我躲藏在他家里，他倒也並沒有认为其中有什么麻煩事。也許我借口有被暴徒袭击的危險，他信以为真了吧，似乎一点都沒有想到我是潜伏地下的。所以，第一天晚上，他硬要同我去欣賞附近江戶川公园的夜景。那时正当公园里乘涼的游客众多，我說我不去，他却不依，滿不在乎地領我去了，当时我的心里就像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不得太平。

可是，不久櫛田也看出事情不比寻常了。自从我住到他家之后，我的妻三番两次地带着从未有过的紧张神色把我的衣服包在包袱里给送来。那时天气还正当盛夏，可是衣服中间却有新做起来的丝棉袍子、毛线袜子和呢鞋罩等等；因此他也就看出至少在最近期间内我是决不回家的了。从此以后，小心谨慎的櫛田，尽管半夜三更出去散步，也决不再和我一同去了。散步回来偶然在街头巷尾碰见的时候，他也连招呼都不打，看见我只当是看见了不认识的人。

不用说，不久我自己就把实情对他说穿了。他自然会觉得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但是，这里我要表达一下我对死去的旧友的深深感谢的意思：尽管我老是住在他家不走，他却从未有过什么表示，使我觉得不好再在他家住下去。起初，我对他说：“我们两个人这样在一块儿谈话，今生今世恐怕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他完全把我的话当做开玩笑，不以为意，可是后来可能想起了这句话，觉得也许真的从此以后不会再见到这个老头儿了。毕竟他也无意于轻视这个胡搞一气的老头儿，而且我既是他过去的老师，又是他三十年来的至交，所以似乎决定趁此机会尽心款待我一番，作个终身纪念，因此日日夜夜抛开了他自己的工作，陪我谈天，每顿饭都盛设相待。

他家里我本来不打算呆久，可是结果，五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一会儿快半个月了，而党方面给我的藏身处所，仍然毫无眉目。尽管如此，老是麻烦櫛田也不妥，所以我不得不另想别法，再找一个临时的藏身处所。当时真是无路可走。住到櫛田家来，已经是伤透脑筋。此外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托身之处了。大塚也为此事着急，再三动脑筋，甚至跑到大阪去设法，终于全都沒有结果。

九月也已过了五天了。大塚最后决定去找津田青枫，托托他

这件事。

那个时候，上野公园的美术馆里，二科美术展览会轰轰烈烈地开幕了。在这个展览会上，津田展出了这个展览会前所未有的大作品“疾风怒涛”。为了看一看社会对这个作品有什么反响，开幕后头几天，津田每天怀着几分骄傲守在会场里。

招待期刚过两三天，有人向收发室的女职员递了一张名片，求见津田。津田望了望名片，想不起那个名字。可是，他素来就爱忘掉人家的姓名，特别像这种人来人往的展览会会场里，平素不大认识的人也往往突然来同他搭话，所以他也就准备和来客会会面。

跟在带路女职员后面的人，乃是戴着一副粗框架眼镜、穿着黑西装的高个子壮年绅士。名片上印的“今井文雄”原来是个化名；服装虽则和往常不一样，人却是见过几次面的河上肇的小舅子大塚有章。

看到和津田坐在一张沙发椅子上的美术家模样的长发青年站起身走了以后，大塚方才开口。谈话的地点是出出进进人很多的休息室的一角。

“不瞒您说，我是为了姊夫的事情来拜访您的，……近来外面的形势愈来愈不妙……”

“是吗。”

津田猜想到问题不简单，一点也不表示什么，准备先听一听对方怎么说。

相去两三步路的沙发椅子上，坐着三、四个看来同样是画家的吊儿郎当的青年，把香烟灰向地板上乱弹一气，一心注意着门外走过的一阵阵的看画的观众。大塚放低了声音继续说道：

“姊夫最近成了右翼暴力团的目标，我心想找个安全地方让他躲藏起来，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

那时津田是知道我們的生活內情的，馬上就看出這句話的意思，感覺到事情很麻煩。

当时那番經過，津田在他的随笔《把人藏起来》中談得很詳細。后来我讀到那篇文章，大为感动，在《入獄記》里写下了我当时的感动心情，不过后来想法有所改变，这里且照着目前的想法来談一談。

听大塚把話說完，津田就轉念(根据他自己的話)：“当时有两种心情同时起伏着：一則是担心这样一来，会不会給自己带来危险；再則是正該在这样一个急难的关头，帮一把忙，借以报答向来的交情。”因此，他对大塚就先讲了下面这样一番話。使得不明白其中底細的大塚，弄不懂他到底是怎么一个意思。

“河上博士过去曾經在我个人的一件重大事情上，不顾社会的毀誉褒貶，帮了我的大忙(这个忙我周围的人沒有一个帮得了)，对此我非常感激，牢牢記着他的恩德。靠了博士，后来我才获得安定生活，所以我十分感謝他，始終怀着报恩的念头，心想哪天一定要报答他一番。”(这是津田君的亲笔。)

津田这里所說的“个人的一件重大事情”，指的是同他从前的太太离婚以及同现在的太太結婚。对于那件事，我曾經稍稍尽了一点力，可是其实那不过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在我可以說完全沒有放在心上。可是后来我被捕之后，讀到他在杂志上发表的随笔，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到这件事，倒使我觉得非常意外。我当时非常感动，觉得由此可见他的为人厚道得很。可是，后来又經過种种的事实，才觉得結果还是我想錯了。他对那件事，当然不会感恩到那种地步。尽管这样，他却仍然再三对外公开談起那件事，这无非是为了免得遭人白眼，說他窩藏我，足见他是左翼的同情者；如果再解释得坏一些，那就是为了向大家吹嘘他自己的厚道了；反

正两者必居其一。也许这仍然是我的误解，不过总而言之，现在我是这样解释着。说起我这个人，实在没有办法，一写文章，就到处损伤朋友，真是抱歉之至。不过，一般的人，都不是圣贤，请原谅我采取这种看法吧。

言归正传。津田听了大塚的话，躊躇了一下，然后先像上面那样解释一番，当下就答应说：“合适的地方总可以找到吧。”接着就思索适当的藏身处所。

“我哥哥的驻京办事处设在麴町区，那个地方怎么样？”

“拜托拜托，耽擱的日子决不会太久，四、五天或者一星期就成了。”

大塚这时再三强调：耽擱的日子不会太久。

津田的胞兄西川一草亭（津田青枫原姓西川，是甥立舅嗣的），是插花艺术的宗匠，家住在京都，东京方面有許多闊弟子，他每月总得来东京一两次，呆上两三天，指点門弟子学习。富豪和貴族家，他坐了汽車亲自上門去教，平常的学生，就让一块儿在办事处学习。办事处设在麴町区，宽敞的住宅里平常只有一个看家的老太婆带着一个抱养的女孩子和一个年輕的女佣住在那里。津田想起了那个地方，把情况对大塚約略讲了一下。大塚听了他的话，就说：“那太好了！”脸上的筋肉这才松动下来，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那样地宽了一口气。他彷彿放下了一桩心事，临别的时候，从容不迫地在第一展览室里的津田那幅大作品前面，一边向作者詢問画这幅画的动机，一边还表示連他那样的門外汉都不胜欽佩之至，站立在那里欣赏了好半天。当作者告訴他这幅画是受到他姊丈的示意的时候，他还感到得意哩。随后他就说：

“那末7日下午稍微晚一点再来拜訪吧。”

說完这句话，他就走出了美術館的大門。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到今天我都没有弄明白，事情就是我向櫛田家預告第二天离开他家，可是到了那天，大塚却来通知延期一天，过了一天又是这样，結果比原来的預定延迟了两天。当我对櫛田說明天要走的时候，櫛田太太第一天給預备下了牛肉火鍋。吃了这样一頓餞別飯以后，哪里知道又耽擱了一天；于是第二天又来一次餞別，請我吃炸大虾。等到第三天上，櫛田太太还亲手給做了魚肉飯糰。

到了准定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櫛田两人，坐在楼上寬闊的走廊中的籐椅子上，吃着冰过的新鮮水果（我爱吃糕点，而櫛田极爱吃水果），在夏夜的深更，靜靜地談着天。小小的籐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只抽了小半枝就仍掉的烟头，一会儿就积滿了。就像抽旱烟袋那样，点上一枝蝙蝠牌香烟，只抽一两口，随即扔掉，另外换上一枝，这是那时櫛田吸烟的习惯。他的太太一次又一次地給换烟灰缸。記得那时我对他說过下面一番話。

“站在党外攻击共产党的政策，总归不好。党中央所决定的意见，我們并不以为全都正确，也并非主张什么都該盲从。但是，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話，可以通过党的机关提出，在党内加以討論。不这样的話，就会伤害党的威信，这是應該特別慎重将事的。潜伏在地下作艰苦斗争的人，不像合法舞台上的人那样有公开发言之权，所以，如果有人对党外随便加以批評，是受不了的。因为没法辯駁呀。我們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凡是站在希望共产主义实现的立場上的人，即使不积极地帮我們的忙，至少也不可以从中作梗，这一点應該时时刻刻放在心上。說实話，现在日本的党，無論在实践方面也好，理論方面也好，都是比較幼稚的。但看党的印刷品，就連我这样的人，有时也会觉得并不高明，甚至觉得准是搞錯了。可是，如果就此站在党外批評

一通，却只会伤害党的威信。由于这样的关系，我认为，处身党外安全地带的馬克思主义学者，即使对于党的政策有什么不满意的方面，本人也有义务主动地限制言論的范围。这是我們最后一次的会面了，所以今天晚上把我对你的最后希望說出来。”

劳农党时代我已經詳細地、把浅野那批取消派分子的本质对櫛田談过，并且請他注意，可是他把我的话只当耳边风，完全不放在心上。虽然再讲也白費，但忠厚的我，終于还是說了上面那样一番話。我当时說話的态度极认真，看櫛田的样子也似乎接受我的意见，所以我还以为一定能发生一些作用。哪里知道从那以后直到1935年春天他突然死去，他在《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杂志》以及《改造》之类的刊物上，仍然頑强地一再主张着他的地租論。所以，看来聪明人是不願意干我那样的傻事——不遺余力地亲手破坏了所乘的新劳农党那条船——的，櫛田始終沒有走下他所乘上的那条船。对于一个在自己山穷水尽的时候給以莫大照顾的老朋友——社会上还一心以为他是出色的馬克思主义学者哩，——而且在他死后，写出这样一些話，虽然觉得十分遺憾，不过也沒有办法。

事先我托櫛田太太給买了一只小箱子。临动身前，就把衣服等等装在里面。这些东西是我妻三番两次偷偷地送来的。（箱子因为惹眼，沒法送来。）怕冷的我，整理衣服时，看到那些衣服即使过冬暂时也不缺少什么，不禁对于我妻的那份操心，感到既高兴又悲伤。衣服中間，还塞了一本德文版《列宁全集》1918年代的作品，一本德文辞典，还有多年来常用的消化药和安眠药。这时，站在旁边看着我理箱子的櫛田太太，拿出他丈夫經常服用的滋补药和胃散，放进了我的箱子。

整理好箱子以后，我把留了三十年的鬍鬚剃掉了。这是为了

多少掩飾一下我那副一眼就会让人认出的面容。

讀森鷗外的《大塩平八郎》，里面对于謀叛失敗而逃到河内^①的平八郎，有下面这样一段描写。

“平八郎給老掉在后头的格之助厉声打气，22日下午到了大和地界。天快黑的时候，平八郎让格之助在南畑买了一些东西，身上穿得整整齐齐的，走进驛站旁边的佛寺。过了一会儿跑出来說：‘你也来把头剃了’。格之助并没有表示惊讶，跟了进去。父子两个换了和尚打扮，穿了麻衣，走出寺門，这是23日早上六点钟左右的事。”

我因为写到自己剃了鬚鬚，忽然想起了这段小說。不过，那篇小說在这一段以后，还写着下面这样的話。

“在佛寺里的时候，平八郎几乎一句話都沒有說。出了寺門，平八郎突然說道：‘得，現在我們要回大阪去。’

“听到这句話，格之助吃了一惊。‘可是回去以后怎么办呢？这……’

“‘你別管，閉着嘴跟我来就是啦！’

“平八郎逃出来的时候，脚底下犹如涂了油；而回到大阪去的时候，則犹如口渴的人寻求泉水那样。他那回大阪的念头，在旁观者看来，仿佛是加在平八郎身上的一种不可抗力。格之助因为早晨和晚上都在佛寺吃了热騰騰的粥，犹如吃了仙丹那样地恢复了精神，再也不落在后头了。不过，他老是觉得他們一步一步正在向危险地带走去，望着走在他前面的义父的背影，禁不住惊奇之情逐渐增加。”

其实，尽管打扮成和尚，要是回到大阪，当过本地捕快的人，反

① 这个“河内”，是日本古地名。——譯者

正瞞不过別人的眼睛；可是有过剃鬚鬚的經驗的我，却很能領會平八郎的心理。再則，从前他拼着性命逃到了大和地界，而现在，却打扮成和尚模樣，突然向回走，重新回大阪，这种心理我也很能理解。鷗外先生在这里只是作了客观的叙述，說是“他那回大阪的念头，在旁观者看来，仿佛是加在平八郎身上的一种不可抗力”，而避免写到平八郎的主观的想法；我觉得，尽管吃尽千辛万苦从河内逃到大和，今后却不知道去哪里是好，平八郎到这里已是走投无路了。要說暂时躲一躲，那末还是躲在有一些熟人的大阪好；除此而外，平八郎再也想不出別的好地方了。——我的情形也是一样：当初要是津田不帮我那个忙，我当时也許会从櫛田家回到自己家里去吧。

9月9日下午，在附近雇好一辆汽車，說好皮箱三两天內再派人去拿，随身只拿了一个小小的手提包，深深致了謝，我就同前来接我的大塚一道，离开了櫛田家。作为謝礼，当时我送了櫛田一本有馬克思亲笔签名的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这是我妻給我带来的）。我还在扉頁上写了“呈櫛田学兄，1932年9月，河上肇”这几个字，作为紀念。櫛田死后，他的藏书全部卖給了东北帝国大学；唯独这本有些来历的《資本論》，沒有放在櫛田文庫里面，到现在还保留在櫛田太太手中。

西川一草亭家

我和小舅子坐了汽車，开到上野美術館正門的大石阶底下的时候，碰上陣雨，雨下得很大，风也刮得很厉害。小舅子把我留在車中，跑上阶沿去接津田。不一会儿，两人走了下来，被傾盆大雨淋了一两步路，急急忙忙地钻进了車廂。正要关上車門的时候，有个

青年一眼认出头发灰白卷曲、面色通紅的津田，边跑边喊：“津田先生！津田先生！”他西装被雨淋得透湿，一只手攀住了車門，說：

“对不起，請让我搭車到前面那坡道下面。”說毕，也不等別人回答，一只脚早已踏上車。

我吓了一跳。这个知識分子看样子和津田并不是挺熟識，却老着脸皮装出很熟的样子，所以看来不是个美术家，而是个新聞記者；而这个时候，我要是让新聞記者看见，那是很麻煩的。津田也似乎很窘，就問大塚說：“成么？”把責任推在大塚身上。大塚也很窘。他想，姊夫的面孔誰都認識，而且今天又把鬍鬚剃掉了，这番情景要是被新聞記者看到，是不胜麻煩的。可是，仓卒之間，他也只好橫一橫心回答說：“好吧。”

津田就让出一个地方，让那个青年坐在他的左边。汽車冒着狂风暴雨向坡道底下駛去。

我把津田夹在中間，坐在他的右边。剃掉了鬍鬚，格外显得清瘦；我把略为带黑的脸上的筋肉綳紧得像个面具，一句話也不說，別轉着头装做看着窗外的馬路。

那个青年似乎一切都沒有注意到，只自言自語說：“好大的暴风雨呀！”汽車剛开到上野广小路，他就下了車，說要在那里搭电車。

津田和大塚打了一个照面，露出卸下了千鈞重担的表情，可是又碍于司机，什么話都沒有說。青年下車之后，津田才对司机交代了目的地。

我照旧一句話也不說。津田感到一种可怕的紧张，也保持着不自然的沉默。

汽車終於开到麴町区下六番町小学校对門的一草亭的办事处。风雨越来越大，一点都沒有停歇的样子。

車子停在树木阴翳、絲毫沒有暴发戶气味、拿整个宅子的气派來說显得較小的、古色古香的街門前面。三个人下了車，按了按紧闭着的大門上的电鈴，就躲在門檐下避雨。尽管只等了一会儿工夫，我还是担心可能会引起过路人的詫异。

知道叫門的是津田，開門迎客的女佣还特地拿了雨傘，急急忙忙地把三个人領进去。

懂得窈門的津田，一面对管家的老太太說：“讓我們躲一下雨吧。”一面就走到最里边一間鋪八张席垫的的屋子里去。

馬上捧出了茶点和漂亮的香烟盆。

我一面用热毛巾擦着脸，这才开了口：“多精致的住宅呀！”宽广的走廊的地板擦得油光蕩亮，玻璃窗上沒有一点灰尘，窗外是巨石蒼松，安在石灯籠里的电灯，白天也不熄灭，照在頻頻被风吹动着的湿淋淋的竹叶上，使竹叶閃閃发光。由于和邻家相隔着一个林木蒼郁的大庭院，所以清靜幽寂得几乎使人以为到了山里的和尚庙。我这才知道，只要有錢，在大东京的中心区也能租到这样的房子。

津田先是同管家的老太太东一句西一句地閑扯着，后来忽然看了看我，說：“正給内地出来的朋友充当向导，遇上这样的暴雨，簡直叫人无法可施。”道地京都人的老太太，用京都式的客套話順口說道：

“要是不嫌弃的話，請索性在这里住一夜吧。”这句话来得正好，津田随即恳求說：“那就請多多照应了。本来我的来意也是如此。哥哥那里，我随后会对他說明一切。”脸上露出好容易大功告成的神气。

津田那天晚上因为有二科展览会举行的座談会，不久就站起身要走。我因为还没有得到主人的諒解，告訴他我心里很不安，他

輕描淡写地說：“不要紧，随后对他說也不妨。”說完他就走了。大塚也一同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拘拘束束地坐在那間大屋子的角落里，吃着晚飯。不习惯吃人家飯的我，让陌生的老太太招待着，心里觉得很寂寞。

吃完晚飯，又吃了刚从冰箱里拿出来香蕉和梨，坐在給端来的籐椅子上，头支撑在小籐桌上，一时百无聊賴，只管抽着蝙蝠牌香烟。这样茫茫然地独自一人，回想起方才急于想离开櫛田家，倒觉得留恋起来了。时而想到櫛田太太把滋补品和胃散放进我箱子的那番情景，簡直有些感伤了。

雨仍然淅淅瀝瀝地下着。

等到八点刚过，忽然大塚領了一位三十岁上下、穿着西装的矮个子又跑了来。据說是今后代替杉之原同我联系的中央方面的党员。（后来我被捕之后才知道，那个人就是当时党的中央委員长风間丈吉。那时我連做梦都不曾想到，地位那样高的人会单身一人来同我联系，始終认为他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刚参加非法运动的我，当时对这位老前輩自然非常謙恭，可是始終沒有想到他是那样一位大人物。）本来，我因为不願給党外的知交添麻煩，所以曾經一再請求，在未住到党給决定的最后的藏身之处以前，不要派人来同我联系，可是不知是出于必要呢还是中間发生了糾纏，結果在一草亭家就同这样一个人会面了。

大塚把那人領来之后，馬上就走了。

我一眼就看出那个人是工人出身。他的面貌、身段以至說話的腔調，一点都沒有知識分子的气息。我們两个人坐到籐椅子上，馬上就在电灯下面头碰头地談开了。

“請你記住，从今以后，由我直接和你接头。每隔一星期或者

十天，我会到你这里来。我的党名叫德川，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叫平松吧。”

接着平松声明說：“我說話很粗气，今后請勿見怪。”随后又說了下面这样一番話：

“推荐本田君(这是我的党名)为党员，这事老早就有人提过，但是由于劳农党时代的錯誤犯得很严重；有些人认为还不是时候，所以一再拖了下来。可是现在大家已經清楚，犯那次錯誤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后来又彻底清算了，而且本人又有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的願望，所以最近中央委员会推荐本田君为党员的时候，滿場一致通过了。我們本来也曾打算让你到苏联去，不过在你这方面，也有困难，因此决定让你留在日本工作。可是，暫時还是不能让你参加会议，所以由我来接头，传达一切。至于目前的工作，你可以对党报的編輯技术尽量提出意见。必要时还想請你写些小册子，而且关于一般文件編輯方面，也想請你尽量多提意见。用不着躁急，躁急是要不得的。讓我們大家从容不迫地定下性来，沉住气干下去吧。”

我集中了全副精神傾听着他的一言一語，可是他的談話却絲毫沒有煽动感情的腔調，所以最容易感情冲动的我，都沒有受到多大刺激。

談完了正經，平松开始讲起呆在莫斯科的片山潛来。他的一番話无异是要破除我对片山可能怀有的好感。“說实在的，片山老人是一个沒有多大能力的、不中用的人，近来用他的名义发表的文章，大多数是別人写的。有时他老人家自己也写，不过大家都头疼。同样用片山的名义发表的东西，其中往往有写得很糟糕的，也就是这个緣故。从国内寄去的文件，他往往一个人收起来，不让同志們看，这使大家都生气。原来共产国际的所以让他老人家当

日本代表，是为了酬答他悠久的斗争经历；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关于片山潜，平松讲的尽是这类话。听了这些话，我自然兴奋不起来，而且也不懂得他为什么首先要谈到这一些。可是，从这番话里，我至少知道对方是从莫斯科回来的。

接着他又谈到岩田义道。（这是我后来才清楚的，当时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就是由平松、岩田、松村三人组成的；三人中间，平松是委员长，松村是去过苏联的、反动当局派来的奸细。以前我住在西大久保寓所的时候，曾经同岩田派来的人见过三、四次面。来人是和岩田同居的年轻女管家。目的是托我给他办理离婚手续——和从前的老婆离婚，以便和这个女管家正式结婚。）我和岩田的朋友关系，平松似乎知道得很清楚，可是讲来讲去，也没有讲岩田什么好话。他说岩田在开会的时候总是先来一套抽象的辩证法的解释，所以工人出身的同志都敬而远之；又说岩田老想和本田君会面，可是因为大家觉得既然不是出于党务上的需要，还是不让见面的好，所以到今天连住址都没有让他知道。只管听着这类话，我的紧张的神经就慢慢松弛下来。可是忽然之间，觉得空气在动荡，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男人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真弄得我张皇失措了。专心一意听着对方说话的我，全然没有注意到脚步声；等到觉得微风吹动而抬起头来的时候，一个穿着日本服的人已经悄悄地站在身边了。

那个人就是这家人家的主人西川一草亭。他虽则是津田的胞兄，面貌却一点也不像。津田的丰采很不错，谁都一眼看得出他不是艺术家，准是思想家；而西川呢，却生得有点像商人，其貌不扬，矮矮的个子，不胖不瘦，下巴又长又尖，来得很别致，给初次见面的人一个异样的感觉。平常我最容易忘掉人家的面貌，而这次呢，却一眼就认出是一草亭。突然之间发觉他而吓了一跳的我，不久就

重新鎮靜了下來。

我首先向他鄭重道歉，說是當主人不在的時候，沒有得到允許而闖了進來，非常失禮，然後故意裝出一副活潑的腔調，同他閑聊，來掩飾自己的狼狽。本來同我正說着話的平松，畢竟老練沉着，善能觀風望色，當我和一草亭談着話的時候，極其自然地插上一兩句口，然後乘適當的機會，很乖巧地辭去了。

出席了二科展覽會的座談會的津田，到十點半鐘才好容易回來。

他和一草亭在另外一間屋子裡講了一會兒話，然後來到我的地方，告訴我他哥哥那裡已經講通了，叫我放心，而且說他哥哥明天清早就要回京都去，這樣一來，這裡暫時就等於空房子，所以叫我不必顧慮什麼，儘管呆下去，過幾天他還會來看我，說完他就走了。

搬到黨所指定的藏身處以前

第二天早晨，我還睡着沒有起床，一草亭就動身回京都了。剩下我一個人，孤守在那間鋪八張席墊的客堂北邊用紙門隔開的一間鋪六張席墊的屋子裡。這間屋子的東面和北面是面臨走廊的紙窗，因為是這棟房屋的后院，所以屋外的空地狹窄，大白天還是半明不暗的。東面有個小小的狐仙祠，祠旁有棵古老的大朴樹，枝葉密茂，北面是一堵高板牆，牆那邊就是鄰家。我向他家借來一張矮桌子，靠窗放着，整天埋頭讀書。寂靜的院子裡，只聽到蟬聲。

三頓茶飯，都由女傭送到我屋子裡來。大概我受到的是和一草亭在家時一樣的待遇吧，早晨總是一片薄薄的塗上黃油的烤麵包，一杯咖啡，再加一份冰過的水果。陶器很精緻，刀叉都是銀的，

餐巾雪白，一切都漂亮得很，不过一天三顿，分量都嫌少了一些。这家的主人似乎不像我贪吃。

过了四、五天，9月15日傍晚，大塚把我寄存在櫛田家的箱子送来了。那时他报告说，我存在银行里的一万五千元，取出之后，今天已经安全地交给党组织了。

当天我妻为了履行和大塚的约定，到住友银行新桥分行提取一万五千元的定期存款，银行根据民法上“妻子未经丈夫同意不得处分财产”的规定，不肯付款。她不得已跑到住友银行麹町分行，找当时做该分行经理的她的胞弟（大塚的哥哥）平佐，把存折抵押了一万四千多块钱。一两百块钱，其实无所谓，可是为了算利息啦什么的，费了老大工夫。由于同大塚约定的钟点快到了，所以一拿到钱，就在银行门口坐上一辆出租汽车，直奔高架电车品川车站，满头大汗地赶到京滨电车高轮终点站百货店楼上的森永糕点铺的茶室。这时正好是约定的上午十一点的前几分钟。走进屋子一看，穿了西装的大塚，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喝干了的冰咖啡的杯子，正在抽纸烟。

若无其事地走到他那张桌上坐下的我的妻子，一连喝了两杯冰咖啡，擦了擦脸上的汗。汗水只管流个不住。

约定的一万五千元，其中的三千元前几天已经付过了，为了要从今天提出的钞票里取出一万二千元另外包好，她在汽车里遮遮掩掩地把钞票数了好多遍。喝完咖啡，她若无其事地把那包钞票悄悄地塞给了大塚。

为了防备万一大塚被暗探钉梢而遭逮捕，当时另外有两个党员（就是后来抢劫大森银行的西代和中村），口袋里藏着六连发的实弹手枪，候在茶室进口的桌子上观风，看到一小包东西交在大塚手里，他们马上走了。

大塚让自己的姊姊先走，然后离开茶室，在电车站前坐上一辆出租汽车，直奔日本桥的东京大厦。大厦里有一间房间，门口挂着“高野会计师事务所”的假招牌，那是党的秘密事务所；房屋资金局事务部的负责人今泉善一（此人后来也和大森银行抢劫事件有关），正等候在那里。

我一面从大塚嘴里听取当天发生的事情的轮廓，一面想：“从前通过杉之原的手捐献给党的资金，大概将近一万元，再加上这次的一笔，约略总有两万几千元了。我在新劳农党时代不知糟塌掉多少钱，料想不到今天居然还能拿出这些钱来。”心里感到高兴，同时却想：“可是这样一来，究竟还剩下多少钱呢。”不由得担心起我妻今后的生活来。

前面也曾说过，我的妻虽然一点都不善于理财，可是自奉十分俭朴，在我稿费收入相当可观的时代（《经济学大纲》的稿费有一万五千元，《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和《第二贫穷故事》每种稿费一万二千元，还有其他等等），她也从来没有铺张浪费过，把钱全存进银行里去了；旧衣柜底，全是些老古板衣服；可是这几年来，那些存款用得精光，她却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而现在呢，她把最后的存款都毫不迟疑地捧了出去。对于这样一个糟糠妻，我总想留下一部分钱，让她安安稳稳地度过她的晚年。可是，既然我自己投身到谁都没有工夫顾到妻子的波浪滔天的革命旋涡中，那末，尽管对小舅子，要想把这种事情事先拜托他，也都开不出口。

只是在事后从大塚嘴里听到这样的报告：“关于留下若干生活费给母亲和妻子的事，已经征得党中央的同意了。”至于为此大塚准备给她们设法留下多少钱来，我却连那个数目都没有问。我素常是不明了家中的财政状态的；捐出一万五千元以后，究竟还剩多少，心里盘算过几遍，还是估计不出，只觉得我的妻太可怜了。

黨組織方面給我的藏身处所，等來等去，還是沒有下文。一草亭家，最初也以為只要呆兩三天或者四、五天，哪里知道依舊一天天地拖下去。津田時常買些茶點送來，還對我說：“這個地方很清靜吧。呆多久都成。要是你不嫌棄，就這樣地長住下去，好么？”至于我呢，心里却很着急，希望早日安頓到我應該安頓的地方去，開始自己的工作。

看家的老太太初見面時客氣得很，日子長了，臉色愈來愈難看。客人來了之後，一天到晚鑽在屋子裡。從來不外出，甚至連院子裡都不大去：這樣一個來歷不明的怪客，將來會不會給帶來麻煩呢？她想到這一層，愈來愈膽寒。她但願我早點離開她家，推說有病，不再和我見面。日子一天天拖下去，襯衣襯褲我都不得不自己洗，老太太却裝做不知道，也不讓女傭幫我的忙。我這個人，如果在患難中受了人家的好處，日後雖則未必一定能夠報答，可是心里卻是永遠不會忘掉漂母之恩的。在大學讀書時代，曾經有個年老女傭，看我的伙食不好，覺得可憐，有時私下盛給我一碗醬湯，或者把人家吃剩的菜放在我的小食桌上；後來我雖則把她的姓名和面貌全都忘光了，可是到現在還對她感激不盡。遺憾的是，一草亭家那位老太太，卻沒有能讓我產生懷念的心情。

直到9月20日，大塚好容易來通知可以住到黨所指定的藏身处去的時候，我才放下了一樁心事。大塚還說：“這也許是最后一次機會了，明天下午五點鐘，在你動身以前，我會把姊姊領到這里來。”說完，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自從離開櫛田家，我住的地方連我妻都沒有讓知道。）

第二天（21日）吃完午飯，我取出懷表放在矮桌子上，心焦地等候着五點鐘的到來。以前我也曾經有過一次經驗：當我從歐洲留學回國、船快要停靠神戶港的碼頭的時候，那一兩個鐘點，真是

使我等得說不出地心焦。此番也和那一次完全一樣，使我在十七年之後又重新嘗到那個滋味。

終於五點鐘了，可是人還不來。五分鐘過去了，十分鐘過去了，等到過了二十分鐘，大塚才領着秀子和左京，打開我那間屋子的紙門進來了。出去招呼的女傭，看到穿了黑色禮服的胖胖的秀子，就猜出是我的太太。當畫家的左京，沒有穿禮服，外表倒像個學生；所以，本來，儘管他的臉容和我大不一樣，旁人却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我的弟弟，然而女傭卻覺得四十出頭的他，大概是太太帶來的書僮。

我們四個人托女傭叫來四份鰻魚蓋交飯；說不定將成為永別的这个晚上，那就算是臨別紀念了。後來，我們就在那間逐漸暗下來的鋪六張席墊的屋子里，說了一會兒話。

我離家之前就已開始的對共產黨同情者的逮捕，後來越來越凶了。8月里已經逮捕了兩百多人，到了9月，還好比牽瓜籐那樣，牽牽連連地逮捕了許許多多人；細迫兼光的被捕，當時也上了報。杉之原就是他給我介紹的，而據大塚說，這位杉之原的情況也不妙，現在已經離家了。

“你逃出來，還是逃得對。”大家都這樣說。

我們夫妻兩個因為旁邊還有兩個弟弟，所以沒有能說什麼體己話。雖則也談到那天早晨安全地把錢獻給了黨的事，可是我終於沒有問起其實我時刻都在擔心的、還剩下多少錢的問題。而秀子呢，只笑笑說：

“這樣一來，我也就無牽無掛了。”

那時大塚正在籌劃一件重大的事情。8月31日那天夜里，本來準備由他負責襲擊小石川區不動貯蓄銀行白山分行，結果沒有能動手，於是又要他負責在最近期間完成另一個計劃（就是後來襲

动整个东京的大森搶劫事件)；所以他脑子里专门想着那件事哩。我对这事也稍稍听到一些风声，觉得当时大塚有些坐立不安，周围的空气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张的感觉。和他在一起，我不好只顾家庭的私情，所以，吃完饭，歇了一会儿，我就说：

“老是这样坐下去，也不行，我们就走吧。”

然后坐得端正，回头嘱咐秀子说：

“今后的住址不能再让你知道了。见面的机会也可能绝对不会再有，可是希望你始终住在东京，不要走。我的身体不知道能支持多久，要是生了病，快到断气的时候，我会请同志们把我抬到家里去。”感情脆弱的左京，坐在旁边听了这番话，眼泪直流。看到他那副样子，我就嘱咐说：

“左京呀，妈妈就交托给你了。”

那时我的老母亲，雇了一个女佣，住在家乡山口县的岩国市，独自一个人度着她的余生。

“再就给我换上一条腰带吧。”

临动身的时候，我解下我身上的一条束旧了的黑锦纱腰带（那条带子因为已经结烂，所以被剪短了），换上左京身上的一条黑绸网腰带。

秀子去到里屋，把带来的糕点以及给老太太的女儿和女佣的礼物送给看家老太太，并且郑重地道了谢。

四个人一道走出来，女佣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终于没有和老太太碰头就分别了。

我和大塚坐上停在门口的汽车。秀子和左京等汽车开出以后才离开那里，还只管回头看咧。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整整十二年前的事情了。年老病弱的我，现在居然还能在故都一角租上一栋破屋，重新面对京洛的山川，在

空前未有的战乱中間，独自安安静静地写当年的回忆，这样的日子，当时簡直連做梦都沒有想到。写到这里，放下了笔，不无感慨。1944年8月14日，动笔后約八十天。

“劳动农民党解散以后，潜入地下以前”的补充

前面已經說过，我离家以后，将要潜伏地下时，在沒有住到党所指定的藏身处去以前，曾受到老友吉川、櫛田和津田的照顾。每家人家我都白白地呆了一两个星期，白白地吃了人家的。照道理說，光是这一点，就已經受了人家不少恩惠。何况知情而让一个共产党员藏在自己家里，碰得不巧，会以窩藏犯人論罪。这样看来，我当时是給朋友家里添了极大的麻烦。我的妻子总爱強調这一点，认为无论怎样都补报不了給人家造成的麻烦，事实上她似乎也那样执念着。

可是，我却怎么說也不认为是那样。按照我的本性来說，我并不是那种受了人家的恩惠或給人家添了麻烦而丝毫不放在心上的。宁可說是比一般人更重情誼，但是在上面所說的几件事上，我的感情却和我妻相去甚远。每逢她过分执拗地那样主张的时候，我总是起了反感，生气。这到底是什么緣故呢？

我的托庇于吉川家和櫛田家，即使在我被捕以后，也沒有让法院知道。尽管不止一次地受到預审推事的盘問，我始終沒有招供出来。可是一草亭的別墅，由于曾在那里会见过中央委員长风間，預审推事非問出一个究竟不可。而且风間早已供出某月某日初次同我碰头，大塚也已供出地点在麴町区下六番町小学校附近，因此，我也就供认那是小学校附近的西川一草亭的別墅。由于这个

緣故。看家老太太似乎還曾被法院傳喚作證。當時老太太也許吓得發抖了吧。固然，開庭的時候，僅由女傭到法院里受了審，事情就這樣了結了，但是，無論女傭也罷，老太太也罷，都會感到很大的麻煩吧。津田的長久被拘押在警察署里，我想也許是因為他同無產階級藝術運動有聯系的緣故；可是，他偷偷把我藏起來這件事，對於他總是不利的。這樣一想起來，我的確給津田等人添了許多無法補報的麻煩。既然這樣，我為什麼並不怎樣放在心上呢？

我妻經常批評我說：“自己任性闖下了禍，到後來自己吃苦頭，倒也罷了；可是如果因此而連累了別人，那未免……。”由於事情不容易說清楚，我從來沒有把我的想法對她講過；不過，無論如何，我總不以為，也不可能以為我參加地下活動是出於什麼“自己任性”。我認為在這方面，我們夫婦之間，想法有很大的分歧。

那是出於一種義務感的行動，我主觀上認為我本人絲毫也沒有利己的念頭夾雜在里面。我所以不那樣重視受到他們的恩惠或是給他們造成麻煩，就是由於這樣一種心理。

吉田松蔭先生在他想偷乘外國輪船逃走的隔夜，曾經在下田港一家旅館里投宿，事發之後，那家旅館的老板，吃到了很大的苦頭。而比這位老板更慘的，則是藏匿大盜平八郎的美吉屋五郎兵衛夫婦兩個。五郎兵衛被定罪梟首示眾，他的老婆常子被定罪流配到荒遠的海島。後來，五郎兵衛押送到江戶，死在監牢里，所以，在磔刑柱子上，只掛出他那經過鹽漬的屍體。那真是淒慘到極點的死法；不過在封建幕府時代，凡有藏匿造反者的，敗露那天，將遭到嚴刑，這是最初就擺得明明白白的。既然這樣，為什麼像大盜平八郎那樣的人物，還要給別人帶來那樣的麻煩呢？

在森鷗外的《大盜平八郎》里，講到亂後逃走的平八郎重新回到大阪時，有着下面這樣的描寫。

“往南走过大阪油悬町紀伊国桥，东边巷里第二家坐南朝北的門面，是一家叫做美吉屋的手巾布批发商店。老板五郎兵卫今年六十二岁，老婆常子今年五十岁，女儿胜子，孙女儿鹤子，此外家里还用了五个男僕，一个女僕，上上下下十口人过活。五郎兵卫这几年来在大盐家出出进进，有时給大盐家备办些厨房里的用品，2月19日暴动发生以后，市政厅就把他交給街坊看管起来。（引用者注：江戸时代，幕府让区长、街道工作者、房东和保甲在一定期間内把罪犯或嫌疑犯看管起来，叫做街坊看管。）

“2月24日的夜里，美吉屋的老板照往常那样睡在上房，让家属和伙計們睡在楼上和厨房里。敲过八点钟，外面有人打門。老板起身問是誰，說是备前島町河内屋八五郎差来的。美吉屋和河内屋一向有交易，五郎兵卫心想有什么事情要在夜里差人来，疑疑惑惑，走到院子里去开門。

“刚一开門，随即走进两个穿了灰布雨衣的和尚，低声喝道：“快快把門关上！”五郎兵卫吃了一惊，再一看，两人左面一只手里都拿着短刀，全不像出家人。他吓得瑟縮发抖，既不吭声，也不动弹。走在前面的一个年紀大些的和尚，使了一个眼色，跟在后面的那个年輕和尚就推开五郎兵卫，把門关上了。

“两个人坐到廊檐下，开始脫草鞋。五郎兵卫看着看着，又大吃一惊。因为那两个人虽然剃了头发化装成和尚模样，却原来是大盐平八郎父子。‘噯呀，不是大盐老爷么？’平八郎喝道：‘不要称名道姓！’

“两个人一声不响地直往里走，于是五郎兵卫走在前面，把他們領到堆放东西的小屋子里。五郎兵卫問：‘您打算怎样？’平八郎只回答了一句：‘暂时要在你家里叨扰。’

“窩藏叛首是犯大罪的，这一点五郎兵卫当下也不是沒有想

到，可是，平八郎的說話，这几年来总是在这个老头儿的心上起着一种暗示作用，所以到底沒法拒絕。再加父子两个始終拿在手里的短刀，也产生了威胁的效果。五郎兵卫只得把他們两人留下来，設法不让人发见，使得灾禍尽量往后推，哪怕推迟一刻钟、推迟一天也好。他把小屋的紙門关紧，把情况对老婆一个人讲了，偷偷地給准备茶飯，不让伙計們知道。

“一天一天过去了，老夫妇不知道客人究竟哪天才走，留心着客人的动静，可是平八郎却十分鎮定。家里要是来了知心的人，往往让进里屋去，只隔着一重紙門的屋子里藏着一个被通緝的人，实在放心不下。幸而美吉屋家的西南角上，有一栋单幢房屋。周围是个小院落，和正屋之間，夹着一堵开了一扇小門的板墙。还有一个門，几乎直接通往大路，在大門西面的小胡同里。这栋房屋，家属平常都不出进，更不怕被伙計們发觉。因此，五郎兵卫半夜里让平八郎父子两人迁到那栋房子里去了。每天做飯的时候，五郎兵卫多量出些米，放在另外一只紙袋里，还加上黄酱、盐、酱菜等等，亲自送去。父子两个就在那栋房子里自己用炭火做飯吃。

“不久到了三月，美吉屋更換了些伙計。那时女佣中間有一个回到平野乡的荐头店，說出了下面一番話。不知为什么，美吉屋每天要用那許多米。老夫妇两个，天天另外量出一份米来，伙計們还以为是拿去供神的，可是从来沒有剩下一点儿上供的祭品。

“平野乡是封建諸侯土井的八万石采邑中間的一万石土地，是所謂七大姓土著所統治的地方。內中的末吉平左卫門和中瀨九郎兵卫两人，听到了从美吉屋回来的女佣的話，就向乡公所告发。駐在公所的諸侯家臣，把这个消息汇报了土井。土井于是命令近卫捕快內山彦次郎传訊美吉屋五郎兵卫。……五郎兵卫被內山一拷問，馬上招出了实情。……”

平八郎的藏身处由于这样的一番經過而被发觉了；3月27日的清早，許多捕快包围了美吉屋，平八郎放了一把火自焚而死了。从2月24日清早来到美吉屋，他只多活了一个多月。至于美吉屋一家为此而遭到的不幸，上面已經說过了。

像平八郎这样一个明白道理的人物，为了拖延一个多月迟早要死的生命，給人家造成那样大的麻煩，而毫不介意，这种粗暴的态度，似乎不像中斋先生^①的为人，他当时究竟是怎样一种心理，我以前一直不能理解。可是，自从我本人有了一次地下活动的經驗以后，才似乎多少懂得他的心理了。

自己的所作所为固然是违法的，但是，那和騙子、小偷不一样，絲毫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自己做那种事，是把身家性命完全放在脑后的，里面絲毫也沒有夹杂着什么利己的念头。——由于当事者有着这样一种想法，所以即使麻煩了人家，觉得也和平常不一样，而不怎样予以介意。即使沒有非法运动的經驗的人，只要想一想打仗的情形，也就可以多少領会此中的道理。凡是相信自己打的是正义仗的大将，杀死敌兵自然不用說了，在必要的时候，甚至牺牲自己手下兵士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与窃盜、騙子等等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非法运动者的想法，大致也是这样；因此，在他的行动的过程中，尽管有时麻煩了別人，却并不怎样放在心上。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上面我虽則曾說平八郎“为了拖延一个多月迟早要死的生命”，那也只是別人在事后的一种說法，而在当事者說来，即使他已經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也不会輕易承认失敗，俯首就擒。我敢說，当时平八郎虽則經常抱有死的精神准备，但是，2月24日夜里，当他打美吉屋的門的时候，他也許决不

^① “中斋”是大蓋平八郎的別号。——譯者

会想到仅仅一个月以后事情就败露，美吉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反而希望他的潜伏状态能永久持续下去吧。这种心理，和买彩票的人都梦想自己是幸运者的心理相同。再说，如果事情万一不败露，日后平八郎父子能转移到别的安全场所去，那末美吉屋老板五郎兵卫也就不至于受到磔刑，他的老婆常子也不会被流配到海岛上去了。陷于绝境的人之所以能想到遥远的未来，而比较地能沉住气，就是因为他毫无根据地把这“万一”梦想作了“唯一”。在这种梦想之下，当事者就会不怎么把带给别人的麻烦放在心上。平八郎当时不加思索地打美吉屋的门的原因，就在这里。

前面已经讲过，当我将要住到党所指定的藏身处所去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我妻，把我的后事托付了她。这表示当时我自以为到死也不至于被捕。而事实上，后来仅仅过了一百多天，我就被反动当局抓住了。这样的下场，在第三者看来，其实早就明若观火了。由此可见，当事者的想法和第三者的想法是有很大距离的。

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某些国家的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可是，这些国家的当局者还把希望寄托于万一，不肯罢休，因而未能及早采取收拾局面的贤明的办法，徒然无谓牺牲，不把事情弄到最坏的地步不歇。在冷静的旁观者看来，自然是蠢到极点了，可是，当事者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主观的想像上，无论多么聪明的人，在干着这种蠢事的时候，总还是洋洋得意哩。回头看一看1933年1月上旬的事，当时我已经知道大塚被捕了，而且警察厅方面已经从大塚嘴里得知了我的住址，在捉我的隔夜，为了做好准备工作，用种种办法来侦察我住所的情况，尽管如此，我却仅仅觉得情形有些不大对头，准备马上换住所，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第二天就被捕。反省到当时我自身的情况，也就能够理解现在打败了仗的国家的战争领导者的心理了。

只有彻头彻尾用纯粹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就是科学的观点——锻炼出来的政治家，面对国家兴亡的关头，才会在观察问题的时候丝毫不为主观愿望所左右，冷静地客观地观察局面，采取最妥善的方针。我觉得今天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国家、科学的国家苏联，才有这样的英明果断的政治家。

1944年10月6日

曇花一現的地下時代

難忘的一百多天地下生活

我過地下生活，只不過一百多天。雖然本來也就知道時間不會太長久，可是，我是準備死在地下的，所以總以為至少有這麼兩三年。可是結果，卻那樣快就被逮捕了，這也許是誰都沒有想到的。

在僅僅一百多天的地下生活中，對於運動沒有能夠做出什麼貢獻，我覺得很遺憾。但是在我將近七十歲的一生之中，這一百多天卻是難忘的一百多天。下面我想讲讲這一段生活的回憶。

1932年9月21日，我总算住到了黨所指定的藏身處所。那是麻布區材木町一位姓蟹江的小兒科醫生的家裡。我被大塚領到他家的二門口，是在初更時分；當時時令已經將近9月底，怕冷的我，已經穿上嗶嘰單衫，外面還加了一件黑褂子。我化名為宇波；這是預先約好的。宇波這個姓乃是蟹江在信州飯田中學念書時候一位漢文教師的姓。可不是麼，像我这副樣子，說成一個鄉下中學的漢文老教師，多相稱呀。

我的名片一遞進去，樓上會客室的客人似乎就此乘機告辭了。才聽到一聲“那末失陪失陪，我從前的老師來了”，主人蟹江和來客已經格登格登地走下樓來。樓梯底下就是二門口。蟹江一眼望到站在那裡的我，雖則是初次見面，卻像老相識那樣用極親昵的語調說道：

“噯呀！什麼風把老師吹來的呀！”

我和大塚相对一笑。

我們馬上就被領上樓。附有擺設間的那間鋪八張席墊的屋子的席墊上，還鋪着地毯，圓桌子的周圍，放了四張笨重的圈身椅。我一只手里提着小小的黑皮包，另外一只手里提着一筐水果，算是禮物，真像老教師來看他從前的學生那般的。大塚也跟在我後面，提了箱子走上了樓。

不一會兒，大塚辭別了，這時蟹江就開始對我說明他的家庭情況。據他說，他在紅十字醫院工作，白天總是不在家。（我最初還以為他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醫學士，日後才知道他不過是私立大學或醫學專科學校畢業，覺得這就奇怪了。）他在學生時代就入贅給蟹江家，他的妻子也具有醫生的資格。兩夫婦外，只有一個兩歲的大兒子和一個岳母，家里不用看護婦，也沒有傭人。關於我的事情，只有他妻子知道，還瞞着他岳母，只說我是他從前的老師宇波先生，所以希望我在他岳母跟前始終不要說穿。他還叮囑我說，呆在家里哪兒都不去，很不自然，可以推說由於生病，禁止戶外活動，所以希望我裝出病人的樣子，不要露出馬腳，要裝得像是雖則沒有什麼大毛病，用不着進醫院，但是徹底治療卻需較長時間，為了省幾個錢，才來投奔從前的學生，暫時在他家里養病。因此他每天會給我配補藥吃，一天三次，飯後服用，要是他忘掉了，我可以主動向他索取。蟹江再三叮囑了我這些話，仿佛對這出戲很感興趣。可是最不善于騙人而且討厭這種舉動的我，當時就意識到事情很麻煩，不知怎樣才好。

年紀才三十歲光景的這位小兒科醫生，白淨的長方臉上留着一小撮鬚鬚，他那副表情，就像常見的有點小聰明的人那樣，使人覺得作為贅婿，再合適沒有了。只是他那副飄逸的神氣之中，缺乏真誠，所以我對他並沒有多大好感。對於初次見面的我，他一點

儿都不认生，抓住年紀比他大三十岁的我，就像对待从前的同班同学那样滔滔不絕地說些毫无顾忌的話。

最后，他取出长野县的地图，开始給我說明从前宇波先生教过他书的那个飯田中学附近的地理：汇合到天龙川上流的松川，是怎样地流着的；高島屋山和太平峰在哪个方向；飯田中学的运动場离教室有多远，西边有个小山，沿着高高的石級爬上小山，頂上有个八幡宮的祠庙；……他仿佛陶醉在他自己的少年时代的回忆里那样，把这类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給我听。他讲得很快，漫无边际地只管讲下去，一点都不想体諒对方的心情。据他說，这是因为，如果我不弄清楚这許多情况，将来在吃飯时候或别的时候露出了馬脚，那就麻煩了。可是，对于这类事情，我自然不会发生兴趣；再說，悟性既迟鈍、記憶力又不好的我，一口气听了这許多話，也不可能一下子都記住。刚踏上前途困难重重的地下生活第一步的当夜，我心里自然而然地有着許多感慨，眼前老是浮现出才分手的妻子的面影，精神实在不能专注，只希望对方索性簡簡單單地說声“先生，您辛苦了，以后可够嗆哩！”让我安靜一会儿。

等到四下里全无声息、只听见秋虫的鳴声的时候，蟹江的妻子才出来见我，說是好不容易才哄孩子睡了。接着夫妻两个把我領到为我准备的屋子。

那間屋子就在会客室的西边，中間只隔一道紙門。这間鋪六张席垫的阴暗的屋子，就像隐蔽的儲藏室，如果不通过会客室，就不能下楼，它的出路是被堵住的。南边是墙；西边为了要遮太阳的緣故，也是墙，只在高处开了个小窗，还有一个六尺宽的壁櫥。只有北面是窗，半人高的窗口，安着玻璃拉窗。刚走进屋子的时候，窗外的梧桐树的大叶子，碧油油地反映在电灯光中；古怪得很，这个印象，直到后来还留在我的記憶里。

屋子里放着一张双人床。这间屋子从前是寝室，现在就腾出来给我用。那张床，占去屋子的一大半地位，屋子就显得狭窄了。

那天晚上，我和蟹江讲好，每月付五十元的房饭钱。蟹江说，本来不应该收什么钱，只因为他家是岳母当家，为了不至于在岳母面前弄得不好看，所以……。在我这方面，出了房饭钱，本来比白吃白住心安而且方便；只是从前我自己家里对于地下活动者，做梦都没有想到向他们收钱，所以当下我未免感到有些出乎意外。

躺到床上后，一面重新察看屋子的情况，一面暗想：要是今后会客室里来了客人，我简直成了瓮中之鳖，连厕所都不能上。屋里连一张矮桌子都没有。因为我想马上就要开始工作，所以打算明天就让他们给买一张矮桌子来。又想到这间屋子朝北，终日见不到太阳光，冬天可就难过了。本来，这四十多天以来，我一日千秋地盼望着住到党给我的藏身处所，岂知住到指定的地方一看，一切条件都和我事前的空想相去甚远，心里未免有一种淡淡的失望之感。最初的一个夜晚，我就是这样的心情下入睡的。

此后我在蟹江家呆了八十天；八十天中，一直过着比坐牢的人更不自由的生活。

在这八十天中，我没有开过一次窗，露过一次脸；没有穿了鞋踏过一次泥地。南边贴邻那家人家的主人，据说在外务省当差，也许认识我的面孔，所以不能糊里糊涂地靠在窗口。头发长了，用理发推子自己剪。屋子也由自己打扫。不仅我住的那间，连隔壁那间铺八张席垫的会客室，每天也由我一个人收拾。会客室里铺着地毯，还放着笨重的桌子和椅子。每天我总要把地毯揭开，把尘土打扫干净，还要擦地板，直擦到楼梯下面。衬衣衬裤之类也是自己洗。

麻煩他們的几乎仅仅限于三頓茶飯。因为吃得太苦，貪吃的我，老觉得沒有吃飽。尽管后来坐牢的时候，我也沒有产生过当时那种下賤的感觉。这或許是死了那份心的緣故吧。

主人不在家吃午飯的时候，只有煮黄豆或咸菜，此外沒有别的菜。晚上那頓飯，也許因为主人是贅婿吧，大家都一律平等地吃些粗恶的菜。有时虽然也做样巴好菜，盛在盆子里，放在桌中央，听凭各自夹着吃，但分量过少，在人前老是感到拘拘束束的我，也不好怎么下筷。既然进入了地下生活，照說就不該嫌吃得不好，可是不知怎的，当时总觉得不自在，老想到“吃閑飯的人，第三碗飯只能偷偷地吃”那首川柳^①。我們家里的生活一向虽則很俭朴，但在伙食方面，却非常讲究，营养几乎嫌过多，现在突然发生变化，事实上也許是胃脏在不断发出生理上的不滿吧。我念念不忘地想吃頓牛肉，但是因为不能出去，所以始終吃不成。大塚看不下去，有时給我送来些夹肉面包，我虽然刚吃完晚飯，却像餓鬼那样把它一扫而光，一片都不留給对方，弄得大塚也只好苦笑了。

有一次星期日，据說紅十字会医院举行运动会，房东全家一清早都去参观，留下我一人給他們看家。他們临走的时候，說是起坐室里留下了面包給我当午飯。平常感到說不出地不自在的我，心里高兴得很，以为今天总可以把自己爱好的茶喝个痛快了。哪里知道等到吃午飯时候，走下楼去一看，餐桌上只放着半斤面包和一份黄油，茶壶里沏的乃是粗茶，这使我大失所望。平常他們家里待客总用紅茶，这天連紅茶都舍不得拿出来；我看到这副光景，不得不感到类似吃閑飯的門客的那种不痛快。——想起来实在慚愧，我这个人实在生来就是个馋癆坯。除了不惜生命以赴的事业

^① 川柳是日本固有詩歌形式之一，每首由十七个字母組成，內容多属机智、滑稽、諷刺之类。据传由柄井川柳(1718—1790)創始，故名。——譯者

而外，一提到过去的回忆，不知不觉地就扯到吃上面去了。

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不便的，就是对蟹江的岳母隐瞒着我的身分。在这方面，每天不知给我造成多少不自在的感觉。

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讀卖新聞》的創刊五十周年紀念号送来了，上面登載着一篇关于我年輕时候用千山万水楼主人的笔名写的长篇連載《社会主义評論》的回忆，还堂而皇之地附有我的一张照片。吃早飯的时候，蟹江翻看报纸，一下子看到那张照片，急忙把报纸藏过，才算沒有生出事端。

还有一次，蟹江的父亲从乡下来到东京，住了些日子；平常一向在一块儿吃饭的我，尽量避免和他谈话，总是快快吃完饭上楼去。可是有一天吃饭的时候，蟹江的父亲問起我的孩子，我却一不小心說出了真話，回答說大儿子在二十四岁上死掉了。这样一来，对方就說：“大令郎不是借用ミサカ岭这个称谓，取名ミサカの么？我到今天还記得很清楚哩。”他对于自己儿子的老师宇波先生，只听到說起，却沒有见过面，所以一心以为我这个老头儿就是汉文老教师。可是，不善于装懵懂的我，听了他这句话，却吃了一惊。我只知道信州有座著名的神坂岭，至于ミサカ这个山名的汉字怎样写，却不知道，心里着实发慌。

类似这样的使人发窘的事不断地发生，使得我经常不能不考虑再找一个条件比较好一些的地方。当时大概双方都觉得“吃闲飯的养不得，也做不得”吧。

同样从事地下活动，另外一些人同我比起来，就舒服得多。面貌不为反动当局所認識的人們，大白天都可以公然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只要有錢，就可以像一般人那样，要吃牛肉就去吃牛肉，要吃西菜就上西菜館，虽說潜入了地下，却和普通人一样在地上行走；而我却不成，因为大家都認識我，所以躲得連阳光都不能见，在这

一点上，牢獄生活反而自在得多。

風間丈吉

我在蟹江家住下来以后，平松照約定的那样每星期来看我。

当时在我看来，他的特色，就在于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儿非法运动者的神气。他容色健康，脸上还有两个酒窝，經常悠然自得。和我以前所遇到的知識分子或小資產階級出身而搞地下工作的人不一样，在他身上，看不出分毫提心吊胆、总像被追捕着的人的那种神气，也沒有一点长期从事艰苦斗争的人那种阴惨的神色、沉郁的表情和疲乏的样子。同时，他也不装腔作势，摆出了不起的样子，也不自吹自捧。

我整天呆在屋子里，从早到晚写着东西。为了让平松带起来方便些，我总是用小字写在薄紙上；尽管这样，每次把写好的东西放在一起装进封袋时，因为頁数多了，所以总还是厚厚的一袋。

交给他的时候，我說：“让你担风险了。”

他很随便地說：“人家都不認識我，所以还好。”一边說，一边把封袋塞进褲子后面的口袋里，还用手掌嘯嘯地拍了两下。他那不摆架子、不装腔作势的样子，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由于我看惯了“全协”那些还没有成为党员而举动却异常警惕的人們，我总以为对方的地位并不怎样高。

他一次也沒有对我讲过刺激、激励或令人兴奋的話。至于理論上的爭辯、时事的討論、党內的情况等等，自然更不談了。他把需要办的事情办完之后，就同我讲讲莫斯科紅場上的示威游行，或是低声給我唱个国际歌，有时还一块儿吃頓午飯，一同消磨時間，就仿佛到我的地方是来玩儿似的。

我呢，听信了杉之原的话，一心以为他只是编辑《赤旗》报的一个党员，最多也不过是中央候补委员而已。我把我自己这个党员评价得很低，所以也把直接到我这里来做联系工作的人看成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可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这位平松却原来是担任着当时日本共产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党内最高职位的风间丈吉。他在故乡的小学毕业以后，十五岁那年来到东京当铁工，二十三岁那年，因为参加罢工而被开除，第二年（1923年）就去俄国。后来他在俄国呆了六年，在莫斯科的东方共产主义大学毕业以后，1930年12月，正当我忙着搞新劳农党的解散运动的时候，他回到了日本。第二年（1931年）2月，他和紺野等从事重新建党的工作，成为党中央的负责同志，那一年6月起，又当了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我和他碰头过好些次，他从来没有表示他是居于这样一个地位的人，甚至连暗示都没有暗示过。直到我被捕之后，才从检察官嘴里听到这事，当时我觉得十分出乎意外。

我交给他的东西，除了党具体叫我搞的文件之外，大半都是关于《赤旗》报的内容以及编辑方法的意见书。

关于《赤旗》报，要说的话多得很。首先，我看到它的非常不高明的编辑技术，早就替它着急。我年轻时候曾经编过《读卖新闻》，新劳农党时代又曾一手包办了《劳动农民新闻》的编辑工作。不仅如此，由于我对印刷方面的技巧，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感到兴趣，所以看到《赤旗》报那种四不像的编排方法，脑子里不断地想着：这里可以这样，那里可以那样。只要一有空闲的时间，我就一一举例加以具体说明。

照我看，即使在文字内容方面，也有不对头的地方。比方说，记得前面也曾提到过的、共产国际的新纲领里，把西洋人该说成

“面包”的地方，譯成了“rice”。这当然是由于日本人平常吃的不是面包，所以为了避免“为面包而斗争”这句话而那样译的；这里所谓 rice，并不是指“米”，而是指吃饭的“饭”，也就是“生活”的意思；但是中央委员所写的文章里，竟把“为 rice 而斗争”误解成为当时在农村里展开的贫农的“饭米斗争”。当时我觉得这是大成问题的，感到非常遗憾，这件事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再说，在写文章一向讲究修辞的我看来，《赤旗》报里有许多文章，简直不成气候。本来，文章应该力求写得浅近明了，使大家一看就懂，可是《赤旗》上的文章，艰涩难懂的很多，而且每篇文章都缺少一股力量。每到空闲的时候，我就把我所感到的内容上或文章上的缺点，一一仔细指出。“等着瞧吧，不久我就会使《赤旗》报面目一新！”这样想着，我暗地里还不禁痒痒哩。

10月8日，平松第四次来到我的地方。这一天恰好是大森抢劫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那天他对我说：“今天有些忙”，不多一会儿就走了。上次来的时候，他满不在乎地把党叫我写的一本“李顿调查报告的批判”的小册子带了走，这一天呢，他却没有把我一星期来写的东西立即带回，只对我说，因为忙，暂时不能按时来，将另外派人来接头，那个人经过一定的考验，可以信任的，两三天以后就派他来，那时可以把这些稿子交给他，《国外通讯》以及其他资料，都将叫那人送来。交代了这番话以后，他随即走了。

10月6日发生的大森抢劫事件，我已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了，那是在大白天里抢劫川崎第百银行大森分行的钞票的事件。那天下午四点钟，银行正要关窗停止支付，行员正要结算现钞的时候，闯进三个二十多岁的西装青年，拔出手枪，对准行员，抢走三万多元的现钞，满不在乎地离开了白昼人来人往的大街。这在日本还是空前未有的事，那些人的行动的大胆和手段的高明，震

动了整个东京，据报纸上说，也使警察厅大吃一惊。其实呢，这是日本共产党干出来的事，而且是与警察厅保持密切联系的官方奸细钻进了党的心脏部之后，为了使党的威信扫地而早就有计划地进行着的事。

当时本来预定在10月底开日本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反动当局似乎准备在那个时候制造一个大逮捕的最高潮，在此以前，嗾使那个率领匪徒钻进党内、并且占据中央常务执行委员要职的奸细松村，警惕着不要露出奸细的马脚，要竭力设法使党内一切秘密的暴露从表面上看来仿佛都是检察程序的自然结果。大森抢劫事件有关者的逮捕，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也是费了很大的事，逐个进行的。可是到了10月底，把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时齐集到热海来的全国各地的中坚分子一网打尽了的时候，就让松村以及他手下那批人完全脱下假面具，放手利用他们在党内进行造谣破坏。后来就引起了党员和党员自相残杀的事件，破坏了党员相互间的信任，最后使党的组织全军覆没。就这样，1932年夏天从党的外围同情者开始的大逮捕，到此才算结束。而大森抢劫事件，是其中的一幕，不过是反动当局为了破坏党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而想出的一种办法罢了。在这个事件里，我的小舅子大塚乃是实行的最高负责人，二女儿芳子也受到大塚的指挥，和该事件多少有些关系。不过，这方面的详细经过，几年前我在《狱中记》里已经详尽地讲过了，现在对它不再感觉多大兴趣，所以就省略了。

由此可见，平松最近开始提高警惕，乃是由于大森抢劫事件发生以后，东京的警察网顿时整个动员了的缘故；他说工作忙，指的则是全国代表大会迫在眉睫这件事。可是，会期越近，他被捕的命运也越近了。

代替平松到我的地方来的，是个高个儿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他

看来是个知识分子，化名是清水。（六年后我才知道，这个青年是我从前教过书的京都帝国大学出身，真姓是藻谷。不久他也被捕，判了两年徒刑而缓刑了。）

他是个极沉默的人，即使来到我的地方，只呆一会儿就走了。每隔四、五天，他就来一次。自从他来过以后，平松一次都没有再来。

“这一向平松老不来，是什么道理呢？”我问道。

他仅仅回答说：“大概因为他现在非常忙。”

当时将近 10 月底，平松事实上忙得不可开交。清水大概是知道平松在党内的地位的。

但是，清水也只来了三、四次，不久也像断了线一般，不再来了。

初次会见奸细松村

好久不来的大塚，10月10日突然同了两个人来到我的藏身处所。这个地方照说不该让别人知道，可是在危急之际，他万不得已采取了这个办法。

大森抢劫事件是10月6日发生的，当下警察厅就动员了全部力量，积极开始搜索犯人。形迹可疑的人到处都受到盘问，各种犯罪者和嫌疑犯都被抓了去。内中有一个抓在牛込区神乐坂警察署里的私贩手枪的人，供出9日上午约定一个人做一笔交易。警察当局为了慎重起见，派几个便衣侦探暗暗跟在那手枪贩子后头，在约定的时间，去到约定的地点，放他去作钓饵，这时果然有个穿西装的青年，站在那里，像等候什么人那般的。便衣侦探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抓起来，抄出他那胀鼓鼓的口袋里的钞票一看，簇新的钞票

中間，竟夾雜着所要搜的連號鈔票的一部分。這個形迹可疑的買手槍的人，毫無問題是和森搶劫事件有牽連的了。便衣偵探們對於這意外的收穫，高興非凡。

銀行里被搶走的鈔票，當然並非全都知道號碼；唯獨搶劫事件發生的那天日本銀行直接送交川崎第一百銀行分行那一部分新發行的鈔票的號碼，是知道的。那個形迹可疑的青年的袋子裡的鈔票，其中就發現有那些號碼，便衣偵探自然高興極了。

捉住的那個青年名叫今泉善一，是個共產黨員。他從前從來沒有被捕過，被警察一拷問，馬上就招供了。

事後不久，街頭賣號外的鈴聲就震天价響起來。號外上說的是：森搶劫事件是日本共產黨干出來的，犯人中間的一個已經捉住了。

這個事件的真相，警察廳的重要官員在事件沒有發生以前早就預先知道，可是報館方面和一般人（他們當然是通過報紙），却直到今泉被捕後才知道那是共產黨干的事，都不覺大吃一驚，感到出乎意外。

這且不去管它。今泉被捕的號外，使與該事件有關的黨員們受到很大的震撼。

那時黨內設有一個房屋資金局，總負責人就是那個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松村奸細，房屋資金局下面分資金部、房屋部、地方部、調查部四部，今泉是房屋部的負責人，還兼管資金部內新設的事業部（這個部的任務，是利用智能犯的手段或暴力犯的手段，獲取大筆資金）。

今泉沒有好好地讀過什麼書，也沒有多少鬥爭經驗。他生長在東京，小學畢業剛進中學，就中途退學了，後來進了築地技工學校的夜校，1928年在那個學校的建築科畢業了，當了大藏省（財政

部)營繕局工務部的制圖員, 1931年离职后, 当了黨員, 是个党龄还不滿一年的二十二岁的青年。自从和松村搞上关系, 松村賞識他会出坏主意, 认为是个大可利用的青年, 就拼命提拔他, 加以重用, 甚至让他爬上党中央的領導地位, 最后当上了中央候補委員。想到这点, 我过了五十岁才被吸收为黨員, 还高兴得淌眼泪, 就显得太可怜了。

大森搶劫事件发生后, 第一个被捕的黨員就是今泉这样的人, 对于反动当局倒是一件可庆可賀的事。他一經警察厅拷問, 就垮了, 接連好几天之中, 把党的一切秘密原原本本、統統招了出来。他把他所参加的秘密工作范围内的事, 例如党的办事处、《赤旗》报的印刷所、黨員的藏身处等等, 推而至于党的組織、人事、設備、資金网、各种联系、秘密地址, 还有房屋資金局事務部的整个中心任务, 应有尽有地招供出来了。他那异常正确的記憶力, 使他的口供發揮了百分之百的奸細效果。他虽則不是有意識地钻进党来做奸細的, 但是实际上却起了最大的奸細的作用, 把重大的秘密一下子全都泄露出来, 使得那个本来的奸細松村能够保留他那张画皮, 直到許久以后。——今泉被捕不久, 担任袭击銀行的两个黨員西代和中村在芝公园里的藏身处所, 就遭到了搜查。

在这样的情况下, 要想在党的办事处聚首談話, 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 大塚仓卒之間为了应急, 不得已把石井和百瀨两个黨員帶到我的藏身处所来了。因为一切秘密全都知道的今泉, 独有我的住址还不知道。

这是今泉被捕后第二天, 即10月10日的事。这天大塚混身改了装; 几天沒见面, 可怜他瘦得像另外一个人了。我心里捉摸, 这几天中間, 他不知怎样操心了哩。

他把石井、百瀨两人領进我的屋子, 瞧都不瞧一眼我給倒的

茶，三个人坐在屋角里把头低低地凑在一起，轻声地只管商量着什么。

前面已经讲到过，因为我屋子里放着一张大床，北窗下留出的空地只有一点儿。我把矮桌子挪到另外一个角落里，尽可能使己不听他们讲话。闲着没事做，只好一枝接一枝地抽蝙蝠牌香烟，无目的地打量着大塚带来的两个人。内中的一个，坐在那里就可以看出是个和大塚差不多的高个儿。几年之后，方才知道那人就是党员石井正义，资金局事业部第一课的负责人，和大森抢劫事件有直接关系。我们后来在小菅刑务所里曾经碰见两三次，还谈过话。另外一个，皮肤白得像个女人。他化名百瀬，是奸细头子松村手下的匪徒，这也是直到后来才知道的。

过了一会儿，楼下有人来找我。我的住址根本没有人知道，宇波这个党名也是秘密的，怎么会有人到这里来找我呢？我心里正在奇怪，下楼去看看风色的大塚，说一声“你来得正巧”就高高兴兴地把那个人领了进来。这样一来，我也就并不感到不安，却始终弄不懂：那个人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究竟是来看我呢，还是来看大塚的？

新来的那个人，年纪大约三十上下，穿了一身潇洒的西装，容貌俊秀，可是我却看不透他究竟是知识分子出身呢还是工人出身。不过我马上就留心到，将近四十岁的大塚，对于这个年纪比他小得多的人，态度十分恭敬。大塚以前领平松（风间）来的时候——也许是他也同样不知道平松在党内的地位吧——一点都没有表示出这种态度。从前我和平松直接会面过许多次，始终以为他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而当我看到这个新来的人时，却马上就觉得他一定是位中央委员了。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奸细头子松村，房屋资金局的全部大权就掌握在

他手里。现在回想起来，大塚对他那番恭敬，是可以理解的；他所以知道我的住址和党名，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他来到以后，四个人就以他为中心，继续商量着什么事情。我离开了自己的矮桌子，坐在床角，尽量使自己离他们远些，不去听他们讲话。

我光对那个新进来的人注意观察。肤色苍白，生得不肥不瘦，长方脸绷紧着，显出聪明的样子。露出在洁白的衬衫袖子外边的那双手，也是瘦瘦的，手指又白又细。他对大塚他们几个人说话时，神气十足，地道是上级的架子；那招待来客用的唯一的座垫，也由他占用。

石井和百瀨不久就走了，松村和大塚留下来和我闲扯了一会儿。当时松村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给我作为目下的生活费。我想这张钞票或许也是抢来的，所以尽管是张用过的旧钞票，我仍然把它装进信封里另外收起来。

后来松村和大塚一道走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松村又来了。这次他拿来一只黑色大皮箱。他连钥匙一并交给我，说箱子里装的是党的秘密文件，要永远寄存在我的地方，所以可以随意取出来看；《赤旗》报也几乎是全份，一期也不缺。

他还亲自把皮箱打开，说“连这些东西都装在里面哩”，就取出“国际共产党日本支部、日本共产党”、“国际共产党支部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印鉴给我看；又说“化学部也曾试制过这种东西”，说着他就用无色墨水写些字，擦根火柴点燃十分易燃的纸给我看。

当时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对方是个犬奸细的我，对于正在那样异常危险——警察的警戒网百分之百地动员了——的当口、大白天里满不在乎地提着装满那类违禁品的大箱子来看我的他的大

胆，只有叹服而已。

閑扯了一会，他就走了。从談話中間，知道他也是莫斯科回来的。

在他走后，我翻看了一下箱子里的东西，发现其中有佐野学、鍋山貞亲等人(那时他們还拘押在市谷刑务所里，沒有判决)关于党的政策的意见书。看上去，似乎是什么人在探监时听取了他們的意见而作的汇报。当时完全不明白日本刑务所內情的我，看到这些文件，还只当作平常所傳說的监牢里照样可以和外界取得联系一事，果然是可能的呢。可是，等到后来自己拘留在市谷刑务所，才知道連和家属见面时，看守长都站在旁边把談話內容記錄下来；不仅这样，有时还用“这种話不許讲”的話头来打断家属的談話。就像这样，探监談話，在時間上和內容上都有严格的限制，党的政策之类，更不是可以随便談的。我亲身体驗了这一点之后，不由得疑心同样坐牢却似乎意外自由的佐野那些人，那时已經在轉化为党的叛徒了。

大塚他們在我的地方碰头商量的結果是，由于目前形势险恶，大塚和石井可以完全停止活动，只和百瀨保持联系。这可能是依照松村的意思而作出的决定。光和百瀨联系的話，石井和大塚就等于已被警察厅捉去了。

老母进京

那时我的二女儿芳子，由于大塚的召唤，从大阪来到了东京。大森事件发生前不久，她曾被派去和西代接头；事件发生的那天，她为了掩护从西代手里接了鈔票的大塚，曾穿着盛装和大塚同坐一辆汽車逃走。这些話，当时大塚都沒有对我讲。他只是露了一些

口风，說芳子最近似乎已来东京工作。等到大森事件进行完毕之后，他才告訴我，他已經把芳子帶在他身边了。至于具体的情况，他一点也沒有談到；不过他是我完全相信得过的，所以我想，一样搞非法运动，芳子还是在她舅舅跟前工作，最为安全可靠。

“阿芳如今变得很坚强了。”他說。

我只能凭这样一句話，来想像我女儿的生活。就这样，虽則同住在东京，却不能见一个面，她究竟在什么地方、怎样地过活，我完全无从知道。

岂仅是这样呢，連千里迢迢乘了火車从家乡山口县岩国市来到东京的老母，我也終于未能见上一面。后来我一想到当时的情形，总是觉得那一次实在对不住我那上了年紀的老娘，感到一种哀愁。

1929年的春天，我曾回到故乡去过；从此以后直到今天（1944年10月），再也沒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故乡。

“山村一去路千里，云間空望阿母家，誤作风尘場里客，十年不见故乡花。”

上面这首詩，也已經做了四、五年了。

1929年我回故乡，是就訪問住在同县厚狭鎮的細迫兼光的父亲之便，那时山本宣治刚被暗杀。新劳农党創立后不久，那年（仍旧是1929年）冬天，我又和大山郁夫等一同到九州去演說，可是那时虽然坐在火車里看到窗外不远的似曾相識的故山风光，来回都沒有時間下車去看母亲。一过年，1930年正月，沒等到过年初五，全家就搬到东京去了。

岁月如流，1930年过去了，1931年又过去了，等到1932年夏季将尽，母亲为了要看看我，想到东京来。母亲从前只来过一次东京，在这帝国的首都，沒有好好玩过，我想趁她身体还健康的时候，

让她从从容容地把大东京玩个暢快，所以写了一封信去預先表示欢迎。母亲的朋友們听到她不久就要到东京去玩，大家都羡慕她有个好儿子，太幸福了。

可是，我自己却由于前面所說的情况，不得不在那年夏天突然离开家庭。当时我的弟弟左京，为了让孩子們在乡下过暑假，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回到故乡去了，我妻馬上給他去了一封信，希望他如果可能的話赶快来东京。但是，为了怕泄露秘密，信里沒有对他說起我离家的事。因此，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种事情的左京，等到孩子們快要开学、从故乡回到东京时，才知道了这个情况，不禁吃了一惊，深深觉得事情不好办。

至于母亲呢，因为9月初天气还热，准备等左京他們动身后，自己緩一步进京。可是，本想同母亲叙叙久闊的天伦之乐的哥哥不在家，母亲纵然特意来到东京，也沒有什么意思，因此把左京弄得沒个主意了。9月21日他在西川一草亭的別墅里和正将搬到党所指定的藏身处的我分手后，第二天立即又单身回到故乡，因为他打算不管怎样，见了母亲，把情况对她讲清楚，一切等商量过后再决定，先宽一宽母亲的悲伤情緒再說。

乡下地方和大都会不同，無論什么事情都容易引起別人注意，一点小事情也会成为傳說的材料。左京怕刚刚进京馬上又回到乡下这件事，有点不自然，会使人家大惊小怪，他——他是水彩画家——就借口說是繪画工作还没有結束，前次只是送妻子、孩子到东京去而已，就这样又回到乡下。母亲了解到詳細情况之后，觉得在这个当口去东京，也沒有办法，可是，如果突然中止进京，对亲戚邻舍方面又不好說。再加，在这种时候，一个人呆在乡下，更觉气悶，还不如借此机会作一次旅行，去和儿媳妇談談，也好解解悶。因此，等左京画了几天写生画，就和他一块儿照原定計劃动身来东

京。这时她本人心里虽则怀着无限的不安，左邻右舍的老太太們却非常羡慕她，还以为左京是为了迎接母亲特意回家来的，老太太的福气多好呀。

左京同着母亲来到东京的时候，10月已經过去一半了。我只是从同我妻保持联系的大塚口里知道了这件事，可怜同我母亲一面也不能见到。我借用亲戚中的一位女人的姓名，写了两封沒有署名的信寄給左京的妻子让她轉。信的内容大致是說：特意来到东京，我因为生了重病，身体动弹不得，所以不能来看您，非常遺憾。目的是，见面既然不可能，那末让母亲看到儿子亲笔写的信，也算尽了我的一份心意。

在藏身处写的《新綱領》的解說。

岩田义道之死

前面說过，平松(风間)自从大森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10月8日)来过以后，一直沒有再来；不仅如此，連替他来接头的清水，不久也断絕了踪迹，左等右等也不来。

大塚也是如此。仅同百瀨保持联系的他，在約定的時間两次去到約定的地点，百瀨两次都沒有去，心想百瀨終于也被捕了。只此一根的綫头也断掉了。——那末，大塚既是大森事件最主要的参加人，还沒有被捕，为什么奸細百瀨当时不設法引他上鈎，让警察当局抓他呢？那是因为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于10月底开幕，要乘那个机会充分發揮奸細的作用，所以必須暂时等待一下；要是能避免的話，必須慎重避免引起同伙的怀疑。老练的大塚，也許松村都防他一着。因此不仅把大塚逐出房屋資金局事业部，而且經過周密考虑，有計劃地切断了了他的一切联系。从这一件事情上也可以

看得出来，有时为了充分发挥奸细的效果，会故意对某些中心人物，放他一马。可是，后来大塚被捕，仍旧是百瀨把他引出去的。这在以后还会讲到。

10月过了，11月也过去好多天了，可是左等右等，除了大塚而外，一个人也没有到我那里来。据报纸上说，大森事件的主犯、被同志们称为“爸爸”的，到现在还没有捉到，警察方面正在积极搜捕。尽管这样，他仍然冒着危险一次次来看我，照料我的生活。可是，他本身和党的联系也断绝了，所以恢复我同党的联系一事，一时也就无从谈起。

平松同我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曾托我为《新纲领》写几本浅近的宣传小册子，解释它的内容，因此，我每天从早到晚呆在楼上那间铺六张席垫的屋子里，倾注全力写着。为了尽可能用浅近而流利的语言文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基础上、把它写成《新纲领》的完善的解说书，我绞尽了脑汁。因为现在已经潜伏于地下，所以没有必要再怕人家看出是我的笔调，也没有必要顾虑受到检查，真是随心所欲地要怎样写就怎样写，痛快得很。我一个劲儿地写着，丝毫不觉得疲倦。结果，我桌子抽屉里，誊清过的稿子越积越多了。

《农民的革命出路(农业革命)》；

《革命的展望(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人民革命是什么(工人和农民的专政)》；

《所谓打倒天皇制指的是什么？它的意义何在？》；

《大东亚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的展望》。

——我把上面那些文章，都用小楷端端正正地誊在薄纸上，用线订起来，加上封面，并且按照写作的次序标上(1)、(2)、(3)、……

的記号。一想到我写的这些文章不久就将以党的名义一篇篇地印发，就觉得任何艰难困苦都是值得的，并且独自庆幸以文章立世的我，总算沒有白白活在世上。一向只知道讀書写文章的我，到了晚年，竟有机会专心一意地搞这种工作，用自己的一枝笔，多少参加即将到来的伟大的革命事业，作出点滴的貢獻，这真是太幸福了；为了这个事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我都不会后悔的。——我这样独自私心欣幸着。

可是，只靠一个綫头同党中央相联系的我，因为自己不能到外面去，所以尽管写出了那許多稿子，却沒法摆布它。

直到后来才知道，当时为了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而忙得暂时沒有能来看我的平松(风間)，在大会刚要开幕前的10月30日，早就被捕了，清水也在这前后被捕了，所以，实則无论等到什么时候，他們再也不会来了。不仅这样，全国代表会议即将开幕的时候，由于突然剝下了假面具的奸細松村等的暗中活跃，党的一切机关，在由于今泉的招供而受到相当沉重的打击以后，又一次遭受了全面、彻底的破坏，所以，无论我写出了什么，收受这些东西的中央机关已經不存在了，而且印文件的机关以及頒发这类文件的組織，全都被消灭干淨了。我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被切断了一切联系，就像漂流在汹涌的狂瀾中的一叶扁舟，却还蒙在鼓里，只管伸长了脖子一心等着恢复联系呢。

由于一切消息都不許发表，报纸上什么都不登出来。仅仅根据《讀卖新聞》的特別消息——尽管有些地方都打了××——知道中央常务执行委員岩田义道在东京被捕，第二天受到警察厅的严刑拷打，瀕于死亡，第三天送进警察医院，第四天11月2日的午夜，终于气絕身死。

岩田的入殮，是由他的遺族在5日下午举行的。我家里也接

到他突然逝世的訃聞，我的妻算是代表我，參加了入殮儀式。至於岩田和我的關係，前面已經詳細講過，這裡就不再重復了。

我的妻趕到靈堂的時候，岩田的遺骸已經解剖完畢，纏上了白布。他的妻子解開白布說道：“請您看看吧！”一看，原來大腿部腫得不成樣子，皮膚呈現紫醬的顏色，簡直慘不忍睹。看上去，似乎是用特種拷打刑具壓死的。根據安田博士給我妻看的備忘錄，昨天解剖的結果是這樣的：

1932年11月4日，東京帝國大學病理學教室。解剖號195。

岩田義道，年35歲。

體重64公斤。

身高160厘米。

腦髓重1445克。

心臟重375克。

心臟非常大，脂肪堆積着。心筋：右心，0.5厘米；

左心，1.0厘米。

右心室擴大，心筋薄，大概這就是死亡的原因。

肺臟無顯著變化。沒有肺結核。臟器擴大，且有出血。

胸腔內有大量出血。

腹腔內沒有出血。

胃腸以及其他內臟器官沒有顯著變化。但是各種器官都有部分出血。

下肢：大腿部前面後面都有顯著的皮下出血。這大概是死亡的導因。

上肢：處處有皮下出血。

參加入殮儀式的，前前後後有一百多人，其中有個認識大塚的，後來遇見的時候，把入殮那天的情形詳細地告訴了大塚。

大塚來到我的地方說：“真是，到處都會碰見熟人！昨天走在路上，遇見一個熟人，他談起了岩田入殮的情況。‘河上先生的太太也去了。我想，河上先生要是在家的話，什麼都會照顧到的。’看來姊姊是去了，所以他才講那樣的話。他還不知道我們是姊弟關

系哩。”

报纸上虽然只发表了岩田惨死一事，可是后来大塚从他交好的新闻记者(以后还会讲到的原鼎)那里听到，10月30日，来到热海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遭到了搜捕，重要干部似乎大半都被捉去了。因为一切消息都禁止发表，所以详情不得而知；可是，外边在刮着颶风这一点，却多少有些感觉出来。于是我们开始猜测，平松和清水说不定也都被捕了。

“在形势没有弄清以前，您暂时读读书吧。我觉得我也得小心一些，所以此后不能常来看您了。以后让您所认识的內田每星期来一次吧。要钱用的时候，可以叫內田去和姊姊联系。”

“这样很好。要是现在你被捉去，我就成了没脚蟹了，所以即使为我着想，你自己也非求一个绝对安全不可。”

我和大塚两人，就作了上面那样的谈话。

內田名叫丈夫，是刚从高松商业专科学校毕业的青年，那时还刚开始从事左翼运动。他的母校里，有我的学生和好友堀江邑一在那里教书，所以当我还住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就已经和內田见过几次面。自从他来和我联系以后，我曾请他把家里的《列宁全集》取了来，还请他给我到家里取生活费，从他那里获得了生活方面必不可少的帮助。这样的关系，一直继续到我被捕时为止。

知道我无论怎样等待也不能重新和党恢复联系的蟹江，不久就开始感到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我觉察出他在盼望我在没有出事以前快快搬到别处去。

有一天傍晚，他下了班回来，一到家就形色仓皇地奔到楼上，对我说：“附近路口上有两个便衣偵探模样的人在徘徊着，不要紧么？”过了两三天，又买了黑布来，把我那间屋子的西窗遮上，说是这是为了防止夜里灯光露出去。其实，哪家人家夜里没有灯光

露出去？他那样小题大做，我不是不明白他的用意。

即使他不这样，我已经觉得这家人家呆不下去了，等他做出了这番举动，我就更加觉得一天都呆不住。我这个人的脾气，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自己所讨厌的人求情，也不愿意硬叫人家麻烦，更不愿意乞求别人怜悯。好久不来的大塚有一次来了，我立即把情况告诉了他，希望马上搬家，托他尽力设法。大塚自身正在走投无路，我并不是不知道，可是我一步都不能走出门外，除了麻烦他而外，更没有别的办法。

“像这样的時候，正应该多照应一下才是，岂知相反，真正岂有此理。”大塚对于蟹江的态度也表示很气愤，可是，两个人无论怎样气愤，又有什么用处呢。

幸而办事敏捷的大塚，不久转托了一个朋友（后来才知道是当时在《国民新闻》当记者的原鼎）给我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那是一位叫做椎名刚美的日本画家的家里，他家只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不过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很小，不能容纳房客。再加我特别喜欢洗澡，既然不能到澡堂里去，家里非有浴室不可。幸而这家人家夫妻两个性情都非常和善，而且他们又正当贫困的时候，所以如果我每月付给他们五十元的宿费，这对于他们来说，倒可以贴补一下家用，因此，一经委托，并且说明了全部情况，他们连自己得先搬一次家的麻烦，都愉快地接受了。

当我一接到安身之处已经找到的消息，就仿佛重新苏生过来一般，马上通知蟹江，住满 11 月搬走。

迁居到画家椎名家

大塚为了给画家找房子，东奔西走，终于在中野区住吉町的

一个胡同里找到一所适当的出租房屋。地点在尸塚經由小瀧桥到落合火葬場去的那条馬路中段折往左边不远的地方。走进大門，二門口一进去就是起坐間，再走过一間类似儲藏室的鋪六张席垫的屋子，最里边是个鋪四张半席垫的单独的茶室^①。这个茶室虽則狹小了些，主人的画室也只好将就放在那里了，而楼上的一間鋪八张席垫的屋子，就租給我。上楼去的楼梯，設在起坐間旁边的过道里，楼梯旁边是厕所。楼上东、南两面都有窗，天晴的日子，阳光很好，对于成天呆在屋子里而又最怕冷的我，确是一間最合适的屋子。

楼上东面的窗子靠近邻家，大塚就让那时和他住在一起的芳子做了一个黑布窗幃，挂在东边窗上。重新又买了一张矮桌子和一个陶制火鉢（在蟹江家买的那张矮桌子，走的时候送給他家了）。被褥托画家的太太代办；因为我个儿高，褥子做得比普通的长，里面棉絮鋪得厚厚的。为了让我暂时有个安居的地方，自身都极不自由的大塚，在我搬家以前，却为我費尽了心机。

由于要做这种种准备，所以我的搬家比預定的日期拖后了些日子，直到12月6日才好容易迁出蟹江家。

在蟹江家多住了六天，我付了二十元的寄宿費。而蟹江呢，則在最后那天吃晚飯的时候，第一次为我从附近的西菜館里叫来了西菜（說說都难以为情，这是这家人家第一次給我吃牛肉），可是那頓飯，我已經不能安心地受用了。他还送我一件猫皮长背心作为临別紀念。这件东西是非法运动时代的唯一紀念品，到现在还保存着，每到冬天，我总把它穿在身上。

剛吃过晚飯，大塚和內田就来接我了。

^① 茶室是举行茶会的地方。——譯者

和主人告別的我，居然也产生了一种惜別之情，临走还再一次地把自己藏身的那間屋子看了一遍。挂在西边高处小窗上的那块黑布，仿佛給我留了一个紀念。北窗外的梧桐，叶子已經落光。9月底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碧綠的大桐叶正掩映在电灯光下，才不滿八十天，已經发生了明显的新陈代谢；物犹如是，人何以堪！

我們三人坐了汽車出发。汽車穿过明治神宮的外苑，經過新宿，沿戶山原的西半边向北駛，不一会儿就过了小瀧桥，向左轉弯了。八十天沒有看到街景的我，犹如坐在游览車里的观光客人，不住地貪看着窗外的景色。我虽則完全不熟悉东京的地理，可是明治神宮的外苑，却由于几次来这里的球場看过棒球比賽，倒很熟悉。还有新宿以北的地区，我也很熟，因为从新劳农党时代起直到今年离开家庭时为止，我一直住在西大久保，經常到这个地区散步。过了小瀧桥到落合火葬場那条馬路，去年送故友吉川泰岳的遺骸来焚化时，还曾走过。街头已經籠罩上一层夜色，电灯光照得四下通明。对于这个暂时不会再看到的車窗外的夜景，觉得可恋得很。

不久来到椎名家的楼上歇下了脚的我，就仿佛是到了亲戚家里一般。仅仅同主人——画家——和他的太太见了一个面，我就觉得他家同蟹江家的情味完全不一样。

摆设間里挂着主人画的一幅山牛蒡，画軸前面放了一个小花瓶，瓶里插了寒菊。素来爱花卉的我，几十天沒有见到这样的鮮花，一眼看到这瓶花，高兴非凡。那幅山牛蒡也画得不差。

看来有些神經质的主人，偷看了一下刚坐下来的我的脸色，很客气地說：

“要是您不喜欢那幅画，把它卸下怎么样？”

“不，不用卸下，让它挂着吧。我是爱好画的。”

我边这样回答，边重新仔細观看这幅据說是主人的旧作的山

牛蒡花。裱得虽則粗糙，可是这幅实物写生，笔調却很生动而沉着。

看到我十分滿意的样子，大塚似乎卸下了千斤重担。

“这样一来，就完全定性了。多謝多謝。”我回头对大塚表示我感謝的心意。

大塚也高兴地說：“这下我也放心了。”

我在画家楼上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嘴馋的我，在椎名家一住定，馬上就托他們給弄牛肉火鍋。我本来见了人就拘拘束束，现在居然叫他們給做牛肉火鍋，这完全是由于一到他家就觉得同他們很合得来的緣故。年紀快近七十岁而仍然馋嘴的我，第一件回想起的事情就是牛肉火鍋了。

迁居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上，我就約了大塚和主人三个人吃牛肉火鍋。尽管事先告訴他們，除了牛肉和米飯而外，什么都不要，可是椎名太太却給我們准备了湯、紅烧鯛魚、酱菜等等。自从离开櫛田家，到现在差不多一百天中間，一直沒有吃过牛肉鍋子的我，那天大吃了一頓牛肉。和牛肉煮在一起的煎豆腐也是我所爱吃的。再加椎名太太一手好庖厨，做出来的湯也鮮美得很。我不仅把这些东西全都吃光，飯后还吃了厚厚几片带来送給他家作为见面礼的羊羹，真把我好久沒有滿足的饥腸塞得滿滿的了。——那次享受到的味觉，我永远忘不掉，直到六、七年后，徒刑期滿从监牢里放出来，我还曾到他家去作客，要求再給吃一次椎名太太亲手做的菜。可惜那时我稍一走动，就会发烧，到他家作客的当天，就发着高烧，无论吃什么东西，嘴里只觉得发苦，所以特地为我做出来的好菜，也沒有能好好欣赏。据椎名最近来信說，他的太太因病在1944年10月16日下午11点30分死掉了。这样，从此以后，永远也不会再尝到椎名太太做的好菜了。还记得，十二年以前，当我

边吃牛肉鍋子、边赞赏椎名太太的好庖厨的时候，她说：“虽则多少懂得一些做菜的方法，可是家境不好，又有什么用呢。”弄得坐在旁边的她的丈夫只好苦笑笑。这番情景，至今犹如昨天的事情一样，真不胜今昔之感。

自从搬到椎名家以后，飲食方面的不方便，完全解除了，吃闲飯的心情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每天只有中午那一頓独自在楼上吃。规定好那頓总吃面包，面包是由椎名太太从新宿的中村屋买来的。火鉢上烧好开水，可以自由自在地沏我所爱好的紅茶喝。飯后的甜点心經常不断，也是托椎名太太买的。

就这样，我的生活完全安定了下来，可是，和党的联系却没有能恢复。

实际上，那时对党员的逮捕，还犹如燎原之火，到处延烧着。这一年所开始的大逮捕，一般称为“第三次共产党大逮捕”或“非常时期共产党大逮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之一——全日本被捕的人数达七千名，就中10月30日袭击全国代表大会那天，热海、鎌仓、东京等三府十八县一齐下手，党的中央常务执行委员长风間丈吉和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岩田义道都在同一天被捕了。换句话说，党中央在一个月以前，就已像巨大建筑物的栋梁在火灾中崩落下来那样地崩溃了，这个时候，火灾的余烬还在冒烟冒得厉害呢。而我呢，却还是連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同党的联系，已經根本无从恢复了。我心里只是暗想：“平松和清水大概都被捕了，可是过些时候，上面大概会設法来跟我联系的吧。”所以在迁到椎名家以后，我自动地写了几本准备給党出版的宣传小册子的稿子：

《国家是什么？》；

《我們因为爱日本，所以在现阶段才是战敗主义者》；

《貫徹国际主义》；

《馬克思的伟大‘空想’的实现(苏維埃联盟的发展)》。

这些稿子写好以后，就在上面标上(7)、(8)、(9)、(10)等号碼，郑重其事地收藏在抽屜里，盼望着恢复同党的联系的日子早日到来。

因为白天不敢在窗口露面，所以在窗栏干上晒被褥，都得麻煩椎名太太。等到天黑，我才敢靠在栏干上观看窗外的景致。住吉町恰好地势很高，一到夜里，新宿的三越、伊势丹、三福等百貨公司的大建筑物上面的霓虹灯，都可以看得见。那时我的妻退掉了西大久保的房子，在同一中野区的相生町找到了一所小小的出租住宅，和新雇的一个女佣住在一道(呆在我家很久的女佣阿君，那时辞走了)。几年之后，我妻曾經領我去看过那个地方。从繁华的大馬路走进偏旁一条小胡同里，不多路就是那所平民化的楼房。那一带都是些灰不溜溜的破陋房屋，一排房子的那一头还有一家人家挂着“推拿”的招牌。可是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只在地图上看到相生町离新宿不远。我每逢远望新宿夜景的时候，就想到孤零零一个人在家的我的妻，她大概做梦也沒有想到我就住得离她那么近吧。

椎名的《二楼上的河上博士》

画家椎名后来在《中央公論》上发表的一篇《二楼上的河上博士》里，写出了他对我的印象，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关于这篇东西，文学家正宗白鳥曾經說：“《二楼上的河上博士》这篇小品文，用朴素的笔調活生生地写出了河上肇的为人，似乎引起了所有讀者的

兴趣。不过，讀过那篇文章以后，还該讀一讀《獄中独語》（这在后面就要讲到），那是一篇毫无矫揉造作的小說。”

现在我把他那篇文章的主要部分照抄如下。

* * *

我是一个无名穷画家，二楼貼出了余屋分租的招帖。有一天，一个风度翩翩的、大个子紳士来到我家問說：“府上有屋子分租，請让我看看吧。”他看过屋子，付下了几个定錢，就走了。

两三天后，那个紳士又来了，我把他請进会客室，他直瞪着眼睛望着我，平靜而严肃地說道：“那間屋子其实不是我自己要租。有个上了年紀的学者，他想租用这屋子专心从事翻譯和别的写作工作，得多多仰仗您啦。”

我当下就滿口应承了。

大約又过了三天，傍晚时候，雨刚停止，天空里阴沉沉地全是云，前天那位紳士領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又瘦又高的紳士和一个青年来到我家，他指着那位又瘦又高的紳士說：“以后要請您照应的，就是这位。”

一看，那位紳士果然很斯文，像个学者，而且給人一种說不出的令人可亲的感觉，使人不由地想叫他一声“老伯伯”。于是，我們全家人从那一天起，就叫他“老伯伯”了。

那天我在楼上那間出租的屋子里插了些寒菊。

老伯伯很客气地說过一番初见面的話以后，看到摆设間里供着的花，就說：“啊！好久沒有看到花儿啦。”瞅了一会儿寒菊，他又补上一句：“謝謝您。”

老伯伯說他爱吃牛肉，于是那天我就添了一个牛肉火鍋；一頓晚飯，全家人吃得都很高兴。（河上按：这里是为了怕反动当局找麻煩，故意把它写成这样的。另外还有几处，由于記憶錯誤，或

者因为描写技巧上的关系，也有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地方。) 飯后，我的孩子們好奇地睜大眼睛瞪着老伯伯送的一盒羊羹，时时看着弄着，很想吃的样子，我記起連謝都忘了謝，于是就对我妻說：“唉呀，还收了老伯伯的礼物呢。与其吃水果，还不如打开盒子吃这个吧。”让她把羊羹切好送上。

老伯伯一面露出他那长大洁白的牙齿笑着，一面拿起一小块羊羹，說道：“好久不吃牛肉鍋子，今天打破記錄，吃了四碗飯。牛肉鍋子是最最(“最最”两字讲得特別有力)喜欢吃的菜。”

随后他就去洗澡，洗过澡，閑談到十点钟敲过，他就悄悄地上楼去了。

还是讲吃的，我們后来尽可能給这位老伯伯做他所喜欢吃的牛肉吃。老伯伯高兴地說：“經常让你們忙，实在不敢当。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太太常常批評我，說我嘴上叫着要节俭，可是要家里給做牛肉火鍋，这就叫人难办了，牛肉火鍋是很不經濟的哩。”說完哈哈大笑。他还說：“我們家里有时就买碎肉吃。”我妻听了，笑着說：“今天吃的肉，不跟做碎肉的肉差不多嗎？”

老伯伯說：“哪里的話！”然后似乎想着什么心事那般地說：“請您不要再为我的口腹或别的什么而費心吧。現在我已經十分幸福了。”說毕，一語不发，一脸严肃認真的神气。

还有，他当时似乎非常疲倦，搬来的第二天睡了一整天，但是后来就好了，每天一清早就起身，然后做冷水摩擦，体操，洗脸，然后擦起衣服，擦地板，擦楼梯，有时甚至連厕所的門都細細揩擦了。我的妻只是每隔三、四天給他打扫一遍，除此而外，他就不让她插手，說是做点清洁卫生工作，也好活动活动身体。

早飯后，他总要在楼下呆一会儿，在銀烟袋里装上烟絲，津津有味地吸着，聊一会儿天。(中略)

老伯伯还爱吃甜食，酒一滴都不喝。饭后送上甜茶点，他尽管推说：“这一阵饭量增加了，再吃别的东西就嫌多了。”却总是取一些，虽则吃不多，还是吃了。

他还说：“在家里的時候，有太太管着些。所以，像这样一个人生活的時候，就非自己小心注意不可了。”看到他那种想着心事的样子，觉得他怪孤零零的。

老伯伯的胃据说不大好。

老伯伯还爱洗澡。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烧浴汤。要是哪天洗澡的时间迟了，他就说：“让孩子们先洗吧。我们家里有时还让女佣先洗哩。”

吃的方面，前面已经讲过了，他最喜欢的是牛肉，其他像芋类、豆腐、油豆腐等等，他都爱吃，却不大喜欢吃蔬菜。

劝他吃一点蔬菜，他就吃一点儿，说：“在家里的時候，太太也常劝我吃蔬菜哩。”我家里有一个六岁的女孩子，口味也和他一样，所以我就开玩笑说：“老伯伯，您的口味倒像女孩子哩。”他笑笑说：“是么，我还很喜欢吃南瓜呢。”

午饭总是他一个人在楼上吃。他说：“短时期内一切都得仰仗别人，只是中午那顿饭，就让我自个儿吃吧。”并且叫我的妻给他准备了面包、黄油以及牛奶等等。因此，中午那顿饭，我的妻总是尽可能不去照管他。

老伯伯还特别喜欢孩子。

我平常懒得管孩子，老伯伯却常常给孩子们把鱼刺取得干干净净的，或者把孩子们想吃的东西夹到他们的碟子里。所以孩子们总是“老伯伯”、“老伯伯”地缠着他。有时他见到孩子们吃剩了红烧豆腐，就说：“怎么啦，老伯伯替你们吃了吧。”毫不介意地把来吃掉了。我们看到这种情景，什么话都说不上来。

孩子們最愛吃黃油麵包。有一天星期日，將近中午，他說：“今天老伯伯請客。”就讓我妻買了麵包和糕點，把孩子們叫上樓去，切了麵包，把硬皮仔細地切去，塗上厚厚一層黃油，讓孩子們吃，吃了麵包又讓他們吃糕點，並且讓他們玩了好一會兒。

從此以後，每逢星期天，孩子們就歡天喜地地去樓上吃午飯。

聖誕節的前幾天，兩個孩子只管向他母親要玩具：“媽媽，今年聖誕老人送什麼來呢？”也許老伯伯聽見了吧，兩三天以後，就送給八歲的哥哥一個信號機，妹妹一個西裝衣櫥。

這兩樣玩具雖則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價值東西，但是對於我們的孩子來說，卻是從來未有的貴重品。那個信號機，只要撥動開關，紅、綠、白三色小電燈就忽明忽滅，而那個西裝衣櫥玩具還裝着一面鏡子，非常漂亮。兩個孩子又驚又喜，高興得了不得，這時做哥哥的突然叫道：“我最喜歡老伯伯。”不聲不響地守在旁邊的老伯伯和我們，禁不住都笑了起來。

有時兩個孩子纏着他，要他和他們玩升官圖，玩紙牌，老伯伯就從火鉢旁邊站立起來說：“好吧好吧，咱們來玩吧。”於是他就端端正正地坐下，擲着骰子或唱着歌兒，不慌不忙地玩着，讓孩子們取勝，以為笑樂。

到了年底，兩個孩子都傷風咳嗽，躺倒床上。老伯伯從平常準備的各種藥品里，取出阿司匹靈啦、咳嗽藥啦給孩子們吃，還痛切地告訴我們說：“我的大兒子是腺病質，特別是七、八歲的時候，風濕症侵害到心臟，終於在二十四歲那年死去了。那時我想，即使背上一輩子都還不清的債，也得把孩子的病治好。當時我正在寫一本書；孩子死前所寫好的那部分稿子，在他死後的三、四年中，我連重新讀它一遍或把它整理一下的勇氣都沒有。”

樓上的老伯伯多半總在讀原版西書；偶爾也寫寫東西。在這

种时候，他总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子前面，离火鉢远远的；我們如果有事上楼去看他，他簡直不注意。訪問他的客人只有前次那两位。那紳士和青年，都是很文靜的人，很有礼貌。老伯伯似乎非常信任那位紳士。

老伯伯对于我們虽然非常宽大，要求自己却很严格。他带来的字紙簍，是一只馬糞紙空匣，外面用百貨店的包装紙糊起来的；手巾虽則干干淨淨，可是用得旧了，到处都是窟窿。还有，咖啡和白糖，他也决不随便多放，总是看准了分量放；餐桌上的酱油啦、盐啦、調味料啦这些东西，也都用得很省。为了体諒我妻的麻煩，碗盞都不肯多用，只用一只对付着。我妻看到这些情形，就責备我說：“你能学学老伯伯的样就好了。”老伯伯就說：“外人住进家里，多少总影响了你們的家庭关系。”于是我笑着說：“是呀，这可有点儿女尊男卑的味道，真受不了。”

老伯伯老是呆在家里，什么地方都不去，买东西都由我們給代办。他把一个装着錢的袋袋交托給了我妻。我妻买一样东西就給記一笔帳，临了向他报賬的时候，他以学者的淡泊态度說：“不用报了，我听过也就忘了。其实用不着一笔笔记賬的。”根本不注意賬的事情。当时我觉得，我們夫妇二人由于长期过着貧困的生活，在金錢方面未免过于斤斤較量，实在太寒傖了。

老伯伯理髮，也是用带来的推子自己理。有一次，我有事上楼看他，他正在理髮，已經理好了，可是后脑勺、鬢脚和耳朵背后，还留着一些长头髮沒有剪去，使人想起中国孩子的刘海头。

我看到他那副活像是个孩子的神气，不禁笑了起来，一面說：“还有些长头髮沒有剪去呢！”一面就从他手里接过推子，給他剪。他那头髮已經剪短的头，热烘烘的。

剪好头髮，我想給他打扫地上的乱髮，老伯伯無論怎样都不让

我打扫。

老伯伯还喜欢字画。(中略)

有一次,我说:“也许因为我是神经质的关系,每当在彩笺上作小品画的时候,总不能从容不迫地轻松地下笔,往往过于紧张,身体和手都发抖,真没办法。”

老伯伯微微苦笑着说:“哪里,只要注意着些也就好了。我差不多教了二十年书,可是直到最后,每次走上讲坛前的一瞬间,身子还是发抖。又有一次,人家结婚,要我在神前念祝辞,因为以前也有过念结婚祝辞发抖的经验,所以当时我妻就叮嘱我说:‘今天可不要发抖呀!’可是我仍然发抖了。”

但是,我还发现老伯伯有他的凜然不可犯的一面,所以就說:“老伯伯真是個刻苦勤儉的人哩。这样大的岁数,还做体操和日光浴;工作的时候,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子前面。年轻的我都很佩服您的忍耐力和精神奋发咧。”

这就引出了他下面这样一番国外生活的回忆:

“讲起忍耐力来,鳥崎藤村的忍耐力簡直了不起。不瞞您說,我也曾到过外国。在法国的时候,和藤村住在对門;我們經常来往。到了深夜,藤村窗上的灯光一熄灭,不久,他就咯登咯登地跑到我的地方来了。

“有一次,画家Y說請我們吃牛肉鍋子,我們两个同去了。因为没有酱油,所以那一次的牛肉鍋子只放了一些盐和糖。

“吃完饭閑談的时候,藤村几次三番地离席。当时大家并没有怎样注意,过后一問,才知道他肚子痛得厉害。他大概碍于主人Y的情面,所以才忍耐着沒有作声。还有,他是个很細心的人,他回国的时候,我正在京都,于是,在当地一家有名的菜館請他吃飯。那家菜館是家古雅的日本式的館子;当时刚回国的藤村,吃得很高兴。

“吃完飯，将要回去之前，藤村让走进屋子来的女服务员給抄一份那頓飯的菜单。当时我不懂他抄菜单的用意，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把当天的事情写出来发表在报纸上了。”

我听了这番話，觉得老伯伯的忍耐和細心的性格，和島崎藤村又不一样。

快要过年了。我每年总喜欢插些松枝，算是点綴一下年节。因此，也想为老伯伯的屋子点綴一番；可是又想起他平常爱朴素的脾气，所以就問他：“您的屋子要不要也点綴一下呢？”

他說：“不，我的屋子不用点綴什么。”于是我就沒有硬給他插松枝。

平常老伯伯总說：“我們家里过年，除了做些年糕湯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做。”所以，这一年我們也就过了一个非常朴素的年，連酒都沒有喝。而年糕湯呢，却是老伯伯的爱好之一。

尽管在春节里，老伯伯还是和平常一样，按照規定的時間坐在桌子前面埋头讀書写文章。就只被孩子們纏得沒有办法，多玩了幾次升官图和紙牌。

新年里，經常来的那位紳士来了，我們把他留了下来，全家一起吃了一頓牛肉鍋子的晚飯。那一天，紳士难得从从容容地呆了許久才走。

过了四、五天，老伯伯很不放心地等候着紳士到来，可是那位紳士却沒有来。

本来血色轉好、飯量增加的老伯伯，突然飯量也減了。

“不知怎的，夜里睡不着觉，弄得早晨起不来。”生活原来很有規律的老伯伯，經常晏起了。

我虽則不明白內情，可是不知怎的被一种阴暗的預感所威胁，总是觉得不放心。

1月12日，我为了商量以某个美术评论家为中心开一个小小的图画研究会的准备工作，要到郊外某家去聚会。那天由于我的疏忽，忘掉了预先通知人家，那家的主人出去了，好不容易等到傍晚时候才聚会。又因为商量各种问题，费去了不少时间，回家的时候已经七点敲过了。

急急忙忙走到二门口，大儿子马上跑了出来，带着哭鼻子的声音说：“爸爸，老伯伯走啦。”

我一时摸不清头脑，心里还以为是我的什么朋友来过而回去了。等到走进屋里，只见我妻面无人色，她埋怨我说：“你为什么早点回来呢？”就把我不在家里的时候发生的老伯伯的事情讲了出来。接着她就哭了。

我一时默默地想着心事。

孩子们也都青着一张脸，身体裹在大棉袍里，瑟缩地坐着，显示出异样的不安。他们竖起耳朵倾听着我们说的话。

这时我心里已经透亮，就盘问我妻：“那末，老伯伯又是怎样一个情形呢？”

她断断续续地讲出了当时的情况，她说，老伯伯说：“多承你们照应，您的先生回来后，请代为致意。”接着还同蹲在里屋的孩子们道了别，然后镇静而沉着地走出了家门。

这时我方才知老伯伯就是河上肇博士。

由于奇异的命运，和河上博士在一起度过一个多月的生活，这件事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

后来博士通过他夫人给了我们全家种种关怀，还把他心爱的砚台送了给我。这方砚台，我一定倍加爱护。

“拼得一死而还活着，这条命是白白拾来的了。”

这是博士留在我家的俳句之一。

(画家的素描，写到我被捕就完了。逮捕以前的来龙去脉，以及逮捕当天的情形，全部省略了，下面我将加以补叙。)

大塚有章的逮捕

自从搬到椎名家以后，被椎名在他的素描中写成“风度翩翩的大个子绅士”的大塚，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总是换掉了他素常的服装，改穿日本服。他在衣服外面罩上一件袖子缝成日本式的黑呢外套，那外套既不像西式外套，又不像日本式的褂子，穿在身上，就像个小贩头儿。我从来没有仔细注意过这种服装，这时才第一次知道这叫做日本外套。

尽管他穿了这种日本外套到我这里来，仍然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风度翩翩的他；无论穿什么衣服，都很称身，这件日本外套，和他那刮得光光的脸颊也非常调和(他那浓重的落腮胡子，经常刮得光光的)，一点都看不出化装的痕迹。

我笑着和他說：“装得真像哩。”

他只說为了伪装才把衣服换了，詳情不告訴我，其实那时他是在鎌仓住了一阵之后，重新回到了东京，在城东区龟戶町租下一所房子，潜藏在那里，我的二女儿芳子就假装是他的妻子。

东京虽然号称东方第一大都会，其实却只是人口特别多一些，不过是許多大村落的汇合而已，除了极少一部分地区，其余的地方連像个样的阴沟下水道的设备都没有，一般的住宅，前厅的摆设間里虽則挂着字画，供着花卉，到后院去一看，就会发现厕所是埋在地里的粪窖，要由市政厅的清洁夫隔些日子来一次用木桶汲去粪尿。同样，被称作大东京的前厅的銀座和麴町方面，虽然到处都是大建筑和壮丽的第宅，馬路扫得干干净净，就像擦拂过的一样，可

是轉到后邊的貧民窟去一看，却挤滿着垃圾桶一般的破敗骯髒的房屋，許多无产階級和流氓无产階級就在那里过着粪蛆般的生活。大塚新居所在地的龟戶町，就是这种貧民窟之一。

每月只花九元五角錢租下的、一排三栋房子的正中間的一栋，只有兩間屋子，一間鋪六张席墊，一間鋪两张席墊。鋪两张席墊的那間，里面放了一架新买的織袜机，算是給芳子搞家庭副业之用，目的在蒙蔽人家的耳目。紗綫等原料由出售机器的商店供給，織出来的袜子也由那家商店收购。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乃是从“資本”的榨取欲設計出来的、对貧家妇女最后一滴用剩的劳动力的最廉价的收买，在当时的日本，無論大城市或农村里，都还广泛地通行。大塚和芳子一方面过着极度節約的生活，一方面不仅为了蒙蔽人家的耳目，同时也想靠这个副业来貼补眼下的生活費。再加手中还留有几个現錢，如果一点一点地貼补着用，眼下的生活也就不成問題。他們就根据这样的計劃，勇气十足地准备在这貧民窟的一角，长期地作艰苦的持久战。

像这种人口非常稠密、像窩棚一样的房子挤牢在一起的貧民窟里，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都要由許許多多人家合用，因此凡事都容易引起別人注目，同街坊邻舍来往很伤脑筋。大塚他們怕左邻右舍猜疑，不等別人打听就到东到西宣称自己是新近失业而流落到那里的。二十岁才出头的芳子，还是小姑娘模样，說成是三十六岁的舅父的老婆，年紀未免太輕了。因此，她就把自己的头髮挽了个髻，衣服也尽量穿得朴素一些。本来显得比自己的年齡还年輕的她，这样一打扮，好容易才显老了些。她还不时請附近的孩子們吃些粗点心什么的，以免招惹左邻右舍的婆娘們的反感。

流落在这种地方的人，夫妇两个一道外出散散步那类的事情，是絕對沒有的；出去的时候，大塚总是把芳子留在家里，故意使邻

近的人以为他是出去找工作了。

結果幸而沒有人疑心他們。所以只要他們能堅持，這裡的生活看來至少暫時可以太平無事地過下去。

大塚只是經常為我失去黨的聯繫而心焦。他想，他自己倒無所謂，只要不被捉去，就這樣地呆下去，等到形勢完全澄清時再說，也就是了；可是像姊夫那樣的人，老是閑着不做事，就太可惜了。因此，他一心為了同黨恢復聯繫而焦慮着。

他同內田在我的地方碰頭的時候，商量的結果，托付內田說：“不管怎樣，這幾天里，請你一有空就到向來作為聯繫地點的各地地方去跑跑，就把這作為你的任務。咖啡店里也可以常去走走。說不定會碰見什麼人。”

做事認真的內田，從此以後每天出去跑，咖啡店里也常去走動；為了喝那並不想喝的咖啡，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錢。但是結果，始終沒有遇見一個熟人。

不久就過了年，1933年的正月到了。3日晚上，因為我曾經提議大家再從從容容地聚餐一次，大塚依舊穿着他那件日本外套來看我。當時他還帶着《國民新聞》的記者原鼎一道來了。原鼎曾經藏匿過大塚和芳子一個時期，把椎名介紹給大塚的也是他，他和椎名老早就是熟朋友。

那天讲好只要一只牛肉鍋子，別的什麼也不要；儘管這樣，椎名太太仍然給備下蝦湯、銅盆魚的生魚片、涼拌的蛤蜊菠菜、以及奈良醬菜等等。飯後的水果和茶點，也特別講究。上面也曾提到過，椎名太太特別善於烹飪，那天一問起來，原來她持有女子中學烹飪科教員的許可証，對於做菜，她生來就感到興趣。

大塚一到我的地方，就說：“兩三天以來鬧肚子，一直喝着粥。今天本來預備享一享口福，可是實在不成。”

他这样一說，使我大失所望。从小就經常生病的他，那时害着肺結核，痰里时时见血。而且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认为原因也就在結核病上，所以总是为他担心。听他那样一說，我不仅失望，甚至觉得有些不放心了。

可是，等到宾主四人乐乐融融地一坐下来，嘴說肚子不好的大塚，也贊不絕口地和大家同样吃个不停。我本来不会喝酒，但是由于許久才聚餐一次，心里高兴，就說：“今天是新年，对不起，我也来喝一杯。”于是，主人敬我日本酒，我也不推却，一杯一杯地干了三、四杯，結果喝得眼眶都紅了。

“今天菜太多了，以后真的只要一个牛肉鍋子，讓我們几个人每月像这样聚一次餐吧。”

散席的时候，我这样一提議，大家都贊成。不用說，我們誰都做梦也沒有想到那天的牛肉鍋子竟会是最后的一次。

大概是怕事前沒有获得我的同意，把新聞記者帶了来，可能使我不安吧，大塚在临走的时候，把原鼎的情况简单地說明了一番；还对我說：“說不定什么时候还得請他帮忙，所以今天特別請他来同您见见面。”說完他就走了。哪里知道这种事情，比当时所預料的更早得多就发生了。这个我随后就要讲到。

大塚因为早就和內田約好在我的地方碰头，所以第二天又来了。那天內田带来了意外的报告。

“昨天也和往常那样去銀座一带轉，結果在尾张町那家文具店門口突然遇见了百瀨。我想这下可好了，就招呼他說：‘巧得很，在这里遇见了你。’哪里知道那家伙覷面就說：‘遇着了你，也沒有有什么用。’我心里虽則恼火，但仍然問他說：‘形势究竟怎样？我那里的联系完全断絕了，真叫人沒有主意哩。’那家伙說：‘形势怎样，我一点都不清楚。我也和你一样，联系完全断了。喂，你知道佐伯

(当时大塚所用的党名)住的地方么?’我说,我只有同佐伯到现在还有联系。这下他顿时笑逐颜开,说:‘是吗。这就好了。那末就请你给我带个信,让他同我直接联系吧。明天下午六点半以前,我在歌舞伎座戏馆前面的鳶屋吃茶店里等他。听见没有?你可不能误事呀!’临别的时候他还再三叮嘱哩。”

内田说出了这番话,大塚听了诧异地只管侧着头。去年10月10日以后,两次都联系不上的百瀨,现在竟在銀座一带转,他直觉地认为不可理解。当时为了防备万一而约定的第二步的联系,都没有联系上,这除非对方被捕,是决不会有的事。

“现在这个时候,百瀨怎么会没有被捕呢。真有些奇怪。”大塚似乎怎样想也想不通,又独自思索了一会儿。

内田带来这样一个大消息,总以为大塚听了会高兴,哪里知道结果与预期相反,于是他莫名其妙地瞅着大塚。大塚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抬起头来点点说:“不管怎样,明天要去同他见见面。”

第二天(5日)早晨,他睡醒起来,由于做了一夜的恶梦,头发痛,没有精神。因此,他那天破例让芳子买了酒,在吃午饭的时候,喝了一大瓶。

那天,他提前吃完晚饭出去了。太森事件以来,每次出去从不离身的手枪,独有那天,不知怎的,他不想把它带在身上。

到了约定的时间,走进鳶屋一看,百瀨早就在那里等他了。

见面之后,百瀨只说“我也失去了联系,正在无法可想”,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话。

后来大塚走出鳶屋,坐上开往筑地的市营电车。目的是为了和约好的内田碰头。

等到电车开到筑地,他刚要下车的一瞬间,从鳶屋跟踪前来,坐在同一辆电车上监视他的三个便衣警察,向他一拥而上。根本

来不及抵抗，他的两手就被反绑着加上了手铐。

就这样，关于大塚一个人，奸細百瀨算是结束了他的任务。

藏身处被特高^①发现

大塚被捕后的第二天（1月6日）早晨，内田神色不宁地来到我的地方，对我说：“昨天在约定会面的地方等了一个钟点，大塚始终没有来。这是从来没有的事，真叫人担心。不过，约会是二重的，讲好如果昨天见不到面，今天晚上见面，所以今天还得去看看，明天早晨再来报告结果。”说完这番话，他就走了。上面已经提到过，当时通常把联系的地点和时间作二重的约定，如果两重联系都联系不上的话，那末就可以推定对方一定出了岔子了。这是当时非法运动的老办法。所以，我就眼巴巴地盼望着第二天的到来。

“昨天仍然没有见到面。”

第二天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得不担忧大塚也终于不幸遭了殃。我当时比瞎子丢了棒还要感到没依傍。

可是，我仍然没有放弃一线希望。因为，前面也曾提到，大塚老早就害着肺病；近来虽则健康情况好了许多，可是说不定由于某种原因而突然大吐血，起不了床；过几天说不定他会笑嘻嘻地突然来看我。这就是我的万一的希望。

1月10日了。这天是个晴朗的小阳春天气，楼上朝南的纸窗上射满了阳光。向来不能到屋外晒太阳的我，那天也和往常那样地把纸窗拉开两尺光景，让太阳光直接射在席垫上。我就在阳光射到的地方，并排地铺下两个坐垫，把上身衣服脱光，躺在坐垫上。

^① “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法西斯政权专门利用这种警察来迫害进步人士。——译者

特别爱好太阳光的我，天晴的日子，总是这样地不让外人看见，设法使自己的肉体吸收到紫外线。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射在席垫上的阳光也慢慢地移动，我也就跟着移动坐垫和身体。

楼上朝南那一边，隔着一道板墙，就是一家两层楼的小公寓。从我屋子里看出去，公寓的二楼是北窗，当那里的窗开着的时候，屋子里的桌子啦、墙壁上挂着的衣服啦之类的东西，晴天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公寓里住的多半都像是中学生，也有个把像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不过总而言之，都是学生。

我的屋子和这家公寓的二楼之间，虽然有一段距离，不过中间没有一棵足以遮断视线的树木，所以我每当拉开朝南的纸窗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谨慎。这一天也是如此，一面把纸窗拉开一条缝做日光浴，一面不断地注意着公寓那边的动静。忽然，那边有啪嗒啪嗒的声音，似乎在拍什么东西。躺在那里的我，想看一看究竟，就稍稍抬起头来。一看，几乎正对着我这边的公寓楼上的窗口，有个穿西装的相当岁数的男子，探身靠在栏干上，正在拍着空柳条箱底。一瞬之间，我马上觉察到这个可疑的人在窥探着我。那个公寓，看样子就不是一个高级公寓，房客中间，向来没有见过这个看来在社会上工作的穿西装的绅士，而这个人，却仿佛刚从什么地方旅行回来似地，正在拍他的行李箱底哩。当我看着的时候，那人一次又一次地老是拍着那一只箱底，而且站在窗口仿佛在找寻什么，眼睛只管向这边看。我心里慌起来，悄悄地把纸窗拉上了，跟手穿好衣服，站起身来，把腰带重新束一束；无意之间向东边窗外一望，隔壁那家平房的房顶上，正对着我的窗口，站着一个人，心无二用地只管朝我这边窥探。我又吃了一惊，马上坐了下来。

我藏身的这间屋子，北面是通楼梯口的房门，门是纸门。西面

沿着馬路的一边，是一个六尺宽的摆設間和一个六尺宽的壁櫥。南面是一排齐腰高的窗子，那是玻璃拉窗。窗外有低低的栏干，夜里可以安上木板套窗。东面那一边，不知什么道理，是一堵挡住朝日的墙壁，只开着三尺来宽的小窗。窗子也是玻璃拉窗，窗外是鉄棒做的窗櫺，不設套窗。画家椎名看到鉄棒上涂着黑漆，从刚进屋的时候起就老說看着不是味道。因此，前面也曾提起过，大塚在我搬来以前，就給准备了一幅黑布窗帘，但是由于东边的邻居是平房，不怕被人家看到室內的情形，所以白天我总把窗帘卷起，把矮桌子移近窗口亮处。哪里知道今天屋頂上站了人，不由得我不吓了一跳。

無論在南面窺探着的穿西装的家伙也好，还是同一時間站在东面房頂上的穿工人号衣的家伙也好，都使我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当时我如果是个有經驗的非法运动者，頓时就会觉察出身边的危险。可是我呢，尽管已經觉察到刚才的危险信号，却仍然沒有想到那是便衣偵探們干的把戏。

发生了这种事情的 10 日的晚上，我还接待了一位意想不到的稀客。这就是說，内田把他从前的老师、高松高等商业学校的教授堀江邑一領到我这里来了。内田完全懂得我的住址对誰都必须絕對保密，可是他深知我和堀江的关系非常亲密，所以在东京火車站上迎接了因公赴京的老师，听了老师的吩咐，就把老师从火車站上直接領到我这里来了。而堀江呢，为了使人家摸不透他的行踪，在去住宿处以前，想先来看看我。無論从人品上說，还是从思想立場上說，堀江都是我最相信得过的好朋友，而且又是同志，又是从前的学生，所以此时此地能接待他，我有說不出的高兴。

堀江默默地听取了全部情况之后，断定那个自称姓百瀨的是奸細，大塚再也不会回来了。接着对于我今后的生活，提出了周到

的劝告。然后回头鼓励内田说：“情况既然到了这一步田地，你得更加坚强地充当河上先生的帮手才好。”他还说，如果我和我家里的联系万一因为受到监视而发生困难的话，我的生活费，他无论怎样都会给我设法，请我放心；但是无论怎样，眼前总还是注意些好；他一回去，马上会把目前的生活费寄给内田；在形势未判明以前，暂时最好不要同我妻联系，这样比较安全。

因为不便久坐，所以堀江说完了当前要说的话以后，马上走了。临走留下一盒他太太的故乡山口寄来的名产茶点“舌鼓”。他还觉得在这个时候带给我这样的土产，不是当口，自己有些不识时务，所以像做了什么错事那般地一再表示歉意。其实，潜伏在这样的地下，能吃到那美味的山口名产“舌鼓”，我无疑是很高兴的，他却想到了别的方面，还感到过意不去，我觉得这也未免过于体贴入微了。

我很希望堀江能和我妻见见面，把目下的许多情况传达给她听。可是，临别的时候，我没有直说，只问了一声：“你去不去我家呢？”

“不去了，这种时候，除非绝对必要，还是不去的好，所以这次就失礼了。”

这虽然十分正确，可是在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我还是不禁有些黯然。

同芳子见面

第二天(11日)的早晨，大塚前几天才给介绍的、一道吃过饭的原鼎来看我了。

他慌慌张张地说：“斋藤似乎被捕了(大塚那时让原鼎称他‘斋

藤')。通訊社方面,来了这样的消息:大森事件的参加人、至今还逍遥法外的、一般被称做‘爸爸’的大坏蛋,终于捉住了。我还没有看到通訊稿,现在我就去社里。虽则这种消息不准发表,我会从經手人那里把事情打听清楚,过一会儿再来看你。”

他仿佛难于启齿似的,結結巴巴地說了这几句話。还存着一綫希望的我,就好比听到医生对病家最后宣布“請料理后事吧”那样,默默地点着头說:“到底被捕了么。”

接着原鼎又說:“露子小姐(当时芳子的化名)想来看看爸爸,托我問一声可不可以到这里来。”

他神經质地眨着眼睛,看样子似乎是在担心:不知道我会怎样回答他。我却好比被吸鉄石吸了去那样,毫不躊躇地答道:“好的,见见面吧。請你叫她馬上就来。”

“可以么?謝謝。她现在在我家里等着回信哩。上班以前,我先回去一次,馬上告訴她。”原鼎說了这几句話,仿佛是他本人的事情那样,放心地走了。

到了下午,芳子来了。我还是前次她离开西大久保的家庭而到大阪去的时候在东京火車站上送了她,直到今天都沒有同她见面。她把头髮挽了个髻,衣服穿得十分朴素,所以一下子年紀看大了許多。以前在我眼里,这个小女儿还是个乳臭未干的、不懂事的女孩子,仅仅几个月之間,却就像換了一个人,变成大人模样,这一方面固然可喜,同时也动人哀怜。

芳子一走上楼,见了我,开口第一句話就是:“这里的房东大概不欢迎我这样的人来这里吧?在楼下同他招呼的时候,他一脸不高兴哩。”

“哪里,不会这样的。”我一点都不介意地說。

过了一会,我下楼去厕所的时候,椎名把我請到起坐間里,

說有几句話要对我讲。然后非常担忧地、一本正經地說出了下面这样一番話。

“今天我有事出去了一整天，比令爱只早一步到家。据我內人說，我不在家的時候，連着来了两个紳士，說要跟我学画。这就非常奇怪。事情是这样的：这一次，我在大門柱子上挂了一个教授初級图画的招牌。这块招牌，是一位精于书法的好朋友給我写的，他劝我挂上这块招牌，收几个徒弟試試。由于他极力劝說，我曾經把那招牌挂过一些时候，可是誰願意来当无名画家的徒弟呢？东京虽大，这样的好事者究竟沒有呀！結果挂了好久，也沒有一个人找上門来。所以，我早就把那块招牌收起来了。前些日子搬家的时候，大塚先生来帮忙，见到这块招牌就說：‘这个却妙得很，把它挂起来吧。’就亲手釘了个釘子，把它挂在門柱子上。可是，此番同样也沒有一个鬼上門；唯有今天，一天里却来了两个人。我問了我的太太，据說两人都是穿得挺神气的上了岁数的紳士，而且內中的一个，就是前些日子得过勳章，报纸上还登过他的照片的警察厅的特高課长毛利什么的，不錯，正是毛利特高課长。据說来的时候穿的是西装。我又問那人說了些什么話呢，据說，那人說他觉得最为难的是每月付多少学費的問題。我从来沒有收过徒弟，我內人沒法回答他。他还說，他想学的是山水画；我太太就說，我专门画花鳥，山水可不行；于是那人說，等画家本人在家的時候再来拜訪，就这样地回去了。不多久以后，又来了一位穿着上等日本服的紳士，也說是想学画。像这样年龄的紳士願意来做我这个无名画家的徒弟，而且一天之中連来两个，怎样想也想不通。您是一个要紧人，如果住在我这里万一出了什么岔子，可就沒法交代，所以不瞞您說，我一回家就和我內人思量了半天。对您說这些話，让您不痛快，固然不好，可是，不告訴您也不好，所以我才有什么說什么，把

情况說給您听了。”

我当时想，芳子觉得椎名脸色很难看，就是为了这件事情了。听他說完前前后后的情形，我也认为事情的确有些蹊蹺，可是也不怎样把它放在心上。我說：

“大塚至死也不会說出我的住址的。再說，如果真的知道我住在这里，也用不着繞着大圈子来探脚路，定然直接冲进来了。近来抓共产党抓得很凶，說不定正在挨家逐戶地搜索，一个一个解决。不过不要紧，請您不用那么为我担心。”

当时，我心里也的确是这样想的。——可是，警察厅的一套办法，却不是这样。尽管住址已經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对方如果是相当重要的角色，身边就不见得沒有护卫，藏匿那人的房东說不定会在里面搗鬼，而且开枪拒捕，把人打伤，也是屡见不鮮的事，所以在冲进住宅以前，警察方面一定要仔細地偵察內情，这是他們一貫的方針。因此，警察当局昨天派便衣偵探在南邻和东邻大致察看了外部的形势，今天又派人来偵察家里人的动静。那时我如果是个有經驗的非法运动者，定然当夜就逃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不过，如果逃的話，說不定大門外边有通宵警戒着的暗探守在那里，當場就把我抓起来。

尽管有着种种危险信号，我还是处之泰然地把椎名夫妇安慰一番，然后回到楼上。可是，芳子听到昨天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却十分担忧，于是劝我馬上搬家，并且細細地和我商量她所能办得到的計劃。

和房东全家在楼下起坐間里吃完晚飯，芳子毅然决然地說：“天塌下来也好，今晚我反正就在这里过夜了。”

“在这里过夜的話，那末让我把被褥……”椎名太太的話还没說完，我就拦住說：“不用了，今晚橫豎不睡，即使睡，我的被褥也尽

够了。”

“那末，把这个将就对付着吧。”椎名太太說着，把一件棉袍借給了芳子。

走投无路的父女二人，那天夜里围着一个小小的火鉢談着談着，只管談下去。

夜深了，怕灯光漏到屋外去，我們就把台灯从矮桌子上移到席垫上，还在上面搭了一条羊毛毡。

不管怎样夜深，一点都不想睡。話也說來說去沒个完。

我因为烟抽得过多，快天亮的时候，开始咳嗽了。

“您还是睡一会儿的好。”我被芳子逼着钻进被窩里。那时东方已經开始发白。我們停止了談話，芳子也躺在我身边的褥子上。两个人不久都睡着了。

父女两人醒来的时候，进了小学的椎名的儿子，正要上学去了。

椎名太太泪汪汪地瞧着晏起的父女两个吃飯；飯吃完，她对芳子說：“中午給您爸爸准备了他所喜爱的牛肉鍋子，您多玩一会儿去吧。”她似乎觉得，芳子特地来了，昨天晚上却一样好菜也沒有，很不过意。

可是，芳子一吃完早飯，馬上就走了；因为她急于想为父亲找个安身的地方。

我把她送到二門口，同她紧紧地握了握手。目送着勇敢的女儿的背影的我，扶着紙門身子发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回到屋子里以后，我还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回想着昨天晚上芳子对我說的話。

大塚被捕的5日那天晚上，芳子整夜沒有睡，坐在火鉢旁边，等着舅舅回来，白白地一直等到天亮。她想，可能是被捕了。但

是，她也想到了万一的情况，那就是，说不定半路上得了急病，进了哪家医院。

要是知道自己的住址的同志被捕了，那末无论那同志是多么可以信得过的人，自己也必须马上搬家：这是当时搞地下工作的人的老规矩。因为，拷问十分残酷，尽管能坚持两三天，经过一番犹豫，大多数人最后还是招了出来。可是，芳子认为舅舅绝对不会讲出自己的住址，所以她没有急着搬家。

她第二天又独自一个人等了一天，第三天又等了一天。可是等来等去，舅舅还是不回来。最后只有断定是被捕了。

8日早晨，她终于决心把房子退掉，离开那里。她对邻居说：“住在广岛的哥哥得急病死了，所以我们决定收拾收拾，回家乡去。”她把厨房里用的东西分送给左邻右舍的职工们。其余衣服之类，装了三只箱子，托东邻的一个姓中村的运到东京火车站，暂时寄存在那里，她自己随身只带了大塚留下的一支手枪和现款，向附近的邻居们很有礼貌地道了别，就走掉了。她现在似乎躲藏在—个什么地方。

我想到不久以前她还是个完全不懂事的小姑娘，而现在居然能凭个人的决断把事情办到这样，觉得她真有出息；但是又想到她离开了照顾着她的舅舅不算，这下还得背起照料父亲的重包袱，确实是怪可怜的。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就在那穿西装的家伙和穿工人号衣的家伙从邻家窥探我的住所的10日那天下午，三个便衣侦探袭击了城东区龟户町大塚的寓所，可是他们所指望捉拿的岡林增吉（这是大塚在龟户町的化名）的大门上的户口牌子，已经不见了。问起附近的人，都只说有一个太太模样的年轻女人，昨天收拾了家私，退了房子，回乡去了，至于芳子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却不得而知。

被 捕

12日早晨，吃完一頓很迟的早飯，芳子走了。我坐在桌子前面迷惘了一会儿之后，就开始整理抽屜。抽屜里放着許多篇我为党所起草的宣传小册子的底稿。这些稿子，都是我貫注了全副热情写出来的，不忍輕輕易易地交到敌人的手里去。再則，这些稿子里露骨地写了許多毫无忌諱的話，怕被敌人看到了，对自己不利。特别是关于打倒天皇制那篇文章，更是如此。所以，为防备万一起见，我把那叠薄紙底稿卷得紧紧的，塞在一个馬口鉄罐子里，上面盖了一层面粉，交給椎名太太，托她和别的瓶瓶罐罐一道放在厨房角落的擱板上。因为我想，即使万一我被捕，也要把这些底稿保全下来，事后請她送到我的家里，設法使它留传于我身死之后。——被捕后我一直担心着这些底稿，人家来探监的时候，总想問一問它的下落，可是身旁总有看守監視着，始終沒有机会問；后来也就忘掉了。出獄后重新想起，再一問，原来在我被捕后不久，让椎名亲手給烧掉了。

寄存在我的地方的党的那个大黑皮箱，毫无办法处理。不过，里面放着篇幅相当多的《列宁論党的建設》的底稿。这篇东西还是住在西大久保家里的时候，党叫我提供关于組織問題的資料，我才写的。当时，作为这一工作的一部分，我还托前面提到的高松高商的堀江邑一搜集了《列宁全集》中关于这問題的材料（那时的《列宁全集》，并无詳細索引）。异常忠实而細心的堀江，查遍了手边的《列宁全集》的俄文版和德文版，制成詳細的目次，給我寄了来。因为稿子上几乎全都是外文，而且篇幅相当多，所以我就沒有重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那样交給了組織。现在一看，原来那份稿子原

封不动地放在那个皮箱里。我心想，还是把它烧掉的好。可是又一想，已经交给党的东西，自作主张地把它烧掉，也不妥当，所以，就急忙开始重抄，为的是只留我抄写的一份，而把底稿毁掉，免得留下堀江的笔迹。

矮桌子上摊满了那些稿子，敲过十二点钟，我和平常一样地准备在楼上吃午饭，在火鉢里焮上咖啡。正当烤了几片面包，开始吃饭的时候，内田来了。他平常每星期来一次，那天还不是该来的日子。

“还没有到约定的日子，可是挂牵着这里，放心不下，所以就来打扰了。”他说。

我高兴地接待他，说：“恰巧今天煮了咖啡，自以为味道还不差，你喝杯试试。”一面说，一面给他倒了一碗，并且详细告诉了他昨天所发生的事。

芳子的计划是在别处另外租一所房子，让内田和她的伙伴井上礼子（前京都帝国大学井上密博士的二女儿）住在一起，我就算是这个新家庭的退隐的父亲。可是，让年轻男女住在一块，无异是给他们做媒人，我总觉得不大妥当。什么都喜欢敞开的我，连这个心事也都说了出来。

“任何艰难困苦都得忍受，性欲问题要是克服不了，还成话吗！我决不会做出您所担心的事来，这一点请您信任我吧。”老实的内田，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觉得他这人真不错。

平常一来马上就走的内田，独有今天呆得比较长久。我也不想读书，就和他闲扯，这样自然而然地也就把他拖住了。

那天天上乌云密布，似乎马上就要下雨的样子；下午四点钟左右，屋子里已经暗下来了。

“噢呀，今天打扰很久啦，就此告辞吧。”内田说完这句话，正要

站起身来，这时一阵楼梯响，四个男人一拥而进，把对坐在那里的我们两个团团围住。

一瞬间，我心想：“这下可来啦。”我从小心脏衰弱，稍稍听到些响动，就会心跳；感情稍稍冲动，手就发抖。可是，那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稀客的突然光顾，我一点也没有发慌。这也許就像大森事件的时候，分行經理和行員在手枪突然对向着他們的最初一瞬间，还笑脸相迎的情形一样吧（我看见事件有关者在预审笔录中的供词，这样写着）。这大概是因为，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一刹那的預告时间也没有，所以事前也就没有发慌的工夫了。

闖进来的几个人都穿着西装。其中有一个仿佛是上级人员，个子矮矮的，体格茁壮，大脸盘上长着密密的髭鬚，他一屁股靠近我坐了下来，取出一张名片，上面印有“特别高等科在勤、司法警察官、警察厅警部、原田恒太郎”等字样，给我看了看，随手又递给我一张上面似乎写着什么东西的紅格子紙，說道：“請你讀一讀这个吧。”

原来这是大塚借警察厅的紙所写的信，上面写着“呈姊夫、姊姊。”讀了一下，信上大致是說：

我泄露了姊夫您的住址，定然出乎您的意外吧。想到这层，我也很难过。不过，我决不是怕死，而是几天以来經過再三考虑，为您的利益絞尽了我的脑汁，最后才决定这样做的。现在我沒有那样的自由，把詳細情况写在这封信里，我只能告訴您，我被捕以后才发现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这件事，决不是您所能想像得到的，而对我們的命运却起着致命的作用；在这封信里我沒有那份自由把它写出来，这是我所感到十分遺憾的。由于这样一件非常意外的事，党现在也正在完全崩潰。您的命运，实际上犹如风前之烛；即使我今天拼死保守秘密，您的前途，也只是白白地吃苦头而已，决

沒有希望做出一点事业,而且迟早要在更恶劣的条件下,遭到和今天同样的命运。因此,我从各方面考虑的结果,认为这是最后的办法,才敢于说出了只有我一人知道的您的住处。我相信,您一定会明白,我采取这个处置是为您着想。再则,从今以后,我决計經常跟在您身边,竭尽我的力量保护您,这一层希望姊姊也放心。把您拉到非法場面上来,本来就不对,但願姊夫能够早日回到对您最为适当的故乡——书斋里去,以發揮您的可貴的天分。

大致内容就是这样。信是用鋼笔写的,最后的署名是“1月9日,大塚有章于警察厅”。

在我看这封信的时候,原田警部挨近我坐着,脸上露出一絲胜利的冷笑,死死地瞅着我的脸。这个警部的肥厚的膝盖碰在我的瘦骨一把的大腿上,传来一股溫暖,我感到很不痛快。当我拿着大塚的信看着的时候,也許因为身体摆得很自然吧,我的手一点也不发抖,自己觉得自己出奇地鎮定。

大塚最初所強調的所謂非常意外的事,我几乎完全沒有把它放在心上。现在想起来,自然是指党被奸細严重侵蝕那件事了。但是,当时因为事情的内容一点都不知道,所以也沒法把它放在心上。至于說到党組織的崩潰,那末我当时完全沒有料想到,那时的鎮压竟执行得那么彻底,以致后来过了十年,党还是沒有能够重新建立;所以当我看到大塚的信的时候,心里馬上觉得这也正像自己在三·一五以及四·一六大逮捕以后所犯的毛病一样,是一种失敗主义情緒。我自然觉得大塚的悲观失望,未免过早了些。可是,对于他的說出我的住址,我却絲毫沒有抱怨的心理。事实上,像我这种早就有一些虛名、在社会上有很多相識的人,在党的力量受到极度破坏,面对着史无前例的大鎮压,而依为耳目手足的大塚又被捕的情况下,想要繼續搞地下工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特別

是，我几十年来一直过着书斋生活，除了讀書写文章而外，沒有別的能耐，又缺少处世的手腕，而且现在年紀又漸漸地老了）。不說不能进行什么积极活动，就連隱藏个人的身体，都觉得十分費劲，甚至于已經觉得再也无法可想了。我觉得我就好比是一个矢尽刀折、陷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好不容易才把身体潜伏在山洞里的不中用的老兵。当时我虽被捕吏們包围而不怎么感到动摇，对于大塚的处置也絲毫都不抱怨，大概就是因为抱着上面所說的那种近乎絕望的心理的緣故吧。

现在才明白，我在那时被捕，对于我是最大的幸运。前面也曾讲过，我的地下生活，和別人不同，乃是名副其实的地下生活，連抬头看看青天的机会都完全被剝夺了的。住在椎名家楼上的时候，因为南面有窗，太阳光綫很好，还可以利用窗縫里射进来的太阳光，躺在席垫上做一下日光浴，可是以前住在蟹江家楼上的时候，却不得不一直过着见不到阳光的鼯鼠般的生活。而且我無論住在哪里，都不能穿了木屐在地上走动，一年到头只能坐在席垫上。如果永远叫我繼續过这种生活的話，我的健康也許将逐漸垮下去吧。后来我被捕了，而且不久下獄了，当时我的亲友們都非常为我的健康担心，几乎认为必垮无疑；可是，在刑务所，我虽則整天被关在单身牢房里，只要是晴天，每天却允許到屋外做三十分钟的户外运动。光凭这一点，我的监牢生活已經反而比地下生活强。

党的活动后来也不见起色。在我被捕后，不用說，党也在图謀重建，可是由于奸細从中作祟，同志和同志之間的信任心受到严重破坏，甚至于发生了自相残害的事件；所以，本来就因重要黨員几乎完全被捕而大伤元气的党，就更加振作不起来了。后来，党的重建終於沒有成功，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国内一直处于无党状态，而卷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旋渦。所以，即使 1933 年 1 月，我侥

幸沒有被捕，逃出椎名家，躲到了別的地方，但是完全和外界隔絕了的我，也將什么事情都做不成，這是毫無疑問的。

當時大塚之所以那樣快就被捕，也是為了急于想替我恢復同黨的聯繫的緣故。可是，在當時那種混亂狀態下，越是急于同黨取得聯繫，就越容易使我早日落入奸細的手里。

總而言之，這是天不讓我再過更長久的地下生活。我的地下生活這樣短暫而且沒有做出什麼成績，是十分令人抱憾的，可是沒有辦法，這乃是我的命運。——但是，我也許還得向天感謝這樣的命運。現在我年近古稀，漂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旋渦里，居然還能重新安安稳穩呆在書齋里寫當年的回憶；如果再能多活幾年的話，說不定還能看到美好的新時代的曙光，我所處的境遇多好啊。是的，我必須向天感謝哩。

地下生活的終結

我把大塚的來信看完一遍之後，說了一聲“請再讓我看一遍”，就又從頭重讀了一遍。不過，我的記憶力本來就差，再加當時究竟不十分定性，所以沒有能夠完全記住那封信上的詞句，說不定多少有些記錯的地方；再說自從1933年1月3日和大塚一起吃了那頓牛肉鍋子以後，至今十多年，還沒有同他見過第二面，也無從問他當時那封信究竟是怎么寫的。

第二遍讀完那封信，我把它照原樣折好，還給了原田。這時原田又取出信封讓我看看。一看，封面上寫着“中野區住吉町三十號椎名剛美宅河上肇先生”，我這才明白我的住處就是在這樣的方式下讓他們知道的。這時，原田才離開我坐得遠些，說：“明白了麼？”

“是的，明白了，隨時可以跟你走。”我這樣一回答，隔着火鉢坐

在原田对面的那个年紀还很輕、头发留得长长的、眼珠突出的小伙子，向原田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說道：“目前你由我承管。”接着递給我一张小型的名片，上面印着“中野警察署在勤、特別高等系、巡查部长，大野順太。”

再一看，他背后还端端正正地坐着两个穿西装的人守候在那里，这时，由原田示意，他們三个人都站了起来，开始搜查室内。

原田一个人坐在那里，把拿到他面前的东西一件件加以检查，該沒收的东西就放在一边。

抽屜不用說，书箱和壁櫥，都被搜遍了。

从抽屜里翻出了《馬克思的伟大‘空想’的实现（苏維埃联盟的发展）》和《农民的革命出路（农业革命）》两叠草稿。本来，大部分草稿，我都收拾起来了，只有这两份底稿，准备加以修改，所以才留在手边。

奸細松村寄存在我处的那个黑皮箱，自然全部被沒收了。放在右手半边的《列宁全集》，大概是由于他們不懂德文吧，幸免于被沒收的灾难。

最后，六张新的彩笺和一颗小小的书画章被拿到原田的面前时，他赶快把它放在沒收品一起。看到他这种举动，我当时感到十分奇怪，心想为什么这种东西都要拿去呢。那些彩笺，是为了正月里写着玩儿，托椎名給我买的。不願在这类东西上多花費的我，托椎名买的是最便宜的貨色。結果，因为紙头的质地实在太坏了，元旦試笔时，只写了自己作的一首俳句，送給椎名，后来再也没有兴致写，剩下的彩笺就那样擱在那里了。那颗小小的书画章是椎名的，元旦那天借用后，一直没有还他。

为什么这种东西都要沒收呢？这个哑謎后来就明白了。被捕約两星期后，我还拘押在中野警察署里，有一天，原田来了，把我从

拘留所叫了出来，說：“今天让你和你太太会面哩。”我跟他后面，走到楼上那間檢察官曾經在那里訊問我的小屋子里。

原田关上門之后，說：“你太太如今在楼下等候着，会面之前有件小事情麻煩你。”說完就从口袋里取出彩箋，要我在上面写点什么。我一看，那彩箋正是两星期前被沒收的东西。那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沒收了来，是供今天用的，不由得不惊叹警察这种小官儿的厚顏无耻和“深謀远慮”。

不仅如此，原田还从口袋里摸出一顆图章来，說道：“这种东西也夹杂在里面了，今天准备还給你太太。”等我写完，他就在我的名字下面盖上了那顆图章。我愈加惊叹这个警部仓卒之間的“深謀远慮”。可是因为他这就要让我去会见我妻，所以我非但没有推託，而且毫无愠色地依他所說的做了。

我趁他們搜查着屋子的时候，换了衣服。

“警察署里冷得很，多穿些衣服去好。”原田在旁边这样一說，我就在衬衣褲全部换过以后，尽量多穿了几件衣服。

椎名太太由于未能在二門口拦住主人不在家时冲上二楼的警察人員，仿佛自己犯了什么大錯誤那般地不自在，她想在我临走之前，哪怕热騰騰的面也至少請我吃一碗。可是三个便衣警察守在二門口，不許她出去。沒有办法，她只得把生鸡蛋打在茶杯里，端来楼上，說道“不要嫌弃，把这个吃了吧。……您是上了年紀的人，我真是不放心。”

我說了一声謝謝，随手拿起紅漆托盘里的茶杯，把两个蛋黄一口吞到了肚子里。在我踏进牢門之前所受到的这样的厚意和好感，椎名太太含泪的脸容，嗚嗚咽咽的声音，战战兢兢的态度，这一切都留给了我深刻的难于磨灭的印象。

临走的时候，爱吸烟的我，看到坐在旁边的內田手里拿着一盒

蝙蝠牌香烟，而我已經沒有香烟了，就說：“這盒烟給了我吧。”把烟要了來。我後來才想到，內田也同樣要被帶到警察署里去，我要了他的烟，很不應該，覺得那是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感到很難過。後來到了警察署，不用說，那些東西全都被沒收了。

走下了樓，我神色泰然地和椎名太太告別：“多多承蒙您照應，非常感謝。給您添了老大麻煩，很對不起，您先生回來後，請代我多多致意。”剛要从走廊走出二門口的时候，回頭看到在里屋的炬燵邊縮成一團、如同被追逐的小鳥一般的兩個孩子，我又對他們說了一聲再會。

兩輛汽車，一輛坐着我和看管我的原田，另一輛坐着其餘的便衣警察，一前一後，在黃昏時候的街道上，往南開到中野警察署。這一天，從1932年9月21日我開始住到黨所指定的藏身處那天算起，大約是第一百十天；從離開西大久保寓所時算起，大約是第五個月。我的地下生活，仿佛曇花一現，就此結束了。

（1944年11月6日晨脫稿）

未决监生活

(被捕以后,下獄以前——《獄中独語》执笔前后)

中野警察署的拘留所

前面曾經提起,正宗白鳥說过:“《二楼上的河上博士》这篇小品文,用朴素的笔調活生生地写出了河上肇的为人,似乎引起了所有讀者的兴趣。不过讀过那篇文章以后,还該讀一讀《獄中独語》,那是一篇毫无矫揉造作的小說。”我在前面已經抄出了《二楼上的河上博士》,现在就来交代一下写《獄中独語》的經過,把正宗白鳥所說的一篇小說加以結束吧。

上面已經說过,1933年1月,大塚和我相继失去了自由。可是,当时我妻既不知道大塚在一星期以前被捕,也沒有能在当天知道我被捕的消息。到13日,晨报上才发表了一条消息,标题是:“被捕的××博士在藏身处理头讀書,利用通信員同外界保持联系,由于妻弟的招供而得知其住址。”后来又过了五天,就是18日那天,从1932年到1933年繼續約半年之久的大逮捕,才解除发表新聞报导的禁令,出了整版报纸大的大号外。所謂第三次共产党大逮捕,以我的被捕而告一段落。

我妻虽然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大塚被捕之后,她清苦的居处却立即受到了事件的余波。不过,她并没有觉察到我們的被捕。

5日傍晚大塚被捕后,第二天消息就传到新聞記者的耳朵里。記者还源源本本地探悉:大塚是我妻的胞弟,被捕前一直把我的二女儿芳子带在他身边。不过那时因为一切消息还都被禁止发表,

所以他們就迫不及待地想用有关芳子的特別消息来姑且渲染一下版面。6日下午,几个报社的新聞記者,就像展开竞赛一般,相继来到我妻的住所。本来,她在去年11月就收拾了空曠的西大久保寓居,卖掉了不用的家具,处理了我的藏书(除重要的留下外,其余一部分卖给了旧书店,一部分寄到京都大女儿家里),搬到中野区相生町的弄堂房子里住下。可是消息欠灵的新聞記者們,不知道这一层,直到夜里两点多钟,才好容易找到她的住所,粗暴无礼地把她从睡梦中吵了起来。

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芳子近况怎样的問題。我妻本来早就知道芳子离开大阪到了东京,由大塚領着在搞地下工作,而且在大森事件发生后不久,还曾由大塚从中联系,三人在路上碰了头,一同到一家西餐館里吃了一頓飯,但是当然,对于新聞記者的提問,她装做全不知晓的样子。

“那孩子去年5月自己請朋友介紹,到大阪的电車公司做事去了。近来好久沒有来信,想必工作得很好吧。”

她就像迎风的弱柳那样,避开不客气的新聞記者們的尖銳的提問,仅仅說了上面那几句话。可是,第二天各种报纸上却出现了大标题的长篇报导,内容不尽不实,有的沒的夹在一块儿。

例如4月7日的《讀卖新聞》上,除了一篇題作“河上博士的女儿,被环境所逼,抛弃了学业,当了打字員”的京都电话消息而外,还登出一篇題作“父亲河上博士不知去向,博士夫人住在弄堂房子里,凄凉地說:‘准备对那孩子作一番鼓励’”的訪問記,以及上村律师的一篇“想必如願以償”的談話。消息里有这样一段話:

“前年滿洲事变^①爆发,法西斯势力随之抬头,对左翼陣营的

^① 指的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譯者

镇压变本加厉，她的父亲河上博士终于为环境所逼，去年夏天对秀子夫人只说是出外旅行，飘然离开了淀桥区西大久保 133 号的家。从此以后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也可能是逃到遥远的苏联去了。撇下秀子夫人孤零零一个人，过着凄凉的岁月。去年秋天 11 月里，她迁出西大久保的公馆，搬到中野区相生町 10 号一栋两层楼的弄堂房子居住，时常忧愁伤感，思念着博士。虽说迫于时世，她过的日子未免太凄凉了。”

还有这样一段话：

“抛弃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光荣职位、参加左翼阵营、一时成为劳农党的出色的指导者、同时又是我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而为举世所周知的法学博士河上肇的二女儿芳子（二十二岁），……1930 年毕业于京都府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后，到东京进了津田英学塾，她看不过家境的窘迫，不久退了学，终于下了悲壮的决心，当了一个职业妇人。”

其实那时我的家境并不窘迫，大概看到我妻那种朴素的生活环境，新闻记者们才这样胡乱想像的吧。

顺便在这里谈一件事。我以前的学生、一向同我过从甚密的小林辉次——和水谷长三郎同班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法学士——看到报纸上这个消息，吃了一惊，对他的太太说：“马上去把河上太太接到我们楼上来住吧”，当天就把他的太太派到我妻那里。那时我妻的境况，其实并不像报上所说的那样困难，虽则住在狭小简陋的弄堂房子里，还雇用着一个女孩子，所以据说当她受到这样好心好意的邀请时，感到十分难以为情；小林当时的生活并不怎样富裕，却作了这样的邀请，我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非常感激。事情尽管仅仅受到邀请，但是这仍然是我所受到的难忘的友情

之一。

言归正传。尽管新聞記者們鬧得那样凶，半夜两点钟以后还来打門，我妻仍然沒想到出了什么岔子，心想芳子去大阪就业，已有半年以上，新聞記者到现在才来追根究柢，也未免太糊涂了，所以还带着几分輕視的情緒，肚里暗笑着。

報紙上发表了这些消息以后的第五天，就是 12 日傍晚，我在椎名家被捕。那天主人椎名吃完午飯就出去了；下午沒有在家。傍晚很迟回到家里，才听說他不在家时所出的乱子，不觉大吃一惊。他后悔那天不該出去。虽說即使在家，也无能为力，然而总可以亲眼看到当时的种种情形，至少可以亲自和我道別，送我出門。

兴奋着的椎名，向他的面无人色的太太詳詳細細地問明了一切情况。吃完了很迟的晚飯，說了一声“應該馬上去通知河上太太”，他又走出家門。

我妻的住址，我早就对椎名讲过了。那是在同一个中野区里。走出椎名家，一直往南，越过高架电車軌道，爬过冰川町高阜，一直往南走下坡子，就是一条大馬路。再往南去，穿过另外一条大馬路，再走一段路，就是我妻住的地方了。走得快些，不过四、五十分钟的路程，可是椎名找門牌号数却費了一些時間，所以等他走到我妻家时，已經是深更半夜了。

他連忙对走出来的女佣說了自己的姓名，要她进去通报，恨不得馬上走进屋子去，心想我妻一定会立刻出来迎接他。由于早就听到我說过，所以他心里琢磨着：将要跑出来的大概是一个胖胖的妇人。

可是我妻却不知道椎名是誰。这是因为，当时搞地下工作的人，如果不是工作上需要，任何亲近的人都不让知道自己的住址。所以她想：“一个从来没有听說过的人，半夜三更来做什么呢？”抱

着一种谨慎小心的心理，勉强地走到了門口。一看，那里站着的是一个穿日本服的、四十岁上下的矮个儿男人，脸上显然带着一副兴奋的神色。椎名一见到她，仿佛素来熟識的那樣，連忙說道：“我是河上先生的房东椎名。”可是我妻仍然保持詭异的神色，也不馬上請他进屋子，因此他就在門口接着說：“事情是这样：先生今天被捕了。”

尽管这样，提高警惕的我的妻，还是疑心他胡說八道，也許是来刺探秘密的。她于是故意說些无关紧要的应酬話，仿佛被捕这类事情她根本想也沒有想到。

这时椎名才明白了，就說：“啊，原来如此，一心以为您知道哩。……我就是圣诞节承您贈送給孩子們信号机和西装櫥那家的人。这样一說，您总明白了吧。”这两样玩具是去年圣诞节前我让我妻在大丸百貨公司买了，托内田丈夫带到椎名家的。經過这样一解释，我妻才明白过来。

我妻急忙把椎名請到起坐室里，在火鉢里加了炭，敬了茶，坐定下来听椎名談了事情的全部經過。等到椎名告辞的时候，已經快十二点钟了。

那时，我在中野警察署的拘留所里，已經睡得死死的了。我被护送到这个警察署之后，就被带到这个警察署的临街的楼上。这间有四、五个署員在里面办公的髒里髒气的屋子，是特別高等科的办公室，所以里面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也沒有。^①原田警部帶着我，走进屋角的一个小房間。晚飯時間早就过了，原田說不管怎样，晚飯是要吃的，他說他叫荞麦阳春面，問我要什么，我就要了一碗炸虾面。到了这种地方，警察厅的警部是很威风的，署員們一听见原

① 按：特別高等科的警察，平常多穿便衣。——譯者

田說要叫荞麦面，就說了些“这儿的荞麦面意外地好吃”之类的奉承話，随后又把送来的两碗面連茶一起，恭恭敬敬地摆到桌子上。——现在回想起来，炸虾荞麦面，那是最后一次吃到，以后五年中間，从来没有尝过。

这样，很晚吃完了晚飯，我就受到原田的訊問。

訊問的是出生地、官职勳位、兵役、有沒有前科、学历和职业、著作等等，其实都是些用不着問的事情。直到最后，問題才接触到事件的本身。他問我，据說我曾捐獻一万二千元作为日本共产党的資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我回答說：“确曾听說大塚从我妻那里拿去了这样一笔錢，可是其他的事情，我却全然不知。关于这笔錢，在捐出以前我并没有参加商量，事前也没有答应捐獻。”

当时我因为在我刚才被捕时所看到的大塚的信上，写着这样一些話：“从今以后，我决計經常跟在您身边，竭尽我的力量保护您”，“但願姊夫能够早日回到对您最为适当的故乡——书斋里去”，所以打着如意算盘，一心以为这几句話的意思也許是說，一切事情，大塚都会承担下来，而把我开脫出去。而且据原田說，大塚被捕以后，絕食了几天，無論問他什么，他都不开口，最后才說，願意把姊夫的住址讲出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让他写信。可是，在那封信里却作出一个被捕的人所絕對办不到的“我准备經常跟在您身边”的許諾。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一定別有用意；正由于想正确无訛地向我传达那番用意，大塚才坚决要求让他写那封信的。我因为有着这样的想法，所以最初采取的方針是尽可能減輕自己的責任。

这正是我的大失着的开端。本来，既然下定决心搞非法运动，那末早該准备在被捕的时候坐几年牢；可是我呢，却始終急于減輕自己的罪名。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非常慚愧当时为什么不采取光

明正大的态度；想不到使我一开头就采取躲躲閃閃的态度的，就是大塚那封信。也許是我誤会了他信上的意思吧，不然的話，为什么当时大塚要写那样一封信給我呢？由于我們两人以后一直沒有见过面，所以到今天还未能向他本人寻問一下。

这一点，姑且不談。现在接着談原田的訊問。原田的訊問，当时只提到資金方面，沒有追究別的。而恰巧这又引起了我进一步的誤会。我想，看来还好，只泄露了資金一事；只要我不招供，人家将不知道我是个党员。我这样一想，也就有几分放心了。

簡單的訊問完毕以后，我就要被关进拘留所去了。

这个警察署是沿馬路的二层楼木头房子。拘留所在最后面，要走过一条长长的穿廊。房子旧得很，特别是拘留所又小又髒，不折不扣地是个猪圈。

那里点着半明不暗的电灯。在拘留所門口，我的錢袋、表、手絹、手紙、香烟、插在衣領上的牙签等等，全都被扣留了，連衣帶也未能幸免。那个看守，自始至終摆出一副非常冷酷的态度；等到一切东西都搜去以后，就把我推进角落里的一間屋子，鎖上了門。

那間屋子虽則髒得无以复加，在这拘留所里却还号称是保护室，因为屋子里总算鋪有席垫。屋子是四张半席垫大小，北面是正对走廊的門，門上装着鉄絲网。其余三面都是墙壁，只有东面有个小窗，开得高高的。后来才知道，这間屋子原来关着十几个妇女，为了給我呆，才把她們攆到鋪地板的走廊里去了。我进来的时候，这些妇女（除了一两个娼妓外，其余几乎全都是和左翼运动有关的女学生打扮的年輕女子）都挤在走廊西头，端坐在薄薄的席子上。当时我沒有想到她們是为了我才被攆到那里去的，所以当我一眼看到那副光景的时候，心里还想，女人受的待遇特別糟哩。

北面那一边，隔了一条走廊，正对着关我的那间屋子，东头角上是厕所，另外还有三间用墙壁隔开的屋子，靠走廊的一面都装着铁丝网，屋子里漆黑的，凭走廊里那盏半明不暗的小电灯，几乎连人头都分不清，可是，看来哪间屋子都挤满了人。关在那三间屋子里的，全是男人；除了那三间屋子和关我的那间屋子以外，唯有走廊东头有一个洗脸处，另外一点余地都没有，所以那些妇女就只好坐在走廊里了。

关在那里的人，全都得端坐。大约到九、十点钟吧，在走廊里监视的巡警，宣布可以睡觉了。从我那间屋子向外看出去，只有走廊里的妇女们的一举一动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我看见她们正当正月中旬最冷的天气，每三人合盖一条小毯子，平地睡在席子上。我的那间屋子里，总算有两条小毯子，虽则那毯子破得连叫花子都可能不愿意要，大大小小的窟窿，到处都是，只要动一动，就感到有尘土飞扬起来（虽则眼睛看不见）。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裹上毯子，枕头也没有，就在屋角里睡倒了。

奇怪的是，睡倒之后，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事，却只管想着凑得不巧而和我一同被捕的内田丈夫。我首先想，要是被讯问时，他将怎样回答呢。另外还担心正在重抄而被没收了去的堀江邑一的那份《论列宁党的建设》的原稿。这份稿子是堀江的笔迹，这自然不容易被发觉，但是，也必须提防万一出乱子。想着想着。不久我就沉入黑甜乡了。多年来惯于在深更半夜读书和写作的我，平常不吃阿达灵或卡尔莫叮（calmotin）这类安眠药，就无论怎样睡不着觉；就是被捕当时，我的抽屉里还备有那类药品；奇怪的是，不仅被捕的第一夜睡得很好，后来在前后五年的刑务所生活中，也几乎一次都没有因失眠而苦恼的事情。

《手記》里的假話

13日早晨，秀子清早醒来，不等晨报送到，就走出家門，为了报告昨夜所发生的事情，到高圓寺去找我弟弟左京。到了左京家里，才看到当天的《讀卖新聞》上刊登了《××博士被捕》的大标题消息。因为当时还没有解除发表新聞的禁令，所以姓名仍然没有登出来，可是看了那消息，誰都知道指的是河上肇。秀子和左京认为，既然这样公开上了报，大概去看看我也不要紧，于是馬上就到中野警察署。因为時間太早，經管人还没有上班，值班的人推說什么都不知道，不理睬他們。

两个人休息了一会儿，再去警察署。这一次由巡警部长大野接见了他們。他說暫時絕少会面的可能，可是据說这个案子的經管人——警察厅的原田警部說过，今天要见见太太，究竟如何，須要打个电话去問一下。后来他打电话同原田商量了一番之后，就叫我妻馬上去警察厅。

和左京一道去到警察厅的我的妻，做梦都没有想到她本人将受到訊問。她本来以为，同原田见面的时候，左京也在一块儿。哪里知道受到一場訓斥，跟左京分开了，她单独受到原田的正式的訊問，被录下了供詞。最后原田宣布当夜不能放她回家，随即把她关进拘留所。

她被关在类似单身房的小屋里，屋子里还有一个年紀将近四十左右的娼妓模样的女人。当天晚上盖着看守送来的一条毯子过了一夜，第二天仍然輕易不把她释放。她气得哭了。看守送进来的盒子飯，她也不想吃。到第三天晚飯过后，好不容易才被释放了；回到家里一看，身上已經带回三、四只白虱的贈品。正当用开水泡

衣服的时候，左京来了，那天晚上两人一直谈得很晚。

* * *

我的大女儿静子，还是我在京都帝国大学教书的时候就和该校工学部的副教授羽村二喜男结了婚，这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们两夫妇看到 13 日的报纸，也吃了一惊。

羽村坐了 14 日的夜车来到东京。15 日早晨到相生町一看，秀子隔夜才从警察厅释放出来。秀子见了女婿，高兴得了不得，而且放下了一桩心事。大学的工学部这种地方，按说决不会有人同情共产主义者，万一出了岔子，非但女婿在学校里左右做人难，而且也将给女儿添上许多烦恼，这是秀子平常所担心的，哪里知道全然是杞忧。据说工学部的许多教授，全都对我表示同情，劝我女婿即刻到东京来看我，他就来了，所以丝毫也没有左右为难。我妻听到女婿这话，才放心了。本来遇到什么倒楣事情的时候，惹得至亲们伤脑筋，是最令人痛心的事，可是现在情形却完全相反，所以她心里非常高兴。

还没有来得及细谈，羽村就说要去看看岳父，于是秀子马上带他到中野警察署。可是，尽管他路远迢迢地从京都赶到东京，警察署却连几分钟的会面也不加许可。羽村手里还拿着京都釜屋点心铺做的点心“黄梁”。点心总算让送进，于是他就在点心盒上附了一张名片，托他们给我送了进来，因为他想，至少也该让岳父知道，一出事他就从京都赶来了。

“黄梁”这种点心，形似方糕，软得像牛皮糖一样，上面满满地撒着黄豆粉似的甜粉，带有橙子的清香，是一种上等的点心。我看到用美丽的包装纸包好的点心盒上的名片，知道羽村竟然马上了，心里很欢喜。可是，女婿特意从京都带来的这点心，却不能拿到拘留所里去，没有办法，自己尝了一点，其余的全请特高科里的

那些人吃了。那些人一面毫不客气地吃着，一面夸贊“多稀罕的点心呀！”“味道多隽永呀！”恨得我牙痒痒的。

* * *

后来他們让我开始写所謂《手記》。为了写这个，他們白天把我从拘留所里帶到办公楼，就在楼上特高科办公室的一角，摆下紙笔，让我在那里写。

《手記》里所要写的事情，詳細规定在《手記填写須知》这份印刷品中，其項目如下：

- (1) 出生地
- (2) 官职、勳位、年俸、恩俸
- (3) 兵役
- (4) 有沒有前科
- (5) 住址的变动情况
- (6) 被捕年月日以及有关事項
- (7) 健康状况
- (8) 趣味、嗜好
- (9) 资产和生活状况
- (10) 家庭状况
- (11) 学历
- (12) 职业
- (13) 讀書
- (14) 思想变化过程
- (15) 政治运动
- (16) 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

甲、对日本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其目的的看法

乙、日本共产党达到它的目的的手段、方法

丙、本人对日本共产党的目的发生共鸣、并且决心为该党而进行活动的时期

(17) 入党

甲、入党的动机

乙、入党手續

丙、党名及党費

丁、入党后的地位

(18) 党的活动

不过我拿到的那份《手記填写須知》，其中最后两项（“17. 入党”、“18. 党的活动”），都用黑的斜綫划掉了，事先就叫我不必填写。因此，我更加一心以为我入党的事还没有暴露。我想，原田警部的訊問，也只是提到党的資金問題，现在叫我写《手記》，入党一层又完全不問，这就証明我入党的事到现在还没有被敌人知道。大塚大概也知道这种情况，怪不得他要写那样一封信了。既然如此，“早日重新回到原来的书斋里去”，也就并非不可能了。那末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存着这条心，把这个《手記》好好地写一下吧。

我在写“对日本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其目的的看法”这一部分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費劲。只要把自己的想法照直写出来，就行了。因为我想，事情完全属于思想的范围，而与行动无涉，所以无论写了什么，也不会因此就构成罪状。

可是，写到最后的“本人对日本共产党的目的发生共鸣、并且决心为该党而进行活动的时期”那一项，却非常伤脑筋了。按照我的計劃，应该把我的党员身分加以隐瞒才是。但是，我离开家庭隐藏起来，已经好久了。为什么要离开家庭隐藏起来呢？为了自圆其說，不露破綻，就非巧妙地編个謊不可。

可是，我最不善长的就是編造这类謊話。过去三十年中間，我

曾經写过許多东西，可是从来也沒有有意識地撒过謊。我写东西，虽然也往往发生錯誤，但是我从来也沒有故意欺騙过別人；要是自己觉得写錯了，总是尽可能迅速地公开糾正自己的錯誤。总之，我这个人，在写作方面，历来都是以做到无愧于心为宗旨的，所以现在参加了非法运动，碰到非在敌人面前撒謊不可的情况，要我无中生有，也就觉得非常为难。

我把我的离开家庭，推說是为了害怕法西斯团体的袭击。至于一万几千元的对党捐款，那是我不在的时候，大塚干的事，我从来也沒有参加过商量。至于直接参加共产党的活动，我一向认为自己还不够資格；只是在离开家庭、躲起来之后，才开始有了这种想法，觉得如果这种隱蔽生活能够繼續下去的話，那末給党提供一定的理論作品，并不是不可能。所以，如果要划“本人决心为日本共产党而进行活动的时期”的話，那末，在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也可以說就是它的开端；但是結果，我仅仅作出了那种决心，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做，就碰上了这次的逮捕。

我好不容易才捏造出了上面所說的謊話。为了写这篇拙劣的“創作”，我前后費去了三天工夫。

写到这里，我才結束了《手記》，最后写上“1933年1月19日，在中野警察署，河上肇”，按了指印。

20日那天，我把这篇东西又重复看了一遍，然后交給警察署。重复看的时候，觉得撒謊的地方，文章实在缺少生气。可是同时又觉得，这篇“創作”出乎意外地編得巧妙，过去一段时期的隱藏躲避，似乎被解释得很自然。但是，又想：“如果这份《手記》能通过的話，那末我直到今天为止，至多不过是日本共产党的一个同情者而已，罪状輕了，固然是好事，可是这样一来，又多么沒有价值呢！”想到这里，就未免有些伤心。前面曾經写到我在获得党籍的时候是

多么欢喜，可是那份欢喜，现在却将变成一场春梦，这对我来说，的确可算是件伤心事。

不过，这种担心，不久就变成多余的了。

戶澤檢察官的訊問

提出《手記》的第二天(21日)下午，一个姓戶澤的檢察官为了进行調查而来到中野警察署。

为此，警察署二楼西南角上沿馬路的那間挂着“高等科”木牌的小屋子給让了出来。那間小屋子本来似乎是科长室。

我先被带进屋子。等了一会，那个戶澤檢察官就在警察署員的陪同下走进来了。他是个大个子，精力非常充沛，看他的样子，似乎兴致很好，那副得意的神情，要掩飾也掩飾不了。

他还带来一个書記。我和他对坐在一张桌子上。

“哎呀，想不到在这种地方第一次和您见面，现在的确是非常时期啊。”

檢察官先用这种話开了場。等到将要正式进行調查的时候，他一下子改变了态度，声明說：“根据法律的规定，以后一概不用敬語，請勿见怪。”

那两句話說得实在俐落，我肚子里轉念：“这位檢察官先生真有一手哩。”可是，声明归声明，后来他仍然用敬語和我說話。

他从塞得滿滿的手提包里取出四、五份文件，念給我听。

“首先念风間丈吉的供詞。您認識风間吧。”

“不，我不認識这个人。”

“他是党的委員长，党名德川，和您见面的时候，自称平松。您看，就是这个人。”他把一张照相递給我看。

德川也罢，平松也罢，这两个名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听他这样一讲，我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平松就是党的委员长，真是万万想不到。我心想，其实没有必要再看照相，却仍然把那照相拿了过来；一看，照片上的那个人，和一向见面的平松，相貌完全不同。头发散乱，领带也不结，而且面相凶猛，和总是面带微笑的平松，简直完全不一样。我肚子里转念，大概是受到了残酷拷打的缘故吧。

“好，您听着吧。风间说过这些话。”检察官说，然后摘要地念了风间的供词。

“什么？都让知道了么？既然这样的话，好吧。”我心里马上就打定了主意。这时我说：“热得受不了，请让我脱掉一件衣服。”说完就把褂子下面的一件丝棉袍脱去。这件棉袍，是我因为要在既不见一丝阳光、又不生火的冷得要命的拘留所里不垫褥子、不盖被窝睡觉，才让家里送来的，而白天，我也把它穿在身上。可是，这间小屋子，却在火鉢里生着旺旺的炭火，尤其是那天正好是个大晴天，西南两面全都是窗子，屋子里简直热得叫人难受，连我这种怕冷的人，身上也都汗滋滋的了。

随后检察官又读了紺野与次郎（即滨田）的供词中的一段。那是作为风间关于我的入党的口供的旁证的，只不过短短的一段。

接着又念了某一中央委员的供词，这份供词最为详尽，风间的供词中所完全没有提到的一万几千元捐款的事，我在入党前翻译《共产国际新纲领》的事，以及用德文为这个《新纲领》勘误的事，几乎什么全都详细地讲到。

奇怪的是，我在出狱后翻查司法当局交给律师的有关文件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见到这份最最详尽的供词。现在我相信那份东西就是担任奸细的中央执行委员松村的供词。

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在那份供词中，讲到当我还住在

西大久保自己家里的时候，向党提出过一份《新綱領》德文譯本的勘誤表，那份勘誤表是德国的K寄来的；檢察官念到那个地方，問我道：“这里所說的德国的K，指的是K.P.（共产党）吧？”

我回答說：“不是，这是国崎的簡称。我推想那份东西多半是国崎寄来的。”从我嘴里吐露出別人的姓名，我觉得很不好，所以这件事情后来一直鮮明地留在我的記憶里。可是，后来查遍轉到律師手中的供詞，却再也找不出“德国的K”这几个字。因此我深信当时宣讀的許多供詞中，无疑地有一份已不知去向了。——我在另外的地方曾經讲到，《新綱領》德文譯本勘誤的事，連风間都不知道，而松村却記得清清楚楚的。当时通过資金局向党提出的这一文件，想必是被資金局最高負責人松村奸細搞掉了。

讀完三个中央委員的供詞之后，檢察官还对我說：“这是隱藏您的那个小儿科医生蟹江的供詞。另外还有两份您太太的供詞。这些供詞都不忍心念了，內容让您自己去推測吧。至于风間等的供詞，您要亲自看看也可以。怎么样，要看嗎？”他显示出他那胜利者所特有的、不会有亏吃的宽大。

可是我却不想看这些东西。我早就死了心，觉得既然一切全都暴露，现在除了什么都承认而外，沒有別法。

一想起为了把謊話編得天衣无縫而煞費苦心写《手記》的事，就觉得又可笑又可恨，气得要命。

檢察官最后釘問了一句：“怎么样，供詞里所說的事实，您承认么？”

“我承认这些大致都是事实。昨天交出的那份《手記》里所写的，跟这个有分歧，那是在撒謊。我想把它重新写过，能不能发还給我呢？”

我这样一讲，戶澤高声笑着說：“那份《手記》也在我这里。已

經大致看过一遍了。虽則是謊話，写了也就算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一旦交出来的东西，是不能发回的。现在就要录口供了，怎么样，時間已經不早，您还是先吃晚飯吧。我可以休息一下，等着您。”他边說边叫署員把我的盒子飯拿到屋子里来。当时我一日三頓都从附近的送牢飯的鋪子里叫盒子飯。等到盒子飯送进屋子，他說：“不用客气，請用飯吧。我要回家去吃哩。尽管穷，牢飯鋪的盒子飯，还不至于貪馋。不用客气，您請用吧。哈！哈！哈！”他故意高声发着笑，让我当着他的面，吃了晚飯。

等我吃完了飯，檢察官开始对書記口授供詞的內容。大概所有的供詞都是这样的吧，表面上尽管是問答体，一問一答却全都由檢察官随意編排，它的次序，和实际上所作問答的次序完全不同。最后，不消說，我在檢察官口授的那份东西上来了一套例行公事：“以上所录取的供状，經本人閱讀，承认正确无誤，签名按指印”。

檢察官的訊問，那天一次就結束了。

訊問过后，我所感到非常心安的是，我仅仅吐露了国崎医学士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任何与党有关的新事实，我都没有泄露。主要的事实已經全都暴露了，檢察官已經感到心滿意足，此外再沒有追究別的，所以我总算可以免于事后責备自己：泄露了党的秘密。本来我还担心着怎样說明同时被捕的内田丈夫的問題，哪里知道檢察官連問也沒有問起。因此，檢察官的訊問，並沒有使我感到什么为难，就通过了。这一点，不知道使我有多么高兴。一逕关在拘留所里的我，心里只管想把这一层快点告訴秀子，让她也高兴一下。

我自从潜伏到地下后，一次都沒有见过秀子，想不到三、四天以前，却在这警察署里见到了她。

当时我从拘留所被带到办公楼，正在二楼特高科的一間办公

室里写那个《手記》。我专心致志地写着，后来为了休息一下，放下笔抬起头来，出乎意外地和秀子靚面相见了。自从在西川一草亭的別墅里分手以后，这还是第一次见面。她是送衣服来的，正走上通向办公室的楼梯，刚刚露出一个脸来。那时我还被禁止和家属会面，不自觉地对她摇了摇手。她看到我向她摇手，就縮回去，可是立刻又露出脸来。她睜大了眼睛，目不轉瞬地看着我。我对她歪歪嘴，笑了笑。她也笑了笑，就走下楼去了。那时的印象犹如雕刻品那般地深深印在我脑子里，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檢察官訊問后的第三天，警察厅的原田警部跑来对我說：“今天让你同你太太见见面。”那时他从口袋里取出詩笺，叫我写字；詩笺就是被捕时沒收去的东西；被捕时連书画图章都被沒收了去，后来在落款时用上了：这些上文已經提过，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我被迫付出了以上的代价，在原田監視之下，那天和我妻作了大約三十分钟的久未见面的談話。

就这样地，檢察官戶澤在1月26日提出了起訴书，第二天27日，我就被关到丰多摩刑务所去了。所以警察署的拘留所里，我只呆了十六天。关进刑务所，普通总以为更加受不了；其实这样一来，我却渡过了一重最艰难的关口。

那个时期，和左翼运动有关系的人，一个个被捕，单凭刑事警察的个人意见，也不經過审判，就关进警察署的拘留所里，往往一关就关一年以上。警察署的拘留所普通被称为猪圈，实际上那也是不折不扣的猪圈。自然，同在一个东京市里，各个警察署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我所呆过的中野警察署的猪圈，还不算是最糟的；可是尽管如此，大白天里都是暗洞洞的狭小的监房里，人挤得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呆在里面，呼吸都觉得困难。按說，像这样的地方，是不可能有人上吊自杀的，而警察署方面却借口防止上吊，腰帶不

用說，連手巾、衣帶、領帶以至稍呈細長的东西，一概沒收了去。婦女們連細帶子都被沒收了。夜里两三个人合盖一条薄薄的毯子。談話是絕對禁止的。再加整天都必須端坐着。誰要是惹恼了署員，就会被拉到廊下，吃大苦頭，拳打、脚踢，抓住头发拖到东、拖到西，无所不至。無論关多少天，也不让洗澡，听由跳蚤、白虱造反。一个人，不管多么健康，如果在这种地方关久了，不可能不生病。那是軍部的、警察的日本帝国主义所保留下来的封建遺制的一个具体样品。至于刑務所，毕竟沒有糟到那种程度；在那里，究竟有被子可盖，有澡可洗，早晨和傍晚还有三十分钟左右的户外运动；尽管是杂居房，也不像拘留所那样，許許多多人关在一間小屋子里，挤得連动弹都动弹不得。所以，要是早晚要被起訴的話，誰都希望赶快办完手續，早日移解到刑務所去。不过，拘留期間像我那样短的，也許不多。

27日上午十一点半钟，和留在拘留所里的人們說了一声再会，我就离开了那儿。拘留了两星期多，我的头发和鬍鬚都又髒又长，身上穿着一套栗壳色捻綫綢褂子和棉袍，外套也不披，帽子也不戴，腰帶被沒收了去，就用針織品的围肚来代替，围在衣服外边。走出中野署門口乘坐警察厅派来的护送汽車的时候，守候在那里的各报館的照相班，一齐把鏡頭对准了我。

我首先被送到警察厅。秀子和左京都在那里等候着，我們在警務人員忙乱地出出进进的仿佛走廊一般的一間小屋子的角落里，获得了几分钟的会面。秀子預先从送牢飯的鋪子里叫来了我所爱吃的炸虾盖交飯和川魚片給我做午飯。我慌慌张张地一边吃着已經涼了的食物，一边同秀子和左京說了有限几句话。

飯一吃完，我們就該分手了。这时秀子忽然想了起来，奔到地下室的小卖部，买来一包不带紙嘴的蝙蝠牌香烟和·一包带紙嘴的

敷島牌香烟，递到即将起身的我的面前。

“平常喜欢的东西，老是丢不开，也不是事情。这种东西，我不要了。”我不拿她的。

秀子就說：“不是还要坐汽車么？”

她这样一說，我被提醒了，就拿了一包蝙蝠牌香烟放进袖筒。

“那末，我去了。”

“保重！保重！”

双方道了别，我被穿制服的巡警前后护卫着，走进走廊。那时早就在走廊里守候着的各报館的照相班，一齐挤攏来，把路都堵塞了，粗暴无礼地从前后左右对准了我拍照。有的还紧紧跟牢着我，我去警察厅貼隔壁的东京地方法院的預审室，他們也去到那里，直到我坐上开往刑务所去的护送汽車，他們还执拗地釘牢我几次三番地拍照。我不仅不像普通犯人那样，以被拍照为耻，反而认为是个极好的紀念，因而始終昂然地面对着这些照相班。我心里絲毫也不把坐牢当作一件丢人的事。

咯嗒一声，我被上了手铐，戴上犯人戴的，把整个头部遮住的深深的草笠，坐上了护送車。

关进丰多摩刑务所后不久，势如决堤洪水的疲劳

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由于半年的地下生活和半个月的拘留所生活，弄得更虛弱了。从中野警察署經過警察厅而被护送到丰多摩刑务所去，正当正月底天气最冷的时候。同坐在一輛車子里护送我的中野警察署特別高等科的雇員，看见我在半个月中間就瘦得那样，而且大冷天被解往刑务所，似乎觉得我很可怜，在車子里說了几句安慰我的话。

那天是个阴天，下午三点多钟，当我到达丰多摩刑务所的时候，天似乎已经黑了。护送车开进正门，沿着办公厅前的广场向左，最后停在沟通办公厅和关犯人们的牢房的走廊前。汽车司机似乎习惯于事前向犯人们索取将被没收的香烟，他在停车之前，就催我说：“河上先生，请把香烟给了我吧。”我就从袖筒里取出刚从秀子那里拿来的蝙蝠牌香烟，给了他。

下了车，从左手那边的门口进去，就是一个和走廊差不多的大屋子。从中野警察署跟来的雇员，走到那个走廊中间，就告辞说：“那末，再见了。”

“多承您照顾。请代我问候各位吧。”我说，对于这个相处半个月的雇员，分别的时候，甚至都觉得伤感。

就在那个走廊中，我换过了全部衣服。刑务所里规定，凡是从警察局拘留所里来的人，在入所以前，必须换掉所有的衣服，因为他们身上总带着臭虫之类。秀子早就听到这么说，所以预先给送来了一套衣服。不然的话，那时我就得穿上牢衣了。

随后就被带进牢房，那是一间铺三张席垫的单身房。过去从来没有关心监狱的情况的我，自出娘胎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牢房。比起警察局的拘留所来，牢房干净得多了。

几小时前，我还呆在猪圈里。那个地方，又暗又小的屋子里，荡漾着潮湿、骯髒、发着尘土味和馊味的空气，只看见好些个被强制保守沉默的人的头在蠢动。使室内格外显得丑恶的，是屋角放着一只没有盖子的便桶，粪便几乎满得要溢出来。我总算被关在所谓保护室里，里面铺有席垫，受到的已经是特种待遇；可是，即使在这种保护室里，那份阴暗和骯髒，也和圈猪的地方没有什么两样。而我，就在那种地方呆了半个月光景。现在我呆的牢房，虽则非常旧式，窗子极高而且小，比普通住宅阴暗得多，可是最初给我

的印象，却很清潔。再加，这里还允許家中送衣服被褥。因此我首先心下一安，思忖着：要是像这样的話，多久都能忍受下去。

不一会，我被看守长叫了出去。这个看守长是所有未决被告們收容区的負責人，似乎久經世故，岁数也相当大了。他看到我的样子，似乎很可怜我。我因为怕冷，身上穿着两件棉袍，按說我那瘦得犹如风干蜥蜴的細长身材，不至于显得那么瘦长了。可是，露出在衣領外边的头頸，肌肉松弛，骨头突出；灰白头发长得长长的黑黝黝的脸上，布滿大小皺紋和斑斑点点；这些都无疑地表现出疲劳的神色。走进看守长的屋子，我脫下草笠，深深地行了一个礼。他看了我一眼，就用同情我的口吻說道：“听說不久以前你还是大学里的簡任教授，这样瘦弱的身体，又上了岁数，忽然来到这种地方，不知道将来能否平平安安地服役哩。”（后来他亲自对我說，当时他是这样想的。）他似乎很会照顾人，溫和地让我坐近火炉，問了一些話以后，慈祥地說：“我們会在規則所許可的範圍內，給你一些方便；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向我提出。”

我向他郑重地道了謝。本来，我被捕以来，对那些公务人員，也就从沒有表示过反抗的态度。記得关在中野警察署拘留所里的时候，有一个担任看管犯人的巡警，体格魁梧，孔武有力，当我刚关进去的时候，他曾經大着声音，指桑罵槐地吆喝說：“老子最恨共产党。那些卖国賊，非狠狠收拾他們不可。”我听到这类話，不禁心惊肉跳，岂知过了不久，他却說：“河上这家伙着实可佩，半句怨言都沒有說过。”还让我到走廊里烤他的火，一天两三次地把沒收得来的香烟分給我抽。这位老练的看守长，大概一眼就看出了我这种态度。

“送伙食的問題，今天晚上已經来不及解决了；如果由府上去办手續，那就会拖得很久，所以还是由我来想办法，讓他們从明天

早晨起給你送進來吧。”

他一開始就對我表示這種友好的態度，連吃飯問題都給解決了。不熟悉刑務所生活的我，呆在該所的期間里，始終沒有能弄清楚這個老看守長的姓名，後來獲得了自由以後，也終於沒有能對他表示謝意，但是，剛關進該所時他所給我的好印象，我長久沒有忘掉。

他們當天就給我換了一個牢房；這大概也是出於看守長的好意。最初那間屋子，是個普通的單身房，後來的那間，却是能關八個人的雜居房，讓我一個人獨占了。單身房，屋子小，天花板出奇地高，窗子也又高又小，呆在里面，就像掉落在洞底一般；而雜居房卻大得多，所以天花板雖則一樣高，卻沒有地窖那樣的陰森森的感覺。窗子雖則也同樣高，同樣大小，然而東南兩面都開了窗，上半天一屋子都是太陽光。地板中間鋪了兩張沒有蒙席子的草墊。已決犯雖然只給一張薄薄的席子，然而未決的被告，却好歹有草墊可睡。屋子里還備有幾塊粗糙的木板制成的極簡單而且矮小的書桌。後來過了不久，家里的東西送進來了。里面鋪了許多棉絮的新做的又大又厚的褥子，又輕又軟的絲棉被，羊毛毯，坐墊，什麼都齊全了。除了三頓飯由牢飯鋪送盒子飯而外，秀子還經常送些糕點和水果進來，所以絲毫都不覺得不自由。再加，每天還可以做不滿三十分鐘的戶外運動。天晴的日子，全身都能照到太陽光。凡有這一切，都是被捕前過着地下生活的我所從來沒有享受過的。

還記得，在刑務所里睡過第一夜，第二天早晨，我獨自呆在牢房里，只聽見踢趿噠啦踢趿噠啦連續不斷的許多人的腳步聲音，覺得很奇怪，當時還以為大概是附近有幾大紗廠或什麼的，那聲音是大批女工急急忙忙趕到廠里上班的腳步聲。

管運動的看守喊了一聲“運動！”，把牢房門打開了。犯人們戴

上草笠，由看守押着，到运动場去。到了泥地上，大家就脫去室內用的草履，穿上事先准备好的木屐，然后走进高高的板围里。这种板围有十几个，以正中央的高台为中心，排成輻射形，高台上站着監視的看守；那些板围就像横躺在那里的狭长的富士山一样，进口宽，愈到中央愈窄。因为大家都想利用这样一片小小的地面、在指定的時間內充分地运动，所以都跑着步。我这才明白，在这里住过一夜后，第二天早晨所听到的，就是这个脚步声。每天能在戶外跑步三十分钟，对于多年蟄居在书斋里的我説来，也就运动得够充分了。

一切情况都使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生活，那末無論多久我都能过得下去。这就使我放下了一件心事，解除了一个顾虑。

不过，与此同时，日子呆久了，离开家庭以后我那极度紧张的神經开始松弛了，于是肉体上也开始显示出要生病的征兆。我自己觉察到，自从移押到这里以后，还不到半个月，夜里身上就出虚汗，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再加腰部鬧起风湿症来，連走路都感觉有点困难。我心里想：“身体似乎不大对头了，要不及早打起精神，击退病魔，可不成！”因此，每天不到三十分钟的运动時間，也极力同年輕小伙子們一样跑步，但是体力毕竟支持不住了。而且夜里虚汗出得越来越厉害，睡衣睡褲簡直如同浸过了水的一样，被膩嗒嗒的粘汗湿透了。这是我生平从来没有經驗过的异状。

恰好这时主任看守来到牢房前，同我攀談説：“幸而身体沒有出毛病，总算还好哩。”

我終於据实告訴他：“其实不然，这一陣，虚汗出得簡直沒有办法。”

于是他説：“是么？这可不成。让医生給瞧瞧吧。”馬上給我办了手續。

第二天我被叫了出去，受到一个年轻医生的診察。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的体温是三十七度八，脉搏一百零九跳。

医生问我：“觉得很不舒服吧？”

我老老实实回答：“不，自己并不觉得怎么。”事实上，平常我即使发三十八度以上的高烧，自己也并不觉得，脉搏次数从小就比别人多，稍稍运动一下，或者受到一点激动，马上就超过一百跳以上。

“运动的时候跑步，也许不好吧？”我担心地问。

医生说：“跑步太剧烈了。至多只能慢慢地走动走动。可是，没有什么大不了，大概是感冒。”

回到牢房后，我想起了八、九年前还在大学里教书时所经历过的类似的症状。当时我患了感冒，发着高烧，在家休息了很久，可是热度始终不退清，于是请了我那时所最信任的医学部教授岛藺博士来給診察。

博士十分仔细地診察过一遍以后，劝我说：“为了预防万一起见，最好还是向学校请一时期病假，到别的地方去轉地疗养。因为你的体质本来不大好，所以还是小心谨慎点好。”

当时我刚刚担任经济学部部长。换了别人，谁都愿意当部长，可是我却不愿意为这种行政上的杂务花费时间。再说讲课对于我也是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我想如果这时候能以生病为理由，辞去部长一职，而且暂时不上课，那就再好也没有了。于是我当下就听从了博士的劝告，由博士介绍（博士是纪州人），去纪州田边镇作了一个多月的轉地疗养。

后来过了两三年，我曾因同样的症状，又去纪州和歌山市附近的新和歌浦望海楼度了一个多月清闲日子。

就像这样，我的身体，一向总好比对付破东烂西那样，加以特

別照拂，才沒有出毛病；所以秀子常說，要是我有一天被关进监牢，可能一下子就垮了。这一点，連我自己也这样想。这时我虽然回想到这些事情，但是我生来是个乐观主义者，所以觉得一切不用担忧，过些日子自然会康复。岂知过了两天，主任看守跑来通知，說要把我迁进病房去。我心里想，还是不要这样小題大做的好，就拒絕說：“不，在这里很好。”

哪里知道刑务所这种地方，根本不理睬本人的意志。主任看守說：“病房里舒服得多，而且手續已經办好了。”

不管我願意不願意，他馬上叫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牢房里的一個穿赭色囚衣的杂役夫和病房方面派來帮我拿东西的一個穿浅葱色囚衣的看护夫帮我搬被褥和衣服，我只拿了药瓶，跟在他們后面，穿过陌生的獄舍，就迁到病房去了。

就这样地，1月底进刑务所的我，3月初馬上就成了病房里的人。

病房生活

病房分为杂居房和单身房两种；杂居房里关的是穿赭色囚衣的已决犯，至于未决的被告，都关在单身房里，为的是不讓他們同別人交談。我当然也被关在单身房里。粗看起来，这种单身病房和我所熟悉的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改建前的旧病房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既干淨，又敞亮，和原来我所住的牢房，簡直不能相比。

以前我呆的牢房，四面都被森严的厚墙威压地包围着。沿走廊的一面，在厚实的木头門框上装着一道笨重的鉄門，每次启閉，地都給震得发响，外界的声音也給隔断了。門上一人高的地方，还

开了一个小洞，外边有盖子盖着，看守经常开启盖子窥探室内的动静，而室内的人却一点也看不到走廊里的情况。门对面的墙上开着窗，那窗开得比一个人还高，通过这个既高又小的窗，只能看见一小块天空，至多只能让人知道今天是晴天还是下雪天。

可是，新迁进的病房，窗子开得和普通民房一样高低，沿走廊的房门，上半段装着可以拉开和拉拢的玻璃窗，走廊里的情况全可以看见。屋子里还有床，而且那床和普通医院里的没有多大差别，是铁床，上面还铺着厚厚的草荐。床头还有放药瓶的搁板，那搁板的高低，既可以坐在床上利用它做饭桌子，又可以利用它做书台；搁板下面另外有一个架子，架子上也可以放东西。窗子左边靠墙装有类似书架的小小的木头书橱。左边屋角里是洗脸的地方，拧开龙头，随时可以放出水来。右边屋角里，是抽水马桶。尽管那抽水马桶露出在地板外面，可是由于马桶和铁床中间有个毛玻璃的屏风把它遮住了，所以看不见。以前住的牢房里，是用洋铁桶来盛水：一只洋铁桶里盛清水，用过的脏水，得积在另外一只洋铁桶里。屋角的厚墙壁，挖开了一块，做成小小的壁橱的模样。揭开那里的遮板一看，里面放着一只又脏又旧的木制便桶。清洁夫每天两次来取粪便，可是所谓打扫清洁，徒有其名，便桶之脏，简直和农家的粪桶不相上下。使用的时候，得把它直接放在地板上；可是，送进来的盒子饭啦，只包一层纸的面包啦，以及点心之类东西，也都得直接放在同一平面的地板上，所以实在受不了。而现在呢，不仅避免了这种不愉快，而且还有一件使我更加高兴的事情，就是以前在牢房里白天不许躺倒，而病房里却完全随我自由。

我本来懒得搬东搬西，可是搬来以后，觉得究竟不差，所以很高兴。整天不看书也不运动，只是昏昏沉沉地睡大觉。看来我似乎需要无穷无尽的睡眠和休养。

这样靜靜地躺在鉄床上，就觉得自己确实很疲劳了。长时期积聚下来的疲劳，犹如决堤洪水一般，滾滾而来，无论睡上多少天，也睡不够。

病房的白漆天花板，由于一次一次的漏雨，形成了浓浓淡淡的茶褐色水漬。整天仰臥在床上，对着天花板，那些水漬，一个个都像活生生的怪物。当我这样地看着天花板的时候，最近半年中間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犹如走馬灯那样在我脑子里断断续續地浮现。我就像做梦一般地看着这种走馬灯。

出现在走馬灯上的画像之中，有这样一幅。那是我还在中野警察署的时候，被拘留的一个女学生和她母亲会面时的情景。

当时我从拘留所里被叫到特別高等科办公室写《手記》，看到母女两个在我旁边說話。年紀看来快到五十岁、身材矮小、性情怯弱、面容憔悴的母亲，从手絹包里取出用木片盒子盛着的魚肉飯团，让女儿吃。听到媽媽怪她不好而伤心的女学生（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像她母亲一样矮小），眼眶里含了一泡忧伤的眼泪，却不取来吃。只听到她輕輕地說：“直到现在，我还不承认我做錯了什么事。”我心里猜测，也許这位母亲平常省吃俭用，一手把这个独生女儿养大成人，而女儿临毕业前，却被关进这种地方，要是一旦被学校开除，那末母亲多年来的好梦，会像掉落在石头上的玻璃瓶那样，砸得粉碎吧。现在面对着这种无可挽回的命运，年迈的母亲和年輕的女儿，內心里各有一番悲愁，此情此景，够多么伤心呀。我这样想像着，心里好不难受，几乎不觉掉下泪来。这时那个知道我的来历的母亲，埋怨似地怪我說：“都是老师們不好呀。您的小姐，做出了那种事情，是听大人的話，是孝順爹娘，可是我的孩子学了她的样，我却吃不消。”我本来打算讲几句话安慰安慰那位母亲，可是在許多公务人員面前，一下子想不出适当的話来，只得苦笑了事。

不过，做母亲的那番类似责备的话，就像梗在喉头的鱼骨那样，永远刺着我的心。

大白天也昏昏沉沉地睡着觉，一睁开眼睛，像这种最近发生的事情，就仿佛山头涌起的夏天的浮云那样，起伏变幻着。——体温虽则不久就降低了，盗汗却老是出个不停，一夜中间，睡衣总得换两三遍。

就这样，一个月像做梦一样过去了，天气有时暖得叫人想赤膊。春天到来了，甚至连住在监牢的病房里，都觉得春意盎然，春光越加浓厚了。

日子一久，原来不习惯于刑务所生活的我，对于周围的情况也一点点熟悉起来了。同每天来量体温的看护夫（全都是已决犯，只有他们不穿赭色囚衣而穿浅葱色囚衣），也有机会讲几句话了。

这里的病房总共三栋。毛病比较重的病人关在第二病房里。它的北面是隔离病房，有走廊相通。关轻病人的第一病房，和第二病房并排，两栋病房的中央有风雨走廊相通，形成H形。关我的那间屋子，是第一病房中部的单身房，右边就是通向风雨走廊的过道，只有左边才有毗邻的病房。

隔壁那间屋子，本来一逕没有人住，可是有一天傍晚，却传来一阵非常痛苦的呼卢呼卢的声音。那是一种难以言传的古怪的声音，就好像是刚吃下去的东西，要呕出来，堵在喉头，把呼吸都堵住了那般的。

我心里想，“隔壁那个病人可真是古怪，每次吃饭的时候，就发出这种讨厌的声音来，真叫人受不了。”

后来又听到唧唧噥噥低声说话的声音。我又想：“看来在这样的牢房里，生病的时候，也还有人服侍，给揉背啦什么的哩。”

过了一会儿，那持续了许久的凄惨的呻吟声才平静下来，忽然

传来一阵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还听到喊：“五点四十七分正。”

这时我想：“那个古怪的声音，可能是誰在断气的声音吧。那种毛病，也许就叫做痰壅。”这样一想，就怪噁心的。

第二天起来一看，果然是死了人。只听到走廊里锯木板、钉钉子的声音。在忙着做棺材哩。从玻璃窗里看出去，只见走廊的窗口摆着一张桌子，桌上供着香炉和褪了色的纸花之类。没有听到念经的声音，看来只用这些东西供着昨天夜里新亡故的死人。

死掉的那个人，是坐牢坐了不久的徒刑犯。昨天傍晚正在纺织工场作工的时候，突然脑溢血发作，跌倒地上，当场人事不省，终于一句话没有说就死掉了。本来是一个五十四岁的挺壮健的人，因为一下子断了素常爱喝的酒，身体就出了岔子。电报虽则打了出去，家属却还没有来，据说今天会来收尸。到时候，尸体将从隔离病房北边那个铁门紧闭的后门抬出去。人要是坐了牢，从后门抬出去的话，也就完蛋了。——这些都是从量体温的那个看护口中零零碎碎听来的。

尸体搬走后的第二天，隔壁房间里又住进了人。新来的那个人整天都很安静，不过奇怪的是有时突然三呼“日本共产党万岁”，他把“日本”两字顿一顿，然后接着喊“共产党万岁”；三呼完毕，沉默了一会儿，不久又喊起来。那个声音沉郁得犹如石头一般。声音虽则低沉，可是因为病房里很静，连杂居房都不许说话，所以附近各个房间都能听到。“日本共产党万岁！”这几个字，我虽则不时见到，可是听人喊这个口号，那天却是第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到晚在走廊里监视着的主任看守，听到了也装做没有听见，一次也不去阻止。我肚子里想：“以前早就听到人家说，精神饱满的共产党被告，在监牢里还勇敢地继续作着狱中斗争；果然不错，这个人住在病房里也还是打算搞共产党的宣传哩。”

那时我已经睡够了觉，不再成天躺在床上，时常走到窗口，从玻璃窗里往外看。可以看到一些第二病房里的人，由看守跟随着，从走廊里走过，到诊疗室去看病。其中有些与共产党有关的被告，似乎认识我，看见我站在窗口，他们一定在走廊半中间停住脚步，把草笠挪到一边，露出脸来，和我招呼说“你好吗？”或是“请保重！”犯人头上那顶草笠，本来是为了不让人家看出脸孔，才给戴的，而且监牢里禁止和别人交谈；可是这些人根本不把看守放在眼里，满不在乎地挪开草笠和我讲话，而旁边的看守呢，见了也只当做没看见。特别是管医务室的那个看守，个子很矮小，因此被告方面，反而显得威风堂堂，他们在走廊半中间停下脚步、挪开头上的草笠、对着我打招呼时的那副潇洒态度，简直使人联想起《劝进帐》这出古典歌舞剧里的男主角辨庆，下场时走台步的神情。我自己从来没有对看守们采取反抗的态度，而且也不想那样做，不过看到这些人的斗争的勇气，心里仍然不禁感到佩服。哪里知道有一天，隔壁房间里不断地传出扔东西的声音。看上去，事情有些不对头。走到窗口向天井里一看，邻室的窗前本来种着一棵大冬青树，树下丛生着棘棠草，右手半边有棵木瓜树，树上开着营养不良、失去光泽的红花，现在那一带的地上，乱七八糟地扔满了麦饭啦、菜啦、水果皮啦以及破碗烂碟之类。

看到这种狼籍的样子，我才体会到：“本来就觉得奇怪，毕竟是个疯子。”

那个人不久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个刑务所里，设有关精神病者的特别牢房。尽管如此，那种牢房却不像伦敦的监狱里那样具有周到的设备，只不过是装有铁栏干的、储藏室模样的一所小房子而已，而且屋子只有两间。地方离普通病房很远。刚才所说的那个人，搬到那里去后，起初还常

常高声叫喊，后来喊声忽然听不到了。据说搬到精神病专科医院——松泽医院去了。

这种病，称为拘禁性精神病，年轻人最容易得。五·一五事件^①中被株连的老百姓后藤某，也得了这个病，当我关在小菅刑务所里的时候，他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变态，听说后来病状日见恶化，释放出狱后，终于因这个病而死亡了。他是一个体格十分强健的青年，还不如我这个身体衰弱的老头儿经得起风险。

还想到一件事情，现在顺便谈一下。那个时候，我的胃口开始一天不如一天，每天送进来的三顿盒子饭，总要剩下一大半。那盒子饭是我妻不惜重价，让牢饭铺送来的特制的最上等的盒子饭；饭盒子是双层的，上面一层盛满了相当讲究的菜。但是，一则也许是生于生了病，消化器官发生了障碍，再则也许因为究竟是牢饭铺做出来的东西，原料和烹调法缺少变化，所以日子久了，我几乎只是稍微吃两筷，大部分总剩在盒子里退回去。后来我对牢饭铺提了意见，要他们变变花样，于是有时送来了鱼肉饭团，有时送来了烤鳗鱼，但是仍然不发生效果。每天总搭在菜里送来一次或两次的鱼糕之类东西，我简直一点也不想吃。我妻特地到新宿买了送来的大蛋糕，虽然盛的纸盒很漂亮，蛋糕上面涂着厚厚一层白色奶油，可是说来罪过，我还是不觉得好吃。1944年11月的现在，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食物极度不足的时候，我想到往年筷都没动就扔掉的鱼糕、烤鳗鱼、铜盆鱼生鱼片以及颜色鲜艳、形状美观的日本点心和西式点心，就觉得不胜可惜，心想如果现在能吃上一个有多好呀。

^① 指1932年5月15日一部分青年海軍军官和陆軍士官生刺杀内閣总理大臣犬养毅的事件。——译者

稀奇的錯觉

不知不觉中間，已經是暮春天气了。围墙那边，不知是誰家的第宅，从病房里看出去，北边的高墙外面，有一棵巨大的千瓣櫻花树，本来把花开得遮蔽了蒼空，仿佛在夸說只有它独个儿才代表着烂漫春光一般；可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却已謝得踪迹全无。藤花终于盛开了。

这样写来，似乎文不对題，多此一笔；可是在我說来，却不能不在这里插叙一下只看了一个春天的高墙外那棵千瓣櫻的回忆。从病房里看到的那棵千瓣櫻，真是丰艳美丽之极。后来想到，世上的有錢人，按說决不会在监牢旁边造自己的第宅或別墅，可是当时的我，见到那棵比水泥墙还高、滿树开着如同飲过酒的少女的丰满紅潤的脸頰似的花朵、極枝杈呀在暮春的天空里的巨大的千瓣櫻，却不由地想像那里一定是个宏大的庭园。我还联想到那个庭园里有池子，里面游着紅鯉魚；有石灯籠和各种形状的石头；还有在走廊里跑得登登响的文质彬彬的书僮，和輕輕地在打扫茶室的、头上梳着高髻的使女。当时我真想看看那个第宅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哪怕在大門口张一眼也好。我筹思着，要是将来重新获得自由，无论怎样也得来看一看那个第宅的模样。后来，大約过了六、七年，我刑期滿了，从小菅刑务所释放回家，在杉并区天沼附近住了一个短时期后，又搬到中野区冰川町居住。有一天心血来潮，就到丰多摩刑务所去察看它周围的情形了。看过正門(我心想，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所钻的牢門了)之后，就繞过日光被高高的水泥墙遮住的馬路，去看背后。照說，那里應該有一所宏大而漂亮的第宅，就像我住病房时所設想的那样。岂知去到那里一看，压根儿沒有那回

事，只看见一大片旱田，远处有个低低的肥料棚那样的东西。田里树着一根白漆方棒，标明那里是刑务所的附属农园。窄窄的公共汽车路的两旁，灌木丛下密密地长着野草，再往前走几步，路旁有个青面金刚祠。所见到的就只有这些东西。我简直以为被狐狸精迷住了。

人要是突然和原来生活的那个社会隔绝，一下子关进监牢，那末就会弄不清楚自己在时间方面、空间方面所占的位置；不到完全习惯于刑务所生活，就分辨不出现在究竟是什么时候（无论是在白天或是在晚上），自己究竟在刑务所里哪个地点；就好比身体飘在半空里那样，觉得无依无靠，心慌得紧。这种飘忽不安的感觉，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是不会理解的。由于这种突然的隔绝，往往会在半路上忽然弄错方向，把南当作北，北当作南。例如我当时一心以为自己是从朝南的正门进监牢，然后一直线地向北走的，岂知其实却是从朝东的大门进去，不知不觉中间，拐到了北面。住到病房去以后，总算根据太阳出山和落山，大致分辨出了东西南北的方向；可是脑子里一直以为当初自己是从朝南开的正门进来的，这就是我的错觉了。事实上，正门是朝东的，后门并不在它的背后，而是开在它的右手半边的高墙的下面。

果然不错，当我往回走的时候，看到沿马路的北边的墙上，有一个地方装有一扇可以启闭的门，而它的北面，隔着一条马路，正对着刑务所的高墙，有许多公务人员的住宅，内中比较大一些的所长的住宅门口，果然有棵年代久远的巨大的樱花树。我当初从病房的窗口每天看到、认为美得不能再美的那棵千瓣樱，只不过是这棵树而已。这时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到了监牢里，心理上发生了变态，的确会产生出种种稀奇的错觉。这在我是件非常意外的事，所以虽然别人一点也不感到兴趣，我却仍然在这里噜噜苏苏地把

它写了出来。

现在言归正传。到了樱花落得踪迹全无、藤花也已盛开的时候，可能是由于得到了长期休养的緣故吧，我大大地恢复了健康。盗汗虽則沒有完全停止，体重却逐渐增加了，連医生都說：“最初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瘦得不得了，这一向可好看得多了。”

实际上，我的体重（病房每星期給称）最初是四十八公斤又二百克，后来称一次重一次，到4月初旬，已經超过五十公斤了（进入5月后，竟然达到我生平的最高纪录——五十二公斤）。医生說：“像你这样的年龄，体重能这样地增加，实在是个好现象。”这大概是由于长期間的疲劳得到了恢复的緣故吧。

本来整天昏昏沉沉仰面睡大觉的我，这一陣子，白天时常离开了床鋪，靠在正对天井的窗口，从黑鉄栅空隙里看着天，不然的話，就盘腿坐在床上，看看天井，或者看看走廊里走过的人，来消磨时光。

有一天，走廊里走过一个被告，他突然抬起头来向我的屋子看。我一见那张脸，吃了一惊。原来是杉之原舜一。

上面已經讲到过，他是我离家之前同我联系的共产党员。那个时候，他每星期差不多总要来看我一次。可是，那时候的他，总是把异常浓重的鬍鬚，刮得光光的。而这天所见到的他那张脸上，漆黑的落腮鬍子长得犹如杂草一般，再加头上戴着草笠，面相完全变了。因此我第一眼看他时，吃了一惊，第二眼看他时——他已經快要走过去了——还疑心自己眼花呢。我心里思忖：在这种地方遇见他，这太奇怪了，而且他平常身体似乎很强健，决不会到病房里来，一定是我看錯了。

可是，第二天早晨不动声色地一問来量体溫的看护夫，才知道果真是杉之原。

“隔壁第二間屋子里，关着一位日本大学的教授——杉之原。你認識他吧？”

“不，我不認識。”

“可是他却認識你哩。”

“我也听到过他的名字，可是还没有见过面。”

我同那看护夫这样攀談着。

挨着屋子量体溫的看护夫，有一叠大家的体溫检查表。我請他把杉之原的一份翻出来让我看。一看，杉之原的体溫每天总是在紅的橫綫上面一格——三十八度的地方起伏着。我看到这个表格，皺皺眉，觉得不妙。据看护夫說，他以前曾經住过一次病房，病情好轉后，搬到临时病房，过了一个月光景又回到这里来了。

知道了这些情况以后，我暗中可怜杉之原，后来还老是对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这是因为，我的党内党外活动，其中直接同中央委員发生关系的部分，早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唯独通过杉之原的关系的那部分，却始終沒有人知道。

“我是到死也不会泄露机密的，以后無論什么时候，尽管对方怎样說得像那么回事，你也千万不要上当，只說是什么都不知道得啦。”

他第一次来联系的时候，以及后来，曾一再說过上面那番类似起誓的話。我这个人，本来就容易相信別人所說的話，至于初次同党发生关系时直接从一个黨員嘴里听到的話，自然也不折不扣地信以为真了。

我在病房里初次见到杉之原的时候，就已經听說他泄露了各方面有关系的人的許多秘密，許多人都对他不滿。尽管这样，关于我这部分事情，我仍然深信他严守着秘密。我当时认为，他的預审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完結，也許就是因为这个緣故。我心里这样

想：“也許由于某种情况，如果他不招出同我的关系，就不可能自圓其說，但是他仍然頑強地保守着秘密，因此預審推事发起脾气来，老是不給他結束預審。我曾經听說，如果被告始終拒不招供的話，有时会把他的关在未决監里一两年，始終不去理睬他；现在的杉之原，也許正受着这种罪哩。他一逕发着三十八度以上的高烧，要是預審能够爽爽快快地結束的話，准能保释出外，可是他为了不願給我添麻煩，所以才那样坚持下去；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叫人过意不去了。不过，我的預審已經差不多快結束了，希望他再坚持些时候才好。”所以每次和他視線相接触的时候，我总对他投以感謝和盼禱的眼光。

好久完全不出去运动的我，等到久雨初晴，每天总在运动時間里到天井里去活动活动了。管运动的看守，每天一次把关着的被告一个一个地叫出去，讓他們在監視下在病房附近的小块空地上做三十分钟的自由散步。在这种运动時間，我老有机会同杉之原互送目礼。

要到天井里去，必須經過走廊，自然就得在杉之原的屋子前面走过。走过那里的时候，我就稍稍举起草笠，把脸轉向他的屋子；而他呢，早已听到开房門的声音而知道我要出来，就坐在床上，把讀到半中間的书合在膝上，看着房門上的玻璃窗，等候我的脸孔出现。我虽則一句話也不能同他說，却总是使劲向他投以充滿感謝和盼禱的眼光。

安排給做运动的地方，在病房北面老远的空地上。我到了运动場，杉之原就走下床来，靠在窗口，探头望着外面；可是窗外空隙很小，鉄柵栏挡在前面，只能看正面，看側面却費劲。所以，他也許只能朦朦朧朧地看到一个瘦长身材的老年人，腰里束着一条黑帶子，走起路来样子很特別而已。而我呢，也只能分辨出一个黑黑的

人头探在窗口罢了。可是，从北面数起第几个窗口是杉之原的屋子，这是清楚的，所以我就一个劲儿看着那个黑黑的人头，同他作无言的交谈。等到杉之原出去运动而我在屋子里的时候，情形也是这样。

这样，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4月18日，我的预审结束了。预审推事池田，最后那天问我：“据今泉说，你还曾通过杉之原捐献给党一大笔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吃了一惊，却极力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答道：“这件事情我完全不知道。”等候着他下面再说什么。

可是池田说：“算了，这件事，另外再说吧。”他由于检察官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都大致有了交代，就作出了预审结束的决定。

后来知道，在这以前的4月7日，这个池田推事传讯秀子时，也曾问到除了已经知道的几笔钱之外，有没有通过杉之原捐出五千元这件事；当时秀子含糊地回答说：“杉之原先生的名字倒听说过，却从来没有同他见过面。”当时也就这样过去了。

这是因为，池田推事讯问今泉（关于这个人，前面已经详细地写过了。是大森事件中第一个被捕的党员，由于他把党的秘密和盘托了出来，而且他的记忆力又特别强，所以他的招供给许多人带来了麻烦）时，今泉说过这样一句话：“听说是从一个著名的经济学者那里捐来的。”所以池田猜想那准是河上了。

预审既经结束，我的屋门口就挂上了一块“预审结束”的牌子，而把以前所挂的一块“禁止接见”的牌子卸去。我心里经常祝祷着：“但愿杉之原快些看到这块预审结束的牌子！现在，预审结束的决定都已作出，但愿他再加把油，像过去那样地继续给我保守住秘密！”这是因为，当时我抱有一个天真的希望，那就是，我既然生了病，甚至住病房，预审完毕后，也许能让我暂时保释出外。还有

一层，就是檢察官的起訴书中，大致只提到我入党后的一些情节；我深怕一旦暴露出入党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还曾通过杉之原和党私下往来，事情对我有所不利。——所以，我犹如祈祷神佛那样地祝祷杉之原給我繼續保守秘密。

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事实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的指望，那时早已完全落空了。当时杉之原早已把他和我的关系招供无遗了。至于他的預审之所以还没有結束，那是因为和我完全不相干的別的情节，由于牵涉到其他的關係人，还没有調查完毕的緣故。——可是，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当时担任訊問杉之原的西久保預审推事，把杉之原牵涉到我的供詞压下了，既不向处理我的案件的戶澤檢察官泄露，也不向池田推事泄露。因此，預审决定书所談到我的罪状就比实际上輕得多，而且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节外生枝。

我作为杉之原供詞的証人而被西久保預审推事传訊，是在預审結束后过了一年多——1934年6月26日。那时我的判決已經确定，执行已經九个月了，突然，西久保預审推事亲自来到小菅刑务所，对我进行了訊問。一听到預审推事传喚，我抱了一种新的危惧；岂知等走到預审推事面前，預审推事首先对我說：“証人的判決早已确定，現在已經在执行中，所以即使发现了新的事实，也不会影响到判刑的輕重了。现在首先提醒你一下，希望你明白这层，坦白地陈述。”然后宣讀杉之原的供詞給我听。那供詞实在詳細极了。內中先說到某年某月某日由誰的介紹，以黨員的身分和我初次见面；然后說到我給党的定期捐款，最初每月多少，从某年某月起，增加到多少；临时捐款某年某月几百块，某年某月几千块，还有某年某月公債票多少等等；連为了同莫斯科方面联系而設定的地址，某年某月以前由某区某町某号的某某轉，从某年某月起改由某区某町某号某某轉，也毫无遺漏地詳詳細細招了出来，真叫人佩服。

他有那样好的记忆力。猜想起来，有些细情末节，预审推事也许并没有寻根究柢地加以讯问，可是他为了博得检察当局的好感，却主动地把他所知道的一切源源本本讲了出来。至少当时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我现在虽然根本无法看到当时杉之原的预审决定书，但是至少他那里总保留有一份的。好事的人，不妨去看看。我通过他同党的关系，在那份决定书上大概有着详细的记录，如果把它和我自己的预审决定书凑在一块儿，那末当时我的全部非法活动，就一览无余了。）

预审推事宣读给我听的具体事实，我只觉得似乎有过那样的事，自己几乎全都不记得了。通过杉之原捐献的钱，虽则是我自己付出的，我也只约略记得总数大约一万元左右，至于具体的一笔一笔钱数以及付出的年月日，却一点也记不清。所以，等到读完全部供词，预审推事问我：“杉之原这样讲，证人记得是怎样的？”当时我只能笼统地回答说：“详细的情况全都不记得了；他本人既然那样讲，大概是事实吧。大致有过这些事情，这是不错的。”因此，那次讯问，二、三十分钟就完事了。

那时我还一心以为杉之原的供词是最近作出的。我想，他大概考虑到我早已判定了刑，现在已经执行了九个月之久，所以无论供出了什么，也不至于牵累到我，这才在长期坚持之后，最近把一切招供出来的吧。由于我作了这样的解释，所以尽管对往往全无必要的他的多嘴，感觉某种程度的不快，却还是对他抱着感激的心情。

后来过了几年，刑期坐满、释放出来，我又有机会遇见了杉之原。因为心里一直怀着疑团，我随便向他问起了当时的情况。杉之原呢，似乎做梦都没想到我所推想的事，听他的口气，我们在丰多摩刑务所见面以前，他早就对预审推事作了上面所说的陈述了。

当我从他本人嘴里弄清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更加惊奇事情的出乎意外了。

现在想起来，一切似乎都是出于西久保推事对我的好心腸。这样讲，也許有人会嘲笑我說，推事、檢察官那类人，不是明明属于共产主义者的階級敌人的范畴嗎？干那种工作的人，怎么会对当时我那样的人有好心腸呢？真是天晓得，作这样的解释，也未免太天真了。可是，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件一件事情，是十分复杂微妙的，决不是生搬硬套的范畴論所能解决問題。后面我还有机会讲到当我的审判长藤井推事对我的同样的好心腸。

对于保释的希望

健康逐漸恢复起来之后，就开始觉得这样閑蕩下去，未免太可惜；某一种希望，就越来越厉害地左右了我。当时我一心以为，預审一結束，总可以保释出去；至于审判，一定会拖得很迟。本来，我对于审判之类的事情，簡直什么都不懂。我所知道的只是，被牽連在1928、1929年的大逮捕里的同志們的审判，拖了四、五个年头，直到今天，还没有結束。因此，我一心以为，輪到我們这些人的时候，还早着哩。“我要是能保释出去，那末在两三年之中，将埋头苦干一下，把早就計劃的《資本論》的翻譯尽量搞些出来，作为这輩子的紀念。”这样的希望，强烈地在我脑子里活跃着，审判这件事，反而觉得事不关己，不妨高高挂起，一心以为当务之急，就是保释出去。当时我想，今后两三年中，如果能傾注全力在《資本論》的翻譯上，那末别的什么，都无关紧要了。

因此，临到預审結束那天，預审推事問我今后生活作何打算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我想，但看我怎样回答，預审

推事早就露出口风的保释的可能性，也许就会化为现实吧。因此，我特地要求用笔答代替口述，写了下面这样一段东西，而且表示了申请保释的意思。

“受刑后怎样，我没有想过。受刑以前，如果准予保释的话，我打算无论怎样搞完《资本论》的翻译。《资本论》的德文本，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恩格斯版，一种是考茨基版；这次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又出版了一种校订本，这个版本将成为今后的定本；根据该研究所委员会的决议，日文译本委托我搞。这是我老来最后的事业，觉得非加以完成不可，所以今后决心埋头苦干一番。”

这篇东西是在东京地方法院预审推事室里写的。当时他们给了我几页格子纸和笔砚，让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写；岂知拿起笔来，手却抖个不住，再也写不好字，于是我自己觉察到，我的心情非常兴奋。这是因为有一个热烈的愿望，撼摇着我的全身，那愿望就是：即使一两年都是好的，我要在去世以前，把我身上所残留的全部力量，倾注到《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上去。

可是，现在回顾起来，觉得当时自己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资本论》的翻译！光是听到这句话，资产阶级就会皱眉。还搞什么科学呢？现在必须停止发展科学！——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所发出来的叫嚣么？不看别的，但看不久之后，《资本论》不用说，一切左翼文献都被禁止发行，甚至于连旧书店里都绝迹不见了，足见当时即使我还在大学里当教授，也决不可能有译成《资本论》的“自由”。“法英二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夺得了政权。从此以往，无论从实际方面说，还是从理论方面说，阶级斗争愈益采取公开的威胁的形态。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之丧钟，敲起来了。从此以往，成为问题的，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的问题，只是它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

警章的問題。超利害關係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領津貼的論難攻擊；無拘束的科學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論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① 馬克思寫這段話，到現在已有六十六年了。假如資產階級聽說有人想埋頭翻譯《資本論》，居然認為這種想法很好，就此把好不容易才抓住的人特地放回書齋里去——假如竟有這種事情，那才證明馬克思主義的不正確。而我呢，因為自己對於《資本論》這部科學巨著和人類解放的聖典的價值，評價得非常高，居然一心以為把這樣一部書的完整的定本早日譯成日文，應該是站在任何立場上的人都無條件地歡迎的。再加，當時我還有一種自滿情緒。我想：“像《資本論》這樣一部著作，不能僅僅要求文法不錯地把原文的意思翻成日本語就算了。如果不能傳達出原文的特殊的神采和蓬勃的革命氣概，那就無異於移植玫瑰花而丟掉了它的芳香。如果考慮到這點，那末儘管語學精深、知識廣博的人多的是，可是我却仍然是這部書的最適當的譯者。現在預審已經結束，根本沒有把我繼續拘禁的必要，所以，我如果提出說是要埋頭搞這件工作，那末他們也就會一年兩年地把我白白關在未決監里，讓我吃閑飯吧。不錯，翻譯《資本論》，這個理由比任何其他理由都強，這將成為我申請保釋的最有力的理由。看來誰都不會反對這一點。”這種想法，說來簡直滑稽。

因此，自從預審結束之後，我每天都伸長了頭頸，盼望保釋出外。按照法律規定，拘押的最長期限是兩個月，這個期限不久就要屆滿了，而繼續拘押的通知書却不送來。於是我就抱著一種渺茫的希望，以為这下真的可以保釋了；哪里知道快到期滿的時候，絕無差錯地送來了一張預審推事出的拘押通知書，上面照例寫道：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頁。——譯者

“因有罪証湮灭之虞，特根据刑事訴訟法第九十条及第一百十三条之规定，更新拘押。”我见到这张东西，暗自生气，心想：“預审都完全結束了，还說怕罪証湮灭，天下有这种狗屁的道理么！”不过，沒有政治自由的专制国家，反正就是如此搬用法律的。

保释虽則暂时失敗，“禁止接見”总算解除了；从此以后，家屬可以不再像过去那样，每次先要到法院，取得預审推事的許可，然后才能探監，而是随时都可以同我見面了（虽然是在監視之下）。秀子馬上就来了。那正是5月1日劳动节，秀子給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她說，根据报纸消息，公审不久即将举行，所以现在得赶快选定律師。对于一逕以为公审还在遙远的将来的我，这簡直是个晴天霹靂。我慌了。可是我对于公审的态度，从听到这消息的时候起，就注定是极端消极的了。

在三·一五和四·一六事件中被捕的同志們，那时正以佐野学为首，拼命展开法庭斗争，使法官們非常棘手；而我呢，一开始就不准备进行法庭斗争。当时大約有二十个紅色律師，結成一个团体，几乎一手包办着牽連在三·一五和四·一六事件里的所有共产党员的辯护。遇到公审的日子，这些律師总是穿起法衣，一起集合在法庭的平坛上，和大批被告相呼应，对着拥挤的听众（一般旁听虽被禁止，但是拿特別旁听証的人和新聞記者，总是把旁听席挤得滿滿的）为左翼大张声势。据說，他們揚言也要給我一手辯护，认为必須利用这个机会大大展开他們所說的法庭斗争。我从我妻那里听到这一点，皺眉了。因为这种时髦的把戏既不配我的胃口，也和我的人品不相称，所以謝絕了（虽然据說謝絕他們很費劲，而且会因此失去左翼方面的同情）。不过，我也不打算請什么有名的資產階級律師。因为我知道，法庭上决不会由于辯护得好，就判我較輕的刑。因此我觉得，只要有一个律師挂挂名就可以了；至于人

选，就打算去請新劳农党时代的朋友上村进，虽則他也是一个左翼律师。

我已經在《回忆》的另一处地方讲过，那时我和上村已經絕了交。不过我心想，现在我已被捕，关于他那次借錢遭我拒絕的理由，他該明白了，他的誤会总可以完全消释了。

所以，秀子那天跑来同我商量，我最后对她說：“辯护的事情，去請請上村看。至于其他一切，可以和細迫商量着办。”

前面已經讲过，細迫是給我介紹杉之原的、我的朋友。当时他也在当律师，比我先被捕，这时已經保释回家了。我认为一切可以交給他决定着办理。

哪里知道律师实在不容易选定，因为提意见的人多，各人的說法又不一样，所以我妻单是为了这件事，也就煞費了一番苦心。特别是安田德太郎（山本宣治的外甥，医学博士，京都时代以来的朋友）、山田盛太郎（前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馬克思主义学者，因违犯治安維持法而被判徒刑两年，准予緩刑）这些人的劝告，都是純粹出于私人友誼，为的是使我尽量判刑較輕，我妻不便不加以考虑，可是因为各人的主张不一致，这就使人无所适从。

秀子在刑务所的接见室里問明了我的想法，律师决定只請上村进一人，她一走出丰多摩刑务所的大門，直接就到麴町区的上村进律师办事处。幸好上村当下就答应了。可是放宽了心回到家里一看，山田盛太郎等人早就在守候着她。他們主张律师不能請上村进，无論怎样得請鈴木义男。这个鈴木律师，从前当过东北帝国大学的教授，平野义太郎和山田盛太郎等被捕的时候，也曾由他担任辯护，結果爭取到了緩刑的判决，而且他在法院方面人緣也好，所以要是不便回絕上村的話，至少得加請鈴木。这就是他們的劝告。

秀子听到这番話，正在思忖怎样办的时候，安田德太郎带来了关于左翼方面的看法的情报。据说，左翼辯护团的小伙子們，坚决主张按照原則办事，认为河上肇的情况，尤其应该大大地展开法庭斗争，决不应为了莫名其妙的顾虑而放弃这个大好机会；总而言之，他們横蛮得很，要是全然不加理睬的話，事情很不好办，为了息事宁人起见，唯有采取妥协的办法，除了已經請定的上村之外，哪怕再加請一个左翼律师神道宽治也好。

我妻想到最后，觉得既然如此，律师人选，除了聘請上村、神道、鈴木三人而外，沒有別的办法了。因此，在听到安田等人那些話的5月16日当夜，她馬上就去訪問上村律师，請求他的諒解，第二天17日的早晨，又去看神道，請他出庭辯护。幸好神道也高高兴兴地答应了。我妻觉得事情告一段落，就放下了一件心事，回家了。哪里知道过一会儿，山田、安田和山田胜次郎，三个人一道跑来了。据说他們三个人已經商量过了，其中山田盛太郎热烈地主张：絲毫不用顾虑紅色辯护团的想法如何，这个时候，無論为了学术界还是为了馬克思主义，最要紧的都是使河上先生早日获得自由；如果为了一些枝节問題，徒然引起了法院方面的坏印象，这是极不明智的；所以必須謝絕神道，上村方面也应该尽可能加以謝絕，如果真正沒有办法，那末可以以鈴木律师为主，上村为副；至于紅色辯护团方面，無論他們怎样憤怒，都沒有关系，反正事情要赶快办，应当赶快去征求河上先生的諒解。这一次，連安田都这样主张了。

一个一个的主张接踵而来，弄得秀子很为难。特别是，今天早晨刚刚低声下气地托了神道，随即就去謝絕，未免太随便了，所以觉得很棘手。可是，既然大家都說这是为了自己丈夫的利益，也就不能不加理睬，所以她拿出勇气，18日那一天，先征得了我的諒解，

然后一切都照山田等的主张办了。

鈴木律師那方面，根本沒有問題。當秀子去托他的時候，他說即使不去請他，他也預備主動地給我辯護，所以一請就滿口答應了。

這裡我為什麼要把這種小事情嚕嚕蘇蘇地寫了許多呢？這是因為，我聽到外面的朋友們這樣為我操心，就開始認為自己不無緩刑的希望。而這一點，給了我很大的心理影響。

請律師的事情剛告一段落，法院傳票就送到了我手裡；傳票上說：公審定於下月（6月）8日上午九時起舉行，屆時應至東京地方法院第一法庭候審。現在我覺得，4月18日才結束預審，到6月上旬就舉行公審，這恐怕是出於審判長藤井推事的好心關懷。這是因為，當時恩俸法的修訂迫在眉睫，如果判決遲不確定，眼看着我一生的恩俸就完蛋了。光從這一點上說，也以早舉行公審對我有利。

可是，由於我一心以為公審遙遙無期，現在突然說兩星期後就要舉行，我頓時發慌了。鈴木律師也說一兩天之中閱過卷，馬上就來看我。我心緒不寧地等候著他的來訪。

5月26日，鈴木律師來了。那時他大致對我講了這樣一番話。“事件非常簡單，我打算極力爭取緩刑的判決。保釋看來多半不行，但是好歹我也準備作為保人，寫個申請書試它一下。要是不准保釋的話，說不定審判方面反而會有好的結果。因為對方可能考慮到，反正要准予緩刑，不久就可以出去，受幾天折磨也無所謂。”

聽了鈴木律師這話，我半信半疑地說：“不過，前些日子見到戶澤檢察官的時候，他氣勢汹汹地說，我的罪名相當於治安維持法第一條第一項前段的條文。我覺得緩刑的希望不大。”

鈴木律師笑笑說：“那個人的脾氣就是這樣的。比方說，山田

(指的是山田盛太郎)也曾被他大大地威胁过,可是等到作出了缓刑判决的时候,他还特地来向山田道贺啦。”靠替人打官司吃饭的律师的话,本来不应该信以为真,可是当时的我,却认为这是法律专家说出来的话,还非常重视哩。

铃木律师来看我后,不久老朋友作田庄一也来看我了。我和作田是高等学校时代以来的老朋友,特别是,我曾为了把他推荐到京都帝国大学去教书,尽了很大的力,所以虽则我们两人的思想立场不同,却一直保持着友谊关系。他那时还是京都帝大经济学部的教授(退职后去中国东北,当了所谓“满洲建国大学”的副校长,现在这个差事也不干了,住在京都。他比我大两岁),这年的1月,我刚被逮捕,他就赶来东京,到中野警察署看我,给我送来上等香烟。这次他又利用因公出差的机会,先同户泽检察官碰了一次头,打听了情况,老远地到丰多摩刑务所来看我,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我。

当时他是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中最有力的法西斯主义代言人,是统治阶级的宠儿,而我却是受统治阶级镇压的囚犯,所以他似乎不无顾虑,怕我不高兴他来看我,而且口头上也表示了这种意思。可是,关在监牢里的我,对于他这次意想不到的来访,却感到高兴。我坦率地说出了我对于受审判时的思想准备。

他答应我,回京都以前再去看一次检察官,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检察官,后来在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再熬一个时期就可以了”。这其实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就等于探望病人的人,并没有什么医学知识,也没有从医生那里了解病情如何,只是随便应酬说“再熬一个时期就可以了”一样;可是这句话,说的人虽然并没有什么作用,也没有什么根据,而我却认真地把它当成了一回事。我想,见过检察官、了解过检察官的看作的作田,说出这样的话,无疑

地是暗示緩刑大有希望。一个人，整天沒有人同他講話，隔了多天才能同外面的人作三十分钟不到的接見，分手之后，想起对方所說过的話，总会反來复去地把它回味好多遍。“再熬一个时期就可以了”。我不知多少次地想起了这句话，硬給它加上种种解释，而开始对渺茫的将来寄予期望。

真了不得，等到忽然公审就在眼前，再听见律师等人讲了几句說是有希望緩刑的安慰話，这种希望就不知不觉地在我心里生下根来。过去我一心指望保释出外，在审判开始前的一段期間里尽可能把《資本論》的翻譯搞些出来；而现在呢，却又一心指望得到緩刑的判決，回到原来的书斋里，把余生全部献給这一事业。我越来越认真地想：要是真有这种好事的話，那末我无论怎样让步也行。

3月初住进病房的我，大約过了三个月，健康几乎已經完全恢复，于是就在5月底迁到临时病房。——现在想起来，进未决监不久，我就生了病，这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样一来，我才能利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完全从事休养。对于反正不久就将服徒刑的我，这就好比是一个准备，一种預备工作。

临时病房和普通牢房相同，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关的都是病人。鉄床之类的設備自然沒有了，骯髒的程度比来病房前所住的牢房厉害得多。自从迁到临时病房后，我感到最伤脑筋的就是夜里跳蚤咬得叫人受不了。整个地板房間里，只鋪着一张席垫。睡觉的时候，把被褥鋪在席垫上，躺下身去，等到电灯一熄灭，跳蚤就从四面八方向我进攻（簡直可以听到它們的声音！），咬我的全身。我的細瘦的两手两脚的皮肤上，几乎沒有一处不是跳蚤咬过后留下的紅斑。

有一天，我卷起衣袖給来探监的我妻看，說：“跳蚤多得簡直叫人受不了。你瞧，被咬成这样。”

她怀疑地说：“不是跳蚤吧？会不会是湿疹什么的呢？”

自从迁到临时病房以后，想到不久就要开庭公审，每天屈指计算着日期，盼着那一天。我妻也为了说不定哪天我能回到家里去，买了一个新的浴桶准备着。她现在所住的弄堂房子，自然没有浴室，因此打算在天井里很小一片空地上，凑合着盖个浴室，于是叫木匠来估了一下造价。如果是馬口鉄屋頂，馬口鉄围墙，单是洗身的地方鋪地板的話，只要花十五元到十七元，馬上就可以盖起来。結果，盖浴室的事，她决定到时候再說，暂时把买来的浴桶放在狭窄的門口的泥地上。

后来，6月3日那天的报纸上发表消息說，公审决定无期延期；过了几天，我也正式接到了“因检察官要求，公审延期”的通知。我心里想，一定是由于我和杉之原的关系新被发觉了。

公审——缓刑的梦想的实现；这种已經近在眼前的东西，一下子忽然又变得遥遥无期了。

于是我又一天天地过着沒有指望的、枯燥乏味的日子。

夏天终于来到了。我虽然特别喜欢阳光，却又怕太阳晒得太热，所以在运动的时候，也不把草笠脱掉。夜里蚊子也出来了。送进牢里的黄油，也溶化得发粘了。

5、6月間，我开始讀起书来。健康既然恢复，临时病房里白天又不让躺下，讀书的时间自然就多了。那个时期，我爱看俄国契訶夫的作品。临时病房的旁边，有个厨房，每天听到咯嗒咯嗒忙着切蘿蔔的声音。在白木小矮桌上讀着契訶夫的作品的我，听到那个声音，老觉得心酸。现在一想起那个声音来，还觉得有一种凄凉的滋味。

6月28日，公审延期后的第二十日，我突然被移送到市谷刑务所。加上了鉄手铐的我，和历次送进监牢的各种用具同被装进

一辆护送車，走与五个月以前进来时相反的路，出了丰多摩刑务所正面的大鉄門。初来这里时对我表示过关怀的老看守长，同坐在一辆車子上担任押送。

“路上可以不用戴草笠。”他总想安慰安慰我。等到到了市谷刑务所，那个看守长在我沒注意的时候就走掉了。不熟悉刑务所生活的我，分手的时候沒有能对这个老看守长道一声謝，这到今天我都感到遺憾。

一切都忙乱不安的市谷刑务所

从丰多摩刑务所押送来的我，就仿佛火灾后的灾民那样，一时茫茫然地站立在市谷刑务所的一間可以称之为犯人接收室（在英国称为接納室，屋子里有完备的設備）的又小又暗的屋子的角落里，身边杂乱无章地放着带来的被褥衣服和其他一些夹七夹八的零碎东西。犯人一批一批送来。不断地可以听到看守大声叱責的声音。起初当我走进丰多摩刑务所的建筑物的时候，只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寬闊走廊里，几乎連人影都沒有一个；值日的看守，也并没有慌慌张张地跑出来；站在我身旁監視我的看守，对我說：“到这边来吧，这里暖和。”把我帶到水汀管子旁边去；周围的空气既宁靜又安定。而这里，和丰多摩不同，是专关未决的被告的未决监（当时因为这个未决监关满了人，所以把关不下的被告，送到丰多摩刑务所的一角去。那些专门同已决犯打交道的看守們，对于未决的被告，态度比較寬大），一切都忙乱不安，獄吏說話也非常粗暴。我正这样想着，一面看着出出进进的人，突然有一个看守径直走到我身边，把一件骯髒的烂糟糟的浅葱色夹衣扔在我脚下，命令我脫去混身的衣服，换上这件夹衣。这种囚衣，我还是第一次。

穿。

“褲衩也要脫掉么？”

“什么都要脫掉。”看守恶声恶气地說。

这样，我就在脫得精光的身上穿了一件汗酸臭的囚衣，也沒有束帶子，被关进那間屋子旁边的一間临时牢房。所謂临时牢房，是刑务所里的一句行話，指的是正式牢房以外，临时关那些已决的犯人或未决的被告的地方，目的在于既不让別人看到他們，也不讓他們看到別人。那种临时牢房，小得像个仓房或壁櫥。被关进这种地方，那时也是第一次。

在我被关在临时牢房的那段時間里，保管科的秃頂老头儿，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眼鏡，开始检查我的行李，把我带进来的一切东西，一一和丰多摩刑务所的移送单核对清点。因为东西多，所以保管科里的人觉得不胜麻煩。关在丰多摩刑务所的时候，送进来的东西的数量並沒有严格的限制，再加我妻竭力想使我不感觉不便，所以我的东西比一般人多得多。幸好关我的牢房总很寬敞，所以早就應該退回家去的、冷天用的棉袍啦、毯子啦之类的东西，嫌手續麻煩，也一径留在身边。另外还有面包啦、水果啦、黄油啦、果酱啦，有的用紙包，有的装瓶或装罐，什么都不剩地帶了来（要是我早知道的話，这些东西早就扔掉了）。因此，我的行李的品目既多，体积也大。可是，这里对于送进牢里来的东西的品目和数量，都限制得很严，所以有些知道內情的人，都輕装前来；像我那样一下子带进这么多东西的，还从来不曾有过。

我在临时牢房里，清清楚楚地听到看守們在謾罵：“簡直是王爺的行李哩！”

保管科的看守，担心后面陆陸續續送来的人的行李的清点工作被耽誤，嘴里說着埋怨的話，花了好多時間，才把我的东西清点

完毕，然后把我从临时牢房里叫出来，命令我从那些东西中间挑出要拿进牢里去的。结果，我问明了一样一样东西的最大许可量之后，从堆积如山的行李中间，挑出了这样一些东西：被一条，褥子一条，毯子一条，枕头一个，坐垫一个，法兰絨日本服两件，褂子一件，衬衣两件，衬裤两条，裤衩两条，腰带一条，日本式袜子两双，包袱皮一条，牙粉一袋，牙刷一把，塑料盒子装的肥皂一块，连盒子的眼镜一副，手纸五刀。这些东西，都由看守另外记上帐。

办完了这个手续，这下要让医务科的看守检查身体了，于是他们叫我把身上的衣服全都剥光。瘦长的身体只剩皮包骨头，肚子瘪得像个碗底，我的样子无疑地显得可怜。看守一面取笑说：“你这家伙瘦得紧哩！”一面犹如对付咸鲑鱼那样，冷冰冰地开始测量我的身长、胸围和体重等。

我曾经看过《伦敦刑务所生活》这本书，里面写到，在伦敦的刑务所里，新入所的人换衣服时，谁都不让看见，全让他们在屏风背后换，连看守都不站在旁边；可是在日本，却连未决的被告都得在大批狱吏面前出洋相，浑身剥得光光的，连裤衩也不穿一条。我暗自想：封建遗制的残余，甚至在这种地方也表现出来了。

医务科的看守把我的身长、胸围、体重以及其他健康状况、有没有遗传病、有哪些老毛病等等都记录完毕后，才让我穿上刚才挑出来的衣服。

这时，一个留着短短的髭鬚、看来生性傲慢而又脾气恶劣的、脸色苍白的看守，跑来接我了。他就是担任监视那关我的牢房的看守中的一个。他让我戴好草笠，穿上一双旧草鞋，就推开后面的铁门，叫我跟着他离开那里，走出了那扇门。

一看，这里已经是监牢的一部分了。四下里都显然荡漾着阴惨之气。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阴森森的呢？三条长长的走廊，扇形

地伸展出去；走廊門口，装着粗笨的黑鐵柵；走廊的两边，是一式的牢房門。我站立的地方，正当三条走廊的連接点，一个犹如图画里的閻罗王那般的、肥头肥脑、脸孔紅紅的看守长（衣袖上还釘有一道銀色袖章，看来他有一身好武艺，也許是摔跤或劈劍的能手），帶着两三个看守，守在老高老高的平坛上。我被叫到这个閻罗王面前，問了姓名、年齡、职业、住址、有沒有妻子等等，最后叫我伸出手来給他看。我疑惑不解地伸出了右手，于是閻罗王从坛上弯倒身体，用他那双手背上长着黑毛的厚厚的手撫摩着我的手，十分傾倒地說道：“多柔嫩的手呀！”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很滑稽。事实上，我的皮肤，受了活到九十六岁的祖母的遗传，天生很柔嫩，再說直到現在五十九岁，一向只拿笔杆，比女人的手都柔嫩，无怪乎要使看守长傾倒了。可是，究竟为什么要检查我的手的粗嫩？这一点，直到今天，我还是弄不明白。

閻罗王的檢閱就此完毕。站在我身旁的管牢房的看守催說：“走吧。”又指指堆在一角的我的行李說：“把那些东西也拿去。”

我向他指的地方一看，在叠好的褥子和棉被上面，放着坐墊、毯子、一包袱衣服和零星用品、枕头等等，除此以外，不知什么时候从哪里拿出来一个里面装了飯碗之类的食具盒，也放在那里。我因为草笠遮住了眼，所以看东西不方便，等于瞎子，而且早就走累了，一下子无论怎样也拿不动那么多的东西。我最初被关进丰多摩刑务所的时候，正当1月底大冷天，我妻因为我怕冷，新做了一条棉絮鋪得特別多的又长又大的褥子送进监牢。光是这一条褥子，叫我这个体力弱的人搬一大段路，已經觉得是个沉重的包袱。因此，我回头对看守說：“一次搬不动，让我分两次搬吧。”而心中却在轉念，在丰多摩刑务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自己搬过东西哩。

可是，不明白我的底細的看守，冷笑笑說：“什么？真泄气！”我

心想，尽管你冷笑，这堆行李我反正搬不动，于是分辩说：“要知道，我到这里来以前，一直住病房的。”其实即使不生病，这样一堆行李，我也绝对拿不动哩。

“什么？生病？生的什么病？”

“长期出盗汗。”

“哼，肺病么？好吧，就光拿这个吧。”

这样说着，他就只让我拿包袱和食具盒。手纸从包袱里掉了出来，散满一地。我笨手笨脚地追着拾那被风吹得乱飞的纸。

被褥之类的东西，由一个穿浅葱色囚衣的杂役夫轻松地背着，跟在我后面。看守走在最后。

“从那里出去，到外边去。”

“往右去往右去，往右边转弯。”

“一直往前走。”

根本不认识路、不知道应该怎么走法的我，被跟在后面一再吆喝的看守和杂役夫所催促，一面望东不识西地徬徨着，一面走出最初那所监牢，来到外边，沿着一栋装有铁栅的小高窗开得密密的巨大的二层楼监牢向北走，最后走进最最后边的一所监牢里。

这个刑务所原来称做东京监狱，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旧式的（现在已经完全拆毁，迁到别处，改称做东京拘留所）；关我的地方，是近年增建的部分，在这里算是最好的一所屋子了。

这是一栋长方形的建筑，东西长，中央是天井，整个建筑就像一个扁的口字。建筑内部，靠天井的一面是走廊，除了浴室、书写室（犯人在这个屋子里写信）、会面室（狱吏在这里接见犯人）之类以外，其余全是一样大小的单身房。这里一个杂居房也没有。所有的牢房都排成一排，门都开向走廊，没有一间屋子是面对面的。

每个牢房的门口，左边地上，整整齐齐地放着关在房里的犯人

的草鞋，上边墙上的钩子上，挂着草笠。因此，站在走廊里看起来，草鞋和草笠整整齐齐地排成一长条，哪个屋子是空的，一眼就可以看清楚。

我被关在南翼楼下中央的牢房里。这间屋子在整栋房子里算是光线最好的。

牢房有三张席垫那样大小。席垫只铺两张，靠窗口铺的是地板。和旧式的监牢不同，窗开得低低的，和普通老百姓住的房子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窗外装有遮板，窗外的行人，只能看到一双脚。我那间牢房，可以从遮板上看到几棵高大的梧桐树的树梢；隔着那些梧桐树，老远地可以看到像小山那样高耸着的旧监牢的黑黝黝的巨大的屋脊，显得非常阴郁。那是二层楼的木头房子，因为是很久很久以前修建的旧式监牢，所以窗子很小，和巨大的屋脊一对比，就格外显得小了。从我那间屋子看出去，尽管中间有梧桐树叶遮挡着，仍然可以看见楼上那种小窗子，有时甚至连靠在阴暗窗洞的铁棒边的人的脸孔都隐约看得出，这更加给监牢增添了一番凄凉的感觉。

窗口的地板上，右边放面盆和水桶，桶上有木盖盖着，左边有个简单的屏风，屏风后面是便桶。

铺着席垫的那部分，一边指定放被褥，另一边墙上用铰链钉着一个活动搁板，那是书桌。用包袱布包好的衣服，就放在书桌下面。关在里面的人，就坐在被褥和衣包中间的一小块地方，不管你看书不看书，整天都得朝向桌子那一边端坐着。那个坐的地方离窗口较远，所以尽管像我那间比较光线充足的屋子，下雨天还是暗得看不成书。可是，犯人坐在那个地方，看守从走廊里通过门上的眼洞视察室内的动静，倒是最为方便。

走廊地上铺着一尺宽的长棕垫。看守穿着草鞋在棕垫上慢慢

走着，来回巡視（身上穿了制服，头上戴着制帽，腰里挂着劍，脚上穿了草鞋的官吏，也許只有刑务所里有），而这种巡視，对于犯人說来，总是出其不意的。往往只微微地听到开眼洞盖子的声音（眼洞盖子装在室外，室內是看不见走廊里的动靜的），这时如果向那边看去，就只看见两个黑眼珠子在发亮，这才知道有人在窺看了。这是使人心里非常不痛快的。

我一迁到这里，馬上感到这里的条件坏得多了。等到我和行李都安頓下来，時間早已过了正午；回想当初进丰多摩刑务所的时候，馬上就有人想到給我搞外面送进来的牢飯，而这里却就沒有这样一位好心腸的看守长了。在牢房里刚坐定，主任看守就跑来給讲了許許多多規則，然后叫我吃飯。听着他的吩咐，打开食盒一看，里面是扣着盛的麦飯和只够几口喝的一点醬湯。那种东西，我一点都不想吃，連筷子都沒有动。晚上发来的是麦飯和煮蘿卜絲，我也吃不下，只用开水泡了一点麦飯，好容易吞下肚去。（刑务所里的囚飯，我到这时才第一次吃。）现在回想起来，真不懂当时怎么会吃不下那种飯。现在我們所吃的战时飯，在糙米一样的米里，搀着麦和豆渣，分量还不够吃飽。要是在今天，尽管吃完飯以后，那种帶有一盞醬湯的囚飯，也准吃得很香，所以反而羨慕起当年的监牢生活来了。

市谷未决监里的生活

第二天，我被叫到医务室里。昨天我刚进所时譏諷了我几句的看守，后来似乎弄清楚了我的来历，有点后悔，因此，为了补偿起见，事前沒說明就給我办好了看病的手續。他把我叫到跟前，討好地說：“你不是說有病么？我想还是让医生看一次好，所以今天早晨

就和医务主任讲好了。他虽则是个年轻的人，却是庆应大学医科毕业的医学士，很有一手哩。”昨天还称呼我“这家伙”，今天改称为“你”了，而且脸上不时露出和气的笑容。

从医务室回来后，下午又被唤出去接见。是秀子来看我了。

秀子那天的日记里，记着这样一段话：“6月28日(星期三)，阴后雨。左京小叔早晨去丰多摩探监，据说昨天突然移到市谷去了。于是赶快到市谷去。本人精神很好，并不怎样兴奋。昨天中午和晚上，吃的都是监牢里的饭，据说吃得很香。今天中午据说也没有吃面包。立即去牢饭铺，让他们每天早晨和晚上给送五角钱一份的盒子饭，中午送面包(连同黄油和果酱，交替着送)、牛奶一磅、半熟鸡蛋两个。”

我其实并不爱吃监牢里的囚饭，同秀子见面的时候，大概是想安慰她一番，所以说这样的假话。

日记里说是“今天中午也没有吃面包”这是因为在丰多摩的时候，总让送新宿中村屋的面包当午饭。

当我听到秀子说“以为面包还没有吃完，所以很放心哩”的时候，我带着抱怨的口气回答道：“这种东西哪里来！”

这里和丰多摩不同，吃的东西不许从家里送来，一概得由牢饭铺送。而且三顿饭的品目和价钱全都有限制。水果和点心，可以请看守给买，种类和价钱也都有限制；在丰多摩我所吃到的东西，这里再也搞不到手了。在丰多摩的时候，送进牢里的东西实在太丰富了，以致移押的时候，我行李里还有和歌山高等商业学校的宫川实送来的骏河屋的罐头羊羹，家乡母亲送来的罐头橘子，小林辉次送来的罐头水果，秀子送来的苹果和花旗蜜橘，都还没有吃。另外，还有没有吃完的中村屋的面包、上等黄油和果酱。可是，这里送食物却有限制，而且不准退回家去，因此这些东西，连母亲特

地从乡下送来的也包括在内，眼看着只好让保管科的那些没心肝的先生们捞外快了。对于这一点，我非常不甘心。“这种东西哪里来”这句答话里，包藏着忿懣的情绪，就是这个道理。顺便提一句，后来由牢饭铺送进来的面包，质量之坏，坏到极点，上面所涂的那层黄油，也发着古里古怪的臭气，所以简直没法下咽。

除了这种种不方便之外，还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每次接见，在接见之前和接见之后，总要暂时关在接见室旁边的临时牢房里。由于秀子来看我，这一天我第一次尝到了那个味道。

本来，在预审推事传唤我到东京地方法院去的时候，我已不止一次地被关进这种临时牢房。位在首都中央的这个法院的建筑物，可算得是威风堂堂，从乡下初次来到城市的胆小鬼，光只见到那个前门，可能就会被吓倒。可是，建筑物后面空地上添盖的一排临时牢房，却和主楼正相反，简直太惨了，比警察署里的猪圈还糟。那是由马口铁屋顶和胡乱刨削过的木板盖起来的长方形板棚，中央一条是泥地过道，过道两边是一些隔得小小的屋子。这种临时牢房，一小间成为一个单位，关一个人。每间大约有十八平方尺的面积，一半是泥地，一半是地板，地板上铺了席子。泥地上放着大小使用的便桶。因为打扫得马虎，所以很脏。触鼻的臭气，不断地放散在既小又暗的屋子里。这里即使是大晴天，也不见阳光，新鲜空气也进不来，一年到头屋子里都是潮湿的，冬天冷得要命，夏天却又闷热不堪。关在刑务所的人被传唤到法院来时，总是太清早一古脑儿被押上护送车，从刑务所送到这临时牢房里来。法院方面的事情，不管上午半小时工夫办妥也好，下午一小时工夫办妥也好，一经关在临时牢房，反正就得在这里吃随身带来的盒子饭，等到傍晚时候，再一古脑儿载上护送车，送回原来的刑务所；在被送回之前，得整天对着便桶，几乎气都透不转地呆在那里干等着。

就像这样，一旦蒙受犯罪嫌疑的人，在沒有受到正式审判、也沒有断定有罪无罪以前，就得随时随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受到一种刑罰。封建遺制的残余，在这种地方也表现了出来。

至于这个市谷刑务所的接见室的临时牢房，却又比东京地方法院的临时牢房更糟。这牢房也是馬口鉄屋頂和木板盖起来的細长板棚，里面分隔成一个一个小方块，每一块地方关一个人。地方很小，小得几乎仅能容身，可以說是活人的棺材。說它是棺材还不对，因为它沒有底，下面是不鋪木板的泥地。三面都是胡乱鉋削过的杉木板壁，連細小的木节孔，都被仔細地堵塞了。后背的壁上，釘着一个板凳一样高低的狹狭的木板架子，必須弯下了腰，才能坐在上面。在那个木板架子前面，恰好在齐眉高的地方，装有一个糊上紗布の木框框，刚好遮住上半身，那框框是用鉸鏈釘牢的，可以推上去、放下来。所以，临时牢房里的人，坐在那里，根本看不见外面；外面的人，也只看到临时监房里的人的下半身。可是，因为直接接触到外面的空气，所以冬天非常冷，而夏天呢，又因为屋子小得四下里都碰得到鼻子，所以关在里面一会儿，就使人觉得气都透不过来。特别是夕阳直射的时候，尽管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渾身也会淌油汗。

被喚出来接见、由看守带来的“收容者”（这是刑务所里的行話），暂时就得在这个临时牢房里耐性等候；过了一会儿，輪到自己接见的时候，他們就会喊出自己的番号——几百几十号。在这里，收容者犹如物件一般，不用姓名，全部用番号代替。那番号写在一块比名片还大的白布上，縫在每人的衣襟上面。在非常时期的今天，小学生都在衣服上縫着写有姓名的白布，大家都司空见慣，不以为奇了；可是我关在市谷刑务所里的时候，受到这样的对待，心里还老大不愉快哩。

喊到番号,才能进接见室。听上去好听:接见室;其实却只是个小得像箱子一样的、才能容身的泥地房間。进了那房間,門就被反扣上。那里沒有凳子,只能背对着門站在那里。有一面的板壁上,挖了一个正方形的洞,外面可以从洞里監視里边的人。屋外有个監視的獄吏站在那里,那獄吏不知从哪儿拉了一下绳子,正面的一块木板就吊上去,来会面的人的脸就一下子显现出来,那时方才知道来的人是誰。但是,木板尽管吊上去了,外边却还釘着一层鉄絲网,所以既不能授受东西,也不能握手。双方一开始談話,那个从旁監視的獄吏,就把談話的要点記錄下来。我接见的时候,总是由一个鑲有金綫袖章和肩章的看守担任記錄;那記錄每次都得送到檢察局去。

这样的小房間总共有五个,排成一排,每个房間都有一个看守監視,接见就在他的監視下进行。

五个房間全走一条泥地走廊,走廊只有一个进口,那里又有一个看守站崗。

接见的時間普通只有六分钟,我算特別优待,可以有十五分钟。到了規定的時間,站在旁边監視的看守就拉动绳子,前面那块木板就落下来,于是不容分說,对方的脸就看不到了。

接见完毕,走出小房間,就重新被关进临时牢房,在那里等候,过一会儿,由看守来把收容者带出去,护送到原来的牢房。在临时牢房里等候的时间,往往在三十分钟以上。

渴望自由的人,对于这种束縛,当然觉得非常痛苦。会见家属,我自自然是願意的,可是,每次接见之前和接见之后,在这种临时监房里所遭的罪太大了,因此我心里就想,最好还是不要經常来看我。关在丰多摩刑务所的时候,一次也沒有关进什么临时牢房过,而且接见的时候,也是隔着桌子面对面地坐在椅子上,在普通的屋

子里从容地谈话，移押到这里来后，就办不到了。

至于来探监的人，却又要吃另一番苦头；仅仅为了六分钟或十五分钟的会面，所付出的牺牲异常巨大。对于不习惯的人来说，单是在等待室里挤上老半天，呼吸着荡漾在屋子里那种刑务所特有的阴惨空气，就已经够受了。可是弄得不巧，还往往会从被探视的人的脸上发现不欢迎他来访的不高兴的脸色。可是，路远迢迢地来探监，又不能生气，只能忍耐着，因为一瞬间以前所受到的那种痛苦的阴影，在对方的脸上还没有消失。

戶澤檢察官的談話

原来，我的公审延期和被移押到市谷刑务所去，都是因为检察官戶澤想一显身手的关系。

恰好就在那个时候，佐野、鍋山等人的号称“根据过去十一年的实践”作出的转变方向声明书（其实乃是向最近几年来的未决监生活和多半会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命运投降的产物），在报上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立下了功劳、得意非凡的戶澤检察官，看见我这个老头儿适逢其会地落到了他的手里，就想再显一显他的身手。他认为趁此机会，可以更进一步使河上肇这个老头儿从理论家和学者的立场，来个所谓转变方向，通过共产主义者本身所写出的东西，大大地宣传一番，证明无论在实践上或理论上，共产主义都是绝对行不通的；于是，尝到了一次甜头的他，就得意忘形地想趁势再搞一手。

佐野等的转变方向声明书，经过一次一次的推迟，直到6月10日，也就是原定举行我的公审的6月12日的前两天，才在报上发表。要想拿佐野等转变方向的事实——当时对于任何人都完全是

出乎意料以外的新事实——作为材料，来威胁落了网的河上肇，搞出个名堂来，时间实在欠充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检察官才要求暂时把公审延期；他对律师说有新的事实需要进行调查，这其实并非指我所担心的我和杉之原的关系新被发觉这种小问题，而是因为他觉得关于转变方向的问题（这到后来在共产党员中间如同流行性感冒那样地传染着）有进行调查的必要。

移押到市谷刑务所后的第三天，我就受到检察官的传唤。早饭刚刚吃过，他们就把我带出牢房，说是“上法院去！”走着入所时的回头路，又到了前天抚摩我手的那个阎罗王的宝座下，那儿的看守把一副铁手铐喀嚓一下给我加在手上，还把连在手铐上的绳子拉到背后，拴在腰带上。

阎罗王叫着我的番号：“一百二十八号！”

我回答了一声“有”，不很方便地用加了手铐的手把草笠向上掀一掀，露出半个脸来。

“谁要看你的脸？把手伸出来！”他斥责说。

我想怎么又要伸出手来呢，心里不觉有点儿好笑；哪里知道这次是检查上了手铐没有的。

由看守押送着，走到外边一看，有三辆护送汽车一并列停在那里。五个被告连成一串地登上最后那辆车；等他们都上车后，我才上去。

三辆汽车开了。似乎不时经过繁华热闹街道，可是因为头上戴着草笠，所以看不大清楚。

到了法院，才告诉我说是今天检察官要见我。我心想，没有办法，今天又要在那临时牢房里受一天罪了，哪里知道他们却把我带到一间铺了三张席垫的又敞亮又干净的屋子里。猜想起来，这屋子大概是最初作为法院大楼的一部分而盖的临时牢房，由于近来犯

罪事件激增，这种临时牢房不够用，才在大楼背后的空地上修盖了板棚式的粗糙临时牢房的。

我正在想，到底为什么今天这样优待呢，不多一会儿工夫，他们就把我带到另外一间屋子。这屋子可大了，除了泥地，光是铺席垫的地方就有十二张席垫大小。是朝北的西式房间，窗子全都敞开着，清风一阵阵地吹进来，非常凉爽。

比呆在刑务所的牢房里都舒服多了。我心里才想，这样的地方、等上一天也没关系，不久一个看守来带我了。和往常不一样，等候的时间非常短。让押送我的那个看守在后面催促着，头上戴着草笠，手上加着手铐，在宽阔的长廊里东弯西拐，上楼又下楼，最后到了楼上的一间小会客室。然后摘掉草笠，卸下手铐，坐在椅子上。看守站在身边监视着。

等了不一会儿，户泽检查官“哎呀”一声，马上就出现了。

他体格魁梧，脸色可不大好。黄肿的脸，半边大，半边小，生得不大匀称。其实他那一张脸根本不可能使我发生好感，可是今天却特别显得兴高采烈。刚在椅子上坐定，他就马上按电铃，叫工役泡茶。工役把茶壶啦、盛在盘子里的茶杯啦送来之后，他就接下来，随手在三个杯子里倒了茶，自己取了一杯，把一杯放到我面前，另外一杯给站在我身边的那个看守，说道：“喝杯吧。”

看守诚惶诚恐地哈腰打躬，着慌地说：“我去外边喝吧。”

“不用客气。已经倒了，喝了去吧。”

“不，我……”看守怎样也不肯接那杯茶，只管三番五次地哈腰打躬。

“不肯喝么？那末就到外边去等一会儿吧。”

年轻的看守一溜烟地跑出去了，脸上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

于是户泽从他那西装的右边口袋里取出一包香烟，拿了一枝

带紙嘴的香烟銜在嘴里，擦根火柴点着，同时从左边口袋里取出一包蝙蝠牌香烟，放在我面前，說道：“不用客气，抽枝烟吧。”

我是个烟癮很大的人，像敷島牌、朝日牌那类带紙嘴的香烟，嫌太淡了，不过癮，平常总吸不带紙嘴的蝙蝠牌；戶澤在中野警察所訊問我的时候，早就听见我説过，他記在心里，于是今天特意給带了蝙蝠牌来。本来，关在警察署的拘留所里的時候，偶尔倒还有烟可吸，因为那里的看守往往把沒收得来的香烟藏在自己口袋里，有时一时高兴，就分給三、四个被拘留的人吸。可是关到刑务所以后，吸烟的机会就絶对沒有了。因此，請吸香烟，在被請的人來說，实在是极大的恩惠。渴望着吸烟的我，馬上中了檢察官的怀柔之計。随即取了那包烟，說道：“領情領情。”

我扯开錫紙，取出一枝烟，擦了根許久沒擦的火柴。

戶澤似乎不怎样爱吸烟。虽則点了一枝烟，却只是銜在嘴里，偶尔吸上几口，装个样子而已。我一面被許久不吸的蝙蝠牌香烟所輕微地麻醉，一面等候着，看对方究竟説出什么話来。

我才吸完一枝蝙蝠牌香烟，戶澤檢察官就説开了。

“实在忙得不可开交，煩死了，好不容易才抽出空来，要他們把你移到市谷刑务所去了。丰多摩实在太远，不方便；至于市谷，我去看你也可以。可是，首先請你不要誤会，檢察官的要求延期公审，完全是为你的利益着想。我虽則沒有在学校里直接听过你的課，但是我之所以会对社会問題感到兴趣，今天能成为这样一个专门处理思想罪犯的檢察官，可説都是受到你的著作的影响的緣故。《貧穷故事》的确是洛阳紙貴的一部著作。恕我乱説，我认为那个时期你写的东西最好，后来反而比較差。我爱讀你早期的著作……实际上，你是我的老前輩，我从你那里得益不浅；你甚至不妨説是我間接的老师。就因为考虑到这层关系，所以我才想在公

审以前，找你細細地談一談，听一听你的想法。不过这些话也扯得太远了，其实呢，抓人是我的本行，不管学者也好，什么人也好，反正一視同仁，我就只知道到了公审的时候，到法庭上去求刑。现在檢察官要求暂时延期公审，表面上看来，似乎对你不利，其实是为你的利益着想，不过当然，这就要看你表示什么态度了。总而言之，我是在这种心情下和你会面的，希望你不要誤会。现在是一个大好机会，可以让你冷靜地重新考虑一番。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机会，现在还是好好地考虑考虑吧。”

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檢察官这番話，一个字都不让漏掉，一个字都不让听錯，犹如害了重病的人注意倾听医生在診察完毕后所說的話那样。

我本来就是個容易听信別人說話的老好人，现在尽管对方是个檢察官，当听完他那番話之后，我心里还是想：“他的意思，大約是想让我写点什么东西，以此为代价，給我来一个緩刑吧。关于这一层，他一定还会說下去的。”于是，我就打定主意，准备在不伤害自己学問上的良心的限度內，尽量滿足对方的要求，发狠心来一个大退却。现在但看他再說些什么。

这时檢察官又說了这样一番話：“經過这次大逮捕，共产党已經完全垮台了。多少虽也漏网一部分，可是不怕，如果他們干出什么名堂来的話，那就再来一次大逮捕。老实說，三·一五事件的时候，抓人还心中无数，带有摸瞎性质。而现在的警察，就远非昔比了。现在，一切都是平常早就調查得清清楚楚，有了目标，只等适当的时机到来，看见他們稍稍露出些苗头，就一一加以逮捕，把他們連根鏟尽。（戶澤檢察官当时說出这样的話，过后想来，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連中央委員里都有奸細。）

“共产党嘛，且不說外国，至少在我們日本，是絕對不能成为气

候的。要是像俄国那样，由工人取得了天下，那自然对工人有利。但是，这在日本却行不通。日本具有全世界出类拔萃的国体，要是抹煞了这个特征，就不可能有日本民族的繁荣以及其他一切。

“自古以来，日本从来没有被外国征服过，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一点，我很想听一听你的意见。这个问题，还请你好好地想一想。

“佐野、鍋山那些家伙的彻底转变，完全是由于他们注意到了日本国体的尊严。在走了许多弯路之后，他们终于认识了这一点。你的想法怎样，我不知道，可是反正从俄国回来的那批人，全都转变了。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你说是不是。重要角色中间，至今死也不肯转变的，虽然也有两三个，可是奇怪的是他们都一次也没有到外国去过。我认为，正由于他们不了解外国，所以才不了解日本。

“佐野、鍋山的声明书已经在报上发表了，这给左翼那批家伙一个莫大的震动。年轻些的都发生了大动摇，大概不久就会回心转意的。佐野的影响力究竟不小哩。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从此在日本就完蛋了。佐野等人的厚厚的自我批判，也已经写出来了。这本来任何人都不给看，不过你如果要说的话，可以特别通融。你觉得怎样，要不要先和那些人见见面？如果你愿意和他们见面的话，我随时可以给你办手续。”

对于长期被监禁而完全没有和人谈话的机会的我来说，能和关在同一刑务所里的同志们谈话；而那些同志又是实践方面的老前辈，过去我又非常尊敬他们，照说是个极大的诱惑。可是现在，在我看来，佐野这批人已经接二连三地变成了最后而最恶劣的取消派叛徒。不错，我感到我自己也有些泄气，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参加到那批家伙的队伍里去，因此，我不仅不想和他们见面，而且觉得这时让我同他们见面，就是给我添麻烦。于是我毫不躊躇

地回答說：“我已决心不再搞政治运动，从今以后，我将絕口不談政治，所以既不想看那类东西，也不想同佐野等人见面。”

“这些話，我也略有所聞；今天我来，是为了想直接詳細問一問抱着这种想法的你，将来打算怎样。”

“关于将来的方針，預审推事曾經問过，当时已經作了书面答复。”

“哦，那个已經看到了，那是說如果保释的話，将怎样怎样，还说你沒有考虑到下獄以后的情况。我现在想問个明白的，是你今后永久的生活方針，而不是一定期間內的生活方針。”

最初我向預审推事提出那篇《今后的生活方針》的时候，心想要是能保释的話，那末不妨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所以我在那篇东西里說，在保释期間，我将蟄居在书斋里，专心翻譯《資本論》。不过，由于沒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所以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可以公开这样声明。尽管只是在一定期間里作出这样的让步，这在一个获得了党籍的共产主义者說来，已經是一个很大的退却了。因而，当我下定决心把这一层写出来的时候，我非常兴奋，手发着抖，几乎写不成字。可是，一旦开始退却，就沒有个底。现在占領着我的心的，已經不是希望得到保释，而是指望准予緩刑，而且这种指望十分强烈。要是能不受体刑，重新回家的話，那末我可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終身做一个老书生，蟄居在书斋里，好歹做些后勤工作，把余生献給《資本論》翻譯（好容易获得的党籍，自动把它放弃，固然可惜，而且讲不过去，可是对于矢尽刀折的今天的我來說，却只有这条路可走），而且，走这条路，对我說来，也是最适当的。这样一想，我就对我所离开的书斋里那张旧桌子，感到十分留恋。总而言之，退出运动，回到书斋，专心翻譯《資本論》，这就是那个时候我的热切的願望。

因此，檢察官問我的時候，我毫不躊躇地把這一番意思回答了他。同時，因為不知道這樣是否能使對方感到滿意，所以又附帶說了一句“你要是有什么意見，還請開誠布公地說出來”，等候着對方的下文。——對於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脫離運動無異於自殺。可是，這卻不是說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本身錯了，所以一點也不包含在思想上、學問上轉變方向的問題。這個程度的讓步，是否能使檢察官就此同意准予緩刑呢？對方如果認為這樣的讓步還不夠的話，大概還會對我指出吧。我就懷着這樣的念頭，對着檢察官。

這時檢察官逼進一步地說：“我沒有什麼意見。只是我希望你趁此機會把你的想法寫出來，發表一下。說是發表，听起来似乎過於鄭重其事了；不過，只有我一個人在這兒聽見，是一點也不發生社會效果的。……”

對於這一層，我絲毫不覺得不願意。因為我這個人，原來簡直就愛在玻璃房子里過活，一方面，固然不願意別人把我看得過低，另一方面，也不願意別人把我捧得過高，認為讓人家看到我的本來面目，最為輕鬆愉快。因此，過去我不曾為給自己裝點門面而操過什麼心。反而是，由於覺得早些讓人家知道我的弱點和丑惡心理活動，心里倒來得輕鬆些，所以有時甚至把照說應該保守秘密的東西，也主動地懺悔出來。現在我也受到同樣心理的支配。

“寫也可以，只是對外發表的東西，在刑務所里我却不大願意寫。”

“這又是為什麼呢？”

“許多年以來，我習慣於安定地靜靜地一面抽着香煙一面寫東西，不然的話，我就不想寫。”

因為我想到陰暗的牢房里那張用鉸鏈釘在牆上的、連厚一些

的书都载不住的白木小桌子，就寒心了。

我这样一說，檢察官馬上打斷了我的話：“这个好办，我将尽量設法使你感到方便。自然，刑务所里不能让一面抽烟一面写文章。不过，警卫主任森口，是我介紹去那里工作的……你認識警卫主任吧？”

“不，还不曾见过。”

“是么。反正我会打电话給他，让他尽量設法使你感到方便。”

“那末，我就写点什么吧。”

檢察官听到这話，大为高兴。商量的結果，很快地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由于我打算写篇相当长的东西，所以将来稿子可以交給《改造》杂志或《中央公論》杂志发表；杂志下月号的截稿期大約还有两个星期，由我赶快让我妻去同杂志社办好必要的交涉；由檢察局馬上通知我妻，让她明天来刑务所看我。一切說妥之后，檢察官就把守在走廊里的看守叫进来，吩咐他說：“今天是我的吩咐，有特別紧要的事情要办，所以你可以馬上把人送回去，不要再让他在临时牢房耽擱了。你对管事的人員，就說这是我讲的。听懂了么？”

后来他一面送我出来，一面自言自語地說：“要求不要求准予緩刑，还没准儿；可是现在，檢察官的上訴，反正不打算提了。”

我隱隱約約听到这两句話的时候，怔了一下，可是还来不及問他，他那肩膀寬广的背影，已大踏步地消失在走廊里了。

跟随我的看守把我送回临时牢房的时候，在半路上提醒我說：“不可以对別人說起今天喝茶吸烟的事！”

写《獄中独語》的經過

我弟弟左京，到丰多摩去探監，恰巧我那天被移押到市谷去

了，隔了一天，他又到市谷去探監，我又不在，說是去法院了，他大失所望，回家的時候，就轉到秀子那里，把兩次探監都沒有遇見的一層告訴了她。後來秀子就接到了檢察官戶澤的通知，叫她明天上午八點鐘到市谷去看我。

第二天（6月30日），秀子就到市谷去看我了，心里琢磨着不知道是為了什麼事。

見了面，聽我把大致的情況說了一下，我妻立刻擔心起來。她早就聽到不久要把我移押到市谷刑務所去，心想那准是檢察官策劃着把自己的丈夫拖進佐野那批人中間去，要是提出這一點的話，丈夫一定很窘；現在事情果然不出她所料，這就使她不得不担起心事來。

“在刑務所里寫東西，還是算了吧。我覺得即使要寫的話，也該先和律師商量商量才是。”

她不由得說出了這樣的話。因為她知道我的性格，想到一就不知道想二，怕我只圖早些出獄，單為這方面着想，在不知不覺中間犯錯誤。她並不懷疑我的正直，並不認為我會說出違心之言。可是，她知道我這個人是感情用事的，主觀的，容易為自己的希望和願望所支配，往往有陷於片面而走極端的危險。現在，這種性格的我，正當坐在牢里急着想出來的時候，却要寫東西，那准會犯這種老毛病。她認為這是很危險的。

我馬上回答說：“不用擔心，我決不會做出出賣良心的事情來。”

秀子所擔心的倒不是這個，可是因為旁邊有看守監視着，也不便再往下分說。因此她就問道：“是不是寫關於佐野等的聲明書的事情呢？”

“不是，他們要給我看那聲明書，我回絕了。又問我要不要和

佐野等见一次面，我也回絕了。我打算一字都不提到政治上的問題。”

秀子听到这个回答，稍稍放心了。商量的結果，决定把稿子交給《改造》杂志发表，由秀子去交涉，这样，我們就結束了那天的接见。

秀子的日記，記到当天市谷刑务所的接见，最后有这样一句話：“据說他昨夜很兴奋，沒有睡着觉。”这大約是我在接见时对她讲的吧。接着还有这样的話：“回家时順便到左京小叔那里去和到目白去。”

秀子在市谷和我见面之后，馬上就去高圓寺左京那里，把当天的情况告訴了他；然后又去目白訪問了山田盛太郎。她所忧虑的，是我所写的东西，会不会被当局加以窜改，然后对外发表。她觉得，如果万一发生了那样的事，那末即使事后加以更正，对于社会方面，也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这一着必須在事前加以預防；可是，关于这类事情，又沒有一个足以信任而又老于世故的人可以商量，所以只好去訪問在我被捕前从未见过面的山田（劳农党解散以后，山田也曾訪問过我。当时他所出版的关于日本資本主义的分析的新著作，正好起到了解释共产国际一部分綱領的作用，因而获得了青年学者的莫大尊敬和信仰）。他們商量的結果，决定稿子先直接寄給秀子，对外发表的事由秀子一手办理；商量好以后，她才回家。她因为怕給別人找麻煩，所以在日記里沒有写出山田的名字。

話分两头。那一天，看守长把紙、墨水和玻璃鋼笔送到我牢房里来。这就是檢察官为了我要写文章而答应給我的“特別方便”的具体內容。

可是，桌子呢，就是那块小小的白木板。那块板离窗远，离門

近，用鉸鏈釘牢在陰暗的牆角落里。寫東西而不得不用這樣的桌子，首先就掃興。

我獨自暗中嘟囔着。一切精神上的生產，首先必須有“自由”，而我今天卻沒有這種自由。和魚不能在陸地上游泳一樣，人坐在監牢里（連葡萄酒都給喝的西洋的刑務所里，又當別論；至於在封建牢獄的殘余遺留得相當多的日本監獄里），真正的精神上的生產，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說，離開了我那張桌子，我怎么都不想寫東西。我獨自這樣嘟囔着。

我所說的那張桌子，記得在這《回憶》的另外的地方已經提到過不止一次了。那張桌子是我結婚後不久買的，一直用了三十多年，每逢我把什么都丟光的時候，唯獨這張桌子我却總是不肯把它拋棄；我的五十種以上的著作，幾乎都是在這張桌子上寫出來的。自從大學里給了我一個研究室以後，我很少呆在家里，不分冬夏晝夜，讀書總是在研究室里讀。每逢暑假，大多數教授都到各地去演講，或是到別處去避暑，把研究室空起來了。而我呢，儘管在盛夏天氣，每天還照樣去研究室，中午那頓飯，帶好了盒子飯去吃。經濟學部里的人，留下來的，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谷口吉彥副教授；到午飯時候，我總是在我屋子的電爐上燒開了水，沏上茶，把谷口請來一道吃午飯。到了冬天，研究室里晚上都有暖氣。好在我家離學校很近，我因為家里不如研究室里暖和，所以一吃完晚飯，就急忙又上研究室，在那里讀書，直到水汀關閉為止。法學部和經濟學部各教授、副教授的研究室，同在一所磚瓦蓋造的二層樓房子里，一共有三十多間，屋里通着很熱的暖氣，可是夜里利用它的却只有我一個，我老覺得太可惜了。——就像這樣，我幾乎終年呆在大學研究室里過日子；可是，當我要寫點什么东西對外發表的時候，即使是一篇在報紙上發表的通俗讀物，我也總是呆在自家的書

斋里，鋪了坐墊、坐在矮桌子前面写。我在市谷刑务所要写东西时所不能忘情的，就是那张桌子。那是用厚樛板做成的桌子，四条腿給截短了，它又笨重又庞大，女人們簡直別想搬得动。世上有些写文章的人，往往为了要写文章而出外旅行；而我呢，离开了仿佛象征着我在科学上的不可动搖的信念的那张又沉又大的桌子，就不可能有什么写作活动。离开家庭以来，每逢要写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总是想起那张令人难忘的桌子；而现在，却要坐在特別来得窄小的桌子前面写东西，因此不禁深深地感觉到一支笔重得犹如鉄錐子一样。

可是，呆在自己的牢房里写东西，这在牢獄世界里，却无疑地是一种“特別的方便”。一般未决的被告，是不許在自己的牢房里使用紙笔的。（記得四十多年以前，我在小学生时代曾經用过紙制石板和化石笔，而现在牢房里也只許用这个。我本来以为紙制石板这种东西早已成了博物館里的陈列品，岂知外界还在制造这种东西，这使我当时感到非常意外。）哪怕写一张明信片，也必須在规定的礼拜几那天向主任看守申請，第二、三天得到許可、領到明信片后，必須在規定時間到书写室里去写。关我的那所监牢的书写室，是和临时牢房差不多大小的小房間，才能容下一个身体，小窗子开得很高，站直了都看不到外边，屋里光綫差得很。夏天，大白天里也有很多蚊子。一边被那些蚊子咬着，一边背着窗（座位是这样安設的，以便看守可以从走廊里通过眼洞随时視察），弯了腰坐在一张又高又小的板凳上，在很窄的桌子上用玻璃鋼笔写字，尽管只写一张明信片，我都膩煩。因此，本来爱写信的我，在这里却很少申請发信。

写出来的东西本来打算在《改造》上发表，所以要写就得写长些。可是：一切条件不允許我写那么长的东西。好比盛夏的灼热

天气，一匹拉着重载的瘦馬，喘着气爬上沒有树木的山頂，我就在这种心情下，好容易在第二天才写出了一篇类似备忘录的短文章，在那上面加了一个“獄中独語”的标题。使着秃秃的玻璃鋼笔和渗在棉花里的墨水，在容易起毛的粗糙的紙上写东西，怎样也不想写比这更长些的了。

我把写好的稿子馬上交給看守长。这是7月2日下午的事情。大概是他們打电话把这事报告了检察院吧，当天傍晚时候，戶澤检察官这下亲自来到刑务所。以后他也常常来，每次总是从法院回家的时候順路来的，同时由于在刑务所里，无论吃晚飯还是睡觉都比外面早（只关不課劳役的未决的被告的这个刑务所的就寝时间，比其他一般刑务所更早），所以他来的时候，总是快要就寝了。今天他到这里的时候，太阳也快落山了。

我让来叫我的看守带着，什么都不知道地（在监牢里，事先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走出牢房，在露天下走了一段路，到了另一栋房子里。这栋房子接近外門，是工作人員的办公处。我被看守带着，在不熟悉的走廊里东湾西拐，然后走上楼梯，到了會議室那个大房間的門口，这时看守命令我在那里等一下。

不多一会，穿了白西装的戶澤，右手提着一只黑皮包，由值日看守长領着，走上二楼来了。他看见我站在那里，精神抖擻地和我招呼了一下，回头向身旁的看守长問了一声“是这里么？”就迅速地大踏步走进會議室。我也跟了进去。

刑务所里的工作人員，除了值夜班的而外，似乎已經全部下班了。夕阳直射的这个會議室，因为沒有打开窗子，而且下着窗帘，所以一走进去，感到十分悶热。

看守长吩咐一个看守取出团扇，倒了茶，然后指着牆角上的电鈴按钮說：“有什么事情，請按电鈴吧。”說完就退了出去。

和我对坐在复着青呢台毯的大会议桌一端的户泽，从西装口袋里取出我所写的那个稿子，说道：“这篇文章刚才已经拜读了，我觉得这就挺好。可是，我一个人不能作主，准备先带回去，同大家商量以后，再来看你。”

由于这篇东西太平无事地通过了第一道关口，我放了心。户泽呢，似乎忘掉了当前的事情那样，说完那两句话以后，只管闲扯着，什么岩波书店的老板真可佩服啦等等。这些话，既和我的审判毫不相干，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可是他却津津有味地扯着。这样杂七杂八地扯了一阵，他就说一声“再见”，走了。

第二天7月3日上午十点钟，秀子不放心那篇稿子，来探监了。我大致对她说：“稿子已经写好。可是非常短。登载在杂志上，实在太短了，不过在这种地方怎么样也写不出长东西来。尽管写那样一点儿东西，都觉得非常累。”

那天秀子回家的时候，去高圆寺左京那儿转了个弯。回到家里歇了一会，到下午四点多钟，中野警察署的巡警来了，通知她在当天下午六点钟以前去检察院看户泽检察官。

她马上去了。到那里一看，户泽板着脸对她说：“据说你在探监的时候，阻止你丈夫把写好的文章发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请你来，就是要你说明一下。”

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的秀子，含糊其词地说了一番搪塞的话；检察官方面也没有深究。——特地把人叫了去，却只不过为了这点儿事情。

秀子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面由看了一整天家的女佣陪着，吃着错过了时刻的晚饭，一面独自在肚子里想：“这就难怪做检察官的忙个不了啦。”

老记着检察官的那副不好看的脸色，她心里十分不自在。左

京要是能来談談多好呀，可是今天早晨刚刚见过面，又哪里会来呢？她心里正在那样想，却不料改造社的記者倒来了，目的是要求让他们发表那篇文章，而且一再叮嘱务必让他们发表，然后走了。改造社的記者前脚刚走，中央公論社的記者后脚就到。說河上先生的文章只給《改造》刊登，不給他們写些什么，实在下不了台，杂志社的記者就沒法再当下去，所以无论如何要請帮忙，另外写点什么让他拿去发表，再三哭訴哀求不已，因此秀子应允他明天去市谷和自己的丈夫商量商量看。临睡的时候，她一想到明天又不得不出去，心里就煩起来。

《獄中独語》的被迫修改

第二天7月4日的早晨，起来一看，下起小雨来了。秀子十一点钟离家，正午到达市谷刑务所，就申請会见，岂知正好那时戶澤到刑务所来找我談話，于是让她等一下。

她在那里等了三个钟头。

在这段时间里，戶澤要求我修改《獄中独語》这篇稿子。

他这样說：“你所写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滿好，可是回去一商量，有人却认为就那样发表不妥当，那倒反是給馬克思主义作宣传了。我多年来和思想犯接触，从早年起就常看左翼方面的书刊，也許是神經麻痹了吧，我觉得毫无問題的地方，別人往往觉得有問題。由于这种关系，希望你把这篇文章重新考虑一下，怎么样？”

“是这样的么？”

我沉思了一会。实际上，我所写的那篇东西，虽則毫无顧忌地暴露了自己的“沒落”，却作了充分的注意，使它不至于损伤馬克思主义的本身。不仅这样，我暗地里还存心，要是可能的話，使这一

篇文章对馬克思主义的宣传起到几分作用哩。可是結果，毕竟对方也不弱，沒有輕易让过关。

我这个人，本来最不願意人家干涉我所写的东西。当我听到檢察官那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馬上这样想：尽管檢察官叫我重新考虑，我现在也只能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不过，因为我一心以为叫我写这篇文章是准予緩刑的交換条件，所以也不便像平素那样发起脾气来。我决心寻求一个弥縫的方法，使这篇文章能够通过。

“那末，让我重新想想看吧。”我这样说，接着就开始进行修改，把那些被认为成問題的地方尽量改得婉轉一些。比如：

“上面这些话，自然并不意味我对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上的信心发生了动摇”改为“上面这些话，自然并不意味我对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的科学上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在这里，只是把“共产主义”四字删去，把“馬克思主义”改成了“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这样一改，簡直反而如同画龙点睛，可是我觉得，在外行人看来，印象也許就两样得多。

就像这样，凡是遇到被认为成問題的地方，我就用这样的话征求戶澤的意见：

“这儿改成这样好不好？”

“这样改还不成么？”

“那末，这样改行么？”

結果費了很多時間，把成問題的地方全都修改完毕。后来戶澤拿起那篇稿子，翻来复去讀了两三遍，看他的神气，他似乎已經感到滿意，觉得修改了一些字句之后，全文給人的印象已經“妥当”得多了。

于是，他把这里的典獄长(所长)叫来，把修改后的稿子給他看，說：“怎么样，这样差不多了吧。”

这个典獄长是一个年紀还輕、皮肤白淨、梳着光光的分头、看来生性傲慢的矮子，我还把他当作是書記啦什么的哩。

他把稿子接在手里，还没有看，就一半对着戶澤那面說：“刑务所里不允許写文章在杂志上发表，所以这篇文章，前面应当加一个前言。前言可以采用写給自己老婆的信的形式，里面可以这样說：下面所写的，是本人现在的想法，請你讀一下；讀过以后，不妨拿到杂志上去发表。因为，如果是书信的話，那末检查过內容以后，认为沒問題，这儿是允許发出的。”

因为我一心以为他是書記啦什么的，所以暗想：“这家伙說話簡直太目中无人了。”

后来他把那篇稿子看过一遍，說什么文章里面有些地方非修改不可，首先开头那句“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是共产主义者”就要删去。那个地方，本来早就根据檢察官的意思，几次三番作了修改，现在他居然还来加以挑剔，所以我十分气憤，心想：“这个毛头小伙子，說話瞧不起人，倒会罗嗦！”

因此，我比較强硬地反駁說：“可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是反对共产主义、否定共产党的人呀。共产党员，不一定要具备对馬克思主义的高深学識修养。在这种意义上，共产主义者不需要是个馬克思主义学者；可是，只要是个信仰馬克思主义的人，他就不能說不贊成共产党。这并不是我在主张我的意见，而只是把事实写了出来；难道不是这样么？”

对方一脸得意的神色，頂了回来：“天下不便写的事实有的是。尽管是事实，在刑务所里写这种东西是不成的。”

这时我只好应了一句“是么？”結果还是不得不把原稿第一頁去掉，另外写了几行。

典獄长还叫删去原稿最后的几句话。那是这样写的：“为了把

上面这篇文章作为葬送自己的弔辞，同时使它成为挽救自己的咒文，就在市谷刑务所的牢房里把它写完了。1933年7月2日。”

他的理由是，把市谷刑务所的名字写出来，不妥当。其实呢，当时我被关在市谷刑务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现在我所要发表的这篇《獄中独語》，不消說是在市谷刑务所的牢房里写出来的。只是，这种地方乃是所謂写文章的潤色，每篇末尾总要把写作的地点和時間提一提。不这样的话，这种短文章，就像割掉了尾巴的蜻蜓一般，沒个收束。我怀着討救兵的念头，一半对着检察官那面，用比較坚决的口气訴說了我的意见。于是检察官以劝慰的口气插嘴道：“不願意把自己的所名写出来，这是刑务所的传统；现在且不談大道理，还是照他所說的那樣做吧。”

但是，我怎么样也不願把那一节完全删掉，所以无精打彩地把它改成这样：“为了把上面这篇文章作为葬送自己的弔辞，同时使它成为挽救自己的咒文，1933年7月2日，一个人坐着把这篇东西写完了。”

尽管这种改动不大，文气总像是受到了破坏，总觉得不是味儿。

原稿全部修改完毕后，检察官让我抄了一个副本。因为他說要带回去再商量一下。

“如果决定这篇东西可用，会打电话来通知，那时就請你寄給你太太。如果商量下来，觉得实在不行，那末我想由我以談話的形式把你的想法的大致輪廓，对新聞記者发表，你觉得怎样？”

检察官这样对我說。而我呢，一心只想为了获得緩刑而采取某种形式的妥协，所以毫不躊躇地应允了。要是那时我妻在我身边，她一定会阻止我，因为連我写的文章，她都担心被检察当局窜改哩。

我一应允，戶澤不愧为检察官，随即要求說：“那末，为了慎重起见，請你写个委任状給我吧。内容可以这样写：1933年7月2日所写的、准备寄給妻子的、談到自己现在的想法的文章，要是不許可寄发的話，同意检察院方面把該文大意公开发表。委任状写好后，还得請你按个指印。否則引起检察官侵害宪法第二十六条所保障的书信秘密的問題，就不好办。”我心里虽則不願意，还是照他的意思写了委任状，而且照式按了指印。

戶澤露出滿意的神色，走了。

我和戶澤之間作着上述那样的長時間談話的时候，正是秀子坐在刑务所的探监人等候室的一角等着和我会面的时候。那里出进的人很多，属于哪一社会阶层的人都有；可是和左翼运动有关系的人，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因强盜、窃盜、詐欺等罪而被拘押的那些人的家属，都俯倒了头，显出沒脸见人的样子；可是思想犯的家屬，却互相大声談笑着，活跃得很。——秀子等候了好半天，等到检察官走了，才好容易和我见了面。

我先告訴她，因为稿子有几个地方要修改，所以迟未寄出；后来她对我說，《中央公論》也在一再要我給他們另外写一篇文章。

我皺着眉头說：“好容易才写出那样一篇短短的类似备忘录的东西，已經累得不得了。《中央公論》那方面，你就用这話回絕了他們吧。”还說：“疲倦透了，打算靜靜的呆上三、四天。在这几天里面，請你不要来看我。”又叮囑她說：“稿子寄到以后，可以把底稿留在家里，另外抄写一份給杂志社。”

这是因为我想把这份值得紀念的原稿保存起来，再則，原稿上照說还可以辨認得出修改以前的初稿的面目，我也打算原封不动地把它保存下来。

（可是，最近取出那份原稿一看，修改的部分是哪里，最初的句

子是怎样的，大部分已无法辨认出来，真是可惜。那是因为我写稿子有个脾气，爱干净，涂改的地方，不喜欢留下原来的字迹。那份稿子，也是这样，当时和检察官说着话，并没有想到以后的事，漫不经心地把初稿经过修改的部分扯掉，重新抄写得干干净净的了。今天想起来，真是后悔。）

探监后回到家里，秀子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看得出他很想快些出来。”事实上，我当时的确急着想快点出来。

《獄中独語》的在报纸上发表

把我原稿的副本带了回去的户泽，第二天7月5日，获得了上司的谅解，决定一字不动地把原稿发表，同时向审判长办好了撤回检察官要求延期公审的申请手续。律师当天就把决定8月1日举行公审的通知转达了秀子。

6日下午，接到准许让我发信的通知。于是我又重新把原稿看了一遍，附上一页简单的信，马上办手续送交看守长。当时我想，无论怎样快，不到7日，总不会从刑务所付邮，稿子最快也得在10日左右才会寄到改造社。

岂知地方检察院方面，见到我的稿子出乎意外地短，即使不在杂志上发表，日报上也登载得了，而且觉得与其交给一份《改造》杂志刊登，还不如同时在所有各报上发表，它的宣传效果不消说要大得多，于是产生了不如交给报纸发表的说法，结果，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就在6日那天这样办了。

同样在报上发表，晨报比晚报效果大。于是，检察院方面，估计着东京市内各报社晚报的截稿时间已过，在6日下午很晚的时候，召集了各报的司法记者，分发给他们一份题作《獄中独語，河上

肇»的油印品。

傍晚七点钟，秀子刚刚吃完晚饭，《日本电报》和《中外商业》的新闻记者，同时跑来了，声称刚才检察院发表了河上先生的转变方向声明书，希望听听太太你的感想。最厌恶和新闻记者谈话的她，把两个记者胡乱应付回去之后，急忙躲到高圆寺左京家里去了。可是，新闻记者继续不断地到来，相生町的小胡同的弄堂房子前面，挤满了十几辆汽车，多久也不见离去。看家的女佣看到这种情形，觉得照这样再也赶不走那些人，就偷偷地从后门溜出来，路远迢迢地到高圆寺去接秀子。秀子觉得不能扔下一个年轻女佣不管，只得亲自出马，一同回到家里。这时二十多个记者，顿时毫无礼貌地喊说：“喂，回来啦！”也没有通报，就蜂拥闯到楼上来了。

楼上那间铺六张席垫的屋子里，北窗下面摆着我那张用了三十多年的大书桌，仿佛在等待主人的归来；那里的墙上，挂着一个圆镜框，里面是我亲笔写在诗笺上的一首古人的五言绝句：“落日五湖游，烟波处处愁，浮沈千古事，谁与问东流”。秀子端坐桌旁，轻摇团扇，勉强地对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回答一言半语（当时《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曾用“毕竟落落大方，沉默寡言”的话形容她）。

“您对于您丈夫的转变方向，作何感想呢？”

“是不是因此而觉得放心了呢？”

“对于其他同志们，您是怎样想法呢？”

各报社的记者，这样那样地提出了许多问题，而秀子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我还没有看到丈夫所写的东西，所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感想。不过探监的时候，他曾把他说是不久即将动笔的东西的内容大致对我说过；现在我能说的，只是一点，就是我认为他那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替他难过。”

記者們千方百計想使她再說一些，執拗地向她進逼，可是她多久也只零零落落地來這麼一句半句，什麼“我現在的心情很複雜……”啦，“我認為丈夫決心寫那篇東西，是煞費躊躇的……”啦等等。

最後連記者們也都死了心，於是轉換了話題。

“河上先生對於自己女兒的事是怎樣一個想法？您和他見面的時候，他說了哪些話？”

“我們雙方近來不大提到女兒的事……”

“先生在監牢里讀些什麼書呢？”

“由於里面來索取，前天把《世界地理風俗大系》中的《中國篇》、《巴爾干半島篇》和《波蘭篇》送了去。《蘇聯篇》不許可，所以沒有能送進去。近來大概在讀這些東西吧。”

無論怎麼問，總歸得不到什麼了不起的消息。貼近秀子身邊坐著的《時事新報》的記者，當時簡直全無規矩地想摸秀子身上穿的衣裳，可是結果在他的報道里也只帶上這樣一筆：“夫人身上穿著素淨的灰色格子布單衣”。

到後來，記者們完全絕望了，於是動手拍照。各報社的記者都帶有兩名攝影記者。他們在天花板低低的、六張席墊的屋子裡不斷地點燃起鎂光燈。——世上有一種婦道人家，遇到丈夫出了什麼震動社會的事，就出來出風頭，對新聞記者說些不相干的話，讓新聞記者給自己拍照，秀子本來一看見這種人就頭疼；可是經過一次一次身臨其境，才明白這種事情在某種程度上簡直是無可避免的。

十點鐘左右，那批人回去了，後到的《國民新聞》和《讀賣新聞》的記者，又把同樣的事情重復了一次。

送走了記者們，關上大門的時候，夜里開始下的雨，下得格外大了。

这些情节，呆在监牢里的我，自然无从知道。办完《獄中独語》的发信手續以后，我还只管惦记着那篇东西。到了就寝時間，睡到鋪上，还是清醒地反复思考着自己所写的文章。本来我这个人写文章一向认真，写好一篇东西之后，总把其中的重要的地方記在心里，事后如果想到在內容或表现方法方面有什么需要潤飾的地方，等印刷所把校样一送到，就立即加以修改（寄給东京的《改造》或《中央公論》的文章，尽管我人在京都，也总是請他們把校样寄給我；如果不亲自加以校对，就放心不下）。现在也是同样情形，尤其是因为所写的是备忘录式的短文，一字一句都背得出，什么地方作了怎样的修改，也全都記得。现在想来，其中有两三个地方，无论怎样非重新修改不可。一想到这一层，就只管担心这方面了，因而在悶热的牢房的夏夜，多久我都不能入睡。

第二天早晨，刚到起床時間，我就放下报知机（所謂报知机，是个木棍子，可以从室內伸出走廊外，有几分像鉄路上用的信号机；监犯找看守有事时，用它作信号），把主任看守叫了来，申請立即见看守长，因为我打算請求让我把昨夜才提出、照說还没有付邮的那篇《独語》中的两三个地方作如此这般的修改。

收容者的起床時間非常早，可是刑务所一般所謂干部一級的工作人員的上班時間却仍旧和外面普通上班時間一样。我等来等去，直等到吃过早飯好久，好不容易才见到看守长。可是见面一談之下，才知道文章已經在当天的晨报上一齐发表了。

当然，我連做梦也沒有想到这一层。因为本来讲好，那篇文章先寄到我妻手里，然后由她送交改造社，把它刊登在下月1号发行的《改造》杂志上。不过，当时听到这个出乎意外的消息，我也并没有吃惊或着慌。因为，我一向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我所写的东西，不管它的內容好不好。因此我甚至反而觉得，那篇《独語》，与其刊登

在讀者有限的一个杂志上，倒不如让全国各报一齐发表，来得合适。我所引以为憾的，只是过后想到要改的地方未能修改以及对杂志社失了約而已。

我和看守长刚见过面，不久戶澤檢察官就来了，他是上班順路来找我的。他一见到我，就說：“我这个人，从来沒有向誰低头过，可是今天却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向你低头认罪。因为，由于全然沒有料到的齟齬，你的文章在今天的晨报上已經发表出来了。”然后就絮絮叨叨地把发生齟齬的經過向我說明，最后补上一句“由于这个緣故，所以無論如何請你不要誤会。我因为怕你发生誤会，所以才赶忙来向你說明。稿子的抄本是由我带回去的，所以我得切实向你賠不是。”

可是，他所說的“緣故”到底是什么緣故，从他那番話里却无法弄明白；究竟是否真的发生了什麼齟齬，还是原来就是那样計劃的，还是临时想到那样办的，在我也沒法判断；不过我觉得，对于这一层，并沒有追究的必要，所以也沒有死乞百賴地問他，只是觉得当时他郑重其事地搬出宪法的条文，叫我写了委任状，而现在却是这样的結果，未免不对头而已。

看到我的过于冷淡的态度，戶澤觉得沒趣，还在自言自語地訴說緣由。

“昨天晚报上刚刊登出高桥貞树、三田村四郎、中尾胜男三个人的轉变方向声明书，所以其实即使要在报纸上发表，也以过一些时候再发表，效果来得好些；所以，說实話，那样做，使我都觉得很为难。”

从戶澤这几句話里，我才知道連高桥、三田村那些中央委員都轉变方向了。呆在监牢里，能听到这样的消息，是跟請我抽香烟一样值得感謝的。

回到牢房以后，想到今天第一次看见检察官表示出当被告的态度，說些牛头不对馬嘴的話，我就老是暗地发笑，而且觉得很痛快。

下午，秀子又来探监。

这天早晨，秀子起身很早。隔夜的雨，还在点点滴滴地下着。因为時間还早，报纸还没有送来。焦急地等报纸送到，翻开一看，《东京朝日新聞》用大字标题、几乎是整版地登着我的消息。她把登在上面的《獄中独語》翻来复去地讀了好几遍。想到自己的丈夫现在公开向社会作出这样的声明，一个人在监牢里还不知怎样地烦恼着，心里就难过。后来她又让女佣去新宿买了几种报纸来。哪种报纸都很重视我那篇文章，而且态度都比较好。

《东京朝日新聞》上說：

“前些日子佐野、鍋山两巨头声明转变方向，6日又是高桥贞树、三田村四郎、中尾胜男三首脑声明转变方向。而河上博士，却和以上那些人不同，是不折不扣的沒落。‘因被捕而沒落！’这是到今天为止許多知識分子共产党员所走过的道路。可是他們一旦保释出外，由于虛榮的名譽心作祟，就只知道在公审法庭上或是諸如此类的大庭广众的場合說些空洞的硬話，却没有一个人肯坦白說是自己已經沒落了。河上博士下面这篇声明他已經彻底沒落的文章，乃是毫无掩飾地描写了自己屈服在伟大的国家权力之前的真情实况以及对生活的頑强追求的一篇人生記錄。”

《国民新聞》上說：“这篇文章恳切地吐露了人的真情，毫不虛伪地写下了老僧入山采药的心境，而且承认自己已經沒有資格做一个以实践为生命的馬克思主义者，自称为书斋里的一个老弱残兵，向党低头請罪，这就显出了博士的真摯的整个面貌，和历来的一番大道理的轉變方向声明书不同，表示了真正的人性。”

《时事新报》說：“这篇文章恳切地吐露出人的感情，和一般所謂共产党员的声明书不同，充滿了动人的真情。”

《报知新聞》上更說：“由于真挚的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和认真的性格、1928年抛弃了大学教授的高貴职位、走出了象牙之塔的博士，后来以‘前卫一兵卒’的資格，纵横馳驅在斗争場里，用他流利动人的文章和滿腔斗志，坚守正統的馬克思主义陣营达五年之久，終于牽連在去年10月的共产党事件里，坐了牢，不久就要举行公审。现在他用銳利的解剖刀作了自我批判，清算了过去的一切，重新退到象牙之塔里去了。要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决心把‘腐儒的余生’貢獻給《資本論》的翻譯。下面刊出的《獄中独語》，就是他輾轉反側地苦悶之后，用他的生花妙笔所写出的他那明鏡止水的心境。全文是寄給住在中野区相生町十号的秀子夫人的。”

無論哪一段消息，看上去都沒有多大恶意；秀子把每份報紙讀过以后，大致放了心。——今天我自己讀到这些消息的时候，觉得未免把我过分夸奖了，心里有些慚愧。

从监牢里挂号寄給家里的信，下午才送到；邮局所盖的邮戳，是“7月6日下午4—8时”。不久《东京朝日新聞》的記者来了，要求务必让他把原稿拍成照片，可是秀子拒絕了。呆一会儿他又来了，还是死乞百賴地要拍照，可是秀子仍然坚决拒絕了。

后来吃了午飯，她才到刑务所来看我。

我一见她的面，就問：“怎么样，看了那篇东西，沒有吓倒吧？”

她微笑着回答：“其实我什么也不懂……不过正直地把真情写出，我觉得那也沒有什么不可以吧。所有各报都把它当作重要消息登出了，可是都比較表示好感。”

“真是，仅仅那点儿东西，就累得我够受了。”

我終于还向她訴苦似地說出了这样的話；而秀子呢，一眼就看

到我在不多几天中間就显著地瘦了下来，因而吃惊非凡。

回家时，她順便去牢飯鋪，让鋪子里从当夜开始，每頓晚飯多送五角錢一份的西菜湯（名为西菜湯，其实是碗酱油湯而已。牢飯必須由牢飯鋪送进来，品目也必須在刑务所限定的范围以內，所以別无办法）。因此，当时我虽則每天吃着限定范围内的最上等的牢飯，但是胃口仍然非常不好，特意給我送进来的东西，大半还是剩下了。粮食不足的今天，回想当时的情况，觉得真是暴殄天物。

《獄中独語》的内容和写作当时的思想情况

刊載在报上的我所写的《獄中独語》，内容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而被捕的我，如果想始終作为共产主义者而生存下去，那末，留給我的就只有監獄生活。要是想重新获得自由的話，就迟早非自动抛弃共产主义者的資格不可。

“这一点，本来就摆得很清楚；共产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也充分懂得。把这副老骨头埋葬在牢獄里，这是我早就作好的精神准备。連自己都这样想，在第三者看来，可能更不成問題了。俗話說，‘人生五十’，我已經五十五岁了，余生已經沒有多久了。誰都会以为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死，将是我的夙願吧。可是一旦亲身体驗到牢獄生活，却就懂得了超越生死的老和尚入山采药的心情。尽管不惧怕无可避免的一死，然而总想尽量避免痛苦，死得好过一些，这似乎是人的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一个人愈是到了老年时代，生活力日漸衰退，这种本能可能表现得愈是突出。我在二十六岁的时候，曾經閱历过一次精神上的死亡；和那个时候比較起来，现在的想法显然不一样了。由生活力衰退而来的气力衰弱，是无法可想的。我今天才真正明白，世上的确有

一类事情，不是青年就干不了。……自动抛弃共产主义者的资格，这在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乃是自杀。共产主义者是决不应该那样做的。为了重新获得自由，我现在却竟明知故犯，这只有低头向同志们请罪。

“今后我将和实际运动——无论合法的或非法的——完全断绝关系，隐居到原来的书斋里去。这是我现在的决心。现在我把这个决心公开宣布，给予它一种社会效果，这就意味着我亲手葬送共产主义者的我。

“实际运动本来就不适合我的性格，尽管如此，1928年辞去大学教授职位以后，我还是一步一步地深入到运动里去，这完全是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上的信仰，使得我不能再蛰居在书斋里的缘故。我不过是迫于一种义务感而硬着头皮做去而已。在同实际运动发生关系的这五年中间，主观上我尝受了别人所不知道的种种痛苦。亲自充当候选人而参加竞选，这种事情，对于有这种爱好的人来说，也许十分有趣；可是即使这种事情，我见了也十分头痛。所以，等到经历了种种的磨炼、最后不得不抛弃母亲和妻子、过一辈子地下生活的时候，我不由得口占了这首歌：“找到了归宿，回头一看，已经越过了多少山河！”这完全是我真实的感触。当时，我一方面觉得，由于科学上的信仰，而能置身于这样的境地，乃是一个学者的夙愿；同时也不能不想到，像我这样1879年生在新加坡、一直受着明治政府的教育的人，居然能在目前情势下达到这样的境地，这中间不知道吃尽了多少苦头。……这还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而今天呢，却就要亲手葬送共产主义者的自己了。面对着注定的命运，独自坐在监牢里，我真是感慨无穷。

“为了避免误解，还得声明一下，我说这些话，并不表示我对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論的科学信仰发生了动摇。我虽則才疏学浅，然而水里火里經過了三十年而得来的科学上的信仰，却决不至于由于仅仅半年的牢獄生活而馬上开始发生动摇。即使隱居到书斋里之后，我仍然将是信奉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者。不过，光是信奉馬克思主义，是不成其为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而且，这当然会对一个人的科学上的成就給与决定性的影响。无論是誰，只要他脫离了实际运动，那末不論他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和代表馬克思主义发展方向的最先端的学者們并駕齐驅了。固然，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可能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的才能，而完全蟄居在研究室里和书斋里；但是，他們是始終也不会脫离实际运动的。这一点，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区别于腐儒式的單純的馬克思主义学者的地方；而且到后来，只有前一种人才能够对馬克思主义的发展（馬克思主义不是停滯而固定的学說，它无止境地不断地发展着）有所貢獻。退出了阶级斗争而变成一个残兵的我，在科学上也决不可能作出上述的貢獻。本来，人到死都不可以沒有志气，而我呢，从今以后，即使在科学的領域里，也只好死心蹋地地搞些不十分重要的工作了。

“从实际运动退隱以后，对于直接有关实际运动的政治問題，当然我将完全不再开口。因为我深信，退隱在书斋里的人的政論，只有害处，沒有好处。从今以后，我将終身不再写政論文字。

“至于《資本論》的翻譯，在我有生之日，却总想把它搞出来。——这是几年来不断縈繞在我脑子里的一个希望。今后只指望呆在书斋里作为一个残兵而偷生于世的我，准备在获得自由之后，尽快地完成这个工作，来补賞我貪图安逸的罪过于万一。

为了把上面这篇文章作为葬送自己的弔辞，同时使它成为挽救自己的咒文，（下面两句，初稿时的字句还記得，现在照初稿抄

出)就在市谷刑务所的牢房里把它写完。1933年7月2日。”

现在一行一行地重抄这篇东西的时候,我捏着一把冷汗,担心当时不知写了些什么;等到抄完之后,我才放了心,觉得这样一篇东西,即使今天看来,也并不怎样丢人。

前面也曾提到,正宗白鳥说过,要是把我从椎名刚美写的那篇《二楼上的河上博士》起到这篇《獄中独語》为止这一期間的生活如实地写出来,就会成为一篇不假雕琢的小說。依照他这个說法,也許写到这里,正好把文章結束;不过我却要順便把正式判刑下獄前的一些經過也談談,来結束本篇。

繼續抱着緩刑的希望

不久,我也接到了8月1日开庭公审的通知。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本来就希望公审不要拖到暑假期后的9月里去,幸而如了自己的願。

这时我度日如年地等候着那一天的到来。(我希望能靠那篇《獄中独語》的发表,給我一个緩刑的判决。《独語》結尾所以写着“为了把上面这篇文章作为葬送自己的弔辞,同时使它成为挽救自己的咒文”这样两句話,正是由于自以为通过葬送自己,可以挽救自己;这里所謂“挽救自己的咒文”,就包含了因此而获得緩刑判决的意思。所以,等候开庭公审的日子,也就是等候释放的日子。)我手边有石板和石笔。接到公审通知后,我就在石板上照月历的格式画了一个七曜表,把到开庭公审那天的未来三星期的日子都填在上面,然后过一天就抹去一天。

刑务所里每隔十天左右剃一次髭鬚,两次中間,有一次連帶理发,而我最怕这个。

在外面的时候，我把理发和洗澡同样当成一种休息和享受。工作得疲倦了的时候，要是赶巧天在下雨，或者懒得出去散步，我就往往去理发，来一个脑部按摩。理发店就在邻近，叫美留軒。顾客主要是大学里的一批人。我和那里的掌柜的也搞得挺熟。他曾經当过京都理发学校的校长。无论理发也好，剃鬍子也好，比起在国外留学时代我所經驗的，都要细致得多，舒服得多。尽管有时顾客多，得等一会儿，可是因为我总在沒有事情的时候才去，所以一点也不以等候为苦。遇到这种时候，我就以好比到温泉浴池洗温泉那样的心情，从袖管里摸出香烟，两枝三枝地吸着，等候輪到自己。瘦削的我，然后一屁股坐上那价钱似乎相当高的大椅子，把自己的脑袋暂时交托給别人摆布。对于整天埋头讀書或思索的我来说，这确实是一种最好的休养。至于讲到这个刑务所里的理发，那就天差地別了；每隔十天左右輪到一次，对我来说，那簡直是受罪。

每逢理发或剃鬍子的时候，管理发的看守就到牢房来，突然打开門，把人叫出去。牢房里的人事先并不知道他哪天、什么时候来，可是只要一看到那个看守的营养不良的怪难看的脸，就必须馬上到走廊里穿上草鞋，戴好草笠，飞快地上理发室去。（理发室里有两名理发师；名为理发师，实际上都是服徒刑的犯人。）可是最初的时候，看见一个不認識的看守默默地开門，就根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到了走廊里，也不知道到哪儿該拐弯，怎么走法。可是，稍一迟疑，跟在背后的看守，就要罵人，还用手指来搗人的肩膀。即使上过两三次理发室之后，像我这种对这类事情毫不敏感的人，也还是不能像他所要求的那样快步前进。有时心想大概是这里了，預备停下步来，他却搗着人的肩膀說：“誰叫你停下的。”因为他根本不開口，要是我以为还没有到理发室，走过了头，他就会斥罵：

“倒是往哪里走！”这种地方，非常使人不快。

有一天，赶上我刚刚洗完澡，因为出了许多汗，解开腰带，正在擦身。偏巧这个时候管理发的看守开门了（因为看守穿着草鞋走在棕垫上，完全和猫走路一样，丝毫声音都没有，所以总是出其不意地），我就像触了电那样，马上丢开手里的毛巾，团团缠上腰带，一边招呼说“有劳等候”，一边急急忙忙穿草鞋。

尽管这样，看守仍然捣捣我的肩膀说：“腰带可以边走边束嘛！”虽则肩膀被捣，既不痛又不痒，却叫人怪生气的，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屈辱。

实在这也难怪，像这种下级看守的日常工作，也够受的。他们每个月的收入，初做时是三十多元，做了十几年，尽管达到可以拿恩俸的年限，也不过五十元左右而已；至于工作时间，早晨天不亮就上班，一直要到傍晚开电灯的时候才下班，一共是十几个小时，另外有时还要值夜班，而休假却每个月仅仅两天，所以他们所过的生活，几乎是从来不曾有在阳光下看到孩子的笑脸的生活。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少数人压迫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阶级社会的镇压机构，是十分庞大、所费不貲的，对于下级小公务员的待遇，自然好不了；再说，即使待遇不好，谋差事的人还多得很哩。想到这些情由，他们平常那种虚张声势，也许是无可奈何吧。这就好比被主人不当人使唤的女佣，跑到厨房里拿猫来泄愤，是同样的心理。

不过，受不了的，是我们这些处于猫的地位的人。理发觉得头痛，不用说了；其他就像运动啦、洗澡啦、接见啦，每次被叫出去的时候，只要一接触到那些看守，就觉得头痛。因此，每天傍晚，当我一面自言自语地说“总算又过了一天”、一面从石板的日历表上抹去一天的时候，我心里觉得非常高兴。不管我的主观意图怎样，地球总是以每秒二万九千七百米的速度旋转着。石板上剩下的日

数，毕竟一天天地减少了。“这下理发只剩一次了”，“这下终于不要再理发了”——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边抹去日数，到最后，终于明天就要公审了。

我从包袱里取出秀子早先送来的衣服试穿着。白麻布衬衣、碎花白麻布单衫、罗纱褂子、罗纱围裙，这些就是为了让让我出庭而给送来的衣服。我因为生平从来没有穿过罗纱围裙，曾对秀子说：“嗶嘰围裙已经挺好了”，可是秀子说：“因为报上说大塚先生出庭的时候，都穿了罗纱围裙，才顺便新做的。”就硬送进来了。

看到那条罗纱围裙，就又想起了大塚金之助。据秀子告诉我，大塚金之助的公审是7月15日举行的，当时检察官要求判他四年徒刑。那天，也给大塚担任辩护的铃木律师，从法院回家的路上，到秀子那里去转了个弯，对秀子说：“大塚先生能不能缓刑，我很担心；至于河上先生，让步的程度要比大塚先生大得多，所以我想缓刑可以不成问题。”到18日那天，大塚判决了：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可是检察官当场就采取了上诉的步骤。头脑简单的我，想到这些情节，就转念：检察官先前让我写那篇《独语》，道理就在这里了。还记得有一次和检察官会见的时候，他曾说过：“你是我的老前辈，我从你那里得益不浅；你甚至不妨说是我间接的老师。就因为考虑到这层关系，所以我想在公审以前，找你细细地谈一谈，听一听你的想法，这才请求法院把公审延期了。延期公审，其实是为你的利益着想，希望你不要误会。”我清清楚楚地想起了这些话；特别是最后他自言自语说的那句话：“现在，检察官的上诉，反正不打算提了”，我认为值得注意，因为据说他在大塚的案件宣判时，当场就采取了上诉的步骤。

从窗子里望着夕阳似乎已经落山的天空，心里正在转念：“今天又终于过去了”，想不到这时把我叫出牢房去作接见。原来是公

审前夕，检察官的戶澤不知要和我說什么話，又来找我了。

见了面，戶澤开口就說：“明天終于要开庭公审了。明天我将怎样提起公訴，虽則早已决定，在这里却不便对你讲，一切都得明天到法庭上去說。不过有一点可以告訴你，就是一切都是根据上司的命令。”

然后他又說：“我既沒有答应让你保释，也沒有答应让你緩刑，是不是？这一层也請你預先想通了才好。”

不知道他在担心些什么（想不到看来他竟是个胆小鬼），一再声明“沒有答应过什么”，虽然我並沒有加以否认。我肚子里轉念：“今天既不給我香烟吸，脸色也不好看，看来情况不大妙”，就只回答了一声“是的”，別的話什么也沒有說。因为我不开口，戶澤自然也就不好永远重复着那句話。为了掩飾他的狼狽，他轉變了話头說：“你認識山田国雄吧。这次也被捕了，关在丰多摩哩。”

本来就記不大牢人家姓名的我，觉得这个名字既沒有见过，也沒有听說过。

“我完全不認識。”

“可是对方却說他把你当作老师看待哩……。我曾把你写的那篇《独語》拿給他看过，他看了之后說，那篇文章里写的全是个人方面的事情，劝人轉變方向的地方一点也沒有。讀那篇文章的人，似乎誰都是这样想的。”

戶澤說这几句話的时候，口气很不滿。事实上，当初他叫我写那篇《独語》，还以为又获得了一件法宝，立下了大功哩。正因为他們认为文章里声明决心脫离实践的一套話，有助于无产阶级政党方面的被告們的“教化善导”（在与佐野、鍋山等的轉變方向声明书不同的意义上），所以司法省行刑局才不厌其煩，在向新聞記者发表以前，火速地把那篇东西油印了出来，分发给全国的刑务所和

检察院。岂知一切都枉费心机，当局所预期的那种性质的反应，并没有发生，这就使户泽逐渐觉得不满起来了。至于我呢，本来就有意識地力求不損害同志們的战斗意志，希望在那篇文章里說明，沒落的不过是河上肇一个老头儿，至于馬克思主义，非但不会沒落，而且将永远无限止地繼續发展下去，在被剝夺了写作自由的情况下，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尽可能作一些宣传，来証明馬克思主义的真理。所以我暗地里想，尽管你檢察官先生不滿意，我也爱莫能助了。

过了一会儿，户泽談起了明天的事。

“明天审判长一定会提出三个問題来問你。第一个是，将来的生活方針怎样；第二个是，由于你历来所散布的馬克思主义的毒素，許多青年走上了歧路，許多家庭发生了种种悲剧，对于这些，你觉得該負怎样的責任；最后第三个是，现在你对日本共产党抱着怎样的想法。我說这些話，并非和你商量研究；其实无論是誰，都会想到，上面所說的几点，审判长一定会問起的。你对于这些問題，将怎样答复，似乎可以預先想想，作好准备。当然嘍，对于这些問題，并非一一都得加以答复。声明自己对于某个問題不好答复，可能也不失为一种态度。不过，不管怎么样，要是事先不拿定主意，临时会发慌的。虽則多此一举，因为想到了，也就忠告一下。真是，檢察官簡直比律师都亲切了呢！”說完，他干笑了。

“多謝多謝。”除了这样应酬他而外，我也沒有別的法子。

尽管户泽說得那样清清楚楚，我在接見完毕、回到牢房里去后，依然沒有放弃緩刑的希望。才在一个多星期以前，秀子来看我，还曾对我說：“即使公审完了，也不见得会馬上回家，在里面請不要焦急，耐性些吧。”我在口头上虽則回答“好的好的，我也早有这个精神准备”，可是肚子里却以为只要公审一結束，当天就可以

回家了。不管檢察官提起怎樣的公訴，判決准予緩刑，大概是不会錯的了。我一心这样想着，所以认为释放的日子到底就在眼前了，当天晚上，躺下就睡着了。

第一次公审

我的公审是8月1日上午九时四十分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二陪审庭举行的。

这个法庭的正面是高高的平坛，那里是推事和檢察官坐的地方。长方形的法庭，左右两边也有稍稍高出地面的平坛，設有类似議會里的議員席那样的座位。那是律师席，有时那里挤滿了成批的律师，大张声势，形成一种示威。被告席和旁听者席，設在中央的平地上。这个第二陪审庭，号称大法庭，是地方法院里最大的一个屋子。旁听者在开庭以前，已經到了八成光景了。

我戴了那頂深深的草笠，上了手铐，由刑务所里跟来的一个看守长和两个看守前后护送着，慌慌张张地抄小路从律师进出口进了法庭（普通的过道上，有各报館的攝影記者守候着；不知道为什么緣故，刑务所的看守慌慌张张地抄过了那条路沒有走）。我一走进法庭，旁听者的視綫一齐集中在我身上了。这时，他們让我摘了草笠，給我卸了手铐。脫下草笠，向旁听席一看，发现我弟弟左京伸长了脖子在望我哩。这天秀子据說为了避免惹人注意，沒有坐在旁听席里，却守候在法院里面的律师会館里。因为头天《东京朝日新聞》的記者找了她三次，要拍照，所以她这天和左京分成两路，开庭后才来的。

过了一会儿，鈴木和上村两个律师，穿了律师服，推开门出现在律师席上，向我微微点头示意。我最初总以为今天在公开庭审

以前，律師總會交代我一番什麼話；到這時才知道，就連在法庭上，也不允許和律師自由交談。

接着，穿了法官服的藤井審判長，帶同兩個陪審推事，推開平壇後面的門，出現在正面了。審判長坐在中間，左右兩邊各坐着一個陪審推事。在他們的后上方，象征天皇制統治的皇家的菊花章，放射出金色的光芒，使我想起了憲法上的規定：司法權在天皇名義下由審判長執行之。就座的两名推事，來得正合適，一邊一個，身材都很小，中間的審判長就顯得魁偉非凡，配合得很好。審判長在他那頂制帽下，戴了一副黑色粗框架眼鏡，睥睨着室內；陪審推事把文件攤在桌上，看着。一個書記官早已在平壇上的左邊一個席位上坐下，在展紙、研墨。檢察官戶澤，今天也穿了法衣。在審判官席的右邊，中間隔着一定距離，和書記官席大致相對稱的地点，設有一個桌子，那就是檢察官席。戶澤一面扇着扇子，就了座。和往常穿着西裝的時候一比較，今天他的相貌顯得大有不同。

公審開始了。我的姓名被宣讀後，我就走到擺在審判長前面壇下的一張桌子那里，背朝着旁聽者，站在審判長面前。

審判長開始訊問預審筆錄里所記載的一些事實。他說話聲音洪亮，屋角里都可以聽到。而我回答的聲音呢，儘管審判長預先提醒過我要講得響些，以便書記官記錄，聽來却似乎微弱得可憐。其實我身體雖弱，因為有多年教書和演說的經驗，所以並不是不能高聲講話。不過那一天，早晨五點四十分鐘在刑務所里吃完早飯，始終沒有喝過一點水，再加本來生就一副極容易興奮的體質，即使在平靜的環境里，新陳代謝也很快，因此在受審的時候，嘴巴簡直渴得冒煙，舌頭不聽使喚，再也不能高聲說話。再說當時我又未能保持昂然的態度，這就無疑地使我當時的模樣越發顯得可憐相。

我的犯罪事實極其簡單，而且我既沒有否認也沒有要求更正

預审笔录里的事实，所以訊問进行得很快。

訊問完毕預审笔录里的事实后，审判长果然向我提出隔夜戶澤檢察官所說的前途生活方針以及对过去言論行动的责任問題。可是我所最怕提到的对日本共产党的想法一层，他却一个字也沒有問起。

审判长訊問完毕后，宣布休息几分钟；檢察官陈述起訴要旨，是休息以后从十一点四十分开始的。他的陈述，讲得又快，声音又低，一点精神都沒有，簡直像聊天一样。可是像“被告在长时期中向社会散布馬克思主义的毒素”啦、“驅使被告走到这步田地的，被告本人认为是他的科学上的良心，实則不外乎意志薄弱而已”啦、“被告已經是五十五岁的老年人，还参加共产党，这完全是出于老年人的不服老”啦之类的刻薄話，却深深刺痛了我的神經，使我产生难忘的不快和洗刷不掉的侮辱感。我心里很气愤，觉得尽管是檢察官，照說也沒有侮辱別人的权利。《东京朝日新聞》那天的消息里，写着这样一段話：“当檢察官列举对被告有利的各点、說到老年人不服老那句話的时候，被告不禁啜泣了。”其实呢，我尽管是个懦弱的人，也不至于懦弱到在稠人广众之前啜泣的地步吧。这样的說法，是使我有點为难的。

檢察官說了一陣刻薄話之后，改变了調子，提到了我的《獄中独語》，說什么“被告不顾一切反对（其实我独坐在监牢里，根本听不到反对的声音，而檢察官却这样說），发表了那样一些想法，从他这种东方人所固有的勇气和正直中，可以清楚看出河上这个人的面貌”，什么“世上一些只会空談的知識分子革命家，讀了那篇声明书，也該知道自己的命运了吧”，什么“光我个人，就已听說有不少知識分子，讀了那篇文章，脱离了革命运动”。这些話，也使我感到无話可說。让人家听到这样的話，我觉得害羞。那篇《独語》，是为

了爭取緩刑、不得已而写的，可是让檢察官这样一稱贊，我却深深感到羞耻，觉得自己从此完蛋了。

正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檢察官的語調又变了：“既然說要脱离实际运动，为什么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馬克思主义来一个批判呢？被告說他仍然信奉馬克思主义，这就是被告的打肿了脸充胖子的地方。佐野、鍋山等人的轉变方向，說明了什么問題呢？他們都是到莫斯科去过的人，結果他們倒反彻底地轉变了方向。被告坐在监牢里，必須再好好地冷靜地想一想，佐野那些人为什么要像这样轉变方向。”說到这里，他放高了声音說：“对于被告河上肇，本职认为应当适用治安維持法第一条第一項前段的规定，处以七年有期徒刑。不过这不是說整整七年全要执行徒刑。要是他悔改得好，不妨斟酌办理，准予假释。”就此結束了他的陈述。然后无动于中地坐下，重新开始扇他的扇子。

坐在旁听席上的左京，一听到要求判处徒刑七年，吃了一惊，痛苦地搐动着眉毛。他掌心里捏着一大把汗。只管注視着哥哥的他，起初觉得哥哥的身子在发抖(事实上当时我也許的确在发抖。我在前面也曾說起过，我只要稍微受到一点感动，我的身子馬上就发抖了。坐着还不要紧，站在那里，再也沒法不让人家看出我在发抖)，后来鎮靜下来，等到檢察官要求判处徒刑七年的时候，哥哥的头沒有动一动，他这才略为放心了。

等候在律师会館的秀子，听到从法庭退出来的律师告訴她檢察官陈述起訴要旨已經完毕、結果要求判处徒刑七年的时候，也吃了一惊，觉得意外地重。

到了下午，起初是上村律师以友人的資格、后来是鈴木律师以首席律师的資格分別作了心平气和的辯論，指出本案作为违犯治安維持法的案件來說，不应当适用該法第一条第一項前段的规定，

却应当适用后段的规定(治安維持法第一条第一項的内容是这样的:凡以变革国体为目的,組織結社,或担任該項結社之重要职位及其他領導职务者,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禁錮;知情而参加該項結社,或有实现該項結社之目的之行为者,处以二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禁錮);即使要处以体刑,也只能处以二年的最短有期徒刑,而且理当准予緩刑。我心里本来在想,我的罪状摆得这样明明白白,怎样能为我辯护呢。可是鈴木律师,到底不愧当过东北大学的刑法教授,他的辯論,引証了德国刑法学家的最新学說,把主力放在法理学方面,不光是一味求情討饒。亲自在旁听着的左京,后来甚至报告秀子說:“鈴木律师的辯論,真是出色。像他那样的辯論,哥哥也会感到滿意吧。”可是我本人呢,一开始就认定律师辯論这类花样,反正不可能影响到量刑的輕重,所以并没有像左京所想像的那样高兴。

律师辯論完毕后,就万事大吉。审判长宣布本案定于8日上午九点钟宣判,公审就此結束。

我当时觉得实在太簡單了。本来认为檢察官的起訴和律师的辯論,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要紧的是审判长的訊問,可是那訊問却没有多少时候就草草結束了。对于这一层,我总觉得心有未足。过去牽連在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里的共产党被告們,經過一次一次的审判,到现在还没有判决,而我的命运,却在今天一天的公审里就草草决定下来,这总使人觉得有点放心不下。

秀子当夜在日記里写道:“即使不到公审庭去旁听,我也觉得很累了。今天他想必够疲倦了,而且可能很灰心失望。明天就准备去看他。”

宣 判

从第一次公审到第二次公审的一星期中，我只管想着缓刑問題。

检察官要求的是徒刑七年。而缓刑必須在两年以下才成。七年和两年，相差太远了。要是照这个样子，缓刑是绝对沒有希望了。所以应该赶快想办法。这样一想，我就坐立不安起来，终于給审判长和检察官每人写了一份申請书。

“今后我决心不仅不宣传馬克思主义，連馬克思主义的理論研究以及这方面的著作的翻譯(包括《資本論》的翻譯)，也完全加以放弃；换言之，即决心把作为馬克思主义学者的自己的存在，也一并加以葬送。此节敬祈諒察。”

这就是我的申請书里的主要意思。也就是說，在《独語》里，我虽則葬送了共产主义者的我，然而对于馬克思主义学者的生活，却仍然加以保留；现在就更进一步，連馬克思主义学者的我也一并葬送了。下决心下到这种地步，今后我的身体只不过是生理上的繼續存在而已。既然自己亲手毅然作出这样的处置，那末無論从哪方面看起来，把我放出监牢，也应该不至于再发生什么問題了。但願法院方面能考虑到这一层，在量刑方面加以斟酌。这就是我提那个申請书的用意。

在当被告的时代，这时是我精神气力最最萎靡沉滞的时候；煩惱焦急的結果，终于演出了这样的丑态。后来每次回想当时的情形时，我总懊悔当时为什么沒有能处之泰然，沒有能保持理直气壮的态度，而感到非常羞耻。

8月8日终于到了，宣判的日子到了。

因为陪审推事生了急病，开庭时间大约推迟了一小时。我还像往常一样戴了草笠，加上手铐，来到上次那个法庭；一看，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旁听者，几乎座无虚席。左京在一小时前早就来了，仍旧坐在前次坐的旁听席一角，伸长了头颈，瞅着我走进来。我马上觉察到了。没有见到秀子，我想她今天大概仍然在律师会馆等候着。

当我走进法庭的时候，正在对别的被告进行宣判。平地上的被告席上，一个年纪四十左右的人，穿了一件又脏又破的单衫，面相丑陋，身材矮小，俯倒了头站在那里。

神采奕奕的审判长，戴了一副粗框架眼镜，手里拿着文件，正在平坛的正中央宣读着判决书。他声音宏亮，念得比较快。根据他念出来的判决书，这个被告似乎是诈骗一笔为数不大的钱财的嫌疑犯，由于证据不足，所以宣判无罪。审判长念完判决书后，改变了口吻说：“世上有一类人，在宣判无罪以后，往往得意洋洋，自以为自己的清白得到了证明；其实拿被告的情形来说，只是由于证据不足才没有判罪罢了，决不能自以为清白。懂得了么？所以，应该好好地体会这一层，当心今后不要再发生什么问题。”这样，按照法规，作了“警戒将来的训谕”。

接着又有一个被告站到桌子前面，那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头发留得长长的，气色不大好，似乎很怯弱。他身上穿的是质量不高的一抹色赭黑罗纱褂子，半新不旧的哗叽围裙。

根据审判长所宣读的判决理由书，这个年轻小伙子所犯的罪，似乎是帮助一个艺妓自杀，那个艺妓是他的情妇。判决是徒刑两年，但斟酌情况，准予缓刑三年。

判决书宣读完毕后，那个年轻小伙子顿时面露欢喜的笑容，向探身站在律师席上的一个律师丢了一个眼色，声明对于判决没有

不服。

这时我的姓名被叫到了。当我走向指定的被告席的时候，旁听席上嘈杂了一阵。审判长刚刚读了“判处被告河上肇徒刑五年”的判决主文，旁听席上的新闻记者们就发出一片咯嗒咯嗒的皮鞋声，争先恐后地走了出去。接着又念了一会儿判决理由书。在我背后一眼不眨地注视着我的左京，觉得我还是和往常那样，脑袋微微侧向左边，样子意外地镇静。

而我呢，嘴里虽则没有说出来，实则直到这时为止一直渴望得到缓刑。对法律一窍不通的我，当时以为如果法庭上一旦判我缓刑、检察官也当场声明没有异议的话，那末不等到走出法庭，也许就会获得释放了。我心想，要是真有这样的事，那末即使一两丈路，我也不愿意再让看守押着我走了。那时我将和刑务所里的看守当场一刀两断，把法院里让穿的麻里草鞋脱在法庭里，光了一双袜子走出法院大门，让左京叫辆汽车，和大家一道回家。——一心急着早一刻半刻出去的我，几天以来，一直在脑子里描绘着这种琐碎的空想。而现在，空中楼阁一下子土崩瓦解了，结果判的却是意想不到的重刑：徒刑五年！

不过，我的空想犹如橡皮球那样刚一破裂，我就顿时翻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对于每次遭逢的命运很想得开我，顿时拿定了主意，心想：“好吧，就坐它五年牢吧。”判决理由书刚念完，我的心已经安顿在牢狱里了。

宣判完毕，我立即被带回临时牢房。今天的临时牢房，就是前次来过一趟的那间最大的临时牢房，里面铺着许多张席垫。我一回到那里，马上脱去褂子，松一松一直使着劲的肩膀上的筋肉，当着瘦骨一把的胸口扇着风。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徒刑五年的判决，却和律师都不能说一句话：那样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孤独的

感觉，强烈地支配了我，我恨不得能和墙壁说几句话。这时，那天护送我上法院的看守长，忽然从走廊里探进头来，问道：“当时我恰巧离开了一会儿工夫，没有听到，判的是几年徒刑呢？”

“五年呀。五年可够受的，我马上就会进监狱执行的。哈、哈、哈、哈。”

我一面这样回答，一面奇怪自己的声音居然那样高。当时我还对自己进行了一番省察，觉得：尽管我自以为心里一点也没有波动，可是在这种时候高声大笑，毕竟说明我有几分兴奋。

不久看守长又跑来说：“刚才我见了户泽检察官。他说马上服罪不好，要我务必告诉你，还是和律师从长商量商量再说。”说完他就走了。

其实，公审隔夜，户泽还特意跑来刑务所对我说过什么“明天的判决，可能比检察官所要求的要轻得多”、什么“明天只有一个宣判，所以我不打算参加了”等等的話。当时我回答说：“无论判决是轻是重，我都准备立即服罪。”（事实上我早就打定主意，决不上诉。）这时户泽似乎发了慌，一再热心地对我说：“何必急于作出决定呢？还是不慌不忙地想一想的好。我劝你务必这样办。”——我认为这可能是检察院方面想尽量使被告长期处于判决不确定的状态下、以便他们从中操纵的一种手段。

穿着浅葱色囚衣的担任打杂的犯人，给我送来了开水。趁此机会，我打开了那天早晨从刑务所里带来的盒子饭。那是秀子托牢饭铺连同早饭给送来的。知道今天是宣判的日子，熟悉这类事情的牢饭铺，为了讨个吉利，在盒子里给盛了赤豆饭。我苦笑着独自祝贺徒刑五年。

吃完了饭，因为疲劳不堪，虽则明知会挨到看守的骂，我仍然围裙也不脱，就把手当作枕头，躺倒在席垫上了。不时从眼洞里窥

探的看守，那天总算一句責备的話也沒說，就过去了。

不久天黑了，不消說，我和其他被告一道乘上护送汽車，仍旧被解回原来的刑务所。

撤回上訴

上訴期間，只有七天，要是过了七天的期限，判決就算确定，再也无法挽回了，因此听从了律師的劝告，姑且办了上訴的手續。这样，我就每天每天繼續过着毫无意义地吃飯睡觉的未决监生活。光是看那个管理发的看守那张討厭得要命的臉，就够受的了，可是暂时却仍旧不得不让他搗我的肩膀。日子过得实在忧郁到极点了。

这样过了三个星期，早晨和晚上已經显著地感到秋意了。但是，第二审哪天开庭，却全然不见分晓，准予保释的希望也沒有。我开始感觉到我仿佛被单独扔在一边的一样。我心里想：“老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如干脆快点进監獄执行。”但是呆在单身牢房里，一个商量的人也沒有，感到自己犹如坐在一望无际的曠野里，任凭风吹雨打，却不知道走哪一条路是好。

后来，9月7日早晨，有一个每次巡視的时候都对我表示好感的看守部长，在走过我的牢房的时候，来到窗边，提醒我說：“恩俸法不久就要修改了；修改之后，只要被判两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就不再能領恩俸。根据现行的恩俸法，判刑在六年以上才失去領恩俸的資格，所以如果现在进監獄执行，就可以保牢恩俸。这一层，是不是值得考虑一下？”

我虽然早就領着恩俸，可是从来沒有查看过恩俸法的规定。至于恩俸法不久就要修改的消息，也一无所知。尽管旁人也曾提醒秀子，恩俸法不久就要修改，可是她考虑到决不能使我让这类

事情左右了我的行动，所以故意不對我讲这方面的事情。可是从看守部长那里知道了这事以后，我就此独自作出了最后的决心，觉得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根本没有问题，只好把上诉撤回。于是，在和秀子以及铃木律师等商量了一下之后，终于在9月15日那天，办好了撤回上诉的手续。这样，按照法规的规定，我的刑期就从那天算起了。这也就是说，从1933年9月15日这天起，我要坐五年牢，开始一个一千八百二十五天的长途旅行。

“古人仅仅出外作半年的旅行（固然从前的旅行和现在不一样，是性命攸关的旅行），就写出了‘三千里旅程的离情别绪塞满胸膛，泪洒在幻变无常的歧途上’的句子。现在，眼前摆着一千八百多天的长途旅程，潦倒的老书生，哪能没有秋天的萧瑟之感呢？但是，我还是边吟哦着‘前人诗歌里说，到什么山砍什么柴，多旷达呀’的短歌，精神抖擞地‘迈着大步’出发了，所以请您放心。希望好歹平安无事地完成这个旅行，和您重新晤聚。谨祝健康。”

这是办妥撤回上诉手续后的第三天、9月18日那天我写给朋友的告别信。和以前不一样，现在只要过去一天，就算是走了一千八百分之一的路程。尽管为数极微，刑期这样一点一点地少下去，总使我心里有了一个指望。可是，以后还有一千八百多天！这就是说，现在我五十五岁，到那时我就六十岁了。不到六十岁，我就不能探望我的老母，不能和妻子团聚，不能抚摩外孙女们的头，不能和知心朋友作半天的清谈。当我一边从牢房的小窗里望着飘满白云的秋天的晚空，一边思忖今天居然又走了一千八百分之一的路程的时候，我不禁感到前途实在辽远得很。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及早办了撤回上诉的手续，是对的。当时我本来不怎么把恩俸放在心上，以为只要写点稿子，总能够养得活妻子；岂知后来情况大有变化，到今天，恩俸竟成了我的唯一收入；

只由于有了恩俸，眼前才能活命而不发生问题。所以现在痛感当初及早撤回上诉，是做对了。

当时住在须磨的舅舅(今年已经九十岁了，正月以来，卧病到现在，生命垂危；当时照算还不到八十岁)，写信给我(寄到我家里)说：“上诉一事，我大不赞成。应当拿出这样一点勇气来：判处五年吗？好吧，就坐它五年！判处十年也不怕！”那时我正当不知怎样办才好的时候，听到舅舅信上说着这样的话，还认为他缺乏同情心呢。现在想起来，才知道那正是最好的忠告。

五年徒刑，我当时虽然觉得太重了，可是第一审没有判得更轻，这归根结底对我有好处。因为，要是第一审判轻了，检察官一定会上诉。不仅这样，公审的迅速举行，也对我有利。如果审判长稍稍犹豫一下，把公审拖到暑假以后，那末我不仅将失去恩俸，连下狱后不久因皇室喜庆而颁布的一般减刑，也挨不上了。

总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一切情况，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幸运地展开的。

当时我虽然办了撤回上诉的手续，我的刑期就从9月15日开始计算，但是，因为司法省的指令还没有到刑务所，所以刑务所方面按照规定，还是给我以未决时代的待遇，让我暂时仍旧穿自己的衣裳。

过了十天，到9月26日的早晨，我被叫出牢房，带到那间初来时呆过的收容者号房。在那里，我脱光身子，然后领到一件单衣、一条腰带和一条裤衩。三样东西都是赭色的；由于历次洗濯，颜色褪了，再加积满了污垢，使人觉得世上恐怕没有谁能设计出比这更使人不愉快的颜色了。衣服非常小，穿到身上一看，瘦虽瘦、个子却高的我的腿，半条露在外边。那条腰带，腻滋滋地沾满污垢，皱成一团，尽管我的腰身瘦小，也只够束一圈。(刑务所里忌用一切

长绳和长带，因为怕人上吊。)裤衩的形状像个运泥砂的畚箕，据说就叫畚箕裤衩，以前我从来没有穿过。这是半条手巾长短的一块小小的布，前后钉有带子，那带子一边是个圈圈，一边可以扣起来。头脑迟钝的我，拿在手里，半天也不知道怎样个穿法。这时，在旁边看着的看守，不知道是可怜我呢，还是觉得我可笑，脸上露出善意的微笑，教我說：“把一只脚伸进圈圈就成啦。”

我苦笑着回答了一声“原来是这样”，把三样东西穿好，顿时觉得身体轻快了许多，仿佛脱去了一层皮一样。

新发给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既小又短。身体一伸直，脚就露出一大截。被子冷天给换厚一些的；我这才知道，原来监牢里暑天也给盖薄被哩；可是褥子却始终是那条又薄又小的，不给换。这和昨天我还用着的褥子一比较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我原来那条褥子，是秀子因为深知我怕冷，又想到监牢里不生火，冷得很，所以新做了一条特别大、特别长的厚褥子，里面塞了特别多的棉花，给送进牢里来的。那条褥子被拿走以后，我从王子一变而为乞丐了。

没有衬衣、没有袜子、也没有短裤和肚兜的我，在已是深秋天气的9月底，早晚比较冷的时候，就像被扯光了羽毛的小雀一般，每天躲在牢房角落里发抖。夜晚睡下后，看到自己身上穿着通红的寝衣(这里所说的寝衣，并非另外又有那么一件衣裳，白天黑夜就只身上那一件)，一时连自己都毛发悚然，不免感到恐怖。

发下来的一日三顿麦饭，很难下咽。最初发给我的，是分量最少的十等饭，然而我仍旧要用开水泡着，好容易才能吞下一半。和被褥同样，食物的变化也太急剧了。昨天以前，还一直让牢饭铺给送盒子饭，一天送三顿，送来的时间比一般发饭时间要早一些。房门的眼洞下面，开有一个四方形的窟窿，即使不开房门，也可以从那里把不大的物件递出递进。窟窿外面有一块盖板，用铰链钉牢

在門上。送东西进来的时候，揭开盖板，它就和房門成一直角，变成一块可以在上面放东西的攔板。我住的那間牢房的盖板，过去每天早、中、晚都揭开，在板上放些飯盒啦、菜湯瓶啦、面包啦、牛奶瓶啦之类的东西。每次送东西来时，管这部分事情的看守总要把小小的印泥盒子和作收据用的細长紙条递給我；而我呢，就在上面按指印。这些事情，一百多天以来，已成刻板文章，现在也突然中断了。所以，我心里觉得寂寞得很。——6月中旬还有五十二公斤半的体重，下獄后才两星期，一下子减到了五十公斤。当时我很担忧，心想这样下去，将来究竟要减到几公斤为止呢。总而言之，当时我的处境，就像所有的绳子都断了，逐渐向很深的井底下沉一般。现在的我，除了把希望寄托在可能由活到九十六岁的祖母遗传給活到八十岁的父亲、再由从父亲遗传給我的、全身細胞的环境适应性而外，再也沒有別的办法了。

下獄后的生活

下獄后的头三天，他們叫我靜坐默思；三天一过，就叫我开始做工。对于刑务所里的一套规矩一无所知的我，听到要叫我做工，心里吓得卜卜跳，以为不知要給徒刑犯們做怎样的苦工呢。幼年时代，住在故乡的时候，曾經看到穿着赭色獄衣的囚犯們，每两个人用鏈子鎖在一起，被看守不住地用粗青竹棒毆打着，运泥运砂。现在我又重新記起了那个情景。

指派給我的是室內工作——糊气球。他們对我說：照规定，一天要糊一百四十四个；但是开头几天，做不滿定額也不要紧，只是不准做出不合规格的制品，以致糟蹋材料。

材料是切成一定形状的彩色蜡紙，每两百张一刀，用小竹片展

平，刮上薄薄的浆糊，不让飞散。发下来的材料，颜色有好几种。拿到材料，就把它排成两行，放在小矮桌上，刮上浓厚的浆糊，然后交错地把两行材料一片一片揭开，拼贴在一起。拼拢八片，就成了一个气球。

这样做出来的气球，都是折叠起来的。等到干透以后，吹上气，就变成圆圆的气球了。于是再用拳头把它压瘪，使成碗形，叠起来，用绳子穿进中央的小孔里，把它穿在一起，放在那里。到第二天，打杂的犯人就会来收集，点清数目拿走。这种杂役夫，对同道监犯的态度，非常官僚主义。

我整天几乎一分钟也不休息，努力干着这个不习惯的工作，可是仍然很不容易提高工作效率。

我的个子高，整天以一定的姿势弯着身体在很低的白木小矮桌子上工作，一到傍晚，腰就痛得仿佛割裂开来一般。我几乎是以匍匐着的姿势才勉强支持住身体，工作到夜晚。晚上，因为屋子里只有一盏五支光的电灯装在高高的天花板上，所以黄颜色的蜡纸特别不容易对付，自然只好拚命绞尽衰退的目力来工作，弄得两只眼睛刺刺作痛。尽管已经摇了就寝铃，附近的牢房里大家都睡得没有声息了（关在这个监牢里的，除了极少数做杂役夫的徒刑犯而外，全都是未决的被告），已是徒刑犯的我，却非等值夜班的看守吩咐我“可以睡觉了”，不能歇手。有时候我几乎疑心看守忘掉吩咐了（事实上也必然有忘掉的时候），就寝铃摇过很久很久，才听到“可以睡觉了”这句话。

早晨还没有摇起床铃，就被叫起来。我简直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候让起身，什么时候让睡觉。普通刑务所里，10月里的起床时间规定是上午五点半，就寝时间是下午九点。我当时没有钟表可看，所以在时间方面也像吊在半空里一样。据一个曾经坐过

牢的人說，最痛苦的，是時間方面、空間方面都弄不清楚自己所處的地位。像這種空虛而寂寞的感覺，不是親身坐過牢的人，無論如何也體會不到。

總之，在這個監牢里“服徒刑”的最初的經驗，真是痛苦極了。我一輩子都忘不掉當時所感受的那種陰郁心情。

下獄後第四天上，輪到了我最厭惡的理髮日。被那個沒有好臉的管理髮的看守叫出去後，我邁着小步急急走向理髮室，剛跨進門檻，等候在那裡的雜役夫（穿了淺蔥色囚衣的徒刑犯，名稱雖是雜役夫，其實却是專門給人理髮的），一看到我的臉，幾乎和看守同時以低沉的音調自言自語地說：

“剃掉它！”

“剃掉它！”

我雖則已經穿上赭色囚衣，這時上唇和下巴上卻還留着髭鬚，算是未決時代的一個紀念。他們兩個人說要剃的就是那髭鬚。我也早已料到髭鬚要被剃掉，可是沒有想到剛坐上椅子，那個雜役夫就取了一把鈍口子的剃刀，猛然給吱吱地剃起來。那一天本來輪到剪髮，我總以為會按照往常那樣的次序，先剪頭髮，然後剃髭鬚。而且，即便剃髭鬚，也指望他先用剪子剪一道（因為我的胡子長），然後蘸些水，塗上胰子，再用剃刀剃。並且還預想着這樣一種情景：對方帶笑招呼我說，“對不起，今天得給你把髭鬚剃去”。結果，哪里知道預想完全落了空。看來，雖然大家同是徒刑犯，那個雜役夫卻早就對我所留的髭鬚抱著一種莫名其妙的敵意，好容易才慫到了今天，而現在，就以一分鐘也不能再耽擱之勢，給我來了一個冷不防。——回到牢房後，我用手巾按着下巴上流出來的血，不禁想到隱藏在人心裡的那種毫無意義的殘酷和敵意。

不久就是 10 月 20 日。這一天，是我五十四周歲的生日。因

为每月只准有一次接见，所以我和秀子早就约好，10月里她就在那天来看我。

等候了许久的20日到来了。早晨起身一看，天上阴云密布，刮着风，马上就要下雨的样子。

我把大堆彩色纸叠成斜坡，涂上浆糊，开始做气球，结果没有做了多久就被叫出牢房。因为要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刑务所去了。

这个市谷刑务所，是一个所谓未决监，一个专关处于未决状态的被告的特种刑务所。所以我早就知道，已经移付执行、穿上赭色囚衣的我，早晚将被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那个日子，今天终于到来了。

被叫了出去的我，对于这个一百几十天来昼夜都呆在内的牢房，也产生了感情，很想和墙壁讲句分别的话，临走时还再三回头向它看。（人这样东西，的确是这样的：尽管并不是值得留恋的东西，一旦离别，总不免对它有一种惜别之意。）对于已经做好的三十多个气球，和刚涂上浆糊的彩色纸，也感到有些舍不得。——成了徒刑犯的我，除了一副老花眼镜而外，没有从牢房里带出任何其他“私有财产”。

押送汽车由穿了制服、佩了剑的一个看守长和一个看守部长护送着，沿着马路只管往东开去，开过上野广小路，又向东北疾驶。我心理转念，这也许是我看到自由天地的最后机会了，就向左右两边的窗外观看。街上到处是男男女女，匆匆忙忙地来来去去，谁都没有向我看一眼，这使我觉得有些凄凉。

早晨就像要下雨的天空，终于下起雨来了。风刮得越来越大，细雨打在汽车的玻璃窗上。我冷得发着抖。

汽车开过千住大桥，再开过架在荒川溢洪道上的千住新桥，猛然弯向右边，沿着河岸，在长堤下一股劲地向南驶去，不久开上了

两旁矗立着小菅刑务所的职员宿舍的新马路，然后开始放慢了速度。爬满在马路两旁混凝土墙上的常春藤，叶子已经发红，凋落了一半。我从车子里看到这个情景，知道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荒川堤下，葛饰原野的一角。以高高的草绿色了望台兼钟楼为中心，南北两翼矗立着使人联想起莱茵河畔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古城堡那样的灰色混凝土三层楼房，每幢楼房可以关六百多人，另外还附设有十多栋工厂和广袤的农场，四周用老高老高的混凝土厚墙围着。——这就是小菅刑务所，就是为了今后五年之内把我从社会上抹煞，而打开黑漆铁门把我吞了进去的军部的、警察的、半封建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牢狱。

(1945年6月19日脱稿)

封面
正文